传统与现代 大学、党派、会社、报刊……
茶馆、会馆和士绅团体
咖啡馆、沙龙、公共媒体、同人刊物和近代知识人团体

边缘与重心 北京、上海、广州、昆明……
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的城市生活和世俗文化
晚清沿海通商口岸的崛起、租界的出现，近代知识生产体系的形成
民国以后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初具规模

断裂与新生 左联、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
科举和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以儒家文化为共同价值观的思想框架解体
从朦胧且短暂的新文化联盟，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流派，他们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光谱

有为有守

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许纪霖 等著

用社会史的方法打开思想史的世界
细解近代文化名流的“朋友圈”
理解近现代中国文化源流的必读书

许纪霖 瞿骏 宋宏 王晓渔 王儒年
唐小兵 储德天 郑志峰 两代学人传承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初版序言（2008）

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49页。

近20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肇端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该“文化热”后来被称为“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即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格外凸显出来。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启蒙大众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体现其社会身份的，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以及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十多年来，这两个研究取向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来说，都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质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21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并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文化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

在这当中，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史，特别是从都市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这一研究路径重点考察

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如何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课题。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施加公共影响。

本书的宗旨，乃是从都市空间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视野观察都市空间，试图将都市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研究相结合，开拓知识分子研究新的研究论域。具体而言，本书涉及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包括实体性的物理空间和虚拟性的文化空间）、现代知识分子所凭借的各种社会建制（报纸、杂志、书局、社团、学校等）、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及公共交往等研究。希望通过若干年的成果积累，本书的出版能够在城市文化和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拓展出一个新的方向，无论在研究理念、研究论域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下面，借本书出版之际，我就如何将都市研究与知识分子研究结合起来的问题，谈一些个人的浅见。

一、

都市空间网络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时间为脉络的社会，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的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近代社会更多的是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于是，考察近代社会的空间关系，特别是都市的空间网络，便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新的问题意识。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和活动于一定具体的空间关系之中。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1—34页。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儒家士绅所活动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们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由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也就是说，他们活动的空间基本上是自然的、有限的、固定的和非流动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和精神的联系。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晚清，作为一代重臣的曾国藩在率领湘军远征的时候，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乡土之根，忠告自己的子女们要记住“耕读为本”。

参见［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9—579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5页。

不过，到了明清之际，伴随着江南地区商业城市的崛起，一个过去没有过的绅商阶层（即有商业背景的绅士）出现了。[注]过去的乡绅主要集聚在乡村，但是到了明清时代的江南社会，一批读书人开始往城市聚集。在城市里面，发展起书院、会馆和青楼等一些新的知识人活动的空间，这为近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脉络和前提。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社会中的青楼。青楼作为一个明清士大夫公共交往的重要空间，其功能很类似于18世纪法国、德国的贵族沙龙。在沙龙和青楼之中，必定有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主人，以她为核心，周围聚集着一批文人墨客，高谈阔论，引为同道。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这样描写以柳如是（河东君）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聚会："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夕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注]

近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中，近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近代知识分子是近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近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然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都市的公共空间不是自然的、历史的，它们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像蜘蛛一样，都市人无时无刻不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建构各种各样的空间网络，并在这样的空间网络中实现自我的认同。

参见［法］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见包亚明主编：《都市与文化》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8页。

福柯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之中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的物质存在。[注]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

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正是这些近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二、

管理型公共领域与批判型公共领域

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上述这些公共空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在许多时候执行了政治批判的功能，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后者要比前者宽泛得多，主要是指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展开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的场所，而前者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带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性质的概念，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生产的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渊源。[注]显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建构和赖以生存的都市空间，正是广义上的公共空间。

参见［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与［美］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参见［美］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与［美］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章（《“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呢？这十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国内外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在美国，以罗威廉和兰金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武汉和浙江地区晚清社会和城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不具有批判性、仅仅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地方士绅公共领域。[注]而另一批学者如魏斐德、黄宗智等对此表示质疑，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第三领域”的概念，

以此区别于哈贝马斯具有很强欧洲历史色彩的“公共领域”概念。[注]在中国学界，类似的讨论也十分热烈，而且更具有当下的问题意识。[注]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有关公共领域的争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等争论所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后设的问题，即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公私观念的不同理解。国家与社会、公与私，在欧洲的历史之中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国家与公相联系，社会与私相关联，二者之间从古罗马时代起在法律观念上，就有着明确的界限。到中世纪中期，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麦克弗森所分析过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注]所谓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基础。而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前提下，产生了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个人通过在沙龙、咖啡馆和公共媒体的舆论，以公众的身份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批判性讨论，从而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其界限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以普世王权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系统，属于国家的范围，而由地方宗法家族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属于社会的空间。不过，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欧洲那样清晰的二元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承担了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功能。儒家士绅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中央帝国的王权—官僚管理体系，在朝代表国家，在野代表民间。士绅的身份是双重的，但其集体信念又以儒家学说为自己的公共认同，通过士大夫集团的中介，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不是像欧洲那样互相抗衡，而是有一种积极的互动，特别是在地方事务上，常常是相互渗透交错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1—34页。

与此相对应，传统中国的公私观念是一个道德评价性的概念，其法律界限相当模糊。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中国人伦关系中的“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个人所代表的相对利益。比如为家族争利益，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但对于家族自身来说，又代表着公。[注]虽然在社会关系中，

公私相当模糊，但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公与私就像理与欲一样，代表着两种相反的价值，君子修身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私欲，实现大公。

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第3章（《“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第131—134页。

也就是在上述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特殊关系基础上，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洲的公共领域，即罗威廉和兰金所研究的管理型公共领域。这一管理型的公共领域，或者用黄宗智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是一种在国家权力与宗法社会之间的组织，以地方士绅，特别是城市绅商为主体。他们不议论朝廷国是，所关心和从事的是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比如赈灾、慈善、消防、水利等社会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由于国家的资源和权力有限，地方士绅对这些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也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鼓励和支持。它并不是与国家对峙的公共空间，相反地，是一种“国家权威的社会性设置”。它建立在地方性与团体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像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那样建立在对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加以保护的基础上。换而言之，在19世纪的中国，虽然有士绅公共领域，却没有欧洲那样的市民社会。它更多强调的是地方士绅的公益精神，而非捍卫私人权益。[注]

对19世纪中国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个案是王笛的《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载《史林》2003年第2期；另参见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

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和讨论的下限基本局限在19世纪，研究的领域也多集中在浙江及武汉、成都这些城市。[注]那么，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在上海这样相当先进的大都市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批判型公共领域呢？我对晚清以来上海公共领域的研究表明，以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为起点，随着各种具有时论功能的报纸、杂志以及知识分子社团、沙龙的涌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过一个类似于欧洲那样的生产公共舆论的批判型公共领域。[注]与以地方士绅为主体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不同，它在中国的历史中自有其渊源可循，来自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

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批判型公共领域的主体不是那些地方性士绅，而是具有现代意识和救世关怀的全国性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公共媒体、政治集会和全国通电，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公共舆论，对当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如此，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依然与哈贝马斯所说的以欧洲经验为历史底色的公共领域，有众多不同。比如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为主体，而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注]

这样，对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循着两种不同的路径进行，一种是近代地方性士绅与城市的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关系，另一种是近代全国型知识分子与都市批判型公共领域的关系。这两种公共领域所呈现的空间虽然有重合，但显然各有特色：前者多为茶馆、会馆和士绅团体，后者则为咖啡馆、沙龙、公共媒体、同人刊物和近代知识人团体。每一个城市空间，都形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关系文化权力网络，知识分子借助这些公共领域，形成了各种相互交错和重叠的共同体，并交织成为一个巨大的以都市为中心、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逐级辐射的等级性的知识分子网络空间。无论是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个体的研究，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网络空间中，才能找到研究对象的确切位置。

三、

都市知识分子的特征

从乡村知识分子到都市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之中，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直接转型，其间经历了几个大的过渡形态。最早从乡村知识分子当中分化出来的，是明清时代的儒商和文人墨客，如钱谦益、郑板桥等。他们的生活基本脱离了乡村，进入了扬州、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亦官亦文亦商，形成了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城市生活和世俗文化。第二阶段，到了晚清，随着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租界的出现，在大都市里面出现了像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背景，以洋务为职业，又带有传统文人的文化习性和气质。相对科举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洋务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但随着社会的分化和近代化进程，译书、出版、办报、办学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从中产生出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背景的近代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新运动催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游离正途、在民间发展的异端士大夫，他们虽然身居民间，却占据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凭借都市所提供的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掌握了颠覆乾坤的公共舆论。这些人的身份可以是自由作家、学堂教习，也可以是职业报人和职业政治家。到了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与都市的关系不再是洋务时期那样的边缘性和模糊性，而是具有紧密的关联，他们的活动和舆论参与建构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他们自身成为都市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最后，到民国以后，近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产业逐步完善，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形成规模，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终于定型了：他们可能是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充满了布尔乔亚的高贵、优雅和矜持，也可能是鲁迅这样的自由作家，愤世嫉俗，与秩序为敌，洋溢着独立不羁的波希米亚精神。总而言之，到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与乡村完全斩断了精神上的脐带，成为完完全全的都市人。

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但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

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

参见［法］布尔迪约、［法］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这里所说的具有归属感意义的空间关系，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布迪厄的分析表明：现代的学校体制以知识中立的方式，不断生产着以名校毕业生为顶尖阶层的知识分子等级体制，[注]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拼命挤进名校或出国留学，以获得显贵的教育出身。而名校或留学海外的毕业生，又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交往共同体。这群被布迪厄称为“新宰制阶级”的都市上层贵族，与传统封建贵族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是以先天的血统为基础的，而以高学历和名校为身份徽记的新宰制阶级，可以通过后天的个人努力而形成。不管如何，学校的出身在都市公共关系网络中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认同、相互认肯的第一层空间关系。

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第二层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传统中国社会也有意识形态，那是被中华帝国所认可的、为科举制度所不断制度化的儒家学说。然而，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普世王权的瓦解和乡村宗法制度的衰落，作为知识分子公共信仰的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近代资本主义的职业分工、阶级利益的分化和近代多元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都市知识分子出现了“有机化”，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注]知识分子不再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如同古希腊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神祇一样，在不同的都市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各自所崇拜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由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交错复杂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而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构成了不同的都市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冲突、论战，常常充满了语言暴力，一旦意识形态冲突与军事／政治力量相结合，就会演变为更为残酷的战争暴力。

第三层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近代知识分子不停地在各个都市里面游走，以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生存方式和文化气质的都市空间。在近代中国，不同的都市文化生态差异很大，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近代中国知识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

空间。而近代上海拥有国内最发达的报业、出版社和娱乐业，借助这些加入了近代化过程的文化工业，激进、漂浮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上海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并且形成散状形态的多元公共舆论。1927—1930年，在短暂的三年多时间里，上海一度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以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为代表的创造社／太阳社，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和以张君劢、张东荪、李璜为代表的解放与改造派／国家主义派。最后，经过一番复杂的争斗，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同盟，留在了上海，胡适、张君劢这两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沪北上，重返北京。近代中国历史上，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绝非偶然，与两个城市的文化空间和都市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被动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一方面是都市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结构制约、影响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积极能动地参与了都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建构。

［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都市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和团体认同，不仅取决于上述三个都市建构性的空间关系，即使在近代城市公共网络中，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虽然不起主导功能，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发挥着潜在的影响，宗亲关系、同乡关系，深刻地镶嵌在近代都市的人际交往中，与近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交织成一个巨大复杂、相互缠绕的交往关系网络。在这个迷宫一般的彼此重叠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认同、交往空间和身份归属不是单一的，而是呈复数状态，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价值和身份取向，有多种团体认同和身份归属，这形成了知识分子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萧邦奇在对1920年代浙江的左派知识分子沈定一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分析其在大都会的上海、省会城市杭州和作为乡村的衙前三个不同空间的活动，揭示了“沈在这三个地方的活动不仅展示了三者间的相对结构和价值维度，也展示了三者的历史角色扮演者、社会网络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维度”。[注]如何辨别知识分子个体活动的不同的空间网络，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不同的网络关系中揭示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身份和内在思想，是知识分子个体研究中值得发掘的深度所在。

都市知识分子由于性质与乡村知识分子的不同，他们的社会角色、知识结构和内心世界相互之间不是和谐的，而是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根据曼海姆的分析，这些冲突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225页。

第一，从都市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是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在乡村社会的熟人世界中，个人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模糊的。但都市的居住方式形成了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城市家庭与工厂、办公室之间的分离首先强化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公共官员的工作模式标志着这一区分强化的另一阶段。其工作中的行为完全暴露给大众，而在工作时间之外才隐退入私密性之中。而知识分子则试图将他所做的几乎所有事都纳入私密性的范围，因此他成功地将个体化的城市私密性发展到极致”。[注]现代知识生产的私人性和个人自主意识，使得都市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然而在都市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他没有现成的、自然的历史关系可以凭借，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和建构公共关系。假如他没有被某一个或若干个关系网络所容纳的话，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弃儿。因此个人主义的都市知识分子比乡村知识分子更需要社会交往，他在抵达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需要寻找适合与接纳他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但在公共的关系网络中，都市知识分子的私密本质又让他试图在公共关系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就产生了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183页。

第二，从都市知识分子的知识类型来说是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的紧张关系。卡尔·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日常经验的知识与秘传知识。前者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个体的经验获得，与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作为民俗“小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一种日常知识，它安排传统宗法社会中的人伦日用，成为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南。不过，还有另一种秘传性知识，它虽然源于日常生活，但逐渐与日常生活分离、疏远，成为一种专业的或抽象的知识系统。特别到了现代都市社会，知识越来越学科化、专业化，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知识分子就无法掌握这些秘传性知识。曼海姆指出：“在简单文化中，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常常汇聚为一种。由部落垄断的技艺常常构建了一个秘密的主题，这种技艺本身却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巫术的来源和基础是秘传的，也常常进入到私人活动的日常循环中去。而日益复杂的社会却倾向于将日常知识与秘传知识分离开来，同时也拉大了掌握这两种知识的群体的距离。”[注]在都市知识分子之中，由于知识类型的不同，形成了两大知识群体：以媒体为活动背景，与公共生活关系

密切的知识分子；以学院为生存空间，与日常生活无关的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常常会发生某种紧张关系。而且在知识分子个体之中，由于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相互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关系，因而究竟更多地关注专业知识、发展学术，还是转化为日常知识、启蒙大众，也构成了其内心的冲突和紧张心理的根源。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223—224页。

第三，就都市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来讲是价值符号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落差。知识分子按照本性来说，是以创造和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为其自我特征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抽象知识（所谓精英阶级的“大传统”）与他每天所身处其中的世俗知识（所谓民俗意义上的“小传统”）有着同构的互生关系，精英的符号离日常人伦不远。而都市生活充满了符号性和象征性，因而都市知识分子常常沉溺在意识形态的抽象世界而浑然不觉。意识形态常常营造出一种虚幻的体验意识和空间感受，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传播的价值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仅仅存在着一种象征或隐喻的关系，正如卡尔·曼海姆尖锐指出的那样：“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注]知识分子的符号世界源于现实世界，但前者并不能等同于后者，而作为符号世界的造物主，知识分子在意识中常常将符号世界幻想为现实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在二者之间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断裂和紧张。

四、

知识分子共同体与公共交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如何构建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公共交往关系的。在这里，我们要引进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一理论对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阐释途径。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参见［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1—186页；［法］朋尼维兹：《布赫迪厄——社会学的第一课》，孙智绮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72—87页。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他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注]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布迪厄这里所说的资本是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发展而来，但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资本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指的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货币和劳力）、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和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注]）。这三种资本形成了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而所谓的惯习（habitus）与习惯（habit）不同，它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位、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在布迪厄看来，

场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意义上的物理范畴，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性的社会范畴。这种紧张性的产生，乃是因为活动于其中的行动者们通过运用各自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致力于争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象征资本。象征资本与前三种资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和领袖地位。其他三种资本可以在社会空间中不断地生产出来，而象征资本永远是稀缺的，总量有限。布迪厄将场域比作是一场游戏，资本的拥有者们遵循共同的游戏（场域）规则，力图使自己的资本在互动关系中得到别人和社会的承认，转化为宰制性的象征资本。[注]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都市知识分子共同体，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和角度。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它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位使得他们物以类聚。知识分子选择共同体的考量标准是哪一种共同体惯习更符合自身的口味。沈从文和丁玲，这一对一起从湖南内地来到沿海大都会的知己，之所以后来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因为两人所羡慕和追求的文化惯习不同：沈从文希冀的是布尔乔亚的理性、斯文和唯美主义，而丁玲向往的是波希米亚人的自由、热烈和反抗激情，因此一个加入了北平自由主义的文艺沙龙，另一个投身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

即使在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遵循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仍有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需要考察：在共同体内部，共同体成员们是在什么样的都市空间之中进行交往的，咖啡馆、沙龙、聚餐会、书店、同人杂志还是公共媒体？这些内部空间具有什么样的外部氛围，又如何形成价值共识？共同体内部的领袖和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提携新人？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共同体又是通过什么类型的资本活动以获得象征资本？而其象征资本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次，从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考察，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信仰、价值目标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之间的话语和惯习是不是一种不可通约的关系？如果依然拥有某些交往的公共空间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公共媒体、大学还是广场？共同体的内部场域与共同体之间的外部场域中交往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同？在相互论争的共同体之间，争夺的是什么样的话语霸权或象征资本？在互相冲突的话语深层，是否还有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

最后，从知识分子的整体关系与其外部的都市空间网络来看，其群体的空间分布不仅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有所不同，比如上一节提到的北京和上海知识分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取向，即使在同一座城市之中，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也会有所不同。城市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同质概念，在其文化地理的版图之中，呈现出一个严格的等级化空间秩序。以旧上海为例，按照文化权力的等级排列，从西南部的法租界，到中心区的英美公共租界，再到西北方向的虹口日本人居住区，呈现出一种降调式的文化空间排列。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特定的城市活动空间，比如现代主义派文人必定在法租界的咖啡馆聚会，这是作为都市布尔乔亚阶级的空间象征，而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至于公共租界，则成为不同知识分子彼此交往的公共空间。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大都会的文化地图所呈现的，是一张都市知识分子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

从都市的空间关系入手，可以打开知识分子研究的全新视野。这一研究论域因为已经拥有了多种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以及丰厚的史料基础，呈现出诱人的前景。它将为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增添一道灿烂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更加多元、广阔和生机无限。

许纪霖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美］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

关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比较有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有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在两千年的漫长古代历史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注]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注]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近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

［美］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见氏著：《时代的探索》，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43页。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注]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乃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掌握了舆论权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依然被边缘化？——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一、

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5、8章，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注]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其表现有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二，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中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根据陈宝良的研究，由于明代生员人数大幅度增加，而仕途依然狭窄，游士化倾向在明中叶以后就开始出现。不第秀才或者做塾师，或者当儒医，或者做幕僚，或者经商，或者成为通俗文化的创作者。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5—326、499页。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乃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之中，士大夫虽然不是世袭的贵族，具有阶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但士大夫具有法律和文化规定的各种特权和威权，是礼治社会的精英和领袖。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注]

读书人成为社会的游士，并非自1905年以后起，事实上，在科举废除之前，日益扩大的科举规模已经造成了大量过剩的功名人士，而洋务运动和军事地方化所带来的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恰恰给这些无法向传统仕途发展的读书人以新的拓展空间：买办、商人、出版家、律师、医生、幕僚、军人等。即使没有功名，通过这些职业，一个读书人也同样有可能通往权力的高层。报人出身的王韬、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和幕府出身的薛福成，都是成功的例子。到了晚清，他们的经历已经不再是个案，而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了。

［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3页。

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2页。

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游士化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卡尔·曼海姆指出：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注]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注]

“intellectuals”在中国一般翻译为“知识分子”。但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分子”在中国的语境中含有贬义，“把‘人’变为‘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强烈主张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参见［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新版序第2页）。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本书为行文的方便，在谈到“intellectuals society”时，用“知识人社会”，在谈到“intellectuals”时，用“知识分子”，二者的内涵是相同的。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intellectuals society）。[注]

［美］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第104—106页。

［加］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关于士绅的威权论述，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9页。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时期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差不多在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1895—1925年）发展起来。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注]按照卜正民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注]士绅与士大夫，指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在传统中国都是享有功名的读书人，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共同的文化趣味和社会地位。当说他们是士大夫时，更多指的是他们在帝国内部的官僚职能；当说他们是士绅的时候，更多指的是他们在乡村社会作为地方精英的公共职责。概而言之，汉唐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

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注]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瞿同祖指出：“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正式权力相比，他们属于非正式的权力。……他们是惟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注]

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

参见［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与［美］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326—330页。

宋明以后，在政治权力之外所出现的“士绅社会”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这一社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作为“士绅社会”中的精英，士绅们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标准、文化趣味、社会身份和法律特权的社会阶层。[注]他们自身通过科举、书院、讲学等方式结合成一个内部的关系网络，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垄断了古代中国的知识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礼治社会之中，文化和知识是最重要的威权来源。其二，“士绅社会”与中国基层社会有着非常内在的密切结合，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士绅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地方精英角色。而在明清年间，随着城市商业化的成熟，一批中上阶层的士绅移居城市，他们又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继续扮演乡村社会的精英角色，有些研究者将由这些士绅主导的城市生活视作中国式的“绅士管理型的公共领域”。[注]其三，“士绅社会”虽然具有自主性格，其对城乡基层社会的管理也具有自治性质，但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权力完全分离。相反地，中国的“士绅社会”与欧洲的“市民社会”不同，士绅们与国家权力有着经常性的密切互动，不仅他们的士绅身份来自国家赋予的功名，而且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性精英，在一些情况下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的非正式延伸；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作为乡土利益的代表，是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讨价还价者。[注]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领域，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之时，“士绅社会”权力扩张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走向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贵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人社会”。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演化，参见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见氏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近代的知识分子。何为传统士绅？何为近代知识分子？我们自然可以这样区分：前者有功名，基本是传统教育出身，而后者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以学校的文凭代替了科举的功名。然而，从历史的演化来说，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晰的界限。大致而言，晚清一代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是从士大夫到知识人过渡的一代，而到五四，陈独秀、胡适、鲁迅，再加上更年轻的傅斯年、顾颉刚、闻一多等，则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了——尽管作为第一代，依然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许多精神和文化遗产。[注]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美］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见氏著：《时代的探索》，第37—42页。

比较起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注]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近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这就是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注] 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产生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

统士绅，而是近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近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关于“二重权威”的论述，参见［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45—53页。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儒家德性为中心的礼治社会，传统士大夫之所以在政治和社会上有影响，不仅因为他们是礼治秩序中的道德表率，还因为他们掌握了礼治背后的道德价值的解释权。这些道德价值具有超越的意义，是天的意志体现。天德赋予人间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之正当性权威，即天之意志在中国通过“二重权威”的方式得以展现：一方面是帝国的王权通过天子秉承天意实现政治的统治；另一方面具有内在善性的心灵也有可能直接与天命相通，为天地立心。[注]中国的士大夫们通过个人的心性修养所拥有的，正是那种以天理为中心的道德解释权。

关于中国思想史上从天理观到公理观的转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395—1409页；关于从规范知识到自然知识的变化，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第34—44页。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作用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注]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的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近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来源。知识的再生产，就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晚清以后其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

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二、

“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就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下）》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群体：历史、思想与实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作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条最重要的途径。[注]他们虽然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人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将之视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并非移植自西方，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晚明的历史遗产。前面说过，宋明以后，士大夫的重心下移，从庙堂转移到民间，在基层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在“士绅社会”之中，各级士绅们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联，形成了多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往网络。到明代，这一士大夫的交往网络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也蔚成规模。[注]晚明的东林党、复社这些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朝野具有影响，乃是因为拥有书院、讲学和结社这些公共交往的网络。

鉴于晚明士林气焰过于嚣张，清廷统治者吸取教训，严禁士大夫结社、自由讲学，并关闭民间书院，清代的士气归于沉寂。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再度泛起，中央王权逐渐式微之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在野士大夫试图重新担当挽救危亡的使命，赋予他们思想灵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学，而是明代先人留下的历史遗产。

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近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

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却与明代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近代中国“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只有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发展形态。

关于魏晋时代士族与文化的关系，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278页；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关于清代的文化家族与学术文化的关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参见［美］本杰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首先来看学校。中国的文化重心在历史上曾经有多次迁移。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重心在私学，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私家学校，以吸引门生。到两汉时期，文化的重心转移到太学，五经博士与帝国的官僚政治有着紧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贵族门阀崛起以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世族，在黑暗混乱的中世，那些世家大族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燎原火种。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确立，虽然科举吸引了芸芸学子，但许多有识之士痛感科举制度害人，无法培养出儒家所期望的有德性又有经世能力的人才，他们将夏商周三代的学校理想化，并按照这样的理想开设书院。书院成为宋明时代的文化重心。然而书院再繁荣，也毕竟作用有限，它并没有被建制化，虽然是士大夫公共交往的网络，但并非国家正式体制的一部分。只要有科举，一般读书人就会舍书院、奔仕途而去。有清一代，书院堕落为科举的附庸，而文化世家特别是江南的文化家族成为学术文化的重心。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学校才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培养精英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获得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

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之中，精英是在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人物。在传统中国，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先后成为国家建制中的精英选拔机制。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视为上流精英。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载《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

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注]胡适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太学时代，还是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守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士人之所以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近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近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借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校——是真正属于知识人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近代中国，不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预亦相当有限，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又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近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近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但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当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隔离的智慧，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可以与政治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处在一种自我的边缘化状态。不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当成为某个专业

领域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必再有社会担当。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阶层。

传统的精英网络是以宗法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到了近代社会，由于原来的宗法家族系统的解体，精英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加速，精英的关系网络认同转而以共同的教育为背景，特别是以学校出身为中心。比较起同乡、同宗，校友更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共同的师长关系、共享的校园文化和人格教育，使得校友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感情认同。虽然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内在地镶嵌在近代学统关系之中，然而到1920—1930年间，一个以近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基本形成。

在等级性的文凭社会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留洋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欧美留学生处于金字塔尖，留日学生其次。处于第二层次的是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名牌学府的毕业生。第三层次则是一般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出身的学生，最后一个层次是遍布全国的师范院校和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其中，上一个层次的毕业生通常在下一个层次的学校任教，逐渐形成了一个层次鲜明的师生网络。这一以学统为中心的知识人网络，替代了传统的以科举和书院为核心的同年、同门关系网络，渗透到行政官僚、商业金融、知识生产和公共传媒各个系统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权力。

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

参见［美］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56—67页。

根据统计，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和两大政党的重要党员和职员都是留学生，但留日者居多。而在国民党政府内阁官员中，留美的超过留日的。1948年198位国民党大员中，留美34人，留欧22人，留日32人。在学界，留学生也占了可观的比重。到1936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有44%是留学生出身。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00、214、271页。

中国两千年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官政治传统，使得政治不得不借助文化象征符号，才能获得其合法性。中世的士族门阀，凭借的是世家大族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优势，近世转为官僚政治以后，科举出身又成为士大夫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资源。晚清科举废除之后，文化象征资源便出自文凭和学问。五四时

期少年中国学会的领袖之一曾琦曾这样说，从前鄙视学问的政党，“现在因受战后潮流的震撼，也渐渐的知道‘学问势力’不可侮了”。[注]在民国年间，虽然政权掌握在新旧军阀手中，但从中国政治传统来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未必拥有政治的正当性。除了个别土匪出身的军阀之外，大部分北洋和国民党军阀对读书人还是相当尊重的，并争相延揽人才，以获得士林精英的好感。近代中国的大学，有点像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也是国立的，里面的学士是齐宣王为了争取霸业养的人才，但那些“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一方面自由讲学，一方面自由议政，与秦的博士们不一样，他们不是吏，而是师，与君王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在师友之间。[注]同样，在民国头二三十年，由于权力中心像战国时代那样一直不稳定，各路政治势力纷纷礼贤下士，招徕人才。不要说政治势力，连杜月笙这样的地方青红帮，都注意私门养客，善待文人。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的用人逐渐改变过去沿用私人的混乱局面，开始讲究学历和文凭，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内部比例越来越高。[注]

关于新式教育的成本问题，参见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学校是“知识人社会”的中心，经过近半个世纪从洋学堂到近代大学的新式教育，到193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形成一个半封闭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一精英阶层的标志是受过国内外大学的高等教育，拥有近代大学的文凭。之所以称为半封闭，乃是因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新式高等教育对所有阶级开放，但由于其成本比传统的科举教育高得多，不是一般的贫寒弟子所能承受。在传统的科举之中，由于考试科目比较简单，即使对底层读书人亦未必形成致命的障碍。[注]科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门第的，是门第的敌人。然而，晚清以后兴起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教育的成本，无论是声光化电，还是人文博雅教育，无论是学费，还是素质成本都非常高，尤其是出国游学或者进国内的名牌大学，只有家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而过去，家族承担了读书人的成本，也期待着中举以后的回报。然而，五四以后，家族意识在农村逐渐式微，新式教育产生的人才也未必会给家族带来实际利益，因此能够游学海外或获得名校教育的，多是殷实人家。贫困家庭的，只能上地方的师范学校，被排斥在主流精英层之外，这些师范生或者作为地方精英在乡间施展影响，或者流落到上海，成为城市的波希米亚人，或者甘于身处社会边缘，变为主流体制的反叛者。

竺可桢：《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载《申报》，1936年5月9日。

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44页。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第171页。

新式教育的门第化趋势，到民国年间已经十分严重，竺可桢在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指出："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即如江苏富庶甲于全国而据该省统计，居民每年收入在90元以下者，占66%，浙江尚不及此数。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数90%以上。埋没人才，至为痛惜。"注而外出留学的，阶级分野更严重。由于官费留学逐年减少，有实力到国外尤其是英美留学的，大都是富家弟子。注据统计，1946年度留学生考试录取生的家庭职业中，商人占32%，家居者占16%，官员占14%，教师、医生占13%。这四项加起来占三分之二。注

邱巍曾经研究过浙江吴兴的钱氏家族，从第一代的钱振伦、钱振常兄弟中式进士，到第二代的钱玄同、第三代的钱三强，构成了一个从传统士大夫家族向近代知识分子家族演化的完整脉络。参见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参见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90。

近代的文化家族研究表明，凡是能够跻身上层精英阶层的，大都是文化世家，即三代以上有功名，有一定经济实力，书香门第，世代相传。事实上，即使在明清的科举制度下，在仕途中占有真正优势者也是那些文化世家，特别是居于开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的文化世家。到晚清民国的新式教育背景下，比之传统的科举教育，其拥有更明显的优势，继续传承下去，如浙江吴兴的钱氏文化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注不过，近代的知识生产主体已经从传统的文化家族转移到了大学。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而且通过等级化的文凭，参与了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一定的大学毕业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阶层有着固定的、制度化的联系，叶文心的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期间上海的不同层次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与社会的分层制度有关，顶尖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培养的是金融、工商业的上流人士，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大学的毕业生更多地进入中产阶级的队伍。注

关于1930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参见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5—163页。

大约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中国社会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学术贵族阶层，他们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在海内外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其中很多是留学海外的留学生。他们有很高的工资收入，[注]有着比收入更体面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学贯中西，谈吐文明，教养深厚，对西方和中国的高级文化和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在融合中西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近代的精神贵族传统。这一新式知识贵族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家族门阀或王朝官学，他们有了大学这一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在这座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握有相当的自主权。

以上有关黄宗羲的思想，均见《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

大学内部的学者们不屑与政治和社会共舞，保持着精神贵族高傲的冷漠，但是，近代中国的大学毕竟渊源自古代的学校传统，不仅是纯粹的知识和人才的生产场所，同时也是公共舆论的空间。这一传统来自传统士大夫对三代学校的想象，并且试图将学校理解为一个代表公论、制约王权的士大夫公共机构。为晚清和民国的知识分子所再三注意的黄宗羲的“学校”论，就为近代的大学提供了历史的自我理解。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是独立于皇权和官僚的公众舆论机构，是“天下是非”的仲裁之地。其领袖与成员的产生，不是由朝廷选派产生，而是由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公议推举和更换。“学校”是民间的，但又对权力中心有着制度性制约：每月初皇帝必须率领文武百官到“学校”，像弟子一般坐在下面，听取“学校”的学长讲学，该学长由“当世大儒”担任，地位与宰相相等，政治若有缺失，可以当着皇帝和宰相的面，直言批评。天下之是非，不是产生于朝廷，而是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注]

这一东林书院式的学校范式，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历史建构之中，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民国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建立起来的大学体制，为了保持大学纯粹的学术传统，防止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几任北大校长，都对大学的过于政治化有所警惕。不过，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他们希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有近代的知识，同时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大学虽然

不直接生产公共舆论，代表公共良知，却有责任为公共舆论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识的基础和理性的能力。

“知识人社会”的第二个网络是社团。大学为近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和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社团来实现的。

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1年，第297页。

参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梁启超：《变法通议》，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199—206页。

根据阎步克的研究，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除了士族这一社会基础之外，还有士林这一公共空间。在东汉年间，士林有两个中心：一是以跨地域的太学为中心；二是以大名士的个人声望为号召，其人成为各地士人的凝聚中心，形成士大夫的交往网络。[注]不过，传统的士大夫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和社会身份的阶层，虽然在历史上由于地域、利益和经学内部学派的差别，分为不同的群体，但长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和王权对士人结社的限制，使得士大夫阶层无法以建制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注]不过，宋代以后，朋党的观念有所改变。欧阳修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注]明中叶以后，东林党自认代表天下舆论，他们通过书院网络，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朋党的有着共同政治信念的同志式团体。晚明的士大夫结社成风，形成了对抗朝廷的非常大的民间压力群体。[注]从各方面来说，晚清所继承的正是晚明的精神遗产，士大夫结社又起狂澜，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注]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成立的重要学会有62个，发起者基本上都是新式士大夫。[注]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知识分子的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政治权力无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这一士林由于缺乏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识背景，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近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体，基本上以各种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为基本分野，比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社、改造派、学衡派和少年中国学会等。但是，也可以发现在那些知识分子社团内部，传统的地缘和近代的学缘关系同时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比如新青年早期群体基本上都是安徽籍的知识分子，国家主义派的核心成员曾琦、李璜等都是四川人，现代评论派的核心是留英学生，学衡派的主要成员都出身哈佛等。近代的意识形态认同、近代的学缘关系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相互镶嵌，构成了复杂的人际交往网络。

《独立时论》不是一份刊物，而是一本系列文集。1945年以后胡适身边的一批北大自由主义同人相约，为各报纸刊物写稿，最后结集出版，形成团体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或许是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影响，他们很少以正式的团体名义出现，通常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人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人共同体，都是以同人刊物为中心：1920年代的《努力周报》、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1940年代的《独立时论》[注]。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人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胡适等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是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和政治。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而公共传媒是“知识人社会”中除了学校之外最大的公共网络。

据史书记载，子产对“乡校”表现出统治者的宽容：“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善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参见［美］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第611页。

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第35、56页。

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9、212—213页。

近代传媒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还生产与再生产近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疑是报纸、杂志、书籍这些近代传媒的产物，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它们是近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假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中国的公共领域有许多非典型的形态，甚至可以判定其不成为公共领域。不过，假如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看，可以发现其自有渊源所在。公共传媒虽然是到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公共舆论，却历史悠久。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叫作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士大夫的清议传统，最早恐怕是春秋时代的“乡校”，那是贵族社会中众人议政的公共空间。子产不毁“乡校”，乃是对古代清议的一种尊重。[注]战国时期齐国创立稷下学宫，那些被君王养起来的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或“不任职而论国事”，也是一种清议。秦代所设的博士，其职掌是“通古今，承问对”，与“不治而议论”大体相同。[注]到西汉年间，清议传统表现为乡议，乃是察举制度下考察选拔地方精英进入政治系统的基本依据。到东汉年间，大批士大夫云集京城，在太学里面议论国是，这些太学生的言论形成了对朝廷压力非常之大的清议。清议乃是与朝议相对，可以视为民间的批判言论。[注]东汉的清议就其批判性而言，足与近代的公共舆论媲美，然而由于太学依然是在王权体制之内，太学生的身份亦官亦民，民间的色彩打了一些折扣。到明代中晚期，王学讲学之风的盛行、东林书院的崛起，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清议出现了。各地纷纷出现的书院、讲会和结社，正是明季士大夫清议的建制化基础。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分析说，清议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往往突出其非官方性质，清议是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虽然清议不能等同于士论，但“在舆论的造成中，士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民论’接受‘士论’的‘导向’”。[注]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林右崇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4年，第8—9、242页。

（明）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自反录》，清光绪三年（1877年）泾里宗祠刊本。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第243页；［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第27页。

在明代，清议也叫公论，很接近近代的公共舆论。之所以被称为公论，乃是因为在激进的王学左派们看来，君主不能代表公，只代表一家一姓王朝之私。而公论者，出自人心之自然，所以君主不能夺匹夫之思想。匹夫之想法，乃真诚之见，是天下是非的标准。[注]如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注]士大夫的公论，被看作是维系人心之本和国家之元气，士大夫最应在清议上着力。如果士大夫不主持清议，那么清议就必出于匹夫匹妇之心，游谈处世之口。[注]明代中后期是民间士大夫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公共舆论最嚣张的年代，"处士横议，品核公卿"，成为晚明的一大景观。

晚明士大夫的精神遗产到晚清被重新发扬光大，书院演化为近代的学校制度，讲学变迁为近代的传媒，而结社光大为近代的知识分子社团。这些都是"知识人社会"得以形成的制度化条件。其中最重要的革命性事件，乃是公共传媒的出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参见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见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145页。

近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报纸的前身是邸报，有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结社与邸报大有关系。邸报成为社会舆论，变成天下的中介。[注]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不断改进的印刷业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聚合为近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参见［加］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查尔斯·泰勒认为公共领域有两种形态：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前者是指区域性的集会，公众们因共同关心的主题聚集在一起，那是一个有形的空间，比如沙龙、酒吧、广场、街道、学校、社团等。而跨

区域的公共空间，则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现代的公众。按照查尔斯·泰勒的看法，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不一定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而可能是一群有着共同主题的陌生人群。他们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社会想象的一部分。[注]

根据许纪霖的研究，《时务报》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公共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

在晚清中国，当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1896年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近代公共领域之后，[注]以公共舆论为中心的“知识人社会”才拥有了可能性基础。报纸不仅传播近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众舆论的生产者。近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是从传统的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近代的公共舆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

参见［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第80—81页。

所谓的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他们是由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是一些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比如阅读公众、戏剧公众、文学公众等。[注]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来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其实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之中所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人。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人社会”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一个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中大城市为中介，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而这一网络，正是通过公共传媒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建构起来的。

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见氏著：《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钱穆先生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注]到了近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近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人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些网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络也各有交叉，但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互相对抗、平衡和互相抵消。无论如何，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的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将其奉为上宾。

现在的问题在于，既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舆论影响和文化权力如日中天、空前膨胀，那么，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无法成为社会的重心而衰败下来呢？

三、

为何重建社会重心失败？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影响力，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192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上升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大学、传媒和各种社团的公共网络，与城市资产阶级一起建构了一个足以与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第二阶段从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下降时期。关于前一个阶段的情况，前两节已经有较多的论述。而1930年代以后之所以影响力开始下降，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有关。在晚清，伴随清廷的权力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中逐渐衰落，地方势力日益崛起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多种政治权力的并存，社会重心不断下移。民国的头20年，北洋政府和继之而起的国民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缺乏权力中心，顾及不了社会的自主发展。1930年代以后，随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击败各路军阀，中央权力稳固，就开始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特别是1940年代以后，政府以战时集权的名义，控制更加严密。虽然战后的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舆论影响一度强劲反弹，但终究昙花一现，最后，曾经是那样生气勃勃的“知识人社会”，被战争、内战所彻底摧毁。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见《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1932年，在“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胡适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文中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国近代以来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胡适指出，其中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没有失去社会重心，但在中国，“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注]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枢，而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体和社团的力量，试图重建社会的重心，但其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仅仅用外部政治权力的变化便可解释的。我们要追问的是，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重心的内部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自我转型，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过，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在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社会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知识精英大批城居，他们控制了教育和传媒这两个重要的知识和信息平台，拥有了独立的知识空间和文化空间，并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正是独立，使得近代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那种内在的制度性联系，他的文化权力变得虚拟起来，仅仅以一种话语的方式而存在。无论是对社会的启蒙，还是对政治权力的影响，都是如此。由于不再拥有与社会和国家的体制性联系，又缺乏市民社会的有力支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虽然曾经不可一世，最终却是孤军作战，沦为边缘。

关于晚清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村精英的疏离，杨国强有非常精彩的研究，参见氏著：《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2—173页。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仅与地方社会和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制度性联系，而且其内部由于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士大夫集团也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然而，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一个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社会”，但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的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信仰、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的联系。[注]

参见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第19页；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见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到19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如前所述，传统士绅之所以有力量，乃是扎根于土地，与世家大族和地方网络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晚清以后，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有研究表明，在城市发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对宗族和家乡的认同感日益淡泊，比如吴兴的钱氏家族中的第二代钱玄同

就是如此。即使是留在乡村的士绅，也大量移居县城，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注]

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见《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36页。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1—183页。

吴景超：《智识分子下乡难》，载《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顶尖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晏阳初批评说："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没有认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空口讲改革，没有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终于找不着实际问题。"[注]一般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早在五四期间，李大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智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李大钊号召青年"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注]不过，好不容易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还回得去吗？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1930年代吴景超在谈到知识分子下乡难的问题时说，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乡下也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上的需要，而最亲近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也都不希望他回乡。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不肯下乡的原因。[注]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3页。

即使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觉，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农民们格格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难怪当年梁漱溟要感叹：我们搞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注]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大批士绅流向城市，乡村的“士绅社会”开始解体。同时，也使得本来比较明确的地方精英身份，也变得暧昧起来。地方精英指的是在地方舞台上具有支配力的个人和家族。它比士绅的概念大得多，具有较多的异质性，包括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长老，以及各种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头领等。

参见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

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5页。

［美］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岳谦厚、张玮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295—297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已经从过去比较同质的士绅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而且不同的省份、地域中的地方精英差异非常大，有些地区还是传统的士绅，有些地区商人具有相当的地位，而有些地方是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的强人。在江南地区，承继江南士大夫文化的历史惯性，科举被废除以后的江南地方士绅虽然不一定都有功名，但社会要求他们要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诗书琴画、文物鉴赏等，才是获得体面的重要标志；[注]在云南地区，传统的乡绅还是存在，但大地主和地方政客替代了旧式学者；[注]而在河南地区，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主要是一些有能力领导地方民团抗击土匪的人，而不再是受过教育、有财富的人，他们高度依赖暴力的力量。张信对河南的研究表明：民国以后地方的权力从传统的精英那里，转移到了具有不同个人背景、有能力利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增强其在共同体内部影响力的人物手中，而地方自治为这些新精英的崛起提供了适当的机会。[注]

参见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科举被废除以后的地方精英，虽然与传统的士绅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联系，但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根据邓若华对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地区地方精英的研究，发现民国的地方精英与传统士绅相比较，前者开始注重对于

财富地位的追求，而不是注重提高自己的品行和修养；地方精英开始职役化，更多地向国家权力渗透；他们从原先由士绅们主持的慈善、教育领域中退出，将这些公共的职能让给地方权力；最后，上层的地方精英们的活动也基本局限在县城，对基层乡村没有兴趣，与乡村的关系慢慢淡化。[注]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如果贵族领主和农民一道生活在农村，导致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便会大为减少。"[注]当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地方精英，都纷纷放弃基层农村的时候，那里便成了革命的温床。

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时，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近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些公共建构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一方面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而存在，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近代中国的学术中心，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最集中的城市。在这些著名的大学里面，云集了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学者。五四以后，大学势力之强，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然而大学是学院的象牙塔，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老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一元是全国性的"知识人社会"，另一元是本土的地方社会，这两个社会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学院精英与地方精英也相互脱节。到1930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贵族阶层，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与北京不同，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民营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人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自从上海开埠以后，在黄浦江畔就出现了一个绅商阶级，以张謇

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亦绅亦商，他们以地方自治为契机，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地方精英。民国以后，传统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近代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成分复杂得多，除了大学教授、文化人之外，还有报业、出版业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类专业人士等。他们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最有名的是以张謇、黄炎培为领袖的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中，联合上海的资产阶级，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是执媒体牛耳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副会长是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青红帮首领杜月笙，秘书长则是前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著名文化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这些地方名流有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士，也有黑社会首领。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

不过，上海这一城市社会与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有区别的。在乡村社会之中，士绅始终是主角，但在近代的城市精英之中，核心角色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英雄，像史量才这样的报业大王，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资产阶级，沿承晚清绅商的传统，具有亦绅亦商的双重身份。

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29页。

参见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4—415页。

储安平：《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见《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49页。

在历史上，士大夫们之所以有力量，除了掌握文化权力之外，乃是有世家大族和宗法地方势力作为社会的后盾。近代以后，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但这些文化权力需要寻找新的社会基础。士大夫自命为“中等社会”的中坚，但也意识到要与其他“中等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商人阶级结合，才能真正有力量。清末的杨笃生说，在中等社会中，“唯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

士类之间者附属焉。而主持全省之议论思想者，惟士林而已”。[注]士大夫自然是“中等社会”的中心，但也需要团结“中等社会”中的其他阶层：绅商、军人和自由职业者。“中等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复杂的社会实体。[注]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如日中天，但内战一爆发，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储安平在专栏“客观一周”（《客观》杂志）中检讨说：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阶级虽然居于领导地位，其影响至远且久，但在组织及持久上，总觉较为消极。“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注]

在近代中国，不仅知识分子弱，资产阶级更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像欧洲那样，是在自治城市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从其产生开始，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江浙资产阶级和青红帮势力内迁到西南之后更是一蹶不振，只能仰仗政府过活。中国的“中等社会”，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一毁在抗日战争之中，二毁在内战手里，到1940年代后期，虽然借助国共之间暂时的力量平衡，回光返照，但比较起抗日战争之前，内瓤全然空了。一叶孤舟，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最后终究是昙花一现，江河日下，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

参见［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构成的流动网络。[注]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同近代的城乡关系一般，区隔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精英共同体，虽然从个体而言可以在两个集团之间流动，但从整体来说，无论从学校出身、知识结构

和文化趣味，还是各自所借助的社会关系来看，都已分解为两个互相脱节的群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思想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但19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近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关系。

问题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裂，在一个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又被严重政治化了，逐渐从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蜕变为附庸政治的“有机知识分子”。19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力量的下降，与此有密切关系。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命，俨然是一独立的中流砥柱，不屑成为任何阶级的附庸。1930年代后国民党的权力在加强，城市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力量在减弱。到1940年代，战争和内战全然摧毁了民间资本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之后，失去了资产阶级支持的知识分子，被夹在两股非此即彼的党派力量之间，被迫进行政治选择。

胡适日记（1947年9月23日），见《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2页。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战后从美国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试图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学统体制，制订了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当胡适兴致勃勃地将这个计划拿到北大教授会上讨论时，却受到了同事们普遍的冷遇，大家谈的不再是学术，而是吃饭问题。向达教授讽刺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注]为饥饿和内战所激化了的知识分子无心学术，逐渐政治化，并深深地卷入党争之中。1946年年底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成为知识分子非左即右的最后选择，民主同盟内部决裂，胡适、张君劢等人向右转，更多的知识分子向左转，逐渐失去了“知识人社会”自身的空间。到1940年代末，知识分子普遍地党派化，大学衰落，学术跟着政治走，媒体围绕着党派转，文化权力屈从于政治权力。“知识人社会”衰落了，无论是大学，还是公共传媒和文人社团，深陷党争而不自知。晚清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统完全崩溃，最后被革命的政统所取代。

1913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梁启超撰文呼吁中国须有中坚阶级：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实验》，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99—2600页。

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所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夫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国中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也，以之董率多数国民，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

从梁启超到胡适，两代读书人都热烈地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无形之一团体”，“董率多数国民”。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总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许纪霖

第二章

士人、城市与权力：清末沪上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关于本文所用的“士人”或“知识分子”等概念，笔者在相当程度上赞同程美宝的看法：使用“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等用词时，指谓的意义主要有两层。首先，与其说“士大夫”或“知识分子”指代的是具体的人物，不如说是一种理想典型，一种当事人的自我认同。其次，这个标签也指谓那些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楷模去塑造自己的形象与行为的人。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6—18页。而陈旭麓先生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自居于士类者”这一概念，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前文定义的精到概括。在陈氏看来，如生员、学生、记者、编辑、律师、医生、学堂教师、职业革命家等都可视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自居于士类者”。见氏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8—261页。

参见王鸿泰：《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笔者这里所说的“权力”概念是指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权力，他强调权力是一套由知识、文化、声名等构成的既隐形又弥散的控制和支配结构。

清末知识分子[注]正处于张灏先生所概括的“转型时代”之中，转型时代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士人流动性的极大加强。这表现在：（1）数量更为庞大的士人从整体而言由居乡耕读转为赴城谋生；（2）就个体而论，在赴城的历程中不少士人在各种因素激发下会从各个市镇向县城、府城、省城等流动，最后则向更为庞大的中心、沿海城市转移集中，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并有一小部分从那些城市走出国门；（3）在全国各个通商大埠间，士人的往复来去也更为惯常而频繁。如果说从前士人依托于“乡土社会”，依靠他们的血缘、地缘、学缘和与之相派生联系的一整套文化、权力结构来获得他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可是到明中期以后，在“乡土社会”的层面上，已经另外发展出一个“城市社会”。这个“城市社会”的形态恰好和“乡土社会”形成对比。[注]而到清末，这个“城市社会”伴随着士人流动性的加强愈加深刻地影响着士人的生命情境。本章即想着眼于上海这样一个清末中国最特殊但又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来考察士人如何在城市中获得并维系他们的权力。[注]不过在这数万字的篇幅中，笔者并无可能从整体上来回应这个问题，只是希望能从知识分子交往的网络出发对此问题作出一定的讨论。本文认为清末身处上海的知识分子至少存在以下四种交往的网络，即私谊网络、会社网络、集会网络和传播网络。这四种网络在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留居上海、展开日常生活、寻求身份认同、应对政治变迁、传播自我形象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四种网络是上海这个城市自晚清

以降形成其自身特有的文化、权力结构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而言，交往的网络决定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而对于上述问题的选择取舍亦决定了谁将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而谁又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主人与过客的角色扮演、更替与定型无不与权力的获得与维系息息相关，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从晚清到民国之际知识分子自身形态的过渡转型。

一、

日常生活与权力：清末知识分子交往的私谊网络

1．入上海——初到沪的士人们

光绪九年（1883年），日后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刚刚登上进士龙门并授刑部候补主事的刘光第告假回籍，路过上海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刘光第：《南旋记》，光绪九年八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见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398、399页。

到书肆问价。坊间多有用书，胜吾乡远甚。值较京颇贱，然亦非寒畯所能多购。……晚出街游眺：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但闻歌馆酒楼，肉竹相倚；蜂痴蝶怨，玉夜香春；俯仰此身，在琼楼玉宇间也。舒丈屡邀入妓馆茶园，余三人俱将留钱买书，未果。……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注]

刘氏之言至少透露出以下两点讯息：其一，从物质上看，即使像他那样中了进士，而且只不过是途经上海，但因为茅庐初出，一介穷京官，所以还是清晰地体会到在上海生活的不易。为留钱买书，几个青年才俊都未能见识一下沪上洋场中著名的妓馆、茶园，其状不可谓不窘。其二，从心态上看，他对上海的感觉处于“既恶之又爱之”的矛盾状态，但因其自诩为“学人”，其恶的部分要大大超过爱。到否上海是生人大恨事和学人大幸事，这中间的分野正描摹出士人为士的身份和为人的个体与这座城市既融合又疏离的微妙状态。不过随着他乘坐的轮船远去，滔滔江水又带走了十余载春秋之后，“入上海”乃至“居上海”已成为越来越多士人的选择。

如1849年秋王韬到上海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聘请，入墨海书馆做中文编辑，主要就是由于父亲病故，家中生计无着，而其父王昌桂为上海传教士翻译书籍的经历对他是有示范效应的，像汪荣祖的看法就是在承认生计的因素之外强调王氏对探索西方奥秘的好奇心。参见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3页。1850年代中

后期至1860年代初，太平军与清军在江、浙、皖地区激战正酣，战火疮痍，上海因有租界与西人势力作依托，相对较为安全，江浙一带难民纷纷离开故园避入上海。而在这些难民中，据梁元生研究就有不少他认为的“上等士绅”，如张文虎、陈暘、钱鼎铭、冯桂芬、何绍基、顾广誉、顾文彬、厉学潮、刘熙载、庞钟璐、孙锵鸣等。见氏著：《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9—140页。

所谓选择暗示着太平天国运动—甲午这段时间士人来沪动因的变化。大致说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前到沪的士人大多以江浙一带尤以上海周边地区为多，或系迫于生计或为躲避天灾人祸。[注]战争平息后，这些士人中的一部分人回到了家乡，一部分在上海做久居之计，另一部分则把上海当作寄居城市，在上海做“寓公”，但仍然遥遥经营家乡的土地和农业生产。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第145页。

而此后近20年由于政府的“官督商办”制度，利润的诱惑，社会地位的驱使，地方统治者的双重政策等因素的激励，[注]许多朝廷大员像李鸿章、张之洞纷纷进入了工业企业和商业投资领域，由此将触角伸及上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买办渗透到官场和绅界，他们通过捐纳和提供军需，很容易地获得了士的身份乃至候补的各种官衔而得以与上海有了联系。这些人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意味着一个“网络建构”的开始。从李鸿章到张之洞，从盛宣怀到张謇，从唐廷枢到严信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书院、企业等建制化机构催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那个地方精英集团，其中包括曾铸、李平书、虞洽卿、朱葆三、宋汉章等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编织的那张由血缘、地缘、学缘、幕缘构成的私谊之网，使得上海在1895年后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士人精英的汇聚之所。

之后参加《时务报》群体的人员也都是通过这些网络而进入的，像梁启超事繁不能按期作文，报馆先后聘请麦孟华、章太炎、徐勤和欧榘甲担任主笔，其中麦、徐、欧都是康有为的弟子。汪康年还一度劝说郑孝胥和夏曾佑出任主笔，但未成，其他像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汪康年之弟汪诒年，康门弟子韩昙首和龙泽厚都担任过各种职务，形成了《时务报》中粤、浙两大集团。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45、56—57页。

1896年1月，日后在士人私谊网络中颇能承上启下的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就是汪康年。此时上谕查封京师强学会，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随即关闭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他选择曾是其幕僚的汪康年作收拾残局的人。凭着这份幕缘关系，汪康年成了“接收大员”。他接收到的强学会余款银620余元就成了创办《时务报》最早的现金来源。但真要办报并不是一帆风顺之事，一个好汉如果没有三个帮也不能成事，幸而汪康年找到了他的知己良朋：通过旧师长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关系，黄遵宪来了；当年赴京赶考时结识的小师弟梁启超亦在康有为的允许和其力邀之下来了；在湖北做幕僚时结识的吴德潇父子也来了；再加上堂兄汪大燮提供内幕详情，在上海的同乡叶瀚、宋恕、孙宝瑄等出谋划策，往来奔走。汪康年及以他为中心的《时务报》群体“留上海”方能初定局面。[注]

此后，像汪康年这样的进士们，还有举人、秀才们都会来上海，不少人还会设法留下，他们都或多或少要与那张私谊之网挂上钩才能遂其所愿。只是由于太多士人缺乏详细的生平材料而使得做一个量上的统计非常困难，因此接下来只能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先来看进士们。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13、28、29页。隆庆里的确切位置已无从查考，惟张元济家保存的信封上有“西华德路”“中虹桥”字样，可以推得在今东长治路、长治路桥一带。参见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9页。

《蔡元培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1898年曾在京直接参与过变法活动的张元济在戊戌政变后颇为心灰意懒，“直不欲与闻人间事矣”，且预见“将来必有株连”，已有南行之意。至其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后，李鸿章立即告知盛宣怀，去沪后将由他安排其出路。张元济同时又得举人同年汪康年密电，其复汪康年书谓：“弟事已定，即日南下，约重阳后可在沪相见。”张元济携家南下之际，被张氏尊为问业师的徐用福之兄徐用仪赠银200两，据其子张树年回忆，徐用仪所赠银两解决了张氏全家迁居上海的费用，张元济晚年屡屡念及此事。[注]到上海，张元济与赵氏（从蕃）同年共寓外虹口隆庆里772号。[注]安定之后，先赴南洋公学译书院办理译书事宜，继而接任公学经理，不久转入商务印书馆，踏上了通往文化出版大家之路。

《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33、352、353、355页。

同情维新的蔡元培也于政变发生后离京南下，回到家乡绍兴。继而从绍兴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员。当时的南洋公学里盛宣怀是督办总理，为蔡元培在京城的旧相识，而且盛氏与极力推荐蔡氏到南洋公学任教的澄衷学堂监督刘葆良为同乡。总理沈曾植与蔡氏也是浙籍同乡，代理总理张元济更是与蔡氏同乡、同年举人，关系非同一般。蔡元培1899年的日记备忘中第一条就是张氏在上海的地址。1901年3月蔡氏黄昏到上海，夜宿舟中，第二天清晨就赶到张元济家，“年伯母影堂前行礼”。7月到上海应聘南洋公学时，先下榻宝善街周昌记客栈，过了六七日就搬到外虹口隆庆里782号邵仪冲处，与张元济做了邻居。[注]此后，他在上海这个舞台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组建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创办《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获得了不小的声望。但因其始终有反清之活动，并不能容于政府，其在上海的时间亦不过数年。

再来看举人们，1897年郑孝胥凭着曾是张之洞的幕缘，充洋务局提调，并在商务局差委，时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同乡见其常住客栈，非常不便，遂为他租定长安里林庆记楼下屋一间。且方方面面考虑得相当周到：

室中甚华洁，有二窗，颇明，几案窗榻亦极稳称。夜饭以闽人为庖夫。……自至上海，是夕床始施帐焉。同居者为王子青、陈少兰、施小樵，皆在楼上；林庆中父子在楼下对房。是屋，楼上下皆三幢，月租二十二元，余得一房，出租六元，此房实为屋中最胜处也。饭食附于庖人，上下二人，每月亦六元。

《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607—609页。

房租、伙食并不算便宜，但第二天盛宣怀即派人送礼，给了郑氏一个商会公所参赞的名衔，月给薪水百金。[注]

陈谧等：《陈黻宸年谱》，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1185、1188页。

1902年，陈黻宸来沪，蔡元培邀请陈氏和其他同来的老乡宋恕、蒋智由等朝饮于九华楼。在沪逗留期间，适逢出资帮助蒋智由办《选报》的浙籍老乡、诸暨人赵祖德欲另办新报，陈氏遂受聘主办《新世界学报》。陈黻宸在浙东学界声望卓著，他到上海办报后，他的一些学生也随之来沪，《新世界学报》成为他们聚集的一个重要场所，其中包括马叙伦、汤尔和、杜士珍等养正书塾“三杰”以及黄群、陈怀等人。不过翌年，一方面其科举情结难

释，欲赴河南参加会试；另一方面“报馆事腐败已极！”，个别编辑截用稿费，反需陈氏赔垫，于是决定停办报馆。

叶景葵：《忘山庐日记·序》，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序”第1页。

综观上述几位士人的经历可以发现在血缘、地缘、学缘、幕缘构成的私谊之网中，除非你是真正强而有力的高官贵宦之后，像孙宝瑄是“钱唐孙子授侍郎诒经之次子，慕韩总理宝琦之胞弟，李筱荃制军瀚章之女夫，以荫生得分部主事”，他可以奉母出都、寓沪八年，闭门读书、广泛交游，回到京城马上签分工部行走，更有底气在邮传部不合于尚书，即拂衣而去；若不然，最重要的反倒是幕缘，汪康年、郑孝胥能在上海如此如鱼得水，两人曾是张之洞幕僚的身份是起了极大作用的。这亦是晚清士人进阶的重要途径，在汪、郑之前以幕僚而一跃成为封疆大吏的不乏其人。幕缘使得他们与统治集团，特别是统治集团中某一实力集团保持着持续而有机的联系。以这一实力集团为中心，这些联系可以为他们源源不断地带来人脉、金钱和势力。再辅之以血缘、地缘、学缘就能形成一个牢固、有力、持久的网络。如果仅仅是血缘、地缘、学缘关系，一旦本身交际能力不够、经济状况吃紧或者政治环境严酷的话，在上海也很难待得长久或者待得如意。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9、11、13页。

最后来看秀才们，这批人的网络因为年纪、阅历、家世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布迪厄意义上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而言肯定比不上进士和举人们。像王国维在1892年16岁中了秀才，但其后五年多次考举人不中，又不甘于仅仅就馆教书，1898年受其同学许默斋推荐，入《时务报》任书记，因收入甚微，王氏欲改投翻译中西文报馆，但其父王乃誉来信阻止：“初与交往，恐难得深信，若更他适，则荐者与家人乡友非怪太活，决使且留会，曷以空闲学之，更须常往还之，况粤浙恐成冰炭，是又非宜。”引文深切地表明了时人对地（乡）缘关系的重视和这层关系帮助王国维在上海打开局面的重要性，可是此时的王国维毕竟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即使在浙籍精英汇集的《时务报》馆，其前任许默斋薪水已是不多，而到王国维接任时则更为减少，同时工作又非常繁重，以至于他在写给许默斋的信中大有抱怨：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阁下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核书籍……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注]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第20—22页。

雪上加霜的是王国维常犯腿疾，时常需要上海、海宁两头往返，这就更使其与上海疏离。不久《时务报》馆关闭，王氏处境窘困，幸而此时与他有师友之谊的罗振玉请其担任东文学社庶务，后又介绍他赴日留学，[注]才得以成就日后的一代国学大师。

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7、151页。
李仁渊：《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载《思与言》第43卷第3期，2005年9月，第104页。

王国维在上海并不得意，一大重要原因是本身并无太多资本，而其似乎又并不注意积极拓展私谊之网络，除了罗振玉、许默斋外就别无他人可助一臂之力。不过在上海的失败或不得意有可能是一普遍现象。像严复在1900年逃难到上海时赁屋闸北康乐里，连生活费都没有着落，要向妹夫何心川借100元钱才渡过难关，又因为译书费未能及时寄下，还曾向汪康年借过规元500两，其书云："兹有极恳者：冬令将至，需款孔殷……一俟前途汇款到时，即当划还不误。"[注]言辞之凄凉可见一斑。连严复这样的士人都在上海陷入过困境，那些寂寂无名的校对、编辑、记者与售文为生的小牌作家一定更举步维艰，正如有学者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如此多薪资、过着那么顺遂的生活，否则当时上海就不会有那么多偷拐强骗的无赖文氓。"[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161—165页。关于东来书庄，后来以"古史辨"而闻名天下的顾颉刚就对其印象非常深刻："在旧书篦里寻到一本《湖北官书局书目》，觉得上边的书名都很有趣，就拣了价钱最贱的书向书铺里买，哪知没有。买了一本《西洋文明史要》回来，我父见了，说道：'这是你不懂得的，买它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己实有买这本书的要求，至于懂不懂乃是无关重要的。这是我买的书的第一部，使我不能忘记。那时我并没有钱，只是在新年中可以得到一宗收入，就是长辈给予的拜年钱。我把这些钱瞒了家人，到书铺里畅畅的拣择一

番；又不敢把买来的书一时带回家去，就存在亲戚家里，悄悄的一本一本的携归。……予忆是时苏州观前街东首有东来书社……此书即购于彼社者也。……予第一次买书即买历史书，非有所解于历史，第以此书定价二角，尚可打一折扣，囊中之钱尚足付耳。”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不过成功者还是有的，同样是秀才的包天笑，他的网络拓展就相当的成功。包氏拓展网络的特点是以其家乡苏州为中心扎牢根基，时常在上海交游培养人脉，在有了相当积累之后方正式定居上海。戊戌前后，包天笑就在苏州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组织学会，而后因为和留日的苏籍学生杨廷栋、杨荫杭相熟，也依样画葫芦组织了励学会、创办《励学译编》月刊。另外他还参股了东来书庄，专门经销日本进口的图书、文具、地图、挂图和教材。因为书店的生意往来，苏州府属的常熟、昆山、吴江等县，乃至常州、嘉兴、无锡都有慕名而来的买书订杂志，或者问讯配书。包天笑也由这一渠道认识了如常熟的曾朴、吴江的金一等人。除了组学会、办刊物、开书店以外，包氏还与表兄尤子青创办了《苏州白话报》。[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209、219、242页。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242页。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246页。

包天笑在苏州的事业并未持续很久，就被其在苏州结识的好友推荐前往南京去担任道员蒯光典的幕僚。蒯光典是李鸿章的侄女婿，人称“蒯疯子”。在南京待了几个月，包天笑即被派往上海，主持金粟斋译书处。金粟斋停办后，又凭着其在苏州、南京、上海等地积累的人脉关系在叶瀚的启秀编译局、以粤籍人士为主的广智书局编译处、蒋观云的珠书园译书处短暂工作过。主要依靠他刚学的一点日文翻译书籍，检定、润饰稿件。[注]这期间有两个小细节值得一提。第一，包天笑也绝非一帆风顺，金粟斋停办后，他就曾非常迷茫，从前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已各散东西，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回到苏州，做什么呢？还是处馆教书吗？要谋生计，在苏州更无出路”。以致他碰到叶瀚只能自嘲地说：“低就也没有，回家吃老泡去了。”[注]第二，地（乡）缘关系的重要也在包天笑的文字中体现出来，包氏在以粤籍人士为主的广智书局编译处就做得并不得意，按他自己的话说：“里面全是广东人，我和他们言语不通。”[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23页。

包天笑因病结束上海各译书处的职务，回到苏州后不久就先被推举到上海考察女学校，后又通过其老丈人的关系担任青州府学堂的监督，当青州府那里人移政息之时，开书店时认识的曾朴、交游上海时认识的狄楚青终将其拉了回来。狄氏为《时报》的总经理，曾氏任《小说林》的管事，请包天笑一是因为老相识，二是因为在青州期间包氏对《时报》《小说林》常有投稿，能文之名已深刻二人心中，自此包氏在上海的报馆中负责固定的版面，领取丰厚的薪水，还有不菲的外快。凭着其文章的天赋、小说的本领、宽广的人脉和当时可以居奇的外语，对他而言居上海大易！注

2．居上海——多重的日常生活世界

士人们在初到上海时境遇常有落差，这些落差并不会在“居上海”的岁月中自动抹平，私谊网络的无形之手会把他们带入到不同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开展属于各个圈子的衣食住行、交游起居。让我们先来看“闲民”的世界：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81页。

上海一区，盖以声色嬉娱为世界者也，而出入此世界中，大抵闲民最多。闲民约分三种：一维新党人，一依西商为生者，一富豪家子弟。今者前一种人渐就衰减，且多落魄不能自存者；惟后二种人特盛，且力能维持此世界，盖有金城汤池之功也。注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403、438、441页。

如马叙伦就说：“那时（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维新派是和平改革派，戊戌党人里‘硕果仅存’的张元济先生，就在这里隐然是个龙头。”见氏著：《我在六十岁以前》，岳麓书社，1998年，第11页。

写出这段点“闲民”世界之睛文字的是孙宝瑄。他是贵宦之家出身，并一直对所谓“新党”的作派冷眼有加。注但以作史的后见之明看“前一种人渐就衰减，且多落魄不能自存者”，大致说的是康、梁一派人物。而当时活跃在上海，广义上的“维新党”闲民可并不少。注随便数一数就有汪康年、叶瀚、张元济、马相伯、严复、伍光建、郑孝胥、赵凤昌、吴彦复、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尧、汪允宗等十来个响当当的名字。这批“维新党”闲民连同依西商为生者、富豪家子弟：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81页。

昼聚之地曰味莼园，夜聚之地曰四马路。是故味莼园之茶，四马路之酒，遥遥相对。……每夜所销宴乐之费，并北里中及大餐馆等计之，殆数万银饼不止。若官抽其税，每银一饼税一角，亦可成巨款也。

以上是“闲民”世界的一个大致勾勒，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细节，我们不妨从郑孝胥的日记出发分析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间有着怎样的生活。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267页。

郑孝胥的闲民身份在他的朋友那里是有定论的。郑氏曾调侃张謇比做官还忙，汤寿潜比当兵还苦，无料他的朋友加了一句：“郑比出家更闲。”而从其一月的生活观之，此说并不离谱。在30天里，郑氏跑了两次张园，看了西人戏法；赴了七八个饭局，包括雅叙园、九华楼、聚丰园、一品香、万年春、海国春、鸿运楼等知名酒楼和堂子；去群仙戏院观剧三次，第一次听了郭少娥的《打严嵩》，后两次则是其红颜知己金月梅所演的《池水驿》和《翠屏山》。

不难发现郑氏活动的空间大多是酒楼、青楼，加上张园、戏院，考虑到其与日本人笔谈唱和，交情颇深，似还可加一个洋楼。这与于醒民在《上海，1862年》中将王韬、龚孝拱、李善兰、蒋剑人等“海上狂士”的活动空间颇有见地地概括为酒楼、青楼、洋楼很有几分相似。但空间的相似毕竟只是表象，无论是在外在的行动方式或者内在的精神气质上，1860年代的“海上狂士”和20世纪初的“上海闲人”已经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

他们在酒楼狂饮狂歌狂舞，手里挥动宝剑，剑锋往地上猛砍，打碎酒杯、酒壶、茶壶、便壶，甚至砸坏门外的小车和马车。“剑花摇摇酒花热，裸身大叫千年魄”，他们光膀赤膊，旁若无人。正衣冠乃名教中人凛凛以守的常规，他们弃之不顾；胆子天大的人也不敢吃的河豚鱼与河豚鱼发酵腌制的“西施乳”，他们敢于咀嚼品味。

他们在青楼绮游，以狂名权充风月之资，在石榴裙上题诗，于香艳扇面挥毫。居然有痴情神女钟爱这些穷酸才子，留下不少风流韵话及妓女文学、史料的“艳书”。

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5页。

他们在洋楼与外夷邪教人物厮混，吃洋菜洋饭，撰译夷书，类乎以夷变夏、里通外国，好像不怕被人说数典忘祖，不怕犯下大逆之罪。30多年后人们都不敢扮演的角色，他们却率先为之。[注]

《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830、832页。

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载《史林》2006年第4期。辛亥革命起时，郑氏曾在日记中评价岑春煊："庸劣无根柢，一生色厉而内荏，固宜以降伏革党为收场也。"可见他对岑氏的恶感向来有之。见《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81页。

《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832、833、850页。

上述举动"狂士"在几十年前做了，而现今的"闲人"却没有做，这做与不做之间，显示出在日常生活中权势的急剧转移也已昭然若揭。如果说1860年代权力是由中央向督抚交接的话，那么在20世纪初权力则是从督抚向士林名流传递。王韬给曾国藩、徐有壬、吴煦等总督、巡抚、道台上书上了个遍，到头来还只是个无奈逃到香港的"长毛状元"；举人出身的郑孝胥在一个月里光见上海道台袁树勋就见了三次，前两次还集中在一天之内。[注]此外与督抚的书信往来，各大衙门的电报寄发，海上名流的私邸会晤更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他在那些性情并不投契的高官面前还颇为托大，如在清末大员中以强硬著称的岑春煊主邮传部时，曾保举郑氏做"丞参"，却被他一口拒绝，岑氏发急电相劝，其辞大失平日之风，有如哀恳。[注]因此可以想见郑氏在酒楼必定高朋满座，温文尔雅，谈笑风生，决不会酒醉、毁物、失态的。而其对待红颜知己也不会光以大名充作风月之资，有时反倒不免有些炫耀自家富贵的"做作"："将行，遗五十圆。月梅辞，固与之，乃惭赧而受。……至大生账房取回二百金。……未刻独诣金月梅，复遗百元。……晨，过月梅，遗诗一本及蚨百元。"[注]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267页。

其实，当严复听到"郑比出家更闲"之语时，曾颇有深意地说："何为自苦于无人之地耶！"[注]一个"自苦"正道中了"闲民"们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无奈。他们有名士的身份，而且在晚清特殊的因缘际会中更是名动天下、玉食锦衣，但时代之潮又推动着他们向"政客"之路走去。这就决定了其一，无法狂——他们与体制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其二，时不时又要表现出名

士的作派——他们也不完全是体制中人；其三，绕不开的时代使他们向“政客”之路走去，但又与那些民初转化为“党人政客”之人永远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汪康年在1911年对郑孝胥的评价看似贬多于褒，但细读却是他、郑氏这一群闲人貌似潇洒倜傥，却爱惜羽毛，瞻前顾后，甚至落入“自苦”境地的绝佳写照：

汪康年：《借债造路平议》，载《刍言报》，1911年7月1日，转引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0页。郑氏“好为大言”非汪康年一人之认知，胡思敬亦有此说，参见胡思敬：《国闻备乘》，“郑苏龛好为大言”条，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4页。对于此类批评，郑氏自己的回应是：“吾今挺身以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虽不免大言不之谤，然其盖世冲天之奇气，终不可诬也。”见《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33页。

郑君为人，明敏捷给，能为大言，能坐摄贵人意旨于俄倾之间。虽于世界事未极洞澈，语多漏义，特以口才之善，使听者不容得起罅隙，又能四面防御，使同坐者不及攻击。然其短处则失之轻躁，一面自圆其说，一面又极意伺人意旨。故目动言肆，意态不宁，而神不足以自镇，气不足以自摄。故政府之对于郑君，于其言也，宜精择而用之；至于其人，则参谋顾问，诗酒从容，亦足有所裨益。若假以政权，视用柱石，恐非其伦矣。……今郑君拔于名士队中，一跃而为政客，镇以名士之号，则人已先摄于先声之夺，加以口才捷给。则人必歆动其辞而不能别择。故吾谓郑君之言，非不可用，而择用其言之为难也。[注]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再来看职业人的世界。周作人曾说：“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路权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注]

当然，温床之效应还意味着职业人形态在进入城市后的变异，如果说塾师还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责，幕友承袭的还是春秋战国“养士”之遗风的话，那么城市中职业人的基础就已基本落在了经济利益上，而以此发散出来的各种职业伦理之变异是一个尚未得到深究的课题。

塾师、医师、幕友或者学生意，周作人展示的是士人中作为“职业人”最初形态的一群。这个群体的存在本就源远流长，清末则由于各种因素或积极如前文所提及的学幕可以仕进，学生意赚钱后亦可捐纳，消极的如人口膨胀、捐纳泛滥、连年战乱，直到最后的致命一击——废科举等都使得这一群体日益庞大，而城市则为其中的幸运儿发展提供了温床。[注]像学校、报馆、出版社等处都能经常看到这群人身影的频繁出没。“居上海”大易的包天笑就是其中一个。

包天笑在上海的主要职业是一报人，兼做杂志编辑、女校教师、小说家。对他来说，虽然与“闲人”的世界有交集，但却并不属于那个世界，他的职业决定了其日常生活是另一片天地。

张敏：《晚清上海租界文人职业生活（1843—1900）》，见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上海社会之现象——报社记者之夜来忙》，见环球社编辑部编：《图画日报》（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沪上早期报纸，除了《申报》《字林西报》外，往往仅有总主笔一人或数人，襄助笔政者若干人，报纸内容也不过是论说、上谕、宫门抄、各地要闻、本埠新闻等。因此报务只需外地新闻聘一二访员，摘录些督抚辕门抄，找沪上各衙门胥吏等提供一些官厅日常公事，加上一些斗殴、拆梢、火灾等巷里琐闻就可以完成。时间上经常是午后着手，上灯时已一律竣事矣。[注]1895年后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报馆之记者，其笔墨之忙，每在夜分，埋头灯下，况瘁异常。盖以各处访稿之至，半须旁晚始达之故”。[注]这段话正是包括包天笑在内的职业报人生活的一个注脚：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23页。

在报馆里编新闻，于每日的时间，很有关系。编要闻，时间最晚，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那种专电，往往要到夜里十二点钟以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也说不定。……本埠新闻的编辑，比较要早得多，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访稿全部来了，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如

果在九点钟以后，发生了特别事故，有重要新闻，明晨必须见报的，当然可以加入，其余的琐闻细事，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至于编外埠新闻的，更要早一点，从前还没有快信、航邮，下午五点钟以后，邮差不再送信了，把当日所到的信，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发清了稿子（有的须要修正一下），就没有你的事了。[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22页。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75—376页。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24页。

任鸿隽也曾在回忆其在天津《民意报》的生活时说："当时报纸的作风，注重在言论上，故每天必有一篇以上的社论，一两个时事短评，这在执笔人不多的报馆里，是相当繁重的工作。记得我有时因为赶写社论、时评，直到午夜以后方得休息，星期日也得不到休息，因此决心不再干报馆的事了。"见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包天笑负责编辑的是外埠新闻，从引文不难看出其编辑工作在《时报》馆尚属轻松，但也总要到下午五点钟以后才能完一天之工，报人之辛苦可想而知。何况他还要每月写论说六篇，后来虽不写论说，算得"藏拙偷懒"，但每月30则短评却仍是逃不过，[注]加上《时报》上连载小说，给《小说林》写写稿，女学堂兼兼差，"一天到晚，就忙了那些笔墨上的事"。[注]因此尽管他收入丰厚，七七八八加起来超过了120元，[注]当时一品香吃西餐不过三元，包氏却不会像"闲人"一般以酒楼、青楼、洋楼为主要逗留之所。他们的交往空间在《时报》馆，在息楼之中。[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18页。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29页。本文有关息楼的部分受到方平老师的研究启发甚多，可参见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包天笑工作的《时报》并不是他一人"念天地之悠悠"的所在，而是有一个《时报》报人群，包括狄楚青、陈景韩等海上闻人。本来包氏并不需要天天到馆，但总经理狄楚青却以为："在报馆里天天见面，大家亲切有味，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讨论。便是写论说，也可以对于新闻上，有所讨论商酌，每一个报馆常有论调与人不同之处，论说上或还有必须修改之处，仅仅是闭门造车，我以为是不大相宜的。"[注]可见《时报》报人群对"交往"相

当重视，为此《时报》馆还专门在楼上辟筑“精室”唤作“息楼”。这个“息楼”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呢？“无非是聊供休息之需，有许多朋友来访问、闲谈，便请在息楼里憩坐。在报馆里的同人，工作之余，也在息楼中休息一下。或有朋友见访，就可以在息楼中会客。息楼那一间房子，由报馆供给，不取租费；另雇一个茶房，专管息楼内的茶水、差遣等等，备了几份日报，供客流览，所费无多，而得益匪浅。也有朋友们在息楼里吃点心的，好在时报馆在福州路望平街，邻近都是点心店、西餐馆，叫茶房去唤他们送来，自吃自惠钞，很多便利。”[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38页。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52页。

就是在这样一个“谈谈说说，庄谐杂作，谈笑风生”[注]的公共空间里，包天笑认识了不少友朋，除了报馆同人以外，还有许多馆外的同好。大家时常聚集一处，由此，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小集团，即所谓的“息楼中人”[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413页。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33、413页。

“息楼中人”几乎全部是江苏人。而且江苏的宁、苏二属中，又几乎都是苏属中人（在晚清此二属几乎就是一省两个世界）。其中有林康侯、吴怀疚、朱少屏等几位上海本地人，以及松江的陈景韩、雷奋、杨白民，娄县的史量才，青浦的叶养吾，川沙的黄炎培等；次之则为苏州人，如包天笑、龚子英、杨廷栋、吴纳士以及杨荫孙、杨景森昆仲。以上人等常登息楼，那么哪些人身在《时报》馆中，却并不常来呢？据包天笑回忆，《时报》的总主笔、与狄楚青同属康门弟子的广东人罗孝高与另一位广东籍主笔冯挺之，因与馆内其他同人言语不通，就不参加息楼的聚会。狄楚青本人虽是《时报》总经理，却也难得到息楼来，因为他是宁属的溧阳人，“与上海的一般松江人、苏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注]包天笑与朱少屏的南社朋友也不来息楼。[注]因此，所谓“息楼中人”，从地缘关系上看集中于江苏苏属的上海县、松江府、苏州府人。

除了地缘关系外，学缘、血缘关系亦是“息楼中人”聚合的重要纽带。如沈恩孚、袁希涛两人都肄业于龙门书院；沈恩孚还是林康侯的母舅，也是吴馨在龙门书院求学时的老师。雷奋、黄炎培、林康侯、吴馨、朱少屏、杨廷栋以及杨荫孙、杨景森兄弟等都曾在清末上海新式教育的重镇南洋公学读

过书。陈景寒、雷奋、杨廷栋还一起参与过日本留学潮。陈景韩的父亲做过雷奋的老师，陈氏胞姐又是雷奋的夫人。杨廷栋则与雷奋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并一起与杨荫杭等人于1900年在日本组织“励志会”，创办《译书汇编》等刊物。

《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66页。
《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孙应祥：《严复年谱》，第145页。

最后来看革命党人、学生的世界。清末的上海其实并不让一些日后被视为著名革命家的人物过得舒心，像章太炎就在信中对吴君遂感叹：“自君遂徙金陵，而吾不复得佯狂避世之友于海上，宙合虽大，可与言者几何……在学社久，无可为知己道。”注后又在给刘师培、夏曾佑的信中言及苦无同等量级论学之人的苦闷：“上海市井丛杂，文学猥鄙，数岁居此，不见经生，每念畴昔，心辄惘惘。”注“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谈，苦无大匠为施绳削，又陵适至，乃以拙著二种示之，必当有所纠正，亦庶几嵇康之遇孙登也。”注

而苏曼殊、陈天华则借小说为自己之口痛诋那些在城市各个公共空间出没的“海上志士”：

沈寂：《苏曼殊与陈仲甫》，见丁守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55—356页。

尚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出名的爱国志士。但是那班志士……不过是嘴里说得好听，实在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人，这么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了什么书店，什么报馆，口里说是借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顽固人的罪恶还要大几倍。注

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那客笑道：“要会上海的志士，何难之有！到番菜馆，茶园子，说书楼，及那校书先生的书寓里走走，就会到了。有时张园、愚园开起大会来，

就有盈千盈百的志士在内。老兄要想会志士，同我走两天，包管一齐都会到了。”必攘惊道：“难道上海的志士，都是如此呢？”那客道：“哪一个不是如此？现在出了两句新名词，‘野鸡政府’，‘鹦鹉志士’。要知现在志士与政府的比例，此两句话做得代表，老兄不要把志士的身价看得太高了。”必攘低着头默默无言，长叹了一声。那客又道：“老兄不要见怪，这上海的融化力，实大得很。老兄若在这里多住几月，恐怕也要溜进去了。”必攘也不回语，心上一团红燃燃的火，好像陡然浇上一桶冷水，熄灭了大半，从此也不再会那些志士。㊟

章太炎：《邹容传》，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63页。不过在章氏为邹容所撰的《赠大将军邹容墓表》中则有另一版本：“社生多习英吉利语，君调之，曰：‘诸君堪为贾人耳。’社生皆怒，欲殴之。”见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49页。传之撰写早于墓表，因此墓表的措辞明显要比传温和一些，所谓“稍增损其辞以表于墓”，这大概是出于邹容与爱国学社诸生具有“革命同一性”的考虑。此点在后来的革命先烈追述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到了爱国学社，看到一般学生多练习英语，便嘲笑他们说：‘你们只配做商人罢了！’爱国学社的学生也多半是有革命性的热血青年，听了这话之后，认为是一种侮辱，甚至都想饱他以老拳。”见杜呈祥编著：《邹容》，青年出版社，1946年，第51页。

邹容更是在爱国学社——这一新学与新人物群聚之地与众人发生冲突，毫不客气地数落他们：“尔曹居上海，在声色狗马间，学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惹得那些新人物群聚欲殴之。㊟

以上四人的感受确实部分映射了当时革命党人、学生的生存状态，比如学识浅陋、声色犬马、逐利求名等。但其尺度却多是理想或自我的标准，因此也不免部分失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批评，这些批评与他们的私谊网络又有什么关系？就让我们重新来考察一下清末革命党人、学生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日常生活。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

陈旭麓：《〈国民日日报〉评述》，见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2页。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与之相参照同盟会员陈纪云回忆他在烟台与齐芾南等办《渤海报》时，“公议月酬银五元，往往兼旬不名一钱。白逾桓住报馆中，日啖干烧饼，且嚼且大呼黄天霸不止。在京遇明侯，革履穿而踵决，省冠三病于小客栈中，胱布小夸褂衣之，始扶将出门去，其穷无聊赖，大率类是，二三十元谈何容易，宜其不可骤得也。”陈隽、佟立容：《陈干与辛亥革命史料一组》，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而像孙竹丹被清廷追捕，幸得友人通知，得以脱逃。“中道金尽，石德纯助之，始复归日本。钱兆湘、杨宝泰迓于东京车站，见其形神俱瘁，衣服尽敝，呜呼！可谓狼狈矣。”见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第86页。

革命党人和学生除了政治上经常处于边缘外，日常生活也往往在一较低的水平，这一世界中人的基本处境被罗志田形象地概括为“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注]像《国民日日报》在新马路梅福里租得一楼一底，楼下安置印刷机及铅字，楼上作编辑室。[注]报社环境如此，身处其中之人就更遑论有什么高质量的生活。章士钊回忆其办《国民日日报》的经历时就说：“（陈独秀）东游不得意，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晓石共立《国民日日报》。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注]

苏鹏：《海沤賸瀋（选录）》，见《近代史资料》（总4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79、184页。

以上是革命党中的报人，另外像军国民教育会的一批从事暗杀活动之人，在天津“租一屋为根据地，将药料、铁弹、电线、电器购就”；到了北京“蛰居都门，伺候阅五月，（那拉）氏尚无还宫之意。吾辈辛苦相筹，东挪西借之旅费已告罄矣”；回上海则“散处旅次，行李萧条，阮囊羞涩”。[注]

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见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总105号），第5、6页。

学生的情况也未好到哪里去，任鸿隽在重庆中学堂时就曾数月无钱付食费，当时学堂食费每月2400文，不过约合银圆二枚。幸而学堂监督借款偿付，才得以渡过难关。任氏又尝以300文一万字为代价为人佣书，还在小学和

中学堂任教一年，才积蓄有120元来上海继续求学。但这点钱也不过仅够其在中国公学读一年书罢了。

苏鹏：《海沤賸瀋（选录）》，见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总44号），第184页。

恶劣的生活环境，加上年轻人常会出现的敏感、苦闷与彷徨，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的生活状态。这种逆反在最初可能表现为一种对声色犬马生活的向往，像章士钊和他那帮军国民教育会的朋友们因王之春案入狱数月，释放后章氏“有腻友李香萍诗妓接居香巢，浴以芳泽，衣以文锦，软语温存，过其似蜜非蜜之生活……同人等皆不胜健羡之至”。

家境日坏，前途可忧的首要之事是1909年10月初，胡适栖身的中国新公学解散。而同时胡家为了那一点薄产，兄弟们要分家，母亲又病倒。胡适在日记中形容自己是：“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此种景况，已不易过；今则并此三字而亦无之，则惟有坐弊而已耳。”胡适日记（己酉十二月二十一日），见《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61页。
适之自志，见《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57页。

如果境况日益朝着不佳的一面发展，周围又出现了一个玩乐的圈子，就会真正投身于这种生活，像胡适在上海曾有一段时间因家境日坏，前途可忧，而胡天胡地过：“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国公学沦亡以来，心绪灰冷，百无聊赖，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之事，皆一一为之。”

胡适在这段“胡天胡地”岁月里最堕落的叫局、吃花酒不会少于八次，而接触过的妓女则有赵春阁、花瑞英、金韵籁、白玉茹、陈彩玉等人。胡适日记（己酉十二月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庚戌二月二日、五日、六日、十日、十二日），见《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58、60、77、79、80、81页。

这些“鄙夷不屑为之之事”简单地说有三大项目——看戏，打牌，逛窑子。他们这群玩友领头的是新公学一个叫何德梅（Ottomeir）的混血儿，此君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什么都会。他住东屋，胡适与林君墨、但怒刚等几位朋友同住西屋，这东西屋又互相连通。另外，离胡适住得不远，还有个唐桂梁，系唐才常的公子，父亲死了，革命也不见希望，他自然情绪

不会见佳。[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就有苦闷之心，朋友再一教唆，胡适学坏了：

胡适：《四十自述》，岳麓书社，1998年，第68页。

和我同住的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党人死的不少，这些人都很不高兴，都很牢骚。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注]

可见革命党人和学生私谊网络自身的特点，再辅之以上海这座城市众多可供交游的公共空间，声色犬马之诟病几无可避免，即使是对假志士批评有加的苏曼殊亦加入了这一行列，1903年的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国民报社，伏案译嚣俄小说，终日不作一语，若有深思者然”，并且“天天嚷着要离开上海”，而到了1906年则变成了“一绝风流之和尚”。据陈仲甫回忆：

沈寂：《苏曼殊与陈仲甫》，见丁守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356、357页。

我重到上海，有朋友在酒馆请我吃饭，正在谈话中间，忽然闯了一个和尚进来，却是曼殊来也！……此时他僧装而吃酒吃肉。我们劝他改穿西装，他坚执地不肯。但隔了几时，却又自动的改了。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几年前除了我们以外，没有朋友，而此时却朋友很多，不但有男朋友，并且有女朋友了。[注]

胡适：《四十自述》，第36—37页。

“望延道：‘所有革命军的说话，早经浏阳谭壮飞先生所著的《仁学》说过的了，然而戊戌那年，谭先生就戮，绝无爰书，亦丝毫未涉及《仁学》一字。是谭先生著《仁学》未尝得罪，这一位搬纸过字的倒代他受了罪，岂非不值？’”见《吴趼人全集》（第3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7页。

但另一方面，依托于上海众多的新制度媒介和公共空间，也使得这一世界中人绝非与“名利”无缘。当时的革命党人和学生大多是些“新人物”而

非“新学人”。在上海这个华洋杂处、两不着边之地，这批“新人物”旧学无底、新学无根的状况尤以为甚，但却并不妨碍他们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得享大名的运气。胡适在安徽老家私塾里“读了许多古书”，来到上海应对梅溪学堂初级班的《蒙学读本》可谓不费吹灰之力，更能进一步指摘老师的错处，从而一天内连升四班，即为一明证。[注]如果说章太炎在学界还被公认为功底深厚，以其“大儒”身份批评一下上海学人、学生的程度低尚能服众，那么以“中外之学”为凭借的青年邹容却并不是一个能跳出如来手掌的孙悟空。1907年吴趼人就已在小说《上海游骖录》中暗讽《革命军》与谭嗣同的《仁学》十分相似。[注]唐文权则对《革命军》的“借资移植”做过很仔细的研究，发现多处借资时人，且程度不低：

唐文权：《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506—518页。潘光哲也发现：“邹容自称‘仿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以备行采焉’，提出了25条方案。然而，这25条方案里，不少是对于新近刊布在《国民报》的《美国独立檄文》的‘复制’。”见潘光哲：《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以一九三〇年为例的一些思考》，载台湾《近代中国》2001年第145期，第100—116页。

《国民报》七则，梁启超四则，谭嗣同二则，章太炎一则，蒋智由一则，麦孟华一则。借资程度，原文照录移植入文者为第八、第十、第十六三则，余皆略加剪裁入文。明言借资者为第十六则……[注]

“梁先生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的时候，虽曾作过不少文章，对于当时的思想界，投过清导剂，并且于当时人心学术发生过影响的。但是那时的文章，都是朝写晚登，有时竟剿袭东洋一些一知半解的学说。”郑师许：《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关于当时新人物不看书和淘汰时人之书之快速，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中有一段对话可谓活画：“及源呵呵大笑道：‘《仁学》几乎是十年前的旧书了，谁还看他；况且谭嗣同是康党，康党之人是腐败到极点的，掮起一扇保皇党的招牌，甘做牛马奴隶。’望延道：‘《仁学》自谭先生死后，才由《清议报》出现，《亚东时报》也登录过，以后才有单行本，也不能算十年前的旧书。’味辛道：‘阁下向在内地，不知道人家进步之速，以日本而论，新出版的书，不过一年半年，便三版四版，甚至有十多版的，迨及一二年后，便无人过问的了。’”见《吴趼人全集》（第3卷），第457页。

被千万学堂学生“秉烛偷读”的《革命军》并非鸿篇巨制，已不可脱拾人余唾之评。虽然这是当时普遍风气使然，连精神领袖梁启超也不能免俗，[注]但也不难看出邹容秉持的“中外之学”实质之所在。不过爱国学社诸生可能连时人的书都懒得一阅，整天凑在一处忙于闹点风潮，在密室中造几个炸弹，把持些校务。[注]那点借来的底气才足以支撑邹容在他们面前指点江山一番。

马君武：《〈君武诗稿〉自序》，见《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5页。

邹容因“《苏报》案”令人扼腕地瘐毙狱中，但他也借“浅直谐俗，恣肆不文”（章太炎语）的《革命军》而得享大名。其他与邹容年岁相仿的革命党人、学生虽未得享大名，却也收获不少。1902年、1903年被公认为是革命思潮激荡的年份，但激荡背后却有着非常现实的因素。马君武就自述其初至日本时：“颇穷困，辄作文投诸报馆，以谋自给，故壬癸间作文最多。”[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周作人致吴海发信（手稿）》，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9期。

而梁启超、周作人之言也可为马君武自述的旁证，梁启超就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注]而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为革命刊物《河南》撰稿，其目的有二：“固然其一在于发挥文学上的主张，其一则重在经济，冀得稿费补助生活。”[注]

关于此可参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湾稻乡出版社，2005年。

译述之业特盛，不少时候是源于“颇穷困”，所以因“颇穷困”而作文的就不会单单是马君武、周作人、鲁迅。从东京到上海其实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文字生产、出版、发行、销售的网络，[注]通过无孔不入的私谊连接，不少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学生也参与了进来。此种参与在利之外，如果你不输文采，机运合适亦会带来名，林獬就是在这个网络中“名利双收”的典型：

陈与龄：《林白水先生传略》，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13期。

返上海，鼓吹革命益力，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白水）每篇仅受酬金五元，然必待资尽而后为之，瓮有余粟，犹舍文而嬉也。复好客，客至，辄请少待，临案走笔，顷刻成篇，遣急足持投报馆，收稿费设酒宴以宴客。[注]

章士钊：《疏“黄帝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221页。

就连严复也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对其译书费做了好大一番计较，何况革命党和穷学生乎？其文云：“今南学中既已有意欲开此局，此诚莫大盛举。兄何不为我一探盛廷尉口风？如能月以四百金见饷，则仆可扫弃一切，专以译事为生事矣。四百金看似骇人，然银价日微，不过往者之三百。而中国延请外人，动费千金月俸，其能事岂遂在复上耶？此非贪得，盖不如是，不能捐置一切也。盛廷尉有心人，似尚可撼，兄试为我谋之。此事果成，不但廷尉之费不至虚掷，即复亦不至虚生也。成人之美，非兄而谁？”见《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26页。

林獬的经历说明在上海革命党人、学生的逐利追名当然可能是像朱菱溪一样“为人卤莽灭裂，要挟同学，使派己充代表，回上海组织民权社，经营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终”，[注]但也可能是由穷困而应变，由应变而得名的一个并不值得加以过多指责的过程。[注]何况由于租界的存在，清廷本身控制力量的薄弱，以及回看革命历程和实际革命历程的落差，在清末上海的“革命”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论杀革命党》，载《申报》，1907年2月28日。

革命党者，各国所谓秘密党也，今之革命党，吾见之矣，茶店酒楼之上，大庭广众之间，而嚣嚣然曰：“吾秘密党员也，吾持流血主义者也，吾为社会计，则宁牺牲吾一身，吾不为一身计，则可杀某某。”[注]

《论杀革命党》，载《申报》，1907年2月28日。

需要注意的是对官员来说这也是一个可带来名利的场域。如秋瑾案时《申报》评论就说：“中国党祸多矣，官场拘捕似是而非之革命党亦多矣。然未有惨酷悖谬，假公报私，如今日绍兴冤狱之甚者也……杀革命党者，升官之捷径也。以杀革命党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革命党也。”《论绍兴冤狱》，载《申报》，1907年7月23

日。关于此可见马自毅：《冤哉，秋瑾女士——析时论对秋瑾案的评说》，载《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这种在大庭广众之间、茶店酒楼之上“嚣嚣然”的情形既不符合《申报》记者对各国革命党的认知，也不贴近我们惯常对革命党的回想。但当“‘革命’二字乃时下所崇，将借是以为美丽之称号，时髦之头衔”[注]的时候，那些以此为招牌，背后却暗藏其他诉求之人都会纷纷踏入这个革命场域，于这类公共空间表演，才进一步造成孙毓筠等热心官场之人，野鸡大王徐敬吾等沉溺花柳之人被当作革命党人而遭到抓捕的吊诡场面，才会有秋瑾女士被杀时，上海各大报刊的一片呼冤之声。当《申报》记者感叹“中国实无一革命党”时，我们亦可说正是能使人变得“嚣嚣然”的上海把每个进入者都塑造成了革命党！[注]而当“革命党”多如过江之鲫，如章太炎、邹容等自视甚高的人物也要忝举其列，被同一种称号变相地“与众人同”，他们不牢骚满腹才叫咄咄怪事。

二、

认同与权力：清末知识分子交往的会社网络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74页。

清末民初各类会社蓬勃发展，学界在1970年代就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据张玉法对清末十年间的统计，共辑得国内及海外的社团668个。在后来的研究中，统计出的会社数量更有很大的增加。据桑兵考察，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2000有余。

会社在清末的勃兴自然有众多原因，学界著述已相当丰富，而从交往史的角度看，城市较之乡村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在人员的流动上，人员的流动让城市打破了“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士人们的人际关系也往往因此能在私谊网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城市为聚散场所，与当地的土著、寓公或其他的陌生人展开交往活动。在此交往场域中，士人们不断地跨出熟人世界，经营人际关系，并借此寻求亲属、同乡、同学以外的，属于自我的在这个城市的独特身份认同。这一寻求过程的结果之一就是“制度性”地凝结出非血缘的会社。

1．三种联结方式——会社之形成

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0、21、59页。

考察会社之形成，我们发现清末一般有三种层次的联结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最基本的，几乎在每个时代形成会社时都会出现，即对私谊的认同。像著名的南社，不管是发起南社的核心成员还是后来的重要成员，其最初的联结都是建立在私谊网络的基础上。首次雅集的17人中，大同乡意义上的江苏籍人就有11人，而陈去病、柳亚子、高旭三位最著名的南社元老在地缘上就更加接近。陈氏与柳氏均是江苏吴江县人，二者之家相距不过五六十里；

高旭是江苏金山县人，距离也不过200里。1902年春16岁的柳亚子离开家乡黎里赴吴江县城应试。而这一次进城对他的大影响就是结识了陈去病：

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2页。

第一个给我兴奋的，是认识了亡友陈巢南先生。巢南是我太老师诸杏庐先生的高足弟子，讲行辈，和我父亲及叔父同门，我是应该称他做师叔的。但他和我一见如故，绝对不摆师叔架子，引我为小朋友，我和他真是所谓“论交在群纪之间”的了。[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53页。

另一位南社的成员包天笑则是由“息楼”的朋友朱少屏介绍入社的，而他入社的动因更与私谊网络大有关系：“我的加入南社，因为南社早已有了我几位老朋友，如陈佩忍（去病），在吴江同里镇金松岑家就认得的。如苏曼殊，在苏州吴中公学社就认得的。”[注]另外像南社的分支社团淮南社亦受其主社影响，其主要发起人周实和阮式同样是江苏淮安的同乡。1906年秋，阮式考上南京宁属师范，结识周实，成为至交。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刘桂生、岳升阳：《北京宣南士人文化空间的形成与戊戌维新》，见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8—339页。

《安徽旅沪学会二次大会》，载《申报》，1906年5月29日。

胡适日记（1906年5月6日），见《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25页。

第二种为清末新出现的，即对界的认同。章清指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其表征明显是‘省界’、‘业界’及‘阶级’等亚文化圈，社会动员也主要在这些环节展开。”[注]但所谓“界”却多是存在于书籍、报章、杂志的言说之中，要真正落实往往要依托于会社这样的实体。在戊戌维新期间，作为北京会馆集中地的宣南，就发挥了“借助会馆而立会，依托学会而聚众”的功能。[注]而作为清末南方中心城市的上海，其不仅是界的言说的一大发源地，又因为其在各方面的优势地位，而能够组建会社，形成真正的人员聚合。以省界为例，不少以此为认同的会社径直冠以“旅沪学会”“旅沪同乡会”之名，如安徽旅沪学会、浙江旅沪学会、浙江旅沪女学会、四川旅

沪学会、江西旅沪同乡会等；有的虽并不一定标示“旅沪”字样，但却也会明确出现本省的名称，如福建学生会、安徽路矿公会等。这些因缘于省界而结成的会社都希望在上海联络同道，图谋公益，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推动他们想象中的省界之进步，而寓居在沪的有着同省认同之人也相当乐于见到这类会社的产生。像安徽旅沪学会成立之初，李伯行、方守六、谢筠亭、周品珊、吴子猷、苏幼卿、朱劲波等旅沪皖籍人士就一再强调说：“上海为交通之中心点，而安徽远处内地，欲结团体、兴学务，以竞争于世界，非立会于上海不可。而是会立后，欲维持永久，尤在人人有自治之力，泯除意见，以图公益，则本省前途幸甚。”[注]而当胡适得悉旅沪安徽同人将组织一“安徽旅沪学会”，观日记就可知其相当欣喜：“此为吾皖人创举，闻之大快意。闻此事主动者为方君守一，定今日开会，布告章程，余本欲赴会，后读《时报》，知已缓期，乃罢。”[注]

《南社长沙雅集纪事》，载《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第三种亦为每个时代都有，但每个时代又都有其特色内容，即对会社政治、文化目标的认同。一个会社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政治或文化目标，其对已加入者或欲加入者的号召力就不会太强。因此会社的各种象征符号比如会社名称和各种与会社有关的活动、仪式都会或隐或现地体现出它的目标，以昭示会社的存在和其拥有的权力。像南社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子。对“南社”这个名称，其创始人的解释就直指他们的政治、文化目标。陈去病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柳亚子则说：“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了。”[注]虽然这几句话都出在辛亥革命之后，却也符合很多人聚集到南社大旗之下时不能明确表达，却相当一致的追求。而为了这个追求，南社成员举行了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与仪式，以凸显他们的目标，主要有辑书、祭祠、谒陵等。而这些举动对南社的形成和其成员的交往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有学者就指出：

郑勇：《社会转型中的文人结社——以南社研究为中心》，见王守常等主编：《学人》（第1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76—477页。

陈去病至浙江访宋遗民谢翱西台恸哭处，在绍兴祭扫宋高宗、孝宗六陵，杭州祭扫张煌言墓，至广东则凭吊陆秀夫背负宋少帝投海处，在汕头祭悼南明隆武帝，而且每每形之诗文，向社友索和，由酬唱和叠行为使“独哭荒祠式”的个人行动变成群体参与。1910年高燮、高旭、姚光、蔡守等会同

周实、周伟同时凭吊明故宫、孝陵时，“本古诗人伤时念乱之义，以此为周凯新亭之泪，阮籍空山之哭”，便不无“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誓师北伐的豪壮。

2．借助公共空间——会社之活动

会社形成之后，会社所开展的活动亦是考察士人交往的一大途径。王鸿泰就指出：

王鸿泰：《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社盟活动为明清间社会之重要特色，而其构成基础则为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社交活动。同时，社交场域也构成一个价值系统，个人可以在此场域中经营个人声名，藉由声名的确认来肯定个人价值。而且，当“名”的价值确立于社会中，且扩及于一般非文人阶层，声名的追求成了普遍性行为时，在“名”与“利”的交换下，声名又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除了个别性的名、利交换外，声名更可着落于出版市场中，制度性地转换成经济利益。如此，社交场域中的社交活动也是种价值活动，乃至是种经济活动。在经济力量的支持下，社交场域稳固地存在于城市中，而“城市社会”也在“乡土社会”之外，成了个人另一个安身立命——或者求名取利的人生活动场域。

清末社团活动的情形其实与上引王氏之概括非常类似，即遵循着“借助公共空间以展开社交—获得声名—出版报刊书籍—获得更大的声名”这一条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

《新开〈国民日日报〉》，载《岭东日报》，1903年8月20日，转引自郑勇：《社会转型中的文人结社——以南社研究为中心》，见王守常等主编：《学人》（第11辑），第487页。

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3期，1934年12月，第847页。

一为借助公共空间凝聚内部成员。以南社为例，除了前两次外，其后的雅集都在上海的各大名园如张园、愚园、半淞园、徐园举行，《南社丛刻》的出版发行也在上海。除了雅集和《南社丛刻》，更重要的是南社成员参与活动的上海报刊。1903年，高氏兄弟在松江创办《觉民》月刊，黄节、陈家鼐、包天笑等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陈去病和柳亚子则襄助章士钊创办《国

民日日报》。时人把此报或视作《苏报》第二，或认为“此报胜于苏报”。[注] 1904年10月，陈去病又创编《二十世纪大舞台》，接替蔡元培续编《警钟日报》。邓实、黄节二人则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托名保存国学，实则以提倡气节、恢复民族精神为宗旨，除了刊发《国粹学报》之外，还辑印《国粹丛书》若干种，多为宋、明遗民著述。[注]

柳亚子：《南社纪略》，第42页。
《南社启事》，载《太平洋报》，1912年4月1日。

不过上述报纸比起《天铎报》与《太平洋报》来还算不得南社的大本营。《天铎报》由社员李怀霜、陈布雷主持，《太平洋报》则由姚雨平、叶楚伧创办。尤其是《太平洋报》，光复之后不再有清末对于革命报刊的严密文网，由柳亚子主持的该报文艺专栏，内部职员几乎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注]不仅如此，南社的流动联络站也设在了报馆里面：“本社因社员加入遍及海内，交通机关急宜成立，现议定于《太平洋》馆内附设南社交通部。”[注]

郑勇：《社会转型中的文人结社——以南社研究为中心》，见王守常等主编：《学人》（第11辑），第493页。

社友的诗、文、词有拟交《南社丛刻》的；交纳入社金和常捐的也寄给报馆。上海的交通部在《太平洋报》，后来则是《中华民报》，上海之外南社亦以报馆为社员联络之地，北京在《国光新闻》内设立通讯处，而杭州是在《平民日报》馆。[注]可见报馆这一公共空间促进了南社社员的聚合，成了他们主要的交游之所。

二为借助公共空间扩大对外影响，扩大对外影响也需要编印书报杂志，更要演说宣讲，开会造势。先来看编印书报杂志。清末上海有影响的会社基本都会以此来联络声气，扩大影响。如竞业学会有《竞业旬报》，人镜学社有《保工报》，社会主义研究会有《社会星》，书业商会有《图书月刊》，华商联合会有《华商联合会报》，中国医学公会有《医学公报》，宪政研究会有《宪政杂志》等，不一而足。

这些书报杂志究竟对会社的经营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已有学者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像方平就对清末最有影响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编印的书报杂志做过细致的分析，认为公会的机关刊物《预备立宪公会报》：

方平：《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预备立宪公会》，见熊月之、高纲博文主编：《透视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宗旨明确，政治立场鲜明，且学理探讨与实际问题分析并重，加之“贬价销行”，“每册仅取值五分”，因而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当时的发行情况来看，仅上海本埠，就有中国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科学书局、南洋官书局、时中书局、普及书局以及世界社等8处销售点。此外，在北京、天津等地以及南洋大吡叻，还有58个销售点。从地域上看，遍布全国17个省份的48个城镇以及南洋等地。[注]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

方平：《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预备立宪公会》，见熊月之、高纲博文主编：《透视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预备立宪公会还先后出版了多种介绍地方自治和立宪知识的书籍。这些书籍或由会员独立编撰辑录，或移译日人著述，大多选取筹备立宪过程中正在或即将实施的法令法规以及其他事项为题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关心时事、要求立宪的人们提供了颇有助益的参考，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不仅行销上海以及附近的江浙一带，而且还远销内地以及一些边远省份。其中，《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分别印行27版和16版，仅广西一省就订阅10万部。孟昭常所编《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还被清政府民政部立案通行。由于清廷筹备立宪的关系，“官场尤乐于购买”这些书籍。该会出版部曾不无自负地说：“足见官场举行新政，实不能不借本会鼓吹之力。”[注]

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第27页。

再来看演说宣讲。20世纪初年，伴随着清末国家危机意识的高涨，各项新政开展日急，对下层启蒙蔚然成风。演说宣讲成了一大重要手段。像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就说：“第六要，立演说，思想遍扬。列位！演说是开通风气第一要着，外国有了三四个人，就要演说一番，要想救国，这是万不可不立的。”[注]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对于蔡氏的教导，黄炎培的回忆更为详细。蔡元培教导他们说：“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

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在蔡元培的鼓励下，黄炎培等人“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由于只能说方言，不会操国语，大家还推请籍隶南方但生长于北方而操国语的李叔同教授国语。见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李平书、穆藕初、王晓籁：《李平书七十自叙·藕初五十自述·王晓籁述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

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对此也有相当明确的阐发：“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语言。”所以特别设立小组会，练习演说、辩论，并提供日文演说学著作数种，供学生参考。同时又考虑到一般人不了解各地方言，所以又要求学生练习国语。[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会社都纷纷“定期集会，邀请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期增进群众知识”。[注]

《家政修改之先声》，载《申报》，1906年11月27日；《纪家政改良会》，载《申报》，1906年12月18日；《家政改良会纪事》，载《申报》，1907年3月25日。

《定期演说》，载《警钟日报》，1904年5月8日；《里竹弄商学会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6月12日；《南市商学会例会》，载《申报》，1908年4月19日。

《五马路商学会演说》，载《警钟日报》，1904年6月12日。

《青年学会章程》，载《警钟日报》，1904年6月4日。

《学商公余社附设宣讲所》，载《申报》，1910年5月11日。

《组织宣讲处之手续》，载《申报》，1911年2月14日。

如家政改良会，就以沪南毛家弄竞化女校为场地，每七日开一次演说会。[注]商学会也会定期举行演说活动，演说的主题，涉及面甚广，既有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工艺制造的内容，也有诸如“立国必以战争”“中东商业之异同”“合群以求自立”“商战之险要”“挽救垂亡之南市”之类的题目。[注]演说者，既有本会会员，也有严复、王清穆、张謇这样的名士。[注]青年学会则提出会员都应负有演讲辩难的义务，遂两周集会一次。每三期集会中，两期为演说，一期为辩驳，自择演题，公定辩题。每次演说时，一人为“主讲员”，四人为“接讲员”。演说之后有跃跃欲试者，可于下次集会时做讲员或于本会“大祝典”时进行演说。若会员操方言而不便于演说辩难，可预先预备演讲稿，请他人代为演说或宣示辩驳意见。[注]学商公余社于1910

年召开春季大会时组织了专门的“宣讲社”，于5月9日举办第一次宣讲，邀请顾霖周演讲“地方自治”问题，并分送讲义，听者络绎不绝。此后，每周日晚间该社都要举行宣讲。[注]东南城地方自治协赞会会员王志公于1911年春节期间组织“新年宣讲处”，自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每日邀请名人轮流演讲，听讲人非常之多，而且大多数是平民阶层以及妇女儿童。鉴于宣讲收效甚著，王志公还准备邀请学堂及会员数人每周日轮流演讲以开民智。[注]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李平书、穆藕初、王晓籁：《李平书七十自叙·藕初五十自述·王晓籁述录》，第110页。

《提倡通俗教育》，载《申报》，1907年4月27日。

在演说宣讲之间歇或结束之时，一些会社还常常利用音乐、戏剧、幻灯等更易为人接受的形式作为辅助，以传输会社的理念和想法。像沪学会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开启民智、改良社会，鉴于“感人入深者莫善于讲求音乐”，遂设立音乐会；又为因半数以上之人皆目不识丁，于是更召集有志研究新剧之同志若干人，并敦请专家，方便指导，着手开演文明新剧，使“见闻者，于娱乐中无意中得受绝大之感化”。[注]袁希涛、龚杰等人组织的通俗教育社更集资购置了一套幻灯，由陈奎堂等人四处试演，穿插放映有关军事、教育、卫生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延请讲员随演随讲，相机指点”，以期设法开通下流社会。[注]

《国民总会开成立大会》，载《申报》，1911年6月12日。

最后来看开会造势。1911年6月11日，中国国民总会在张园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不下5000人，据报章说楼上楼下的座位都被坐满，极一时之盛。[注]

《全国商团联合会大会纪盛》，载《申报》，1911年4月10日。

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会员及来宾有两千余人。副会长叶惠钧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中国人处此时代，不死无路，以故热心爱国之士，莫不汹涌而来，纷纷入会，自本会开招至今，如不截止，已逾千人。现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出此下策。”虽然当时尚不满千人，但叶惠钧表示，从长远来讲，商团联合会将扩展到3000人的规模。[注]

《中国学生会开会纪事》，载《申报》，1911年2月23日。

1911年，环球中国学生会假万国体育场举行新年大会，到会者甚众。会员伍廷芳等人在演说中一方面不无自豪地宣称“本会名誉早播全球，是亦吾国学界之荣，同人之幸”；另一方面则大声呼吁，“愿诸君固结团体，共谋进步，毋自弃其权，致贻外人之讪笑”。卜舫济则说：“凡能创极大事业者，必有极大思想。思想为万事之母，无思想，则百事皆废。本会五百余会员，富有思想者，自不乏人，如能尽力做去，勿灰其心，勿馁其气，必有获收大效之一日。”[注]可见，他们开会的大目标正是如何扩张本会。

《地方自治研究会周岁大会纪事》，载《申报》，1907年4月1日。

地方自治研究会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地方公益，一再聚集会员就地方社会利弊得失和兴革改良等问题进行会商、研究，于地方自治运动贡献颇多。1907年4月，该会在张园召开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有千余人。[注]

三、

政治变迁与权力：清末知识分子交往的集会网络

清末十余年是一个政治事件频繁发生、涉及范围广泛而且影响深远的时代，概要地说就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民族主义运动（包括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当此起彼伏的政治变迁来临时，身处上海的士人们依托城市固有或上海特有的公共空间发动组织集会，以应对时局的变化，并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1．清末上海的集会

直到1897年12月，经元善等中国女学会同人就在张园安垲第发起讨论设立女学问题，汇集中西女客122人，才为张园有百人以上大型集会之始，而且还仅限于教育问题。参见《内董事张园安垲第公宴中西官绅女客会议第四集》，见《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9—203页。

如在四明公所案中，是一批商人（主要是绅商）处于核心地位，如年长者有方继善、严信厚（读过私塾，钱店学徒出身，捐纳贡生）、叶澄衷（读过私塾，未及半年辍学）、朱葆三（13岁即在五金店当学徒），年轻者有虞洽卿（商行学徒出身）等。这些人凭借的是其生意的头脑和买办的人脉，从而在上海工商界享有较高的声望、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清末上海的政治集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为准备酝酿阶段，时间从1895年到1900年庚子事变，在这一阶段中后来蓬勃而兴、喧闹不已的那些政治集会空间如开放私园中的张园、愚园、徐园还都基本只是纯粹的消费性场所；[注]新舞台、文明大舞台、歌舞台、共舞台等新式剧场还未曾出现；同乡会馆、同业公所虽然在四明公所案和小车抗捐时有过政治性的集会，但参与其中的士人极少且不构成重要影响。[注]但这段时间为此后政治性集会大规模发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报刊、学会、学校等“制度媒介”的大量兴起。

关于开放私园的政治集会的数量统计可以参看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载《档

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孟悦：《“世界主义”景观与双重帝国边界上的都市社会》，载《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苏绍柄：《1905年反美运动各地开会日表》，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13页。

第二阶段为民族主义运动刺激下的勃兴阶段，时间从1901年拒俄运动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此一阶段庚子事变的惨痛记忆未消，内外矛盾交迫，民族危机日趋深重，报刊中大量增加的译稿、电报、时评改变了士人想象世界各国与中国关系的方式，再加上学会、学校、新书局、阅报社等传播渠道，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与边疆“同时性”的危机。大量激进的留日学生、江南边缘士人寓居沪上为这本来就已一触即发的局势提供了催化剂和参与人员，而处于清廷管辖范围之外的租界又提供给了他们集而聚之、鼓而吹之、宣而泄之的乐土。这一切使得以各类物质性公共空间为横轴，以此起彼伏之事件为纵轴的政治性集会勃兴。从横轴看，最典型的是公共空间中的开放私园。据粗略统计，在此期间张园、愚园、徐园等各大名园参加者百人以上的较大政治性集会总数超过了30次，小规模的零星集会则更多。[注]从纵轴看，拒俄运动、拒法运动初步掀起了高潮，到1903年《苏报》案后跌入一个低谷，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集会之动力再度高涨，自俄兵砍毙周生有案始，到大闹会审公堂案，再至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达到政治集会的最高潮，已经是几乎无日、无地不有集会，而且从主要是士人来参与扩大到商、学、女等各界，仅仅1905年7、8两月间的集会就有36次之多（详见章末第121页“附表”）。[注]

第三阶段为清末新政改革下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集会的议题变得更加宽泛，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为与清末新政改革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集会，包括宣传立宪和地方自治、倡议革除陋习劣俗（如剪辫易服）、禁绝鸦片、劝戒纸烟、慈善赈灾等，这些集会为新政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也为参与新政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很多人了解新政、关注参与新政的精英就是从公共空间的集会开始的。另一条主线是上一阶段民族主义运动集会的延续，包括评论时政大事、抗议外来侵略、号召保护路矿、维护国家利权、吁求自立自强等种种集会。

第四阶段为辛亥革命发生后的被控制阶段，时间为1911年武昌起事到清朝灭亡。这一阶段时间并不长，只有三四个月，但对于上海士人的集会网络有着一个巨大转型的意义。由于清末立宪运动中具有省议院性质的谘议局的产生和涉及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慈善等各方面的地方自治的推行，我们惯称为上海地方精英和江浙立宪派精英的士人们已经是上海—江浙这一区域的实际控制者。而正源于此，他们也成了攻克江南制造局，令道台鼠窜，推动上海革命成功的关键性力量。可是除了沈缦云这样早已是“党人”的士人，还有张謇、汤寿潜、李平书等真正的实力派人物，其他士人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权力”，在集会这个层面上也是如此。张謇就在1913年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这些曾依附“革命”之士人对革命之结果的大大失望：

《张謇致孙毓筠、王铁珊函稿》，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8页。

辛亥年冬，东人观战者云，是以口舌革命；西人论政者云，是以心理革命。公论在人，不容为讳。且彼时人民之倾脂竭髓，饷军费械，奔走响应，绝不反顾者，一望政治之革新，一希兵祸之速解。所谓革新者，昔之吏贪者革而廉，兵纵者革而敛，商困者革而纾，民偷者革而奋，实业革而兴，教育革而普，司法革而平，财政革而理。及见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风云倏忽，荣悴顿殊，宫室车马子女玉帛之奉，过于昔日之王侯；剽略劫勒、叫嚣堕突之风，甚于平常之军队；司法则但闻以尊人道者纵淫盗；财政则但于供行政者竭输将；实业则有河汉其言之铁路；教育则有专事分利之法学。商以秩序未复而重困，民以法纪荡尽而逾偷。乡曲父老，本不知革命何利，而但见某党某党之种种异说，稍能看报识时务者，则皆鉴于前辙，惴惴然怀生命财产之忧，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痛苦？

这些人亟亟乎地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会中打落了那顶皇冠，却未曾料到他们所打落的那顶皇冠恰恰是提供他们权力的源头，只要不是高呼革命、“排满”、反清，那时的集会从批评政府的政策到提出自己的主张，从抨击巡抚、总督到推举理想的人选都是在允许范围内的。士人或许属于某个群体，但他的“属于”总是建立在某种自我认同之上的；士人或许会言辞激烈，有时还不免有焚物、写血书、自残等冲动行为，但那是他们士的理想化标准在鞭策他们那么做，危机意识确在那些年里愈来愈强。而上海光复后情况有所改变，很多集会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为筹饷集会是革命事业的紧迫需要，为

纪念日集会是要追述革命的历史，为追悼集会是要建立民国的英雄系谱，为各党成立而集会是为了党派的竞争和利益。

《财政大会议》，载《民立报》，1911年12月4—5日。

由此而来，筹饷集会上是台上慷慨激昂，台下如痴如狂，但半天的集会过后汉阳革命军是胜是败仍是一个谜。

张继：《回忆录》，见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5页。

沪军都督陈其美可以“为筹款计，一日集湖州富商于某会馆，闭门，非出钱不可！”

纪念日集会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映入眼帘、刻入脑海的均是五色旗与铁血史。

追悼会上真正战死沙场的上海商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符号，李燮和与他的光复军则由于革命党内部之争，其功绩更是不得彰显。不少死士如能有一条新闻、一场追悼带过已属幸运，更重要的英雄们正在那里排队等候：史坚如、陆皓东、秋瑾、徐锡麟……

各党派集会赶场甚忙，不少名流身兼数党之职，竞逐或有之，热闹或有之，但士所需要坚持的那些理想恐怕已经渐渐风吹云散了。

2．集会的发动、组织

简要分析了清末上海政治集会的四个阶段之后，要进一步了解这个集会网络，我们就必须对这些集会的发动、组织做一概要论述。某些集会具有秘密性质，比如在愚园举行的“中国国会”的两次集会，它们的发动主要依靠的是亲属、同乡、朋友等社交密网，范围小、人数少。“中国国会”的成员就有这样的特点：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15页。

国会核心成员中，汪有龄、汪立元是汪康年的同宗（一为族叔，一为族弟），叶瀚与汪康年同乡，少年时结识汪的表弟夏曾佑，又与汪为挚友，

1894年由汪推荐入张之洞幕府，1897年又与之筹开蒙学会、创办《蒙学报》。孙宝瑄也是汪的同乡，曾任《时务报》撰稿人。……赵从藩、沈士孙与唐才常关系较深。……书记丘震的父亲丘玉符与汪康年有交往，丘震因而得以结识汪康年、叶瀚等人，并参与雅集。[注]

如果是公开的集会，组织者一般都会以传单、告示、公启等方式事先发布消息，知会各界人士参加。以1901年的拒俄运动为例，3月15日张园首次会议。3月14日发起人之一汪康年所控制的《中外日报》便载有《附送传单启》说明事由。15日当天则由《中外日报》馆随报附送传单。传单言简意赅：

启者：中俄密约一节，经俄人辗转要求，倘此事果成，身恐各国争端一启，兵祸又见于东南，以后之事，不堪设想。现闻各省督抚皆不以此事为然，凡我在申各省官绅士商均极宜设法，发电各省督抚，请其力争，以助声势。拟请诸公准二十五日（3月15日）三下钟齐集张园老洋房，酌定电文，并签名字，不胜感激盼望之至。

光绪二十七年 月 日

《传单》，载《中外日报》，1901年3月15日。

上海合埠同人公启[注]

这次集会和第二次拒俄集会，传单上均题署“同人公启”字样，所谓“同人”，泛指汪康年、蒋智由、汪允中、温钦甫等人，这批人确属于一个社交网络：汪康年、蒋智由是老乡；温钦甫是广东人，但与浙籍人士关系密切，到民国时还当过外交部特派浙江交涉员；汪允中曾与包天笑同为蒯光典的幕僚，与蔡元培关系良好。这两次集会与会者言辞和情绪都比较激烈：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93页。

一些志士将俄国国旗撕裂，扔在地上蹬踏不已，继而孙宝瑄起立高呼：“中国将亡矣，诸君知之乎？中国将瓜分矣，诸君知之乎？”一时间群情激烈，泪如雨下，人们争上讲坛，一吐胸中积愤。这时，一位婀娜如花的少女出现在众人眼前，她胸前挂着景泰蓝的日本国旗……她说道：“清国现在上上下下都陷入自暴自弃中，消蚀了爱国的志气，欠缺着举国团结的精神。应该赶快醒悟，像日本、英国和美国学习！”接着，这名16岁的美少女提到了俄国的约稿：“这关系着清国的兴衰存亡，应该把李鸿章和庆亲王斩首，让

坚强的爱国志士取代他们。”据说，她是天津大沽洋行薛姓买办的爱女薛锦琴。[注]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17、325页。

不过在引文中提到的言辞最激烈的奇女子薛锦琴说的是广东官话，台下人并不能完全听懂。而孙宝瑄更是对后来《中外日报》说他为此次集会的主席感到不满，急奔报馆更正。[注]一个言语不通，一个首个发言却急于与集会撇清关系。可见这两次集会组织并不严密。不仅演说词多重复之处，而且义愤之表达居多，切实可行之办法甚少，最后达成的目标也只是发出一些电文表明集会者的态度，并呼吁官方据理力争而已，会后众人即告解散。

《中国四民总会处知启》，载《苏报》，1903年4月30日。

四民总会在成立后不久即更名为“中国国民总会”，其实际主持者为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等人。同年5月该会再改名为“国民参政会”，以陈请皇上归政相号召，邹容、吴稚晖等人表示强烈不满，并退出该会。参见《苏报》，1903年5月6日；《呜呼！国民议政会》，载《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568页；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8—130页。

而到了1903年发动第二次拒俄运动集会，组织程度因为社团的介入而有了相当的提高。4月27日，旅沪各省绅商集会后，当即决定成立“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的“四民总会”，作为拒俄运动的机关。该会成立后，即承当起拒俄运动组织者的角色，并于4月30日发起又一次大规模集会。集会后，该会又拟设立“议事厅”，“聚议一切与中国有关系之事”，[注]力图将运动引向深入，并借以全面参议国事。到后来还因为所谓保皇与革命之争从开放私园吵到报纸杂志，闹到不可开交终告解散，这倒也反证了此时组织开始严密，非此即彼的现象开始凸显。[注]

以社团论，著名的就有中国教育会、江苏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地方自治研究会、公忠演说会、文明拒约社、工界和平社、振新戒烟会等；同乡会则有四明公所、广肇公所、潮州会馆等；同业公会则有上海日报公会、商务总会、南北市烟业公所、上海布业公所、江苏铁路协会等；企业则有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学校则有震旦公学、中国公学、复旦公学等。

此后从社团、同乡会、同业公会、企业、学校，最后到国家都渐渐成为发动集会的重要力量。[注]在这些力量的支持下，集会呈现出了日趋严密的组织化趋势，这体现在“随便来听听”的人越来越少，而因特定目的来参与集会的人越来越多；集会的程序越来越统一，从时间的控制到发言的次序、内容、台下的反应乃至事后的宣传都有一套不言自明的流程，这些到了前述的第四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

3．集会的影响

关于此可参看章开沅：《论汤寿潜现象——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之一》，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清末上海的集会造就了一大批海上名士的声名和影响。诸如张元济与浙江保路，张謇、郑孝胥与预备立宪，黄炎培与江苏教育，李平书与上海地方自治，曾铸与拒美运动。此外像汤寿潜、章太炎、吴稚晖、马相伯、吴趼人等都是清末上海“集会—社团—同乡会—同业公会—企业—学校—报刊—街头巷尾”这一庞大网络中流传很广、事迹远播，甚至有些还被神化的名字。[注]之所以会有如此效果主要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开放的空间，比如张园。

参见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其中有关于张园的论述。

无论是上海市民还是路过上海的外地旅客，从地位显赫的达官贵胄到一般官僚士绅，从一掷千金的豪商巨富到普通工商业者，从资财雄厚的大资本家到工厂工人与职员，从学富五车的学者名流到青年学子，从名门闺秀到青楼妓女，乃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低贵贱，只要照单付款，都可以到张园来消遣娱乐或租用场地，园主并不过问他们的政治背景与身份地位。当然，在这里举行的各种集会与演说，若非秘密的，只要愿意，游客也都可以参与，所谓“人人可听，人人可演”。事实也确乎如此，虽然张园的集会大多系由少数有识之士或这样那样的民间社团所倡议组织，但他们不过是一发起人而已。除了极少数同人聚会之外，绝大多数政治性集会从来就不限于某一狭小的范围内，而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从参加者来看，官绅商学，各种身份，各种层次的人，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注]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第二是动人的主题。在清末上海集会中抨击政府与抗议外来侵略的集会往往听众最多，使时人产生的思想与情感共鸣也最强烈，士人所能发挥的影响也最大。此外如赈灾等集会也因能激发同情和心酸而影响不小。如1902年中国教育会集会欢迎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吴稚晖，他登台演说日本成城学校留日学生风潮，“备述颠末，慷慨激烈，淋漓尽致。述及政府腐败，丧失国权，听者皆为之愤怒；述及蔡和甫举动乖谬，出语荒唐，又令人失笑。鼓掌之声，震动屋宇”。[注]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第640页。

1907年11月9日，江苏铁路协会发起保路集会，马相伯挥泪演说，痛陈江浙人所争，非为争“路权”，实为争“人权”，与会者闻之，无不潸然泪下。[注]

《纪女医学堂学生演剧赈灾事》，载《申报》，1906年12月31日。

1906年12月底，因淮徐海各属发生水灾，家贫女子非冻馁而死，即被人掠卖他乡，张竹君在张园组织中西医学堂女生进行赈灾义演，表演“游戏、体操及种种跳舞术”。期间，马相伯应邀做演说，备述“受苦情形及吾人应尽之义务”，“激昂慷慨，闻者颇为感动，争以银券洋蚨遥掷之，闻者几为泪下”。是日到会者约有千人，捐输颇为踊跃。[注]

1911年12月2日在张园召开的“财政大会议”，《申报》在1911年12月3日即有报道，题为《黄兴之感动力》。而12月4日《申报》则在《再纪财政大会议》的报道中云：“十二日军政府在张园开大会议，已将略情登载昨报，兹又抄得议案详布于下。”其后的内容与革命党机关报《民立报》几乎一字不差，大致可推测是军政府的“统发稿”。

第三是报纸的放大。只要这个集会是公开的，各大报纸都会在本埠新闻中登载消息，而比较重要的则会有多篇报道，包括描述集会时场景的专稿一篇、与会者的演说词照录、已发出的电文全文等。而特别重要的更会配以报纸的论说、时评乃至副刊中的诗词、清谈等游戏文章，甚至在革命的非常时期还出现了政府的“统发稿”[注]。这使得只要是读报的人士也能了解每次集会的具体情况，犹如亲临会场。每次集会时各种具体细节都刊诸报端。有时集会的一些提议，需迁延时日才有下文，报纸则跟踪报道，往往会有一续、二续乃至三续。可以说，报刊为读者在没有更先进设备的时代里提供了纸质的存储设备，它对每一次集会都进行真实的记录，然后又再现出来。这实际

上使得原来只存在于集会现场的即时内容得以储存、强化，进而转变为超越时空的内容，扩大了集会的社会影响。

不过集会对士人的影响也并非完全只有促进的作用，据马叙伦回忆：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20页。

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的疾呼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像现在对民主一样。[注]

《世界名人历史画——葛苏士演说之雄伟》，见《图画日报》（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31页。

这一场景可能是当时士人参与集会如火如荼的典型一幕，但此种“蚂蚁附着盐鱼”式的“如火如荼”究竟是祸焉还是福焉尚待进一步考察。在这个集会网络中正是有了章太炎等名士的示范效应，而使得更多的士人在其间追求声名，却越来越缺乏实实在在的行动，并且态度狂悖，令人齿冷。有评论者对此就这样感叹：“呜呼，我见所谓演说者多矣，而所谓志士之演说者尤多，然坐而言者不能起而行，即能起而行矣，而一蹶不振者有之，道旁筑室者有之，不特此也，貌文明而心野蛮，面目英侠而怀抱卑鄙者且比比然。”[注]

胡适日记（1906年3月23日），见《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6页。

而胡适在其日记中也说：“郁师演说‘演说之道’，中有‘不得肆口谩骂’一段，尤为切中当今新党少年之弊。”[注]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102页。

章太炎也在其给钱玄同的信中说：“近世人多轻躁，以登坛演说为儿戏，文肆资鋬，可笑可悼！”[注]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67页。

另外，集会的开放使得并不仅有士人能够具备启蒙、形塑大众之能力，更有一批流氓宵小鱼龙混杂于其间，坑蒙拐骗，无所不为。那些较无机心却无意中被推上时代风口浪尖的士人如《苏报》馆主陈范等反受其愚弄而不自知，令人不得不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叹。像钱保仁，“本镇江流氓，积之在镇江时，曾雇为佣役，后以诳骗银钱一案，投入教会，今又在籍犯法，逃至上海，当张园演说时，满口胡言，自命为三点头目。且与积之书云：‘尔勿败我事，否则尔首领不保矣。’以是积之不敢明言。梦坡本有痰病，遂受其诈，常言某处有一金佛，可往取归，一身吃著不尽，而梦坡竟信之，欲以《苏报》交彼办理。幸仲岐窥破其诈，得以保守，然已骗去墨银三四百圆矣”。[注]

熊月之：《一百年前的假孙中山案》，载《文汇报》，2003年6月11日。

此人除了骗钱，还对陈范自称是孙中山，“秘密返国，策动革命”。陈范对他深信不疑，于是惟钱保仁之马首是瞻。这个假孙中山，曾手示一小瓶，神秘兮兮的，谓是绿气（即氯气），是秘密武器，足可抵御捕役，陈范亦深信不疑。[注]那天陈范态度从早到晚发生180度转变，就是因为听了钱保仁的指示，放手让章士钊鼓吹革命。6月1日起，《苏报》实行“大改良”，突出宣传革命，连续刊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读革命军》等文。不到一个月，便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四、

印刷与权力：清末知识分子交往的传播网络

1．清末上海的印刷媒介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清末中国的印刷媒介无论技术、数量、发行量、销售范围与持续发行时间都以上海执牛耳地位。以技术论，石印与铅印技术由传教士引进，日后不断改进，1860年代上海美华书馆改良电镀字模与排字架，使得上海成为最大的中文印刷中心，到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华建立的印刷机构达70余处，规模较大者均集中于上海。[注]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第144、213、214页。

以数量论，以报刊和书局为例。在报刊方面，据学者统计研究，1875—1894年间，上海租界发行了30种中文期刊报纸，占同时期所有中文报刊的40%；甲午战争后1896—1898年间上海新创报刊占全国新创报刊的一半；1899—1905年间，上海发行了130种中文报刊，平均每年出版20种以上；1906—1911年间214种报刊，平均每年发行35种以上。考虑到甲午战争后全国中文报刊成倍增长的基数，上海在1906—1911年间创刊的中文期刊仍能占到全国的20%以上，可谓重要之至。[注]书局方面，1899年上海石印局已有四五家，成为全国石印书籍的主要来源。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1898年广智书局创办，1902年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创办，以后更有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公司、大同书局、作新社、民权社、新中国图书社、中国图书公司、图书集成公司、有正书局、神州国光社等十余家著名书局创办，许多报馆也同时出版刊印书籍。

以发行量、销售范围与持续发行时间论，《时务报》《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等具有发行量大、销售范围广、持续发行时间长特点的报纸都在上海出版。有影响一代青年人之功的海外期刊，如《新民丛报》、各种革命期刊和留学生期刊，也多透过上海经销。各种出版机构，诸如书报局、印刷所、翻译处、出版社，也都以上海为中心，大量的新式书刊以上海为中心出版、销售乃至盗印。

Chartier, R, The Order of Books, trans. Lydia G. Cochra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比如国民需要陶铸、下层需要启蒙、迷信必须反对等一系列属于士人/精英的话语就是通过印刷媒介而在清末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十分正确的。

如此庞大的、主要为士人所操控的印刷媒介使得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所说的“印刷文字总是意在建立或加强某种秩序”[注]成为可能，士人们会运用这些印刷媒介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说明、阐释乃至神化国内事务、国际局势和国族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他们重新建构了自我的形象、彼此的认同和与官方、大众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印刷媒介赋予这一切以正确性、合法性乃至神圣性。[注]可以说印刷媒介改变了士人们获得权力的方式和运作权力的环境，更进一步说，当士人们开始与大规模信息传播的网络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时，一种无须真正谋面，只需借助印刷媒介的交往就已产生。下面笔者将先大致描绘上海—内地、上海—海外这两个传播网络的概况和特点，然后以梁启超这一晚清言论界之巨子为个案剖析在印刷媒介中士人的交往。

2．上海的传播网络

清末上海的传播网络大致可区分为上海—内地、上海—海外这两个网络，笔者愿将上海—内地这一网络称为辐射的网络。所谓“辐射”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对于内地而言，上海毫无疑问处于这一网络的中心，从中心对边缘的意义而言，以辐射来命名比较合适。其二为上海这一中心地位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数十年的历程，辐射的力量、效果、范围渐渐由弱至强、由浅至深、由近及远。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06页。

一般来说上海的印刷媒介最初发挥其影响，辐射到内地是因为战争。1884—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申报》派遣访员到战地直接采访，发行号外，电报往来传递消息并创办《点石斋画报》，以吴友如之画宝为读者奉上战场之“即景”。此时身在苏州，年约八九岁的包天笑就曾深深地被这些报道所吸引，一见《申报》来了，总要请其父给他和其他孩子讲许多战争新闻与故事，听南方前线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的传闻，法国大将孤拔阵亡、夺回台湾鸡笼山的消息。[注]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

1894—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申报》及其竞争对手《新闻报》《字林沪报》等都以战争报道为卖点来争夺市场。据姚公鹤回忆：“甲午之后，为吾国社会知有报纸之始，然乙未台湾之役，适当《新闻报》创办之第三年，夜壶阵、大纸炮之战事新闻，络绎不绝于纸，而社会之信用乃以此大增。”[注]

有人就说："光购阅《申报》十四年，近年笔墨日下，然较之《新闻报》捕风捉影，又觉稍胜。"《洪国光致汪康年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77页。

《点石斋画报》也非常荒诞不经。参见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台湾一方出版社，2002年，第142—190页。

从姚氏和其他相关人等的回忆不难看出《新闻报》的报道过于"捕风捉影"，[注]但"捕风捉影"也不独《新闻报》一家，各家均有夸张失实之处，区别在于程度高低而已。[注]各大报刊的最终目的都是商业利益，只要能吸引读者关心最新战况，激发起他们的国仇家恨，每天买报阅读并树立起本报的口碑即可。

阿英：《甲午中日战争书录》，转引自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第99页。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1—632页。

除了报纸这一渠道外，甲午战争时上海的铅印、石印技术已很发达，更有许多书籍详载战情局势，在战争期间就已开始大行销售。1894年石印的《绘图扫荡倭寇纪要》刊行，全书排日记事，采录报章新闻与关于战争的言论，更配以插图。1895年，有思恢复生编石印的《中倭战守始末记》，采录报章新闻、翻译、论著等编成；香港书局石印本《谏止中东和议奏疏》辑录反对和议奏疏；《中东和谈问答节略》和《与伊藤奥陆往来照会》则详细记载李鸿章和谈经过，甚至还披露了马关五次会谈的对话内容；申报馆的铅印巾箱本《中东和约》整理出制订的条规和通商章程；铅字巾箱本《时事新编》除了收录中东战事各种资料与论著以外，更收有小说。[注] 1897年《申报》属下之图书集成书局出版，林乐知编译、蔡尔康笔述的《中东战纪本末》也大为畅销，李鸿章和孙家鼐对此书大为赞赏，更有浙江地方官府中的官员读之而极受震动。[注]

战争为报刊和书籍带来销路和口碑，同时也将原来只属于皇帝、官员处理的事务带领到了芸芸众生面前，使之成为人们谈论关注的焦点，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感受到国事、天下事会离自己如此之近，战争这一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通过印刷媒介与其阅读者建立了连接。不过这一网络对士人的交往方式产生真正影响还是要到《时务报》时期。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66—79页。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3页。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0—181页。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见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6—333页。

《时务报》创刊后，即通过借助官方力量、运用私人关系推广，结合各地新组织、广设派报处等方式拓宽其发行销售网，[注]发行量日渐攀升，创刊之初，每期销售4000份左右，半年后增加到7000份，一年后激增至12000份，最多时达到17000份，创当时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注]。据估算，该报的直接读者约有20万人，间接受众则不下100万人。[注]在如此庞大的一个读者基数之下，“各地官绅之以开辟风气，有益公众之事相托者，书札往还，盖时时有之”。[注]

他们托付《时务报》馆所做之事范围甚广，如代购书报、图器，代聘西文教习，代购印刷机器，招募排字印刷工人等。对这些托请，汪康年等《时务报》人群体一般多尽力而为。通过许许多多琐碎但却影响弥远的互动，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以《时务报》这样的印刷媒介为中心的交往网络。

《苏报》头版，1903年5月6日。

《来函述江西报界发达之现状》，载《苏报》，1903年5月30日。据该文提供的报刊销行量统计，《苏报》的日销量虽无法与《中外日报》（280份）、《新民丛报》（250份）相比，但已远远超过《译书汇编》（120份）、《浙江潮》（80份）、《游学译编》（50份）、《湖北学生界》（30份）等报刊。

1901年之后，政治性意见——尤其是激烈的异己性政治意见——开始通过印刷媒介由上海向内地辐射。如1903年，除上海本埠外，数年前尚名不见经传的小报纸——《苏报》已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昌、汉口、寿州、安庆、芜湖、大通、江西（南昌）、福州、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城、宁波、苏州、松江、无锡、常熟、周浦以及日本横滨等地设立23个“分售处”，共32个代销点。[注]仅江西南昌一个分销处的两个代销点，日销行量就达200份，比前一年增加了四分之三。[注]据时人观察，当时《苏报》的经营策略是“专注意于学界，其价值亦与各学报并立，销数亦与之俱增”。这样的策略使得其发表的激烈的异己性政治意见有了一个易于接受和呼应的平台。清末最激进化的学生、革命党群体由《苏报》的传播网络而形成了相当程度上的交往。

当然有时查禁也会有反效果出现，“《湖北学生界》出版后，内地人士目为后生小子之作，阅者甚少，张宫保忽电告学生总督严禁其出版，四方阅之者乃大警惊异，飞函定阅不下数十，现首册已再版矣，各处办报者安得各有一张宫保为之介绍推广乎？”（《苏报》，1903年2月28日）此虽有广告之嫌，但以人之“雪夜闭门读禁书”之心理常势而言亦有可信之处。

如果说上海、周边与内地这一传播网络更多体现出一种辐射效应的话，那么上海与海外这一传播网络中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勾连的效应。所谓的“勾连”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勾连”一词意味着海外的印刷媒介与上海的印刷媒介之间有着相对密切的联系互动，你来我往的渠道多样而隐蔽；其次勾连亦有松散之意味，表示即使来往的渠道多样而隐蔽，由于官方的控制和查禁，有时也会比较脆弱和危险。注

参见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总第45期。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83页。

从第一层含义来看，自清末留日学潮起后，各种留学生在海外所办的报刊、书籍就开始大量流入国内，而一个最重要的流入地即上海。从印刷、出版渠道来分析，在上海如文明印书局、广智书局、明权社、金粟斋等都会印刷、出版大量留学生所翻译的书。这样的书特别是日文书的翻译，其质量很多时候并不让人非常满意，很多是急就粗糙之作，但却为当时的士人、学生，各类粗通文墨之人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资源。注而且在书局、出版社以外，许多卖其他货物之处亦会兼售海外流入的书籍，像鲁迅、周作人兄弟编了两集《域外小说集》，印书的费用是朋友代垫的，出书后也放在朋友在上海的广兴隆绸缎庄代售，原计划“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结果，第一集（印1000册）卖了半年，总算卖掉20册。印第二集时，数量减少，只印500本，但最后也只卖掉20册，就此告终。于是第三集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寄售处不幸着了火，书和纸版都连同化成灰烬。注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第181页。

从发行、销售渠道来分析，海外与上海传播网络的勾连方式则更多种多样，有书局、出版社代为发行、销售的，如《浙江潮》就是由浙籍的同乡汪康年所办的上海《中外日报》总发行；《游学译编》的总派报处曾设在《苏报》馆；东京《新白话报》社编辑的《新白话报》由上海普益书局总发行。注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5年，第200页。

有留学生往返国内、在海外行李中私自夹带的，如有留学生将《民报》装箱，假称作《法政汇编》，还托满族学生带回国，以免令人生疑。也有把封面撕去，换以《心理学讲义》邮寄回国的。注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第181—182页。

有在报刊上做禁书广告乃至书评的，例如在《游学译编》上有《新湖南》《猛回头》与《仁学》的广告；在《警钟日报》上有《自由血》的消息；《俄事警闻》的头版会登载许多书籍的出版讯息，像《攘书》《黄帝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都有，还有不少禁书的信息夹杂在《万国通史》，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所印大量教科书的广告之间。注

有“野鸡大王”之称的徐敬吾则在张园、四马路青莲阁、奇芳茶馆、四海升平楼等各个上海人多热闹处兜售禁书、禁刊，据当时在南洋公学读书的蒋梦麟回忆，在学生们都很爱去聚会谈天的福州路“奇芳”茶馆里，徐氏常在那里出没兜售新书：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68页。

他那副样子，去过“奇芳”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头帽。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吴稚晖先生说，他知道他是谁，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却忘记了。我们也不晓得他住在什么地方。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注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页。

除了《性学新论》这样吸引读者的书，有哪些革命书刊呢？专写革命逸史的冯自由提供了答案，大致有《革命军》《黄帝魂》《孙逸仙》《驳康有为政见书》《沈荩》《自由血》《女界钟》《俄罗斯大风潮》《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二十世纪大舞台》《孔孟心肝》《三十三年落花梦》《苏报案记事》等不下百数十种。徐氏庄谐并行的生意、引人注目的外形和种种显得奇特的行为，比如时常会跳上张园的台子大讲一番革命，因此被章太炎戏称为《水浒》中的鼓上蚤时迁。注

从第二层含义看，由于清末留日学生的政治倾向日趋激进化，加上慈禧忌惮的康、梁与更令他们担忧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均在日本如鱼得水，不少时候清廷都将海外—上海的传播网络视作洪水猛兽。因此勾连是比较脆弱和危险的。对各种与清廷统治相悖谬的书刊，他们会有相当严厉的查禁，比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就有《军机大臣致各督抚函》云：

《军机大臣致各督抚函》，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转引自付美英、方裕谨：《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对革命书刊的封禁》，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书。如《支那革命运动》、《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并吞中国策》、《中国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野蛮之精神》、《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瓜分惨祸》、《预言新民丛报》、《热血谭荡虏丛书》、《浏阳二杰论》、《新小说支那化成论》、《广长舌》、《最近之满洲》、《新中国支那活历史》等，种种名目，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扰害。此固中法所弗容，抑亦各国公律所不许者，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行查禁。但使内地无销售之路，士林无购阅之人，此等狂言，不难日就澌灭。想阁下关怀世教，必能妥筹办理也。[注]

除了对各省大员有所知会，亦会联合国外政府共同压制书刊在这一网络中的传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外务部庶务司致日本公使照会中就说：

《外务部庶务司拟致日本驻使公使照会稿》，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转引自付美英、方裕谨：《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对革命书刊的封禁》。

本部复加检阅此项杂志（《民报》等），均系本国乱党在贵国境内出版发行之件，其中倡导革命措语狂悖者，不胜枚举。若听其展转流播，煽惑人心，实于本国治安大有妨害。贵国政府与本国夙敦友谊，休戚相关。此等悖逆书报，不独本国臣民见之发指，即贵国政府亦必深恶痛绝，具有同情。查贵国新闻纸条例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等条，凡记载论说，有冒渎皇室尊严，变坏政体，紊乱朝宪，及坏乱社会秩序风俗者，均分别轻重，处以刑罚。又出版法第二十六条，凡将变坏政体、紊乱国宪之文书、图画出版者，处二月以下二年以上之禁锢，并附加罚金等语。此项杂志专以革命煽乱为主义，按诸贵国法规，亦同在应行处罚之列。除饬本国各地方官随时严禁递送售卖外，拟请贵代理大臣转达贵国政府，将另单开列之各项杂志，严禁印刷递送，并请嗣后遇有类似此项杂志之各种书报，一体禁止出版，以维秩序而保治安。相应将该报等题号及印刷所等名目、地址，开单照会贵代理大臣查照办理，并希见复可也。[注]

至严厉时甚至连从海外寄到国内的邮件亦不能放过：

《督理税务大臣致外务部咨文》，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转引自付美英、方裕谨：《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对革命书刊的封禁》。

本日钦奉谕旨：近闻有海外逆党，乘国家多难之际，妄思煽乱，肆意捏造谣言。其诬罔狂悖，直有使君臣上下所不忍闻者。复敢刊印函单，分致京外各衙署、局、所、学堂，淆乱是非，多方簧鼓，居心尤属险恶。著邮传部迅电各处邮政局，认真拣查。遇有自外洋寄来汉文函件，字迹封式在五件以上，分致上项各处者，立即拆阅。倘语涉悖诞，即刻一律焚毁。其各埠外国邮信局、社，亦由该处地方官婉

商仿行，共保治安。并著民政部、步军统领、顺天府暨各督抚，随时派员认真查访，严禁传送悖逆各函件，勿得稍涉疏漏致扰大局。此旨，由邮传部寄电各省埠一体钦遵。……据称，此等悖诞函件，如由外洋寄来者，必系经过沿海数口，即如牛庄、天津、烟台、上海、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等处，是以电饬各该口邮政局，迂有寄来前项函件，立即扣交地方官拆阅；一面帮同地方官与外国邮信局、社会商仿行。惟拆阅函件，甚背联邮章程，恐在华客局不肯允办，应转请商由驻京各国钦差协助等语。[注]

3．印刷媒介中的交往：以梁启超为例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15页。

梁启超为清末言论界的巨子，所谓“言论界巨子”若进行分梳，最显而易见的是指他能文的一面：“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注]

但比较不彰显的是其一生之交游其实赖“言论”之力甚多，而其中之重头就是印刷媒介之功。1898年前他在万木草堂求学，在上海办报，交游网络的基础就此打下，并且此时他已经凭借印刷媒介拓展其交往范围：

李肖聃：《星庐笔记·梁启超》，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41页。

春官报罢，设《时务报》于上海，而梁为主撰述。作《变法通议》数十万言，其文出入魏晋，工丽大类范蔚宗，亦效龚自珍为幼眇自喜之词，旁出陈同甫、叶水心、马贵与诸人之风，指陈世要，一归平世，间杂激宕之词，老师宿儒，新学小生，交口称之。岳麓院长王祭酒先谦，令诸生购阅此报，称为忧时君子发愤而作也。[注]

自1898年始，直到1911年梁启超一直漂泊在外，他所能发挥大影响的时代，其与国内士人交往的渠道除了书信、电报外就是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了：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63页。

戊戌政变，康梁并出走，朝廷降悬赏名捕之谕，几于通国人民皆闻其名，莫不震动而注视焉。然康自是匿迹销声，蜷伏海外；梁则栖身东岛，高树一帜，日积其怨气热肠，化为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无论其所言为精为粗，为正为偏，而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非奇人而何？[注]

孙宝瑄敏锐地观察到了媒介传播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这提醒我们梁氏在媒介中的交往对不同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主要可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即孙宝瑄这种故交型。梁启超当年在上海时，其交往网络先自《时务报》出发，有汪康年、黄遵宪等。后在馆务之暇，跟随住处近在咫尺的马良、马建忠兄弟学习拉丁文。除了上述人等，梁氏最频繁交往的还有谭嗣同、宋恕、吴嘉瑞、胡惟贤，而这段亲密交游的岁月能够被记录下来则应归功于孙宝瑄。后来两人一在日本、一在上海，面对面的交往已经谈不上，但通过梁氏的报纸、杂志、书籍和孙氏内容丰富的日记，两人在纸上的“交往”并无减少。当孙氏读到梁启超所写李鸿章传记时，既对其长处充分肯定，也对其能言而不尽言之处给予了同情的理解：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480页。

饮冰室主人为李文忠撰一书，名曰《李鸿章》，又称《中国四十年大事记》，盖于文忠一生事迹，备载而加以论断，有褒有贬。其褒也，郑重其词；其贬也，则游移其词。吾逆知著者盖深服文忠之为人，其于文忠生平办事不得已之苦衷，皆洞若观火。然于书中，仍不免委曲其词，而不敢直言者，深以目前海内人之脑筋不易感动，必如是立论，庶几文忠之冤，可以少雪耶！[注]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492页。

孙氏也常读梁启超主编的报纸：“梁卓如改《清议报》为《新民丛报》，议论较前尤持平，盖年来学识之进步也。其《新民说》谓：国家之日就衰弱，由民德民智民力之未充，不得专责一二君相。可称至言。”[注]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496页。

梁任父《清议报》所登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议论精辟，如我心中所欲言，足征其学识之进。其结论云：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皆名言也。[注]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55页。

有时孙氏对梁启超的意见会大加赞许：“梁任公曰：我国自古号称英雄，震耀千古者，皆一姓之家奴走狗也。然哉，然哉！”[注]而有时亦会在其日记中与其“虚拟”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

观任公《中国魂》。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54—555页。

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我人民素罕知地球之上，更有他洲他国，如此之多，自谓天之下，惟有我所居一统之世界，外此皆蛮夷耳，故自称曰天下。与古罗马盛时，其国民之心事正同。本无所谓国，何必立名？今忽知天下非仅我一种人民，其他种人民在海外各分疆域，各异其国名者，不可胜计，且皆文明富盛，非蛮夷者比，而我人民于是不得不别成为一国矣。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如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注]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59—560页。

任父以为大地上物力，全为小数之大资本家所占，而其馀多数尽驱而入劳力者一途，此未来之黑暗世界也。余谓不然，尝读《原富》，所论佣钱赢利厚薄之关系，而劳力者与坐拥资本者孰为可贵，吾必取劳力者矣。盖凡资本家，往往不费脑思，不用筋力，优游坐享，与游民无异。游民者，最无益于其群者也。无益于群，而食群之利，使其人占多数，必为群蠹，而世界退化；今能自趋于少，盖莫大之幸福也。资本家日少，则劳力者日多，于是地球上几于人人以己之心与力自养，而更无坐食之闲民，此正进化之机，何得曰未来之黑暗？[注]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61页。

梁卓如论今日，不但新其学术，新其政治而已，尤必新其道德。以为我国古圣鸿儒所提倡者，详于私德，略于公德；惟无公德，故不能合群，此今日之最阙点也。忘山居士曰：孔孟教人，实兼公德、私德无偏重，如仁义二字：仁，公德也；义，私德也。忠孝二字：孝，私德也；忠，公德也。（报人之恩曰孝，尽己之心曰忠，余论之于前矣。）自儒学为法家所乱，历朝君相恃其术以行专制，以保一家，而天下学者亦遂迷瞀暗惑，认贼作子，不知儒术之真，误视公德为私德。即有稍知明公理者，以迫胁于专制政体下，不能行其志，盖比比也。今任父欲昌明公德，以求合群进化之的，其识甚高，其心良苦，余心许之矣。[注]

最后故交总是最能互相了解，观孙氏下面一段对梁启超的评论，二人之相知跃然纸上：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709页。

梁任公，新党之领袖也，其人为顽固否乎？曰：任公非顽固者，但处众顽固之中，又欲藉笔舌以自存，不肯直作不顽固之语，然其心曷尝不知变法之程度太早也，革命之无成也，破坏之无益也。顾直言之，则使人心灰意消，且不免众顽固之讥诽，是以毅然作《新中国未来记》。然于黄、季二人辩驳之中有微意焉，其论今日之时势，正如燃犀照怪，无微不见，且说得虚空粉碎，而中国之必亡，黄种之必灭，虽有拿破仑、俾士麦、格郎宓、华盛顿复生于中国，亦不能救其万一，何况今日之政府与现今之志士耶？故《新中国未来记》者，乌托邦之别名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断无此事也。其书所出，不过五六回，方在黄、李自西伯利亚回国之时，吾不知其此后若何下笔也。吾恐其从此阁笔矣。何也？凡撰书，如演剧然，必密合于情理，然后读之有味。演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盖今日时势为未来时势之母也。然是母之断不能生是子，梁任公知之矣，而何能强其生乎？其生则出乎情理之外矣。是书何必作乎？何也？子可伪也，母不可伪也。梁任公，天资踔绝者也，岂肯为无情无理之著作乎？故吾料是书之必不成也。或曰：然则任公何必强下笔乎？曰：任公，新党中最狡狯者也。彼岂不知是书之难成乎？然不得不以是媚诸新顽固者，而又恐被有识者之讪笑，故其书处处自为矛盾，且笔墨闪烁，使人不测。观所撰《李鸿章》一书可知矣。[注]

第二种是亦对手亦友型，以严复为例。他在《时务报》时期就已与梁启超相熟，两人虽同为激荡晚清思想趋势的弄潮儿，但严复的思想若以“后见之明”看实比梁启超深刻得多，关于此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史华慈在其论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已有明示，因此比梁启超更懂西学的严复极不喜欢梁启超的西学，他说：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33页。

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法哲韦陀虎哥有言：“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任公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注]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45页。
孙应祥：《严复年谱》，第174页。

但因时势和文笔的缘故，二人的声名有着相当的落差，严复说：“（梁启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注]此虽为批评之

语，但也不难看出严复很清楚梁启超的影响力在他之上。这就造成了两人在传播网络中的“交往”既有相知相惜之一面，但亦有互不认同之一面。比较明显的就在一次关于为文之道的讨论上，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撰文，推荐严复所译《原富》首二册，称赞：“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笔锋一转后指出：“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注]

“每次见《清议报》，令人意恶。梁卓如于已破之甑，尚复哓哓，真成无益。”见《严复集》（第3册），第533页。

孙应祥：《严复年谱》，第175—176页。

孙应祥：《严复年谱》，第181页。

严复对《清议报》不以为然，[注]但对《新民丛报》印象还不错，读完梁氏对其为文的批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言；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注]除了在私信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严复也给《新民丛报》寄去了答辩书，而梁启超则在第七期刊载了这篇名为《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注]可见二人虽非挚友，但却不乏最后一代士大夫应有的气度。

像周作人从同学处借得《新民丛报》第11号，阅后甚为兴奋，在日记中记：“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第二天便抄《饮冰室诗话》《尺牍》，摘录《新罗马传奇》《新民说》等，又致信胡韵仙，托买《饮冰自由书》《中国魂》二书。过几天又借来《饮冰自由书》，连夜阅读了半本，称赞其“美不胜收”。第二天阅毕。又借来《新民报》二册。阅读梁启超的《中国魂》，则认为其“其中美不胜收，令人气壮”。连日阅读鲁迅捎来的《清议报》，则以为其“材料丰富，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第46、47、52页。

第三种是乐读崇拜型。由于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整整影响了一代中国少年（也不乏非少年），所以属于此种类型的人物举不胜举，回忆的文字也汗牛充栋。周作人、梁漱溟、恽毓鼎等老名士、新学者、大作家都在其列。[注]下面就以在上海曾日日阅读梁启超文字的胡适于1912年在美国留学时听闻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绕天津三匝终于归国后写下的日记为注脚，简单地体味一下这一类型人物与梁氏在传播网络中“交往”的心路历程：

胡适日记（1912年11月10日），见《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220页。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注]

上文初步证明了私谊、会社、集会和传播等四种交往网络是士人在清末生存、发展赖以凭借的重要根基，但这一根基中有些东西比如私谊网络对传统王朝时代的士人而言，其实也是重要的，所不同的是在清末这个“转型时代”，城乡不同的空间中这一根基所能使士人获得的权力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895年前的士人，不管其居城还是居乡，那些士人尤其是上层士人的“霸权”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其触角可以延伸到包括公共工程、慈善事业、教育建设、科考名额分配、文化活动展示等各个方面。而这些触角的底部就是姻亲、同年、师友、邻居等各种网络的联结。但1895年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地方军事力量兴起，使得所谓“强人”主导地方的趋向出现。这些人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多有功名，但依靠军功、武力起家的背景导致了以展示“文化活动”、炫耀文化技能来建构霸权的方式渐渐式微，公共工程也多开始由另一群被认为“缺少文化”的人物把持。到1895年后，这一趋向的一个结果就是咨议局议员和地方自治议员、职员的“劣评如潮”，自治推行中引发大小风潮不断。而近代中国沿海和内地“土洋”两个世界的形成，八股改策论、废科举、学堂兴起等众多因素，使得士人在慈善事业、教育建设、科举名额等方面的“霸权”地位也都不再能够继承而再生产出来。像钱穆就感叹：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1页。

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乃清末一辈自居为遗老者，率皆蛰居上海天津租界中作寓公，不问世事。其实军阀割据，拥兵自强，倘有地方贤达告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兴学校办实业，亦未尝无人肯听从其言者，乃惜乎亦默不一闻。可知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注]

参见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见氏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

“病”究竟在何处，可能不仅仅在高级知识分子身上，但钱穆所论的确道出了民初“地方”与知识分子渐行渐远的现实，此暂且可搁置不论。当上帝关上了门的

同时，一定也会在某处开一扇窗。依托于上海等新兴城市，报纸、杂志、学会、学校等新制度媒介正在兴起，开放私园、街道、会馆、戏院等公共空间的功能则在转化，这就为士人开辟了多片获得“权力”的全新天地。因此身处“转型时代”的士人如果未入城（尤其是那些清末新兴起的城市），也不在城市周边地区，那么他的交往网络所能发挥的功能将日趋缩减。而如果反之，他们则能大展身手。当上海等新兴城市成为士人聚集的中心，而某些省城、大城等成为次中心，而有些拥有昔日繁华的城市急剧没落，沦为边缘后，这种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没落城市—乡村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正是推动士人转型的重要因素。也正是民国后形成一个“断裂社会”的重要动因。[注]

瞿 骏

附表：1905年7—8月间上海的各类集会

时　间	地　　点
7月9日	上海女界借榕庐集会
7月12日	上海蜀商公所集会
7月16日	上海沪学会借文明小学堂集会
7月19日	上海沪学会及学、商、工界并各埠派来代表借务本女塾集会
7月20日	上海商务总会大决议，商学会集会
7月21日	上海四明同乡会借商学会集会
7月22日	上海志成堂汉货帮集会
7月23日	上海颂有堂麻袋业，各报关行借公舆总会集会
7月24日	上海萃秀堂豆米业集会
7月25日	上海广肇公所广帮洋货业集会
7月26日	上海建汀会馆集议、点春堂集会，四明同乡会第二次集会，文明拒约社借徐园集会
7月27日	上海广肇医院集会，煤油洋杂货公所集会，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借商学会男学堂集会，浦东陆家行、张家桥两镇士商集会，吴淞士商借财神庙集会
7月28日	上海报关行工人借洋裕公行集会，蜀商公所集会
7月29日	上海文明拒约社第三次集会，闵行镇务敏学堂集会
7月30日	上海潮州会馆集会，四明同乡会借萃秀堂集会，衣庄公所、花业公所、内河报关行借徐园集会，吴淞镇洋货业借救生局集会
8月1日	上海四明公所集会，江湾崇善堂集会
8月2日	上海通崇海花纱布业集会

▼（续表）

时　间	地　　点
8月3日	上海书业借文明小学堂集议，纱业商会集会
8月5日	上海商学会集会，蜀商公所集会，信局公所集会
8月6日	上海沪学会借务本女塾集会，鲁班殿集会，文明拒约社借纱业商会集会
8月7日	上海参业公所集会
8月9日	上海南北市烟业公所集会，南北市木作借燕游别墅集会，南洋杂货业借源昌镇号集会
8月10日	上海徐园公忠演说会十二楼开演说会
8月12日	上海布业公所集会
8月13日	上海泉漳会馆第二次集会，鲁班殿集会，煤炭公所集会，海昌公所集会，钟表洋广货业集会，广善堂嘉埔士商集会
8月15日	上海四明同乡会借徐园集会
8月16日	上海木业公所集会，水果公所集会，银炉公所集会
8月20日	上海江宁公所集会
8月21日	上海南市药业公所集会
8月22日	上海徽宁会馆集会
8月23日	上海水陆旱烟业借西菸公所集会
8月27日	上海天足会女学堂第二次集会
8月28日	上海纸业公所集会
8月29日	上海江宁公所集会
8月30日	上海豫园凝晖阁鞋业公所集会
8月31日	上海徐园公忠演说会开演说会

第三章

岂有文章惊天下：五四时期京沪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

五四是激动人心的启蒙时代，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近代中国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同时它也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导致“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分子首先在社会学意义上开始逐步走向“边缘化”，成为一个“自由漂浮”的社会阶层；那么，吊诡的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以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又是怎样走向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从思想史角度来关注这一问题，侧重于观念的力量，而本章则尝试从社会史的层面出发，探讨启蒙知识分子是怎样凭借学院、社团、报刊乃至公园、街头、广场等公共空间建构和拓展人际网络，介入和营造公共生活，成为启蒙大众、改造社会的集团力量，震撼一个时代的；当他们以群体的形态出现时，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交往网络又如何建构起来，形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浩大局面；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共同体内部与外部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复杂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是怎样影响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通过对知识分子交往关系的重建，本章将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在这个颇为特殊的大时代，五四知识分子罕见的力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关涉着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变局，同时知识分子自身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本章重点选择北京的《新青年》知识群体和上海的《改造》派知识群体进行分析。这两个群体各具特色，在五四时期均相当活跃，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影响。其中，《新青年》知识群体作为崛起的新一代启蒙者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原先与政府关系密切、屡遭物议的《改造》派知识群体，则改弦易辙，运用深厚的社会文化资源，以新的姿态，介入启蒙运动，在五四时期影响广泛。这两大知识群体之间既有相互亲和、呼应、合作的一面，也有相互猜疑、论争、排拒的一面，前者营造出五四空前强大的文化权势，后者预示着五四知识群体的分化和重组。为了更清楚地界定这些知识群体的作用，需要将这两大群体的交往活动置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网络中进行考察，看看它们与这两者的离合关系。此外，由于这些知识分子都寄身于近代都市，因而，从空间角度着眼，不同的都市（本文主要涉及的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风格迥异的近代都市，前者是政治中心地，后者是社会中心地）对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无疑会有着不同的影响，吸引着不同的知识群体，同时，不同的知识群体也会选择适合于他们生存和发挥言说能力的都市空间。

一、

本章所说的《新青年》杂志是指从1915年9月创刊至1922年7月1日休刊的《新青年》月刊，共出9卷54期。大体上，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第1—2卷在上海编辑为早期；第3—7卷主要在北大编辑为中期；第8—9卷重返上海，逐渐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知识群体亦风吹云散为晚期。至于1923年在广州创刊的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则完全是另一份刊物了，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有关《新青年》杂志和群体的研究，参见李宪瑜：《〈新青年〉杂志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2003年第3期；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不过上述研究主要是从文学史角度进行的考察。

从上海到北京：《新青年》㊟知识群体与北京大学

1．陈独秀与《新青年》的作者们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自日本归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实践其改变全国思想的宏愿。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力量，《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形成肇端于此，正是以这份同人刊物为中心逐渐聚集起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气象的知识精英。

关于刊物的创办情形，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有一段生动的回忆。他谈到民国初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亡命到上海：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1—32页。

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

参见沈寂：《汪孟邹与陈独秀》，见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9年。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

陈氏兄弟是湖南人，作为书业同行与汪孟邹“过从甚密，情谊极深”，故而1915年7月5日，陈子寿来亚东答应了此事。汪孟邹（1877—1953年）和陈独秀同为安徽人，1902年，陈独秀留日中途回国，由在南京陆师学堂的同乡葛温仲介绍，认识同在该学堂读书的汪希颜（1873—1902年）、章士钊、赵声等人，陈独秀因结交汪希颜而与其弟汪孟邹相识，此后二人交谊渐深。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汪孟邹主持的芜湖科学图书社负责出版发行，而汪1913年在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则得益于陈独秀的建议和推动。[注]不巧的是，当陈独秀办《青年》杂志时，恰逢亚东生意不佳，加以同时又印行了《甲寅》杂志，经济上极为困窘，故转而由群益书社承办。不过，老友归老友，其实汪孟邹并不怎么看好《青年》的销路，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汪孟邹对陈氏兄弟痛快答应，都感到有点意外。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在晚年的回忆中也说，假如当初陈氏兄弟不接受，陈独秀的杂志绝不可能在1915年9月15日问世。[注]

袁世凯通过制定《报纸条例》（1914年4月订立，1915年7月修改）和《出版法》（1914年12月5日）压制报刊出版业的言论自由，《出版法》“第十一条所列各款，与报纸最有关系，动辄得咎，非常危险”，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5、6章；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25—333页。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月刊，共出十期，第5期（1915年5月10日）后移沪印行。因第9期刊发章士钊批评袁世凯的《帝政驳议》，遂遭袁政府封禁，出至第10期后停刊，时在1915年10月10日。

1914年6月，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东京的章士钊信中忧虑国事，亦为一己生计发愁：“……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政治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无见。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甲寅》杂志之命运，不知将来何如也？……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页）同年7月，章士钊即邀陈独秀往日本协助他办《甲寅》杂志，1915年6月，陈独秀偕易白沙自日返沪，住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与其妻高君曼，子延年、乔年、松年和女玉莹聚居。当时高君曼患有重病，延年、乔年白天打工，谋生活自给。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页；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33页。

从世俗角度看，陈独秀选择这个时候办一份新杂志，似乎也有些“不合时宜”。且不说当时在袁世凯的高压统治下，舆论环境相当恶劣，甚难放言高论，快意恩仇，[注]即就个人生计而言，每月200元的编稿费虽可缓解几近一贫如洗且携妻

带儿的陈独秀经济上的窘迫，但在上海这么一个光怪陆离的西化城市，传播启蒙理念，倡言伦理觉悟，若和者盖寡，则养家糊口仍会成问题。[注]

出人意料的是，短短三四年间，《新青年》竟一纸风行，迅速成为左右国人思想的言论重镇，陈独秀本人也一跃而为声盖士林的意见领袖。1923年，距《青年》创刊不过八年，胡适在给友朋的信中就铁口直断：

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1923年10月9日），见《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和《甲寅》还算不上。[注]

参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湾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新民丛报》在海内外销售点共达97处，其热销程度比之《时务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第286—304页。

当年的《时务报》之所以能畅行大江南北，除了梁任公富有魔力的健笔，大半凭借政治力量和官方渠道，[注]而《新民丛报》则是任公栖身海外，借助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积聚起来的巨大声望，并利用日本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整合各种思想资源，通过留学生的传播，在国内思想界呼风唤雨。[注]但在世乱纷纭的民初社会，似无凭借的《新青年》又是如何在数年间脱颖而出，风行天下，撼动一个时代的呢？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因缘？

先来看看作为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的陈独秀，无疑，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灵魂人物，尤其当该杂志最初在上海编辑之时。陈独秀个性强悍，为人狂放不羁，其勇猛精进的行事风格十分适合于开创革新大业。就个人经历而言，在办《新青年》之前，陈独秀已是皖省颇有名气的革命志士。在清末民初的革命风潮中，怀有冲天之志的陈独秀往来奔波于安庆、芜湖、南京、日本东京、上海、杭州等地，从事反清倒袁的政治活动，备历艰辛。这些活动包括组织革命团体以广结同志，倾心地方教育以养育人才，编辑革命报刊做万户鼓吹，如此等等，陈独秀皆全力以赴，生死以之，其人际交往的圈子也借此形成。不同于那个时代的武夫型革命者，陈独秀尚有风流自赏的文人兼思想家的一面，因而，在革命生涯中较多地表现出思想言论上的敏捷才思和文化教育上的鼓动才能，与他结交的友朋也大率类此。

一说1911年12月，陈独秀曾与韩衍、孙养癯、杨尘因等人在安徽怀宁驿口创办《安徽船报》，任总编辑。但此事因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甚难采信。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53页，注4。

该报社址在上海新闸路新马路梅福里，据章士钊回忆，该报是他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第51页。

该报编辑部设在芜湖科学图书社楼上，并由该社负责发行，参与其事的有房秩五、吴汝澄、汪孟邹等，印刷则由章士钊设于上海的东大陆图书印刷局承担。沈寂：《安徽俗话报》，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3—168页；丁苗苗：《〈安徽俗话报〉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甲寅》杂志通常被认为是《新民丛报》之后，《新青年》之前最重要的政论刊物。关于《甲寅》杂志和《新青年》之间在人事谱系、栏目设计、内容等方面的传承关系，已有不少研究，参见［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闵锐武：《〈甲寅〉杂志与〈青年〉杂志的渊源关系》，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庄森：《〈青年〉杂志相承〈甲寅〉论》，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不过，陈独秀当时的思想与《甲寅》杂志旨趣之间的不同亦绝不可忽视，参见郑超麟遗稿《陈独秀与〈甲寅〉杂志》，载《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艰难时世里积累起来的办报经验与人际资源。在《青年》杂志之前，陈独秀主办、合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可考的就有三种，[注]最早是1903年8月，陈独秀亡命上海时与章士钊合办的《国民日日报》，[注]共其事的还有张继、谢无量、苏曼殊、何梅士、陈去病等人，该报发行未久，即风行一时，被誉为“《苏报》第二”，同年12月停刊。1904年3月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发行以后，“仅及半载，每期由一千份增至三千份，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报冠”，[注]一年后的9月停办。最后一种是章士钊在日本主编的《甲寅》杂志，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协助编辑。《甲寅》杂志的政论文自成一派，颇能倾动一时。有意思的是，该杂志的作者易白沙、高一涵、李大钊、吴稚晖、杨昌济、胡适、陶履恭、吴虞、刘叔雅日后都成了《新青年》的撰稿人，两份刊物之间的渊源关系于斯可见。[注]这些报刊虽然都十分短命，难有持久的影响力，毕竟也曾风动一方，为陈独秀日后创办《新青年》提供了助力和信心。因此，当他向汪孟邹扬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显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向书肆老板的游说之词。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新青年》最初两卷的作者们，也许不难理解何以这些撰稿人基本上不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就是和他一起革命的“战友同志”，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作为一份同人刊物，首二卷作者群建构的基础乃是革命生涯中结交的友朋关系，那些作者大都与陈独秀个人有着深浅不一的交往情谊，其中有两种因素最值得注意，一是同乡关系，二为革命背景。

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章。

根据陈万雄的研究，[注]《青年》杂志第1卷作者有名有号可考诸人中，只有谢无量和易白沙不是安徽籍人士。但谢无量四岁即随父母入皖，长居芜湖，1904年与陈独秀等办《国民日日报》，后又赴安徽公学任教。在该校担任教职的还有陈独秀、刘申叔、陶成章、柏文蔚、苏曼殊等。易白沙则从1903年到民初一直居皖从事文教与革命事业，辛亥事起，他与高一涵、高语罕、李光炯等在皖策划起义，1914年与陈独秀等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其余皖籍人士也都在《新青年》创刊前与陈独秀相熟。在此，传统的地缘因素在最初汇聚杂志作者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这样明显的地域色彩对于一份志在天下的启蒙报刊来说，显然构成了很大的限制。幸好从第2卷开始，这种格局就逐渐被突破了，该卷第1号上有一则通告，特别说明：

《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又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注]

《青年》杂志易名为《新青年》的真实原因，据汪原放所述，乃系《青年》杂志与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周报）刊名雷同，该会遂致函群益书社，要其改名，免犯冒名之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
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2页。

这种广告式文字自有夸饰之处，[注]但毕竟表达了《新青年》欲拓展作者群以吸引读者的愿望。在这一卷的新作者中，日后成为《新青年》知识群体重要成员的李大钊、刘半农、吴虞、陶孟和、杨昌济等皆是外省籍人士，皖籍作者仅有胡适、光升、程演生（通信栏中出现）等5人。[注]为便于说明，先将上海编辑的首二卷主要作者的情形表列于下（表3-1）。

表3-1 《新青年》第1—2卷主要撰稿人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教育背景		任职与经历	
			国内	国外	教育活动	社会、政治活动
陈独秀（仲甫）	1879—1942	安徽怀宁	秀才，杭州求是书院	日本东京专门学校，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日本成城学校陆军科	安徽公学国文教师（1905），任教芜湖皖江中学（1906），杭州陆军小学史地教员（1909），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1912）	在安徽组织励志学社（1902），参与组织留日青年会，参加拒俄运动，组织安徽爱国会（1903），合编《国民日日报》，创办《安徽俗话报》，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04），组织“岳王会”（1905），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1），协编《甲寅》杂志，加入“欧事研究会”（1914）
高一涵（受山）	1885—1968	安徽六安	安徽高等学堂毕业	日本明治大学		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留日学生总干事，与李大钊组织“神州学会”，从事反袁（1916），与李大钊编《民彝》和《甲寅》日刊（1916）
刘叔雅（文典）	1889—1958	安徽合肥	安徽公学（1906）	留日（1909）		同盟会会员（1907），上海《民立报》编辑，加入中华革命党（1904）
高语罕	1888—1948	安徽寿县	私塾	日本早稻田大学	赭山第五中学任教（1916）	参加“岳王会”外围组织“维新会”，加入同盟会，组织安徽“青年会”，《神州日报》撰稿人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教育背景		任职与经历	
			国内	国外	教育活动	社会、政治活动
潘赞化（瓒华）	1885—1959	安徽桐城		日本振武学校（1902），早稻田大学兽医科	创办桐城堂会学堂（1906），芜湖军政府芜湖海关监督（1911）	参与陈独秀、苏曼殊等组织留日革命团体“青年会”（1902），加入同盟会，赴滇参加蔡锷讨袁斗争
易白沙	1886—1921	湖南长沙		留日	主持永绥师范学校（1902），怀宁中学、湖南旅皖中学校长（1903）	组织“青年军”起义（1911），协助柏文蔚反袁，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
谢无量（仲清）	1884—1964	四川乐至	上海南洋公学（1901）	留日	安徽公学任教，四川存古学堂监督、高等学堂和通省师范讲习（1909）	参与爱国学社活动，《苏报》编撰，与陈独秀、章士钊等办《国民日日报》（1903），北京《京报》主笔（1906），创办蜀学会，参与四川保路运动
胡适	1891—1962	安徽绩溪	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上海中国公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参加竞业学会，《竞业旬报》撰稿人（1906），《甲寅》杂志作者
光升（明甫）	1876—1963	安徽桐城	秀才，南京江南高等学堂（1904）	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法政科	安徽旅宁公学（1910），江淮大学教务主任、校长（1913）	同盟会会员柏文蔚都督府秘书（1912）
刘半农	1891—1934	江苏江阴	常州府中学		上海实业学校、中华铁路学校任教	与吴研因编《江阴杂志》，加入青年团起义革命军，上海开明剧社编剧，入中华书局编辑部（1913）
李大钊（守常）	1889—1927	河北乐亭	永平府中学（1905），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07）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1914）		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1913），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编《言治》月刊（1913），主编《民彝》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教育背景		任职与经历	
			国内	国外	教育活动	社会、政治活动
苏曼殊	1884—1918	广东中山县		日本大同学校，早稻田大学预科，成城学校陆军科	上海吴中公学教习、南京陆军小学教习（1905），皖江中学任教（1906），安徽高等学堂（1913）	与陈独秀等组织留日学生革命团体“青年会”（1902），参加拒俄运动，与黄兴等创办华兴会（1904），主持上海《太平洋报》（1912），《甲寅》杂志撰稿人
马君武	1881—1940	广西桂林	广西体用学堂（1898），上海震旦学院（1900），中国公学（1901）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03），德国柏林大学（1907），在德国获博士学位（1916）		参与创办同盟会，《民报》撰稿人，主持《民立报》（1912），实业部次长（1912）
吴虞（又陵）	1872—1949	四川成都	成都尊经书院（1892）	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5）	1907年回国后任教于成都县中学堂、通省法政学堂、官办法政学堂等	《政进报》主笔（1911），参与编辑《女界报》《公论报》，《醒群报》主笔
陶履恭（孟和）	1889—1960	天津	天津严氏学校	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士		
杨昌济（怀中）	1871—1920	湖南长沙	秀才，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	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学教育（1906），英国阿伯丁大学主学伦理学和哲学	1913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北京大学教授（1917）	和黎锦熙编辑《公言》杂志（1914）
吴稚晖（敬恒）	1865—1961	江苏常州	举人，南菁书院（1890）	1902年留日	北洋大学堂（1898）、上海南洋公学国文教习	同盟会会员（1905）

说明：谢无量以上为第1卷作者，胡适以下为第2卷作者。通信栏中的作者不列入。

资料来源：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京师译学馆校友录 附：民国七年九月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

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2页；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从表3-1约略可以看出，无论是皖籍还是外省籍作者大都是在投身革命风潮的过程中与陈独秀相识、相知，如早在1902年3月，陈独秀即与潘赞化、柏文蔚、葛温仲等在安庆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鼓吹革命；该年冬天，陈独秀与张继、潘赞化、苏曼殊等在日本发起“青年会”，主张“破坏主义”，他与苏曼殊的相识始于此，两人性情相投，遂成莫逆之交，潘赞化与陈独秀长期相随、共事革命，交情亦甚笃。陈独秀与谢无量则相识于《国民日日报》社。1905年陈独秀在芜湖发起组织“岳王会”，高语罕为该组织外围成员。光升与陈独秀年龄相仿，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常相过从。高一涵与刘叔雅曾在陈独秀执教过的安徽两所学校受业，高一涵在日时又协助章士钊、陈独秀办《甲寅》杂志，刘叔雅则是该杂志的撰稿人。李大钊留日时与高一涵往来密切，二人同是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委员，一起编辑《民彝》杂志。也有一些作者是通过投稿而认识，如李大钊、吴虞皆因投稿于《甲寅》杂志而见重于章士钊、陈独秀。刘半农在上海时靠写通俗小说维生，1916年10月，开始向《新青年》投稿，结识陈独秀和苏曼殊，是诸位作者中认识陈独秀最晚的。[注]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260—261页。

胡适替《甲寅》杂志撰稿时，即与章士钊有书信往还，但他与陈独秀的相识则源于安徽老乡汪孟邹的介绍。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寄《青年》杂志给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时，写信很热情地告诉他，此杂志“乃鍊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鍊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是所感幸”。[注]以后陈独秀、汪孟邹二人盼胡适之稿件，如大旱之望云霓，企盼甚殷。

关于《新青年》知识群体与辛亥革命力量之间的渊源关系，详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上列作者绝大多数具有参与辛亥革命的相似背景，有些还参加过同盟会，由此形成的相同的政治立场（民主共和），也是使他们聚集起来的重要因素。与同乡关系相比，革命背景对于《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建构来说，显然更为关键，这无论是在上海的早期阶段，还是后来移师北大都是如此。[注]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49页。

从活动的方式来看，这些作者都是文人，基本上都侧重于办报和从事新式教育，积累了相当经验。这些活动尽管在当时都属于革命的一部分，具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但不少也有开通民智、启蒙大众的诉求，这为知识精英从政治变革转向文化革新提供了“路径依赖”式的便利。这些人身上还有颇为浓厚的文人习性，每当革命处于低迷时期，常诗酒唱和，以遣感时忧国之情。1909年年底，陈独秀与小姨高君曼闲居杭城时，和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诸人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写诗作词，纵酒狂欢，极为相得。[注]此类例子甚多，不烦举。

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8章。

这批撰稿人多出生于1880年代，在知识背景上，几乎都有留学经历。表中的作者除胡适留美，刘半农当时尚未有放洋机会外，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清末民初的日本，乃是革命的卧虎藏龙之地，大批的革命精英在此聚散离合，不少人正是在日本相互结识，共商革命大计。[注]

《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刊易白沙《孔子平议（下）》，第2卷第3号（11月1日）刊陈独秀《宪法与孔教》，第2卷第4号（12月1日）刊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刊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和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第2卷第5—6号编辑印行时期，恰值陈独秀受聘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后。

张国焘是1916年10月入学北大，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据他回忆，北大同学知道《新青年》杂志的非常少，直到1917年1月和2月开始讨论文学革命，他们才开始注意。当时《新青年》可以在校中和书摊上买到。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39页。

1917年年底，《新青年》因发行不广，书社想要中止，经陈独秀交涉，方允续刊。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1月4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5页。

戈公振：《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注6，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15—316页。

同乡关系、革命背景、文人的习性、相同的留日经历乃至相似的思想取向串联起《新青年》最初的作者群，但是，《新青年》在上海编辑时期，虽然第2卷主题转为抨击孔教，并开始讨论文学改良，[注]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但仍属边缘，读者圈子并不大。[注]从刊物的销量来看，最初连赠送交换只印1000份，直到1917年以后，[注]销量才开始上升，最高达到一万五六千份，[注]而这要在陈独秀北上受聘文科学长以后才有可能。这里的问题或许在于，《新青年》首二卷的作者基本上还局限在与主编陈独秀个人有着良好关系的人士上，作者群的“公共性”尚有不足。此外，十里洋场的沪上，尽管身为全国出版中心，但在高度商业化的竞争中，一份思想性的启蒙刊物要想生存下来并能发挥全国性的影响，号令天下，真是戛戛乎其难。才如江海的陈独秀要想“笔底寒潮撼星斗”，还有待新的大事因缘。

2．一校一刊的结合

书店合并之事后来未成。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3—36页。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汪孟邹从上海起程匆匆赶往北京，此行的目的是为群益和亚东合并成一个“大书店”招股筹资。这个合并的计划他们酝酿了很久，当时亚东的生意颇为清淡，一度甚至到了非上当铺不能过关的地步，窘不堪言，承办《新青年》的群益状况虽尚不差，但毕竟也是小书局，面临商务、中华这样强劲的对手，难免危机四伏。他们希望通过合二为一的方式改变这种局面，自然这也关乎《新青年》杂志的未来前途。[注]

《汪孟邹日记》，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第127页。

一日，时任职于北京《晨钟报》的李大钊在北京瑞记饭庄宴客，席上，陈独秀初识梁漱溟，当时梁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从时间上推断，陈、梁二人当时已接受蔡元培之聘。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3—484页。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5页。

二人到了京城，下榻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64号房，[注]大部分时间用来访友、宴请、[注]听戏，上午则常常“隆中高卧”，日子倒也过得弛张有度。不过，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大约一个月以后，一位大人物的悄然造访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一天，汪孟邹有日记如下：“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注]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6页。

蔡元培当日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作为革新北大的关键一步，他想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的求贤若渴与礼贤下士，汪孟邹有一段生动的回忆：“蔡

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这一近代版的“三顾茅庐”与三国时代不同的是陈独秀非隐士，他与蔡元培早在清末革命风潮中即已相识。多年以后，陈独秀对此尚有清楚的记忆：

这个组织即为“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准确时间当在1904年，此后，二人不相闻问多年。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给我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然而一开始，蔡元培在虑及文科学长的人选时，并未想到陈独秀，此事显然得益于医专校长汤尔和的举荐，且看蔡元培的回忆：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29页。有关陈独秀受聘之事，尚有沈尹默和马叙伦颇有出入的回忆版本，沈尹默特别详述他如何直接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但二人的回忆甚多疑点。可注意的是，两人都向汤尔和推荐陈独秀，似反证汤尔和在当时北京教育界的势力。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见胡适、马叙伦、陈鹤琴：《四十自述·我在六十岁以前·我的半生》，岳麓书社，1998年；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48—49页。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

据沈尹默回忆，一开始，陈独秀有拒绝之意，理由是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后经蔡元培转告，可将《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方慨然应允。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72—173页。

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正式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注]并于当月进京任职，《新青年》杂志也随之从上海迁往北大，编辑部设于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寓所。一校一刊的结合于焉开始，历史的风云际会使陈独秀从局促于沪上的一介寒士终于上升为全国性的知识精英，《新青年》杂志也从边缘位置渐渐走向中心舞台，一个《新青年》的时代悄然降临。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119页。

不过，此中的一大关键仍然是蔡元培的出任北大校长和随后对北大的革新。蔡元培在北大施行的一系列举措，用蒋梦麟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有如“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在保守势力笼罩下的五朝古都，这就好比“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注]但蔡元培引进陈独秀和《新青年》，从日后的发展来看，远非石子可喻，而似巨石投水，一石激起千层浪，头脑古旧之士，骇为洪水猛兽，对蔡元培和《新青年》知识精英来说，却是希望新思潮的洪水能够冲走旧军阀的猛兽。

袁氏倒台后，一度出现北洋系、研究系和国民党三派合作的政治格局，参见杨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蔡元培是在1916年12月26日由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黎元洪当时人称“黎菩萨”，“有求必应”之意也。沈尹默认为北洋政府实际上“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之为物，外国都有的，中国也不能没有，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68—169页。

但在北洋政府治理下，作为国民党党员的蔡元培何以能出任北大校长？这其中有着多种历史因缘的聚合。除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一度出现袁世凯时代所未见的党派合作的新气象，[注]从蔡元培个人来看，他既是前清的翰林，又是革命时代光复会的领导人，民国初年的首任教育总长，集新旧资望于一身。而且在革命生涯中，蔡元培也偏重于教育文化活动，从早年的担任家乡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到后来出任南洋公学特办总教习、发起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中年以后赴欧游历考察，组织华法教育会等，凡此种种皆表明，蔡元培显然是最好的大学校长人选。

参见［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杨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1962年第1卷第6期，转引自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14页。

不过，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蔡元培之出任北大校长，并不仅仅由于他个人的巨大声望和兼通中西的学识，相当程度上也得力于他的一批同乡故吏的援引。[注]首先，

直接推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廉）。1916年9月1日，尚在法国的蔡元培收到范源濂发来的电报，敦请他担任北大校长。日后范源濂在回忆中论及此事说："蔡先生很伟大。他到北大作校长，是我作教育部长时，民五冬天从欧洲请回的；民国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长，却是他邀请的。我和他是肝胆相期的朋友。"[注]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见胡适、马叙伦、陈鹤琴：《四十自述·我在六十岁以前·我的半生》；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马叙伦的回忆不甚可靠，但也非全不可信。相关研究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6—27、45—46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613—614页。

范源濂（1875—1927年）是湖南湘阴人，曾入时务学堂学习，与梁任公有师生之谊，后留日。在政治上属共和党和后来的进步党，他与汤尔和在清末拒俄运动中即与蔡有交往，后又成为合作愉快的教育部同事。而当时的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又是蔡任教育总长时的普通教育司司长。根据马叙伦、沈尹默说法不一的回忆，蔡元培之任北大校长，是与北大、教育部乃至北京教育界关系密切的知识精英马叙伦、汤尔和、沈步洲、范源濂、夏元瑮诸人相商的结果。[注]上述几位除范源濂之外，都是浙籍人士。汤尔和（1871—1940年）时任北京医专校长，是北京教育界颇有势力的人物，他与马叙伦为杭州养正书塾的同学兼结拜兄弟，关系不同寻常。马叙伦回忆中说是他向汤举荐蔡元培，汤再向范源濂推荐。沈步洲当时任负责高等教育的专门教育司司长，按照沈尹默的回忆，蔡元培之任北大校长，出于沈步洲之策划，并且他和夏元瑮、沈步洲都曾同汤尔和商量过，主张由蔡元培来办北大。夏元瑮为夏曾佑之子，曾留学德国，当时任北大理科学长。而汤、夏、沈（伊默）、马诸人又都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和中国教育会共事革命及教育活动的同人。上述这些说法虽有出入，但也说明蔡元培之任北大校长，亦是众望所归。

据王云五回忆，民初教育部中浙籍人士势力之盛，竟可以挤走非浙籍的教育总长。参见王云五：《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9—121页。

何燏时为浙江诸暨人，早年求学于浙江求是书院，1896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1905年毕业后回国任学部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后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1913年1月任北大代理校长，同年11月5日辞职。胡仁源是浙江吴兴人，1914年1月任北大校长。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陈黻宸（1858—1917年），字介石，浙江瑞安人，1903年冬被奏派为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教习，1913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兼北京大学文科史学教授。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1190—1191、1214页。

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教育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浙江籍人士占有很大的势力。教育部中的夏曾佑（社会教育司司长）、许寿裳（参事）、周树人（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等皆属浙籍，且为蔡元培在民初任教育总长时引进。当时引进的浙籍人员，尚有钟观光、董鸿祎、许季上等人，由此形成的同乡网络其人员虽时有变动，但这股势力一直存在于教育部中。[注]北大在何燏时、胡仁源主校政后，陆续引入章太炎弟子取代原在文科独领风骚的桐城派文人如林纾、姚永概等，造成一代学风的转变。蔡元培长校前入北大的章门弟子包括：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朱希祖、黄侃、朱宗莱、马叙伦。这些人除黄侃以外，皆为浙江人，与其师有相同的政治立场（反清、反袁），在北大被目为“新派人物”，颇有势力。而蔡元培与章太炎有共事革命的背景，相交亦甚厚，与其弟子也多有相识。即便是当时先后担任北大校长的何燏时、胡仁源也都是浙江人，[注]胡仁源还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执教时的特班学生。此外，浙籍教授或教员尚有：陈黻宸[注]、陈大齐、许季上、林公铎、沈步洲和被误为章门弟子的沈尹默等，其中陈黻宸又是马叙伦和汤尔和在杭州养正书塾求学时的老师，师生之情甚笃。这种由业缘、地缘和学缘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的人际网络笼罩于北京的教育界，不仅蔡元培出掌北大得益于这样的人际氛围，以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校政，其地位之难以撼动，也与此大有干系。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使学院风气为之一新。作为对照，无论是回忆还是研究清末民初的北京大学，人们通常都会提及京师大学堂浓郁的官僚气息和改革前北大的腐败与死气沉沉，以显示蔡元培改革的艰难与可贵。尽管旧北大并非一无是处，但在风气、理念、制度上的确与近代大学格格不入，禁锢了一所最高学府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因而其整体形象与众多论述所言相差无几。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的顾颉刚对此有十分生动的回忆：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见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学校象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象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

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象个什么“最高学府”？ 注

如引进章氏门生，扭转桐城派学风等。陈万雄注意到，进入民国后，主北大校政者由原来的官僚转为一批开明学者，如严复、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这是从传统官学走向民间的重要转变”，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4—26页。另参见［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第1—2章。

顾颉刚的回忆或许不无夸大之处，其实，进入民国以后北大已有不少的革进，注但仍然难以扭转颓败的风气，洗刷“官僚养成所”的污名，它依旧延续着科举时代“读书做官”的故习和文人风流冶荡的余韵。蔡元培曾在清末执教于译学馆，深知此中之弊，1917年1月4日他到校视事后，迅速展开全方位的改革，实践其“学术独立”“教育救国”的不灭理想。

蔡元培的改革中有两项举措牵动大学全局，关乎近代大学之确立。其一就是教授治校制度的奠定。具体为设立全校评议会，作为议决校政的最高机构，不仅大学各项立法须经评议会通过，举凡学科废立、教授延聘、教师职称、预算决算等重要事项，也均须经评议会审定。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互选中产生，非教授不得当选，任期一年，校长则为评议会议长。因校长与学长仍属少数，于是又有各学科教授会的设置，各教授会主任由教授互选产生。通过这种制度变革，北大一改以往一校之政皆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说了算的专制局面，同时，教授治校也使得北大获得了自主运作的稳定机制，不因校长一人之去留改易而使校务停顿。当然更重要的是使大学能够保持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拒绝北洋政府对校政的随意干预，从而在乱世里创生出一个以研究学问、探索真理为中心旨趣的读书人社会（知识人社会），一个近代大学的骨架开始生成。

不过，教授治校只是提供了转移风气的制度环境，广延富有学识和研究兴趣的教员才是这种颓风得以扭转的关键。蔡元培的用人原则在他给吴稚晖的信中有明确表达：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页。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注

《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77—78页。

依据这两个原则，蔡元培不问年龄、资格、名望、国籍、思想派别乃至政治立场，运用各种人际资源，广求天下英才。这方面突破最早、改革最力，也最为成功的是北大的文科，上文所提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关键的开端。蔡元培掌校后延聘的文科教员除陈独秀外有胡适、梁漱溟、周作人、刘半农、章士钊、李石曾、杨昌济、刘师培、程演生、何炳松、王星拱、吴梅、刘叔雅、黄节、叶瀚、李大钊等，法科则有高一涵等，理科有刘三、钟观光等。其中，胡适是经陈独秀推荐于1917年9月担任北大文科教授。早在1916年12月1日，即将从美国名校毕业的胡适写信给汪孟邹要陈独秀替他代谋职位，1917年1月陈独秀致函胡适："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注

刘小惠：《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周作人：《记蔡孑民先生的事》，见氏著：《药味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31页；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第120、125页。不过，该年谱说周作人是因鲁迅的推荐才入北大，非是。参见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33—234页。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123—124页。

朱志敏：《李大钊传》，第261页。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56页。

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复函吴稚晖邀其担任北大学监主任，并主讲言语学概论。同年3月15日致函汪精卫请其主持国文类教课，"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均未果。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5—6、18页。

刘师培从1908年开始忽然摇身一变，由革命党人转而依附两江总督端方，1915年又列名筹安会六君子，颇有负于民国。民国元年，革命党要惩办他，陈独秀与他人联名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曲为宽宥"，以"延读书种子之传"。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55页。万仕国著：《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第139—146、262页。

刘半农没有学历，但凭借《新青年》上的崭露头角，由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担任预科国文教授。注周作人与蔡元培同籍浙江绍兴，周家与蔡家又"向有世谊"。1906年蔡元培回绍兴办"学务公所"，曾邀适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的周作人回乡帮忙。1916年冬蔡元培归国返乡演讲，当时担任县教育会会长的周作人前往聆听，可见二人早已相知。周作人任教北大，是蔡元培通过鲁迅主动邀请的结果，

1917年9月周作人被聘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撰处纂辑员。对周作人来说，这使他从一个蛰居乡镇的青年飞上枝头，跃升为最高学府的教授，变化不可谓不大。[注]而鲁迅本人受聘北大讲师，则要在1920年8月2日。[注]留学日、英的章士钊（1881—1973年）与陈独秀是多年老友，二人与蔡元培在1914年皆参加“欧事研究会”。受陈独秀之邀，1917年秋章士钊由日返国任哲学门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注]未几，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1918年1月李大钊北上就任此职。[注] 1920年7月8日，北大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从此李大钊又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注]杨昌济亦是章士钊向蔡元培推荐来北大，1917年担任文科教授。有意思的是，章士钊本人后来却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坚定反对者。刘叔雅（文典）、程演生都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刘叔雅还曾问学于章太炎，二人由陈独秀推荐入北大执教。蔡元培在国民党内与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往来甚密，有在欧洲共事文化教育的经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较为疏离。蔡元培出掌北大后，想邀请三人协助他整顿北大，但只有李石曾应允担任文科教员，余下二人皆婉辞。[注]刘师培（1884—1919年）是江苏仪征人，清末与陈独秀、蔡元培等共事革命，相当活跃，后在政治上变得声名狼藉，但学问精湛，国学造诣极深。刘师培与陈独秀私交甚厚，1917年秋由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担任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注]

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梁漱溟在1917年执教北大，起因是蔡元培看到梁漱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一篇探究佛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深感他是个富于研究兴趣、好学深思之士，理当放在大学里，因此想让他主讲印度哲学。年仅24岁的梁漱溟当时只有中学学历，年龄与当时北大学生不相上下，闻言不敢冒昧承当，自谦所知无几，蔡元培说了一席话，令梁漱溟铭感五内，难以推辞：

《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335页。

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注]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地缘、学缘、私谊等因素的作用盖指蔡元培借此较易了解受聘者的才学识，并非暗示蔡元培亦难免徇私。

这些才学之士思想派别不尽一致，但绝大多数都有类似的革命背景。聘请过程中，蔡元培考虑的不仅是否有学识，能否引发学生的研究兴味，是否具有变化风气的开拓能力，其实背后还涉及人际脉络上的某些复杂的渊源（如地缘、学缘、私谊等[注]），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读书人社会”是如何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原则下逐步被建构起来的。在整个过程中，雍容大度而又思想趋新的蔡元培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纳广布国中的俊彦贤士。

任鸿隽和陈衡哲在1920年夏已受聘为北大教授，之前两人已订婚。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见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总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2—18页。

上述新任教员中，原属《新青年》首二卷作者的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刘叔雅、杨昌济、李大钊、高一涵、程演生，占了相当的比例，这还不包括1920年受聘为国文系讲师的周树人和1921年受聘为国文系教授的吴虞。北大吸收《新青年》主要撰稿人充实文、法科，使北大获得了一新校政学风的改革力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而这正是一校一刊结合的一个重要面向。《新青年》杂志的移师全国最高学府，则又反过来使杂志一改旧观，开始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力。这首先表现在《新青年》作者群的扩大上，陈万雄注意到，《新青年》第3、4两卷的新作者除鲁迅和个别人外，大多数为北大师生。其中，属于教员以上的有钱玄同、章士钊、蔡元培、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诸人，余下的为学生或职员，如常乃德、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林语堂、黄凌霜等。《新青年》杂志的声名远播，其所倡导的启蒙运动影响广被，实有赖于全国最高学府师生两代人的热情加盟。而五四前后刊行的《新青年》第5—7卷作者群更有了新的拓展，北大教员有朱希祖、陈启修、马寅初、张慰慈、顾兆熊，学生则有高君宇、张崧年、孙伏园。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期作者增加了不少来自各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任鸿隽、陈衡哲[注]、王光祈等，这使得《新青年》杂志的公共性大为提高，成为举国瞩目的启蒙刊物，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也借助于五四事件遍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注]

一校一刊的这种双向结合不仅让《新青年》杂志成为北大新派力量的言论机关，更重要的是使《新青年》知识群体得以最终形成。当然，并非所有给《新青年》杂志撰稿者皆属这一群体，因此很难清晰地圈定该群体的人员边界，但我们可以从其核心力量的确立来探讨该群体的基本面貌与内部的交往关系。《新青年》杂志原来一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但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开始改为同人轮流编辑，第4卷第3号刊载的一则启事透露了此中之变化：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参见张耀杰：《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见氏著：《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沈尹默：《忆鲁迅》，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

沈尹默回忆二人在杭州首度相见的情形，颇能一见陈独秀豪迈的个性："……隔日，陈（独秀）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刺激，沈钻研书法，日后倒成为书法大家。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72—173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

从思想史角度对胡适何以"暴得大名"的分析，参见［美］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这里的"编辑部同人"显然构成了《新青年》知识群体最为核心的部分，他们的力量足以"共同担任""所有撰译"，因而决定了杂志的基本面貌。根据张耀杰的考证，第4卷各期轮值主编的同人分别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第5卷各期的编辑同人仍为上述六人，只是次序有所变动。但从第6卷1号（1919年1月15日）开始出现了变化，该期刊载了一个分期编辑表，列名其中的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负责编辑，此处新增的高一涵、李大钊是接替准备出洋的刘半农和陶孟和。[注]八人中，除钱玄同、沈尹默外，皆为《新青年》早期作者。钱玄同（1887—1939年）是章门弟子，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年即执教于北大，他是较早认同《新青年》文学主张的北大教员。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钱玄同接读后大为叹服，写信给陈独秀予以声援，此后，钱玄同的身影一直活跃在《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里，至第7卷方才退出。在编辑部诸同人中，钱玄同的主张最为激进，诸如废除汉字、烧毁中国书、以妖孽谬种骂对手，甚至扬言40之人当枪毙等等，被人目为疯子或神经病。相形之下，比钱玄同年轻四岁的胡适就显得十分温和，非常绅士了。钱玄同与沈尹默（1882—1964年）同籍浙江吴兴，都有留日经历，且都在蔡元培长校前入北大。据沈尹默回忆，两人相识约在辛亥之后，当时一批章门弟子自日回国到杭州，中有马幼渔、朱希祖、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和沈尹默的弟弟沈兼士等人，沈尹默因其弟沈兼士的缘故，与这批人相识，[注]以后时有过从。至于沈尹默与陈独秀的关系，则渊源更早，清末在杭州即已订交，按沈尹默的说法，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还得力于他的推荐。[注]在《新青年》同人中，沈尹默代表着颇有影响的浙籍势力，其人深沉有思虑，喜治红（《红楼梦》）、老（《老子》）之学，"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风度"，人称"鬼谷子"。他不似陈独秀、胡适能写滔滔宏论，而只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很得胡适称赞。[注]无疑，《新青年》知识群体中最具声望的是陈独秀与胡适，尤其是胡适，以一寂寂无名的留美学

生，短短数年间，名满京华，迅速成为与陈独秀并驾齐驱的领袖人物，此中缘由，故可深长思之。[注]

张耀杰：《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见氏著：《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见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上述编辑部同人通过编辑会议的形式有相当多的互动和交往，每编一期，相互之间常有协商与合作。如沈尹默因有眼疾，轮到他编辑，便由钱玄同、刘半农来代替。对新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周氏兄弟显然不是编辑部同人，[注]他们成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乃是钱玄同力邀的结果。周氏兄弟的日记里都记载了钱氏的首度拜访，鲁迅后来还在《呐喊》自序里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钱玄同的约稿情形。三人同为浙籍人士，又是太炎门生，关系自不寻常。不过，兄弟二人中，周作人与钱玄同的交往更持久一些，钱氏回忆他与鲁迅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民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民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注]两人的一大共同点是持论皆易趋极端。在与编辑部其他同人的关系上，周作人与陈独秀、胡适诸人交往较多，而鲁迅则显得较为疏离，有时甚至要通过周作人来传递相关信息。

《陈独秀书信集》，第90—91页。

如果说编辑部同人构成了《新青年》知识群体最为核心的力量，那么，属于《新青年》知识群体重要成员的除周氏兄弟外，尚有吴虞、刘叔雅、易白沙、王星拱、张慰慈、陈大齐、沈兼士、朱希祖、陈启修等人。此外，像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青年学生也属于该群体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群体中，沈尹默、钱玄同、周氏兄弟、沈兼士、朱希祖均属浙籍人士，又多为太炎门生，鉴于浙籍人士在北大乃至北京教育界的势力和章门弟子在学术上的支配地位，上述诸人加盟《新青年》，意味着当时知识界占据主流的一股知识力量对文化启蒙的支持和参与，大大增强了《新青年》杂志的声势。其中，钱玄同和沈尹默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当胡适和陈独秀最初倡导文学革命时，学界响应者寥寥，钱玄同是章门弟子中最早投书热情赞扬的。钱玄同的学术造诣即便在章门弟子中也属一流，故颇为时人推重。陈独秀、胡适的文学主张得此重量级学人的有力支持，信心陡然大增。1917年陈独秀接钱玄同信后，回复说："惠书谨悉。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注]

胡适晚年对此记忆犹新：

《胡适口述自传》，见《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钱玄同教授则没有写什么文章，但是他却向独秀和我写了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信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注]

关于太炎门生之于北大和《新青年》的重要意义、作用，参考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21页。

不仅如此，钱玄同还苦口婆心地劝说最初对《新青年》不无微词的周氏兄弟加盟其中，影响波及章门中的其他弟子。至于沈尹默，与章门弟子关系密切，自己也被误为太炎门生，且作为浙籍人士背后的中心人物，其重要作用前文已有涉及。[注]

这些一流的知识精英发起的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犹如一场头脑风暴，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纷至沓来。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刊登了一则编辑部启事：

《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注]

在《新青年》激起巨大波澜，名高于世、谤亦随之的时候，编辑部同人的这则声明显然想以文责自负的方式，保护其实与他们关系极为密切的北京大学。外人的“无谓谣言”并非空穴来风，且不说编辑部同人全都是北大教授，作者群也多为北大师生，即便是“议论”之产生与影响之扩展，也无不与北大息息相关。对于《新青年》知识群体来说，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提供了他们足以安身立说的自由空间，他们在这一空间里的生活、交往、读书、思考、讲学、辩论构成了他们得以在杂志上放言高论的现实基础和力量来源，也就是说，北大给予了《新青年》杂志丰沛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堡垒。那么，这些新派的知识精英究竟如何在学院的空间里进行公、私交往，在新、旧冲突中拓展自身力量？《新青年》知识群体内部的交往又呈现出怎样的复杂性？或者反过来说，北大孕育了怎样的文化空间，使得这批原先星散各处，在清末以来的大变局中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精英能够云集全国最高学府，通过面对面的自由交往形成新的群体性势力，重返时代的中心？

3．《新青年》知识群体的交往世界

先来看看经过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励精图治，北大所展现出来的罕见的自由气象。这方面最为光彩夺目的莫过于北大文科。原来在蔡元培改革之前，文科并不起眼，也不受人关注，学生们趋之若鹜的是法科和商科，前者有助于升官，后者有助于发财。蔡元培长校后，力图改变学生的这一观念，把大学改造成为追求知识的神圣殿堂。其中改革最大的就是文科。当时文科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门（后称系），聘请的新教授最多，再加上蔡元培长校前即已入北大任教的辜鸿铭、黄季刚、朱希祖、陈汉章、陈大齐、马叙伦、钱玄同、张相文、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朱宗莱等，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

这些教员有新旧之分，被目为旧派的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喜好骂人的黄季刚、名列筹安会六君子的刘师培和被讥为两脚书橱的陈汉章等。这些人政治立场互异，但学识渊博，刘师培、黄季刚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更是令新派人士侧目，而思想激越的陈独秀、年少才美的胡适之、态度峻急的钱玄同、生气勃勃的刘半农、擅长谋略的沈尹默等皆属新派。有意思的是两派中都有太炎门生，据沈尹默的说法，章门弟子分为三派：

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

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物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物是钱玄同、沈兼士……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注]

蔡元培长校后延聘的新教员并非都是新派人物，但只要富于才学，蔡元培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原则，让这些个性鲜明、互放异彩的知识精英同处一校，自由竞争，北大文科由此迅速成为革新思想、转变风气的中心。西谚云：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但民初首善之区的北京城不见得有多少自由，倒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充满了令人向往的自由气息。教师拥有开课的充分权利，更有讲课的完全自由。陈独秀回忆：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当时的北大是很有趣的，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着他，他一点也不管。蔡元培能容忍他这样摆架子、玩臭格，一点也不生气。[注]

不过，蔡元培后来还是受不了辜鸿铭的做派，1920年辜氏因教学极不认真，讲“英诗”课一年只讲了六首零十几行诗，终被辞退。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59页。

辜鸿铭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精通多国语言，尤长于英国文学，当时教授英诗，但在政治上却公开拥护帝制。他那古怪的装扮、反动的言论和聪明的俏皮话构成了北大“兼容并包”的有趣象征。[注]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0页。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第234页。
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中华书局，2006年，第186页。

被视为学界泰斗的刘师培，受聘中国文学门，讲授中古文学史，“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功力之深，让当时的学生佩服不已。[注]名教授黄季刚性情乖张，以骂人名海内，其论世间之书则“八部之外皆狗屁”，举世文人除其师章太炎，皆不在眼中，狂傲已极。他在课堂上公然丑诋同门钱玄同和洋博士胡适之，[注]新旧冲突于此可见。曲学大家吴梅的课堂则又是另外一番韵致，“他上教室，常携一笛师，在教室中当场度曲，抑扬亢坠，余音绕梁”。座中学子，兴味盎然。[注]当时在大学里开设戏曲课，乃是一大革新，外界议论纷纷，老辈人士诋为胡闹。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第236页。

博闻强记、自命不凡的陈汉章“《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注]他教中国哲学史，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到商代的《洪范》。后来，改请年少翩翩的胡适来上，胡适截断众流，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当时听课的顾颉刚回忆：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见氏著：《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2—163页。

这一改把我们这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注]

一场学术范式的革命就这样从课堂里飘然而出，冲击着中国当时的知识界。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12页。冯氏这段回忆不无夸大之处，当时北大有点名制度，《北大教室规则修正案》第五条规定，点名时学生有未到者即记旷课，后到者不得请求取消。只是该规定对学生没有太多的约束力，而且教员中也有

不点名的。1918年5月25日，蔡元培校长布告，对预科一年级英文班学生卢植琦，在课堂上点名时未到堂，课后却向教务处要求取消旷课记号，且出言极其无状等情事予以记过处分。此亦可见当时学生不服管束的情形。《校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50号（1918年5月30日），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86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12页。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211页。

不过，这样的自由风气加上后来学潮的影响，也使得北大学生的缺旷课情形相当严重，旷课学生之多，以至于教员“不能上堂授课，徒劳往返”，甚至有学生因反对某教员而群起罢课。参见1918年的《文科学长告白》、《校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2月7日）、《校长布告》（5月25日）、《理科学长告白》、《法科学长布告》、《校长布告》（11月6日），1920年的《教务长布告》（3月4日），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第984—985、960—961页。

教师们讲课尽情挥洒，学生们选课、听课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要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学校对于校外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大门四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注]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生，经过入学考试进来；一种是旁听生，未经入学考，但办过旁听手续；还有一种就是偷听生，既未经入学考，也没办旁听手续，没有许可，自由来校听讲。有些人还在北大附近租房，长期住下当偷听生。[注]不过，当时北大是有学生考核制度的，但对大学是否需要考试和纪律，北大学生在1920年展开过讨论，一些学生向校方提出要求废止考试。该年5月的《北大学生周刊》还特出一期“教育革命专号”，主张彻底废除考试，取消一切考核和纪律。蔡元培认为，考试确“有好多坏处”，但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有责任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不然难以发给证书，所以原则上以要不要证书为准，不要证书者可废止考试。1923年1月，学校公布不受试验不要文凭的17位学生名单，其中有朱谦之等人，当时被同学戏称为“自绝生”。[注]如此开放自由的学院氛围，使得学生们的个性与天才有了充分抒发的辽阔空间，并且也使北大的影响及于校外。[注]

《教育部公布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1917年5月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京师译学馆校友录　附：民国七年九月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作为对照，查1917—1924年北大招考简章，当时本科学费每年30元，预科25元。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第865—878页。

胡适：《致母亲》（1917年10月25日），见《胡适书信集》（上册），第111—112页；另参见耿云志编：《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9页；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那个年代北大教员的待遇也相当优厚。按照1917年5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本科教授分六级，最低薪俸180元，最高则为280元，预科教授最低140元，最高为240元。学长分四级，最高为450元，最低则为300元。[注]据1918年9月北大教职员履历表所载，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俸300元，文科本科教授胡适、陈大齐、陶履恭、马叙伦、刘师培、黄侃、朱希祖、辜汤生、陈汉章、黄节等的俸给均为每月280元的最高额，同为文科本科教授的钱玄同、杨昌济为240元。文科预科教授马裕藻、朱宗莱为240元，刘半农、刘文典则为200元。但有些教授的月俸并不完全合于规程，或许后来又有了变化，如预科教授沈尹默拿的是280元的本科教授最高薪。[注]教授们不菲的收入使其经济地位居于当时社会的中上层，能够过上稳定而颇有余裕的生活了。1917年9月10日，胡适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教授；10月25日，他写信给母亲说自己的薪俸已加至280元，“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言辞之间似颇自得，并扬言家中大嫂、三嫂乃至侄辈的生活日用都“可由适担承”。[注]《新青年》知识群体中，周氏兄弟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鲁迅供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月薪300元，1920年8月在北大兼任讲师，总收入已不止此数。周作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亦有240元。1919年11月周氏兄弟买下八道湾罗姓屋，花去3500元，[注]这在当时属于一笔不小的开支，由此亦可见周氏家道不无殷实。

需要说明的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发生过几次拖欠各校教育经费以及各校教师的索薪风潮。这些事件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实际生活水准影响并不太大，但对像顾颉刚这样刚留校的青年会造成困扰。他在1920年6月被北大聘为助教，任图书馆编目员，该年下半年，北大欠薪，顾颉刚一家四口生活难以维持，赖胡适每月借与30元才渡过难关。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9页。欠薪比较严重的是1925年和1926年这两年，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双重恶化导致不少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另谋生路。关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状况，参见陈明远：《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见氏著：《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

五四时代北大教授们堪称丰裕的生活，[注]曾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李书华在其回忆中有颇为细致的描述：

李书华：《七年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99页。

我初到北大时（1922年——引者注），即领教授最高薪。彼时一年可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注]

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曾被人讥为急于用世而拙于谋生，因而不得不通过制度与非制度的渠道依附于政治势力，难以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近代的大学建制却使得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相当的经济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学术研究、思想创发乃至社会影响力的施展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势力的空间。对于五四时代的知识阶层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尤其是引领时代风气的《新青年》知识群体，衣食无忧的生活待遇可以让他们教学之余，相与商量学问、激发思想，开展富有情趣和文化意味的日常生活与公、私交往。当然，这些有着兼济天下情怀的知识人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广泛介入（诸如创办报刊、组织社团、街头演讲等）来塑造国民的思想，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身重新占据时代的中心位置，显然这需要诉诸一系列具体的活动，北大恰好提供了与《新青年》报刊媒体所建构的想象空间不同的学院空间。知识分子的能量在此逐渐聚集，并得以爆发出罕见的力量。

《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北大开展的各种交往活动，极为多样。公共性的交往包括在校务和院系机构中的制度性往来、专业学术组织的创设以及通过社团和报刊对公共生活的介入，而私人性的交往则又与此交织在一起。《新青年》同人借此建立起在学院中的新势力，在构筑“学术社会”的同时又试图强有力地发挥知识分子的公共影响力，以达到改造国家社会的最高目的。但是《新青年》知识群体所置身的民初学院场域，也如同布迪厄所言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冲突和争斗，尽管有蔡元培这样的大护法优容呵护，对这些志向不凡的青年文人来说，要想在新旧之争中，迅速确立“新文化”之势，也非易事。当时的冲突和竞争相当复杂，新旧对抗其实并非像后世研究者所极力渲染的那样截然二分和是非判然，并且新派知识分子内部也充满各种冲突，更何况背后还渗透了地域、血缘、学派、师承的种种复杂因素。

在北大校政中，体现教授治校原则的评议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除了校长蔡元培与学长陈独秀为当然评议员（其中蔡元培为议长），《新青年》同人或作者群中先后被选为评议员的有胡适、陶履恭、沈尹默、陈大齐、朱希祖、李大钊、陈启修、王星拱、沈兼士。现将与《新青年》知识群体相关人员当选评议员情形表列如下（表3-2）：

表3-2 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当选情况（部分）

	1917年3月	1917年秋季	1918年10月	1919年10月	1920年10月	1921年11月	1922年11月	1923年10月
胡　适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陶履恭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沈尹默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李大钊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王星拱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陈大齐			当选	当选				当选
朱希祖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陈启修					当选		当选	
沈兼士								当选
马裕藻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马叙伦				当选	当选			当选
沈士远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马寅初			当选	当选				
蒋梦麟				当选	当选			
顾孟馀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资料来源：据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篇“体制及组织机构”第5部分“评议会”相关资料；另参考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59页。

注：评议员额数按1919年10月议决的选举法，为全校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如果不包括当然成员，在蔡元培长校的五四时代一般为16—17人。

北大虽为校长制，但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立法机关，校中一切设施实际由其主持，因此该会之于校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逢换届改选，众教授竞争十分激烈。个中情形，由于史料欠缺，难以窥见，但朱偰在回忆文章中对国文系的描述，似可提供间接的佐证：

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

171—172页。

马裕藻担任史国文学系主任最久，在北大评议会（马神庙公主府银安殿上）二十四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是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也不是好当的，因为学校里派别分歧，新旧两派的斗争常很激烈，每逢一学年开始，马氏常坐着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还须适应学生的要求，折衷于新旧之间。[注]

评议会之重要，可于“评议会议事录”中获得直接的感知，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147、154—180页。

由于评议员是由教授互选产生，马氏如此辛勤奔波，不仅是尽主任之责，同时也未尝不是为来年评议会选举“拉票”。按照评议会规则，该会每月召开一次常会，议决校中大事，遇有特殊事项还可召集临时会议，因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性互动空间。[注]表3-2约略可以反映新派知识分子在校务中逐渐提升的位置和重要性，从一个侧面解释新文化运动何以能在北大迅速展开。

当时北大校舍分为三院，第一院在汉花园（今沙滩）红楼，该楼为1916年6月北大向比利时仪品公司借款20万元于1918年建成，该建筑上下共有五层，原拟做宿舍用，当时文科各系及校图书馆均设于此。第二院在地安门内马神庙旧公主府，为理科各系所在，校长办公室也设于此。第三院在北河沿，即原译学馆旧址，法科各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设于此。参见李书华：《七年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00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43页。

从学科建制来看，《新青年》知识群体中的北大同人多受聘于文科，北大文科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除前述蔡元培、陈独秀的改革外，自然也与文科教授们在新旧之争背景下展开的种种公私交往、相互论辩、自由言说密切相关。1918年8月，北大汉花园的红楼落成，成为文科师生教学研讨的主要空间。[注]据罗家伦回忆，当时红楼有两个以教授为主体，师生共同参与的课余自由论辩场所：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第237页。

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

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掊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注

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忆守常》，见氏著：《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2、51页。

罗氏没有具体指出究竟有哪些人出入这两个场所，参与讨论，但我们不难看出这是新知识分子自发形成的激发思想、沟通讯息的非正式交往空间，红楼一时成为新思想运动的中心。注

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83页。

时任哲学门（系）讲师的梁漱溟也是图书馆主任室的常客，不过，他似乎并不参与讨论，他在晚年回忆中说："当1919年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赴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指李大钊——引者注）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太熟了，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彼此不打招呼。他主编《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坐下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交还。总之，彼此十分亲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注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0—531页。

梁漱溟与李大钊的思想立场颇为不同，却无碍二人的私谊。时人目梁氏为《新青年》派的反对者，但梁氏本人却赞成白话文，如果用当时流行的新／旧两分法便很难判断梁氏究竟归属哪一派。梁漱溟也意识到自己既不属于陈独秀、胡适新派，也不属于刘师培、黄季刚旧派的尴尬位置，因此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未必完全由于两人关系的默契。那段时间，周作人课后有暇也常去图书馆主任室，找李大钊闲谈，当时《新青年》同人虽然相当不少，但"除二三人是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而李大钊平易亲和的个性恰好使得图书馆主任室成为知识分子日常性的交

往空间。[注]由于这一空间是由随意交往建构起来的，不具有固定的时间、议程和确定的人员，因而，对于不同的人其功能未必都是相同的。

自蔡元培长校后，学术思想上自由讨论的气氛日益浓厚，这些探讨大致围绕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展开，基本上，当年在上述两个空间讨论争辩的知识分子是以《新青年》同人为主体的。由此，亦可见新派知识分子影响力在北大日益扩张的情形。

从地缘角度来看，当时的北大文科基本上由浙籍和皖籍人士主持，其中尤以浙籍教员占据学务乃至校政的要津，教授讲师中颇多浙人，如朱希祖、陈汉章、陈大齐、马叙伦、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叶瀚、马裕藻、朱宗莱、宋春舫等。从新旧角度来看，除陈汉章、叶瀚等教授外，多属新派、接近新派或依违于新旧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士往往有着多重身份，他们中的朱希祖、陈大齐、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皆为《新青年》同人，除沈尹默（被误认为章门弟子）外，同时还都是太炎门生（钱玄同、马裕藻、朱宗莱也属之），又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这几种因素的重叠相加，使他们在北大有着较为频繁的联系与互动，由此形成了一个交往圈子。沈尹默曾回忆当年经常聚会的情形：

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48页。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注]

朱偰：《我家的座上客——记父亲朱希祖的交游》，见钱理群等编：《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6—88页。

与罗家伦记忆中的校园公共空间不同，沈尹默笔下所展现的是以周氏兄弟寓所为交往平台的私人宴集，其中的成员是以所谓的“某籍某系”为主，“某籍”即浙籍，“某系”指“国文系”或指“章系”。这批人的另一个宴集中心是朱希祖的寓所，其子朱偰忆及其父任北大教授时交游之广，几达“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境界，高谈阔论者，尽为通儒硕学，形成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社会。民初，朱氏一家居东城吉兆胡同，来往朱家的以章太炎和章门弟子为主，出入最密的是钱玄同（当时还叫钱德潜）、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也曾到朱

家宴集，朱希祖颇礼遇之，却引起朱夫人的疑惧，觉得陈独秀不太像教授，倒有点像绿林好汉，说话时，眉毛一挺，眉宇间有一股杀气，劝丈夫莫与之往来。[注]

在整个五四时代，北大乃是太炎门生的天下，一流教授多曾恭列于章氏门墙。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一朱”的说法，“三沈”即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三兄弟，“二马”即马裕藻（马二）、马叔平（马四）兄弟，“一朱”则是朱希祖（逷先），他们被时人目为把持北大文科的重要势力。不过，浙籍诸人中，在北大文科较有权势的是沈尹默、马裕藻和朱希祖，三人早在蔡元培长校前即入北大，与北大渊源较深。蔡元培改革校政后，三人多次被选为评议员，参与决定校中大事，沈尹默在1917年年底还担任国文门（后为中国文学系）教授会主任及文科研究所国文门主任等要职，而在1920年代，马裕藻和朱希祖分别长期担任国文系和史学系主任，所谓浙人把持国文系的说法即与此相关。其实，何止是北大国文系，作为当事人的沈尹默在日后的回忆中甚至自承：

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注]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14、419页。

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第172页。

《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4—716页。关于北大知识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见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35、40—43页；王璞：《上海知识分子的场域研究（1927—1930）》第1章，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所谓的“我们”里，周氏兄弟在北大校政中的地位其实相当边缘，钱玄同和刘半农虽在《新青年》知识群体中极为活跃，但基本上并不太与闻校政，刘半农还因没有学历，遭胡适等英美派歧视，因而真正最擅弄权、工于心计的恰是沈尹默本人。周作人印象中，沈尹默与马裕藻虽然都居校久、资格老、有势力，但马裕藻为人老实，待人谦恭，又容易被激怒，在评议会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会大声叱咤，而沈尹默“则更沉着有思虑，虽凡事退后，实际上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注]朱偰回忆，在“三沈二马”中，沈尹默虽然是领袖，但好居幕后，不大出来讲话，代表这一集团出面讲话的总是马氏。[注]这与上述周作人的说法颇可相互印证。1922年7月，胡适听取丁文江、秦景阳讲述的北大十年史竟然是沈尹默专权史，才恍然大悟自己因在北大根基尚浅也不

免被沈氏利用，以胡适之精明过人尚且如此，其余衮衮诸公可想而知。[注]需要补充的是，影响北大校政的浙籍人士尚有夏元瑮、马叙伦和汤尔和三位。夏元瑮也在蔡元培长校前即已入北大，担任理科学长多年，蔡元培革新校政，夏元瑮襄助甚力。马叙伦在1915年即入北大文科执教，在学术思想上依违新旧之间，他虽非太炎门生，但在民初与章太炎及其弟子关系密切，多次被选为北大评议员，是五四时代学院风潮中的要角。而与他结拜兄弟的汤尔和虽非北大同人，作为医专校长却有着影响北大乃至北京教育界的能量，1920年代一度出任教育总长。前述蔡元培长校和陈独秀之任学长均与此三人从中运作有关。

关于胡适、陈独秀的关系，参见耿云志：《胡适与陈独秀》，见氏著：《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朱洪：《陈独秀与胡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载《新华文摘》1983年8月，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第189页。

胡适初到北大时的情形，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第146—159页。

陈独秀在音韵学方面的贡献，参见陈独秀：《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

在浙籍教员济济多士的局面下，北大的皖籍人士就显得势单力薄。当时文法科皖籍教员除陈独秀、胡适外，尚有高一涵、刘文典、王星拱、程演生等，此六人皆属《新青年》知识群体，陈独秀、胡适二人更是该群体的灵魂人物。作为安徽同乡，陈独秀与胡适尽管性情不同，五四之后政治立场也渐趋对立，但两人之间私谊甚厚。[注]最初胡适是由陈独秀的引介而入北大，胡适的“暴得大名”，陈独秀提供了关键的契机，两人在蔡元培的鼎力护持下，相互应和，激起文化界的狂波巨澜。意味深长的是，在随后的发展中，陈、胡二人的学院命运却变得迥然异趣。陈独秀当时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和评议会当然评议员，除引进新人、推动改革外，并不从事教学，也不撰写学术论著。刚来北大出任学长时，校中难免有微词，觉得陈氏何德何能俨然凌驾于硕学鸿儒之上，只不过“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是校长蔡元培出面力言陈独秀精通音韵训诂，学有专长，为其护航。为塞众人之口，陈氏的安徽老乡高一涵甚至夸张地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注]胡适初入北大也有类似困扰，虽然他出身美国名校，但年纪轻，国学功底还比不上优秀的学生，所教课程恰又是中国传统学问，因而颇遭同行甚至学生的轻视。前引胡适学生顾颉刚的回忆表明，如果不是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领袖保驾过关，胡适在课堂上都难以立足。[注]毕竟大学是研究学术的机关，如果没有令同行侧目的学术创造，撰写时论获得的俗世声名无论多么巨大，未必有助于在大学里安身立命。有意思的是，陈独秀、胡适对待这样的困境，态度颇为不同。对于出身老革命党的陈独秀来说，尽管他在音韵文

字学上有相当造诣，[注]但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旨在救国的实际政治活动，办《新青年》不过是一种迂回的方式而已，因此，以陈氏的志趣与性格，根本无意于以学术为志业孜孜创造，也罔视校中的种种非议，其个性依然锋芒毕露，直道而行，说话不留情面，这使他在学院里的人际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同在文科共事的梁漱溟回忆：

汪东林：《访梁漱溟答录》（一），载《人物》1986年第1期，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第129页。梁漱溟对陈独秀的类似看法早在1942年撰写的《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即有表述，唯不若访谈之生动，参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331—332页。

蔡元培先生荟萃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注]

进德会甲种会员的戒律是不嫖、不赌、不娶妾。

所谓“平时细行不检”当是指陈独秀以风流放诞的秉性常涉足花街柳巷（八大胡同），由于陈氏是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甲种会员[注]和该会评议员，此种行径不免予人口实，也使持身严正的蔡校长十分难堪。而当陈独秀和《新青年》同人们掀起文学和思想革命的大潮时，新旧冲突也剧烈起来，北大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陈独秀在声名盖世的同时，其疏狂率直的秉性却越发不自检束，不仅得罪于旧派，甚至连新派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感到难以容忍，最终使得倡导兼容并包的蔡元培也爱莫能助。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几位重要的浙籍人士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在汤尔和寓所商议陈独秀的去留问题，其结果是以私德问题为借口，让陈氏体面出局了事，自此，陈独秀与北大的关系渐行渐远。值得深味的是，当初将陈独秀引进北大的也正是这几位浙籍人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90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82页。

顾颉刚遗著，顾潮等校：《顾颉刚自传》（二），载台湾《中外杂志》1995年第47卷第2号，第17页，转引自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2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1页。

陈独秀以文科学长和《新青年》主编之尊，难以在北大立足，显然构成了对新文化运动的伤害，也使皖籍教员更形势孤立，但在蔡元培心中此举或许有着更多的无奈。胡适对其安徽老乡脱离北大一事痛心疾首，故十分看重3月26日夜之会之于北大和《新青年》的意义。时隔16年，在给汤尔和的信中，他还责备汤氏说："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注]陈独秀之脱离北大，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而导致的巨大压力固是起因，但胡适所言沈尹默、马叙伦的从中"捣鬼"[注]也相当重要，顾颉刚即认为陈独秀与老友沈尹默失和，是由于浙籍的沈氏眼看皖籍的陈独秀与胡适合作后，在北大势力日张，因而心生不忿，遂思有以排挤之。[注]不过，平心而论，陈独秀的去职，其个性志趣实有以致之，这正如汤尔和在给胡适的回信中所辩称的："陈君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之事，亦必脱韁而去。"[注]

胡适留美归国之际写给友人的这一诗句（"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颇能道出其一生志趣所在，参见《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2页。

对胡适"讲学"与"议政"两种取向的分析，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章；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第183—190页。

［美］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见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3页。

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页。关于胡适此书在学术上的范式意义，参见［美］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见氏著：《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美］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相形之下，与陈独秀齐名的胡适在北大的处境要顺遂得多，这首先与其自我定位有关，早在留美归国之际，胡适就以"讲学复议政"自任。[注]与陈独秀、李大钊不同，胡适无意于实际的政治活动，他真正的兴趣所寄是讲学与著述，是在学术思想上替中国造不亡之因，而对政治则抱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所谓"议政"也就是借知识分子擅长的言论方式以尽知识者的公共责任。[注]显然，北大提供了胡适

施展天才的最佳舞台，胡适因此也十分感念蔡元培，认为自己年轻时若无蔡先生的着意提携，其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注]胡适初到北大时，担任英文、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功课。面对同行和学生对其国学水准充满怀疑的目光，常常提心吊胆，于是发奋用功，[注]甚至不惜以健康为代价，终于在一年内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写作。蔡元培亲为之序，称赞胡适“心灵手敏”，以中西学兼治的功力在短时期内成就了一部开创性的学术论著。[注]此书在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后，广受欢迎，奠定了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而像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这样的国学造诣最深的北大学生从旧派教授营垒中转向胡适问学求道，则进一步提升了胡适的学界地位。[注]

胡适曾对自己的性格有所自剖，参见《胡适日记全编》（3），第448页。

当然胡适最终能在北大得以立足，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个人的长袖善舞和长于经营。胡适其人心思细密，个性“平正和易”，与陈独秀的浑身豪杰气不同，胡适通体绅士风，且颇能洁身自好。尽管胡适为文常有言辞激烈之处，性格中也很有“率性”的一面，痛恨平庸，[注]待人却亲切温和，凡所聚会，常令座者如沐春风。胡适的绅士风度，林语堂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述：

引自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见胡不归等：《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在女子前献殷诚，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先生的特长。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先生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逊所谓“绅士”的范围。用这种体贴温柔于同辈及少辈，“胡大哥”之名便成了。[注]

［美］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第220页。

关于胡适的乡土观念，参见李敖：《胡适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112—113页。

胡适与高一涵同居的相关史料参见胡适：《致母亲》（1917年10月5日）、《致母亲》（1918年9月14日），见《胡适书信集》（上册），第106—107、191页，以及高一涵：《漫谈胡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第187页。

《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23、40—41页。

《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在这种待人接物的和气中，英年盛名的胡适交游遍天下，“我的朋友胡适之”竟成为人际交往的流行语。不过，唐德刚注意到热闹场中的胡适对其三重身份背景（安徽人、哥大出身和北大成名）十分偏爱，对此存有极深厚的温情主义。[注]有论者进而认为胡适虽交游广阔，但其一生所靠在人际网络上实为安徽同乡、留学生和北大人三大群体，[注]这种说法虽大体成立，却略显笼统。需要补充的是，此处的留学生其实留美居多，如与胡适关系颇为密切的张慰慈、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赵元任、杨杏佛、张奚若、蒋梦麟等，而这三重身份也有交集的部分，如前述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王星拱、程演生既是安徽同乡又为北大同人，相互之间关系十分熟稔。有意思的是，胡适虽留美七年，却保留着甚为浓厚的乡土观念，喜称“我们安徽人”如何如何，梁实秋说胡适很爱攀同乡关系，好像天下之人皆源于安徽，安徽之人皆源于绩溪。[注]上述几位皖籍北大同人中，高一涵、刘文典、王星拱三位虽不能说唯胡适马首是瞻，但大体上皆追随胡适，视其为知识界领袖人物，其中同乡关系无疑起着某种潜在的作用。三人中高一涵与胡适关系最为密切，1917年胡适初到北大时即与高一涵同居一处，直到1923年胡适一家仍与高氏合住在一起。[注]二人的结识是通过胡适的同乡朋友许怡荪之介。高一涵1918年入北大丛书编辑委员会工作，后被聘为法科教授，不过高氏后来因生活放荡（热衷于赌博、逛胡同），学问荒芜，1923年南下养病的胡适写信规劝他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高一涵感激涕零，称之为起死回生之良言。[注]其时（1923年5月），高一涵还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同住在胡家的一院，开明而细心的胡适得知后特别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劝她要善待此女，千万不要看不起人家。[注]

《胡适日记全编》（3），第476—478页。

刘文典：《致胡适》（此信可能写于1922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66页。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37页。

与高一涵精力耗散，学术上尚待努力不同，性情疏懒的刘文典在陈独秀去职后大为用功起来，1921年9月刘文典将耗费其一年多心血整理而成的《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带给胡适，胡阅后大加夸赞，誉之为“不朽之作”，还帮他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为其作序热情推介。[注]尽管如此，刘文典在浙籍势力笼罩的北大文科，其处境并未有太大的改善，他在给胡适的信里抱怨自己在北大背时极了，自1917年入北大，整整五年拿最低薪，而那些不如他的却是最高级薪水，这令他十分难堪。他向胡适表达了求去之心，希望门路广阔的胡适替他想办法另谋职业。[注]这再次显示出虽然胡适个人在北大已有相当地位——他从初入校始，连续高票当选为评议会评议员，并担任英文科教授会主任，一度还被委以教务长之职，其俗世声名更是如日中天——但即便到了五四时代的尾声，北大尚未形成以胡适为领袖的取代浙籍留

日派的学人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同乡观念的胡适并未利用蔡元培的信任，为壮大自身势力，在引介新人时滥入同乡人士，反而颇能把握公私的分际，秉持学术的公心，为北大延揽才学俱佳的留学人员，这些人大多为各省籍的欧美留学生。蔡元培在回忆中也承认："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注]

《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4页。

《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页。

对于胡适来说，无论是讲学还是议政，北大是其主要的凭借，北大同人在胡适眼中因而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他私谊甚厚的陈独秀、陶孟和、高一涵、钱玄同、张慰慈、王星拱、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张奚若、蒋梦麟、李大钊、周作人等，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安徽同乡，都有着或长或短的任职北大的经历，构成其人际交往网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有着"努力做学阀"的自觉意识的胡适，也十分留意拓展《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势力。比如对当时的浙籍教员宋春舫，钱玄同等因见其人颇为碌碌，且戏剧观念与之不合，遂予丑诋。胡适很不同意这种做法，在给钱玄同的信里，他告诫说："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世。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得是一个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即便是《新青年》同人甚为厌恶的北大学生、林纾弟子张厚载，胡适也"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注]以至于性急的钱玄同不但未能体察胡适的良苦用心，反而责怪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注]

以上的叙述表明，尽管地缘因素对五四时代学院知识分子之间交往的影响或许要比我们通常估计的为大，但绝非最重要的因素，师承（太炎弟子与非太炎弟子）、学派，特别是近代的学术出身（中学与西学）、留学经历（法日派与英美派），以及个性志趣和思想立场更能发挥关键的作用，这些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使得五四时期北大知识人的交往世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不过，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的背景下，大体在1920年之前，《新青年》同人或北大新派知识分子尽管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与纷争，但基于相同的启蒙立场，仍能保持联合的姿态以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4．代际合作：《新青年》知识群体与新潮社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1月9日）、《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7年12月），见《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490页、下卷第1355页。

最能体现知识分子基于公谊而相互联合的莫过于北大在蔡元培倡导下兴起的以社团、报刊为凭借的公共活动。在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中，大学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他告诫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不过，蔡元培反对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读书，强调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因而提倡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兼以杜绝学生奔竞游荡的恶习，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为打开局面，蔡元培亲自发起、师生参与的社团就有不少，较著名的如砥砺个人品行的进德会、培养新闻人才的新闻研究会、倡导美育的画法研究会和音乐研究会、引发研究兴趣的学术演讲会等，直接助成的学生社团就更多。以往在北大罕见的社团活动，在蔡元培的大力推动和《新青年》社团的示范作用下，得以蓬勃展开。在五四事件之前，北大成立的社团，除上述提及的以外，教师发起的尚有成美学会、哲学研究会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社团为学生所发起和组织，教师间亦有参与，如哲学会、理科化学演讲会、书法研究社、体育会、音乐会、雄辩会、同学俭学会、消费公社等。正是通过结社的方式，北大师生各自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大为增加，突破了以往基于私谊性质的交往方式，师生的参与热情被调动起来，整个校园变得空前活跃。1917年秋季入学北大的哲学门学生杨晦以亲历者身份回忆当时热闹的情形：

当时的北大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里，大家谁愿意参加都可以自由签名。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特别是到了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与外交上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尖锐化，校内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思想活动更是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之外，还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经常出现各种活动的海报、布告。只要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规模大些的会，一般都在饭厅。开会时，谁要发表意见，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辩难。[注]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第155页。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15—2718页。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他所考虑的思想启蒙的对象是年轻一代，不过，《新青年》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有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展开的最初几年里，出现了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教授中趋新人士多，而学生中反倒守旧者众。[注]以当时十分著名的三大学生社团即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为例，颇能一见当日情形。旧派教授刘师培、黄季刚、陈汉章、黄节、吴梅、林损等在学

术上其实很得不少学生的拥戴。1919年1月，一群围聚在这些教授身边的弟子在刘师培寓所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刊行旨在“倡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月刊》。这份杂志的总编辑是刘师培和黄季刚，特别编辑人选几乎网罗了当时北大的旧派教授，具体编辑事务则全由学生承担。从创刊号上黄季刚撰写的《国故月刊题辞》中不难看出其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微意。㊟

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有关该社的相关史料一并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40页；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许德珩当时与傅斯年是国文系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却不甚相得。许德珩是《国民》杂志三位主编之一（另两位是邓康和黄日葵），他在晚年（1980年始）回忆中将国民杂志社成员的思想取向分为左中右三派：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中派是占近半数的新旧文化调和派，以易克嶷为代表；最后是与调和派势均力敌的激进派，以他自己和黄日葵、张国焘等为代表，主张革命救国，拥护新文化运动。但是，许氏在1958年的回忆中并无此提法，强调的是“写文言文”为《国民》的两大特点之一，许本人当时也是拒用白话文，由此亦可知受旧派影响的成员绝不在少数。由于文白之争乃是新旧之争的一大焦点，因此这段晚年回忆与五四事件之前的《国民》杂志情形不尽相合。有趣的是，许德珩的这一段回忆与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文字如出一辙，参见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为了科学与民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46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成立于1918年10月20日的国民杂志社，由诞生在该年反日请愿示威运动中的“学生救国会”创办，以反帝救国为最高职志，1919年元旦创刊的《国民》杂志因而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倾向。这一学生社团得到蔡元培和李大钊的支持与帮助，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响（五四事件后为多），成员众多（出席成立大会的社员即达80余人，成员总数曾达180余人），以湖南、江西、湖北籍学生为主，重要成员有许德珩、邓康、黄日葵、张国焘、易克嶷、黄建中、周长宪、熊梦飞、陈钟凡、周炳琳、常乃德、段锡朋、高尚德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血气方刚的爱国学子因人多势众，思想比较混杂，对待新旧文化和道德多采调和的态度，对文学革命则颇不以为然，也不满于胡适和陈独秀，因而《国民》杂志上通篇文言文，拒用白话文（五四事件后才用白话）。体现民族主义诉求的“反帝”和“文言文”成为《国民》的两大标识，由此赢得了黄季刚、刘师培乃至章太炎的同情。㊟《国民》也刊登章太炎和“国故月刊社”的黄季刚、刘师培、马叙伦、吴梅等人的文章，除了观念上不无接近的一面，在人事上，这或许也与编辑股干事陈钟凡同时又是《国故月刊》的特别编辑有关。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31—432页。

尽管北大守旧学生众多，但随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狂飙突进，学生群体出现分化，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国文系高材生、黄季刚的得意弟子傅斯年转向《新青年》阵营，当时陈独秀还不敢相信，他问周作人，傅斯年是否来卧底的？[注]傅斯年是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他的转变固然对他身边的同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当时已有一些学生尤其是一帮文科学生被新文化运动所激励，接受了《新青年》的启蒙思想。除傅斯年外，还有罗家伦（英文系）、顾颉刚（哲学系）、徐彦之、潘家洵（英文系）、俞平伯（国文系）、汪敬熙（法科经济系）等，这些北大最优秀的学子常在傅斯年的宿舍里聊天。除了高谈文学革命，他们还想学着《新青年》办一个学生刊物，日后名动天下的“新潮社”就是在这种看似不经意的闲聊中酝酿起来的。傅斯年在追溯《新潮》的缘起时说：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载《新潮》1919年第2卷第1期。

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七年的秋天，子俊（即徐彦之——引者注）和我又谈起这层事。子俊说：“何如竟自尝试一回呢？不成功也没甚么不可以。”[注]

组织社团一事于是进入具体实施的阶段。罗家伦的回忆更为生动，由此亦可窥见当日学生生活之一斑：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见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4页。

那时候学生的物质生活非常朴素简单，可是同学间的学术兴趣，却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图案。我住在校外松公府公寓，孟真住在校内的西斋四号。我早晨到校上课之前，首先要到他房里谈天，他没有起来的时候，我有时掀他棉被，他颇引以为苦，气得大叫。他房间住了四个同学，一个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当时名福鼎），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一个周亚烈，阿弥陀佛地在研究他的佛经（后来他出家在天目山做了方丈）；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孟真，和他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什么配合！可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家还是好朋友。[注]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第238页。

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生了。[注]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载《新潮》1919年第2卷第1期。李小峰的回忆中有一段注文，以据说的口吻记述陈独秀的同意经过一些曲折，主要是傅斯年的180度大转变，让陈独秀怀疑后者是否旧派的间谍，后经胡适作保，才接受傅斯年等的要求。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01页。可以佐证的是，周作人晚年也有类似的回忆。

关于新潮社的基本情况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第40—64页。最详尽的亲历者回忆见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200—242页。相关研究参见李惠惠：《〈新潮〉杂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5年；卢建军：《开启另一种“文本”的阅读空间——以〈新潮〉杂志为例》，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4期；刘心力：《新潮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周作人、毛子水、李小峰、孙伏园等均属新潮社后期核心人员。参见《新潮社历届职员名单》，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第51—52页。

但是学生办杂志通常会面临种种困难，最大的麻烦是经费问题，众人便推能干而又活跃的徐彦之去找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陈氏开始还有些疑心，不敢自信《新青年》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力，不过后来很快就答应：“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意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注]这给怀着尝试心情的学生以莫大的鼓舞，1918年11月19日，傅斯年、罗家伦和徐彦之发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刊行《新潮》杂志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最初成立时成员仅21人，后增至37人，与“国民杂志社”相比，可谓学生中的小众团体。重要成员除上述三位发起人，第一批入社的有顾颉刚、杨振声、毛子水、汪敬熙、康白情、俞平伯、潘家洵、张申府等，后几批入社的有叶圣陶、江绍原、李小峰、郭绍虞、孙伏园、朱自清、冯友兰、周作人等，除周作人为教授，张申府为助教外，大都是北大学生，从籍贯上看，则以山东、江苏和浙江籍为主。[注]核心成员除傅斯年、罗家伦两位灵魂人物外，包括杨振声（编辑部书记）、徐彦之（主任干事）、康白情（干事）、俞平伯（干事部书记）、顾颉刚（编辑）、周作人（第三届主任编辑）、毛子水（编辑）、李小峰（干事）、孙伏园（编辑兼干事）。[注]

俞平伯和朱自清均原籍浙江，但出生都在江苏，正式的籍贯俞平伯写浙江德清，朱自清写浙江绍兴。俞平伯只在德清县城河里泊了一夜船，而在出生地苏州却一住16年，以至于他日后都不知道“苏杭谁是我的故乡呢”，“把故乡掉了”。朱

自清只去过绍兴两回，每回只住一天，出生虽在江苏东海，但长在扬州，喜称自己是扬州人。其实江浙在文化上关联相当密切，不过这种故乡情结倒十分有趣。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朱自清：《我是扬州人》，见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05—309页。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见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3页。

顾颉刚：《回忆新潮社》，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第124页。

这批思想趋新的学生之所以能聚在一起承继《新青年》的启蒙大业，地缘、学缘甚至室友关系首先提供了相互交往的契机。以重要成员而论，傅斯年、徐彦之、杨振声、汪敬熙皆为山东人；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朱自清、[注]周作人都是浙江籍人；而顾颉刚、潘家洵、李小峰、叶圣陶、郭绍虞则是江苏人。当这些莘莘学子远离故土，云集陌生的北京大学时，同乡关系常常会是他们相互接近、认同的重要因素。不过，与乡谊因素相比，同学关系似更重要。“新潮社”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文科学生，当时文科各系学生之间交往颇为密切。傅斯年与罗家伦来自不同省份，在不同的系求学，但在北大自由的选课制度下，常常越系选上相同的课程，两人由此结识。在办《新潮》杂志前，傅斯年和罗家伦常向《新青年》投稿，成为《新青年》的作者，他们常去胡适的寓所，“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两人因此渐成相知的朋友。[注]“新潮社”中同系的也不少，如国文系的傅斯年、杨振声和俞平伯；英文系的罗家伦和潘家洵；哲学系的顾颉刚、谭平山、朱自清、冯友兰、吴康、陈家蔼、何思源。顾颉刚还呼朋引伴地介绍他的中学同学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入社。[注]而宿舍里的群体生活，则使学生之间更易于发展出亲密的交往关系，也便利于集体行动。傅斯年和顾颉刚分属不同的系，但两人是同居一室的室友，他们的宿舍甚至成为性情相投者高谈新思想的聊天室。

不过，最终让这些心高气傲的天之骄子走到一起，组成社团乃是基于相同的志趣。傅斯年特别强调“新潮社”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他在《新潮》杂志创办八个月之时说：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载《新潮》1919年第2卷第1期。

我们同人结合之先，多没有什么交情，若颉刚、子俊和我的关系，原是例外。我们当时集合同志的时候，只凭知识上的一致；虽是我们极好的朋友，而觉悟上有不同时，我们并不为感情而请他。一旦结合之后，大家相敬相谅，团结的很牢，做起事来很有勇气。……所以我敢大胆着说，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因为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相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注]

傅氏的这段话固然过于忽略前述社会学因素（同乡、同系、同学、同室）之于“新潮社”结合的重要性，但也的确道出了这一学生社团超越私谊的对新文化的共同追求，没有这样自觉而热烈的追求，“新潮社”同人显然很难凝聚起来，《新潮》杂志更不可能成为继《新青年》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启蒙刊物。

从代际角度对五四两代知识人的考察，参见［美］维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章。相关研究参见章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代际意识”的萌生及其意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58年5月4日），此文有胡适演讲原音光碟，可穿越岁月的尘埃，一闻胡适绩溪口音的国语，见《胡适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8—249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潮社”的整个运作过程中《新青年》同人和校方的鼎力支持，事实上，这也是《新潮》得以顺利问世的关键。当时除了陈独秀答应学校给予经济支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还分外热心地把图书馆的一间房拨给“新潮社”作为社址，庶务主任李辛白则帮助落实印刷、发行等事宜，确定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发行，由该部附设的印刷局负责杂志的印刷。不仅如此，“新潮社”成立后，与《新青年》同人还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傅斯年和罗家伦邀请胡适担任“新潮社”的顾问，以胡适的声望，他的指导对《新潮》杂志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还曾致函鲁迅，征询他对杂志的意见。正如《新青年》杂志向北大学生开放，寻求学生们的响应一样，《新潮》杂志也渴望得到《新青年》师长们稿件上的帮助，当时在《新潮》上登载文章的有李大钊、胡适、宋春舫、周作人、王星拱、鲁迅等。这些事例充分展现出新知识分子内部师生两代人之间的倾情合作，《新青年》的启蒙事业终于得到了最优秀的一代青年的承继和光大。[注]多年以后，68岁的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发表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还极口称赞《新潮》的这批学生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胡适尤其欣赏徐彦之建议的《新潮》的英文译名“Renaissance”——文艺复兴，它恰好代表了胡适本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构想和定位。[注]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

鲁迅：《致傅斯年》（1919年4月16日），载《新潮》1919年第1卷第5号。鲁迅时年39岁，其思想之激进远非一般青年学子可比，1919年1月16日，尚未在北大兼职的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里抱怨：“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鲁迅：《致许寿裳》，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7页。

如果我们从杂志的主题旨趣来看，更能理解《新青年》与《新潮》之间精神上的“父子关系”。与“国民杂志社”注重实际的救国活动，偏于实行的一面，因而杂志上多为评论现实政治、外交不同，《新潮》关注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艺创作，通过引入西方的新思潮，批评中国近代学术上、社会上的诸种问题，来激发群众对学术的兴味，传播科学思想和新的人生观，从而改变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无人性化生活的悲惨现状。[注]在《新潮》杂志所确立的三大旨趣（即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中，所谓“革新的文词”首先就是指白话文的运用，这与《国民》固执于文言文形成奇特的对比，由此不难看到《新潮》对于《新青年》发起的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热切响应。不过，“父子”之间在“家族相似”的同时，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倾向。大体上，《新潮》比较侧重新知识的引介和文艺作品的创作。鲁迅在回答傅斯年的询问时，就建议《新潮》的纯科学文章不要太多，在讲科学的同时多发点议论，“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它几针”，[注]显然是觉得《新潮》的锋芒还不够。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第238页。

《汪孟邹致胡适》（1919年4月23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0页。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7—53、71—82页。

出乎“新潮社”同人们的意料，《新潮》杂志出版后，大为风行，据罗家伦回忆，第一期“初步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后亚东书局（应为亚东图书馆——引者注）拿去印成合订本又是三千份”，[注]销量直追《新青年》。当时《新潮》的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初刊时，代销处仅限于北大和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及书报摊，外埠则基本上由经销《新青年》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社代理。那时，《新青年》杂志与上海的出版界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与亚东图书馆更是合作无间。亚东老板汪孟邹与陈独秀、胡适既是老乡又是老友，当《新青年》移师北大后，亚东的生意一改以往的萧条，也开始兴旺起来。当时亚东经陈独秀推荐，经理北大出版部的书籍，门类遍及历史、地理、诗词、文字学、曲谱、数学、伦理、哲学、经济、财政、法律等，代售的刊物除《新青年》和《新潮》外，还有《每周评论》《国民》和《北京大学月刊》等，成为北大出版物在上海流通的重要管道。1919年4月，汪孟邹写信给胡适欣喜地说：“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旺盛，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注]胡适和陈独秀也常将自己编著的书籍文稿交由亚东出版，如风行一时的《尝试集》《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等，胡适还介绍《吴虞文录》给亚东印行。[注]民初上海乃是全国的出版中心，启蒙知识分子通过与民间传媒出版业的密切合作，使自身的影响力借助文化市场迅速扩展。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209—210页。

不过，就《新潮》而言，按照李小峰的回忆，当时主要的推销员倒是青年学生，“他们自己看过杂志后，借给同学看，寄给朋友看，送给兄弟姊妹看，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由远及近，从北到南……《新潮》的读者就这样越来越多，遍及全国”。其实这种凭借私人关系滚雪球式的传播只是一种传统的扩散方式而已，李小峰自己也注意到，在《新潮》前期，除少数几个大城市外，由书店代销者很少，而由接受新思潮的个人、学校、报社、图书馆、教育会、学校附设的贩卖部等代销者居多，甚至还有绸缎庄代售的。但李氏的说法也揭示了《新潮》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年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注]

殷海光在论及白话取代文言的影响时，就认为这不止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走出古人的牢笼，它还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人思想的具体作用。新的语言方式使知识分子从远离经验世界转变到接近经验世界，从旧的思想方式转变到新的思想方式，促使他们走出文字筑成的高楼，而落实到人世间。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98—299页。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

关于文学革命影响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美］维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91—96页。

［美］维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02页。

《新青年》和《新潮》杂志如此大受欢迎，除去其所表达的思想革命的内容外，与白话文的倡导和运用有着很大的关系。以白话代替文言，使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汉语书写语言，并不仅仅是表达工具的转变，也不只是白话文之于人们观念世界的重塑，[注]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它所带来的是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关系的一大转变。在传统时代，文言是士大夫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耀眼标识，也是士大夫垄断古典文化的表征，经由帝国政治权力的维护和科举制的推行，文言的权威变得几乎牢不可破。文言区隔了士大夫阶层和普通民众，成为两者之间一道巨大的屏障。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民智，最终却没能撼动这道屏障，个中原因正如胡适所指出的，它仍然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作古文古诗的“我们”。[注]而五四文学革命在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同时，要求知识精英（原来的士大夫阶级）放弃文言，改用白话进行公共甚至私人的书写，从而弥合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巨大裂痕，起到直接沟通和动员民众的作用。这意味着继科举制废除后，士大夫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的进一步丧失，由此激起旧派士人的攻击自属事理之常。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和《新潮》的读者群和支持

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包括大量的中学生和师范生），这批人实为处于知识精英和下层民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这些年轻的阅读公众居住于城镇和都市，文学革命不仅使他们获得了表达青春激情和叛逆的便利工具，更重要的是在白话主导的话语空间里，轻而易举地拥有了以往所没有的平等言说的权利，因此他们对文学革命的狂热追捧，正切合了其自身的需求。[注]同样是学生刊物，使用文言的《国民》便不如白话的《新潮》畅销。十分吊诡的是，当新派知识分子不断提升白话文学的位置，并进而运用白话作为启蒙工具走上街头去启发沉默的大众时，充满精英心态的他们显然没有理会林纾、辜鸿铭这样的文学革命反对者所忧虑的“引车卖浆之流均可用为教授”的可能后果，这正如舒衡哲所言，他们没能预见到那些被启蒙的大众迟早会发起对启蒙者优越地位的挑战。[注]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431页。

随着《新青年》和《新潮》掀起的启蒙大潮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新旧思想和势力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不过这种冲突在北大校内和校外的表现很有些不同。周作人回忆当时北大：“所谓新旧派的论争实在也争不出什么来，新派纯凭文章攻击敌方的据点，不涉及个人，旧派的刘申叔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另一位黄季刚乃专门泼妇式的骂街，特别是在讲堂上尤其大放厥词，这位国学大师的做法实在不足为训。”[注]的确，新旧两派在校内并无话语层面上公开的正面交锋，也许是为了打破这样的岑寂，扩大新文化的影响，1918年3月，钱玄同竟然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上演了一出双簧戏。不过，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下，新旧两派在各行其道的同时，相互之间充满了私下的争斗。当年的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回忆：

杨振声：《回忆五四》，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61页。

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和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注]

关于林蔡之争，详见［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91—99页。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63—289页。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99—100页。

《傅增湘致蔡元培》（1919年3月26日），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第65页。

关于《新青年》群体日后分化的原因及详细经过，参见王璞：《上海知识分子的场域研究（1927—1930）》第1章；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章；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如果说来自校内的新旧之争，还颇能彰显思想自由的景象，且不无有趣，那么，来自校外的冲突则给北大带来巨大的压力。先是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经学教员的前清举人林纾致函蔡元培，严厉批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在公开回函中，并没有去正面反驳林纾的观点，而是将论辩的重点落在捍卫北大学术与思想的自由。[注]有意思的是，憨直的林纾认定古文不当废，却坦承自己不知其所以然，情急之下，这位对古文充满挚爱的桐城派文人竟然孩童般地幻想用影射小说来阻挡文学革命的汹涌潮流。新旧之争无论校内校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旧派并无足以与新派抗衡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的缺席或沉默，导致新文化一路凯歌行进，于是对旧派来说，也只有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了。敏感的《新青年》同人从林纾这些幼稚的小说里警觉到可能来自北洋政府的压力，当时有旧派人士企图游说安福系控制的国会，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并要求解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授，一时京城谣言四起。[注] 1919年3月，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中有“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世员生不无微词”之语，向蔡元培施压。[注]前述陈独秀去职当与北大承受的这种压力有关，尽管北大当时有着相当的独立性，但如果没有后来那场突如其来的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命运究竟如何，恐也难以逆料。[注]

二、

从政团到社团：《改造》派知识群体的凝聚与介入

1．“忏悔中的新生”：研究系和《改造》杂志的创刊

新文化运动以北大为中心迅猛展开以后，很快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力，1919年五四事件的发生，更使得全国形势为之一变，青年学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面对这样的局面，以梁启超为核心的一批知识精英，逐渐从上层政治淡出，通过组织社团、创办报刊等方式，开始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重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不过，他们的参与并非对“五四”的被动适应，而是有其自身基于民初遭受的政治挫败的深层思考。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见《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2599页。

进步党由清末立宪派演变而来，成立于1913年，由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而成。领袖为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其中，梁启超为该党灵魂人物。1916年倒袁成功后，梁启超与汤化龙鉴于党争之害，倡言“不党主义”，决组强固无形之党，进步党遂分化为汤化龙、刘崇佑等的“宪法案研究会”和梁启超、王家襄、林长民、蓝公武等的“宪法研究同志会”，后为在国会里对抗商榷系，两派合并为“宪法研究会”，研究系以此得名。相关内容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谢彬：《民国政党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王觉源：《中国党派史》，台湾正中书局，1983年；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

关于梁启超“中坚阶级论”的分析，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湾食货出版社，1981年，第15—20页。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2—13页。

1921年12月20日，梁启超还在公开演讲中说：“国内有些人，对于我这人根本怀疑，说什么‘研究系阴谋家’，这个头衔我实在不敢承领。”梁启超：《外交软，内政软》，见《梁启超全集》（第1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0页。

《胡适日记全编》（3），第552页。

还在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面对皇权官僚系统崩溃所带来的无序和混乱，梁启超忧虑中国的覆亡，故十分关注宪政民主秩序的建构，而欲达此目的，梁启超当时颇寄希望于中坚阶级的撑持和带动。他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中坚阶级的立国之

道："……在有中坚阶级之国，则以少数之中坚阶级为根干，乃孳衍枝叶，以成多数。斯发育有序，盛美可期。"[注]但是环顾国中，谁能堪此大任？梁启超属意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士大夫阶级，在他看来，这一群体，既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又具备现代的西洋知识，自属当仁不让。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梁启超视孙文的革命党为"乱暴党"，他联合由士绅阶级组成的立宪派，创建"进步党"（包括改名后的"研究系"），[注]直接介入上层政治，试图通过国会里的政党运作，带动军事强人袁世凯、段祺瑞步入宪政的轨道。[注]但梁启超在民初短暂的政治实践除反袁和联段反张勋复辟获得成功外，着着都是失败的记录。在武人政治的叱咤自专下，怀抱治国经世之志，以"国务大臣"自许的梁启超，根本难展长才，他所向往的中坚阶级理想也徒成画饼。特别是在实际的政治博弈中，梁启超和他所属的政党常常有一些牺牲理想屈从于现实政治的权宜之举，这更使得他们的声名受损，一时之间，被人目为阴谋家和阴谋集团。[注]对此，梁启超徒呼负负，抱怨不止。[注]在清季言论界积聚起来的巨大的象征资本，至此流失太半，无怪乎作为旁观者的胡适会感叹：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注]

梁启超公开宣布退出政坛共有三次，分别为：1915年1月20日，在《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声言"……自今往后，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1916年8月，与报馆记者的谈话，表示要献身社会教育；1918年10月，与《申报》记者的谈话。前两次均未果。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华觉明：《进步党与研究系》。华觉明相随汤化龙有年，颇知内情。华文见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附录。

关于梁启超（包括进步党与研究系）与民国政治的研究，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楚永全：《民初建设"强善政府"的尝试——以进步党、研究系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理论与实践为例》，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梁启超说："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故凡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愿加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68页。

事实上，国内政局的腐败纷乱，政坛上的无所作为，早已使敏感的梁启超深以为苦，1913年他就在家书中流露了对政治的厌倦之情，此后又两度向社会宣布退出政坛，从事著述。但直到政坛上的失败已无可挽回后，才得如愿。[注] 1917年11月，"研究系"占主导地位的段内阁倒台，作为该系灵魂的梁启超辞去了上任不足四个月的财政总长之职，结束了他的上层政治生涯，"研究系"的政治势力大为削弱。此时，该系的重要分子聚集在刘崇佑宅中开始检讨民国以来的政治得失，意识

到顽固的北洋派不足与谋宪政，深悔从前与国民党鹬蚌相争之失。汤化龙甚至在《晨报》上发文，对宿敌国民党“多谅解语”，一时引动多方关注。[注]不过，这样的反省仍然停留在上层政治领域的恩怨得失之内。1918年春夏之交，“研究系”在国会选举中惨败，至此，这一政治集团虽仍在政坛上活动，但已被彻底边缘化了。此后，其成员也因群龙无首，形同涣散。[注] 10月，梁启超在与《申报》记者的谈话中公开表示“毅然中止政治生涯”，[注]与梁启超关系较为密切的同人如蓝公武、黄群、张君劢、蹇季常、籍忠寅等也从“研究系”抽身，相率退出了政坛。但退出并非退隐，并非意味着梁启超及其同人真的要与政治绝缘，而是要另寻一条实现民主宪政的新路，这其中隐含了梁启超政治思想与实践的重要转变。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欧行途中》，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3），中华书局，1989年，第39页。

1918年12月，梁启超以民间身份组织“欧洲考察团”，随员六人，涉及各方人才：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外交刘崇杰、经济徐新六、科学丁文江。赴欧前夕，梁启超一行在上海与同人张东荪、黄群（溯初）等“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了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换了一个新生命了”。[注]经此“脱胎换骨”的检讨，梁启超一扫政治挫折带来的阴霾，开始践行民国以来宣布多次的承诺，尤其是欧游归来后，更是思路顿开，信心倍增，准备在思想文化界一显身手。

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3），第53—54页。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3），第90页。

梁启超及其同人的这一转折，固然与他们遭遇的政治挫折密切相关，但他们由此展开的对民国政治的深入反省，反映出对政治的重新理解，这提供了他们再出发的起点。其中，梁启超的思考尤为重要。他在民初提出的“中坚阶级论”，是将中坚阶级发挥主干作用的空间定位在上层政治范围即国会之内，以政党政治为中心。但国事的日非，使他在1915年首次宣布脱离政坛的文章中就已注意到，“政治的基础恒在社会”，而中国之所以江河日下，症结就在于“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界，而社会方面空无人焉”。[注]在此，梁启超将政治与社会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关注点转移到独立于政治的社会空间。他敏锐地意识到“吾侪所栖托之社会，孕乎其间者不知几许大事业，横乎其前者不知几许大希望”，视之为国家依赖之根基。[注] 1916年8月，在他再度表示退出政坛的意愿时，仍然强调社会教育事业作为宪政基础之重要。但他那时仍忙于政坛活动，其所理解的政治还是少数精英之事。

1919年在欧洲的游历和考察，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在《欧游心影录》里梁启超主张全民政治，他将过去20年来的种种失败归于少数人的阶级政治

违背了民主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而无论是进步党（研究系）还是国民党都犯了这样的错误，只依靠少数豪杰，与多数国民不生干系。梁启超说：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中国人之自觉》，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3），第22—23页。

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功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注]

梁启超1919年在欧洲时参与发起“国民外交运动”，相关研究参见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

尽管这种少数精英教化、启蒙和动员多数国民的理念仍然是精英主义的，但其政治运作的实际对象已迥然不同了，并且这一理念也成为他日后倡导“国民运动”的张本。[注]从着眼于上层政治到关注社会空间，从“贤人政治”到“全民政治”，对政治的这种新的理解基本上为梁启超及其同人的转向定下了思想基调。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89页。
《新学会宣言书》，载《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1号。

这一转向所导致的重要举措就是“新学会”的创立和《解放与改造》杂志的刊行。“新学会”是1918年秋，由梁启超与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籍忠寅等人发起的文化团体，宗旨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注]“新学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发行新的刊物，用来表达同人的文化构想和政治理念，这就是1919年9月1日创办于上海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由于梁启超等人出国游历，这份刊物由张东荪和俞颂华负责编辑。刊登于创刊号上的《新学会宣言书》公开否定了过去“进步党”和“研究系”利用现成势力谋求国家革新的政治策略，承认国家的革新并无取巧的捷径，必须经过那条思想革新的大路。而思想革新之道唯有研究世界新思潮新学说。[注]这一思想革新的宣言与前面提及的全民政治的主张构成了他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知识分子仅凭学院和报刊发表言论，即能号令天下，鼓动风潮的时代，实属罕见。传统士大夫只能依附于现实政治权力，得君行道。

上述转变的发生，正值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辐射影响力的时候。这一运动犹如时代的转辙器，其最特殊之处还不在白话文的倡导和思想的革新，而是开拓了

一个独立于现实政治势力的广阔的话语空间。[注]梁启超及其同人的思想转变一方面应和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启蒙，同时借助这一空间，他们致力于文化革新运动，培植新势力，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力图东山再起，重返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张君劢：《与溯初吾兄书》（1920年1月12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6—897页。

以往的研究仍然将这一脱离政坛、路径转向的群体称为“研究系”，只是为区别于政团的研究系而将其命名为文化上的研究系，实际两者活动相当独立，1924年国会解散后，研究系已不复存在。故这种做法颇为牵强，且易致混淆。参见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韩］吴炳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建设构想与实践（1911—1932）》，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欧游途中，梁启超与张君劢、蒋百里等人按照上述这些预想，筹划了归国后的诸项事宜。[注] 1920年3月，梁启超等回国，着手整顿《解放与改造》，刊名为省便故，改为《改造》，“精神则犹前志也”。经过这一系列的反思、检讨、忏悔和谋划，梁启超及其同人从“研究系”中分化出来，以《改造》杂志为中心汇聚起一批热心文化启蒙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与“研究系”有着渊源关系，但1918年以后，其活动已独立于作为政团的“研究系”，为避免混同，本文将其命名为《改造》派知识群体。[注]

上面所述，旨在说明梁启超及其同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创办这一刊物，其背后的转折所涉及的复杂内容又是如何体现了他们的深远关怀和对时局的因应之道。但这批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因缘际会，凝聚成为一个知识群体的，还需要展开更深入的分析。

2. 《改造》杂志的作者群

《改造》杂志是一份同人刊物，主持参与的核心人员为张东荪、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解放与改造》杂志宣言和《改造》发刊词，尽管分别出自张东荪和梁启超，但事先都经过同人的讨论和商定，成为办刊的宗旨。在各种“主义”十分繁盛的五四时代，它提供了一个通过介绍、传播新思潮来革新文化的公共空间，吸引了不少五四青年的参与，他们中的一部分因而成为该群体的成员。这是一个介于文化关怀与政治诉求之间的松散的知识分子团体，它一方面有着自觉的宣言和纲领，同时它又缺乏一个明确的“主义”，它不是一个像“研究系”那样的政治性党团组织，也非纯然的论学群体。这一群体的人员构成自然包括该杂志的撰稿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给该杂志投稿的人士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这需要对作者群进行具体的分析，看看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网络来形构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共同体。

表3-3呈现了《改造》杂志主要撰稿人的基本情况（个别人的概况因岁月的淹埋，迄未找到），通过静态的分析，可对这一作者群的风貌有一基本的了解。

表3-3 《改造》杂志主要撰稿人概况（1919.9—1922.9）

姓 名	生 年	籍 贯	教 育 背 景		任职与经历
			国内	国外	
梁启超（卓如）	1873	广东新会	举人，学海堂，万木草堂	旅居日本	进步党领袖，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
张君劢（嘉森）	1887	江苏嘉定	秀才，翰林院庶吉士，南京高等学校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德国柏林大学	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上海知行学院教授
张东荪（圣心）	1886	浙江钱塘	格致科进士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	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时事新报》总编辑，中国公学教务长、代理校长
蒋方震（百里）	1882	浙江海宁	秀才，浙江求是书院	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	主办《浙江潮》，总统府军事处参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文学研究会发起人，讲学社总干事
蓝公武（志先）	1887	祖籍广东大埔（江苏吴江）	上海震旦学校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留学德国	《国民公报》社长，进步党参议院议员
俞颂华（澹庐）	1893	江苏太仓	复旦公学政治经济系	日本东京法政大学	中国公学教务主任兼教授，《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东方杂志》编辑，《申报月刊》主编
舒新城	1893	湖南溆浦	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		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1923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续表）

姓 名	生 年	籍 贯	教 育 背 景		任职与经历
			国内	国外	
郭虞裳				留学日本	上海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
刘秉麟（南陔）	1892	湖南长沙	北京大学法科	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	中国公学出版部主任，光华大学教授
匡僧					《学灯》主编
吴品今					
彭一湖					
李三无					
陈筑山		贵州		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	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务长、代理校长，中华教育促进会乡村教育部主任
丁文江（在君）	1887	江苏泰兴	进士（游学考）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学士	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
徐志摩	1897	浙江海宁	北京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剑桥大学	执教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中央大学，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
刘延陵	1898	安徽旌德（移居江苏泰兴）	复旦公学		任教中国公学中学部
沈雁冰（茅盾）	1896	浙江桐乡	北京大学预科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小说月报》主编，文学研究会发起人
郑振铎（西谛）	1898	祖籍福建长乐（浙江永嘉）	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		《新社会》旬刊主编，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学灯》主编，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林志钧（宰平）	1881	福建闽县	附生	日本法政大学	外务部科员，外交部科长，进步党外交科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
吴统续					
陈霆锐	1890	江苏吴县		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	律师，执教东吴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教授

▼（续表）

姓 名	生 年	籍 贯	教 育 背 景		任职与经历
			国内	国外	
金侣琴（国宝）					执教中国公学
周佛海	1897	湖南沅陵		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夏元瑮				留学德国	北大教授、理科学长

说明：上表的撰稿人大体上仅包括撰稿三篇以上的作者（不包括译述和附录中的作者）。个别如林志钧、陈霆锐虽不合这一标准，但因与核心成员关系较为重要，故一并划入。

资料来源：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王明根主编：《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李娟丽等：《军学奇才——蒋百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

分析表3-3，可以看出几个颇为有趣的现象：

首先，从主要撰稿人的年龄结构来看，其分布相当有规律，大体呈金字塔形。高居顶端的是梁启超，他作为晚清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清季言论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感染了无数青年的心灵。进入五四之后，随着第二代启蒙者的崛起，梁启超的言论不再能左右年轻一代的视听了，但他努力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追踪时代的脚步，又不失一己的独立思考，故仍能引动人们的一些关注。位居中间的是出生于1880年代的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蓝公武、丁文江、林志钧等六人，他们与作为最后一代士大夫的梁启超不同，都有留学背景，接受过完整的近代知识训练，同时又拥有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是他们相同的人生记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与梁启超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其中，既有在昔日的“研究系”中追随梁启超的张君劢、林志钧、蓝公武，也有与梁启超情兼师友的张东荪、蒋百里、丁文江，在他们身上似乎传递了梁启超那种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情怀。余下的撰稿人中有九人出生于1890年代，另外的九人，他们的生年虽尚付阙如，但其中郭虞裳、金侣琴是俞颂华留日同学和朋友，年龄当在伯仲之间，其余恐亦相去不远。问题的关键尚不在此，相比于1880年代出生的撰稿人，这批更年轻的作者除

个别人如徐志摩外，在整体上与梁启超的关系较为疏远，撰稿的数量也远不能与前两个层次的撰稿人相比，但基本上，他们是受五四大潮洗礼的一代青年。从总体上看，这种年龄结构反映出梁启超及其同人试图通过思想文化上的努力吸纳新生力量的明显倾向。

参见［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和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参见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见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主编：《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从作者群的出生籍贯来看，其地理分布比较集中于江浙地区，人数多达十人，尚不包括移居江苏的刘延陵。其余，湖南为三人，闽粤地区按祖籍四人，安徽、贵州各一人。如从撰稿数量衡断，也以出生江浙地区的作者占据优势。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着眼，基于地缘因素的同乡关系有着无须明言的重要性，美国汉学家顾德曼研究了同乡观念与组织在上海移民城市近代变迁中的复杂功能，显示出这一传统因素在近代民族认同、国家建构以及民众运动中的建构作用。[注]不过，在有着超越性关怀的知识分子身上，同乡关系的作用未必表现得如此明显，但观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浙籍和皖籍势力的消长，可知其对知识群体的建构作用不可低估。就《改造》杂志所处的上海都市空间背景而论，江浙文化与其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注]故而在作者群中江浙籍知识分子占据多数，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文化现象。如果考虑到北大与《新青年》中江浙籍知识分子的势力，可知这也并非纯然是一种地域现象，它显示出五四启蒙运动中江浙籍知识分子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有关清廷罢科举后，学部组织游学毕业考一事，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章；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章。

从撰稿人所受教育的背景来看，1870和1880年代出生的作者一般在国内受传统教育更多一点，而1890年代出生的作者大都接受过国内的新式教育，尽管所入学校五花八门。值得注意的是，前者中不少还具有传统的功名，如梁启超、蒋方震、林志钧、张君劢、张东荪、丁文江。有趣的是，如果说前三位是正途出身，那么后三位则是在清廷废科举之后，通过学部组织的游学毕业考而得到的功名奖励（张君劢在1902年中秀才除外）。[注]想想这三位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清廷覆灭前夕留学回国，荣归故里后又如传统士人一般匆匆赴京赶考的情景，颇堪玩味。这似乎细微地显明了知识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再从各人的留学背景来考察，他们大多具有留学国外的经历，其中以留学日本为多，有十人，有留美经历的三人，留英三人，留德二人。对近代知识分子来说，在群体网络的建构中，学缘的因素其实要比地缘因素更为重要，相同的学校，一样的师承，类似的知识背景，同样的留学经历，往往成为知识分子相互认同的基础之一。需要提及的是，就《改造》派知识群

体来说，共同的留学经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本上，该群体的主要成员都是在留日时期相互结识并成为莫逆之交的（分析详下）。以往的研究常常将不同的留学经历给予知识分子的不同影响化约为法日型和英美型，前者思想激进，如鲁迅；后者温和，倾向自由主义，如胡适。其实看看梁启超及其同人在五四时期文化和政治理念的稳健、温和，便可知这种两分法会遮蔽不少的历史面相。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03页。

从作者群的任职与经历来看，出生于1870年代和1880年代的撰稿人其任职与经历常兼跨政界、学界、传媒出版界，个别乃至军界、实业界，而出生于1890年代的作者则一般在学界、传媒出版界，即通常所称的文化界任职或活动。这是一个有趣的对照，说明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梁启超及其同人身上有着更多的传统士大夫的特色。按照罗志田的分析，近代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议政与参政，前者的议而不参是建立在政治与学术（文化）判然二分的现代理念之上，而后者并无这样的二分意识，政治与文化或学术是相互贯通牵连的，犹如修身（道德）与经世（政治）密不可分一样。因此，他们会十分重视政治践履，既议政又参政，[注]而政治挫折之后的所谓“退出”，常常只是一种迂回之策而已。相形之下，1890年代的作者倒更多一点专业精神，尽管也不无改造社会的宏愿。

3．交往网络与知识群体的重构

近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并非仅仅如传统宗族那样经由血缘关系自然生长起来，而更多的是通过近代的知识教育体制（学院、研究机构）、传媒出版系统（报刊、书局）得以人为建构。上面的分析表明，仅仅是静态的考察，只能了解作者群外部的一般情形，要界定《改造》派知识群体成员的实际构成，还必须深入到这一群体的内部，具体分析他们是如何借助于各种关系网络汇聚起来的。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尽管不是主要的建构因素，但也以潜在的形式镶嵌到近代以学院、社团和传媒为中心勾连起来的人际网络中，共同参与了群体的塑造。

俞颂华：《论梁启超——谈谈我对于他的认识》，见《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

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33、236页。

大体上，《改造》杂志作者群体一开始由三个亚群体构成，分别为梁启超及其同人，张东荪、张君劢在江浙发展起来的关系网络以及郑振铎、茅盾的“文学团体”。其中，梁启超及其同人居于群体的核心，“二张”的江浙网络居于群体的外围，而郑振铎、茅盾的文学团体则最居边缘。在整个群体中，梁启超最为年长，五

四时期他的影响力虽已大不如前，但魅力犹存。1946年，俞颂华在回忆梁启超时，以一种充满敬意的口吻谈及学生时代如何受惠于任公富有魔力的文字。1920年，他两次拜见了欧游归国的梁启超，大约是过于敬仰的原因，竟至无话可说。[注]徐志摩也在1918、1919年的日记中表达了对任公文章的叹服。[注]可以说，作为一个魅力型人物，梁启超是这一群体的精神象征。由于他在国内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积聚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因此他也成为这一群体重要事业的筹划者。

唐纯良、文继乐：《蓝公武传略》，载《北方论丛》1987年第1期。
参见陶菊隐：《蒋百里传》。
梁启超：《蒋母杨太夫人墓志铭》，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4上）。

梁启超的同人主要指张君劢、蒋百里、张东荪、蓝公武、林志钧、丁文江等人，他们与任公的关系非比寻常。其中以张君劢、蒋百里与任公的私交最深。1906年，张君劢东渡扶桑，留学期间，投稿于《新民丛报》，任公叹其才，收为骨干。此后，张君劢热心参与梁启超的宪政活动，组织“政闻社”、联络袁世凯、参加“进步党”活动等，不一而足。张东荪和蓝公武也是在留学日本时，通过张君劢的关系，拜识了梁启超。张（东荪）、蓝二人为私塾同学，又同入日本东京帝大习哲学，1906年，同创《教育杂志》鼓吹新思想，私交极厚。[注]追随梁启超后，蓝公武成为“进步党”和“研究系”重要人物，1917年主持该系机关报《国民公报》笔政。张东荪虽未参加具体的政治活动，但是梁启超报刊言论的重要撰述人。蒋百里与任公的关系也极为特殊。蒋百里是梁启超最欣赏的高足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学业极为优秀。两人能入士官，皆有赖任公的相助。蔡锷死后，梁启超顿失宪政事业的重要倚赖，一度寄望于蒋氏，重新培植西南势力，后因时局的波诡云谲而未果。[注]蒋百里是军界奇才，任公办报纸，凡有关军事的文章，一般都由他执笔。蒋百里虽为武人，但对思想文化兴会淋漓，1920年，欧游回国后，他与任公、张东荪一起主持《改造》杂志的整顿与编辑。蒋百里撰《欧洲文艺复兴史》，任公为之序，下笔不自休，洋洋五万余言，遂独立成《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之序，一时传为士林佳话。梁启超说他与蒋百里“交逾二十年，居同学，出同游，天下事则同患难”，[注]视之为知己。林志钧也是“进步党”“研究系”的重要人员。丁文江则是经徐新六的介绍，结识梁启超，1918年年底成为梁启超欧游六随员之一。

这三人与梁启超之密切关系，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64—271页。
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

以上诸人都以晚辈身份对梁任公执弟子礼，实则情兼师友。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晚年的思想颇受这些同人的影响，他本人也不以思想领袖的身份对待这些年轻一辈的同人。依据前面的论述，《改造》杂志的创办以及背后的思想转变基本上是

梁启超与同人共同反思的结果。就《改造》派知识群体来说，除梁启超外，张君劢、张东荪和蒋百里又是其中最核心的成员。[注] 1918年，年少的徐志摩因内兄张君劢的引介正式拜梁启超为师，也成为该群体的一员，他与蒋百里又是亲戚关系，血缘因素在参与群体建构中的效用约略可见。[注]不过，徐志摩纯然一文艺青年，并不与闻梁启超的政治活动。

俞颂华：《论张东荪》，见《俞颂华文集》。
钱梅先：《纪念颂华》，见《俞颂华文集》。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5—196页。

从《改造》派核心成员的空间分布来看，当时梁启超主要在北方京津地区活动，而张东荪和张君劢则主要在江浙地区以上海为中心发展出各自的人际网络，他们与上海地方社会的关系相当密切。张东荪在1919年梁启超等赴欧游历时，独立主持《解放与改造》杂志的创办与编辑，那时他还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辑之职，任公归国后不久，张东荪又主持中国公学。他邀请俞颂华参加主编《解放与改造》，据俞颂华回忆，他是在1919年春认识张东荪的。[注]俞颂华在上海文化界也人脉甚广，因此，为杂志积极撰稿的人士中有不少是张东荪、俞颂华二人的朋友，如郭虞裳、刘秉麟、匡僧、柯一岑、刘延陵等。[注]梁启超回国后，杂志改刊，作者面貌有明显的变动。这批人中有六位在中国公学执教（除张东荪、俞颂华外，还包括郭虞裳、刘秉麟、刘延陵、金侣琴），考虑到这所学校乃是梁启超及其同人刻意经营的人才培育基地，这些人在群体中的重要性可以想见。据周佛海自述，他是因《解放与改造》给的稿费较为丰厚，故经常投稿，补贴家用，由此结识了张东荪，还参加“共学社”的翻译。[注] 1919—1920年间，张东荪因为谈论社会主义，与上海的一些左翼分子如沈玄庐、李汉俊、邵力子、戴季陶、茅盾，包括周佛海等相识，但当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张东荪、戴季陶退出，[注]而周佛海也很快就脱离了该杂志。

关于江苏省教育会，参见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章。
［韩］吴炳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建设构想与实践（1911—1932）》，第51—53页。
郑大华：《张君劢传》，第113—114页。
王世瑛遗稿：《张君劢年谱》，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年。

张君劢1922年回国后，先是担任中国公学大学筹备主任，后又出掌自治学院。不过在这背后，根据吴炳守的研究，张君劢与当时颇有影响的江苏省教育会关系相当密切。该会为民间性的教育社团，主其事者是以张謇、黄炎培、袁希涛为代表的一批江苏士绅，[注]他们参与了自治学院的创办与筹划，还担任了学院董事会董事。张謇、史量才还给予财力支持。自治学院的创办宗旨乃是为了培养自治人才，民初地方自治潮流显然构成其诞生的重要背景。张君劢主持学院期间聘请了不少饱学之士作为教员，如瞿世英、郭梦良、胡善恒、陈伯庄、范锜、张尔田（张东荪之兄）、张东荪、罗文干、陈霆锐、刘英士、潘光旦、吴经熊、闻一多等。[注]其中，除张东荪为《改造》派核心成员外，陈霆锐则与张君劢关系较深，倾心于政治活动，瞿世英、郭梦良、胡善恒、罗文干则为张君劢的挚友。张君劢凭借这些人际资源，归国后对地方政治表现出相当的热心。1922年3月，张君劢参加吴淞商埠局筹备市政，5月与沈恩孚同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当时主任为袁希涛。也是在这个月，张君劢参加了在上海总商会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该会是以当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为背景，主张制定联邦制的全国宪法。张君劢受委托起草《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甲、乙两种，颇受时人推崇。[注] 1923年，张君劢在日记中还记有："与东荪、筑山、霆锐、振铎等十余人商量办一理想杂志，以唯心史观为中心概念，待各方响应者多，再提起组党问题。东荪为主干，六几为编辑。欲为吾国思想界，成一种新分野。"[注]不过，此事在当时并未实现。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320—327页。

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5、31、38、39、43、51、62页。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100页；钱梅先：《纪念颂华》，见《俞颂华文集》。

最居群体边缘的是郑振铎、茅盾的"文学团体"。在《解放与改造》的撰稿人中，这两人是相当活跃的，所作文字多为文学，也有译述，还包括一些关注社会的思想性文章。1919年11月，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一起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旬刊，讨论社会改造、妇女解放、知识分子前途和劳动问题等，[注]宗旨与《解放与改造》相近，因此除许地山外，都向后者投过稿。诸人中，郑振铎与梁启超同人圈里的核心人物均有交往，他和张东荪常有书信往还，讨论甚热。1921年7月，郑振铎接替李石岑担任《学灯》主编。1920年，蒋百里介绍郑振铎拜访正在北京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辑主任高梦旦，接洽出版文学杂志事宜。而郑振铎的女友王世瑛后来又成为张君劢的妻子。[注]这群文学青年大都与俞颂华相识，其中瞿秋白在1920年10月与俞颂华一起作为《晨报》特派记者赴苏采访。[注]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48—149页。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84—185页。

茅盾因常向《学灯》投稿而结识张东荪，张东荪约他给《解放与改造》写文章，因同在上海，过从渐多。[注] 1920年12月，郑振铎与茅盾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中有蒋百里，蒋百里与茅盾同为浙江人，茅盾在北大读预科时，因同乡关系拜见过蒋百里，有一面之雅。[注]此外，耿济之、瞿世英也名列发起人之中。这批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给《改造》派知识群体增添过不少声色，但终因道不相同，与梁启超及其同人的关系亦浅，以至渐行渐远。1920年改刊后，这批人在《改造》杂志上也没有以往活跃。因此，最终《改造》派知识群体主要是由前两个亚群体所构成的。

4．介入五四：文化空间的营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62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6—898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9页。

1918年5月5日，对政治意兴阑珊的梁启超在给籍亮侪的信中，这样表达他对国事的态度：“最欲郑重相告语者，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并向他描绘了自己起居生活的巨大变化：“吾比来有一事，当令公等大惊。吾每日晨六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每日著书能成二千言以上，三四月后当有以餍公心目也。”5月7日，他在复蹇季常的信中也说：“自公之行，吾邈然几与世隔绝，严戒阍者，毋为客通。”[注]单从这些信中看，梁启超似乎已息交绝游，一心闭户著书。其实比《新青年》诸公更具士大夫意识的梁任公，固然绝意于上层政治，但又何能忘怀于家国天下？欧游期间，他与同人已大体商定了回国后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所欲展开的各种计划，这包括组织社团、整顿刊物、承办学院、经营实业等。对梁启超执弟子礼的张君劢担心梁启超回国后手忙脚乱，不计轻重缓急，还特别写信给黄群对这些计划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注]其背后的宗旨则如梁启超所言在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梁启超视此为《改造》派知识群体今后之公共祈向。[注]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59—860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60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59页。

其实在欧游之前，《改造》派同人就已经积极介入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12日，张君劢致信梁启超，谈及发起“松社”的目的和功用，力赞唐规严主张“松社”当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且以此为讲学之业的构想，并提出“松社”的具体办法：“一、既为修养团体，无取发表于外。二、人数极少，仅以平日

能相信者为限，合军人政客于一堂。三、一星期请先生来京一二次，就人心风俗处讲演一二小时。四、标修数事，为身心之修养……”[注]他在另一封给梁启超的信里强调说：“松社事为一种精神结合，非日日以精神相磨砺，万无益处……”[注]张君劢与唐规严一样以曾国藩之业期待退出政坛的梁启超卷土重来，而“松社”则为集结核心同志的隐秘团体。张君劢以舍我其谁的精英心态发问道：“今日提倡风气舍吾党外，更有何人？盖政治固不可为，社会事业亦谓为不可为，可也？”[注]七八月间，梁启超致书陈叔通，商量“松社”具体开会日期，其时“松社”章程业已订立。不过从后来的情形看，“松社”似乎并未成为张君劢所畅想的文化组织，只是一个设立在上海的搜购图籍的机构。

如果说发起“松社”的计划尚不足以显示《改造》派同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参与，那么同人所掌控的报刊媒体的改版与转向，则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介入之深与响应之切。在梁启超欧游归国之前，当时基本上由《改造》派同人主持或与其关系密切的报刊，在北方是北京的《国民公报》和《晨报》，南方则为上海的《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

转引自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136页。

转引自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135页。

胡适：《致蓝之先书》，见《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关于《国民公报》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详情，参考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5章；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85—286页。

关于《晨报》参与五四运动的详情，参见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207—212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86—287、230—234页；钱晓文：《北京〈晨报〉研究》，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张芹：《〈晨报〉副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创刊于清末的《国民公报》原是立宪派的报纸，进入民国后成为“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1917年7月，蓝公武接任社长一职后，《国民公报》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相当活跃。从1918年开始，该报不仅使用白话文，极为赞同五四文学革命，而且蓝公武还与胡适、傅斯年等北大新派知识分子就各种思想文化问题（如戏剧问题、贞操问题、拼音文字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等）展开公开讨论。1919年1月，《国民公报》上的广告声称“力图顺应世界潮流，将内容大加改良……以期促进政治之改进，谋思想之革新”。[注]在致胡适的信里，蓝公武称赞《新青年》同人“在这几年中，就这新青年诸君，猛力进行，没有好久，居然有许多赞成的反

对的，令一般人把诸君所说的话，都成了一个问题研究，这真是诸君开拓思想界的大功，吾是愿以无限的同情来祝愿诸公的”。[注]《国民公报》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很快使得胡适、傅斯年等将其引为同道。1919年1月24日，胡适致信蓝公武，信中说道：“到京后，高一涵先生告诉我说贵报（《国民公报》）近来极力赞成我们的主张……我看了先生的白话文章，心里非常喜欢，新文学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注]两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呼应与联合，虽因《国民公报》于1919年10月遭封杀而受挫，但在另一份声名卓著的报纸——《晨报》上获得了继续拓展的空间。《晨报》是“进步党—研究系”极有影响力的大报，由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创办于1916年8月15日，原称《晨钟报》。1918年9月遭安福系封禁，同年12月改名《晨报》复出，由蒲殿俊出任社长，李大钊因与研究系渊源较深，且此前担任过《晨钟报》主编，故也参与编辑。1919年2月，《晨报》第七版副刊改版，增设“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专栏，意在介绍和传播“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晨报》副刊在新文化运动中更具影响力，尤其是李大钊的介入，使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更为密切。虽说《晨报》副刊有明显的“研究系”背景，但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公共论坛。在副刊上发表文章的除李大钊外，尚有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彭一湖、陈独秀、费觉天、郭梦良、蒋梦麟、吴品今、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新青年》同人中的领袖人物活跃其间。1921年10月12日，副刊改为四开四版，单独出版，名为《晨报副镌》，由孙伏园任主编，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更是后来居上。值得一提的是，《晨报》不仅对新文化运动贡献甚大，对五四政治运动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长民那篇揭示中国外交危机的重要文章即刊载于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五四事件的发生与《晨报》对山东问题的连续报道显然不无关系。学潮掀起后，《晨报》又做了详细的追踪报道，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因而，“研究系”虽声名狼藉，但《晨报》在学界却颇受欢迎。[注]

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164—165页。

《时事新报》创办于1911年5月，由两个宣传维新派思想的小报合并而成，黄群、张君劢、张东荪先后主其事。关于《时事新报》及副刊《学灯》介入新文化运动的详情，参考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6章；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89—291页。

《国民公报》与《晨报》因办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城市北京，直接受到《新青年》掀起的思想风暴的冲击，对新思潮的反应相当敏捷。而张东荪在上海主持的《时事新报》一开始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应显得相对迟缓，报纸上仍然充斥了怪力乱神和海外奇谈之类取悦于都市小市民的文章。这倒不是由于张东荪头脑迟钝，而是当时为了维持报纸的销路迫不得已采取的举措。[注] 1918年3月，在《时事新报》设立《学灯》副刊后，情形大为改观，《学灯》开始讨论新思潮、新文艺。先后主持

《学灯》副刊的有宗白华、郭虞裳、李石岑、郑振铎等人。《学灯》在五四时期不仅以宣传新文艺引人瞩目，并且也因与《新青年》展开“社会主义讨论”等新思潮论争而名噪一时，很快成为与《晨报》副刊齐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注]与《晨报》不同的是，《时事新报》直接受《改造》派同人控制，成为同人在上海的重要言论机关。

丁文汇、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0页。
丁文汇、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4页。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欧游归来抵达上海，“诸友来迎者颇众”。当时梁启超住在老友张元济家中，与陈叔通、张东荪、黄群等同人屡作深谈。在留沪的十余日里，梁启超还应张謇之邀，到南通小住了数日。如果说出游前的梁启超显得不无消极，欧游归来后，他变得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在中国公学的演说中，梁启超兴奋地说：“此次游欧……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注]他在给爱女的信中甚至考虑南下居住：“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注]

依据前述欧游期间的筹划，梁启超及其同人着手创办各项文化与教育事业，以此聚集同志，养育人才，变化风气，再造民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共学社”和“讲学社”两个学会组织，云集了文化界诸多名流。较早创立的是共学社，时间约在1920年4月，社址设于北京石达子庙。核心成员以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改造》派同人为主，成员还包括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张謇、蓝公武、舒新城、吴统续、叶叔衡等，发起人除四位核心成员外，尚有蓝公武、丁文江、蹇念益、梁善济、籍忠寅、王敬芳、赵元任、张謇、蔡元培、蒋梦麟、张元济、刘恒等。除《改造》派知识分子外，参与者中不少为当时学界、出版界乃至实业界的重要人物，如蔡元培、蒋梦麟便是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元济、高梦旦则是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而张謇、刘恒、王敬芳则为实业界的要角。就政治倾向而言，除蔡元培、蒋梦麟、丁文江、赵元任等外，大都曾为“进步党”和“研究系”成员或属于清末的立宪派。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28页。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1页。
参见子冶：《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见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95—511页。
关于商务印书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参见周武：《商务印书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章；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

与事业》，张人凤、邹振环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3—171页；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章；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章；刘曾兆：《清末民初的商务印书馆——以编译所为中心之研究（1902—1932）》，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陈永忠：《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出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章第3节。

有关共学社的详情，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55—158页；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84—88页。

共学社的活动主要为编译书籍，意在输入西洋文化，成就及影响最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1920年4月10日，张元济致函梁启超一口答应其增资要求："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敝处拟岁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画，属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注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行了卷帙甚巨的"共学社丛书"，内容涵盖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传记、史学、俄罗斯文学等十项，出版总计不下百余种，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梁启超与张元济相交已久，两人是光绪乙丑（1889年）乡试同年，交往则始于1895年。在维新时代，两人书札不断，相知尤深。民初，尤其是梁启超退出政坛后，他与张元济的关系更为密切。1918年4月梁启超被选举为商务印书馆新一届的董事，注他的不少论著都由商务印行，其文字在商务刊物上发表，按千字20元的最高额付酬，当时胡适的文稿也只有千字4元，注可见梁启超与商务关系之深。当然，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撇开私人情谊，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冲击下，也亟待改变出版策略与方向，以适应新的思想气候，而借重任公的声望，不过是其中的举措之一。当时，商务不仅与《改造》派知识群体密切合作，还力邀北京大学的新派知识分子加盟商务的出版事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广被，商务之功未必在北大之下。注按照张朋园的研究，共学社还有几项较重要的活动，除选派留学生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松坡图书馆为公共空间，鼓励士人增进学问，传播知识。1916年，梁启超为纪念病逝的蔡松坡，在上海创办松社（前文已述）。共学社成立后，松社迁往北京，改名松坡图书馆，梁启超自任馆长，下设编辑、总务两部，蒋百里负责编辑部，蹇念益主持总务部。编辑部下设有干事等职，先后任职的有徐志摩、陈博生、林志钧、蒋复璁、杨维新等人，皆与梁启超有很深的私谊。共学社以松坡图书馆为活动空间，并附有读书俱乐部，由丁文江、梁启勋担任干事。该图书馆还设有招待所，在上海活动的《改造》派同人如"二张"等每到北京来，便暂寓于此。另外，松坡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不仅图书人人都可借阅，而且还可兼作民间社团活动的场所。《改造》同人试图以此为中心在北方吸引士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不过，松坡图书馆缺乏固定的经费，仅靠士人的捐赠，因此维持起来相当不易。注

梁启超：《讲学社规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本），转引自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66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19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0页。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59页。

如果说共学社以译书为主，重在以书籍的形式生产和流播西方知识，那么讲学社的创办，则是通过广邀世界知名学者，引进近代新知，促进新思潮的深入展开，同时也借此进一步提升《改造》派知识群体在知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讲学社成立于1920年9月间，梁启超手订《讲学社规约》共六条，首条言及该社宗旨："本社团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定每年延聘世界专门学者来华巡回讲演。"[注]讲学社设有董事会筹划社务，其中成员多为政学两界名流。9月5日，梁启超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讲学社董事暂举定以下诸人，伯唐、孑民、亮俦、秉三、仲任、任公、静生、梦麟、搏沙、陈小庄（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尚拟邀范孙、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乐就也。"[注] 9月10日，梁再次致函张东荪说："《讲学社规约》及董事名单寄上，请登报。第二年所聘之人，已由董事会决议为倭伊铿矣。郭、黄二君本皆在董事会之列，或前书忘列其名耶？"[注]郭、黄二人即为郭秉文和黄炎培，郭秉文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黄炎培则为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会长为张謇）、中华职业教育社议事员会办事主任。张朋园据罗素自传中的相关资料认为董事会约由20人组成，除上列提及的人员外，尚有胡汝麟、林长民、沈恩孚三人。[注]从董事会成员名单看，《改造》派知识群体的人际资源相当丰厚。如蔡元培、蒋梦麟、范源濂、陈小庄、金仲蕃（邦正）、张伯苓、严修（范孙）、郭秉文、黄炎培等教育界重量级人物几乎被一网收尽，而王敬芳（搏沙）、张謇则为兼跨教育、实业两界的人物。汪大燮（伯唐）、王宠惠（亮俦）、熊希龄（秉三）、林长民、张一麐（仲任）又是政界活跃分子。这些人大都与梁启超有着很深的私谊。在经费上，作为民间组织的讲学社得到公、私两方面的支持。先是北京政府教育部每年资助两万元，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则每年拿出五千元捐助。

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68—69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13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17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18页。

关于讲学社的详情，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59—161页；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66—83页。

讲学社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按照规约，讲学社每年邀请一位国外名哲来华讲学。尽管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先后只请了四位学者来华，但其受欢迎的程度和对学界造成的思想冲击都是十分罕见的。第一位聘请的学者是美国哲学家杜威，不过杜威1919年4月即已来华，并且最早敦聘杜威的是北大，主其事者为胡适、陶行知和郭秉文。《改造》派同人对杜威来华一事表现得极为热心，其程度不亚于胡适等北大新派知识分子，《学灯》对杜威的介绍可谓不遗余力。当时由于发生五四学潮，影响到杜威讲学的经费问题，[注]第二年，讲学社出面续聘了杜威。由于杜威在华的巨大声望，在其讲学一事上，北大胡适派学人群与《改造》派同人之间的关系，既可以说是密切合作，同时也未尝不是对外来资源的一种争夺。第二位受聘的学者是声名卓著的英国大哲罗素。1920年7月30日，梁启超致函梁伯祥、黄溯初商量罗素讲学一事："两月前搏沙偕傅佩青来津，曾议聘英国哲学家罗素来演讲，当时即发电往罗氏，复电十月间可到……顷函商聘请人用何名义，弟复书谓用中国公学名最好，或加入新学、尚志两会亦可，此为同人共同提倡之事，经费能稍分担更好。"[注]搏沙即王敬芳，时为中国公学校长、河南福中煤矿公司总经理，他是清末的立宪派领袖之一，又是民初进步党成员，与梁启超关系很深。傅佩青即傅铜，梁启超信中提及的写给罗素的邀请函就出自他的手笔。当时傅铜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但与梁启超及其同人往来较多。8月8日，罗素来华事已约定，徐新六写信给任公推荐傅铜陪伴在华讲学的罗素，并告诉梁启超傅与胡适诸人不太相得的传闻。同时又建议："六以为钧座宜作一函……与蔡孑民、胡适之、蒋梦麟、陶孟和、王亮畴、梁伯强、王搏沙、胡石青、叶叔衡、蒋百里及六，函寄伯强先生……以罗氏应招来华属为帮忙，伯强先生即可招集各人，共商办法……"[注]无独有偶，也在同一天，傅铜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希望罗素讲学聘请者的人数或团体数，多多益善，学校、报馆甚至工商界之人物与团体都可以，并提出翻译罗素丛书，要任公斟酌。[注]当时讲学社尚未成立，在力邀罗素访华一事上，大体由中国公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北京大学商定，其中前三个机构为《改造》同人所掌控，讲学社成立后即由该社主办。但从上述往来书信看，在罗素访华过程中，也同样体现出知识界相互合作的风气。不过，与杜威访华其弟子胡适扮演耀眼角色不同，罗素讲学主要由梁启超及其同人负责，同人对此倾注了很大的心力，我们可以在同人主持的媒体上看到对罗素所进行的积极介绍、讨论与宣扬。讲学社最后聘请的两位是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前者由张君劢的老师、德国哲学家倭伊铿推荐而来，1922年10月，张君劢陪同杜里舒访华，但反响不大，与杜威、罗素对中国思想界造成巨大冲击形成强烈对比。杜里舒的哲学倾向与倭伊铿、柏格森相类，皆属生命派一流，为梁启超及其同人所好，故邀请杜里舒一事正反映出《改造》派同人的思想取向。泰戈尔的受邀来华，同样与梁启超激赏泰戈尔赞扬东方文化，批评西方物质文明有关。[注]

关于《解放与改造》杂志，详参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57—262页；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第247—

271页。

《改造》同人展开上述各种文化活动，其背后的目的相当明确，那就是扩大影响，联结同好，吸纳人才，为建立政党做准备，因而需要同人具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并将其公之于众。欧游归来后，对《解放与改造》杂志的整顿，就特别能反映同人在思想上达成的新的共识。《解放与改造》原由张东荪主其事，多刊载社会及政治方面较为流行的理论，显得有些散漫，缺乏系统性。梁启超归国后，亲自主持改刊工作，具体编辑事务则由蒋百里和张东荪承办，从三人间的通信看，相当郑重其事。1920年9月，整顿后的《改造》由梁启超撰写发刊词，特别强调了杂志的宗旨在于使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并公布了经同人共同认可的十六条宣言，内容涉及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个领域，俨然是改造中国的基本纲领，只不过以文化运动作为入手处罢了。《改造》第1号即以“新思潮研究”作为专题，随后几期则分别涉及社会主义讨论、教育问题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改造》对实际政治的重视，连续三期讨论废兵问题、自治问题和联邦问题，第1号还刊发了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可见同人的兴趣所在。[注]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4页。

参见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2—48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10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12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3—926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2页。

《新青年》知识群体之所以能开创一个时代，依前节所述，实与他们占据全国最高学府有着莫大的关系。对于《改造》派知识群体来说，培植人才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创办一所大学。1920年3月，游欧归来的梁启超在给其女的信中提及：“惟吾欲在上海办一大学，彼若有志能相助最善。”[注]梁启超及其同人后来选择承办上海中国公学作为自己养育人才的基地。按照胡适的叙述，中国公学创办于1906年，最初赞助其事者多为立宪派人士。1919年，公学董事会改组，推熊希龄为会长，王家襄为副会长，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涛、夏敬观、叶景葵、梁维岳、王敬芳七人为常务董事。王敬芳为校长，王当时任福中公司总经理，不能住校办事，就请了公学毕业同学李荫秾为事务长，刘秉麟为教务长，分代校长之事。[注]这些人大都与《改造》派同人关系很深，个别的还是该群体中人。1920年5月14日，王敬芳写信给梁启超表示：“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注]梁启超显然极为看重中国公学，热心地为公学捐募基金。7月20日，梁启超在给爱女的信中谈及公学之事时，信心十足地说：“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注]梁启超与其同人商议的结果是让张东荪出任公学教

务长，主持校务，试图将公学改制为大学，同时添办高中，以兼顾高深与普及，这也是张东荪与蒋百里往复讨论后所定的办学方针。[注]当时，《改造》派同人对公学寄予很大的希望，视之为东山再起的大本营。除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外，舒新城也十分热心此事。1921年12月11日，舒新城致函梁启超，描绘了一幅颇为迷人的同人再铸辉煌图："倘能照此步伐做去，则可以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注]舒新城当时主持公学中学部，所谓"鼎足而三"除中国公学外，当指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南京的东南大学。

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47页。

不过，中国公学的经营相当艰难，并无舒新城想象的那样顺遂。且不说接办后发生的两起校内风潮，使张东荪面临很大压力，最大的阻碍乃是经费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学的发展。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公学的财源基本上靠民间筹集。尽管梁启超及其同人与政府反复交涉，但得之于政府者甚少。1920年以后，公学常款除学费外，全靠王敬芳的福中公司每年二万元助款，显然不敷使用。[注]但梁启超力主勉力维持。1921年11月，公学发生风潮时，梁启超致函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鼓励道：

鄙意谓但使勉强可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搏沙无论如何总属我辈，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逾闹一次则阻力逾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38页。
左玉河：《张东荪传》，第114页。

并且提醒"新城所约诸贤，无论如何不可散去"。[注]当时舒新城聘请了不少颇有学识的教员，如吴有训、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常乃德、陈兼善、刘建阳、许敦谷、杨贤江、周予同、向大光、周鑫、陈衡等。11月23日，舒氏在给任公的信中特别指出新聘的后五人中，"杨、向及二周不但在社会上略负时望，且可为吾党用，弄风潮亦大有好处也"。显然，公学不仅仅是一个培育人才的基地，更是结纳社会精英、壮大自身势力的机构。而主持校务的张东荪为将公学办成一流大学也先后广延了很多学有专长者，如俞颂华、刘秉麟、徐广德、高践四、郭德华、陈其鹿、陈伯庄、童瑗逊、李祖虞、金侣琴、郭传治、霍俪白、陆鼎揆等。[注] 1922年1月，张君劢从欧洲归国，住在上海，出任公学的大学筹备主任。当时的张君劢生计困窘，"全恃借债度日"，4月，他在给任公的信中直言道：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54页。

至于接手公学一层，在京时冒昧答允，现已规画其大概，觉二百万公债基金为至少之数，如不得二百万，森绝不接手……要之，此半年内森尽力于筹备；然筹备与接手系两事，在森决不以不预备接手而写懈其筹备之心……[注]

参见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46—47页。左玉河：《张东荪传》，第113页。

实际上，政府公债基金利息（每年16万元）并没真正拿到，公学处境十分艰难。1923年，张君劢应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之聘，转而主办“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张东荪辞职，由陈筑山任代理公学校长。不久又重请张东荪主持大学部，中学部则由陈筑山负责，直至1927年公学被国民党接收。[注]

中国公学在勉力维持中尽管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由于上述缘由并未达到同人预期的目的，只做到部分改制专科及添设高中。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及其同人并未将视野局限于中国公学，前述舒新城所画蓝图，梁启超早有考虑。当时，梁启超住在天津，受聘在南开大学讲课。梁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私交甚厚，有意接办南开文科，双方也已大体商定。1921年11—12月间，兴奋的梁启超向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诸人详述了整个计划：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5页。

鄙意君劢当主任（即南开文科主任——引者注），百里、东荪、宰平各任一门，能找得梁漱溟最佳，更辅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此将来之关中河内也。[注]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6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3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4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45—946页。
关于梁启超的办学与讲学，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71—179页。

雄心勃勃的梁启超甚至扬言“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注]当时梁启超还想插足清华学校，将其也收为“吾辈之关中河内”，[注]不过，任公的如意算盘并未成为现实。个中原因主要在于，《改造》派知识群体活动重心基本上落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二张各自都重任在身，难以分身北上，况且北方文教界的主导势力仍为原来的《新青年》中人或北大的新派知识分子。而《改造》派文教方面人才之缺乏，也让他们扼腕叹息，梁启超对此深有体会，在给同人的信中反复说“我所最感苦痛者，是吾党人才缺乏，若贪多必至失

败”，[注]“我因此又起人才缺乏的感慨，假使吾党有人，则清华中文主任一席当然可以立刻到手”。[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扩大《改造》派同人在教育界的影响，吸引人才，年届五十的梁启超一马当先，以罕见的过人精力讲学于大江南北。据张朋园统计，1921年10月至12月，梁启超在京津两地分别讲演七次，1922年一年间，在北京、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天津等地来回讲演达50余次，所到之处广受青年学子的欢迎。如果从组织政党、重返政治中心的角度看，梁启超及其同人在教育界的努力并不成功，尤其是梁启超本人越来越醉心于学问，而淡漠于政治。但是从整个新文化运动着眼，梁启超及其同人的贡献显然书写了其中的辉煌篇章。[注]

从前面的叙述中，尽管我们不难看到《改造》派知识群体在《新青年》群体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中与这些北大新派知识分子的合作关系，但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与嫌隙。参见张朋园：《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以胡适与梁启超为例》，见氏著：《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

总体来看，五四时代，国家权威衰败，政权充满了正当性危机，而成长中的市民社会则拥有相当的力量。在这一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正是借助于学院、社团和媒介出版业，开创了一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占据时代中心的《新青年》知识群体居于首善之区，寄身于国立大学，与国家关系较近，但通过自身的行动和言论使知识社群得以在学院里拥有相当的独立性。作为担当天下的一代精英，他们借助公共舆论来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从渊源上看，《新青年》知识群体多有革命党背景，这自然影响到他们言说行事的风格。与《新青年》派的性情激越不同，由清末立宪派演变而来的《改造》派知识群体显得较为稳健平和。[注]在民初介入上层政治失败，脱离政坛后，他们将目光下移，投向社会文化领域，以图东山再起，因而其立身的空间自然比较倾向市民社会，这或许是他们对上海作为活动空间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新青年》知识群体还是《改造》派知识群体，其思想言论之广被都得益于和上海出版传媒业的密切合作，尤其是作为全国最大的民营出版企业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在张元济主持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五四之后，随着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新式政党的出现，中国社会开始了重组的历程，日趋分化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作用也渐渐走向了式微。

宋 宏

第四章

分歧与底线：1920年代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一、

1920年代前中期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1．“新青年”的分化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是北京大学的宗旨，但是多元思想的并存也意味着它们之间可能孕育着激烈的冲突。过去的论述强调“新旧之争”，比如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胡适、陈独秀等“新青年”与辜鸿铭等“老夫子”之间的对抗。近代以来，“新”常被赋予肯定意义，代表先进、光明的文化；“旧”则被赋予否定意义，代表落后乃至腐朽的思想。在这种“进化论”的框架里，“新青年”被描述为当然的胜利者，“老夫子”则被描述为必然的失败者。所谓“新旧之争”既隐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同时遮蔽了其他分歧。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事实上，在广义的“新青年”阵营里，立场有游移和坚定之分：当时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后来曾回忆马叙伦等“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注]陈独秀、胡适则是比较坚定的新派人士。他们在北京大学的执教时间也有先后之分：沈尹默、马叙伦属于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前即执教的教员，陈独秀和胡适则属于蔡元培引进到北京大学的教员。蔡元培晚年曾这样描述：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此处蔡元培的回忆有细节出入，当时鲁迅（周豫才）尚未至北京大学兼课。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注]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蔡元培：《呈报选举马寅初为北大教务长请予备案文》，见《蔡元培全集》（第1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同样是主张革新，也有“旧教员”和“新教员”之分。前者资历更老，但到了1919年，无论在社会声望还是校内身份方面均无法跟后者相提并论。当“新青年”共同面对“老夫子”时会团结一致，随着对方逐渐式微，“临时统一战线”也面临解体命运。1919年3月前后曾经盛传陈独秀和胡适等四人被政府驱逐出校，这个说法甚至由北京电传至上海各报，以至胡适在《北大日刊》声明“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注]次月，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这种机构调整的实质是人事变动，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自动解除，而教务长的职务则由马寅初担任。[注]

鲁迅：《忆刘半农君》，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陈独秀曾在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陈独秀：《实庵自传》，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8页。这段话不仅是作者的谦虚之辞，也可看作他的自我批评。

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2—173页。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第233页。

［美］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当时陈独秀和胡适都面临来自不明方向的危机，但为什么是陈独秀而不是胡适黯然出局呢？这跟两人性格有关，鲁迅曾对《新青年》时期的他们有过一段漫画式描述——假如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陈独秀在敞开的大门外竖一面大旗：“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则在紧闭的门上贴张小纸条：“内无武器，请勿疑虑”。[注]从个人性情来看，固然可以按照鲁迅的标准认为陈独秀口无遮掩、胡适工于心计，但大多数人的印象却是陈独秀性情暴躁、胡适性格温和。[注]在半个多世纪后，沈尹默还清楚地记得陈独秀第一次见他时就进行评点：“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尹默自称后来钻研书法，也正是因这次刺激而起。[注]虽然沈尹默和陈独秀有过一段交往密切的时期，但从对这件小事的态度也能看出两者交往之始就已有不和谐音。相比之下，胡适不像陈独秀那样容易树敌，据罗家伦回忆，胡适初到北京大学，“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只是到后来才气焰大盛。[注]唐德刚也提到，当时在北京居住的皖籍老辈与后起的青年学者多鄙薄陈独秀而推崇胡适，“政治思想问题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传统的礼教观念在作祟”。陈独秀公然嫖妓，而胡适在个人行为上“循规蹈矩，为一时模范”，以至于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所看不顺眼的“反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烂账都记到陈独秀头上，而“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

给了胡适。[注]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和地缘并非不重要，但是在人际交往中它们发挥何种作用，跟个人性情有着密切关系。

沈尹默和沈兼士也是《新青年》的作者，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1号刊登了《本杂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其中第6卷拟定由沈尹默编辑。但沈尹默在回忆文章中称："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他同时还指出自己虽然在《新青年》上撰稿，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沈尹默：《我和北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66页。考虑到第6卷第6号的编撰日期正值3月26日前后，正在"倒陈"的沈尹默放弃《新青年》的编辑恐非"眼睛有病"和"自忖非所长"两条理由所能说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90页。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119—120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6页。1920年4月陈独秀的信写给12人：守常（李大钊）、适之（胡适）、申甫（张申府）、玄同（钱玄同）、孟余（顾孟余）、孟和（陶孟和）、百年（陈大齐）、尹默（沈尹默）、慰慈（张慰慈）、抚五（王星拱）、逷先（朱希祖）、启明（周作人）；1920年年底的信写给9人：守常（李大钊）、玄同（钱玄同）、适之（胡适）、孟和（陶孟和）、一涵（高一涵）、慰慈（张慰慈）、豫才（鲁迅）、启明（周作人）、抚五（王星拱）。第二封信少了申甫（张申府）、孟余（顾孟余）、百年（陈大齐）、尹默（沈尹默）、逷先（朱希祖）等5人，增加了一涵（高一涵）、豫才（鲁迅）等两人，此后关于《新青年》的讨论都在陈独秀和北京九人之间进行，但一涵（高一涵）和慰慈（张慰慈）并不主动，常常只是附议胡适。

《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8—259页。其中第三种解决办法"暂时停办《新青年》"系陶孟和的主意，因为当时邮局已经不准邮寄这份杂志。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6页。

第二条分解为"不谈政治"和"迁至北京"两项。"北京同人"的态度参见《胡适书信集》（上册），第258—259、264—266页。

北大的分化也预示了《新青年》的分化。1917年，因为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京。这次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移，它还使《新青年》扩大了作者阵容，蔡元培、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革新者[注]加入，最终使《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1920年，陈独秀返回上海，《新青年》的作者阵容再次发生变化，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社会主义者加入编辑和作者行列。如果说1917年的杂志转型是众望所归，那么1920年的杂志转型则富有争

议。1920年4月，上海的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12人，特别提到“编辑人问题”，并给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第二，由在京一人担任；第三，由他自己在沪担任。[注]在这里，陈独秀恰恰遗漏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即该刊由他和在京诸人轮流编辑。三种解决办法已经预设了他不可能和在京诸人共同编辑这一前提，这也就意味着答案已经预定为第三种，即由他在沪重新组织编辑人员。因为最初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即由陈独秀主持，现在重返上海的《新青年》自然不可能完全抛开陈独秀而存在。事实也证明了陈独秀无意放弃《新青年》，在此之后，陈独秀邀请陈望道加入编辑部，并决定把它作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注]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在去广州之前，再次给李大钊、钱玄同和胡适等九人去信，告知《新青年》编辑事务已由陈望道办理，另外沈雁冰（茅盾）、李达、李汉俊三人新加入编辑部。[注]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的问题，胡适指出“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也提出三条办法：第一，听任《新青年》成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重新创办“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恢复“不谈政治”的戒约，《新青年》编辑部自第9卷第1号起移至北京；第三，暂时停办《新青年》。[注]实际上，“北京同人”的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对上述三条办法的看法（表4-1）：[注]

表4-1 《新青年》北京同人的不同看法

	另办一杂志	“不谈政治”	迁至北京	停　办
李大钊	赞同（最初态度）		赞同（最终态度）	不赞同
钱玄同	赞　同			不赞同
胡　适	不赞同	先是赞同，然后取消	赞　同	不赞同
陶孟和	不赞同	不赞同	赞　同	赞　同
鲁　迅	赞　同	不赞同		
周作人	赞　同	不赞同		
王星拱	不赞同		赞　同	

陈独秀的这封信已无法找到，根据胡适给李大钊等的信可以得知其中一些态度。参见《胡适书信集》（上册），第264—265页。

陈独秀：《致胡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75页。

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出版；1925年4月改成月刊（实为不定期出版），1926年7月停刊。复刊后的《新青年》是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从第1期开始编

号并且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研究者通常把它看作与《新青年》同名的另一份刊物。

“北京同人”在细节上进行推敲，但已经成为“广州同人”的陈独秀几乎全部否定了胡适的意见。他先是对“不谈政治”的说法非常生气，同时认为“另办一杂志”的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注由于这时《新青年》在上海遭到查禁，1921年2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这份杂志“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根据上下文，“不成问题”不是“没问题”的意思，而是指“不可能”。他表示“十分赞成”胡适等人另办一个报纸，又委婉表示自己不便提供文章。注从这个回复可以看出，此前陈独秀关于《新青年》的三种解决办法仅是象征性地征询意见，他实际上已经拿定主意由自己来主持。但同时也能看出，他对胡适等提出的三条办法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从反对“另办一杂志”转变为赞成“另外办一个报”。1921年4月，推迟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6号在广州出版，次年7月出版第9卷第6号后休刊。注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研究者经常称胡适站在“问题”一边，而李大钊站在“主义”一边，但这种描述有用“二元对立”式的模式把它简化之嫌。李大钊表示自己的观点或可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他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见《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见《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8、153、176页。

见《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22、274页。

在陈望道的信中，可以得知他被胡适称作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胡适这句话出自他给陈独秀的信，可见陈独秀让陈望道看到了胡适的信。因为缺少稿件，陈望道盼望周氏兄弟、李大钊、钱玄同多多支持，但周作人回信称“自从钱刘噤口以后，早已分裂，不能弥缝”。“钱刘”指钱玄同和刘半农，当时他们很少给《新青年》文章。参见《陈望道书简》，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第19—21页。在陈独秀和陈望道的信中，都提到南方盛传胡适、陶孟和与研究系接近。胡适回信指出这是“谣言”，钱玄同则认为陈独秀“神经过敏之”，李大钊也表示要共同给陈独秀写信“辩明此事”。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138—139页。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第141—142页。

根据《新青年》的出版地，“新青年”逐渐分化为“北京同人”“上海同人”和“广东同人”。后两者有所重合，态度比较一致，所以又称为“上海广东同人”，“北京同人”则常常与他们的意见相左。但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向左转”已为人所知，胡适和李大钊在1919年之间就产生过“问题和主义”之争。注就赞同“另办一杂志”（或报纸）、不赞同“不谈政治”这两点来

说，陈独秀与周氏兄弟的态度也比较接近。1920年3月、8月和9月，陈独秀至少单独给周作人去了三封信，每次都在信中提到豫才（鲁迅）。[注]在给“北京同人”的信中，4月份的十二个收件人中只有启明（周作人），年底的九个收件人则包括周氏兄弟。当时，高一涵、陶孟和和钱玄同等人已经很久不提供稿件，乃至陈独秀感慨“京中同人来文太少”；而周氏兄弟依然继续给《新青年》供稿，陈独秀专门给他们两位写信，表示“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注]在此前后，陈望道也多次给周作人去信，表示“先生们在北方，或不很知南方情形”，同时透露南方人们已对胡适不以为然的信息。在批评胡适的同时，他盛赞“所谓‘周氏兄弟’是我们上海广东同人与一般读者所共同感谢的”。[注]在“北京同人”产生分化的同时，“上海同人”和“广东同人”也产生了分歧。1921年2月，广州的陈独秀起草党章，主张党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上海的李汉俊指责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并且另拟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有职无权。对此，陈独秀回信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这种党内之争，与此前的《新青年》有关。李汉俊曾因党内经费紧张，提议“新青年书社”按月支出二百元作为党的经费，没有得到陈独秀的同意。[注]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0—241、304页。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38页。

［美］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见氏著：《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2页。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

《本志宣言》，载《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号。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

“新青年”的分化有着思想史上的复杂因素。周策纵先生曾指出，虽然新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地抗议，但他们在寻找理论共识的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尽管1917年以后“重估中国旧传统”和“引进西方新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成为新知识分子行动的基础；但五四事件之后知识分子间盛行的那种联合精神依然只是表面现象，这是他们当时面临共同对手的暂时结果。[注]汪晖先生有着类似的判断，他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同一性”不存在于各种观念的逻辑联系之中，而是存在于思想者的“态度”之中，比如“反传统主义”就作为一种“态度”持续存在于五四以及其后的中国历史之中。[注]张灏先生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五四思想具有“两歧性”，存在“一些对立发展的趋势”。[注]以上诸种观点均是从观念史的角度探求观念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知识分子和文化空间的关系探求观念的变化。从既有史实可以看到，1918年7月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上透露：“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

政治为然。”[注]这种观点的差异并没有立即导致《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共同居住于北京的他们依然保持合作关系。到了1919年12月，《新青年》突然刊登宣言，宣称：“本志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注]格里德先生称这是“胡、陈二人最后一次在一起发表共同的观点”，[注]但“公共意见”的发布没有解决“各人持论”的问题，反而预示着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无法弥合。1920年，移居上海的陈独秀与北京同人产生了前面提到的分歧，这次却没有能够求同存异，而是最终导致《新青年》彻底分化。同样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居住于北京的李大钊却与胡适等人保持来往，直到1922年还参与签署了备受争议的“好政府主义”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

如果说士大夫比较注重籍贯这种地缘关系，近代知识分子则更注重城市的文化空间。1919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同时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北京大学“新青年”的分化与前者相关，《新青年》的分化则与后者相关。必须指出的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是“决定论”或者“因果论”所能涵盖的。比如籍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会馆、同乡会这些中介起作用。城市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同样是多重性的，从《新青年》的分化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座城市的不同风格。不仅各座城市会提供各异的文化空间，同一座城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空间。接下来，让我们分别看一下“五四”之后的北京、上海、广州和居住在其中的知识分子。

2．北京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0—101页。时人常误把马叙伦与“二马”混淆，马氏一门九子，其中五位比较知名，即老二马幼渔（裕藻）、老四马衡（叔平），老五马鉴（季明）、老七马准（绳甫）和老九马廉（隅卿）。“二马”主要是指马幼渔和马衡。

朱希祖从1913年起在北京大学先后担任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才离开北京大学。据朱偰记载，第一院的马裕藻在北大24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因为学校派别斗争激烈，每逢一学年开始，他常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三沈两马”的领袖沈尹默好居幕后，代表这一集团发言的总是马裕藻。在第三院，除了老教授王建祖、顾孟余、马寅初，王世杰可以操纵一切。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1920年代北京学界有英美派和法日派的说法，前者包括胡适、陶孟和等，后者以“三沈”（沈兼士、沈士远、沈尹默三兄弟）、“二马”（马裕藻、马衡两兄弟）为主，以李石曾为首。[注]根据一位1923年至1929年间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学生回

忆，第一院是“三沈二马”的天下，第三院则是《现代评论》派的大本营。在第一院里，有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幼渔）、哲学系主任陈大齐、英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后由陈源继任）、德国文学系主任杨震文、法国文学系主任李宗侗、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和教育学系主任蒋梦麟；在第三院里，有政治学系主任周鲠生、法律学系主任王世杰、经济系主任顾孟余和社会学系主任陶孟和。[注]如果仅从校内职务来看，这些名字还显得有些孤立，无法在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下面我将从北京的胡同出发，通过他们的交往空间勾勒北京知识分子（不限于北京大学）之间复杂的网络关系。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626—627页。虽然这张明信片地址有误，最终还是到了胡适手中。

《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根据《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在1920年5月22日明确记有“至新屋（今日迁居）”的字样，但没有说明搬迁至何处。根据《胡适年谱》，在1920年6月栏注有“从缎库搬到后门里钟鼓寺十四号居住”，依据是1920年6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胡适、张祖训启事》。据此可以推测，胡适当于1920年5月22日从南池子缎库胡同搬至钟鼓寺14号。1926年6月前后，胡适搬至景山西面的陟山门大街6号。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5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6—107、191页。1921年9月20日，高一涵移至同巷7号居住。《胡适日记全编》（3），第472页。1923年5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到高一涵接了一个妓女做老婆，他还特意嘱咐夫人江冬秀不要不肯跟他们打招呼，因为高一涵就住在他家的一院。《胡适日记全编》（4），第22页。

高一涵：《漫谈胡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第187页。虽然胡适的书信、日记与高一涵的回忆文章在具体细节上有出入，但他们的主要居住地点却基本吻合。

《胡适日记全编》（3），第273、595页。

《胡适日记全编》（3），第273页。当时，“公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往空间。根据胡适日记，他在公园与熟人邂逅的概率非常之高。此外，他们也会专门约定在公园碰面，商讨具体事宜。

在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交往空间中，值得关注的是南池子缎库胡同（以及钟鼓寺）、八道湾、东吉祥胡同和石虎胡同（以及松树胡同）。1920年7月，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收件人地址是“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注]这是他在1月份登门拜访胡适时的住址，此时的毛泽东不知道胡适已在这一年的5月搬至钟鼓寺14号。[注]不管是南池子缎库胡同还是钟鼓寺14号，胡适的住宅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空间。除了供主人居住，它还主要有三个用途。第一，与朋友常年合住，

高一涵和张慰慈就曾长期与胡适合住。1917年9月，胡适刚刚进北京大学时，就与高一涵合居于教员宿舍，他们也曾考虑在校外合租房子。1918年9月14日，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此间屋内本有几间空房。今天有朋友高一涵、张祖训两君搬来同住，更不寂寞了。"[注]根据高一涵的回忆，他从日本东京留学归国后住在北京朝阳门内竹竿巷，当时与李大钊合住同办《甲寅日报》，后来李大钊搬走，又与胡适同住。1918年，他进入北大，和胡适同住南池子缎库后身；1921年，他又和胡适同住在北大后面钟鼓寺。后来移居织染局，但因为同办《努力周报》，也朝夕相见。[注]在《新青年》的分化中，他们两位始终没有主动发表什么见解，均是附议胡适的提案。高一涵、张慰慈不持异议，不能全部归结为他们与胡适合住；但三人长期居住在一起，势必在很多问题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第二，供朋友短期居住，比如汪原放、陶行知到北京之后就居住于他家。[注]短期居住的往往是来自北京之外的朋友，这也就意味着胡适住宅成为他与外地朋友进行交往的主要空间。第三，供朋友聚会，有时高朋满座，甚至达到"几乎没有坐处"[注]的程度。通过这种频繁的交往，以胡适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89页。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07页。

除了这些《努力周报》的核心成员，与胡适交往比较密切的还有蔡元培、王云五、顾颉刚等人。胡适的活动空间也不仅是南池子缎库胡同（以及钟鼓寺），他还经常到顾维钧家参加以欧美同学会为骨干的聚餐会。这张图表主要参考了章清的《〈努力〉时期自由知识分子（骨干成员）情况简表》，但做了一定的增删。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62—64页。1921年5月，在努力会简章上签名的有胡适、任鸿隽、丁文江、王徵。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374—375页。同年同月，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他与王徵、丁文江、蒋梦麟四人"讨论组织一个小会的事"，大家对他拟的组织大纲表示同意。见《胡适日记全编》（3），第274页。1923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赴任鸿隽、陈衡哲夫妇晚宴，胡适、朱经农、王云五、徐新六、王文伯等在座，他在当天日记中记曰"：努力社同人，只少一在君矣。"。见《蔡元培全集》（第1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1923年10月，胡适在上海与任鸿隽、陈衡哲、朱经农、徐新六商量暂停《努力周报》，事后写信告知北京的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沈性仁。信中提到以后要扩充《努力周报》，除了老朋友要加入，还应当邀请蔡元培等"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21—323页。综合以上四个版本，可以归纳出《努力周报》的12名核心成员。

1920年5月，就在乔迁新居的次日，胡适给丁文江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那个东西的名字，我想用'努力'，何如？"[注]"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明信片上语焉不详。一年之后的1921年5月，胡适、丁文江等人成立了讨论政治的"努力会"："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注]接下来，他们准备创办跟陈独秀提到过的那份报纸，《努力周报》在1922年5月创刊，其核心成员的基本情况大致如下（表4-2）。[注]

表4-2 《努力周报》核心成员

姓　名	籍　贯	生　年	学　历	职　务
胡适（适之）	安徽绩溪（生于上海）	1891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教务长
丁文江（在君）	江苏泰兴	1887	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	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高一涵	安徽六安	1885	日本明治大学	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祖训）	江苏吴江	1890年左右	艾奥瓦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教授
陶孟和（履恭）	浙江绍兴（生于天津）	1887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沈性仁	浙江嘉兴	1895	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任鸿隽（叔永）	浙江归安（生于四川垫江）	1886	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	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教授
陈衡哲（莎菲）	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	1890	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	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教授
朱经农	江苏宝山（生于浙江浦江）	1887	华盛顿大学硕士	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徐新六（振飞）	浙江余杭	1890	伯明翰大学理学士、维多利亚大学商学士	浙江兴业银行副总经理
蒋梦麟（孟邻）	浙江余姚	1886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教育系教授
王徵（文伯）	吉林宁安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胡适多次提到“新青年”团体只有他和陶孟和曾在英美留学。他认识丁文江和徐新六也是陶孟和介绍的，他们都曾留学英国，“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年）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3卷），第103页。由此可见，留学经历和年龄上的接近促进了他们的交往。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22页。

从籍贯来看，他们多来自江浙皖；从年龄上看，他们多出生于1885年至1890年间，前后相差不超过六年；从学历来看，他们大都是胡适所说的“英美派”；[注]从职务来看，他们大都在北京大学执教。同时，陶孟和与沈性仁、任鸿隽和陈衡哲是夫妇关系，胡适与张慰慈在1905年前后是澄衷学堂同学，胡适、朱经农与任鸿隽则是中国公学旧交。1923年10月，他们决定暂时停办《努力周报》，把它改组成半月刊或月刊。虽然后来并未复刊，胡适却有着自己的规划，把过去二十五年归纳为三个杂志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和《甲寅》都还算不上。他明确表示：“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注]由此可见，胡适对1920年前后“新青年”的分化依然不能忘怀。与其说他想回到“新青年”同人情同手足的过去，不如说他想让分化后的“新青年”重新领时代风气之先。

1917年，胡适初进北京大学的月薪是260元，属于高薪，但他依然比较节省，并在给母亲的信中称“今年所怕须是添置衣服之费，皮衣更不得了”。最初他打算跟高一涵合租房子，也是为节省开支计。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6—107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45页。胡适此前曾看了两处房子：一处有房18间，但他嫌房价太贵、房子又旧，没有还价便放弃了；另一处有房18间，25元一月，他准备还至20元租住，后来似乎也放弃了，大概因为在租金上没有达成妥协。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38—139页。

《鲁迅全集》（第14卷），第358页。原书中“晚大风一陈后小雨”，“陈”当为“阵”。

《鲁迅全集》（第14卷），第363—365页。如果加上过契、修缮、家具费用，八道湾的总价值大约是四千银圆。邓云乡：《八道湾老屋》，见氏著：《文化古城旧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8—312页。

吊诡的是，当年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群“北京同人”不太赞同在《新青年》之外另办一杂志，结果却很快办起了《努力周报》。那么，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另一群“北京同人”在做些什么呢？那时周氏兄弟的经济能力显然要比胡适高出许多。虽然胡适的收入不薄，[注]但素无积累，又要经常贴补家用，手头并不宽松，所以以每月20元的租金租下南池子缎库胡同。[注]而周氏兄弟都有工作，家中变卖老屋之后更是增加了不少积蓄。1919年6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被捕、上海工人发起罢工——虽然正值风雨飘摇之际，当天的鲁迅日记一如既往的简短：“晴，下午昙。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注]此处“看屋”一说，应是为买房做准备。1919年8月，周氏兄弟先后看下多处房产之后，最终决定以3500银圆的价钱（外加中佣175银圆）买下八道湾11号的四合院。[注]从此之后，八道湾成为周氏兄弟与朋友聚会的重要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沈尹默的两段回忆：

沈尹默：《忆鲁迅》，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第一回和豫才见面，已经记不清楚，大约是辛亥革命后，我住在杭州的时候。那时从日本归国有一批人，都到了杭州，如幼渔、逖先、玄同、百年、蓬仙、豫才、启明、季芾、仰先等人，他们是在东京智度寺与兼士同听章太炎先生讲学的一群朋友，兼弟也是那时候回来的，因他的缘故，这一班人先后都认识了。[注]

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48页。其中“柏年”无法在《鲁迅全集》中找到。在1929年2月15日江绍原给周作人的信中，曾提到“沪报有陈柏年任北大文学院长消息”的说法。见孙郁、黄乔生主编：《致周作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但不知江绍原所说的“陈柏年”与沈尹默提到的“柏年”是否有关系，或为陈百年，当时北大教授陈大齐字百年，系浙江海盐人，留日学者。而孙伏园曾用过柏生、松年的笔名，也有可能系笔误或手民误植为“柏年”。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逖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注]

章太炎曾在东京民报社专设一班讲学，有八名弟子：周豫才（树人）、周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钱玄同、朱蓬先（宗莱）、朱逖先（希祖）、龚未生（宝鉴，章太炎之长婿）。参见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93页；许寿裳：《章炳麟》，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55—56页。

沈尹默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八道湾知识分子宴集图，正是这些人在北大初期包围了蔡元培，从“臧否当代人物”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熟稔程度。但沈尹默将参加宴集人员的身份归纳为“北大同人”，将鲁迅描述为核心人物，未免是一种“筛选性记忆”。虽然上面提到的诸位确实以“北大同人”为主，沈尹默却遗漏了他们的另外两个身份：“太炎门生”[注]和“某籍某系”。

罗家伦口述：《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361—362页。

沈尹默：《我和北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58页。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当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的任命遭到攻击时，直到蔡元培等以章太炎将陈独秀视为畏友来为陈辩护，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见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1879—1942）》，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35页。由此也可看出“太炎门生”在学界的影响力。

沈尹默：《我和北大》，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60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页；陈以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见丁石孙等：《蔡元培研究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桑兵提到1920年代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由于没有注释，不知这一资料来自何处。如本章开头所述，1919年4月，北京大学就已经废除了学长制。

许世瑛：《先君许寿裳年谱》，见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

鲁迅并不是中坚人物，表面上的核心人物是马幼渔，实质上的灵魂人物恰恰是沈尹默。胡适曾在日记中把沈尹默称作“阴谋家”，罗家伦称他“大有谋士的态度”，并指出“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注]八道湾诸人干脆把他称作“鬼谷子”，沈尹默本人欣然接受这个绰号，只有钱玄同在背地里认为这个名字不妙，因为鬼谷子是阴谋大家，这样说有自己找骂的嫌疑。[注]而沈尹默之所以能进北京大学，也跟“太炎门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北京大学由何燏时、胡仁源主管，而章太炎享有重名。由于沈尹默弟弟沈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推论他也必然是太炎门下，便让他到北京大学执教。其实沈尹默只在日本九个月便回国，并未从太炎受业，但也从此将错就错。[注]“太炎门生”分为三派，一派是以黄侃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派是以钱玄同、沈兼士为代表的“开新派”，还有一派是以马幼渔为代表的“中间派”，“对其他两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注]关于“某籍某系”的说法，周作人曾有一个解释：“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注]这是一个类似于外交辞令式的回答，基本上没有否认聚集在八道湾的知识分子具有同乡同系的背景。从籍贯上看，他们基本上都是浙江人；从系科来看，他们大都属于国文系。所谓北大国文系（“北大同人”）、章氏同学会（“太炎门生”）、浙江同乡会（“某籍某系”）三位一体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不仅在八道湾聚会，还占据了北京大学的要津。不仅中国文学系、史学系和东方文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朱希祖和周作人担任，沈兼士还担任国学门主任，国学门委员除当然委员外只有胡适一人不是浙籍。[注]就在国学门正式成立的1922年，有一位浙江绍兴的“太炎门生”就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就是鲁迅等人的老朋友许寿裳。在许寿裳担任校长期间，八道湾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兼课，直到1924年许寿裳辞去这个职务，由杨荫榆接任。[注]

《鲁迅全集》第14卷，第460、462、495页。

一般认为，《晨报》副刊的编者孙伏园因为发表鲁迅《我的失恋》与《晨报》负责人产生矛盾，才辞职创办《语丝》。其实此前孙伏园出差期间，代理编辑的李小峰刊登了一组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之类的文章，已经引起不和。李小峰：《鲁迅先生与〈语丝〉的诞生》，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86—289页。

任嘉尧：《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

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68页。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66页。

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71页。

1923年7月中旬，八道湾发生了一次至今依然成谜的争吵，周氏兄弟从此失和。此后，周作人依然居住在八道湾，鲁迅则于8月初迁居至砖塔胡同61号，1924年5月又迁居至西三条胡同宅。[注]分居使得两人不再共享一个交往群体，但曾经的同居生活使得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保持默契。参加八道湾宴集的诸位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不是“北大同人”的孙伏园实践着周氏兄弟当初另办一杂志的提议。从1921年10月起，这位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开始编辑研究系的《晨报》副刊，并且连载了鲁迅那篇著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4年10月他离开了《晨报》副刊，[注] 11月就创办了《语丝》周刊。[注]《语丝》曾列出16个长期撰稿人的名单：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玉堂（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孙斐君）、王品青、衣萍（章衣萍）、曙天女士（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冯沅君）、顾颉刚、春台（孙福熙）、林兰女士。鲁迅指出16个投稿者意见态度“各不相同”，[注]川岛也否认了16人“气类完全相同”的说法，同时还否认这是一个“同人刊物”。[注]这样说固然有道理，但回避了另外一些事实：在这些人中，除了已经失和的周氏兄弟，川岛和斐君女士、衣萍和曙天女士、李小峰和林兰女士是夫妇关系，孙伏园和春台是兄弟关系。虽然鲁迅认为“《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注]但除了他和淦女士之外，其他14人却经常每月底聚会一次，每次一桌两桌不等。[注]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67页。

鲁迅曾专门提到《语丝》在北京大学的销售情况，第一院（文科）“一纸风行”，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他还特别指出：“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注]正如前面提到的，第一院是

“三沈二马”的天下，第三院（法、政、经济和社会学）则是《现代评论》派的大本营。其中，政治学系主任周鲠生、法律学系主任王世杰就被鲁迅反复称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

《胡适日记全编》（3），第682页。

1923年李四光结婚后搬离东吉祥胡同。马胜云等编著：《李四光年谱》，地质出版社，1999年，第45、61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42页。

在胡适的日记中，记有“到东吉祥胡同访王雪艇、李仲揆、丁巽甫，谈大学事”。[注]胡适所拜访的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都是后来的现代评论社成员，他们三位旅英老友回北京后就在东吉祥胡同居住，而燕树棠、周鲠生等人也居住于此。[注]那么，现代评论社到底有多少人呢？在周作人的日记上，记有“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宴，共约40人”。[注]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现代评论社有约40人，从周作人也被邀请可以看出他们的晚宴也有非核心成员参与。根据《现代评论》的撰稿名单，从广义上看甚至不止40人，但从狭义看则为20人左右，后者才能被称为“东吉祥胡同派”。以下是核心成员的基本情况（表4-3）。

表4-3 《现代评论》核心撰稿人员

姓　名	籍　贯	生 年	学　历	职　务
王世杰（雪艇）	湖北崇阳	1891	伦敦大学经济学硕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
周览（鲠生）	湖南长沙	1889	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彭学沛（浩徐）	江西安福	1896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燕树棠（召亭）	河北定县	1891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李四光（仲揆）	湖北黄冈	1889	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4]	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
钱端升	江苏松江	1900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法律学、政治学系教授
杨端六	湖南长沙	1885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5]	商务印书馆会计科科长
唐有壬	湖南浏阳	1893	日本庆应大学理财科	关税会议专门委员
陈翰笙	江苏无锡	1897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柏林大学历史学博士	北京大学历史系、法律学系教授[1]
陈源（通伯、西滢）	江苏无锡	1896	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	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
凌叔华	广东番禺	1900	燕京大学英文系	故宫博物院审查书画专门委员
杨振声（今甫）	山东蓬莱	1890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	
丁西林（燮林、巽甫）	江苏泰兴	1893	伯明翰大学理学硕士	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预科主任
郁达夫	浙江富阳	1896	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学士	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

4 1918年6月，李四光获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31年，伯明翰大学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马胜云等编著：《李四光年谱》，第35、102页。

5 杨端六之女杨静远曾专程到伦敦大学查找父亲入校资料，但未果。杨静远：《我的父亲杨端六》，载《万象》2004年第6卷第7期。所以，现在无法知道他获何学位。

1 陈翰笙的硕士方向是美国宪法史，博士方向是东欧史，故他最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根据他的回忆，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以李石曾为首。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历史系的系主任朱希祖是日法派，拼命排挤他，后来政治学系主任周鲠生推荐他到法律学系任教。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8—29页。

倪邦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根据朱偰的回忆，胡适和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而且1926年之后胡适有一两年不在国内。他特别指出，一般会误认胡适为现代评论派实际上的首领，其实应为王世杰。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第177页。

1922年6月27日，在顾维钧家的茶话会上，李石曾、王世杰提倡“邦联制”，胡适对此进行“痛驳”，质问为何不使用“联邦制”。《胡适日记全编》（3），第710页。

《胡适日记全编》（4），第201—202页。

倪邦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第14—21页。“太平洋”和“创造社”的联合，跟他们的籍贯、留学所在国和职务均有关。太平洋社的周鲠生、杨端六等是湖南人，与创造社的成仿吾有“同乡之谊”，又是成仿吾之兄成劭吾留日期间的同学，成仿吾随兄留学时曾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同居过。同时，郁达夫曾在北京大学统计学系执教，与他们是同事。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11—212页。

从籍贯上看，东吉祥胡同的知识分子来源比较宽泛，不是集中于某块区域，而是以两湖为主、兼及众多省份。促成他们之间交往的主要因素不仅是籍贯或出生地，还包括留学所在国，这也是从士大夫转型为知识分子的特点。从生年来看，他们多集中于1890年至1900年间，而南池子缎库胡同（以及钟鼓寺）的胡适等人多集中于1885年至1890年间。虽然前后相差只有大概五年的时间，但正是这五年使得胡适等人成为五四一代，而王世杰等人则为五四后一代，他们在当时的声望也因此无法相提并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胡适等人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并且与王世杰等人的观点有相近之处，他们的朋友也会互相交叉；但把胡适称作“《现代评论》的精神领袖”[注]还是有些勉强，[注]至于把胡适等人看作东吉祥胡同派，那更是与史实不太符合了。翻检1921年至1925年的胡适日记和书信，他与王世杰等人的往来是十次左右。尽管日记时有空缺，书信也多有遗失，但就保存下来的资料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交游广泛的胡适来说算不上十分密切。就在这十余次往来中，还有“痛驳”王世杰的记录。[注] 1924年12月《现代评论》周刊创办，1925年1月，胡适曾与陈源达成接办《太平洋》的协议。[注]事实上，《太平洋》最

终并未由胡适等人接管，而是于1925年6月停刊。过去人们常常注意到“现代评论派”的前身是英美派知识分子团体太平洋社，最近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参与其中的还有留日学生团体创造社。[注]虽然创造社所占的分量远远不如太平洋社，但不应过于夸大胡适等人在“现代评论派”中的作用，却彻底回避创造社参与其中的史实。

胡适在日记中明确记载：“此辈者，李石曾、顾孟馀、沈尹默一班人也。”《胡适日记全编》（4），第202页。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第28—29页；马光裕整理：《陈翰笙谈〈现代评论〉周刊》，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马光裕整理：《沈从文谈〈现代评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4期。

在胡适与陈源商量接办《太平洋》的那个晚上，他们还一起感慨了北大“法国文化派”的“阴险”。[注]可以说，对法日派的反感，是他们进行合作的基础。根据陈翰笙、沈从文等多人的回忆，[注]《现代评论》创办的背景是北京大学校内分为“英美派”和“法日派”两派。虽然八道湾的常客“三沈二马”算是“法日派”的骨干，但不能由此推断八道湾的主人周氏兄弟也是其中的核心。同样，虽然南池子缎库胡同（以及钟鼓寺）和东吉祥胡同都有英美派出入，但也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1920年代末，胡适等人南下上海而王世杰等人几乎全部到达武汉，从目的地也可看出两个知识群体之间的差异。可惜在论战中，两方都一边抱怨自己的身份被误解，又一边继续误解着对方的身份。如果说这跟双方“身在此山中”有关，应该予以“同情的理解”，那么至今研究者依然保持厚此薄彼的偏见，未免有些不尊重历史。

徐志摩：《剧刊始业》，见《徐志摩全集》（第4卷·丙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114—115页。

与其说胡适经常出入东吉祥胡同，不如说他与石虎胡同更为接近。1926年，徐志摩回忆起三年前初办新月社时的热心，勾勒了它的简史：“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7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注]论者喜欢把新月社和新月社俱乐部视为一体，但徐志摩对它们的态度并不一致，对前者是“热心”，却把后者称作“俱不乐部”。在此前的信中，他也曾表示过同样的看法，指出初起时的新月社只是个口头的名称，“与现在松树胡同七号那个新月社俱乐部可以说并没有怎样密切的血统关系”。新月社与新月社俱乐部的区别，主要是以下四点（表4-4）。

表4-4 新月社与新月社俱乐部的区别

	成立时间	地　址[2]	组　织	兴趣点
新月社	1923年左右	石虎胡同7号	松散的群体	戏　剧
新月社俱乐部	1925年左右	松树胡同7号	正式的社团	政　治

2 当徐志摩从石虎胡同迁至松树胡同，新月社和新月社俱乐部就不能以地址来区分了。韩石山：《徐志摩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最让徐志摩不能接受的倒不是这些可以看得到的区别，而是两者的精神气质。新月社具有一种理想，而新月社俱乐部虽有组织却连社费都收不齐，声称要做事情，实际只顾娱乐消遣。关于两者的成员，他这样说：

徐志摩：《致新月的朋友》，见虞坤林编：《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406—407页。

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有一两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们是过激派。[注]

虽然梁实秋曾担任过上海《新月》月刊的主编，但他并不是北京新月社俱乐部的成员。梁实秋：《忆新月》，见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倪邦文：《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第30—31页。

如果只看每句话的前半部分，就可以知道新月社俱乐部的组成部分：银行家、政客和北大教授，性别是男女兼备。这与梁实秋的描述非常接近，他曾指出北京新月社有俱乐部性质，包括“文人和开明的政客与银行家”。[注]虽然新月社和新月社俱乐部有着显著区别，它们的主要成员却都由这三部分组成：银行家是张公权，经费实际由黄子美、徐申如提供；开明的政客（多半也是文人）是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张君劢；文人是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丁西林、林徽因、张歆海。其中张公权、张君劢是兄弟关系，他们的妹妹是徐志摩的前妻；徐申如、徐志摩是父子关系，林长民、林徽因是父女关系，梁启超、林徽因后来是公媳关系，陈西滢、凌叔华是夫妇关系。至于“某党某系”和“北大学阀”的说法，同样并非空穴来风：梁启超等人都属于“研究系”，胡适等人则是北京大学教授。可以看出，出入于南池子缎库胡同（以及钟鼓寺）、石虎胡同（以及松树胡同）和东吉祥胡同的知识分子互有交叉，都具有英美背景并且在思想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尤其前两条胡同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往来。但是，它们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南池子缎库胡

同（以及钟鼓寺）的“努力社”较注重思想、学术和政治方面的工作，石虎胡同（以及松树胡同）的“新月社”借文艺表达对自由、民主的热爱，东吉祥胡同的“现代评论派”偏重于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启蒙。[注]八道湾胡同的“语丝派”与前两者的论战将在上海全面展开，与东吉祥胡同的论战却在北京就已经激化。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5页。

北京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主要是从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十年之间。在1920年代中期，北京已经出现风雨飘摇的景象：一边是长期以来八所高校教授遭受欠薪之苦，一边是军人执政导致的高压政治。与此同时，胡同里的知识分子也逐渐组合和分化，并且在女师大风潮中产生激烈冲突。关于女师大风潮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比较为人熟知的是周氏兄弟站在女师大学生（以及前女师大校长许寿裳）一方痛斥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正人君子”这个词，在鲁迅著作里总共出现了59次。[注]但研究者所采用的《两地书》多为1933年鲁迅修改过的版本，张耀杰先生通过对信件版本的仔细校勘，得出另外一种结论。我用他的文字来结束这一节：

鲁迅改动信件的显著之处，就是模糊了他与许广平的党派立场。张耀杰：《〈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载《长城》2004年第1期。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坦言自己是一个“党同伐异”的人物，他所认同的“同党”，很大程度上是许广平加入的正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国民党，特别是以国民党元老、北京大学教授兼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李石曾为首的留学法国或日本的教授学者所组成的法日派。女师大风潮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李石曾等人想让国民党高层人士易培基取代杨荫榆的校长职位。“某籍某系”的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既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又是法日派的中坚力量。鲁迅所攻击的“异党”，主要是杨荫榆、章士钊以及基于既不“党同”也不“伐异”的独立立场自由发言的《现代评论》同人。因为章士钊和《现代评论》同人在某些观念上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较为一致，研究系又是国民党“党同伐异”的最大异党，鲁迅和许广平有时也把实际上具有国民党背景的《现代评论》同人，当成所谓的“研究系”加以讨伐。[注]

3．上海、厦门、广州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许敏：《上海通史》（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北京的知识分子主要在大学里谋生，他们对北京大学这个重要资源的抢夺非常激烈。相比之下，虽然上海的大学门类比较齐全，但“对于高深的基础科学和综合的人文文化的大学和学科的设置，并不放在重要的考虑范围内”。[注]上海是近代以来的出版和新闻中心，所以知识分子多与出版社或报纸杂志社有关。创造社成员主要在泰东书局任职，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兼具出版社职员和社团成员两种身份，但出版社和社团之间却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1921年，成仿吾得到泰东书局准备聘他当文学主任的消息，与郭沫若一起离日回国，回到上海之后才知道推荐人已经离开了出版社。尽管没有如愿以偿，他们却从此开始与泰东书局合作，并与田汉、郑伯奇、郁达夫、张资平等人于6月成立非正式团体创造社，以下是核心成员的基本情况（表4-5）。

表4-5 创造社的核心成员

姓　名	籍　贯	留 学 学 校	任职单位
郭沫若	四川乐山	1914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1915年：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1918年：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泰东书局 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
成仿吾	湖南新化	1914年：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1917年：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	泰东书局、广东大学
郁达夫	浙江富阳	1914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1915年：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 1919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泰东书局、北京大学 武昌师大、广东大学
郑伯奇	陕西长安	1917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京都第三高等学校 京都帝国大学心理学	广东大学
田　汉	湖南长沙	1916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中华书局
张资平	广东梅县	1914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九州熊本第五高等学校 1919年：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	武昌师大

当时日本有八所分设在全国各地区的高等学校，第一高等学校设在东京，特别给中国留学生成立预科，每年招收一班新生，一年结业后分发各高等学校，毕业后再升大学。郑伯奇：《忆创造社》，载《文艺月报》1959年第5期。

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67页。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田汉曾给左舜生去信，托他寻找纯文艺杂志的出版处，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对此均没有兴趣。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04页。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提到商务印书馆如何以最高的价格向他约稿，他如何不感兴趣。但在1918年8月，他曾写信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求售自己编辑的《泰戈尔诗选》，遭到了两家书店的拒绝。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早期创造社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并且主要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和东京帝国大学两所学校为主。[注]他们的国内阵地是泰东书局，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接受过聘书，[注]这家出版社不仅承担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的出版，还编辑了“创造社丛书”，以至被称作“创造社的摇篮”。[注]而在此之前，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均不愿付印他们的书籍。[注]

文学研究会有十二名发起人：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

除了十名发起人，陆续入社的还有俞平伯、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等人。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79—80页。

1921年成立了两个著名的文学社团：一个是6月份成立于上海的创造社，另一个是1月份成立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注] 1923年1月，闸北商务印书馆的部分文学研究会会员成立了上海朴社，共有十名发起人（表4-6）。[注]

表4-6 朴社的发起人

姓　名	籍　贯	学　历	文学研究会	商务印书馆
顾颉刚	江苏苏州	北京大学	是	是
郑振铎	福建长乐	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是	是
王伯祥	江苏苏州	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	是	是
叶圣陶	江苏苏州	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	是	是
周予同	浙江瑞安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否	是
沈雁冰	浙江桐乡	北京大学预科	是	是
胡愈之	浙江上虞	绍兴府中学堂	是	是
谢六逸	贵州贵阳	日本早稻田大学	是	是
陈达夫			否	不详
常燕生	山西榆次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否	是

虽然朴社成立的最初动因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相似的理念。朴社这一名称就跟“朴学”有关，而朴社成员大都是性情比较温和的知识分子。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79—80页。

朴社成员几乎都没有留学经验，甚至不少成员只有中学学历，但他们大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和商务印书馆编辑。朴社成立的最初动因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此前他们曾专门讨论过“学术界生活独立”的问题。与其他因为理念而结合的知识团体相比，朴社的成立缘由似乎显得有些形而下。但这正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学术独立和生活独立的密切关系，他们得出一个比较超前的结论：学术独立需要以生活独立为前提，生活独立不能一味拒绝而是要充分利用文化的商品化。朴社规定社员每月需交纳十元会费，等筹款到一定数目以从事出版事业。[注]

参见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09页。

柱常：《潘汉年和创造社的出版部》，载《解放日报》1983年3月3日。

在1920年代前中期，北京是文化中心，广州逐渐成为革命中心，上海并不是最为知识分子瞩目的城市。1921年，郭沫若曾在东京偶遇沈尹默，后者听说他们有在上海办一种纯文艺杂志的计划，第一反应是“上海滩上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注] 尽管沈尹默的评判有些草率，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上海在当时知识分子眼中的位置。时人也曾回忆，1920年代中期“上海的文艺出版物除了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一种以外，几乎是一片荒凉”。[注]

创造社出版部北京分部暂时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二楼东头的现代评论社内，后来先后迁至北河沿46号、景山东街中老胡同17号、亮果厂5号；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则在昌兴街42号二楼。除了北京、广州分部，创造社还在武昌、绥定、扬州、长沙和日本设立出版部分部。日本分部设在东京和京都，由李初梨、冯乃超、穆木天等人负责。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28—1129页。

这三路办法系发起人之一王伯祥提出，但具体内容不详，只能根据他的日记进行推测。商金林：《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上海朴社始末》，见商金林：《求真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925年11月，北京朴社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对门即景山东街17号开办“景山书社”。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92—93页。

商金林：《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上海朴社始末》，见商金林：《求真集》，第13—14页。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的知识分子呈辐射型，他们不断尝试到北京、广州等地发展。创造社创办出版部并设北京分部和广州分部，朴社则分为上海朴社出版部和北京朴社。1921年6月成立的创造社是非正式团体。1926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北京分部率先成立，地址就在北京大学的现代评论社内；3月，创造社出版部营业课在上海闸北成立；4月，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成立。[注]在此前后，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从上海到广州，郑伯奇从日本到广州，他们都在广东大学执教。由于1923年年底顾颉刚的北上，朴社也分成北京同人和上海同人。他们围绕朴社的社址和发行机关产生三路分歧：“第一路”坚持把发行所设在上海；“第二路”则坚决反对发行所设在北京，否则退社；“第三路”要求把社址也设在上海。[注]与《新青年》相似，朴社成员展开了激烈的城市争夺战，最后，北京同人成立北京朴社，出版了《古史辨》等书；[注]上海朴社解散，但保留了“朴社出版部”，上海同人也成为开明书店的主力。[注]创造社和朴社不约而同地成立出版部，以摆脱其他出版机构的压制，它带来双重效益：在经济上，可以通过出版书籍增加收入；在文化上，可以通过出版自己的书籍增加影响力。

鲁迅：《两地书·六九》，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1页。

在192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学欠薪和政治高压，北京的知识分子陆续开始外迁。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之聘到达广州，与朴社骨干顾颉刚和创造社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交往经历。还在厦门的时候，鲁迅就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自己去广州的两点“野心”：第一，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鲁迅在广州的首要问题。

在鲁迅的通信中，顾颉刚“所荐之人”的数目在短短半月内变幻莫测：1926年9月20日，是“两三个”；9月25日，是“三人”；9月30日，是“七人之多”；10月4日，又为“五六人之多”；10月16日，称《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10月20日，再次称“现代评论”派的势力要膨胀起来。鲁迅：《两地书·四二》《两地书·四六》《两地书·四八》《261004·致许寿裳》《两地书·五六》《两地书·五八》，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9、126、135、484、157、163页。

顾颉刚最初推荐潘家洵、陈乃乾，后者未赴任，顾改荐容肇祖。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07—108页。

鲁迅：《260907·致许寿裳》，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80页。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00—106页。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17页。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认为，“语丝”这一刊名是由顾颉刚提出而被同人通过的。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88页。但鲁迅持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翻开，用指头点下去便得了“语丝”的名目。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66页。研究者的发现分别印证了他们的部分说法，由于刊物的名称一时想不出来，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薛绥之：《关于“语丝社”》，载《语文学习》1979年第6期。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88页。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17—119页。

鲁迅：《270426·致孙伏园》《270612·致章廷谦》，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2、548页。1927年4月26日，鲁迅在致孙伏园的信中提到顾颉刚“反对民党”；5月11日，这封信刊登于孙伏园编辑的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6月1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提到“我已寄了一封信，开了一点小玩笑，但不知可能登出”。查阅鲁迅5月11日至6月12日的日记，可以知道他曾再次给孙伏园去信，但并未得到回复，也无从得知此前信件已经刊登的消息。鲁迅：《日记十六》，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655—659页。鲁迅在对顾颉刚提起诉讼的回复中，也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回应了这种“人命关天”的事件。鲁迅：《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39—40页。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16、110页。

鲁迅的逻辑是：一边否认自己“有什么派”，一边指责对方“倘非将一人定为某一派，则心里便不舒服”。鲁迅：《270612·致章廷谦》，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7—548页。

针对鲁迅的“顾来鲁走”，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提出“顾去傅去”，如果顾颉刚离去他亦辞职。根据一个亲近鲁迅的学生叙述，中山大学学生对鲁顾之争有四种意见：第一，极力挽留鲁迅，拒绝顾颉刚；第二，挽留鲁迅、傅斯年，对顾颉刚不欢迎亦不拒绝；第三，对鲁迅、傅斯年、顾颉刚均挽留；第四，挽留鲁迅、傅

斯年，暂聘顾颉刚外出买书，下期不再聘。第四种办法能够被委员会接受，也对鲁迅做出了重大让步，但那名学生也承认除非第一种办法，鲁迅断难挽留。孙伏园：《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见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9—190页。

所谓“绅士”，就包括顾颉刚在内。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已经成为公案，此前他们就曾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产生分歧。鲁迅反复指责顾颉刚喜爱推荐自己人，以至现代评论派弥漫厦门大学，[注]其实顾颉刚推荐人选多为朴社同人，[注]而鲁迅本人曾推荐“太炎门生”许寿裳未果。[注]长期以来，研究者从鲁迅的角度将这场风波视作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是非之争，顾颉刚之女顾潮则认为这是北京大学法日派和英美派的宿怨所致。[注]根据桑兵先生新近的研究，“两者均不属于北大对立竞逐的两派，至少不是其中的骨干”，但种种原因使得“鲁迅将原属于语丝派的顾氏目为现代评论派”。[注]事实上，顾颉刚曾与20多个知识团体有关，[注]很难确定他究竟属于哪一个，而这也使得他很容易被划离或划归某一知识团体。鲁迅和顾颉刚的矛盾在广州进一步激化成暴风骤雨。鲁迅在中山大学时听说顾颉刚也将来任教，表示“他来，我就走”，[注]后来校方派顾颉刚去浙江等地采购图书，使两人避开狭路相逢的场面。[注]鲁迅离开中山大学后在报上称顾颉刚“反对民党”，他轻描淡写地把这称作一个“小玩笑”，[注]但在当时“反对民党”极有可能成为致命的罪状。[注]鲁迅之所以开这个致命的玩笑，是因为他怀疑顾颉刚的“同党”在香港的报纸上制造他的谣言。从鲁迅和顾颉刚的激烈冲突中，可以看出鲁迅有着非常强烈的派别划分意识，这并不是说他本人想创建什么“鲁迅派”，而是指他喜欢将对方分门别类。[注]如果这种派别划分比较准确倒还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他常用的三种逻辑：第一是筛选法，比如夸大顾颉刚和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对顾颉刚和语丝派的关系则轻描淡写；第二是排他法，“顾来鲁走”的说法即彰显了这一点；[注]第三是有罪推定法，因为怀疑顾颉刚的“同党”造谣便回击一个致命的玩笑。前面提到，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将具有国民党背景的现代评论派当作“研究系”加以讨伐。在这里，鲁迅再次有意或无意地将认同国民党的顾颉刚当作“研究系”。

参见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第200—202页。这篇文章还谈到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也前去执教。这与事实有出入，成仿吾去广东大学当在郭沫若之前。参见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92—293页。

郭沫若：《坠落了一个巨星》，转引自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第201页。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99页。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93页。

成仿吾、鲁迅等：《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见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第150页。

鲁迅：《日记十六》，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671页。

鲁迅：《270925·至李霁野》，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3页。

鲁迅和未名社、沉钟社有着长期交往，后来未名社与开明书店合作，鲁迅退出未名社。韦从芜：《未名社始末记》与冯至：《鲁迅与沉钟社》，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如前所述，开明书店的主力恰恰是朴社的上海同人。

相比之下，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最初交往则显得和风细雨。鲁迅之所以会去中山大学，至少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共产党员的推荐，[注]一说是创造社核心人物郭沫若的邀请。[注]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郭沫若已经开始接近共产党。[注]尽管那时的郭沫若无暇顾及创造社的事务，[注]并且已经离开中山大学，但鲁迅和创造社的关系却逐渐紧密，刚到广州没几天就拜访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注] 1927年4月，他与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共同发表宣言，批评英法暗中或公然帮助军阀孙传芳屠杀工人，号召世界无产民众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团结起来。[注]在离粤赴沪前，鲁迅去创造社买书，对方坚不收钱。[注]第二天，他在给一位未名社朋友的信中提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同时不免有些过誉地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并且表示如果这三社沉默“全国真成了沙漠”。[注]在这三社之中，鲁迅和未名社、沉钟社的关系要比创造社更为密切。[注]

鲁迅：《而已集·通信》，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6页。鲁迅生前不同意文集收入他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讲演记录稿，根据马蹄疾的考证，鲁迅删去相关的两篇记录稿，不仅因为他自己所解释的内容有“漏落，错误”，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2页。

邹鲁还在《国立广东大学十三年度概览序》中写道：“本校为大元帅所手创，为大元帅三民主义之演讲地，入本校者，务当凛念大元帅如在其上，努力为大元帅三民主义而奋斗。”参见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第121、131页。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黄义祥：《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的功绩》，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49—55页。

［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59—76页。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第200—202页。

鲁迅刚到广州，就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特别说明自己的身份是“教员”而不是“战士”或“革命家”。[注]如此区分两种身份，说明时人很容易把它们混淆起来，这跟中山大学的“党校”性质有关。1924年，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政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根据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校长邹鲁的回忆，该校负有双重使命：“一是西南的最高学府，一是本党革命人才的大本营。”[注]特别值得一提的细节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经过这次“改组”，国民党以“党统”代替了“法统”，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注]会议结束没有几天孙中山就发布了筹建广东大学的命令，他还亲自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按期演讲三民主义，分令党政军和各学校师生前来听讲。等到广东大学正式成立之时，学生已多为国民党党员，他们与黄埔军校学生被孙中山并称为“文学生”和“武学生”。[注]1926年，为纪念去世的孙中山先生，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此前，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身份成立了国民政府，其正统性来源已非国会，而是革命领袖的遗嘱，“党治”原则比孙中山生前贯彻得更为透彻。[注]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占据话语强势，[注]中共在中山大学的力量特别强大，中大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如果得不到中共的允许，甚至进不了中大，[注]这种现象直至清党运动才发生改变。

鲁迅：《两地书·二》《270919·致翟永坤》，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4、574页。

经历过女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一系列风波，鲁迅逐渐对大学失去兴趣。早在女师大风潮之后，他就向许广平表示“进（疑为‘近’——引者注）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他还特别提到“金钱的魔力”对学校的影响；等到中山大学风波之后，他表示对政、教两界不再有涉足的兴趣，[注]那时他已充分体验过大学之中政、教的互相渗透。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之所以在上海而不是北京度过，大概也跟这有所关联，上海使得从事自由职业更为便利，而北京则主要依靠大学来谋生。如果说在1920年代前中期，上海属于知识分子外迁的辐射型城市，广州属于知识分子移居的向心型城市；等到中后期，两座城市的位置则颠倒过来。下面我将以上海为中心，探讨1927年至1930年间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二、

1920年代后期上海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1．知识分子的“内战”

参见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927年10月，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海上颠簸，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了上海。在此前后，郭沫若、阳翰笙、李一氓等人在参加南昌起义之后辗转来到上海，茅盾、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宋云彬、汪原放、孙伏园、林语堂等从武汉赴沪，夏衍、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王学文、傅克兴、李铁声、沈起予、许幸之等从日本留学归来，徐霞村、巴金等从法国留学归来，洪灵菲从南洋流亡归来，柔石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失败后来到上海，刘呐鸥从台湾返回上海，李璜从重庆来到上海，李小峰等从北京逃到上海。除了这些不期而至的客人，当时的上海已经居住着大批知识分子：张元济、蔡元培、朱经农、王云五、高梦旦、徐新六、汪孟邹、周建人、叶圣陶、夏丏尊、赵景深、郁达夫、张君劢、张东荪、施蛰存、戴望舒等。一时之间，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专业和各种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已经名满天下，另一部分虽然当时尚未为人所知，但在日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中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政治因素来看，当时南、北两方分别在蒋介石、张作霖的统治之下。1927年4月，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不再是昔日的革命圣地；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1927年8月，张作霖把国立北京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科学校等京师国立九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恢复陈旧的教育方式，教授纷纷离校。除此之外，1927年武汉曾经成为短暂的革命中心，知识分子一度聚集其中，随着“七一五”事变后武汉和南京从对峙到合流，知识分子很快四散。南（广州）、北（北京）、中（武汉）先后出现政治变局，已不适合知识分子居住。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69页。

梁实秋：《谈闻一多》，见《梁实秋散文》（第1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第387页。

从经济因素来看，北京高校欠薪已久，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比较艰苦。如果说政治因素在1927年前后突呈激化状态，经济因素则存在已久，北洋政府长期拖欠教

员薪水，北京国立八校的索薪运动从192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蔡元培等国立八校校长曾因为经费积欠达五个月以上而共同提出辞呈。1921年6月3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公立中小学教职员和小学以上的学生共上万人，因教育经费等问题请愿，李大钊、马叙伦等教授被打。马叙伦后来回忆时，称“六三事件的规模，实在远过‘五四运动’”。[注]除了家道殷实的世家子弟，当时留学生的生活也比较清苦。像闻一多之类的清华官公费留学生，每月80元也只够生活所需，再加上需要购买绘画颜料、帆布和诗集等，不免捉襟见肘。[注]相比之下，当时上海有着发达的出版和传媒业，知识分子很容易找到谋生方式，再加上其他城市出现政治高压，它就成为一时之选。

1930年左右部分知识分子纷纷离开上海：1929年，李璜、张君劢、叶公超、余上沅、饶孟侃（子离）离开上海；1930年，胡适、梁实秋、张东荪离开上海；1931年，罗隆基离开上海，奔波于京沪之间的徐志摩因为飞机失事身亡。当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留在上海，如鲁迅、朱镜我、李初梨、钱杏邨等。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那就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离开了这座城市，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则留在这里。本书将主要论述以下三个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光谱：以胡适、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他们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包括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刘英士、叶公超、余上沅、饶孟侃等；鲁迅和他周围的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具有左翼倾向的批判知识分子，包括柔石等；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他们多是中共文化支部的成员，包括成仿吾、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夏衍、阳翰笙等。由于篇幅有限，张君劢、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李璜等中国青年党领袖，叶圣陶、夏丏尊等立达学园／开明书店的教育界人士，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等现代派作家，以及史量才等著名报人将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

2．胡适的交往网络

胡适1927年的日记非常简单，没有相关记载，但他在1928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我去年离美国周年，又是上海‘清党’的周年。”《胡适日记全编》（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1927年4月12日，正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运动时，胡适也从美国启程回国，[注]他在上海有着为数众多的朋友（表4-7）。

表4-7 胡适在上海的朋友（1927年）

姓　名	籍　贯	生年	任职（1927年前后）
张元济（菊生）	浙江海盐（生于广州）	1867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
蔡元培（孑民）	浙江绍兴	1868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年6月，大学院院长
朱经农	江苏宝山（生于浙江浦江）	1887	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部长；光华大学校长；1927年秋，上海教育局长
王云五（岫庐）	广东香山（生于上海）	1888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高梦旦（凤谦）	福建长乐	1870	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
徐新六（振飞）	浙江余杭	1890	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
汪孟邹	安徽绩溪	1878	亚东图书馆经理
汪原放	安徽绩溪	1897	亚东图书馆（其间曾赴汉口任《民国日报》编辑）

从年龄来看，1867年出生的张元济和1897年出生的汪原放前后相差30年。这表明胡适不仅在横向上与同代人交往密切，而且在纵向上与上一代有着良好关系。正当胡适奔走于英美时，徐志摩也从北京迁居上海，1927年4月他正式居住于环龙路花园别墅11号。胡适和徐志摩在未来的几年里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他们在1927年前后纷纷来到上海（表4-8）。

表4-8 胡适、徐志摩在上海的其他朋友

姓　名	生　年	学　历	原居住地	抵沪时间
高一涵	1885	日本明治大学	北京	1928年左右
张慰慈（祖训）	1890年左右	艾奥瓦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	1928年左右
梁实秋	1903	哈佛大学文学硕士	南京	1927
余上沅	1897	哥伦比亚大学	南京	1927
闻一多	1898	科罗拉多大学	湖北	1926
饶孟侃（子离）	1902	芝加哥大学	北京	1927
潘光旦	1899	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硕士	美国	1926
罗隆基（努生）	1898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英国	1928
叶公超（崇智）	1904	剑桥大学文学硕士	北京	1927
丁西林	1893	伯明翰大学理学硕士	北京	1927
刘英士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上述知识分子主要源自两处：一处是从北京南下，另一处则是留学归来。从求学经历来看，他们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英美派”。从年龄来看，胡适、高一涵、张慰慈等北京故交多出生于1885年至1890年间，梁实秋等海上新朋基本出生于1895年至1905年间。1891年出生的胡适和他们相差十岁左右，几乎已是两代人；倒是1897年出生的徐志摩和他们年岁接近，来往更为密切。

在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中，关于上海三年以“中国公学的复兴”为标题，《新月》月刊以及人权论争只是一笔带过，这大概与作者是中国公学学生有关。参见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见胡不归等：《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62页。

王云五：《我所认识的朱经农先生》，见氏著：《旧学新探》，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胡适日记全编》（5），第325—326页。

关于胡适的上海时期，研究者多强调他与中国公学的关系。[注]如果翻检胡适日记，会发现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大学院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而这两个机构都不在上海。在这三四年中，胡适频频谢绝上海以外高校的聘任，他与朋友们却多在上海的大学里执教。除了大学院和中基会这两个外地机构，胡适还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有一定的渊源。他在上海的老朋友张元济、王云五、朱经农、高梦旦均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要职，但在1928年，商务印书馆却成了胡

适所感慨的尾大不掉的“大公司”。此时张元济已经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改任董事会主席，[注]类似于“退居二线”；朱经农暂离商务担任上海教育局长，后在大学院、教育部任职；[注]高梦旦向商务印书馆辞职，甚至王云五也萌生去意。[注]虽然胡适依然与以上诸位朋友有着频繁往来，却纯属私交，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不免有些疏远。

徐志摩：《致李祁·290721》，见虞坤林编：《志摩的信》，第205页。

他的著作主要交由亚东图书馆印行。在上海期间，他还与新朋友们创办了新月书店，直接出版自己的著作。亚东图书馆的核心人物是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他们都是安徽绩溪人，与胡适有同乡之谊。“新月同仁”分别偏向于文艺兴趣和政治兴趣，两种兴趣之间存在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也表现在《新月》杂志之中，它早期以文艺为主，后期则侧重于政治。1929年7月，徐志摩“颇想另组几个朋友出一纯文艺月刊，因‘新月’诸公皆热心政治，似不屑治文艺”。[注]除了关注对象的不同，他们还围绕经济支出（新月书店股份）和文化身份（《新月》的社长和主编）产生过正面冲突。分歧不仅发生在胡适和徐志摩之间，也发生在胡适、徐志摩和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之间。

徐志摩：《致梁实秋·3011XX》，见虞坤林编：《志摩的信》，第380页。
《胡适日记全编》（5），第177页。

当时有一种“胡圣潘仙”[注]的说法，指胡适和潘光旦家分别成为朋友聚会的中心。在胡适1928年的日记中，也能见到“今天是星期，我家中来客最多，终日会客”的字样。[注]与此同时，胡适等人还在筹划一份叫作《平论》的周刊，并在1929年经常进行平社的聚餐。从新月聚餐过渡到平社聚餐是在1929年，这正是胡适、罗隆基和梁实秋等人发起“人权论战”的一年。尽管《平论》周刊最终并未出版，《新月》杂志却从第2卷第2期（1929年4月）开始增大了政治类文章的篇幅。从参与聚餐的人员也能看出，除了同时参与两项活动者，参与新月聚餐者更偏向于文艺方面，而参与平社聚餐者更偏向于政治和学术方面。

梁实秋：《忆“新月”》，见《梁实秋文集》（第3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56—57页；梁实秋：《谈闻一多》，见《梁实秋文集》（第2卷），第534页。
梁实秋：《槐园梦忆》，见《梁实秋文集》（第3卷），第558—559页。
梁实秋：《谈闻一多》，见《梁实秋文集》（第2卷），第492页。
梁实秋：《清华八年》，见《梁实秋文集》（第3卷），第21、36、38、40页。
梁实秋：《悼念余上沅》，见《梁实秋文集》（第3卷），第467—468页。

除了胡适极司菲尔路的住宅，潘光旦家也成为朋友经常聚会的地方，以致有“潘仙”一说。梁实秋和闻一多刚到上海的时候就住在施高塔路恒丰里的潘光旦家，梁实秋后来搬至外面，但经常与朋友以潘宅为中心讨论问题。他与闻一多、饶孟侃等人提出异议，不赞同《新月》由一两人独断，便是在潘宅做出的决定。[注]而梁实秋后来迁居至爱多亚路，右邻是罗隆基夫妇，前弄住有丁西林。[注]这些人多有清华背景，闻一多和罗隆基是同班同学，在班次上比梁实秋早两年，[注]潘光旦在班次上比梁实秋早一年。梁实秋和张禹九是同学，两人曾发起成立“清华戏墨社”；梁实秋、闻一多和饶孟侃都是“清华文学社”社员；梁实秋还和吴景超同住一个寝室。[注]余上沅系清华教务处职员，与梁实秋有师生之谊，但两人仅相差五岁，后来成为朋友。[注]这些清华同学随后赴美留学，到《新月》创刊时已有十余年交情。

3．鲁迅的交往网络

1927年10月3日，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海上颠簸，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了上海。他们最初也只是想把上海作为一个中转站，因此先下榻于共和旅馆。他决意离开广州有多方面原因：从学术环境来说，鲁迅对顾颉刚的到来非常不满，很快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从政治环境来说，“四一五”事件使鲁迅再次目睹了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从文化环境来说，广州的出版业远不如上海发达。虽然鲁迅有着重返北京的计划，但两方面的原因阻止了他的返回：一方面跟北京的政治环境有关，张作霖的高压政策使得知识分子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跟鲁迅的个人情况有关，他回到北京有可能“无处可住”。鲁迅对杭州的态度相当暧昧，在章廷谦等杭州好友的邀请下，他有赴杭的计划，但由于涉嫌人事纷争，最后放弃。总体来说，虽然他明确表示要离开广州，却没有最终目的地，而是打算以上海为中转站，暂时“漂流”一段时间。准备“漂流”的鲁迅最终选择了上海，与其说上海是一座理想中的城市，不如说鲁迅寻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去处。各种因缘际会最终使得他一直居住于此，再也没有离开。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5页。从1929年1月起，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教育部的“编辑费”。鲁迅：《日记十八》，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750页。

鲁迅、景宋：《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1、341页。

在离粤赴沪之前，鲁迅就已经决定不再涉足政、教两界，并把学校称作“秘密世界”。但是在上海期间，他与大学院和学校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或许只有深入“秘密世界”的内部，才能洞悉其中的秘密。1927年12月，鲁迅刚到上海没有多久，就应大学院长蔡元培之聘，担任了特约撰述员；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理部务为止，他一直按时领取着每月300元的报酬。[注]从执教为生到自由职

业通常会经历一段比较艰难的过渡期，在此期间需要经受经济上的考验。特约撰述员的报酬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不仅使得鲁迅在上海的最初生活成为可能，而且使得他顺利转型。政府部门的聘书居然催生了一个自由职业者，悖论就这样成为现实。许广平曾跟朋友提到当时收入的三个来源：一是鲁迅著书、她校对的收入，这部分是零用钱；一是鲁迅“在南京有事（不须到）月可三百”，一是“每月北新版税，亦有数百”。后两者在扣除生活费、北京家用之后还有余裕。对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尤其是具有独立精神的写作者来说，领取国民政府的薪金很容易构成道德上的压力。所以许广平在提到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报酬的时候，用“在南京有事”代替。1929年5月，她写信给在北京省亲的丈夫：“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注]

“特约撰述员”又称“特约著作员”，蔡元培曾忆及吴稚晖、李石曾、鲁迅等皆受此聘。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512页。

在对待大学院的态度上，鲁迅和胡适完全不同：鲁迅接受了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聘书，但并不过多过问大学院的事情；胡适坚辞大学委员会委员未果，却积极参与其中各项事务的讨论。不过，这种区别既不能证明鲁迅淡泊名利、胡适汲汲于功名，也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两人在大学院担任的职务决定着他们的行动：特约撰述员由“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注]不必也无权过问大学院事务；而大学委员会委员则是大学院的核心机构，从体制上控制着教育界命脉。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鲁迅和胡适在学术界的地位有着显著差别。两人对于大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前面已经提到鲁迅逐渐对教界失望，而胡适则始终对大学抱有希望。

王锡荣：《鲁迅上海时期演讲考略》，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郑伯奇这篇文章原刊于1936年11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5期，讲演学校是“沪西D大学”，文章收入《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时改为“沪西大夏大学”。但据考证，郑伯奇所提到的那次讲演当在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390页。

王锡荣：《鲁迅上海时期演讲考略》，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第301—306页。鲁迅于1930年2月中旬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3月2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鲁迅：《日记十九》，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808—817页。

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鲁迅有案可查的讲演共计60次左右，在上海的讲演主要集中在1927年和1930年两个时间段。第一个高峰期并不奇怪，鲁迅几乎每次新到一座城市，都会接到很多讲演邀请，比如1926年9月到厦门、1927年1月到广州和两次北平省亲期间，1927年10月到上海后自然也不例外。[注]鲁迅的讲演为什么会在1930年前后达到第二个高峰期，并且集中在一个月之内？研究者一般都会采用当事人郑伯奇的说法，他提到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后，为了宣传新的文学主张，他和鲁迅曾被分配到大学去演讲。[注]王锡荣先生经过考证，提出另一种看法，即鲁迅讲演并非“左联”所分配，而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所分配。[注]事实上，两个团体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组织。不管究竟是何种组织，此时鲁迅的“讲演”已不再像从前一样完全是“接受邀请”，而是“被分配”。每次讲演往往不是鲁迅一个人，比如3月9日中华艺术大学的讲演者还有郑伯奇，3月13日大夏大学的讲演还有潘汉年、郑伯奇、王望平，3月19日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的讲演者还有郑伯奇等人。这些人大都是中共党员，而中华艺术大学也从1929年起就被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办。[注]

1931年12月，鲁迅在大学院的特约撰述员职务被中止，他在大学的讲演也日渐稀少。可以看出，虽然鲁迅在赴沪前后即做出脱离政、教两界的决定，但1927年到1930年还只是一个过渡期，他与这两者依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在不断建立卖文为生的渠道。直至1930年代以后，鲁迅才逐渐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69页；《271107·致章廷谦》，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91页。

就在1927年10月鲁迅即将赴沪的时候，北京的《语丝》周刊被张作霖查禁，发行该刊的北新书局也被查封。[注]这并不全然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它促使《语丝》和北新书局南下上海。鲁迅抵达上海只有三天，即看房准备定居。在此期间，来往最为密切的正是孙伏园、孙福熙、李小峰夫妇等，他们几乎天天碰面。前面提到许广平提及上海生活有三个收入来源，其中之一即“每月北新版税，亦有数百”。

鲁迅：《270707·致章廷谦》《270717·致章廷谦》《270728·致章廷谦》《271226·致章廷谦》，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56、559、563、605页。

当时孙伏园、孙福熙兄弟与李小峰已有不合，鲁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伏园和小峰的事”“春台小峰之争”。[注]虽然鲁迅对其中原委不甚清楚，并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跟他们保持往来，但在私下场合多次表示不满。鲁迅对孙伏园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划清“敌我界限”，居然对“正人君子”的《现代评论》称赞有加。鲁迅对孙福熙的不满则与后者与新月书店的合作有关，他称“春台为叭儿辈效力”，并多次在信中发出感慨。在此前后，鲁迅对李小峰的北新书局也逐渐不满，有时把它与现代评论派联系起来，有时则把它与新月书店对比。在感慨“春台小峰之争”的

同时，鲁迅敏感地注意到《北新周刊》刊载政治书籍的广告，推测这与现代评论派成员陈翰笙有关，并进而怀疑“现代派已侵入北新”。

鲁迅：《280222·致李霁野》，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9页。
《柔石家书辑存》，载《东海》1980年第3期。

《语丝》迁至上海出版后，鲁迅曾感慨“一移上海，便少有在京的人的作品了”。[注]在1927年到1930年间，他既与留在北京的友人渐行渐远，也与居住在上海的北京朋友逐渐疏远。当初他之所以选择“漂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一批学生追随他。通过重建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鲁迅既可以整合这些资源，年轻一代也可以通过鲁迅迅速获得文坛承认。比如柔石不仅通过鲁迅获得翻译书籍换取稿酬的机会，还在家信中称“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他肯为自己的作品写序，可使“前途之命运”不再窘迫。[注]

薛绥之：《鲁迅与内山完造》，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第132—133页。
《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卞立强译，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503页。
薛绥之：《鲁迅与内山完造》。

上海以书店云集而著称，书店之间具有不同的分工。对于鲁迅影响最大的恐怕非内山书店莫属，同时鲁迅也使得内山书店成为重要的文化场所——两者相得益彰。从1928年到1935年，根据《鲁迅日记》的书账，鲁迅每年购书费用在600元到2400元之间。这些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文书，其中绝大部分又是从内山书店购买。[注]鲁迅去内山书店共500次以上、购书1000册之多，中国书店买不到或不能销售的书，往往在内山书店都能买到。[注]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不仅鲁迅从内山书店购买大量书籍，内山书店还代售、代办了鲁迅的书籍。[注]鲁迅曾以“三闲书屋印行”的名义出版书籍，其中四种由内山书店代售，还有的书籍则托内山送到日本东京去印刷。[注]内山书店对于鲁迅来说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还承担着其他书店无法承担的功能。对于缺乏体制内交往空间的鲁迅来说，内山书店成为他跟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内山书店成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空间，一方面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认识了大量日本人士；另一方面鲁迅可以在此约见朋友，文学青年慕名前来结识、拜访。

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第207页。

如果说内山书店是鲁迅与外界来往的中转站，借此可以看出他的广泛人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电影院则是鲁迅经常出入的另一处场所，与他同行的往往是一些

交往比较密切的朋友，具有一定的内部循环性。据不完全统计，鲁迅曾在上海27家影剧院看过大约140场电影。[注]内山书店是鲁迅与朋友甚至陌生人交流的空间，电影院则主要是鲁迅与密友在一起的空间。在1927年至1930年间，与鲁迅结伴而行、同去电影院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鲁迅的家属和亲戚，比如许广平、周建人、王蕴如（周建人夫人）、周晔（周建人女儿）；另一部分是鲁迅的学生，以朝花社成员为主，比如柔石、崔真吾、王方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住在景云里。他们之间最初的交往促成他们居住在相邻的空间里，比如鲁迅的住所便是周建人介绍，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等人的住所则是鲁迅介绍；相邻的生活空间又促使他们之间交往更加密切，比如鲁迅与居住在景云里的年轻人组成朝花社。但是，人和空间的关系不是决定论所能涵盖，共同的生活空间使得他们之间的密切交流成为可能，却不是必然如此。比如同样是居住在景云里的朝花社成员，柔石成为鲁迅的“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崔真吾、王方仁却渐行渐远。而廖立峨虽然曾寄居在鲁迅家，他们的关系却最终破裂。

4．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交往网络

创造社的两种分期方式，都源自郭沫若写于1930年的文章。关于创造社分期的详细论述，参见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42页。

一则题为《〈现代评论〉出版了！》的短文明确指出：“现代评论撰述人，包含‘太平洋’‘创造’两社全部社员和其他国内有名杂志的执笔者。”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第1067页。

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1112页。

创造社有两种分期方式：一种是二分法，另一种是三分法。三分法把《创造》季刊或《创造周报》时期视为创造社初期，时间是1921年6月到1924年5月；把《洪水》时期视为创造社中期，时间是1924年6月（一说1925年9月）到1927年年底；把《文化批判》时期视为创造社后期，时间是1928年1月到1929年2月。[注]二分法则把中期创造社合并到前期或后期，却忽视了中期创造社的一个显著特点：具有包容性。前面曾提到创造社既和英美派知识分子团体太平洋社联合，成为“现代评论派”的前身；[注]也曾准备和鲁迅联合，这便是中期创造社的事情。冯乃超把创造社的这段时期称作“最少‘组织’‘集团’气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最少宗派情绪的时期”。[注] 1927年12月，就在创造社从中期转型为后期的时候，另一个文学团体太阳社也宣告成立。这两个社团的主要成员情况如下（表4-9）。

表4-9 创造社与太阳社的主要成员

	创造社			太阳社
	前期	中期	后期	
主要成员	郭沫若 成仿吾 郑伯奇 郁达夫 张资平 田　汉[3]	郭沫若 成仿吾 郑伯奇 郁达夫 潘汉年 周全平 王独清	郭沫若 成仿吾 郑伯奇 李初梨 冯乃超 彭　康 朱镜我	蒋光慈 钱杏邨 孟　超 杨邨人

3 成仿吾称“田汉是我们的朋友但未参加创造社”。成仿吾：《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关于创造社等问题的谈话》，见《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92页。这种说法与事实有所出入，早期创造社是非正式团体，田汉不仅参加了最初的“成立会议”，而且与郭沫若等联名发表《创造》季刊出版预告，这两件事情成仿吾均参与其中。1923年春，田汉脱离创造社，与《蔷薇之路》受到成仿吾批评有关。参见吴孟铿编：《田汉年表》，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成仿吾：《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关于创造社等问题的谈话》，见《成仿吾文集》，第290页。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第385、432—434页。

郭沫若抵沪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在1927年10月下旬，但有研究者考证为在1927年11月5至8日之间。参见孙党伯：《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是何时回到上海的？》，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刊登《〈创造周报〉复活了》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至少有三种版本，只有其中一种刊有这个“预告”。参见陈友雄：《鲁迅和创造社成员联名发表的三个文件》，载《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

首先看一下鲁迅和创造社的关系。成仿吾曾在回忆中指出：“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的成员是后一辈。”[注]尽管今人喜欢把鲁迅、郭沫若并列，成仿吾的描述却更符合当时的情景。在1920年代初，鲁迅已经是比较知名的作家，而郭沫若等还只是初出茅庐者。一般而言，上下辈之间存在两种关系：老一辈“扶植”后一辈或者后一辈“颠覆”老一辈。但鲁迅和创造社成员的关系却更为复杂，充满了各种变数。1927年2月，还在广州的鲁迅曾与创造社成员成仿吾等共同签署《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该宣言签署者还有王独

清、何畏，发表于4月份的《洪水》半月刊上，这正是创造社主办的刊物；后又译成日文于6月份在日本《文艺战线》上发表，签署者又增加了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郑伯奇等人。[注]在众多签署者当中，鲁迅是唯一一位非创造社成员。1927年10月，鲁迅刚刚抵沪不久，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的郭沫若也经香港秘密到达上海。[注]鲁迅和创造社依然延续着他们在广州时的关系，于11月会晤了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等创造社成员，商议组织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事宜；12月他们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创造周报〉优待订户》的广告，宣布《创造周报》即将复刊；次年1月在《创造》月刊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预告。在广告和预告中，鲁迅均名列特约撰述员的第一位。[注]

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第94—95页。

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摘录），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第660页。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5页。

就在鲁迅与上海的创造社成员准备进行深度合作的时候，创造社也在发生着变化。1927年8月，因为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做法和对当时政局的看法与其他成员存在严重分歧，创造社元老郁达夫发表声明退出创造社。[注]郭沫若把自己与郁达夫的对立称作“无产派和有产派的对立”，[注]这袭用了阶级斗争的思维；钱基博指出“郭沫若代表青年抵抗一派”，“郁达夫代表青年颓废一派”，[注]这主要是从文学风格的角度进行评价。郁达夫的离去不像郭沫若所说是创造社维持正常运转的必要筛选，而是使创造社遭受重大损失。这损失也不能仅仅从钱基博所说的文学风格这一思路来理解，郁达夫的离去既说明创造社中期的包容性开始降低，也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载《延河》1962年第7—8期。

［日］斋藤敏康：《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刘平译，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1114—1115页。

创造社中期的结束与郁达夫的离开有关，创造社后期的开始则与一群在日本留学的文学青年中止尚未完成的学业回国有关，他们是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李初梨、冯乃超、彭康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毕业后分发至不同的高等学校，后来又同时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朱镜我则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注]就在郭沫若委托郑伯奇等与鲁迅商谈合作事宜的时候，创造社另一名元老成仿吾却赴日本策动上面诸位文学青年回国。这些创造社新成员在日本受到福本主义的影响，后者认为：“要创立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者集团的组织和密切结合的雅各宾

党，而为了实现这种联合——‘必须在联合之前，首先彻底地分裂’，这就是列宁的组织理论的核心。”[注]这种“分裂联合”的组织理论对他们影响之深，以至于晚年的冯乃超仍然不承认当年的创造社有“宗派主义”，只承认有“文人的小集团主义”，并且表示：“经过论战后的，即分裂后的统一，不是更好的统一么？”[注]

郭沫若：《跨着东海》（摘录），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第828—829页。

宋彬玉、张傲卉：《成仿吾和创造社》，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转引自包子衍：《鲁迅史实寻踪》，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1期。

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3—484、538—539页。

郭沫若与鲁迅建立联合战线的计划，与李初梨、冯乃超等“分裂联合”的计划构成尖锐的矛盾。郭沫若称之为“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注]成仿吾则表示郭沫若准备恢复《创造周报》是“幻想”。[注]最后郭沫若等退让，决定停办《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并在1927年12月18日的《申报》上刊登《〈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急启事》，表示“因编辑上的关系决将《创造周报》停办改出《文化批判》月刊，从十七年元月起，按月逢十五号出版”。[注]从鲁迅的回应文章推测，他并未看到这则紧急启事，直至看到《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再版本封三上的《〈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和《〈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以及一些批判火力十足的文章，方才知道创造社已经不再是合作伙伴。《创造周报》第1卷第8期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一种预告《创造周报》复活，另一种则宣布《创造周报》将改为《文化批判》，甚至连《创造周报》定价广告都来不及取消，只得当即声明取消。[注]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4—163页。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见霁楼编：《革命文学论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52、164—167、171页。

陈颂声：《鲁迅和创造社》，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在1928年1月的《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创造社新成员冯乃超重新梳理了“文学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坛”，以叶圣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五个作家为例，认为他们“代表五种类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的人士”；他还预告，在下一期杂志上有“李君的论文——《如何建设革命文学？》”。[注]可以看出，这次论争的发起经过精心策划，论题也是统筹安排的。在1928年2月的《文化批判》上，如约出现另一名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他进一步梳理了“文学

革命的历史”，还质问：“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注]读到冯乃超、李初梨这两名创造社“少壮派”的文章，鲁迅撰写了《“醉眼”中的朦胧》进行反击。值得指出的是，双方都没有将讨论限制在观点之争上，而是更为强调对方所属的文学团体，甚至延伸到与论题没有多少关系的琐事。在创造社成员的笔下，鲁迅的籍贯、家族、年纪、牙齿等一概不能幸免；在鲁迅的笔下，创造社为建立出版部而募股集资、为应对政治高压而聘请律师的行为均遭到批评。[注]

陈孝全：《蒋光慈生平史实几个问题的辨正和补充》，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79页。

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载《新华文摘》1980年第5期。

稍后一段时间，太阳社也发起了对鲁迅的批判。1928年3月，《太阳月刊》发表了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文章先追溯了“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然后着重对鲁迅进行批判。曾经与郑伯奇一起去鲁迅家商谈合作事宜的蒋光慈（他也曾是创造社社员），最初并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鲁迅误认为蒋光慈联合创造社和太阳社“围剿”他，在1928年的《文学的掌故》中将他称作“蒋光X”。蒋光慈也于1929年1月发表《鲁迅先生》一文，反唇相讥；鲁迅又分别在1929年的《〈奔流〉编后记（十二）》和1930年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称之为“蒋光Y”和“蒋光Z”。[注]这种完全超出文学论争的笔战，使得鲁迅和太阳社的隔阂比和创造社的更深。冯雪峰曾经回忆创造社成员在1929年下半年已经开始改变对鲁迅的态度，太阳社的蒋光慈一直到后来也仍然不尊重鲁迅，钱杏邨比蒋光慈稍好一些，但直到“左联”成立时也不承认过去攻击鲁迅是错误的。[注]

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载《现代》1933年第3—4期。

戴淑真：《阿英与蒋光慈》，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钱璎、钱小惠：《镜湖水——钱杏邨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48页。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85—86页。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31—133页。文化支部和闸北区委的关系，曾任文化支部书记的黄耀还有另一种说法：“一九二八年，在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黄理文、组织蔡博生、宣传李初梨等领导下，文化支部由我担任书记，朱镜我担任组织，彭康担任宣传。组织生活以冯乃超、洪灵菲为首，分为若干小组。”黄耀：《关于上海闸北区文化支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8页。

也有夏衍是太阳社成员的说法，但夏衍本人否认了这一说法。见周正谊：《夏衍是不是太阳社的成员？》，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夏衍在回忆录中也

表示自己既没有参加“太阳社”，也没有参加“创造社”。夏衍：《懒寻旧梦录》，第87页。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85页。

根据福本主义，“分裂联合”的组织理论主要不是适用于文学团体，而是用来建设“雅各宾党”式的团体。从性质上说，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团体，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支部”。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四人在武汉时就有办一份宣传革命文学的文学杂志的打算，甚至连题目都已经定为《太阳》。注由于武汉的形势发生变化，他们陆续来到上海，在瞿秋白的支持下成立春野书店，出版发行《太阳月刊》。太阳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社里成立了一个春野支部，隶属于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注闸北区第二、第三两个支部的成员，大部分是“四一二”事件之后从各地转移到上海的知识分子。太阳社的成员不仅要宣传革命文学，同时也要参与工人运动。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是提篮桥到杨树浦一带，那里工厂比较多；他们的任务是在茶馆和马路上和工人“交朋友、搭关系”。注相比之下，创造社除了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后入党，绝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党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党员阳翰笙和李一氓加入了创造社，并与潘汉年成立了党小组，同年隶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后来，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也入党。第三街道支部原由闸北区委领导，后来改为文化支部，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支部书记最初由潘汉年担任，当时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是李富春。注值得注意的是，创造社、太阳社和文化支部的关系不是完全重合的，比如文化支部成员夏衍既不是创造社也不是太阳社成员。注尽管如此，两个社团在文化支部的控制下应无疑问，他们的成立或工作都有中共高层领导的指导。研究“革命文学”论争，如果只注重参加者的作家身份，不充分重视他们作为中共文化支部成员的另一重身份，就无法理解创造社和太阳社，两者和鲁迅为何分分合合。夏衍所在的党小组中除了他，太阳社成员都有过群众工作经验，钱杏邨和孟超等都参与过工人运动。注创造社成员虽然大多是作家，但中共直接委派党员参加其中，这既促使一些作家被发展成党员，也使得那些党员出于工作的需求逐渐成为作家。正如“文化”对“支部”只起到修饰作用，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首先是党派成员，其次才是作家。

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66—167页。

刘汝醴：《记上海艺术大学的鱼龙会》，载《戏剧艺术》1979年第3—4期。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载《延河》1962年第7—8期。

杨纤如：《左翼作家在上海艺大》，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载《延河》1962年第7—8期。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载《延河》1962年第7—8期。

郭沫若：《离沪之前》，见陈漱渝编：《郭沫若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64页。

与胡适、鲁迅等相比，文化支部在大学的能力有限。1927年，共产党员比较活跃的上海大学被封闭，后来改组为劳动大学。[注]文化支部只能活跃于上海艺术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上海艺术大学是一所私立而未经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同学总共不到百人，学校收入全靠学费，没有政府津贴和有产者资助，经济非常拮据。[注]1929年，位于法租界的上海艺术大学被查封，师生另组华南大学，不久也被查封。一部分师生转到中华艺术大学，另一部分师生重建上海艺术大学，于1930年再度被查封。上海艺术大学第一次被封之前，曾拟聘请创造社成员王独清主持文学系，文学、社会科学和美术三系由创造社成员包揽：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沈启予负责文学课程，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负责社会科学系，叶沉和许幸之负责美术系。[注]被封之后，则改聘王独清为教务长，以免引起注意，阳翰笙等担任文学系教师。[注]不过，关于上海艺术大学和创造社的关系有两种说法。据郑伯奇回忆，两者的合作是在党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注]但据郭沫若日记记载，由于王独清和创造社的关系逐渐疏远，他和上海艺术大学的合作是以个人名义，而非创造社名义。吊诡的是，在郭沫若日记中对王独清担任上海艺术大学职务不满的恰恰是郑伯奇。[注]

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第86—87页。

丁景唐：《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前后史料散记——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而作》，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

杨纤如：《左翼作家在上海艺大》，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第90—91页。

鲁迅：《290221·致史济行》，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654页。

郭沫若：《离沪之前》，见陈漱渝编：《郭沫若日记》，第63页。关于上海艺术大学是野鸡大学的说法，并不是郭沫若一个人的说法，而是为当时所公认的。见刘汝醴：《记上海艺术大学的鱼龙会》，载《戏剧艺术》1979年第3—4期。

冯乃超口述、蒋锡金笔录：《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我的一些回忆》，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左翼作家组织的艺术剧社进行公演的观众，也主要是上海艺术大学、浦江中学、泉漳中学学生，最多的则是中华艺术大学学生。见杨纤如：《左翼作家在上海艺大》，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浦江中学位于公共租界赫德路，创造社成员王学文曾在这所学校执教。王学文：《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第144—145页。

中华艺术大学从1929年起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办，校址迁入窦乐安路233号新建的砖木结构的三层楼花园洋房。[注]这里地处华界、越界租路和租界的交叉

处，属于“不管区”，党的地下组织常在此活动。[注]为了获得公开合法身份，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由陈望道担任，夏衍是教务长兼文学科主任，西洋画科主任是许幸之，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都从上海艺术大学转到中华艺术大学执教中文学科。[注]“左联”成立大会即在这里举行，1930年5月中华艺术大学被查封，后来师生自行启封，是年8月再次被查封。[注]鲁迅和创造社握手言和之后曾多次去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但在此之前他明确表示和这所学校“毫无关系”，针对外面传说他将去该校做教务长，鲁迅表示这是一些人“骗青年的新花样”。[注]上海艺术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都是规模非常小的私立大学，远不能跟光华大学、暨南大学等相比。郭沫若曾把上海艺术大学称作“野鸡大学”，[注]冯乃超也曾把中华艺术大学称作“野鸡大学”。[注]由于当时影响有限，中华艺术大学的旧址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误认作其他地方。除了这两所大学，当时的左翼作家还在两所中学比较活跃：一所是浦江中学，一所是泉漳中学。这四所学校都曾遭到查封。[注]文化支部的活动范围不仅在大学也在中学，这与他们作为党派组织比较注重下一代的培养有关。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91页。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226页。

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册），第204页。

郭沫若：《离沪之前》，见陈漱渝编：《郭沫若日记》，第64、65、77页。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见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56页。

内山书店也是文化支部成员经常出入的地方。夏衍、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都是内山书店的常客，夏衍认识鲁迅也是在这里。[注]郭沫若和内山书店的关系更为密切，1925年他在大夏大学执教时没钱买书，便到内山书店借阅或者立读。[注]1927年4月，郭沫若在上海与李一氓接头时，也是在内山书店。[注]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他秘密居住在窦乐安路，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也已经超出顾客和店主的关系，不再局限于购买书籍。他会赠送内山书籍，内山也会赠送他葡萄酒，并帮他代订日本人开设的旅馆。[注]郭沫若去日本后，很多事务都由内山代理，许广平曾称“内山先生对郭先生的这种友谊，也同样用到鲁迅的身上”。[注]

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第175页；杨纤如：《左翼作家在上海艺大》，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位于北四川路窦乐安路角的公啡咖啡馆有两层，楼下卖糖果，楼上有两间小房可以喝咖啡和冷饮。它是犹太人所开，一般中国人不太会去，而外国人对喝咖啡的

人又不太注意，巡捕和包打听也不会轻易登门，比较安全。[注]公啡咖啡馆离鲁迅和部分文化支部成员住处特别近，创造社和太阳社在筹备成立“左联”时几乎把它当作“根据地”。中华艺术大学、内山书店、公啡咖啡馆和部分文化支部成员的住处，几乎都集中在一起，使得他们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活动空间。

“五四”前后，当“新青年”在与“老夫子”的战斗中逐渐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新青年”内部也开始分化。到了1920年代中期，这些昔日并肩作战的知识分子由于女师大事件及“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事件产生正面冲突。与知识分子分化同步的是他们开始在各个城市流动，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北迁”（如《新青年》的迁移）有关，“新青年”的分化则推动了知识分子的“南迁”（如陈独秀、鲁迅），直至1927年知识分子云集上海。

罗志田：《知识分子与革命：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见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吴言：《“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年祭》，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见《胡适书信集》（上册），第373—375页。

尽管1925年至1926年间北京学界的章士钊执掌教育部、女师大事件及“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事件成为“新文化人分裂的一个转折点”，[注]但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拥有“不容越过的一条线”，哪怕他们之间互相攻击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依然共同谴责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注]1926年5月，胡适还写了一封同时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的信，对三位的笔仗表示惋惜，比喻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并表示这是“我们”自家人的误解和猜疑。[注]可是到了1929年“人权论争”的时候，当胡适、罗隆基等对国民党进行激烈批评并遭受打压时，他们同时遭到昔日的知识分子同盟军的攻击。

1927年，不仅国民政府的军队开始统一全国，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向新闻、教育、学术等领域进驻，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尤为致命。如果说1927年之前，知识分子虽然有内部分歧，他们面对外部的高压政治还能拥有共同的底线；等到1930年之后，他们的内部分歧似乎已经超越了他们对抗外部高压政治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当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的时候，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共同维护一些基本底线，反而陷入“内耗”。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思想还是人事上产生分化，都在情理之中，但是如何避免没有必要的自我消耗，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王晓渔

第五章

疏离与融合：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与上海地方社会

1930年代的上海，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特殊而又颇具吸引力的社会。这里除了繁荣的经济、发达的商业、宏伟的建筑、宽阔的街道和高档的娱乐，更重要的是它拥有繁盛发达的文化出版业。这里拥有一批全国最具影响的文化出版机构，数不清的文化刊物和极具个人魅力的文化名人。它是北京之外的又一个文化中心，每年出版大量的书籍，发行几百种风格各异的刊物，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名人。同时，上海又是一个多种势力相互争斗而又没被任何一种势力控制的世界，外国势力、国民党势力、共产党势力，还有其他势力都相当活跃，从而为居住于此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论和行动的相对自由。这样的一个社会，为知识分子谋生、成名、革命、避难、享乐等提供了可能的机会。

在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1920年代末相继离开上海之后，正是上海社会的这种特殊性，使上海仍然居留着并不断汇聚起为数可观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怀着成为文学家的梦想，或抱着追求革命真理的真诚，或为了躲避政治迫害，或为求得最基本的生活，居留或汇聚到上海这座海纳百川而又光怪陆离的城市。

1930年代居留和重新汇聚到上海的知识分子，因着不同的地缘、学缘、性情和政治倾向等结成不同的群体，通过各自不同的交往网络与上海社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活动空间和舆论表达的空间。他们的交往网络所延伸到上海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他们与上海社会的关系或疏离或融合，进而让他们自身或成为居无定所的漂泊者，或成为植根上海社会的文化移民，或成为上海社会的地方精英。

一、

“左联”知识分子：居无定所的漂泊者

1．“左联”知识分子的汇聚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第36页。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第37页。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来到上海，后来加入“左联”，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参加过国民革命，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得不从实际斗争的前线撤到上海的人。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就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经潮汕、香港等地来到上海的；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等人是在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撤到上海的。钱杏邨、蒋光慈、孟超等人是从武汉经安徽撤到上海的。[注]他们到上海既是避难，又希望在上海这个国民党势力还无法完全控制的城市重新开展革命活动。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被迫回国，带着对文学艺术的热情和施展才华的抱负来到上海，这其中包括创造社的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王学文、沈叶沉等。[注]再有一部分人是从乡村或内地城市或为谋生，或为求学，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为避难而独自来到上海的，如鲁迅、柔石、冯雪峰、胡也频、丁玲、胡风、萧军、萧红等。

此一时期来到上海的，是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只有鲁迅、茅盾、郭沫若、郑伯奇、杜国庠、田汉等年龄稍大，其他人都是不满30岁的青年。这是一批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自小就离开家庭，有的还远离家乡，在学校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同家族的关系已经变得松散。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都是在学校中建立的，这是近代学校开办以来，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特征。表5-1是“左联”成员出生年一览。

“左联”从1930年成立到1936年解散，其间不断有成员加入，也有成员退出，加上不管是加入还是退出，大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究竟共有多少成员，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能弄清的问题。本表所列，系在“左联”活动期间确定的、较为活跃的一部分成员。

表5-1 “左联”成员出生年一览表[注]

姓　名	出生年	姓　名	出生年
鲁　迅	1881	蒋光慈	1901
茅　盾	1896	艾　芜	1904
郭沫若	1892	巴　人	1901
阿　英	1900	戴望舒	1905
田　汉	1898	冯铿（女）	1907
郑伯奇	1895	关露（女）	1907
洪灵菲	1901	胡　风	1902
胡也频	1903	任　钧	1909
李伟森	1903	许幸之	1904
楼适夷	1905	草　明	1913
柔　石	1902	洪　深	1894
沙　汀	1904	穆木天	1900
徐懋庸	1911	杨邨人	1901
阳翰笙	1902	聂绀弩	1903
叶以群	1911	蒲　风	1911
殷　夫	1909	于　伶	1907
张天翼	1906	欧阳山	1908
周　文	1907	李辉英	1911
周　扬	1908	葛琴（女）	1907
丁　玲	1904	端木蕻良	1912
夏　衍	1900	何家槐	1911
夏征农	1904	吴奚如	1906
冯乃超	1901	彭柏山	1910
马子华	1912	周立波	1908
东　平	1910	丽　尼	1909
叶　紫	1910	舒　群	1913
田　间	1916	罗　烽	1909
白薇（女）	1894	白　朗	1912
任白戈	1906		

表5-1显示，在“左联”成立时，年龄30岁以上的有9人（其中刚满30岁3人），20—30岁的有37人，不满20岁的11人。

长期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校园中，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校园以外的社会。自小出入共同的学校，生活在共同的教室，接受着共同的教育，受着同样氛围的熏陶，朝夕相处的学校伙伴，成了他们以后最牢固的社会关系。

当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上海，他们都成了无根的异乡人。在上海这座充满商业和现代气息的城市里，他们没有现成的社会关系可资利用。无论是渴望在这里谋生、成名，还是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他们都必须通过各种管道去重新构建交往的人际关系，以此来寻找亲情、安全感和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的知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林舒等人，依靠写作所得的收入是相当丰厚的。据陈明远先生的研究，鲁迅从1927年到1936年作为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所得收入每年在6000元左右，其间收入最少的一年是1927年的3770元，最多的1929年、1930年都高达15000元以上，这样的收入远远超过生活收入令人羡慕的一般大学教授。其他不如鲁迅有名气的作家如沈从文、茅盾、田汉等每月也有200元以上的收入，相当于一般的大学教授。名气更小一些的文人如柔石、丁玲等，每月的收入也超过或接近100元，相当于上海当时比较有名的演员的收入。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64、200—203页。

后来成为“左联”成员的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大都渴望从事文艺创作。这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学创作具有一种神圣性，它属于艺术，充满了浪漫色彩。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学在改变社会观念方面的功用得到凸显，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把文学视为可以解救国家民族问题的工具，将其定位为自己追求的志业。在这方面，鲁迅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其二是从事文学创作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体面的受人尊重的行业。虽然许多文人在上海没有固定的职业，收入也不稳定，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于文化的推崇，使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士身上仍然带着高贵的光环，而事实上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受惠于上海文化产业的商业化，仍然能够过着令一般民众羡慕的生活。[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把从事文学创作作为自己职业的首选，许多人在求学的过程中就有意识地从事这方面的训练，甚或一批从事理工科专业学习的人，后来也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而成为职业作家。像创造社的张资平在日本帝国大学时学习的是地质学，郁达夫学的是经济学，成仿吾的专业是造兵科，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学的是医学，他们最后都放弃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从事文学创作。

上海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上海接纳所有愿意前来的人，也为其提供了诸多拼搏、冒险和施展才华的机会，但上海却不保证每个人都在这里获得成功，甚至生

存。上海有上海的规则，它充满了文化气息，但商业气息与文化气息一样浓厚。各种各样的文化出版机构对所有人敞开，但利润是铁的法则，这是一道所有渴望进入文化圈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跨过的门槛。

对于在上海毫无根基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要想跨过文化圈的门槛，在上海社会施展他们的才华，有两条路径可走。一条是纠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人共同创办团体和刊物，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在得到社会认可后再走向公共媒体。另一条路就是拿上自己的作品去寻找赏识自己的名家、刊物或出版社。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87页。

1920年代初期成立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情况就属于前者。创造社是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冯乃超、张资平、穆木天、王独清等一批留学日本而又热爱文学的青年创办的。这批人中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冯乃超四人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郭沫若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郑伯奇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其中冯乃超既读过京都帝国大学，又就读过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同属帝国大学的不同校区，严格意义上讲，上述人员都是不同届的校友。田汉和穆木天虽然不是帝国大学的学生，却都在东京读书。王独清虽然在创造社成立的时候不在日本，但他也在日本有过短期的留学，更为重要的是他与郑伯奇同乡，自小有着密切的关系。[注]这些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人员，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很熟悉，生活、学习的环境相同，所受的思想影响基本一致”，[注]彼此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着这种关系，他们通过互访、聚会等方式来往频繁。基于对文学的狂热爱好和意气相投，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于上海创立了创造社。当他们大部分被迫回国后，创造社成了他们聚合的团体。

傅长禄：《中国现代文化史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

太阳社是1928年1月由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等一批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文学团体，成员主要有林伯修、洪灵菲、戴平万、楼适夷等。这个团体的成员虽然在学缘上不像创造社的成员那般纯正，但其主要成员都有过参加武汉政府的经历，年龄相当，学历相当，也都在上海没有根基。他们组织团体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创造社在上海获得成功的刺激，在形式和性质上都有很明显地模仿创造社的痕迹。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蒋光慈等组织太阳社也是为了应对来自文艺界尤其是创造社方面的批评攻击，摆脱个人在遭受攻击时势单力孤的局面。[注]

早在1921年9月29日，创造社全体同人署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就指出“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不点名地批评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些权威人物。在《创造》创刊号上，郭沫若、郁达夫又撰文攻击郑振铎、茅盾等人，说“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去”。在《创造》第1卷第8期上，郭沫若又发表了《英雄树》，发起了对鲁迅的攻击。在《创造》的创刊号上发表的创刊宣言中，对当时在上海的一些颇有地位影响的人物进行了不点名的攻击，这其中可能包括鲁迅、郑振铎、茅盾、周作人等。

有了团体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虽然对上海这一城市非常陌生，但他们可以克隆求学或工作时的环境和氛围，保留既有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必为生计而去单独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困难，也不必顾及上海社会的具体情况。他们不会感到孤独和恐惧，因为团体给了他们安慰和力量，所以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们来到上海后仍然意气风发。在此后他们创办的同人刊物《创造》和《太阳》上，他们不仅发表自己富有激情的作品，同时还对上海文化界享有盛名的文化权威进行挑战。

文学小团体能够为来到陌生环境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就像一个大家庭，相互熟悉的成员都能够从中找到家的感觉。但同时，小团体也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它的成员造成危害，当他们陶醉其中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封闭自己。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创设之初，其成员就颇有些党同伐异的感觉。他们挑起的对团体外成员的攻击，虽然在挑战权威的时候显示了勇气和自信，借此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也因此为自己赢得了社会上的名声，但毕竟也不必要地给自己树立了许多对立面。那些本应成为他们同道或朋友的人，在遭到了不应有的攻击之后，也被迫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这无形中限制了他们自身的发展。

那些只身来到上海，既没有足够多的原本熟悉的同学或同乡建立起团体，也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吸引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孤立的个体，是无根的漂浮者，对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充满了陌生感，即便有个别的老乡或同学可以暂时地寄住，但生存和立足完全是两回事。身无长物而又渴望从事文艺创作的年轻知识分子，要想在上海立足，显然必须依靠自己的主动出击。也许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途径是寻求有名望的人物给予提携举荐。

柔石的情况也许很能代表这类知识分子的情况。

关于柔石离开宁海县教育局长的位子来到上海的原因，有多种说法。魏金枝在他的《柔石传略》中称：“宁海县农民在亭旁发动起义，其中有宁海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二三十人参加，柔石也预闻其事，起义不幸失败，宁海中学被解散，同时牵涉到柔石身上，柔石就单身出走，逃到上海。”见《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郑择魁、盛钟健合著的《柔石的生平和创作》中没有提到“柔石预闻其

事”，其解释是这样的：“亭旁暴动发生时，柔石正在沪杭一带为宁海中学的立案和修建校舍的事而奔忙……暴动宣告失败，宁海中学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柔石身为教育局长，与包定、杨毅卿（地下党员，暴动的领导人）等关系都很密切，必然成为反动派注意的目标，处境同样非常危险。”见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王艾村的《柔石评传》中既不同意“柔石预闻其事”的说法，也不认为“柔石必然成为反动派注意的目标”，他更倾向于认为柔石有“不仅感到‘开展宁地之文化’理想的毁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凶残较之军阀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意识到自己所倾心竭力的教育事业，并不能‘冲破黑暗势力’，更做不了‘人类的救星’”的失望和觉悟。见王艾村：《柔石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王艾村：《柔石评传》，第139页。

1928年6月，当柔石因为不能不出走的理由悄然离开宁海县教育局长的位子来到上海的时候，[注]他所能投奔的最初的人选是他的老乡、正学小学时的同学、时在上海四明医院任主治医师的严苍山。[注]

王艾村：《柔石评传》，第71、115页。

早在1923年6月和1926年春天，柔石先后两次来到上海，就寄住在严苍山那里，当时同柔石聚会的还有潘天寿，这位在正学小学和浙江一师都与柔石同校的、被柔石称为“天寿哥”的学兄。那时的柔石到上海都不过是临时逗留。[注]这一次，柔石是必须在上海长久驻留，并在上海谋生了。严苍山显然无法为身无长物而又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柔石找到合适的工作。要想在上海立足，柔石只能进入知识分子圈子，依靠他的写作谋生。事实上，在柔石来到上海的时候，他就怀揣着完成不久的作品《旧时代之死》，希望依靠它来卖钱度日。

叶紫：《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载《无名文艺旬刊》1933年创刊号。

鲁迅在和许钦文的谈话中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上海……采用老作家的稿子比较稳妥，编辑的人责任轻，不大冒险。……如果我没有写《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你拿两篇稿子，说不定会都退回来，一篇也不采用。”见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另，叶紫的挚友卜息园就是因为没有名气，又无名人推荐，作品多次被书店拒绝，最后悒悒而死。见郑心伶：《鲁迅与青年作家》，花城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对于一个既无社会名望也无社会关系，离开了原有的生活环境只身来到上海这座陌生城市的异乡人，即便才华横溢，能够写出了不起的作品，但在上海这座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城市，“书店老板，看到你是无名人就要头痛三日，更不敢审察你的作品的内容”，[注]要想获得作品的出版，赢得社会的承认，在文学领域立足，那是

件相当不易的事情。有许多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就是由于自己的作品没有门路出版，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而被埋没了。[注]

柔石显然明白这样的道理，他不止一次地对他熟悉的人表达，希望得到鲁迅的帮助。他到上海不久，当林淡秋来看望他的时候，问及他的打算，他就拉开自己的抽屉，拿出他早已写好的《旧时代之死》告诉林淡秋，“暂时只好靠这部稿子”，并说打算去找鲁迅先生为它找出路。

在一个商业社会，名望是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它能够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丰厚的收益。当时居住上海的鲁迅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有名望的人。有他投稿的刊物就会有影响，由他撰写的著作就会畅销，出版他的著作自然就会为追逐利润的文化出版机构带来经济效益，因而鲁迅的作品是那时上海文化出版界的抢手货。因为有名望，许多刊物的编辑和出版社的老板都乐意结交鲁迅，所以鲁迅同出版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左联”成立以前，鲁迅就同当时北新书局的李小峰，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商务印书馆的茅盾、郑振铎，开明书店的章锡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赵家璧等关系密切，至于鲁迅熟悉的刊物编辑，数量更多。

名望还是通行证、保证书，由名人认可和推荐的作品就保证了它的质量，也同时保证了出版机构的利润。故而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得到鲁迅先生的认可和推荐，是出版自己作品的最有效途径。

江苏和浙江同属江南富庶地区，又属长江下游经济带，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通性。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使其在利益上存在着相同的利害关系，因而江苏和浙江人在很多事情上会保持一致的态度，采取一致的措施，故而将其称为一个统一体也能够成立。

柔石想到让鲁迅先生帮助推荐自己的作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除了鲁迅那无以复加的名望之外，柔石还清楚地知道自己同鲁迅之间的渊源。首先，鲁迅和柔石是同乡，这个同乡的范围可能稍微大了些。柔石是浙江宁海人，鲁迅是浙江绍兴人，他们并不同县，但自晚清以至民国，浙江同乡就有着连气同枝的传统，甚至江苏和浙江因同属江南地域而被外界认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注]其次，柔石同鲁迅存在着师生关系。当鲁迅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柔石正在北大做旁听生。柔石认真地听过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虽然鲁迅也许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个学生，但柔石却因此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鲁迅的学生。

柔石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得不善与人相处，对于这一点，许多研究柔石的学者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到。见王艾村：《柔石评传》，第126—127页。

存在着这样的双重关系，让柔石感觉有得到鲁迅帮助的可能性。但柔石显然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注]他能够感觉到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但心中仍惴惴不安，犹豫不决。在柔石，他最习惯的交往方式也许是最传统的那种同熟人接触的方式。他虽是鲁迅的老乡，是他的学生，但他从没有和鲁迅正面接触过；对鲁迅而言，自己还是一个陌生人。故而在上海最早的一段时间里，柔石虽每天为生计犯难，却迟迟没有将寻求鲁迅帮助的想法付诸行动，甚至都没有去打听鲁迅的住址，他一直处在苦闷和彷徨之中，直到有一天偶然遇到自己的同乡王方仁，拜访鲁迅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早在1926年春，柔石第二次来上海的时候，通过浙江一师的同学汪静之的引见结识了王方仁，曾就在杭州谋办一所私立中学的事情两人相谈甚得。二人此次相见，柔石谈到了请求鲁迅推荐《旧时代之死》的打算。王方仁自告奋勇地与柔石相约，由他和崔真吾引领，一起去拜谒鲁迅。

有关王方仁、崔真吾同鲁迅的书信往来，拜访鲁迅及鲁迅与二人逛书店、托二人买书等情况，在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及，见《鲁迅全集》（第14卷），日记十六、日记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当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时候，王方仁和崔真吾正在那里求学，他俩都听过鲁迅的《中国文学史》。当鲁迅任教广州中山大学的时候，王方仁又刚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在鲁迅定居上海后，王方仁和崔真吾不仅同鲁迅时常有书信来往，还不止一次地登门拜访过。鲁迅也时常同二人逛书店，还不时让王方仁替他买书。[注]正是在王方仁的引领下，柔石在1928年的9月，终于在景云里23号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鲁迅。

带有宗族关系的乡亲赋予了成名人物这样的伦理责任，对于同乡的帮助，也是那些成名人物乃至他的家族在家乡赢得赞誉的主要途径之一。鲁迅对于同乡的帮助一方面出于革命文学的整体考虑，出于对年轻知识分子的欣赏和期望，同时也出于对伦理责任的担当，这在鲁迅对许钦文的帮助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许钦文被捕入狱后，鲁迅通过蔡元培的关系对许钦文进行营救，许钦文出狱后，鲁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写信向住在北京的母亲汇报情况，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母亲同样期望鲁迅对于自己的同乡给予帮助。见1934年8月12日鲁迅给母亲的信。

就鲁迅而言，作为一个在上海乃至全国文坛享有盛名的文化权威，自然也要承担社会赋予他的伦理责任。社会对于那些成名人物、权威人士，总是抱有多方面的期许。就待人接物方面，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名气越大，人们就越是期望他谦和、大度和热心助人。你可以有好恶，也可以有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有怪癖，但你不应该有架子。对于那些尊重你、仰慕你甚至崇拜你而渴望接近你并向你求教的人，你

必须给予帮助和指导。对同乡后辈的扶持和帮助，更是关涉到自己乃至整个家族在家乡的声誉问题。[注]

有不少人批评鲁迅为人“尖酸刻薄”，不宽容，甚至有人讥讽他有“名士风度”，但却从来没有人提到过鲁迅对那些尊敬他仰慕他的人端架子。相反，鲁迅热心帮助青年一直为人称道。与鲁迅两次“相得”又两次“疏离”的林语堂，在晚年所作的《忆鲁迅》中批评鲁迅有领袖欲，要做偶像，这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鲁迅给过年轻的知识分子太多的帮助和指点，也是鲁迅因应社会对他期许的表现。

有关柔石在1928年9月初拜访鲁迅的情形，在鲁迅的日记中没有记载，柔石的日记由于残缺不全，既有可能是他自己没有记录，因为柔石的日记并非每天都记，也可能是后来遗失，总之，现存的柔石日记中没有关于和鲁迅见面情景的记载。但通过柔石在接下来给他哥哥的信可以肯定，鲁迅答应为柔石看稿，这在信中写得很清楚。我们再通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可以知道，柔石当时和鲁迅谈起自己是鲁迅的学生。师生的这种关系成为他们谈话的重要资源。

鲁迅不仅将柔石的《旧时代之死》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还介绍柔石认识了李小峰。柔石在1928年新写的短篇小说《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由鲁迅拿去在自己和郁达夫合办的《奔流》上做了连载。这也是柔石在像样的刊物上第一次有版权、有版税、有稿费地发表作品。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见《鲁迅散文》（下册），线装书局，2009年。

面对既是老乡又是学生且又对自己充满敬意的柔石，鲁迅没有理由不帮助他，他甚至一开始就喜欢上这个“诚实而质朴的青年”，故而两人相谈甚欢，并慨然应允一定仔细阅读柔石的《旧时代之死》。[注]之后在鲁迅从景云里23号搬迁到18号房居住的时候，他介绍柔石和王方仁、崔真吾等人协同租下自己刚刚搬出的23号，还让他们与自己搭伙用膳。在以后的日子里，鲁迅帮助柔石审阅、推荐多篇作品给各家刊物，[注]并让柔石和自己一起主编过多种杂志。柔石由此开始逐渐成为有影响的作家，同时成为鲁迅在上海的“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注]

叶紫的《丰收集》、田军的《八月的乡村》、徐懋庸的《打杂集》、萧红的《生死场》等作品都是鲁迅作序发表的。

同柔石有着大致相同经历的人在“左联”中还有很多，其中受鲁迅推荐发表作品的就有叶紫、徐懋庸、田军、萧红、周文、许钦文等。[注]至于在创作、翻译等方面受到鲁迅指点和帮助的就更多了。

冯雪峰、魏金枝、汪静之、潘漠华等都是柔石在浙江一师的校友，又是“晨光文学社”的成员，彼此关系密切。柔石结识鲁迅后，又先后把他们引荐给鲁迅。见王艾村：《柔石评传》，第53、149、187页。

“东北作家群”是伪满洲国成立后在东北从事文艺创作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主要成员有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罗烽等，在萧军、萧红来到上海结识鲁迅以后，他们也相继来到上海，通过鲁迅的关系加入了“左联”。见郑心伶：《鲁迅与青年作家》，第17—45页。

叶紫与聂绀弩早就认识，聂绀弩回国后通过同学孟十还的关系担任了《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主编，叶紫为助编。通过叶紫，聂绀弩拜访了鲁迅，鲁迅于是开始常向《动向》投稿。见周健强：《聂绀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8—120页。由聂绀弩的关系，胡风、方济仁等在聂绀弩的朋友韩起的家中结识了鲁迅和一些“左联”成员。见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对于鲁迅而言，他的声望、他的热心使他像一块磁铁在自己的周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轻知识分子投奔到他的门下，他所结识和帮助的每一个个体的背后，又存在着那个体由学缘和地缘建构起来的交往群体。柔石和鲁迅相熟之后，冯雪峰、魏金枝、汪静之、潘漠华等也逐渐成了鲁迅的朋友；[注]萧军、萧红投奔了鲁迅后，“东北作家群”也就相继结识了鲁迅；[注]叶紫得到鲁迅的帮助而与鲁迅交往后，聂绀弩夫妇、胡风、方济仁等一批从日本同时回国的知识分子也与鲁迅产生了联系。[注]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其成员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和围绕在鲁迅周围的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

审视参加“左联”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探讨当时的那批知识分子何以会参加“左联”，我们也许会发现以下的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左联”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同一个阶层上，他们的出身、家庭背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左联”知识分子们的家庭处于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无论是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他们的家庭都不是最富有和最有地位的，但也不是最贫穷的阶层，而是处于中游以上的社会阶层。有关这一点，从他们的教育经历上是可以看出来的。

参加“左联”的知识分子的学历以两种情况为最多，一种是有着日本留学经历，另一种是毕业于各类师范院校。表5-2列举了“左联”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信息。

表5-2 “左联”知识分子教育背景一览表

姓　名	最后毕业（肄业）学校	姓　名	最后毕业（肄业）学校
鲁　迅	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肄业	艾　芜	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肄业
茅　盾	北京大学预科	巴　人	宁波第四师范学校（在日本短期留学）
郭沫若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戴望舒	法国里昂中法大学
阿　英	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	冯铿（女）	潮州友联中学
田　汉	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关露（女）	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
郑伯奇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胡　风	日本东京庆应大学英文科
洪灵菲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胡也频	海军预备学校肄业
蒋光慈	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李伟森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楼适夷	小学	洪　深	美国哈佛大学
柔　石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穆木天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沙　汀	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杨邨人	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
徐懋庸	上海劳动大学	聂绀弩	莫斯科中山大学
阳翰笙	上海大学	蒲　风	中国公学大学部
叶以群	日本法政大学经济系	于　伶	北京大学俄文政法系
殷　夫	同济大学补习班	欧阳山	中山大学预科
郁达夫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李辉英	中国公学
张天翼	北京大学预科	葛琴（女）	苏州乐益女子中学
周　文	成都公学肄业	夏征农	复旦大学文科
周　扬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何家槐	上海暨南大学
丁　玲	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吴奚如	初中肄业
冯乃超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彭柏山	上海劳动大学
叶　紫	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	东　平	莲花山麓书楼
田　间	上海光华大学	周立波	上海劳动大学肄业
白薇（女）	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丽　尼	劳动大学旁听生
任白戈	南充中学	舒　群	哈尔滨商船学校
任　钧	日本早稻田文学部	罗　烽	初中
许幸之	日本东京美术学校	白　朗	初小
草　明	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夏　衍	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

表5-2显示，在56名成员中，有过留学经历的共19人，其中留日的15人，而留美留法的各1人，留苏的2人。此外的37人中，大学（包括专科学校）28人（其中省立师范学校有8人），高中和高中以下共9人。

通过上表反映的“左联”成员教育背景情况，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些成员的家庭经济情况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62—163页。

根据社会学家周荣德的研究，中国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由于学制的延长、学习由家中或私塾转移到离家较远的学校、统一的服装费用和伙食费用，加上不再有时间能够参加家庭的劳动，一个知识分子完成学业的经济成本较之科举时代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的情况决定了只有那些相当富有的家庭才有可能供养孩子读完大学，在农村甚至连一些相当富裕的家庭也无力负担他们的孩子上完大学。[注]

田汉：《田汉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
阎焕东编著：《郭沫若自叙》，山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

我们在许多“左联”作家的传记中都能够读到他们求学时经济的困境。柔石在他的日记中时常提到他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时挨饿的情景。田汉在《母亲的话》里叙述了他母亲为了供养他上学如何吃尽了苦头。他最后能够到日本留学，完全是因为他的舅舅易象那时刚好在东京兼职做湖南留学生官费经理员。[注]郭沫若能够到日本留学靠的是他的大哥的资助和他自己在半年内考取了官费生。[注]至于鲁迅的情况则是人所共知的了。

无论“左联”的作家们如何描述他们求学时期的困苦，但他们能够读到大学，甚至能够出国留学，足以说明他们的家庭在当初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他们不可能处于社会的下层，那样的话他们毫无读到大学甚至是中学的可能，也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他们也不属于社会的上层，因为上层家庭里的孩子大都是到欧美留学的，而到欧美留学的费用要比留学日本高出许多倍。

［法］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杨亚平译，2004年。

按照布迪厄的经典研究，教育再生产了社会结构，那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接受过教育以后，虽然导致了少数人社会地位的流动，但绝大部分会仍然停留在相应的社会阶层上，而同一阶层上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相似的惯习，这惯习包括思维习惯、行为习惯、政治倾向等。[注]这种相似的惯习经由同学、校友、共同

的留学经历等连续而漫长的社会化过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正是被相互接触和共同熏染而加强了的同一阶层的同质性，成为“左联”知识分子结盟的基础。

倘若我们熟悉“左联”成立前鲁迅同创造社、太阳社的那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骂），加上人所共知的鲁迅“一个也不宽容”的性格，那么，对于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结盟就自然会产生一些好奇，自然也就会去探究一个“为什么”。

布迪厄的社会结构理论和场域理论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926年11月7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六九），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1页。
1926年11月7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六九），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1页。

鲁迅作为民主的“斗士”，其政治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一直在顽强地同一切旧势力斗争。但鲁迅在事实上并不总是满足于单枪匹马地战斗，他希望“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注他所渴望联合，共同造就一条战线的团体就是当时反传统色彩鲜明的创造社。注在1927年5月，鲁迅还和创造社的成仿吾等共同拟定《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分子及一般民众的宣言》，发表在创造社的同人刊物《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联合的基础——共同的政治倾向。

此外，私人的交往是促成双方联合的桥梁和润滑剂。

当鲁迅看到冯雪峰在《无轨电车》上发表的论文《革命与智识阶级》时，就不无反感地说：“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见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页。

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经过了近两年的唇枪舌剑，双方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在此期间，鲁迅每当提到创造社或太阳社，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反感。注倘如没有冯雪峰、夏衍等几位合适的中间人，双方的联合是不可能的。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冯雪峰致包子衍的信·（1974年1月—1975年12月）》，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

冯雪峰是浙江义乌人，属于鲁迅的大老乡。他也在北京大学做过旁听生，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也算是鲁迅的学生。注早在1926年8月5日，冯雪峰就拜访

过鲁迅，[注]但那时冯雪峰还不能算是同鲁迅相识。他同鲁迅真正开始熟悉还是在1928年12月9日由柔石陪同到鲁迅家相见之后。

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第4页。
许广平：《鲁迅与青年们》，转引自包子衍：《雪峰年谱》，第48页。

冯雪峰与柔石是老朋友了。他们在浙江一师的时候是同时在校的校友，二人都参加了浙江一师学生自办的文学团体——晨光社。柔石在冯雪峰生活困难的时候还介绍他到慈溪县立女子小学代课两个月。[注]在柔石和鲁迅非常相熟的时候，柔石将冯雪峰带到了鲁迅的面前。鲁迅虽然曾因冯雪峰的文章《革命与智识阶级》而对他印象不佳，说“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注]但经柔石解释和随后的不断交往，关系渐渐融洽。后来二人过从甚密，如“意气极相投的挚友一般”。[注]

见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第31页。
见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第31页。

夏衍可以说是专为调解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矛盾，促成“左联”成立而由共产党安排来做筹备工作的人。[注]虽然夏衍那时还不是作家，也没写过一篇作品，但夏衍既熟悉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又同鲁迅相识。当夏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就认识郭沫若，也曾在创造社的刊物上投过稿，回国后同李初梨、冯乃超、李一氓这些创造社核心成员多有来往。而太阳社的核心成员钱杏邨、戴平万、孟超、洪灵菲等人，因为与夏衍同属上海第三街道党支部成员，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至于他同鲁迅相识，却是因为夏衍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常到内山书店买书，熟悉了老板内山完造，经由内山完造的介绍，结识了鲁迅。[注]

冯雪峰：《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33页。

经由冯雪峰牵线搭桥，夏衍作为中间人，加之冯乃超、潘汉年多次登门进行带有自我批评和检讨式的商谈，鲁迅答应了和创造社、太阳社携手，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注]虽然这种联合由于种种原因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联合，团体中充满了不和谐的声音和人际矛盾，但毕竟使左翼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共同的团体，相互间有了共同的身份认同，结成了一个松散的交往网络。

2．夹缝中生存的批判声音

左翼知识分子大都是身无长物的文学青年（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享有盛名的作家），他们凭借的力量和赖以体现价值的手段，是通过他们手中的笔对公众发言，并且还要通过手中的笔来谋生，因而言论空间就成了非常之需。

据阳翰笙说："创造社有个出版部，它的生意很红火。一间小小的铺面，几个'小伙计'，加上成仿吾的侄儿——会计成绍宗，一年就净挣上万大洋，十分可观。"见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25页。张资平在《读〈创造社〉》一文中，专门谈到创造社出版部的经济问题，其中提到出版部按月为创造社的成员支付生活费用，还谈到了创造社的成员因为经济问题而闹矛盾。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第687—704页。

早在"左联"成立以前，许多文学青年就通过文学小团体创办了许多文学刊物。如创造社先后创办过《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新思潮》等刊物，太阳社创办过《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刊》《新流月报》等刊物，引擎社创办过《引擎》，我们社创办过《我们月刊》。另外还有以个人名义创办的刊物，如郁达夫的《大众文艺》，潘汉年的《畸形》，胡也频的《红黑》等。这些刊物为为数众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有些人还通过办刊物和书店解决了生计问题，事实上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知识分子就不仅依靠他们创办的刊物闯出了名气，还因此颇赚了些钱。[注]

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27、30页。

在"左联"成立前，太阳社、引擎社、我们社于1929年6月相继解散了，而创造社则在1929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之后，不得不以江南书局的名义进行活动。这些社团创办的大部分刊物在他们团体解散之前就先后遭到查封，如太阳社的重要刊物《太阳月刊》在1928年7月1日被迫停刊。创造社最重要的刊物《创造月刊》也在1929年2月被查封。[注]虽然此后的文学团体继续努力创办各种刊物，但随着团体的解散，影响已大不如前。

"左联"成立后，致力于创办各种刊物。最初"左联"是对原有的一些刊物进行充实利用，随后就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和各种外围刊物。

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日趋激进的社会。1930年代的上海以欧洲和日本为管道，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非常明显。普罗文学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左联"的刊物由于顺应了激进的发展趋势，因而在文化市场上颇受欢迎。

宣侠父：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写过《西北远征记》，曾在冯玉祥的军队待过，与梁冠英、吉鸿昌关系很好。同阳翰笙、夏衍、阿英、冯雪峰、楼适夷、丁玲、杜国庠、沈启予等"左联"负责人见过面。他通过军队的关系搞到资

金，又以梁冠英的名义同杜月笙打交道，利用杜月笙的关系在公共租界的七浦路找到一个铺面，开办了湖风书店，这就是“左联”自己的书店。见阳翰笙：《宣侠父与左联》，见氏著：《风雨五十年》，第150—155页。

“左联”作品的发行首先是靠自己出版推销。当时“左联”自己就有出版部，原来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出版部实际上就是书店，通过和“左联”关系密切的宣侠父创办起来的湖风书店实际上也可以算是“左联”自己的出版发行机构。[注]

见阳翰笙：《宣侠父与左联》，见氏著：《风雨五十年》，第140页。

王尧山就回忆他在参加“左联”以前是如何的喜欢阅读“左联”刊物上的文章。见王尧山：《忆在“左联”工作的前后》，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第306页。

此外，“左联”还联系了一批规模不大的书局。这些书局因为“左联”的作品有一定的市场，也乐意承印他们的刊物和书籍。阳翰笙就回忆说：“许多左联的书刊……书店乐于出版……有的和我们没有联系的书店，甚至偷偷翻印。”[注]像当时的北新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亚东书局、泰东书局都和“左联”有较密切的联系，出版过“左联”作家作品的书局和书店数量就更多了，计有江南书店、兴中书店、青光书店、天马书店、南强书店、荣光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这样的情况使得“左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注]“左联”也因此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作家。一些原本文学根底不是很好的文学青年就是那时通过在“左联”刊物上发表作品锻炼出来，后来成了很有成就的作家。像夏衍在参加“左联”的时候从没有发表过正式的文学作品，何家槐、白曙、郑育之等一大批青年那时都只是爱好文学的学生，王尧山则是一个学徒，他们都是通过参加“左联”得到锻炼，在“左联”刊物上发表作品慢慢成名的。能够有刊物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本身也是“左联”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之一。

虽然“左联”的刊物很受欢迎，但“左联”带有明显政治色彩、具有强烈的倾覆现有政权倾向的舆论鼓动是国民政府无法容忍的，而“左联”同中共之间明显的联系注定了它将受到严厉镇压。处于此种境况下，“左联”的刊物无论是出版还是发行，大都处于地下状态。这样的状态使“左联”的刊物流通量小，维持时间短，影响力自然也大打折扣。表5-3是关于“左联”部分刊物的创办日期和维持时间的统计。

表5-3 “左联”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

刊物名称	创刊时间	终刊时间	主　编	附　注
萌芽月刊	1930年1月1日	1930年6月	《萌芽》社	编辑实为鲁迅、柔石，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
拓荒者（月刊）	1930年1月10日	1930年5月10日	《拓荒者》月刊社	
文艺研究（季刊）	1930年2月15日		鲁迅	只出一期
南国月刊	1930年3月15日	1930年5月15日	田汉	
艺术月刊	1930年3月16日		沈端先	只出一期
文艺讲座	1930年4月10日		冯乃超	只出一期
巴尔底山（旬刊）	1930年4月11日	1930年5月21日	《巴尔底山》社	“左联”机关刊物
沙仑月刊	1930年6月16日		沈端先	只出一期
世界文化	1930年9月10日		《世界文化》月刊社	“左联”机关刊物，只出一期
前哨	1931年4月25日	1931年11月15日	《前哨》编辑委员会	“左联”机关刊物，第二期改名为《文学导报》
北斗	1931年9月20日	1932年7月20日	丁玲	
文学（半月刊）	1932年4月25日			“左联”理论指导机关刊物，只出一期
文学月报	1932年6月10日	1932年12月	《文学月报》社	第三期始改为周起应编
文化月报	1932年11月15日		陈质夫	只出一期
文艺月报	1933年6月1日	1933年11月1日	《文艺月报》社	第三期由陈北鸥、金谷主编
无名文艺月刊	1933年6月1日		叶紫、陈企霞	只出一期
文艺（月刊）	1933年10月15日	1933年12月15日	现代文艺研究社	
海燕（月刊）	1936年1月20日	1936年2月20日	《海燕》文艺社	
夜莺（月刊）	1936年3月5日	1936年6月15日	方之中	
文学丛报（月刊）	1936年4月1日	1936年8月1日	王元亨、马子华	
作家（月刊）	1936年4月15日	1936年11月15日	孟十还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140页。

表5-3清楚地表明，在1930—1936年间，“左联”所创办的所有刊物没有一份超过一年的，很多是只出一期就被迫停刊了。虽然鲁迅先生发明的突破国民党“文网”压制的“钻网术”相当有效，刊物今天禁，明天换个名称改头换面再出版，[注]但读者对于刊物是要有一个熟悉过程的。即便我们无法知道每份刊物的流通情况，但一份既不能公开发行，刚刚在市面上出现又随之消失的刊物，其占有读者的数量肯定是很有限的。

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0—51页。

正是这样的状况决定了“左联”知识分子不能固守在自己封闭的舆论空间中，他们必须努力寻求更为自由、发行量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久的公共媒体作为表达的空间。胡风在当时就认识到，要想让作品发生影响，“应该尽可能地在合法的商业杂志上发表，那样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不应该局限在小圈子里面”，[注]至于鲁迅等有分量、受欢迎的作家的作品更应该如此。而且“左联”刊物由于经费困难，绝大多数都没有稿费，对于那些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来源的知识分子而言，为生计考虑，他们也必须将言论空间拓展到公共媒体上。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左联”作家们在公共媒体发表言论的过程，是一个利用关系和建立关系的过程。1932年11月，黎烈文从法国留学回来，接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为响应《申报》老板史量才的主张，黎烈文开始着手改革《自由谈》。黎烈文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做过助理编辑，与茅盾有着同事关系，之后他留学日本，结识了郁达夫。接手《自由谈》主编后，黎烈文通过郁达夫的关系主动向鲁迅和茅盾约稿。[注]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自由谈》在此之前，向来是鸳鸯蝴蝶派发表作品的副刊，鲁迅并不看重它，甚至在郁达夫提出向他约稿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自由谈》，但《申报》的影响鲁迅是知道的，他也时常看看《申报》。[注]鲁迅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他也“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但“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他还是决定给《自由谈》投稿。[注]

邵伯周：《茅盾评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30页。

茅盾同意给《自由谈》投稿，当然和他与郁达夫以及黎烈文的私交有关，但他也许更看重《申报》的影响，他从革命文学同旧文学的斗争角度考虑，认为能在《申报》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左翼作家来说是一个胜利。[注]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茅盾开始频繁地向《自由谈》投稿。鲁迅每月为《自由谈》投稿八九篇，后来编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中的文章，都是那时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而茅盾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没有结集出版，但数量也相当可观，前后共在《自由谈》上发表六十多篇杂文。

《黎烈文未入文总》，转引自鲁迅：《伪自由书·后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

受鲁迅和茅盾的影响，“左联”的知识分子纷纷向《自由谈》投稿。察看《自由谈》的作者，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使用笔名的作者有些不能确证外，“左联”的作家至少有二十几位名列其中，计有茅盾、郁达夫、杨幸之、祝秀侠、楼适夷、阿英、张天翼、胡风、曹聚仁、王任叔、艾芜、叶紫、周文、草明、彭家煌、周扬、任白戈、方济之、覃晓晴等。当时被从《自由谈》上驱逐出去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称“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注]这一说法虽然是为攻击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而故意夸大事实，但“左联”作家的作品在《自由谈》上确实蔚为壮观。

黎烈文作为《自由谈》的主编，同鲁迅等“左联”作家因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而鸳鸯蝴蝶派等旧时文人对他们的攻击，无形中将他们推进了同一战壕，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黎烈文不得不辞掉主编的职务后，开始同鲁迅等共同从事“左联”的文化活动，先后同鲁迅合作创办《译文》《中流》等文学刊物。

周健强：《聂绀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6—120页。

《中华日报》本来是一份没有副刊的报纸，负责《中华日报》的林伯生由于报纸的销路不畅，很羡慕《申报》和《时事新报》因为副刊而火爆的销量，也决定在《中华日报》上创设副刊，以期在报纸的销路上能与《申报》和《时事新报》等竞争。聂绀弩经由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孟十还的推荐，结识了同样有过留苏经历的林伯生，成为《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的创刊人和主编。之后，聂绀弩通过他的助编叶紫的引见拜会了鲁迅，从而使鲁迅连同鲁迅身边的“左联”知识分子成为《动向》的主要撰稿人。[注]

《鲁迅日记》（廿二），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鲁迅日记》（廿二、廿三），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崔万秋曾借杨邨人在《火炬》上发表了讽刺鲁迅的《新儒林外史》的因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能够在《火炬》上发表回击杨邨人的文章，以借鲁迅的声望扩大栏目的影响。[注]鲁迅对崔万秋的这种伎俩虽然没有理睬，但“左联”作家中也有不少人将文章投递到《火炬》，周扬就在《火炬》上发表过《国防文学》。鲁迅虽然没有给《火炬》投稿，但后来却在一段时间内同崔万秋保持着书信的来往。[注]

此外，“左联”作家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以及《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以此扩大影响。

见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89、261页；邵伯周：《茅盾评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34页；《鲁迅日记》（1933年4月6日），见《鲁迅全集》（第15卷）。

苏兴良：《文学研究会会员名录考》，见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7页。

除了报纸副刊之外，“左联”的知识分子同样在一些非“左联”的刊物上通过各种关系寻求言论空间，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刊物之一。《文学》是继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主要由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筹备创办。1933年4月，当时已经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到上海访友，通过与茅盾等原来一批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交谈，了解到在《小说月报》之后上海已经没有大型的文学刊物，于是协商创办一份可以填补《小说月报》之后留下的空白的文学刊物。1933年4月6日，郑振铎邀请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茅盾、郑振铎、傅东华、徐调孚、洪深、周建人、黄源等在会宾楼聚餐。[注]在这些参加聚餐的人中，郑振铎、叶圣陶、傅东华、陈望道、胡愈之、徐调孚、夏丏尊、谢六逸同属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注]而郑振铎、徐调孚、傅东华、周建人、叶圣陶等，又是商务印书馆的新旧同事。鲁迅、郁达夫、洪深算是“左联”的成员，而茅盾则既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又是“左联”成员，他还曾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真正成了多重身份的居间人。这次聚会，也算得上是原文学社成员与“左联”的一次合作了。这次聚会之后不久，《文学》月刊创刊出版。

《文学》创刊后，创刊号上登出的发刊词——《一张菜单》中声称“无论谁的作品，只要是诚实由衷的抒发，只要是生活实感的记录……有一个共同的憧憬——到光明之路”都可以发表。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人脉关系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在第1期上发表作品的，还主要是原来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以及同他们相熟的作家。因为

鲁迅、茅盾的关系，“左联”不少作家的作品也出现在上面。其中除鲁迅、茅盾、郁达夫之外，还有楼适夷、沈起予、张天翼、沙汀、艾芜、黑鹰等人的作品发表。

通过在诸多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左联”的作家们将他们的言论空间从原来封闭的、私密的同人刊物拓展到开放的公共媒体之上，从而使他们通向社会的言论管道从地下状态转为公开，拓宽了传播渠道，扩大了言论对象，自然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由谈》《学灯》等报纸副刊以及《文学》等刊物上，一批原本不很有名的“左联”知识分子的作品与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作家、学者如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刘大白、王统照、俞平伯、沈从文、夏丏尊、陈子展、顾颉刚等人的作品一同发表，这就如同参加了一次神圣的授勋仪式，那些带有权威性的刊物在发表作者作品的同时，认可了作者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能力并将其展示给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左联”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也使他们在真正意义上融入了文化圈内，从而搭建起更高、更宽广的文化平台。

每当我们提到言论的表达和言论空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文字形式的作品和报纸、刊物等媒体。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当我们考虑到“左联”作为一个团体的复杂性以及其言论主张通向社会的管道的多样性，我们也许无法对电影、戏剧以及“左联”团体所办的夜校等视而不见。

上海的1930年代正是电影最红火的时期，在上海市民中广有影响。“左联”知识分子也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电影界，努力通过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向上海市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左联”在成立伊始，就在内部设有电影组，到1933年的时候，上海几家最有影响的电影副刊已经掌握在“左联”知识分子的手中，其中石凌鹤担任《申报》的《电影副刊》的编辑，王尘无做着《晨报》的《每日电影》的实际主编。他们不断在这些栏目中发表对电影的评论，引导市民欣赏电影的口味。

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见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76页。

1930年代，尤其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市民中抗日爱国的情绪高涨，过去盛极一时的武侠片、恐怖片和多少带些色情的爱情片渐渐失去了对观众的吸引力，当时最有号召力的国产电影公司——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周剑云已经从影院的上座率感觉到了危机。此时正在明星公司做顾问的“左联”成员洪深趁机提出，应该找一些进步作家来写剧本。[注]

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见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76、84页。

周剑云采纳了洪深的建议，找到了自己的同乡阿英，于是阿英、郑伯奇和夏衍三人得以进入明星公司。此后通过有意识的交往，他们同明星公司的老板和导演成了“朋友”，他们创作的剧本被搬上银幕。此外，田汉和阳翰笙通过结识艺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严春堂也成为艺华公司的主要剧本创作人。[注]

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见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第88页。

通过电影这一言论空间，“左联”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左联”大量的文艺作品被搬上银幕，那些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呈现在广大民众的面前，“左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更流畅的表达。当《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响彻在祖国大地，当上海市民一边歌唱着《松花江上》，一边流泪的时候，[注]田汉、聂耳、夏衍、阳翰笙等“左联”作家的名字也被他们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3．地下状态的活动空间

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第32页。

与无处不在的表达空间相比，“左联”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因为团体的非法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身份的私密性而变得极为有限。“左联”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秘密的团体，它在国民政府眼中是一个非法的团体。“左联”成立后，虽然在《萌芽月刊》上发表了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算是对外公布了团体的成立，但无论是“左联”的办事机构，还是“左联”的一系列活动，都处于地下状态。而在之后的活动中，由于“左联”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主要的是把‘左联’当作了直接政治斗争的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而差不多忽视了它的应该特别发挥的特殊的战斗性能和作用——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并经过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去完成政治斗争的任务”，他们“简直把‘左联’当作‘半政党’的团体，而在组织上就自自然然地走向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因而在行动上“差不多放弃了去争取公开的、‘合法’‘半合法’的存在与斗争的种种方法与方式的努力，于是就不得不尽向底下发展，由半秘密而成为完全秘密的存在”。[注]这就决定了“左联”成员的活动空间大都是在私人场所，偶然在公共场所的活动，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故而那些本应被称为公共空间的场所也就变成了私密的场所。

关露：《我想起了左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第242页。

家庭住所是“左联”成员最经常的活动场所。由于“左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团体，而其成员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故而时刻都有被

国民党特务逮捕、绑架、暗杀的可能性。于是“左联”的成员除了任白戈、何家槐、林淡秋、杨枣、周立波、梅益、杜谈、徐懋庸、关露等一部分人居住在法租界外，[注]绝大多数成员如茅盾、冯雪峰、柔石、周扬、胡风、沙汀、聂绀弩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居住。当然，由于“左联”的作家为了安全经常搬家，有些人在一年中会多次搬迁，流动性很大，所以很难确切地划分谁住法租界，谁住公共租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左联”活动时期，居住在虹口地区的“左联”成员是人数最多的。

“左联”的大多数成员之所以选择在虹口区居住，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安全问题。虹口区向来是个领事馆集中的地区，从租界开辟前到租界开辟后，先后有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领事馆设立于此地，居住的人员因领事馆的关系而相当庞杂。在“左联”活动时期，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日侨，实际上成了没有名分的“日租界”。此外，这个地区街道短而出口多，地形复杂，即便国民党特务能够与工部局勾结起来对付“左联”成员，在这里抓人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其次，虹口地区有为数不少的书店、饭店、咖啡馆，生活和文化设施齐全，住宅区也有一定的档次，并非纯粹的贫民窟，这对于那些虽然并不宽裕但却要维持一种体面生活，同时还要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而言，自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由于“左联”的成员大都居住在同一个城区，还有许多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甚至同一个弄堂，有些单身的成员还会几人合租一个寓所。像鲁迅和茅盾同住景云里的时候，鲁迅家的前门就对着茅盾家的后门，在家中就可以看到对方；冯雪峰有一段时间借住在茅盾的家中，于是经常可以在深夜到鲁迅家中交谈。当鲁迅从景云里23号搬到18号的时候，柔石、王方仁、崔真吾就住进了23号，他们还在鲁迅家里一起搭伙包饭。这样的一种居住状况使“左联”知识分子间的相互走动极为便利。

“左联”基于隐蔽、安全和经济的考虑，他们的一些活动就经常会在一些会员的家中进行。这些活动包括“左联”会议、小组集会、私人交往等。通过在会员家庭中的活动，“左联”的会员们相互认识，交流工作和创作情况，增进私人感情。

沙汀：《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册），第215—219页。
梅志：《胡风传》，第254—259页。

“左联”的成员除了参加过成立大会的首批成员外，后来的“左联”成员大都是通过成员间在家庭中的来往相互认识的。像沙汀就是由艾芜带到周扬的家中认识了穆木天，他还常到叶紫的家中同叶紫、欧阳山聚会，讨论创作问题，偶尔也就着叶紫母亲拿出来的泡菜喝点高粱酒。[注]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住在虹口施高塔路四达里韩起家中，正是在韩起家中的一次“左联”会议上，他见到了鲁迅、冯雪峰、周

扬、楼适夷，还包括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屠玘华。此外，他因同聂绀弩以及聂绀弩的夫人周颖是从日本同船回国的熟人，而聂绀弩也住在附近，于是常到聂绀弩的家中。在那里，他认识了聂绀弩家的常客沙汀。在沙汀家里他同之前仅见过一面的周扬熟悉起来。那时俩人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周扬还引胡风去跳舞厅，并介绍了《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崔万秋、电影明星胡苹、“左联”成员华蒂及其夫人梁文若同他认识。[注]

家庭以外，“左联”成员的活动场所经常是位于虹口区的饭馆、酒店、咖啡厅、书店等。咖啡厅与“左联”之间存在着一种联想式的关系。提到“左联”总会让人想起那些在咖啡厅里的秘密会议和出入其间的那些意气风发的青年知识分子。

早在“左联”成立之前，创造社就因为出版部被查封而在出版部门市楼上设上海咖啡店，作为文艺界接头、谈话的场所。创造社的成员们经常出入这一咖啡店，后来因为鲁迅在同创造社的论战中发表了《革命咖啡店》，称他们“住洋房、喝咖啡”，闹闹革命，为创造社的成员贴上了标签，使创造社的成员也同咖啡店结下了不解之缘。

鲁迅的文章当然是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但鲁迅在文中引用的那篇《上海咖啡店》的文章却非常值得注意。这篇发表在1928年8月8日《申报》上的文章，其作者“慎之”称自己去过两次上海咖啡店，在那里见到了龚冰庐、鲁迅、郁达夫，还在那里结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

鲁迅：《革命咖啡店》，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16页。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见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第887页。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坚称自己是不喝咖啡的，也没有去过上海咖啡店，[注]但当时还是很有一批从日本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喝咖啡的习惯。加入“左联”的原创造社成员，大部分是有喝咖啡习惯的。有关这一点，郑伯奇在他的《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说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当年创造社的重要成员王独清为了拉拢后加入创造社的李初梨、冯乃超等人，“常请大家喝喝咖啡，吃吃广东小馆”。[注]后来“左联”的筹备会安排在公啡咖啡馆召开，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这至少说明筹备会的成员中有人熟悉公啡咖啡馆，而且还不止一个。

《鲁迅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819、826页。

“左联”成立之后，“左联”的一些活动也会在咖啡馆里进行，“左联”的成员三三两两地出入咖啡馆也是常有的事。甚至一向不喝咖啡的鲁迅，有时也会邀请自己亲近的几位“左联”的成员到咖啡馆让他们过一过咖啡瘾。[注]

现在，我们已无法确切地知道“左联”知识分子究竟去过哪些酒店、咖啡馆，更无从得知他们在哪些成员家里活动过，他们有过多少临时的居所和多少秘密的接头场所。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活动空间总是秘密的，活动身份总是隐蔽的，他们的所有活动场所都处于一种地下状态。

地下状态的活动空间和行为的私密性限制了“左联”知识分子的正常社会交往。他们在上海社会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公开的身份，也没有公开的居所。他们无法在上海建立起作为社会成员最需要的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他们不能在公开场所露面，因而不能为公众所认识。大众记住的只是他们所使用的有时连“左联”的许多成员也不能确认的笔名。他们处在流动和危险之中，许多人因为被捕获、被暗杀而在上海社会消失（如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和李伟森五烈士），许多人因为政治工作的需要而暂时或永远地离开上海（如冯雪峰、潘汉年等就时常被抽调到苏区去从事其他的工作）。他们同上海的关系是暂时的、疏离的。他们是上海社会的过客，始终不能成为上海社会稳定的成员而处于漂泊状态。

二、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植根上海社会的文化移民

1．“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的汇聚

叶绍钧：《杂谈我的写作》，见叶绍钧等：《文艺写作经验谈》，天地出版社，1943年。

1930年年底，叶圣陶应章锡琛的邀请，离开工作了八年的商务印书馆来到开明书店。他在解释自己离开商务来到开明的原因时说：“因为开明老朋友多，共同做事，兴趣好些。”[注]

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第117页。

章锡琛创办开明书店，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周围一帮朋友的怂恿和支持。1925年12月，原本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妇女杂志》的章锡琛，因为在《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上发表了自己撰写的文章《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的文章《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遭到了《晶报》和《时事新报·青光》等报刊的攻击。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胡适等也在当时被看成学者喉舌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反对文章，于是反对攻击之声更盛。商务印书馆不愿因此与学界失和，免去了章锡琛《妇女杂志》主编的职务。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为之不平，支持他另筹一刊物《新女性》，这招致了商务当局的更大不满，是年年底，章锡琛被商务印书馆辞退。于是一帮朋友又忙着为失去职业的章锡琛介绍工作，通过郑振铎的关系，章锡琛被介绍到神州女子中学教书，郑振铎还把自己负责的《文学周报》和“文学周报社丛书”交给章锡琛所主持的“妇女问题研究会”刊行。1926年8月，章锡琛在朋友的帮助下，拉出一班人马创办了开明书店。[注]

朱自清：《我所见到的叶圣陶》，见氏著：《你我》，商务印书馆，1936年。
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92页。

在叶圣陶来到开明之前，他的一大批朋友已经聚合在开明书店的周围了。首先是“白马湖作家群”的一批老朋友，此时大部分都是开明的人了。那位亦师亦友后来还成为儿女亲家的夏丏尊就做着编辑所的所长；夏丏尊的学生，“白马湖作家群”中因为漫画才情而广受称道的丰子恺也在1928年做了开明书店的音乐美术编辑；中国公学的同事，在浙江一师同居一室，时常彻夜长谈，被叶终生引为知己的朱自清也早就是开明书店的当家刊物《中学生》的特约撰稿人了；[注]而因为年龄、

长相、形态都与朱自清相仿，同在中国公学任教，一度被误认为是朱自清弟弟的朱光潜也是开明最经常的撰稿人之一。[注]

丰一吟：《丰子恺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38页。“小梅花屋”是李叔同的居所，“小杨柳屋”是丰子恺的居所。

朱光潜：《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载《中学生》1943年第66期。

“白马湖作家群”的这批成员，都是来自江浙的同乡，彼此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在白马湖畔共同度过了一段让人钦羡的诗意时光。他们在白马湖畔时常聚集在一起，或饮酒聊天，或泛舟讴歌。白马湖、“小梅花屋”、“小杨柳屋”让这些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学艺上互相增进，更让他们在性情上相互熏陶，情感上相互依赖。[注]朱光潜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和子恺都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在友谊中领取乐趣，在文艺中领取乐趣”。[注]

叶圣陶虽然不曾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过书，但早在1921年6月，他被邀请到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的时候，就结识了刘延陵、吴有训、周予同，并开始同陈望道交往。正是那个时候，朱自清、朱光潜成为他在中国公学的同事。当“白马湖作家群”轰轰烈烈地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各种文学刊物的时候，叶圣陶同他们中的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等人一起创办编辑着《诗》月刊，所以他也向来被看成“白马湖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

丰一吟：《丰子恺传》，第39—41页。

1925年秋，春晖中学因为学生黄源的所谓“帽子事件”而发生风波，教务长匡互生与校长经亨颐因为意见不合而闹翻，前者辞职离开了春晖中学。一批支持匡互生的教师如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也一并辞职，离开了春晖中学。之后，匡互生等人抱着办一所理想学校的愿望，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白马湖作家群”的大部分成员来到了立达学园，叶圣陶因为在立达学园成立不久就受邀到该校任教，与他们成为同事，并成为“立达学会”的会员，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注]

其次，叶圣陶在“立达学园”时的其他同事中的大部分如陈望道、刘大白、赵景深、章克标、白采、陈之佛等人也不断进入开明。他们或成为开明的编辑，或成为开明的股东，或成为开明书店各类杂志的固定撰稿人。原本是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的沈雁冰，也将自己的代表作《子夜》放在开明书店出版。这让开明书店中叶圣陶的朋友数量大为增加。

胡愈之：《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39—41页。

吴觉农：《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赵景深：《夏丏尊》，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158页。

最后，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的一批同事兼老朋友如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虽然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开明工作过，但他们从开明书店创办起，就一直参与开明书店的各种事务，同开明书店的朋友们在情感和业务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开明书店的许多业务在最初都是由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为之谋划的。胡愈之在1930年代初曾多次去法国为开明书店了解西式书籍装订技术，提高了开明书店出版书籍的装帧水平。[注]至于和赵景深一起编辑过《小说月报》的徐调孚，虽然直到1932年才正式加入开明，但早在1927年开明书店创办时就被总编辑赵景深约到开明担任编辑了。[注]

叶圣陶：《略叙》，见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0—121页。

这样的一种状况对叶圣陶的诱惑是巨大的。叶圣陶本人是一个非常看重亲情和友情，特别注重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人。1922年，叶圣陶被蔡元培和马文藻聘请为北京大学讲师。他在这所全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高校任职不到半年，就以照顾家庭为由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去。1923年秋，他应郭绍虞的邀请，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授，但也很快就回到了家乡。[注]在那些可以扬名、可以造成全国影响的工作机会，与能够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生活工作、享受温馨的亲情和友情之间，叶圣陶宁愿选择后者。正是这样的志趣，让叶圣陶毅然离开了工作八年之久并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商务印书馆，来到了开明书店。

在叶圣陶来到开明以后，又有一批和叶圣陶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开明来。自小同叶圣陶一起长大，同在一所中学毕业，同在角直做过四年教师，又一起被商务印书馆聘用的王伯祥，是叶圣陶一生中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他俩是苏州同乡中自小就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在结束了共同的求学经历后，先是在角直中学与另一位同学吴若宾为学校自编教材，开办书店，创办农场，开辟博览室、音乐室、篆刻室，修建戏台等，后来又在商务印书馆共同组织过朴社，集资出版文学刊物《文学》。这位与叶圣陶同乡、同学、同事，多才多艺的王伯祥，在叶圣陶到了开明书店后的1932年，也离开了商务，投奔了开明。

此后，金仲华、郭绍虞、周予同等一批叶圣陶的同学或同事，又先后来到开明，使得“开明书店派”这一群体不断得到壮大。

王统照虽然迟至1942年才加入开明书店，但在那之前他就同郑振铎、茅盾等人过从甚密，一起主编过《文学》，其中的因缘当然还要归结到他与叶圣陶、茅盾、郭绍虞等人同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郑振铎：《绅士和流氓》，载《文学评论》1934年创刊号。

1930年代，这批存在着同乡、同学、同事关系的朋友们，围绕着开明书店，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且很有特色的群体。虽然这样的群体既无同盟也无组织，但“他们在无形里，曾形成了个共同的倾向，一个向前努力的共同目的”。[注]他们密切的关系以及在身份、性情、情趣等方面的共同性，让我们有理由将其称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派别。由于这个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同开明书店有所关涉，我们将其称为“开明书店派”。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分析“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我们会发现在他们的身上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正是他们能够聚合到一起的机缘和原因。表5-4是关于“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出生地和学历的表格。

表5-4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主要人物一览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籍　贯	教育背景	入开明时间	经　历	备　注
郑振铎	1898	浙江永嘉	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叶绍钧	1894	江苏苏州	苏州公立第一学堂	1930	白马湖作家群、立达学园任教	
沈雁冰	1896	浙江桐乡	北京大学预科			
傅东华	1893	浙江金华	上海南洋公学中院			
陈望道	1890	浙江义乌	中央大学法科		立达学园任教	曾留学日本
夏丏尊	1886	浙江绍兴	东京高等工业学堂	1926	立达学园任教	因为家境困难，所有学业都没有完成
胡愈之	1896	浙江上虞	绍兴中学		立达学园任教	
丰子恺	1898	浙江崇德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留学日本，学习绘画和音乐	1928	立达学园任教	李叔同、夏丏尊学生
章克标	1900	浙江海宁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8	立达学园任教	
徐调孚	1900	浙江平湖		1932	立达学园任教	
朱自清	1889	江苏东海	北京大学		立达学园任教	原籍浙江绍兴
赵景深	1902	四川宜宾	天津棉业专门学校	1927	立达学园任教	
王伯祥	1890	江苏苏州	苏州公立第一学堂	1932	立达学园任教	叶圣陶小学至中学的同学
金仲华	1907	浙江桐乡	之江大学	1932	立达学园任教	
郭绍虞	1903	江苏苏州	苏州工业中学	1942		
周予同	1898	浙江瑞安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43	立达学园任教	
宋云彬	1897	浙江海宁	杭州中学	1928		
顾均正	1902	浙江嘉兴	浙江省立第二中学	1928		
钱君匋	1907	浙江桐乡	上海艺术师范学校	1927		丰子恺的学生
俞平伯	1900	浙江德清	北京大学		浙一师国文教师	

表5-4清晰地显示出，除来自四川宜宾的赵景深之外（其在开明书店只担任了不到一年的总编辑就离开开明去了北新书局），所有“开明书店派”的知识分子都来自江浙地区，其中尤以浙江籍同乡居多。在这些同乡中，又存在着师生、同事、朋友、亲戚等多重关系。以丰子恺为例，他同夏丏尊在浙一师时是师生，在春晖中学、立达学园时是同事；同钱君匋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时是师生，到开明书店成了同事；同陈望道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时成为同事和好友，到立达学园再次成为同事。至于他同开明书店的其他人，也都在进入开明书店以前就成了朋友。至于夏丏尊与叶圣陶以及他俩与其他人的关系，前文业已介绍，此处不再赘言。

吴觉农：《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第82—83页。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很早就被人注意到。1925年就出面作为《新女性》发行人的吴觉农在回忆文章《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中提到：“开明的老一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都有同乡、同窗或同事之谊的老关系，彼此意气相投，私交甚笃。开明同乡多绍兴人（包括上虞、余姚等县）。”[注]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他们所具有的地缘关系。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有着大致相当的经历和身份。他们除了大都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和立达学园做过教师以及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外，在家世和教育背景上也极为相似。

“开明书店派”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平民家庭，家境一般都比较贫寒，具有本真的贫民色彩。因为家庭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他们完成学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只受过中等教育，没有令人炫耀的教育经历，一般读到高中或师范学校，或在那些不很有名的高等院校受过教育。像叶圣陶、王伯祥、胡愈之、顾君正等人，都在上过中学后，为了生计问题而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早早地从事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夏丏尊因为家境困难，各阶段的学业都未能最终完成，所以什么文凭都没有拿到。他们中从事出版事业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期间也兼职或专职从事教学工作，但主要在中等教育学校。少数有着较好教育经历的人在大学谋到教职，如中央大学法科毕业的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朱自清后来在清华大学谋到教职。还有少数教育背景并不太好的成员也一度受到知名大学的邀请，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大学教学工作，那是在他们有了相当的成就之后。如只有中学毕业学历的王伯祥、叶圣陶受蔡元培邀请任教于北京大学；铁路学校毕业的郑振铎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长，后来又在燕京大学任教。

同左翼知识分子带着革命的激情寻求革命道路并进行着革命行动不同，“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来到上海，更主要的是谋求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职业。左翼知识分子的年轻和无所顾忌在“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身上是很难看到的。“开明书

店派”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们在来到上海的时候许多已经是有家室的了，在1930年的时候大都年过三十或接近三十，因此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左翼知识分子就有着很大的区别。左翼知识分子激进、冲动、无所顾忌，他们却显得平和、练达、稳重严谨。

由于都是为谋取生活而来到上海的外乡人，又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和家世，“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深知在上海立足的不易。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事业上锐意进取，处世上宽厚待人，以此赢得他人的认可和接纳。而在情感和精神需求上，他们需要建立起符合自己生活习惯、带着乡音和相同气息的生活圈，以此来放松自己的身心，获取生活中的各种乐趣。

吴觉农在他的《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中写道：

吴觉农：《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第83—84页。

开明书店能够在读者中赢得良好信誉，主要是靠主持工作的同志们一贯的认真不苟，稳健踏实，老老实实地为教育和出版事业工作的作风。……他们审阅稿件，既对作者也对读者负责，选稿不是只看作者是否有名望，书名和主题是否入时，而是看内容是否真正有益于读者。文字要求严谨，有不妥之处必一一予以查考订正，务求保证质量，不容许粗制滥造。注

唐套：《剑三先生》，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第129页。

唐弢在《剑三先生》一文中记述了王统照在校对词典的时候，“埋头审读书稿，或者端正地在小纸条上一笔一笔的写着什么，他写完一条，就贴到桌子旁边的墙上，好像元宵张灯，往兔儿爷身上粘毛似的……这是学术，是研究，是编审，条分缕析，多么谨严的一丝不苟的前辈风范啊”。注

王知伊：《开明书店的“编校合一”》，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第232页。

王知伊在回忆当年开明书店的一批编审们的工作时说过：“编译所的几位老先生经常说：书稿出版后发现错别字、漏字，不仅是对读者不负责，也对不起作者。”注

以上是从不胜枚举的有关“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工作态度和工作场景的描述和记载中随手摘引的几条，资以说明“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严谨、认真

的工作态度。正是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让“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取得令人称道的业绩。

在待人接物方面，“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勤于奉献、为他人着想、宽厚待人、随和谦逊的品质。

朱自清：《我所见到的叶圣陶》，见梁仁选编：《你我·匆匆：朱自清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01—102页。
朱自清：《我所见到的叶圣陶》，见梁仁选编：《你我·匆匆：朱自清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朱自清在讲到叶圣陶对待自己及他人的态度时，总是满怀着敬意和些许的歉疚。他记述道：“他（叶圣陶——引者注）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现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注]他还记述了有一次途经上海，习惯了早7点起、晚9点睡的叶圣陶和其他朋友一直陪着朱自清到天明，其间还为他吟诗，陪他喝酒吃茶。朱自清无限感激地写道：“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注]

冯至：《朱自清先生》，载《中建》1948年第1卷第3期。

与他所称颂的人一样，朱自清本人也是极谦逊极和易的人。冯至有一篇记述在柏林及伦敦见到朱自清的文章，里面这样写道：“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由虚心产生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刻薄寡恩，在朱先生的文字里是读不到的。”[注]

至于“白马湖作家群”中的夏丏尊、丰子恺等一些原本与李叔同（弘一法师）朝夕相处、相知甚深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受李叔同的影响还是本身在杭州等地受到了佛教氛围的影响，都更加能够用宽容、随和，略带散淡的态度对待他人。

郑振铎：《欧行日记》，见《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郑振铎在他的《欧行日记》中曾为他在上海的一批老朋友——“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进行过画像式描写：“伯祥，圆脸而老成的军师……只有我是常向他取笑的，往往的‘伯翁这样’‘伯翁那样’的说着，笑着；他总是淡然地说道：‘伯翁就是那样好了。’”“圣陶……毕恭毕敬的举止，唯唯讷讷若无成见的谦抑态度，

每个人见了都要疑心他是一个‘老学究’。”“调孚，他向不放纵……总是有条有理地工作着，也不诉苦也不夸扬。”[注]

朱光潜：《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见氏著：《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从郑振铎对几位朋友的描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质朴、宽厚的性格和优容他人的处世态度。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骄气、戾气和傲气，甚至不轻易见到他们的豪气。他们有的是和气、服气、书卷气和学究气。朱光潜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相似的气质称为“清气”，他在回忆文章中指出：“当时的朋友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注]

朱自清就在《我所见到的叶圣陶》一文中谈到过叶圣陶在陌生的环境中是如何的害怕孤独和如何急切地渴望能够有朋友陪伴，见梁仁选编：《你我·匆匆：朱自清散文》，第102页。朱自清自己在陌生环境中的孤独和失落感也是在有了性情相近的朋友后才得以消除，见陈孝全：《朱自清传》，第86—88页。

相同的乡音、相同的习气以及在同一座充满商业气息的陌生城市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愿望，让“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这群近代社会中的“文化移民”自然而然地生出无限的亲近和依赖感，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害怕孤独，渴望亲情与友情的感受让他们自觉地走到了一起。[注]正如他们的先民们移民上海后组建了公所会馆等同乡会组织一样，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也形成了带有知识文化人特色的派别。虽然他们从没有组建过什么团体，也没有成立过什么组织，但他们之间的共同勉励、相互提携和惺惺相惜的那些行为，却揭示出带有文化移民心态的“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团体意识。

茅盾：《祝圣陶五十寿》，载《华西晚报》，1943年12月5日。

茅盾在《祝圣陶五十寿》中对这批“开明书店派”的知识分子做这样概括：“叶圣陶的一批朋友，如朱自清、王伯祥、夏丏尊、俞平伯、丰子恺、徐调孚等等，个个诚朴君子，蔼然长者，平易淳厚，方正谨严，感情上是淡而弥深的挚友，事业上是配合默契的同志，没有谁出来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却总因共同的精神特质和人格追求而组合成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系。他们的政治观点，前进而不激进，沉实稳健而非锋芒毕露，不满现状又尚未构成尖锐的对立。对待事业与工作，一律认真负责，历来一丝不苟。行文务求平易畅达，准确有益，不矜才使气，不竞奇斗玄。”[注]这样的概括既刻画了“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相似的性情和处世的态度，也揭示出同一地域同样性情的他们构建群体的不自觉。

2．占有资源、舆论空间和受众

1930年代上海社会商业化的内容之一是文化的商业化。出版机构在文化的商业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围绕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这样的商业出版机构周围的“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其创办、编辑、出版的各类刊物以及他们的出版机构，成为他们建构人际网络、立足上海的重要资源。同时，这些刊物和出版机构也成为他们向社会发言的舆论空间。

在“开明书店派”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早在开明书店成立以前，叶圣陶、王伯祥、章锡琛、郑振铎、徐调孚、茅盾、胡愈之等人就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掌握着《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东方杂志》《儿童世界》等刊物。开明书店创设后，叶圣陶做了《中学生》的编辑，章锡琛编辑了《新女性》，夏丏尊主编《我们》《一般》等。此间陈望道、刘大白等人经营着刊物《太白》，傅东华、郑振铎是《文学》的主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各类刊物和出版社，对于那些只能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它们不仅可以供他们发表言论借以获取名声，同时也能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稿费收入。能够得到刊物编辑的赏识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在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是那些未出道的文人梦寐以求的事，即便是一些成名的知识分子，也需要不断地通过出版社和刊物，维持自己的声望和经济收入。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通过手中掌握的出版社和各类刊物，与自己的同事、同行、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业务的、情感的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

邵伯周：《茅盾评传》，第128—129页。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与郑振铎、章锡琛、周建人等人都是关系很好的同事，1926年4月因为茅盾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军阀孙传芳的注意，商务老板害怕引起麻烦，有意让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茅盾随之提出辞职。[illegible]自那以后，他的主要作品大都放在开明书店出版。如他的《蚀》三部曲、《三人行》、最有影响的作品《子夜》以及被称为《农村三部曲》的《春蚕》《秋收》《残冬》等。故而茅盾虽然自始至终都不曾成为开明书店的编辑或股东，但他同郑振铎、叶圣陶、章锡琛等人的特殊关系及其与开明书店的业务往来却足以让我们把他纳入“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的行列。

朱自清的情况与茅盾有一些相似之处。他同叶圣陶的关系上文已作介绍，当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他的作品大都放在商务出版。开明书店创办后，尤其是叶圣陶到了开明书店后，朱自清也就随之将他的大部分作品放到了开明书店出版，如他的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国文教学》等。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通过自己掌握的出版社和刊物，不断扩大和加深相互间的交往，使“开明书店派”这个以开明书店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仅局限在开明书店成员的范围内。开明书店的编辑群体与作家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建构了“开明书店派”这样一个共同体。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资源不仅让他们自身的交往变得具体而密切，同时也是他们同其他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业务上进而是情感上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与纽带。正是出版社和刊物让“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交际延伸到上海不同的知识群体中，进而将自己编织进上海的知识社会中。

丁玲能够成为二三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除了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为她提供了机缘和条件外，“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的作用则显得更直接有效。

在叶圣陶还在商务印书馆做《小说月报》编辑的时候，他看中了丁玲的作品，连续在《小说月报》头条连载她的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一时间丁玲轰动了文坛，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女作家。丁玲也因此同叶圣陶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

巴金：《致〈十月〉》，载《十月》1981年第6期。

巴金的处女作《灭亡》通过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叶圣陶还附上了一篇《内容预告》予以评赞，从而使巴金声名鹊起。巴金在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不无感激地说：“倘使叶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注]

楼适夷：《难忘的鼓励和帮助》，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第52—54页。

吴泰昌：《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

楼适夷在生活极为艰困的时候，都是靠翻译一些作品交到开明书店直接换点稿费救急。夏丏尊和章锡琛也总是破例接到稿子就让楼适夷去财务处支钱。1935—1936年中，楼适夷在南京监狱中翻译了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中的《人间》并托人交到鲁迅手中。叶圣陶得到这个消息后，在已经同黄源订立了翻译《人间》的合约的情况下终止了该合约，在《中学生》上登载楼适夷的稿子。楼适夷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稿费和版税，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接济了家乡的老母和妻女。直到全国解放，楼适夷在老家的家属，仍然得到开明书店版税的接济。所有这些，让楼适夷在以后的时间里每每回想起来就会心头流进一股热流。[注]冯雪峰、钱杏邨、夏衍等也

都在叶圣陶那里享受过交了稿就领稿费的待遇。钱杏邨的东床吴泰昌说他“常常听见钱杏邨、夏衍感激地谈起这些往事”。[注]

出版社和各类刊物在商业化时代的作用，让编辑和作者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些类似于师生关系，有些类似于朋友关系，还有些类似于施恩者与受恩者之间的关系，编辑和作者之间因为志趣相投、相互欣赏而最终成为知己的事例在那个时代也是相当普遍的。

苏兴良：《文学研究会部分成员笔名录》，见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第42—48页。

见查国华：《茅盾年谱》，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因为大都来自出版界，他们编辑着为数众多的刊物，在审阅外来稿件编辑刊物的同时，自己就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当自己编辑的刊物稿件不足时，他们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稿件，以确保刊物的及时出版。他们的稿件非常之多，有时一本刊物中少半作品都是他们自己所作，为了避免刊物显出作者过少而难堪，编者会使用多个笔名在同一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大都有着为数众多的笔名，像朱自清先后有过13个笔名，叶圣陶和徐调孚都先后使用过18个笔名，郑振铎有22个笔名，王统照有27个，至于茅盾，本名和笔名等加在一起，共有93个之多。[注]此外，他们还在同事或朋友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既是为了给同事或朋友帮忙，借此加深与他们的关系，同时又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章锡琛等人早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时就有大量的作品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如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时就不断在《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东方杂志》《学生杂志》《民国日报·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有时一天多至八九篇文章。[注]郑振铎和叶圣陶的情况与茅盾非常相似，他们经常发表作品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文学旬刊》《戏剧》《儿童世界》《晨报副镌》等。[注]

此外，“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利用出版的便利，很容易地就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他们的很多作品最初都没有准备用书的形式出版，有许多是平时的随意制作，只是在朋友的鼓动怂恿下，就结集出版了。

朱自清在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中与丰子恺一起欣赏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画集时，看到贴满客厅的漫画，就充满信心地对丰子恺说：“你可以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画集。”见陈孝全：《朱自清传》，第91页。

丰子恺最初画漫画纯为自娱自乐，有时为朋友帮忙代画书中插图，有时又是应朋友所请作画相赠。他自己倒从没想到要靠漫画的出版来赢取名利，甚至都没把画漫画当成是一项与文学创作一样的事业来做。是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一帮时常向丰子恺讨画的朋友的鼓动，催生了《子恺漫画》。[注]

叶圣陶：《杂谈我的写作》，见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246页。

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的出版纯粹是在郑振铎的一再“催逼”之下诞生的。当郑振铎创办了刊物《儿童世界》后，不断让叶圣陶去翻译和创作童话，叶圣陶本人从开始的情面难却到渐渐喜欢上童话的翻译和创作，于是一发不可收，翻译和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叶圣陶说：“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来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注]

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第153页。

郑振铎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则是在老舍、叶圣陶、徐调孚等人的督促鼓励下出版的。在此书出版的过程中，徐调孚帮助搜集了郑振铎具有相关性的小说14篇，叶圣陶义务从事了全书的校对工作。[注]

郑振铎：《〈稻草人〉序》，见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367—368页。

夏丏尊：《关于〈倪焕之〉》、茅盾：《读〈倪焕之〉》，见叶圣陶：《倪焕之》，开明书店出版社，1929年。

相互写评论，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这在“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之间是极常见的事情。叶圣陶的每一本书出版，都会有相应的评论出现。郑振铎为《稻草人》作了序，说“《稻草人》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成功之作”，“在艺术上，我们实可以公认圣陶是在现在中国二三个最成功者当中的一个”。[注]茅盾和夏丏尊为《倪焕之》作了序言性的评介，茅盾称其为“扛鼎”之作，夏丏尊称其为“划一个时代的东西”。[注]顾颉刚为叶圣陶的《隔膜》作了生平简介式的序言。

丰子恺的漫画集《子恺漫画》出版的时候，朱自清为其作了序，俞平伯为其作了跋。俞平伯在作了跋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在1926年10月写了《关于〈子恺漫画〉的几句话》，对其中的作品逐一点评。《子恺画集》出版时，又有马一浮（蠲叟）为其作序，朱自清为其作跋。朱光潜也在《中学生》上发表了《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来推介丰子恺的漫画。

通过在各类刊物和出版社不断发表和出版作品，加上相互间的评论文章，到1930年代的时候，“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大都已经是知名的作家、画家、诗人或评论家，他们的名字已经为广大的读者所熟知。

当然，“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正如开明书店这一商业化文化机构一样，其主要的作为还是从事与各类教材有关的文化活动，他们的名字在那时广为人知也主要是从事和教材有关的书籍和刊物的结果。

莫志恒：《说说开明书店及其出版物的装潢艺术》，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第236页。

开明书店同上海一地的其他出版机构一样，是一个商业性的文化机构。它毫无疑问出版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进步作品，如鲁迅编辑的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茅盾的《子夜》等，但开明书店最主要的也是最赚钱的业务还是出版和经营教科书。开明书店在创设不久开始从事教材的出版，[注]而“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编辑各类教科书以及和教科书有关的各类刊物。

唐锡光：《开明的历程》，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第297页。
《中学生》，1930年创刊号卷首语。

开明书店在创办之后，除了编辑出版各类中小学教材之外，更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教辅书籍，如《开明国文读本参考书》《开明国文讲义》《开明历史讲义》《开明中学讲义》《开明青年丛书》《活页文选》等。这些书籍有些被中小学直接当成了教材，有些成为教学的辅导材料。其编辑出版的当家刊物《中学生》，正是在《活页文选》和几种中学教本的出版获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创办的，[注]其宗旨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做便利的发表机关”。[注]这样的宗旨决定了《中学生》的栏目和内容，像“文章病院”等栏目都是完全以指导中学生写作为目的的。开明书店的其他刊物如《开明少年》《新少年》等也都明显地是以指导中小学生的文化学习为主的。

开明书店出版的各类中小学教材和教辅教材，一方面为开明书店赢得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为“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在上海社会的中小学生及中小学生的家长中获得声誉，从而为他们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望、他们的影响波及上海社会为数众多的平凡家庭。

毫无疑问，上海一地浓厚的商业气息让“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成为商业文化的受益者。他们掌握的资源不仅让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广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不错的收益。他们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上海

社会商业化进程的需要，从而有机地融入上海社会中，成为上海这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中依靠文化产业坚实地生存着的一批职业文化人。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在获得相当的名声之后，他们的社会影响不断增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分忧天下的责任感也随之增加。在文艺界获取的声望让他们有资格参与到各种社会事务中，有可能去体现他们的社会担当。

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多事之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的黑暗专制导致的诸多民族、社会问题，成为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忧虑和关注的问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政府的黑暗专制，“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连同其他一些有良知、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一起，不断通过发起组织、发表宣言等方式同社会黑暗势力进行抗争。

自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中的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周予同、茅盾等人先后参与发起了上海著作人公会、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语言协会、中国文艺家协会等知识分子团体，在《上海著作人公会缘起》《取缔不良刊物之建议》《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示》等数十个宣言签名，还参与到进步刊物《文化通讯》的筹办、为小林多喜二的募捐、推行“手头字”、营救被捕的进步文化人士等一系列活动中。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参与的这些公共性的活动，一方面展示出这批在商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侵略、暴力、专制等人类邪恶面前的正义感和反抗勇气，显示出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同时，他们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同上海文艺界、出版界、报界以及政界等各界有声望的人物加强了联系，构建起广泛而缜密的关系网络，把自己深深地植根到上海社会中，进而在上海社会找到主人的感觉，那些因移民而来的陌生感和隔离感逐渐离他们远去。

三、

上海地方名流：跻身城市精英的另类知识分子

A. Swingewood,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ensus in Postwar England”, in A.Gagnon, (ed.), Intellectual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ocial Involvement, Praeger, 1987. 转引自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与“左翼”知识分子在上海社会的漂泊状态以及文化移民“开明书店派”努力立足上海社会的境况不同，上海地方名流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上海社会。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因此不像“左翼”知识分子和“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局限在知识文化人之间，而是涉及军、政、学、商甚至民间黑社会等方方面面。作为既有经济实力又具有社会声望的上海地方名流，他们自身虽然跻身知识分子行列，但他们的活动空间和言论空间以及他们对社会的作用模式同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虽然与文化有关，但已经不是单纯地依靠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来维持自身的生活并形成社会影响。他们的活动既是一种文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实业经营，表达空间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载体，发挥作用的途径也不仅仅局限于言论。他们正如英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社会学专家阿兰·斯温吉乌德所分析的那些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英国知识分子那样，主要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去发挥作用的。

1．学缘和地缘

1917年5月6日，由黄炎培倡议组织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沈恩孚、张元济、王正廷、蒋梦麟、马寅初、严修等政学两界的社会名流，宋汉章、聂云台、钱新之、史量才、穆藕初、陈嘉庚、胡厥文、潘文安、钱天鹤等金融工商界实业界上层人物，黎元洪、李纯、卢永祥、鲍贵卿等军界的要员纷纷加入，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会员和领导人物。

能让如此众多的上海社会的实力派人物加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没有人脉上深厚的渊源和相当的活动能力是做不到的。换言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物，必须有相当的社会资本才行，这种资本来源于他们的自身经历和社会交往。

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政军商界的上流人物加入，毫无疑问得益于蔡元培、张元济等一干南洋公学时的老师替他呼吁。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1901年，黄炎培作为南洋公学的第一届特班学生虽然在校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却同蔡元培、张元济、马良等一干老师结成了良好的关系。张元济作为那年入学考试的口试考官，从一开始就对黄炎培留有很好的印象，并在此后的时间里“亲密相处几十年”，[注]而蔡元培作为他们的中文总教习，因为黄炎培有着较好的国学功底，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的一篇《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者》的作文显示了这方面的品质和才华），因而对他非常器重。[注]黄炎培本人显然很善于交际，而且极具活动能力。他总是通过主动向教师们求教学问、袒露自己的想法等方式接近他们。

见《爱国学社之建设》，载《选报》1902年第35期。

见《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见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109页。

在被校方开除出校之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发起组织了爱国学社，蔡元培就是他们议定的总理，吴敬恒（吴稚晖）为学监，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都是尽义务的教员。[注]在流亡日本回来后，黄炎培在1905年2月29日受蔡元培委托，办理因“《苏报》案”病死狱中的邹容的丧事。为此黄炎培联络了他在日本结识的密友刘三捐出土地作为邹容的墓地。治丧过程中，黄炎培还负责安排了蔡元培等人在著名的张园举行追悼会。正是由于蔡元培与黄炎培之间的密切关系，蔡元培成为同盟会的会员后不几天，就介绍黄炎培参加了同盟会。[注]

参见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70页；宋教仁：《我之历史》，桃源三育乙种农校，1920年。

见李时岳：《从〈秋夜草疏图〉说起——辛亥革命回忆录琐谈》，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加入同盟会之后，黄炎培成了蔡元培处理同盟会事务的得力助手，先后帮助蔡元培处理过建造邹容纪念塔，召开邹容纪念大会，迎接章太炎出狱并安排其去日本，接待经过上海的廖仲恺和去日本留学的四位干崖土司的女青年，在上海推销东京出版的《民报》等事务。[注] 1906年秋，当蔡元培准备去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将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和光复会的重要文献交付黄炎培保管，并选定黄炎培作为自己中国同盟会上海干事的接班人。[注]

见王华斌、王燕子：《黄炎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92—95页。

因为有着这样的关系，当黄炎培起草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方案，希望通过建立组织来推动蔡元培一再提倡和一直致力的教育事业，请蔡元培列名发起，代为向各界名流呼吁的时候，蔡元培没有理由不尽力去办。[注]

除了蔡元培、马相伯、张元济等一批师长们的提携帮助，黄炎培在南洋公学的同学中也有一批颇具影响的人物，其中邵力子作为报人同时涉足政界，后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具有权力和影响。胡仁源先后担任过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教育总长等职。王世澂曾在孙中山的临时国民政府担任过约法会议议员、参政员参政、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政科学长等职务。其他如李叔同、谢无量等，都是才华横溢，在文艺界颇有影响的书画家、诗人。

所有这些在求学时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对于黄炎培以后能够成为上海具有影响的文化名流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除了学缘关系之外，在黄炎培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地缘关系对他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黄炎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同于他人的道路。1902年，因为受到退学风潮的牵连，黄炎培和他的一批同学被南洋公学全体开除，从此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之后的黄炎培，没有如一般知识分子那

样从事与文字有关的行当，而是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将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办教育实业上。

1903年，黄炎培与好友张伯初、长辈陆逸如通过向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川沙厅陈司马呈文申请，将观澜书院改办成川沙小学堂。黄炎培被聘为总理（校长），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在此过程中，黄炎培通过陆逸如的关系结识了上海土木工业家杨斯盛，并与杨斯盛成了忘年之交。

1903年8月12日，黄炎培应邀到新场镇演讲，受人诬告，被南汇知县戴运寅逮捕，准备处死。后由美国牧师步惠廉出面保释得救。有关“新场党狱”的经过，熊月之先生著有《历史与记忆——从黄炎培关于“新场党狱”的记忆说起》一文，见朱宗震、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27页。

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

“新场党狱”[注]对当时的黄炎培而言是一场灾难，他也因此被迫流亡日本，但对黄炎培之后的发展却不无益处。它一方面扩大了黄炎培的影响，另外也让黄炎培结识了新场教堂牧师陆子庄、总牧师步惠廉等。流亡日本，又让黄炎培有机会结交了刘三（季平）、杨白民、陈平斋等一批朋友，这些才华出众的青年朋友后来对黄炎培从事的教育事业都帮助不小。[注]

王华斌、王燕子：《黄炎培》，第47—48页。

“新场党狱”后流亡日本回国的黄炎培不改办教育的初衷，在得到忘年交杨斯盛的资金帮助后，黄炎培先后创办了浦东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和浦东中学。由于学校办得出色，黄炎培的名气渐大，连江苏提学使毛庆藩也亲自到浦东中学视察，后来还专门为黄炎培亲拟了一道公文，声称“今后如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一律立案不准，以免冤枉拖累好人”。[注]

辛亥革命后，由于黄炎培个人的影响力以及其与立宪派和革命派诸多重要成员之间的关系，他开始在政学两界左右逢源。

黄炎培：《我所身亲之中国最初期及最近期宪政运动》，载《宪政月刊》1944年第1期。

见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74—75页。

见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81页。

早在辛亥革命前，黄炎培与立宪派之间的张謇、赵凤昌、马相伯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04年，主要由上海实业界领袖和地方富绅组成的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的时候，黄炎培就是其中的一员，与他同时入会的还有孟昭常、孟森、雷奋、杨廷栋、秦瑞等人。[注] 1905年，黄炎培参加江苏学务总会（后改为江苏教育会），成为常任调查干事，该会的会长是张謇，主要成员有沈恩孚、姚文楠、袁希涛、杨廷栋、雷奋、方还、刘垣、孟昭常等。[注]江苏学务总会的成员中，有很多都是原来立宪公会的成员。1906年，黄炎培虽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上海地区的总干事，但他参与革命党活动的时候少，同立宪派之间的联系多。黄炎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我在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中间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如马良（相伯）、张謇、赵凤昌（竹君）、姚文楠等。在上海很自然地成立起几个据点来，经常集会。教育总会是一处，工巡捐局是一处，望平街时报馆上层‘息楼’是一处……又一处是赵竹君的家‘惜阴堂’，张謇来上海，时时会集在那里。而奔走联络这几个据点的是我。马相伯老人还时时招我去徐家汇问大局情况”。[注]

有关黄炎培在1906年后很少参与革命派活动的原因，见胡绳武：《清末民初政局中的黄炎培》，见朱宗震、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一）。

黄炎培与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在上文提到他同蔡元培之间的关系时业已提到。他本人就是同盟会的成员、上海干事，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1906年后，黄炎培就很少参与革命派的活动，[注]但他同革命派人士之间尤其是同蔡元培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

辛亥革命前，黄炎培在江苏省就担任着多种职务，他自己叙述说：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81页。

那时我任江苏省咨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这局是上海县地方自治组织的前身，实际上已成为上海地方性的权力总机关，李钟珏〔平书〕是总董）、江苏省教育总会（设上海）常任调查干事、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注]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深得江苏都督程德全的信任，被任命为民政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不久升任教育司司长。

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随着黄炎培对政治活动的介入，其社会活动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同各种团体和个人之间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而黄炎培本人又是一个善于交际，具有极强活动能力之人。按照许纪霖先生和倪华强先生的研究，黄炎培由于受到蔡元培的点拨、栽培和影响，对各种主义、理想都有着不带偏见的兴趣，能够一视同仁地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厚态度，以至在个人的交往上能够同从大权独揽的北京政府、教育部，到独霸一方的江苏督军、淞沪护军使；从有势力的国民党的孙中山、汪精卫，到新成立的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从权倾一时的财界大亨虞洽卿，到青帮后生杜月笙，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注]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98—99页。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黄炎培虽然对仕途不感兴趣，一心一意办教育实业，但还是多次被推荐、提名做教育总长，因为每次都坚辞不就，落得袁世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的八字评价。[注]

虽然黄炎培最终没有选择仕途，但他同政学两界的关系成就了他的社会声望，而他的声望又进一步加大了他的社会资本。

黄炎培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并非单纯的教学活动，也非纯粹的教育理论研究，而是以创办学校为主要内容的类似实业的活动。毫无疑问，创办学校需要资金，这就使黄炎培不可避免地要同上海的金融界和实业界发生关系。他在之后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及随后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学校等一系列教育实体，正得益于他同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关系。

事实上，黄炎培在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前，就同实业界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过程中和创办以后，又结识了一批这样的人物。

《追悼穆藕初先生·黄炎培氏挽联》，见《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96页。

在黄炎培交往的诸多实业家中，穆藕初算得上是关系最密切、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黄炎培悼穆藕初的挽联“四十年交好，到老犹新”[注]正是对黄

穆交往的准确概括。

有关黄炎培与穆藕初二人家道中落后的困苦处境以及在求学等方面的相似经历，见陈正书：《黄炎培与穆藕初》，见朱宗震、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一），第279—300页。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黄序”，见《穆藕初文集》，第11页。

见陈正书：《黄炎培与穆藕初》，见朱宗震、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一）。

黄炎培与穆藕初都是江苏省川沙人，两人年龄仅差两岁（黄炎培1878年生，穆藕初1876年生）。1901年黄、穆二人结识后，由于相似的家境和相同环境的熏陶以及二人对国家、民族、社会所持的相近观点，[注]很快成为知己。1904年，当黄炎培和穆藕初同住在上海南市的时候，他们“朝夕过从，相与话食贫况味”。[注] 1905年，身为海关总工会华籍职员董事的穆藕初因为带头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活动而被美国籍副税务司辞退，面临失业威胁，黄炎培很快帮助他在龙门师范学校找到了英语教习兼学监的职务。[注]同在教育行业工作的这段经历更加深了黄炎培和穆藕初的关系。在此后的时间里，黄、穆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诸多事情上互相扶持，相濡以沫。

1917年，黄炎培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随后开办中华职业教育学校。那时已经是著名实业家的穆藕初不仅第一批加入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教育学校的开办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17—118页。

穆藕初的长子穆伯华收藏的原稿复印件。转引自陈正书：《黄炎培与穆藕初》，见朱宗震、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一），第292页。

因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设和中华职业教育学校的创办都需要经费，黄炎培向社会发起募捐。在此过程中，穆藕初、聂云台、徐静仁、穆恕再、刘柏生等与黄炎培相识的朋友都乐意赞助，黄炎培在新加坡通过林义顺介绍结识的陈嘉庚也答应五年内每年都资助黄炎培一千元。[注]在众多乐意赞助的朋友中，穆藕初和聂云台是常年捐助经费的人。其中穆藕初又有着“校董（穆藕初等一批捐助款项的人，都是中华职业教育学校的校董——引者注）中最热心之一人”的美誉。他甚至在一次支付捐助支票的时候对当时的负责人说过，如果费用有困难，“仍可来商于余，余希望君等体任公（黄炎培的尊称）创办之苦心，无使精神受物质之影响而稍有减色”。[注]

宋汉章是黄炎培职业教育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的实力派人物。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17页。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18页。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18页。

虽然穆藕初等实业家带有慈善性质的捐助在黄炎培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中华职业教育学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职教社和职教学校还是“办工厂是常常赔本的，加之社校经费不宽裕，负债累累”，[注]故而黄炎培在职教的道路上举步维艰。是宋汉章用上海中国银行经理的职位和在银行界的信誉担保了黄炎培发行的10万公债，[注]“使学校和工厂经费问题解决，信誉坚固”，[注]中华职业教育学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逐步扩充起来，为黄炎培此后几十年的职业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

至于实业家聂云台对于黄炎培职业教育的支持和他们间的合作，“则是建立在私人友情和共同思想感情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应该刻不容缓地发展中国青少年的职业教育”。[注]

职教事业的成功让黄炎培成为上海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也因此得以在上海社会担任各种社会职务，参与到上海社会的各种公共事务中，成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地方名流。

同黄炎培依靠从事实业教育成为社会名流不同，史量才是依靠报业经营而跻身上海地方名流的。《申报》《新闻报》这两份在上海最大、最具影响的报纸，足以让史量才成为上海最具实力的实业家之一，而史量才的办报方针在《申报》上的表现，也使史量才不失其知识分子的本质。

1912年，史量才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的所有股份后，成为《申报》的主人，从那时起，他就跻身于上海实业家的行列。此后依靠《申报》作为资本，史量才同上海的军政、实业、金融、教育、文化等各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展开了多种多样的交往。

早在成为《申报》主人之前，史量才就同上海的教育界、报界和实业界有过多方面的接触，同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第4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页。

最初来到上海的史量才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工作。黄炎培在《史量才先生生平》中写道："先生既毕蚕学馆业，应上海王氏（王培孙——引者注）育才学堂聘为理化教员。旋膺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各校教席。"[注] 1904年，史量才创办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成为学校的老板兼校长。

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34—339页。

在当时的上海，许多学校都会邀请报社的编辑做教习。史量才因为同《时报》的编辑雷继兴在南洋公学时一起研究西学达一年之久，是非常投机的好朋友，当然同雷继兴的子舅陈景寒（即陈冷，史量才接办《申报》后成为《申报》的主笔）也非常相熟。通过雷继兴、陈景寒，史量才结识了他俩在日本留学时结交的当时任《时报》总经理的狄楚青。因为这样的关系，史量才在创办上海女子蚕桑学校后，也时常邀请《时报》的编辑陈景寒、雷继兴、包天笑等到上海女子蚕桑学校任教习。值得一提的是，史量才因为自己开办学校的经费拮据，在付给请来的《时报》编辑的教习津贴时只付给一半钱款，其余一半则通过为《时报》编辑稿子作为交换。[注]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28—332页。

由于同《时报》之间的这层关系，史量才成了"息楼"的常客。在"息楼"这个文人汇聚的地方，史量才结识了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龚子英、朱少屏、林康候、管趾卿、吴怀疚、叶养吾、杨荫孙、杨白民、王培孙、黄公续等人。这是一群学高识广而又在上海颇有能量的人，除了上文已经详细介绍过的黄炎培外，像沈恩孚是上海龙门师范学堂的校长，在学界德高望重。袁希涛也是教育界的实力派人物，辛亥革命后曾做过教育部次长。龚子英当过《时报》的编辑，辛亥革命后做到江苏财政厅厅长。管趾卿是上海有名的西门子洋行的"康白度"（买办——引者注）。其他如吴怀疚、杨荫孙、杨白民、王培孙、黄公续、林康候、朱少屏等都是各类学校的校长，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时报》馆有着各种业务的或私人感情上的关系。[注]

黄炎培：《史量才先生生平》，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第47辑），第74页。

1905年，史量才响应张謇等提倡的办理教育学会的主张，会同黄炎培、袁希涛等一批在“息楼”结识的江苏籍的朋友，发起组织了江苏学务总会。之后，又同张謇、汤震、王丹揆等发起成立江苏铁路公司，成为该公司的董事。

1906年，史量才又会同时常聚集“息楼”的学界、报界朋友在颐园举行“宪政研究会”，设会所于四马路东辰字21号，狄楚青、雷奋、陈景寒、沈恩孚、黄炎培、袁希涛等都是主要成员。

转引自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的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由于在江苏学务总会、江苏铁路公司出色的工作以及在宪政活动中的行为，史量才得到了张謇这位在政界、学界、实业界都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名流的赏识。毛志良的《江宁春秋》中记载有人曾为此询问张謇：“您为什么这样重用史家修？他说道：‘我是量才录用’。”据称史量才的名字正是此时由原来的“史家修”改为“史量才”的。

由于得到张謇的赏识，史量才得以有机会进入以张謇为首的工商资产阶级实力派人物交往圈内，出入他们经常聚会的赵凤昌私宅——惜阴堂。

通过与学界、报界、工商实业界的交往，史量才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在上海的交往网络，为随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1912年，史量才伙同与自己交往密切的张謇、赵凤昌、应德闳和陈景寒，从席子佩的手中盘下了《申报》。是年冬季，因为张謇、赵凤昌等无意经营《申报》，所有产权全部由史量才买断。史量才成了《申报》的真正所有者，从此步入实业家的行列，拥有了与上海社会实业界、教育界、文化界的精英人士交往的资本和平台，其个人的交往网络也渐次从上海向外扩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02页。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14页。

1914年，黄炎培辞去江苏教育司长，以江苏教育会调查干事的身份在全国各地进行教育调查，其所需经费都是由《申报》提供的，条件是黄炎培以“旅行记者抱一”的名义为《申报》定期写稿发表。注此后黄炎培投桃报李，将在南洋结识的准备在国内寻找合伙人创办银行的黄奕住介绍给史量才，中南银行于是得以成立。注史量才从此得以跻身金融界。

史量才在创办了中南银行后，利用银行作为后盾，在银行开办不久，就开办了民生纱厂。此后又陆续创设了上海酒精厂、瓷砖厂、泗泾碾米厂、泗泾织布厂、温溪造纸厂、温溪铅笔厂等，成为真正的实业家、上海数得着的富翁。

谢介子：《世界报界名人来华者之言论丛辑及予之感想》，见黄炎培等：《最近之五十季——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

1919年10月，在美国檀香山（火奴鲁鲁）召开的世界报业大会上，史量才被缺席选举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确立了自己在报业界的地位，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各类世界舆论也对《申报》好评如潮。注

1922年，《申报》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雨，史量才也同《申报》共命运了十年。为庆祝《申报》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史量才邀请他的好友，在《申报》担任了数十年兼职记者的黄炎培来为他编辑《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这样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纪念刊。

见黄炎培等：《最近之五十季——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

由于史量才以及黄炎培的交往和他们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一大批海内外的专家纷纷应邀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撰写各类文章。除了一批《申报》的老报人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性的文章之外，为此次纪念刊撰写各类文章的计有徐则陵、童世亨、胡适、任鸿隽、梁启超、蔡元培、马寅初、沈恩孚、吴鼎昌、袁希涛、汤尔和、张嘉森、蒋方震、邹恩润、杨铨、丁文江、叶恭绰、聂云台、张慰西、戴练江、郭秉文、廖世承、秦翰才等，一时全国才俊，尽被网罗其中。该书的序言更是邀请了名重一时而又同史良才、黄炎培关系密切的张謇和章炳麟捉笔。注

邀请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为纪念刊撰写文章，这是一个扩大《申报》、扩大史量才在上海乃至全国影响的举动，同时也是史量才同诸多名流进行交

往的过程。为《申报馆五十年纪念》撰写文章的知名人士，有许多原本是史量才不熟悉的，还有许多是史量才从未谋面的。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史量才同其中的许多人成为朋友，还有不少人如聂云台、郭秉文、沈恩孚、邹恩润（韬奋）等人日后都成为上海地方维持会的成员，与史量才同属一个组织。

2．活动舞台和表达空间

上海市地方维持会是由史量才发起组织的一个由上海金融实业界、教育文化界的人士构成的民间团体，它的前身是史量才发起组织的“壬申俱乐部”。到1932年6月7日，又因为“战事平定，秩序既复”的原因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地方维持会的会长是史量才，副会长是王晓籁，其主要会员有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刘鸿生、钱新之、林康侯、徐新六、朱吟江、秦润卿、陈光甫、张公权、黄炎培、李馥荪、胡笔江、徐寄庼、胡孟嘉、胡筠秋、穆藕初、聂潞生、胡筠籁、孙仲立、胡筠庄、胡筠庵、刘吉生、吴蕴斋、张慰如、袁履登、陈蔗青、贝淞孙、杨雄等人。其中会长史量才不仅是《申报》《新闻报》这两家在上海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大老板，还是中南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大股东，同时还在民生纱厂、五洲药方、中华书局等实业中有自己的投资，是在金融、实业、文化、教育各界都极具影响的人物。副会长王晓籁是上海商会的会长，纳税华人会主席，在华洋两界都有势力。理事杜月笙（1932年2月19日被增补为副会长）和张啸林是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还同时是中汇银行的董事长、法租界总商会主席委员、公董局董事、纳税华人会监察委员、陆海空军司令部参议，势力渗透到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会员刘鸿生、钱新之、徐新六、陈光甫、张公权、穆藕初等都是金融实业界的巨子，而秘书长黄炎培在职业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无人可比。上海市地方维持会正可说集中了上海既有社会声望又有经济实力的大部分人物。

上海地方维持会的成员相互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私人交往。身为知识分子的史量才和黄炎培能够置身其间，自然也同其他会员之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有关黄炎培以及史量才同上海各界的关系，上文已经作了交代，这里想对他们与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再作一交代，因为杜月笙在上海的能量及其所作所为实在对上海地方协会的作用有着太大的作用。而黄炎培、史量才等知识分子在上海社会乃至在全国能够发生影响及其发生影响的方式，也同杜月笙等上海闻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59页。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8页。

有关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已有不少的著作论及。“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这副对联是杜月笙在上海地位的写照。要想知道杜月笙在上海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只需看看杜家祠堂落成时，为杜月笙送去贺礼和前去祝贺的人就够了。1931年6月，杜家祠堂落成，全国“党国要人”和在野巨头纷纷前往或派人前往道贺。其中蒋介石派“参军”杨虎为特使，送去一方“孝思不匮”的匾额和一篇祝词。于右任亲题“源远流长”的匾额相送。张学良送去的匾额上写的是“见义勇为”。吴佩孚以“威武世承”相送。段祺瑞和当时的班禅喇嘛也有匾额相送，甚至连远在边陲的新疆主席金树仁也赶到上海参加祠堂的落成典礼。此外，当时法租界的总领事、领事，法捕房的总巡，日本总领事馆都参加了典礼并奉送贺礼。[注]那时的杜月笙，身兼各种政府的和社会的职务，集75种头衔于一身，[注]实在是一位能在上海呼风唤雨的角色，他的社会关系通往上海社会乃至全国的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

在上海地方协会中，黄炎培同杜月笙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也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从地缘上讲，黄炎培出生在川沙县城，杜月笙的家乡是浦东高桥镇，两人算是同乡，但两人虽为同乡，由于年龄上相差十岁之多加之长期以来在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方式活动着，所以一直以来两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直到1931年黄炎培结束避难回到上海筹建浦东同乡会，才和杜月笙有了直接的接触，并因此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周育民：《略谈黄炎培与杜月笙关系》，见朱宗震、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一）。
《黄炎培日记》（第4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浦东同乡会的前身是上海著名的资本家和社会活动家李平书创建于1905年的浦东同人会。黄炎培在1924年的时候当选为该会的董事长。后来由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黄炎培在1927年的5月份流亡大连，浦东同乡会无形中消散。1931年黄炎培回到上海后，即着手重建浦东同乡会，起草了《宣言》和《章程》。杜月笙作为在上海有影响的浦东人，对于重建同乡会非常热心，多次同黄炎培、穆藕初等探讨立会的具体事宜。据黄炎培日记记载，在同乡会成立前，他同杜月笙之间商量了不下十几次。[注]在1931年7月23日，杜月笙发起成立浦东同乡会，黄炎培“被推继藕初为主席”。[注]此后，黄炎培和杜月笙时常共同处理浦东同乡会的事务。

黄炎培：《勿侮辱青年》，载《国讯》1947年第422期。

郁咏馥：《我所知道的杜月笙》，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1页。

黄炎培和杜月笙因筹建浦东同乡会而交往，因交往而惺惺相惜，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双方互相支持，相互影响。杜月笙在结识黄炎培之后，其行为风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从一个依靠青帮势力胡作非为的黑社会老大向一个注意社会声誉、关注公共事务的地方名流转变。对于黄炎培，他不仅在金钱和关系方面大力支持其职业教育事业，而且在黄炎培因言论得罪国民政府而陷入危险的时候，十分关注黄炎培的安危，通过各种渠道为黄炎培通消息，找出路。他还听从黄炎培的建议，从事对抗日军队筹饷、慰问、救治伤员等事务并从事救济难民等慈善事业。黄炎培对杜月笙为自己所做的事是感激的，对他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是赞赏的，他曾满怀深情地说过："我最佩服两位读书不多的朋友，一为毁家创办浦东中学之杨斯盛先生……一为杜月笙先生。"[注]杜月笙对黄炎培也始终充满敬意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杜月笙的一个听差在谈到杜月笙的社会关系时说过，杜月笙在社会名流中与钱新之、黄炎培以及史量才的关系最为密切。[注]

见白华山：《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上海地方维持会因其构成人员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影响，尤其是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和帮会组织上的势力，使得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在上海这座充满了商业气息而又没有被任何一方政治势力完全控制的城市中充满了能量和影响力，成为上海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团体之一，连同上海市商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并称为资产阶级团体中的"四大金刚"。[注]

《上海市地方协会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市地方维持会成立的起因在于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为了"从事于慰劳将士、救济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及其他必要工作"，[注]故其成立伊始，便着手从事向社会募捐，创建临时伤兵医院、难民及孤儿收容所等工作。

《上海市地方协会报告书》（1932年），上海图书馆藏。

［澳］马丁：《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见林克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

新中国编译社编纂：《中国内幕》（第5集），新中国报社，1941年，第60页。转引自白华山：《杜月笙与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由于是由上海市最有势力和最具影响的人员组成，上海市地方维持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从淞沪抗战开始到结束，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为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募集到捐款二十七万六千余元，[注]出资创办临时伤兵医院七所，开办收容所两处，同时还为其他各收容所提供大量的食品、日用品、医疗器械和医务人员。此外，上海市地方维持会还在战时承担了广泛的行政、财政和援军任务，[注]被认为是“虽然不是法团，但其实际力量则超越一切”的“上海最有权力的机关”。[注]

淞沪抗战结束后，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并没有就此解散，而是改称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继续存在，并且规模扩大，功能和业务范围进一步增强，试图变成一个上海资产阶级自己所希望的真正的“永久之会”。

《上海市地方协会月刊》第5号，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市地方维持会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后，开展了内容更为广泛的工作。诸如讨论上海战后的难民收容安置问题；协同各地米业代表商讨救济米贱办法；提出浦东开发的建设和措施；成立国际部讨论国际问题；为东北抗日联军募捐筹款；救济东北难民；继续刊行《国讯》报道全国抗战情形；为会员的健康考虑成立体育委员会等。[注]不夸张地说，想罗列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活动内容和业务范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看一看地方协会内部的机构，也许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上海市地方协会活动的内容之多和活动范围之广。

《上海市地方协会月刊》第5号，上海图书馆藏。

在上海市地方协会内部，设有金融、商业、工业、劳工、文化事业、教育六门。金融门负责货币、金融机构、市场等事务；劳工门负责工人生活、工资与工时、罢工停业纠纷、工会、工人失业、工人意外遭遇等问题；商业门负责商业团体、国际贸易、上海市贸易、物价等问题；文化事业门负责学术团体、图书馆、美术、音乐、新闻事业、出版事业等；教育门则掌管教育

行政、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特殊教育、私塾等。[注]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活动内容和领域可以说几乎涉及上海民众能够涉及的所有问题。

恒社旅台同仁编：《杜月笙先生（镛）纪念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18页。

由于上海市地方协会在上海具有左右时局的能力，在上海尚立足未稳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重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实力。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淞沪抗战结束后的一次讲话中就略带巴结意味地称赞地方协会的主要成员杜月笙说："予长沪市之初，即遇'一·二八'之变，当时……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先生之助。"[注]上海市地方协会的会长史量才和秘书长黄炎培自然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礼遇。

黄炎培：《史量才先生之生平》，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第47辑），第75页。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36页。

在淞沪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任命史量才为淞沪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新中国建设学会理事、国营招商局理事、实业部温溪造纸筹委会主任。1932年10月，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史量才又被聘为参议员，随之被推为议长。[注]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包括市长吴铁城在内的高级官员也频繁同史量才等接触，让史量才在各种会议、集会等公共场合出面。黄炎培虽然向来是"与官不做"，但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时常接见他，对他礼敬有加。1934年10月，蒋介石在庐山就亲自接见过史量才和黄炎培，虽然那次会面，据说因史量才说出了"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注]的豪言壮语而招来了杀身之祸，但可以看出在那之前，国民政府对史量才和黄炎培等上海地方名流的重视。

《上海市地方协会月刊》第3号。
《上海市地方协会月刊》第4号。
《上海市地方协会月刊》第5号。

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在经济和组织上的势力，使上海市地方协会所从事的活动卓有成效。在地方上，上海市地方协会可以调动各种民间力量。如在实施救济米粮案的过程中，上海市地方协会联合苏沪各商会和行业组织发起成立江苏京沪民食调节协会。[注]京沪民食调节协会在无锡召开会

议的时候，江苏省各县的商会、米业公会等组织都派代表参加，同时到会的还有各县领袖、实业厅厅长。[注]在同政府的关系上，上海市地方协会同上海市政府乃至同国民党中央政府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对政府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1932年10月，上海市地方协会提出开发浦东的计划，11月，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就作出反应，公用局局长黄伯樵专门为此做了“上海市公用局对于发展浦东之设施及其希望”的报告，提出了改善交通、发展电话业务、创设自来水厂、开辟住宅区等计划，并准备在浦东建设海滨浴场及海滨疗养院、大公园、运动场等设施，以吸引居民和外地游客，借此来实现工商业的繁荣。[注]

上海市地方协会的能量和影响以及活动方式，使得置身其中的史量才、黄炎培等知识分子，在言论空间、对社会的作用模式以及他们自身所关注的问题等方面，都同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差别。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往往挟裹在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提案和建议中，不仅有了更多的通往政府和社会的管道和载体，而且也更容易在社会上产生效力和影响，这也同时让他们自身有了更多的影响社会的实践性活动。

《申报》，1932年2月10日。

见《申报》，1932年4月7日、4月10日、8月28日等。

就言论而言，史量才掌控下的《申报》《新闻报》是他们当然的也是最重要的活动空间。黄炎培同史量才的关系让黄炎培很早就在《申报》上发表言论。早在1914年，黄炎培从江苏教育总长位子上辞职，到全国各地进行教育考察，所写的考察报告就以“抱一记者”之名发表在《申报》上。1930年，《申报》班底重组的时候，黄炎培又做了《申报》设计部主任。此后的1932年，黄炎培又协助史量才创办大型综合性刊物《申报月刊》，成为《申报》馆举足轻重的人物。史量才作为会长的地方协会成立后，史量才、黄炎培等的言论和主张总是以地方协会的名义在《申报》《新闻报》上及时发表。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地方协会就在《申报》上登出为十九路军募捐的启示。[注]淞沪抗战后，史量才、黄炎培等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倡议文章更是连续不断地登载到《申报》上。[注]

见白华山：《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上海市地方协会月刊》第4号。此电由史量才提议拟定。

《上海市地方协会月刊》第4号。此电由史量才提议拟定。

《上海市地方协会月刊》第5号，此计划由黄炎培提出。

此外，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凡对政府有所陈言和主张，每有地方协会领衔的四团体联名一样，[注]黄炎培、史量才等地方名流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主张也总是挟裹在地方协会对政府的建言中表达出来的。地方协会对政府的各种建议书和提案，就成为上海地方名流知识分子的言论通达到政府的管道和载体。在上海市地方协会呈送给上海市政府的诸多提案与建议中，我们无法分清究竟哪些是由黄炎培和史量才等人提出的，更无法分清哪些提案和建议符合史量才和黄炎培等的本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地方协会呈送的诸多提案中，一定有很多是地方协会的会长史量才、秘书长黄炎培等的意见。事实上，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大量提案都是经过黄炎培、史量才提议通过后提交政府或付诸实施的。如“分致政府及鲁川军事当局速停内战电”、[注]“建议政府组织粮食委员会”、[注]在粮食收获季节收购粮食以解决粮贱问题、徐公桥新村建设计划[注]等不可计数的提案。

3．地方社会的精英

跻身上海精英社会团体中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同政府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能在很多方面保持着同政府的合作。他们的主张在得到了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在现实层面上更容易得以实施并取得效益。我们同时也能够注意到，跻身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尤其是政治的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们总是尽可能地致力于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史量才、黄炎培利用他们所在的上海市地方协会的能量和影响，在赈灾、慈善、农村改造、城市公共事业等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代表上海民众的利益不断提出政治诉求，使上海市地方协会能够为上海地方谋求各种利益，成为上海地方利益的代言机构。他们自身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事业，也具有实业性质，能够落到实处。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无论其身处何种阶层，拥有何种身份，他们都会带有强烈的终极关怀，在道义上对现实政治的弊端进行批判和反思。具有上海地方名流身份的史量才、黄炎培等知识分子，正是在对真理的追求和坚持中，同国民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并由于这样的紧张关系，双方渐行渐远，分道扬镳，并由此引发了国民党暗杀史量才的血案。

虞南支：《国难会议》，载《时事月报》，1932年5月号。
《救亡通讯》第12号，1932年4月11日。
《申报》，1932年4月14日。
《申报》，1932年4月15日。

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召集国难大会的决定，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了国难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国难会议的职责为决定“国难期内外交财政军事及关于国难一切临时设施的方针”。[注]这看上去是一个国民政府对社会开放政权的信号，让许多对国民政府抱有幻想的人士大为兴奋。1932年3月底，淞沪抗战甫一结束，史量才、黄炎培等就和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多名会员连同国难会员62名联合签署了一项提案——《救济国难之具体主张》，其中就提出了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止与此抵触的有关党部决议和法令，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成立有力的并由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的政府，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宪法等主张。[注]但国民党政府很快在3月25日申明，国难会议的议题仅限“剿匪”“赈灾”“御侮”三项，“非此范围，不必讨论”。这让史量才、黄炎培为代表的上海市地方协会连同国难协会人员马上在《申报》上发表声明，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公开表示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难会议。国难会议通过的“御侮”“救灾”“绥靖”的所谓国策公布后，史量才、黄炎培等人在《申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对国民政府极尽讽刺挖苦，称“国难会议是一幕技术纯熟之双簧”，[注]是“帮助政府撒弥天之大谎，以蒙蔽人民耳目”，[注]至此，史量才、黄炎培等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疏远并转为对立。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史量才、黄炎培等利用上海市地方协会发起组织了有四百多个团体参加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不断通过集会、演讲和发表宣言等形式，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申报》，1933年10月1日。

1933年9月，以史量才为主任的灾区复兴组审查上海市政府在1932年年底发行的六百万元市政建设公债的使用情况，发现实际用于市政建设的款项仅占定额的二十分之一，其他都被挪作军事和投机金融所用。为此，以史量才为议长的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提出总辞职，以此抗议上海市政府的非法行为。[注]

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申报》，1934年8月30日。

1934年，史量才作为中南银行的董事，在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经济会议上公开拒绝会议主持人让他承购公债的建议。[注] 8月30日，《申报》上登

出《水旱灾后我国财政金融之前瞻》的时评，这实际上是以史量才等为代表的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决议，其中明确表示上海金融界不承购中政会批准发行的两千万元的江苏水利公债。[注]也就明确表示上海金融界不再为国民政府的内战提供军费来源。这样的决定，彻底宣告了史量才、黄炎培等同国民政府合作关系的结束以及他们与国民政府的决裂态度。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从杭州秋水山庄返回上海的沪杭公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晓示出作为地方名流的知识分子在上海通过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左右上海社会，并通过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影响全国局势的时代结束。跻身地方精英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身的实力和影响来履行社会责任并把他们的终极关怀付诸实践层面的愿望，因为与国民政府的现实政策的冲突，在国民政府的实力不断增强，对上海局势控制的要求和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最终化为泡影。

1930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因着各种不同的地缘、学缘、惯习和自身占有的资源，构建起不同的交际网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知识团体。置身上海城市空间的这些知识团体，为着自身的生存并对社会发挥影响，通过各种管道将他们的声音传递到社会中。在此过程中，他们通过创办刊物、出版书籍、组织团体等方式营造出许多新的表达空间，活跃了上海的文化氛围，扩充了知识文化人生存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不同的知识群体因为自身交往网络不同，占有资源及生存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因之不同，这些不同导致了他们能够影响的民众群体和对社会发生影响的作用模式以及因此形成的与上海社会的关系都存在根本的区别。

“左联”知识分子作为一批抱着倾覆现有社会秩序之决心的激进派，在言论和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之间保持着一种直接对抗的态势，他们的活动空间和表达空间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下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因为缺少稳定的职业和合法的身份，在交往和行动上受到很大限制的“左联”知识分子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交往让自身植根于上海社会，因而同上海社会的关系是疏离的、暂时性的，他们是上海社会的漂泊者。

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碑辞》，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扉页。

主要由江浙同乡构成的“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一批文化移民，他们在交往的对象和处事的风格上都带有明显的移民色彩。温和儒雅的气质、执着勤奋的工作态度和优容他人的处事风格，让“开明书店

派”知识分子不仅在内部能够融洽相处，在外部也能够为民众所接受。在文化商业化程度很高的上海社会，他们在出版界所占有的资源，一方面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表达空间，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将自身编织进上海社会的便利。“思不出其位，求进弗欲锐”[注]的主张让他们在固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保持着对政治温和的批评时，不会将自身置于同政府和社会直接的对立面。他们的务实、温和、勤勉和宽容，让他们能够坚实地立足于上海社会，成为融入上海社会的知识文化人。

上海地方名流是一批特殊的知识分子。其地缘、学缘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让他们在上海社会占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利用他们优势的资源，地方名流们将自己的关系网编织到上海社会的不同领域。他们的交往对象超出了一般知识分子交往的文化领域，涉及学界、报界、政界、军界和金融实业界的头面人物。这样的交往网络让地方名流具有很强的力量，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论和行为影响到政府和社会并具有同政府暂时对抗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也就让地方名流的表达空间不再局限于各种文化媒体，他们的主张很多时候可以以有实力的团体的建议的方式直接投递到政府。他们作用于社会的模式除却一般知识分子的言论表达之外，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对社会产生直接的作用。事实上上海地方名流在一段时间里通过他们最有实力的团体——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不断向政府和社会施加影响，体现出城市精英所具有的特色。但知识分子想要通过知识以外的手段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一个强势的专制政府面前，显然是不可能的。

王儒年

第六章

十字街头的象牙塔：19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的交往世界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对此一时期作为比较对象的海派文化的分析，可参阅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历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如是深情回忆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注何炳棣对清华大学的"天堂"比喻或许是诸多其时生活、工作在北平的学者、文人、学生群体的一个"缩影"，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确实，在经历了1920年代末的知识群体南北大迁徙后，到了1930年代，随着大批知识分子重返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城市——北平，一度黯然失色的故都随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重新焕发光芒，以及一系列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学术资源的引入，开始了一个学术文艺建设的"黄金时代"。相对于上海文艺界的政治化、党派化和复杂的内耗，以及随着小报和甜俗、玩世杂志的大量涌现而呈现的"上海摩登景观"，注北平的学界、文艺界却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建设时期。

1930年代的北平，主要活跃着几个大的知识群体。一个是以胡适等具有浓郁的政治关怀的学院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学者群体，他们聚集在《独立评论》杂志的周围，利用清华、北大所拥有的学院空间，并与天津的《大公报》合作，积极拓展谠言议政和政治参与的空间，试图以建设性的理性态度重建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社会重心。

一个是以周作人、俞平伯等具有鲜明的文化关怀和文艺趣味的作家为中心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也营建了属于他们的交往网络，《骆驼草》杂志、《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性私人交往网络，在这个群体的交往中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传统气息。

而林徽因、朱光潜、金岳霖等既受到传统文化濡养，又开放地吸纳、融通了西方近代生活方式的文人学者，是活跃在1930年代北平的另外一个知识群体。他们仿照西方知识界聚会的形式，在北平形成了声名远播的"太太的客厅""读诗会""星期六茶会"等公共交往空间，作为京派文人的典型群

体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激荡起了最美的浪花。自然，这些群体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享受着同样的文化传统留存的物理空间和精神养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在同样的学府里任教或求学，很多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见证者和产儿，又大都与当时中国第一大报《大公报》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因此笔者的这种群体划分主要是为了分析上的便利和清晰，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精神乃至命运往往是交叉的、叠合的，甚至相摩相荡，共同弹奏出了19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的交响曲。

一、

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

1. 《独立评论》社与议政性公共空间的建构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4. 转引自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见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笔者对其译文有改动。

对于1930年代的北平知识分子来说，《独立评论》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同人杂志。之所以称之为同人杂志，是因为围聚在这个杂志周围的学者大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无论在政治关怀、教育背景与社会身份等各个层面，都具有相当的“重叠性”。可以说，《独立评论》构造了一个政治性的“公共空间”。泰勒在回答什么是“公共空间”这个问题时，曾作如下的解释：“牵涉于‘公共空间’之人们，假设性地来说，从未有机缘会面过。但是他们在一个透过媒体——在十八世纪，即印刷媒体——而形成的讨论空间中被联系，彼此宛如可以相见。书籍、宣传册子、新闻在受教育的公众当中流动、传阅；互通信息的主题、分析、反论……等相互交涉、交锋与批驳。它们广泛地被阅读，而且常常在面对面的集会中，在社交界，在咖啡馆、沙龙以及在更具权威性与公共性的地方，如议会当中，人们彼此讨论它们。经由这种过程得出来的普遍性的观点，若有的话，就可以被接受为在这新的意义下的舆论。”[注]这种舆论形成的公共领域虽然是外在于国家政权的，可又同时构成对国家政权的一种有力监督，并可在适当的时候为舆论的制造者进入政府机构创造机会。

［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这个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多地已经安于充当议政者而非“干政治的人”（如鼓吹好人政府）。如费侠莉所分析的那样：“与《努力》的对比暗示出学术界知识分子面向社会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到1932年，丁文江及其伙伴在中国知识分子背离孔儒关于知识分子功能的概念方面达到一个

新阶段。他们不再轻易假设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一种亲密联系，这一联系，从理论上讲，应该把知识分子作为受过教育的人摆在政治进程的中心。在《独立评论》中，作为自觉的局外人和对社会抱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他们的作品更像出自西方知识分子的手笔。知识分子的异化对他们说来是近代生活所预期的情况，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是很自然的。”[注]《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主要编辑人的政论杂志，胡适是这家杂志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可以说，《独立评论》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胡适与其自由主义同道们的日常联系，也同时作为一根纽带开辟了新的社会网络。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第144页。

关于《独立评论》群体的具体情况，可参看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出完第244期后停刊。胡适曾经在纪念丁文江的文章中这样说明发起《独立评论》的缘由：“《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注]这种说法也可在独立评论社成员蒋廷黻的回忆中得到印证：“现在我已不记得是那一位发起的，在清华俱乐部举行一次晚餐，当日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席间曾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我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注]独立评论社初期社员包括胡适（主编）、丁文江与蒋廷黻（二人助编）、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吴景超，以及负责编务的竹垚生、罗尔纲、章希吕，后又补充了陈之迈、张奚若、何廉、周炳琳、周诒春等新社员。然而为聚餐谈话方便，社员人数始终控制在十二三人。[注]

《独立评论》社员的内部交往模式与准则，蒋廷黻也曾经这样评价过：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5—146页。

在舆论方面，《独立评论》成了当时著名的刊物。《独立评论》不对某项专题作有系统的讨论，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请托的稿件。大家每周聚餐一

次，讨论时事，但不作结论。我们不仅对外界是独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间也互不干扰。我们讨论时都了解彼此不同之点，有时大家的观点也会自然趋于一致。有时，外边作者会发现《独立评论》是真正独立而尊重别人意见的。《独立评论》实在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发表自己的意见。[注]

《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9页。
《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8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296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326—327页。

胡适的日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张《独立评论》社员聚、散、离、合的“文化地图”。“聚”指的是社员最初的聚集和周期性的聚会，意味着《独立评论》的开端和延续，知识分子的“聚”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表现。1932年1月28日，胡适草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草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蒋廷黻的办刊方针不高明。[注] 1934年5月4日，五四运动1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胡适约请了独立社员晚上在他家聚餐。丁在君、蒋廷黻、吴景超、任叔永夫妇、竹垚生、周梅荪、涛鸣、何醉帘（廉）等《独立评论》经常的聚会成员都参加了。当时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客人汤尔和也参加了这个聚会，并在餐桌上用一种非常乐观的语气描述了其在日本的见闻，认为中国的外交局势可能不会变得太坏。[注] 1934年6月15日，《独立评论》社员再度聚餐，蒋廷黻在聚餐会上大谈国际形势，引发与会者浓厚的兴致。[注]自然，这种社员式的交往并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有时也会以更私人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并发生一定的延伸。例如，1934年1月19日，丁文江就来到胡适家中吃午饭，谈了一个多钟头，主要话题是谈教学的心得体会，尤其是谈起用功的学生，更是眉飞色舞。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教授，对学生最热心，对课程最费工夫。[注]另外，如翁文灏出车祸后，胡适等人就充分地调动其社会资源，为翁文灏提供最好最及时的救助和治疗。1934年2月17日，胡适早起看报，得知翁文灏前一天在京杭汽车路上，在武康附近被汽车撞伤，头部受伤甚重，流血甚多，恐有生命危险。他读了几乎堕泪，认为此种人才，世间稀有，岂但是一国之宝而已。午间去探访丁文江，他在协和医院病榻上，对着胡适也居然无言，双泪齐堕，胡适就更感悲伤。[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338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545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546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475页。

“散”指的是《独立评论》社员在时势变迁中的风云流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部分《独立评论》社员面对国事浇漓而不忍筑象牙塔于浩荡时代洪流中，而终于被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所鼓召，纷纷然入阁。这自然与胡适所谓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自觉处于庙堂之外的“江湖”做政府的诤友大相径庭。对于朋友的这些“选择”，胡适自然免不了有一点感伤和惋惜。1934年3月2日晚上，《独立评论》聚餐，参与的人数寥寥无几，只有蒋廷黻、吴景超、周炳琳、吴宪、任叔永夫妇与胡适，共七人，与此前每次聚会的济济一堂构成鲜明的对比。[注] 1935年12月12日，吴景超到胡适家告别，他收到翁文灏的信，要他去做他的助手，翁文灏当时也已答应做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当时《独立评论》社的另一重要成员蒋廷黻也已南下南京，不是担任外交次长，就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独立评论》社员有三人入政府，对于维持这份政论杂志的生命力自然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注]到了1935年12月15日，《独立评论》另一成员周炳琳回到北平，胡适去看他，其时他已就实业部次长之职。《独立评论》社员共有四人相继加入政府成为幕僚了。[注]胡适面对这一境况，并不是消极等待，他想方设法挖掘新人，培养新人，试图组建新的《独立评论》编辑部。1935年5月17日，《独立评论》三周年纪念号出版。晚上有聚餐会，陈之迈与张奚若在座。陈之迈当时才二十八岁，在胡适印象中文笔思想都不坏，是当时学政治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胡适特别注意他，想把他拉进《独立评论》社来，将来让他和吴景超、蒋廷黻三人在一块，可以组成一个《独立评论》编辑部。[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216、218页。

“离”指的是《独立评论》社员在政治上的分歧。《独立评论》社员的交往网络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社会问题等的看法会全然一致。1930年代在胡适、张奚若与蒋廷黻、丁文江等《独立评论》知识群体中爆发的“民主与独裁”大论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尽管政见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私谊，而且他们强调的是“求同存异”，并不为了虚假的和谐而掩饰内部的分歧，相反在媒介上的言论空间和生活空间中可以为了对于政治的不同看法争得面红耳赤，之后仍旧是朋友。这也是这个知识群体保留了古代士大夫遗风而性情毕露的表现。1933年6月13日，胡适午前到中央研究院，见着李仲揆、傅斯年。在此之前傅

斯年因为胡适关于保全华北的政论，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社。但同时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此次胡适与傅斯年长谈之后澄清了后者的误会。胡适认为凡出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并建议认为《独立评论》立言太过温和的朋友们多写一些不温和的政论，而不能因为对杂志言论立场不满就当甩手先生。[注]因此，在胡适看来，《独立评论》绝对不是宣传某家某派政治观点的阵地，而是进行辩论和说理的公共园地。这种论辩性的公共交往并没有削弱这个知识群体的友谊，反而强化了他们的交往。

《胡适日记全编》（6），第279页。
《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32页。
《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83—684页。

1934年1月8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85号发表一篇文章论述武力统一中国之不可能，其直接论辩对手就是此前在《独立评论》上主张武力统一的蒋廷黻、吴景超。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这两个朋友的论调的效果将会是“教猱升木”。[注]围绕这一事件，胡适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多有涉及。1934年12月20日，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在君忽然作驳我的独裁不可能论，我写信（二千多字的长信）答他，你见着否？我说：‘将来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终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胡适之不肯公然谈中医，也是这个意思。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两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栗然以忧。‘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是你们山东亚圣的味儿了！汪蒋的‘感’电，我充分利用来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顺水推船’，导人入于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岂料丁大哥出此下策，为一班妄人增加气焰不少！”[注] 1936年1月26日，胡适在给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信中写道：“今早经农送来一篇记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纪游的诗四首，其一首题为《麻姑桥晚眺》：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此诗似是在君自寓其出处之怀抱，我读之因想起宋人杨万里的一首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明（鸣）。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我想吴达诠别号‘前溪’，大概是用此诗之意。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

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注]胡适对友朋虽不无惋惜，但既然事已至此，他就屡屡写信劝诫这些《独立评论》的老友要“出山要比在山清”，不能做纯粹官僚和顺从的“奴才”，而应该继承古代士大夫遗志，成为政府的“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

《胡适日记全编》（6），第307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361页。

“合”指的是尽管《独立评论》的成员在政治言论上并不全然一致，而且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有不尽相同的取舍，但他们对于《独立评论》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境况中应该承担的使命却有着高度一致的认可，对于该杂志也大都有着浓烈的情感注入。这份情谊可能是维系这样一个以《独立评论》为联系纽带的知识群体在时代风云流散中不至于彻底分崩离析的关键所在。1934年1月28日下午，胡适到清华大学，见着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在蒋廷黻家吃茶，钱端升从天津来。其间蒋廷黻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作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注]最明显地表明这一点的是胡适本人在日记和书信中屡次三番地表示其甘愿牺牲个人时间为《独立评论》工作的原因。1934年4月9日，胡适在日记中说，近几个月来，《独立评论》完全由他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评论》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次晨三点钟。他的妻子江冬秀常常因此而责怪胡适，劝他早早停刊。胡适常常这样开导她，“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作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注]这种《独立评论》群体之间的“合”不仅表现在这种言语之间的认同，而且表现在当杂志被政府迫害的时候，胡适敢于担当责任，为朋友开脱的政治勇气和道德意识。

《胡适书信集》（中册），第717—718页。
张佛泉：《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载《独立评论》1937年第230号。

1937年3月7日，胡适为《独立评论》复刊事，专门致信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归国后的第三天，在上海读报，始知《独立评论》第二二九期因为登载张奚若教授的一篇文字，开罪于先生，致有停刊的事。当时因身在南方，即发一电给秦绍文市长，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应由适担负。北归后曾访秦市长，托他代向先生约一个进谒的时间，以便当面向先生道歉。不意次日即有西安事变的消息，人心都为此事所震

动，无暇顾及此种小事。兹特具函向先生表示我个人负责道歉之意。此报已停刊三月有余，现适在医院割治腹疾之后，已稍复原，拟俟身体完全恢复，即继续出版。以后适长期住平，待教之日正长。倘有言论失当，务请先生随时指摘，以便随时正式更正。”[注]经过据理力争和政治周旋，《独立评论》在停刊四个多月后终于于1937年4月18日复刊。在复刊后第一期的《独立评论》上，该杂志的重要作者张佛泉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对言论及结社自由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细致而精辟的分析，并指出以《独立评论》为象征的公共舆论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健康的公共批评乃优良政府（中央、地方、市政，都没有分别）所必需的条件，他与政府是一事，是不能分的，是须同时存在的。社会上自由独立职业者是没有用意的，没有恶意的，没有背景的，良心话是应该，是必须尊重的。不歧视这样的意见是为政的最低条件，能采纳这样的意见方证明为有真学问。”[注]张佛泉的这段话很透彻地阐明了支持胡适等知识分子矢志不渝地办《独立评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他们一致认为自由独立的公共舆论对于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性，这也是凝聚这个知识群体在《独立评论》的旗帜下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独立评论》的社员中，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陶孟和、吴景超等人的关系网络自然构成了这个“公共空间”的核心，仔细爬梳这些学人的关系网络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可以从社会交往史的角度为解释当时的北平自由知识界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一书中这样记述道：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第60—61页。

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注]

胡适与傅斯年的关系则是一种“亦师亦友”的模型，1952年12月20日，胡适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说：

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见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傅斯年笔下的名人　名人笔下的傅斯年》，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5页。

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给他校阅的，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出来。那时候，他就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是胡适之的‘保驾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替我作了保护的工作。……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注

蒋廷黻也是因为离开了天津南开大学，就职清华后迅速地进入北平自由知识分子圈，据其回忆：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26、144页。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五年中（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华认真授课。抵清华后一年半，我成为评议会中一员。这段期间，对清华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清华教授集中住在三处。我住在北院。北院七号是叶企荪和陈岱孙，他俩那里成了非正式的俱乐部。有很多朋友住在那里，其中包括哲学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张奚若和钱端升，物理系的萨本栋和周培源。我和其他许多人常于饭后到七号去聊天。……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周到北大去授课一次。因为编《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我常到城内总社去。透过这些关系，我一直和城内一些朋友们有接触。注

至于他与胡适相识的过程则是这样的：

蒋廷黻：《我看胡适之先生》，载台湾《文星》1962年第9卷第6期。

我在1923年自美留学归国不久，第一次遇到适之先生，但和他接近还是1931年东北事变以后的事情。当时，他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一些朋友常和他见面讨论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危机，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决定创办一个讨论政治的周刊，胡先生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总编辑，丁文江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我协同胡先生处理社论的工作。我们每周举行一次编辑委员的餐会，大约有十人参加。注

傅斯年与丁文江的相识则是首先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他在纪念丁文江的文章中说：

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载《独立评论》1936年第188号。

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铁穆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多。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注]

关德懋：《翁文灏其人与事》，载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第36卷第4期。

李树青：《纪念杰出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1985年第46卷第1期。

翁文灏如何与胡适相识，又如何成为胡适所谓“八九个朋友”之一，暂无确切史料可考。在192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二人即已有交往是可以肯定的，北京大学、中基会、丁文江都可能是他们相识的媒介。而翁与丁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关德懋在《翁文灏其人与事》一文中指出：“笔者认为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两位师长型人物的领导与爱护。一位是丁文江，在他悼念丁先生的文中，说得很清楚：‘我与在君先生相从廿余年，承他待我如友，我心中实敬他为师……’他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一个从政的学者，是丁文江向先总统推荐而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丁死他失去导师。”[注]《独立评论》的社员吴景超是一个社会学家，1930年代“北方情势，岌岌可危。一时爱国学人，忧时志士，均感到救亡图存，实为刻不容缓的急务。吴先生遂于是年（1935年年底）离开清华教职，随同翁文灏、蒋廷黻诸人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希望把专门学识，贡献国家，增强团结力量，从事抗战”。[注]

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5页。

陈仪深在对《独立评论》作者群的考察中指出："在民主思想方面，实以胡适、陈之迈、陶希圣、萧公权、张佛泉、陈序经、张奚若、丁文江、蒋廷黻、任鸿隽、吴景超等几位为最重要。……《独立评论》的作者群，若以职业身份来看，大致的顺序是：大学教师＞大学生＞公务员＞研究员＞中小学教师＞助教＞编辑报人；若从地区的分布看，显然集中在北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就有一百位左右的作者，其他星散在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因此，可以说1930年代的中国，以《独立评论》为纽带创造了一个"志业共同体"，这个志业共同体既包括"面对面的实质的共同体"（指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见面的成员），同时也包括"想象的共同体"（指因为对《独立评论》言论的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

这个"志业共同体"的主导构成部分来自学院等空间网络，他们也不是匀质化的扁平共同体，而是一个立体的分层的共同体，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吴景超、翁文灏等自然是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他们通过编辑委员会、聚餐会、中基会、欧美同学会、大学、书信往来乃至与政府的勾连等方式形成密切的联络，而他们的友情的建立往往又是通过共同的留学经历、师生关系、杂志社共事、朋友介绍、大学同事、同乡关系、社团、以文会友等各种方式。在这个关系网络的建构中，学缘、业缘、地缘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自然对于他们来说，更关键的在于他们都是一群有着相似的政治理念、生活情趣与文化自觉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核心层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也会因为分歧而产生冲突，如上述胡适与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政治观念的冲突，甚至在1930年代还发生过"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珍贵友谊。同时这个核心群体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之中，就如胡适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社员们纷纷"入阁"直接干政治去了，如蒋廷黻、翁文灏、吴景超等人，但同时又在不断补充新的核心成员，如张奚若、陈之迈等人。

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在这个核心层以外的就是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群，他们也许一辈子也未尝与胡适等人见面，有些也只是短暂地与胡适等人相识过，但因为这样一个"阅读的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分享着对于时事、文化

与政治的理解，并且可以在《独立评论》上创构出一个“舆论空间”，形成理性而睿智的讨论。例如1934年胡适就与寿生、子固、吴其玉等人就中西文化的优劣展开过一场激烈而不乏价值的论争。而胡适在每期《独立评论》所写的“编辑后记”更是以务实而恳切的口吻塑造了一个“交流空间”。章清则进一步认为《独立评论》社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权势网络”，他认为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通过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建立起他们对学术的关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介入。从教育背景来说，这些教育界、学术界的领衔人物，大多具有留学背景，留学期间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建立起密切交往的第一层管道，也为归国后共同创业奠定了基础。这里既有学术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如胡适、任鸿隽与陈衡哲在留美期间因为文学因缘以及筹划“科学社”，建立起密切关系；而胡适与宋子文，因为同任《留美学生季刊》编辑，也为他们未来在政治上的沟通做了重要铺垫。[注]

2．北大、清华与学院性公共网络的形成

在传统中国，书院是知识分子交往的重要网络，书院是一个有形的地理空间，为来自不同地域的士子提供了聚集的交往空间；同时，书院更是一个延续传统、知识谱系与批判性文化的精神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书院成为一批有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非制度性平台。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认为：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书院是研究学问，也就是探究“道”的场所，是以此为中介的人和人的结集的场所。但是，如果那学问是实践性的，且具有政治内容的话，从书院到朋党之间的距离就绝对不远了，朋友关系成为促成自身的政治性党派的形成，也就是当然的事了。[注]

关于清末学堂的情况，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

到了近代中国以后，随着西方式的建制化的大学制度的引进，新式学堂和大学成为知识分子交往的新的空间网络。[注]近代的学院基本上是根源于一种共同探寻纯粹知识的学术目的，这些学院知识分子被安置在一个个学科分工的院系从事专业性的研究，以专业为基础建立了学院内的知识分子交往网络。同时，延续了传统的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往往又会跨越专业的藩篱，建

构出具有一定政治品质的同人群体。血亲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乃至同乡关系在学校这种新的交往空间中成为构造不同的知识群体的重要触媒，而知识群体在形成之后往往会获取一定的体制内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又成为吸纳学院内外的知识分子加盟其社群的重要因素，从而可能形成以不同的核心人物为“圆心”、以他们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影响力为“半径”的交往空间，在这些不同的交往空间，活跃着具有不同习性、关怀与特点的知识群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然是考察这些遵循着不同的圆心、半径而形成的知识社群的典范。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9—170页。

从空间形式来说，大学里面的交往方式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层次：首先是以学校、院系为纽带的交往空间，这种交往同时又是跟个人的审美趣味、治学取向、生活习性等交织在一起的，学校、院系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契机。1931年夏到1937年冬，钱穆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他的个人交游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管窥当时学院知识分子网络的窗口。在这种学院知识分子的交往过程中，往往有一两个核心人物扮演重要的串联角色。钱穆与汤用彤的认识和友谊开始于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据其回忆：“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一日，锡予来访。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注] 其后，两人的友情迅速升温，汤用彤也就把钱穆当作人生难得之知己。他相继介绍了许多朋友与钱穆认识。哲学家熊十力从杭州来到北平后，暂时没有地方居住，又是汤用彤与钱穆商量，从钱穆的居所让出一部分给熊十力居住。汤用彤考虑到钱穆一个人居住生活多有不便，于是又安排他住到自己寓所的前院一书斋。蒙文通从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系任教，与钱穆自然成为同事。蒙文通与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都曾经去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听讲佛学，结交为好友。蒙文通之所以能进北大历史系教书就缘于汤用彤的力荐。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73—174页。

钱穆认识陈寅恪和吴宓也都是因为汤用彤的介绍。汤用彤与吴宓都是出国留学前的清华同学，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还在哈佛留学时有过密切的交

往，而汤用彤与吴宓又是中央大学的同事。钱穆在北平就经常与汤、陈、吴一起，聚会、聚餐、闲聊。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的有新朋友加入这个共同体，例如梁漱溟、林宰平等人。据钱穆回忆："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学院网络中同事、同学关系是最重要的衔接纽带。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经常合聘教师，教师在这三个学校流动性也很强，而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形成了三校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通过师生关系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学院网络。

学院自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理性空间"，但这种知识分子群体更重要的还是遵循着趣味、志业、关切、习性等抽象的共同点而凝聚在一起的，这种凝聚甚至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范围，达致了近乎亲情的境界。很多学者都是远离故土，来到北平教书，他们在理智上都是爱好孤独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旧需要情感的慰藉，尤其是需要在日常的对话中交流思想、共同探讨，从而提升境界、扩大视野，因此，学院的网络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交往平台。如钱穆就对当年的聚谈津津乐道：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70、173页。

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266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350—351页。

其次以同学、师生等为纽带的交往网络在北平知识分子交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周作人与废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网络，再如胡适与留学

美国同学的交往网络，这种网络往往通过中基会、欧美同学会等形式表达。例如胡适在日记中曾经多次记载：1933年12月30日，“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沉樱、杨金甫诸人”。[注] 1934年3月25日，“中午，在清华同学会开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委员会。何淬廉主席。到者，刘奴万、陈翰笙、陈达、陶孟和、梁庆椿”。[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382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399页。

1934年5月12日，“美国大学同学会在颐和园开会，我是会长，不能不去。邀了陈受颐、陈受康兄弟两对夫妇同去”。[注] 1934年6月20日，“下午三点开北大中基会合款顾问委员会，开会后，会员六人（梦麟、叔永、孟和、孟真、洪芬与我）同去看翁咏霓，他已在十六日移回家了。他大有进步，送我们直到大门外”。[注]除了这种相对平等的交往外，就是建立在师生关系基础上的学院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教师除了给学生传授知识外，还往往通过其所掌握的学术资源为学生创造机会，甚至包括就业机会。试以胡适与千家驹的交往过程为例来分析这种网络的特性。

千家驹：《论胡适》，见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千家驹：《论胡适》，见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1932年，千家驹将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在读期间，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赚取稿费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也被胡适注意到。胡适在去南京途中知道他是北大学生，回到北平后与其得意门生吴晗提及。恰好吴晗与千家驹是建立在同乡同学关系上的莫逆之交。于是，千家驹顺理成章地被吴晗带去拜访胡适。闲聊中胡适询问其毕业后的工作去向，千家驹坦言没有着落。胡适便把千家驹推荐到其朋友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注] 1934年，胡适又主动介绍千家驹去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在北大毕业不过两年，怀疑他的能力，而且赵乃搏也不认可千家驹的思想“左倾”，就没有同意，千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胡适，对此事大发一顿牢骚。但由于胡适的坚持，赵乃搏终于让步，千家驹在1935年成为北京

大学经济系的兼任讲师，这个时候离其从北京大学毕业不满三年，所教的是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均为其老同学。事实上，千家驹去北大教书一事，并非出于他自身的要求，而系胡适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甚至连千家驹本人也是从陶孟和处知悉事情的前因后果的。[注]

在这样一个交往网络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地缘、学缘和业缘在综合地发生效力，在这个过程中胡适利用所掌握的文化资源，积极地扩展其个人的社会网络。当然，这不是没有原则的，至少就千家驹这个个案而言，被吸引入胡适的庞大网络的一个前提是被吸纳者具有出众的才华。胡适爱才在民国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对于清华政治系的青年教师陈之迈和《大公报》的张佛泉都是先睹其文，然后引进其交往圈子。

人类学家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田野考察洞察了中国式人情的内涵："人情是一个伦理体系，当一个人与他关系网中的人相处时，它指导和规范他的行为。从规范的层面上来说，人情依赖于报、沾光和面子等基本概念。从实践上来说，人情代表着社会接受的、正确的人际行为，对人情的触犯被视为严重的错误行为。"详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章。从对北平的知识分子交往的考察中，一样可以发现依托于地缘、血缘、业缘所建立的人情社会。

魏定熙在《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一书（金安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另外以同乡、邻里（居住空间上的接近）等空间因素为纽带的交往网络在知识分子交往中也发挥着作用。在传统社会，以宗法体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依托于地方性，成为知识分子建立认同感的重要来源。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逐渐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流转，原本稳固的乡村儒学共同体被打碎，在城市的学校、传媒、商会等现代性都市空间里，地缘作为一种架构社会网络的内生性因素并没有被摧毁，反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是人情社会，[注]实际上地缘相对于血缘在学院知识分子建构网络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同乡、同学是维持人际之间稳定关系网络的主要纽带，人情、面子与乡谊等各种非物质性因素在维持与拓展知识分子网络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会通过同乡会等方式发挥周期性的组织功能。[注]

对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说，同乡关系自然也成为构造人际交往网络的显著因素。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也注意到了这个

面相：

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东京国学讲习会听讲的留学生中，本以川、浙两省人居多，但后来继承章氏衣钵者，主要是浙人。蔡元培长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发展影响巨大。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观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1920年代，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朱希祖担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除当然委员外，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主任，12位编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

萧公权：《清华五年——问学谏往录之九》，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第17卷第4期。

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名家萧公权曾在清华度过五年时光，他在事过境迁后的回忆中指出，就治学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来说，清华几乎接近理想。当时他们一家大小五口初到清华时住在“老南院”二号教职员住宅里。叔玉一家住在六号，彼此相距很近。一年之后，“新南院”教职员住宅落成，他们迁往六号。这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陈岱孙是他的紧邻。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远。萧公权先生在住宅前的一大片空地上种树栽花，五年“灌园”的工夫，把原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园。这是他课余消遣的主要活动。清华园离西山不远。周末或假日他们有时结伴去游卧佛、秀峰、碧云等寺。颐和园也是他们一干文友同僚游踪所到之地。

因此，居住空间的接近自然有助于学者的交流，使得基于学校、院系等制度性空间的正式交往能够转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表现为闲聊、博弈、打桥牌、听戏、喝茶、出游、逛旧书店等多样化的方式，习性与情趣成为学院知识分子在著述之余交往的因缘。自然，学院知识分子的交往并不都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有时候甚至会表现为一种“粗暴方式”，地缘与学缘也经常牵缠在一起，构造出更密切的交往结构。汤一介曾经这样描述作为同乡、对门的熊十力、废名的故事：

汤一介：《“真人”废名》，载《万象》2002年第9期。

在1949年前中国有两个怪人，一个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一个是莫须有先生的化身废名（冯文炳）。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最后还有一种类型就是以学生社团、学生刊物为纽带形成的交往网络。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是形成交往网络的重要媒介，学生刊物往往依托于特定的学生社团，而学生社团往往又通过学生刊物来传播其思想观念、知识兴趣与审美趣味，名曰学生社团，其实又与教师群体保持着密切的关联，从而将教师与学生群体依照一定的交往准则联结了起来。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新潮社与《新潮》杂志就是这种校园刊物的典型，罗家伦、傅斯年等都是这本刊物的重要编辑和作者，同时这个刊物的学生群体与《新青年》群体形成相互呼应之局势，《新潮》杂志作者通过这种联结能够迅速地进入《新青年》杂志的同人群体，而《新青年》的作者、编辑也经常在《新潮》撰写文章，并担任编辑，如周作人就曾经担任过《新潮》编辑。

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园文学非常繁荣，其主要媒介就是《清华周刊》与《清华校刊》等学生刊物，教师也成为这些刊物的重要作者，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校园知识群体网络。据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研究：

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0页。

1932年2月，校刊报道《清华周刊》文艺职员名单，其中吴祖襄任文艺栏主任，钱锺书任英文副刊主任，编辑中有郝御风、孙毓棠、王香毓、霍世休、徐雄飞、林庚等文学爱好者。其阵容是很强大的。同年4月《清华周刊》推出“文艺专号”，在其上撰文者有平伯（俞平伯）、西谛（郑振铎）、吴祖襄、郝御风、林庚、李文瀛、吴大琨、申府（张申府）、叶公超、长之（李长植）等。5月18日，清华中国文学会开执行委员会，到会者赖天缦、吴祖襄、马玉铭、李嘉言，请假者郑振铎、赵赓飏、萧涤非。同年8月，闻一多

返校任教，清华文学社开会欢迎这位老社员。……至此，清华中文系教师有朱自清（兼系主任）、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以上教授）；黄节（讲师，后改为导师）；王力、浦江清、刘盼遂（以上专任讲师）；许维遹（教员）；安文倬、余冠英（以上助教）等，由此可想见清华文坛当时所呈现的繁荣景象。

“场域”（f i eld）与“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在研究社会实践中所创生的两个关键概念。简单地说，“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而惯习则是由‘积淀’（deposited）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schemata）”。布迪厄认为，“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s）。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疆界或形式”。布迪厄将“惯习”看作“一个生成性方案的系统”（a system of general generative schemes）或者结构性机制（structuring mechanism），它是“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惯习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计划运作，在社会结构与特定场域的互动所界定的可能性空间中发挥作用。惯习的概念以实践为本体，将个体行为理解为受到社会条件的结构性制约，却又不是结构逻辑的直接结果。由此，惯习是一个实践性概念，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动态互动。这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超越了“结构决定论”与“主观意志论”的二元对立。此处参考了刘擎未刊稿：《当代中国的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

知识分子学院网络的建构模式，不仅呈现出一种缘于相似的志趣、习性、学缘、地缘等而形成的“同气相求”的状态，而且也可能因为乖离和悖逆的趣味、价值等因素而显现出“离心离德”的分化形态，学院网络分化的同时意味着具有共同利益的网络的进一步强化。这种群体分化与强化表面的理由是“学术分歧”，其背后的原因其实也涉及学术资源与文化权力的争夺，进而通过知识分子的聚散离合展现了1930年代的学院政治的风貌。以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一事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学院政治展现的知识分子网络的场域与惯习。

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胡不归等：《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胡不归：《胡适之传》，见胡不归等：《胡适传记三种》，第24页。

胡不归：《胡适之传》，见胡不归等：《胡适传记三种》，第24页。

1930年11月28日，胡适全家自上海迁回北平，在南京过江到浦口车站遇到刘瑞恒，得知蒋梦麟辞卸教育部长回北京大学消息。当时北大已残破不堪，蒋梦麟刚开始不愿就职，经胡适与傅斯年、顾临等热心筹划，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给予资助，蒋梦麟才北上。北京大学又进入新时代。胡适应聘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主讲《中国中古思想史》等课程。[注]事实上，胡适当时除了北大的职务以外，还兼任了北平图书馆的董事委员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名誉秘书、中央研究院的名誉研究员及协和医学院的校董。1933年，北大校长蒋梦麟打算将国文系主任由文学院院长兼，这个计划导致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许之衡相继辞职，于是引起一场喧嚣一时的大纠纷。林损怀疑此举出自胡适的意见，因此愤恨到极点。他在愤慨中写了几封大失风度的书信。其一致蒋梦麟校长，“梦麟校长左右：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生交相责难，喑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从此别，祝汝万春！林损。”[注]其二致适之先生，“适之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林损。”[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51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91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152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332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377页。

事实上，胡适一直关注着北大的发展，也为之创造了很多机会与资源。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关于北大人事调整的事情。1931年1月30日，胡适已从上海到北平，蒋梦麟同一天之内为了北大的人事纠纷两次拜访胡适。胡适在日记中对蒋梦麟进行了褒贬，认为其决定采用院长负责制是一大进步，但他对蒋梦麟用温和态度敷衍王烈、何基鸿、马裕藻三人甚为不满。当天晚上胡适就找到傅斯年深谈，请他劝蒋梦麟努力振作。同时他又写信劝丁西林、徐志摩回北大，以巩固其在北大的“新势力”。[注] 1931年3月12日，胡适制订出

《北大与中基会合作计划》，将对北京大学的规划进一步推进。当天晚上他把计划书拿给任鸿隽、翁文灏、傅斯年阅读并请他们提意见与建议，然后又做了修改。[注] 1931年9月14日，蒋梦麟与周炳琳皆要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长，胡适以各种理由推脱了。[注] 1934年2月21日，蒋梦麟劝胡适回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仍然不肯。他认为自己若不决心走开，此职终不能得人来做。[注]但到了1934年5月2日，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胡适在这一天到北大文学院复任院长。国文系的学生代表四人来拜访，胡适告诉他们，如果必要的话，他愿意兼做国文系主任，并指出他改革国文系的原则是："降低课程，提高训练。"[注]

而时任北大教师的废名则在一封长信中规劝胡适不要担任北大文学院长：

废名致胡适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4页。

说一句衷心之言，先生不应该担任文学院长之职，天下人之事让天下人去做，若大人者自己来做事，则一怒应该天下惧，那怕是一件小事也要关系十年的大计也。再说一句衷心之言，今日各方面都缺乏人才，凡事都等于老爷唤听差而已。我自知，对于世事不无不恭之嫌，然而从此可以见我的一个最恭之意，即尊重先生个人地位之庄严是也。[注]

桑兵在考察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学院政治的形式：

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931年胡适在北大文学院开学演说时声言："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之'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不过积重难返，历史系因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尚能引进新人，尽管钱穆、蒙文通等并不为主流派所欣赏。而国文系在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改革时，连裁并课程也遭到马幼渔的抵制。直到1934年，胡适才征得蒋梦麟的支持，解聘林损等人。傅斯年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拍手称快之余，认为"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于马幼渔曲意袒护，指马为"此辈之最可恶者"，"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

来必为患害。”请求蒋梦麟当机立断，不留祸根。并称：“马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措辞如此激烈，固有胡适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见前此浙人把持之甚。而胡、蒋合力，在籍系声势已衰之际尚只能动林损而不敢碰马幼渔，则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风可想而知。[注]

由此可见，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院空间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知识群体，而这些知识群体对传统文化、西学源流、大学模式、政治价值等各种问题都有着分歧很大的观点；与此同时，因为出自不同的地域、社会阶层、教育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习性也有着相当大的鸿沟，更复杂的是在这样一个学院空间里还夹杂着非常之多的“社会因素”，比如对中基会的文化权力的争夺等。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还能有一个“兼收并蓄”的大气象与大格局，那么到了1930年代，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更多地转化为“地域之争”，空间生产开始成为吞没时间性（传统与现代的分歧）的重要机制，不同的空间产生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共处方式更多地呈现出某种斗争性品质，当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二、

传统、现代交往的双重面相与京派文人的交游网络

1．苦雨斋的周作人与“十字街头的塔”

在1930年代全面抗战前的北平文艺圈，周作人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核心人物。他的周围集中着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学者，如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这个圈子的交往模式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人的交往大异其趣，与这种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的“公共交往”迥异的是，周作人等的交往更带有传统文人的特性，通过聚餐、尺牍、唱和、听曲、逛旧书店等方式建立一种日常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显得非常随意和自然，不像金、林等人的交往时间和沟通模式是相对固定的，而是性之所至、任意往来。如果说金、林等所形成的交往网络更多的是侧重智慧和知识的话，那么周作人等人的交游注重的是心灵的契合和趣味的重叠。新文化运动后的周作人发生大的逆转，到了1930年代开始宣扬“闭户读书论”，注意“生活之艺术”，在对古书、民俗等的把玩中品味生活，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一部分追随者。

周作人（开明）：《十字街头的塔》，载《语丝》1925年第15期。

事实上，1925年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十字街头的塔》就隐含了周作人的这种“社会转向”，从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流氓鬼”形象转变成一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鬼”。他在这篇短文的结尾这样袒露其心曲：“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illegible]这个时期的周作人

还没有彻底学院化，还没有建筑起自己的“象牙塔”，但他也不愿意完全生活在“十字街头”的喧嚣中，他“怕累，怕挤”，他只能在“十字街头”的繁华中建构一座心灵的“象牙塔”，也即在处世的实存中保留一份超然的情怀，明净地观照和赏玩这个世界。

如果说在1920年代的周作人尚且在出世与入世、愤激与平和、学院与社会之间游离不定的话，那么到了1930年至1937年间，他性格中淡泊、宁静和疏离的面相越来越突出，谈论时事、典故、民俗的随意舒展中隐含的是在“文化的向度”中向自我内心世界的开掘，并且将自然、人生与社会的情趣灌注到这种动态的过程之中。周作人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审美化的进程，由此，短暂的、破碎的、繁杂的“日常世界”便与一个永恒的、辽远的、深邃的“文化世界”对接起来。正是在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周作人的社会网络自然地伸展，与诸多诗友、同好的唱和、交游赋予了日常生活网络一层“文化的光斑”，这种光斑所营造的气氛、感觉造就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塔”，安顿了周作人与其朋友们的灵魂。

1930年至1937年间周作人的日常世界到底是怎样展现的？在他的日常性的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面孔又具有怎样的社会学特性？他们又是基于怎样的机缘“相逢”在这人间世？1932年，周作人在一篇题名为《苦雨斋之一周》的文章中平实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

七月二十三日 阴。

上午，得半农赠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一部二册。写《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与季谷。午，往石驸马大街应菊农、伏园之招，来者佛西、振铎及刘、林、黎诸君，下午三时回家。耀辰来谈，六时后去。晚慧修来。

二十四日 晴。

上午，估人来，买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来访。下午，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重校阅讲演稿了。夜大雨。

二十五日 晴。

上午，往福寿堂，刘天华君开吊，送礼，又联云：广陵散绝于今日，王长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访川岛，午回家。下午，以讲演稿送还邓君，定名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改订《焚椒录》。吴文祺君以平伯介绍来访。金源来谈。夜，大风雨。

二十六日 阴雨。

上午，写信九通。下午，写讲演稿小引毕，即寄去。奚女士来访，为致函季明。晚，写《看云集》序未了。

二十七日 晴。

上午，写《看云集》序了，寄与开明。任仿樵君来谈，还《珂雪斋集》一部。下午，往访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时回家。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

二十八日 阴。

上午，启无来，幼渔、肇洛先后来，下午去。得半农赠《朝鲜民间故事》一册，其女小蕙所译，前曾为作序。嗣群来，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见赠。平伯来。傍晚大雷雨，积水没阶。十时顷，启无、平伯、嗣群共雇汽车回去，斋前水犹未退，由车夫负之出门。

二十九日 雨，后晴。

周作人：《苦雨斋之一周》，载《现代》1932年第1卷第5期。

上午，阅石户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药草》。下午，抄所译儿童剧，予儿童书局，成二篇。[注]

从周作人的这些记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1930年至1937年间以之为核心的文人社群的脉络，这个社群的交往方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私谊性质的私人生活，在这个私人生活所搭建的交往空间中，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发挥着凝聚的作用。周荣德在考察中国的士绅社会时指出：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12—113页。

阶层统一性是阶层群体的先决条件。所谓“阶层统一性”，我们的意思是某一阶层群体的成员能以此与其他阶层群体的成员明显地划分开来。划清界限最通常和有效的办法，就是看有无共同的生活方式。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群体，有着一套形成系统的控制个人活动和互相关系的行为规范。规范系统

只能通过群体中个人的媒介发现它在物质世界的表现，如果没有这个系统，群体则将仅仅是不能起整体作用的乌合之众。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7页。

对于包含周作人等在内的这个文人社群来说，其生活方式存在鲜明的相似性，他们的交往方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第一，家常性的互访活动。闲聊、品茶、家宴，往往是无目的性地消遣闲暇时光。如1932年4月19日“为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被法学院学生囚禁三周年，邀俞平伯、钱玄同、江绍原、徐祖正、冯文炳等在家集会纪念，沈启无因病未至”。

第二，相对比较正式的宴会。一般在一些相对固定的餐馆进行，如丰泽园等，这种交往规模相对较大，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有时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的聚餐会，带有约稿性质。如1933年9月10日，周作人应沈从文之约，赴《大公报》茶话会，谈《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事。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7页。

第三，共同的外出活动和社会活动。例如寻访北平的古旧书店、逛琉璃厂、郊游等。例如根据其年谱记载，“1936年5月16日，北京大学‘风谣学会’成立，最初成员有：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魏建功、罗常培、常惠、沈从文、方纪生、朱光潜、李素英、徐芳、吴世昌、申寿生、容肇祖、章廷谦、周作人等30余人，主席为顾颉刚”。

第四，书信往还和题写序、跋等。这种形式体现了传统文人墨客交往的特性，这在周作人与废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其为俞平伯的《燕知草》、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写序跋。就交往空间而言，周作人这个文人社群的主要聚集空间集中在“苦雨斋”“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学院”“孔德学校”等，另外就是印刷媒介构造的“交往空间”，例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骆驼草》等。

废名：《骆驼草》发刊词，1930年，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第397页。

对于这个文人群体而言，《骆驼草》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该刊实际上负责编辑和发稿校对的是废名和冯至，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徐玉诺等。该刊在废名撰写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响都是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并标榜该刊"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注]这个发刊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个群体的精神旨趣与价值趋向，以"闲适"为核心，玩古董，谈文艺，侍弄花鸟虫鱼，把玩琴棋书画，超然于政治之外，自成一价值自足之系统而罔顾社会舆论和"时代精神"；质言之，就是在意识形态两极化的社会空间里为自身的情趣构筑一个私人性浓郁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追求精神的独立、个人的意味和人文的理趣。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正是这种价值系统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崇尚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世界的频繁交往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一种审美和观照的态度里沉溺在当下的可以把捉的文化世界的精神里，相对于"遵命文学"的泛滥也不失为一种"沉默的反抗"。如论者所指出："他们或在北大任教，或毕业于北大而在北平的高校任教，清一色的学院中人。周作人是这些人的文学前辈，并且曾经是他们中许多人的老师，如俞平伯、废名、梁遇春等。《骆驼草》的创刊标志着1926年以后在周作人身边形成的一个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集体在193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注]

在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这个群体中，人际网络的建构遵循着大致相似的逻辑，而周作人与这些文人的关系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71页。

其一，新文化运动凝聚的"战友型"关系，如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友谊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通过《新青年》等杂志的反传统、主张个性自由、倡导民主科学价值等形成了一个"历史传统"。自然，启蒙运动只是为他们的友谊深化提供了契机，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因素"隐性地发挥着作用。例如周作人与钱玄同早年在日本都曾受业于章太炎，民

国以后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是同学、同事、同志关系的复合网络。周作人曾在《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细致地描述了他们初识时的情态："太炎答应于星期上午在《民报》社开一班，先讲《说文解字》。听讲的人是鲁迅与我，许寿裳和他的同学钱家治……两三个在讲习会的人，因为热心听太炎讲学，所以也赶来听，这便是钱夏（玄同）、朱希祖和朱宗莱。当时玄同着实年少气盛，每当先生讲了闲谈的时候，就开始他的'话匣子'（这是后来朋友们送他的一个别号，形容他话多而急的状态），而且指手画脚的，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去'的雅号。"[注] 1939年钱玄同逝世一百天的时候，周作人作《玄同纪念》深切怀念他的这个老朋友：

周作人：《玄同纪念》，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第445页。

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注]

周作人：《半农纪念》，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第413页。

刘半农则与周作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存在着密切的工作上的接触，他们又曾经都是《新青年》作者，其最初的友情也是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建立的："民国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中初见到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注]

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9—130页。

其二，学院教育建构的"亦师亦友"型关系网络，如与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师生兼朋友关系。当然，学院教育只是提供了相识的机会，事实上，他们的私谊非常深厚，周作人也是将他们作为得力门生刻意栽培，奖掖有加，他们的交往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俞平伯是周作人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经修过其《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并参加北

大进步团体新潮社创办的《新潮》的编辑工作，而周作人是这个学生刊物的重要编辑和作者。孙伏园也是周作人早年的学生，担任《晨报》副刊编辑时曾大量约请周作人撰稿，而他离职后担任编辑的《语丝》周刊得到了周作人的大力支持。因此可说，周作人与俞平伯、孙伏园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查考《俞平伯年谱》可知，俞平伯与周作人的主要交往方式是书信往来，互访活动也相当频繁，经常在家或餐馆宴请对方和其他朋友，如1931年1月7日中午，在清华园寓所宴请来访的周作人和沈启无，邀请朱自清作陪。其次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共同参与社团活动，发表演讲，主持考试等，学院空间是他们交往的重要场所，如据《俞平伯年谱》记载："1930年11月7日，应天津女子学院沈启无邀请，与周作人同车赴天津。11月8日，上午，应邀与周作人在天津女子学院作讲演。下午，受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会邀请，陪周作人往南开大学大礼堂作公开演说。"[注]而沈启无也是周作人的得意门生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私谊与公共学术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互动的文化权力网络。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下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周作人与废名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查考《废名年谱》可知，从1930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废名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得最多的记载就是"访周作人"和"得周作人信"等，几乎每天都会跟周见面或书信交流，甚至周作人夭折女儿若子的忌辰等都会参加。1930年11月20日，废名到周作人家，参加若子一周年忌，两年后的同一天，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废名来，八时半雇汽车同家人往广通寺致忌（若子三周年纪念忌也）。十时半，由寺出发。十二时半到板井邨，即下葬。"[注]相对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和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的"公共空间性"，周作人与其得意门生的交往形式更多的是体现出"私人领域的交往性质"，而这种私人生活的交往空间与公共交往又不是截然两分的，往往又通过参加同样的学会、学院空间、读诗会、报刊活动等与公共生活交缠在一起。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北平这两个偏文艺学术群体在交往的特征上的差异：有过欧美留学经验并认同其生活方式的学者、文人对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采取分离的做法，他们可以参加公共空间的讨论、争辩和型构，但同时保留个人私人生活的私密性；而对于像周作人及其学生这样的群体来说，"公"与"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贯通的共同世界，这更多地体现了中国式交往空间的特性。

周作人：《怀废名》，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第499页。

［日］井上红梅：《采访周作人》，董炳月译，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8期。

例如，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这样记述他们的交往过程："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注] 1934年7月，周作人访日期间，日本记者井上红梅问他"据说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时他回答说："不，没有那种事。来学校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三位。俞平伯现在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注]

废名：《知堂先生》，见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即此可见，虽然1930年代作为"北方文坛盟主"的周作人交游广泛，社会网络错综复杂，门生同事故友遍北平，但真正成为其群体中的核心成员的只有俞平伯、废名等人。《骆驼草》群体在时代的巨变中也在发生显著的分化，而周作人与学生们的交往也时常会有一些变故，例如沈启无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成员，后来因某事触怒周作人被其逐出师门。但废名是周作人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与其说这是因为周作人在生活上处处关照他而招致的感激，不如说是周作人的精神魅力与渊博学识让废名彻底地"皈依"了，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成为类似宗教性的精神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废名所作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窥知一二："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知'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仍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

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与。”[注]废名与俞平伯的互访也是相当的频繁，在废名的年谱中经常可以看到其拜访俞平伯并与之长谈的记载，甚至还要讨论打坐等修炼佛法的方法，精神上极为相通，才能如此亲密相处。

除了这些日常性的密切的交往网络，一些重大的或偶然性的事件也为周作人群体的内部凝聚和对外扩张提供了机会。偶然性事件导致的人群聚合最典型的莫过于朋友的死亡。对于死者来说，死亡是一种无奈的诀别，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制造了一种聚集的“公共空间”，死亡也在某种意义上区分了生者与死者的亲疏程度，暗示着以死者为核心的知识社群的“脸谱图”。对于1930年代的自由知识界来说，几个学人、文人的偶然离世无形中提供了这样的空间。这当然是一种虚拟的“公共空间”，但也是围绕着“追悼会”“安葬仪式”“慰问家属”等有形的空间进行的，而且这种“公共空间”为不同的知识社群的交往提供了契机，也有助于加深他们的感情。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第412页。
周作人：《志摩纪念》，载《新月》1931年第4卷第1期。

例如据《周作人年谱》，1931年12月6日，周作人“参加北平文化界举行的徐志摩追悼会，参加者有胡适、凌叔华、陈衡哲等250余人”。[注]周作人与徐志摩的关系之亲密自然不如胡适等人，但从一个大的视野来看，都可以划归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周作人在应《新月》杂志纪念徐志摩专号之约的文章《志摩纪念》中写道：“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167—168页。

作为徐志摩密友的胡适在遭遇这个“偶然”时的情态及人脉联络显示了另一种“社会网络”：“昨早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北来，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发一电来梁思成家，嘱下午三时雇车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车去接，至四时半人未到，汽车回来了。我听徽因说了，颇疑飞机途中有变故。……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难了。……下午，思成徽因夫妇来，奚若来，陈雪屏孙大雨来，

钱端升来，慰慈来，孟和来，孟真来，皆相对凄婉。奚若恸哭失声。打电话来问的人更无数。”[注]再者如刘半农1934年外出考察染病身亡，他的学界、文界友朋组织追悼会等，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如据《周作人年谱》，1934年9月，从日本刚回来的周作人在短短的一周内，相继拜访刘半农夫人，商议追悼会事宜，参加北京大学关于刘半农后事的会议，并为其撰写挽联，同俞平伯一道去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参加刘半农追悼会。刘半农意外染病身亡，周作人在为好友英年早逝悲痛之余，联络其学生废名、俞平伯、沈启无等积极操办刘半农的身后之事。因此，死亡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表意空间，它所导致的人群聚合隐寓的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和性与关系之亲疏。

与死亡相对应的就是生者的“狂欢”了，也就是生者庆贺寿诞之类的聚会。这种聚会既可以表现为宴会式的空间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祝寿辞式的象征形式，即通过文字唱和的方式来达成过生日的人与祝寿的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标示出知识社群的精神气质的差异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区隔。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作“牛山体”打油诗一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15日，周作人旧历五十生辰，在“苦雨斋”设家宴招待友人，共五席。又用原韵作一首打油诗。这两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个时期周作人的心境与志趣。后上海《人间世》编辑兼老友林语堂索诗，周作人随意抄写与他，被林语堂刊载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冠以“五秩自寿诗”的标题，并配以周作人巨幅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后来其朋友钱玄同、蔡元培、沈兼士等也加入和诗者行列，连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也写作打油诗以应和。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当然，除了同气相求的和诗外，也不乏批评之词，以致周作人的寿诞从“私人生活”嬗蜕成一个公共性的“文化事件”，形成了拥护者与攻击者两大阵营。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周作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报纸杂志作为公开出版物也是这种“突变”的重要原因。印刷空间上的聚集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的延伸，而日常生活中关系的亲远和志趣的差别又是印刷空间上的“话语冲突”的关键原因。质言之，周作人的五十岁生日所导致的“文化效应”是理解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重要线索，也提供了了解他们在大的背景下的“亚群体文化”的钥匙。钱理群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解读指出：“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发出来的，是中国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内心的一次审

视：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等等。”[注]

2．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网络

在19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在时人与历史的书写、记忆中闪耀着诙谐、机智、博学与感性的光辉，也满载那个时代的最高贵的灵魂碰撞出的灵感与情趣。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在这个“客厅”中出现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主持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的在校大学生慕名而来。不管来访者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换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是陌生而神奇的，在20世纪前半叶的民国，也是“昙花一现”式的仅有的光辉璀璨。与其说它是中国式的文人结社的近代延续，不如说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

［法］弥尔顿：《公共空间中的妇女：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张智译，见李宏图等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90页。

近代欧洲沙龙的诞生地是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宫廷，它却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演绎成反抗和脱离宫廷社交的社会空间。17世纪中期，“沙龙”一词最常见的用法是指王室和贵族家庭中宽敞、精心装饰的客厅。到了1750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也开始适用于这一词语。“沙龙”的新用法是指一个设计得更为朴素的房间，它使个人能在一个关系相对亲密的基础上相互交往。詹姆士·弥尔顿在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公共空间进行研究时特别注重对沙龙的考察，他认为与同时期其他的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相比较，沙龙一个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总是围绕着一位女性展开。他认为这些由女性主持的沙龙具有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沙龙和启蒙运动时期公共空间中的其他团体一样，与18世纪的出版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交谈才是沙龙的中心，但沙龙文

化却不仅限于口头。作家占据首要地位的沙龙，是书面文字产生和传播的地方。最后，沙龙为不同社会和职业背景的个人，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条件下共处一室提供了机会。”[注]在初期的沙龙，主体主要是没落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后来大量的作家、文人和学者加入了这个公共空间。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这个交往网络的核心。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

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陈钟英、陈宇：《林徽因年表》，见《林徽因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与当时充斥北平的社交明星迥异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来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所建筑的一种明丽而坚实的“精神魅力”。正是这种知性的资质和高雅的交往技巧，使得她能够在国难蜩螗的1930年代在偏处一隅的“私人空间”建构出一个相对超然的“独立领域”，在这里自然有对国家社稷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却更多的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早在1920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被迫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名义赴欧洲游历，他行前给时为16岁的中学生林徽因写信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注]事实上，林徽因确实在欧洲的游历生活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社交能力，习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十年之后的“太太的客厅”奠定了基础。

在1930年代的北平，以林徽因的“客厅”为中心形成了两种结构的交往网络。第一种网络主要是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而形成的。1930年代的北平高校大部分都能够给教授们提供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闲暇时光，因此以院系为纽带，一些教授因为业缘（这种业缘往往又与共

同的求学、留学经历等学缘牵扯在一起）而发生经常性的日常接触。学院生活要求理智的对话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国外留学养成的聚会习惯也成为很多教授的生活习性，这样工作上的接触和课堂教学、研究之外的时间成为他们积极开辟的“公共时段”，变成知识贵族和精神贵族交流和对话的黄金时间。

林徽因的“客厅”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空间，一是因为梁思成、林徽因都出身名门望族，梁思成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其父亲梁启超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元老之一，这为他们接触清华、北大等学府的学者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二是因为梁、林的密友金岳霖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金岳霖是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终身未婚，喜好结交朋友，身边有一个固定的学者交往圈子，空间上的接近导致双方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高度的重叠；第三，如前所述，林徽因是一个类似“卡里斯玛”的诗人、学者，她具有成为一个沙龙女主人的所有条件，她的知识品位、沟通能力和判断力都是第一流的，她提供的休闲、优雅而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方式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富有天然的吸引力。

林徽因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大致勾勒了这个交往网络的成员与特性：

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见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这时我家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这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张奚若和钱端升伯伯在政治学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逻辑学方面，陈岱孙伯伯在经济学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学方面，等等。……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

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交往活动并行不悖的还有“后院”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定期性的聚会。这种聚会既是老朋友之间的友情的自然延伸，也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跨学科非正式讨论的空间。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金岳霖文集》（第4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8页。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19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作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注]

由此可见，在以金岳霖为核心的知识社群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识背景、职业特性和生活空间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在发挥着凝结的作用。一是金岳霖的“单身汉”生活为朋友间的尽情交往供给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间”，而知识分子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羁绊的精神自由。“单身汉”的生活使金岳霖少了很多俗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说过，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反而为金岳霖的交游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习性在北平的知识社群的“分层”中发挥着隐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为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会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岳霖的“家”恰恰可以满足这些细节上的需求，使得这些学者虽然处身仍旧落后的中国却可以“象征性”和“周期性”地缅怀和重温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202页。

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在人员构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更加广泛，当然一些重要成员是交叉的。金岳霖的特点是平易、亲和，他的身上弥漫着知识贵族的气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像林徽因那样严格维持生活的品位。金岳霖是一个“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够“孤独”地在知识与思维的“自由王国”里徜徉；但在生活中，他仍旧烙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需要在一个知识社群的内部交往中寻求归属感。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性是个人的，而激情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

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郭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注]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729页。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731页。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733—734页。

在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上出现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这就说明这个社群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而是适度敞开的。例如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据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注]金岳霖与钱端升的交往则呈现另外一种特性：“钱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注]而金岳霖与陈岱孙的相识更是偶然中的机缘巧合：“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注]

从金岳霖的这些追忆可以看出，当时北平的知识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筑在学缘、业缘等基础上。自然，这种因为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甚至“同人关系”形成的链条是相当稳固的，在这种表面的理由背后所隐含的是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包括价值上的相互认可，这是当时北平学术社群的核心部分，在它的外围当然经常有一些陌生的、异质的因素接近、参与，也试图从中受到熏染。因此，这个知识社群的成员在成分上是多元化甚至是流动的，而这恰

恰是这个社群充满魅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尤为关键的是能够为当时北平的大学生提供增长见识的空间。

陈岱孙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点：

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第36—37页。

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94页。

胡适也是金岳霖这个星期六茶会的座上客，他曾经在日记中零星地记载参加这些茶会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Mrs. Swan， Prof.&Mrs. 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熊□□。"[注]"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经勾勒出这个茶会的人员结构，可见即便在这样一个相对沙龙化的聚会中，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同质化的平行结构，而是内部分层的，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区分。

第二种交往网络则与前面的交往方式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与第一种交往网络的平等性（一般是同龄人而且具有同事关系）不同的是，这种交往往往发生在两辈人之间，具有代际交往的特征，年轻一辈往往是带着崇仰和虔诚的心态去拜见知识界的前辈，并能得到奖掖与扶持而迅速地进入文学界的核心圈子；其次，正因为是代际的跨辈分交往，

所以不是依靠学缘、业缘等进行，而主要是依靠“印刷文化”而演绎“以文会友”的传统交往模式。这一点与欧洲早期的沙龙极其相似，大量的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的出现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因为共同的阅读对象、阅读习惯和阅读趣味而使本来生活无交集的“陌生人”对印刷物上的“作者”及其“读者”产生了认同与想象，逐渐地，“虚拟的印刷符号”借由有心者的种种努力和主动转变成现实中的具体的交往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近代的定期出版的印刷物在生产印刷符号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新的“社会网络”，而这种“社会网络”反过来又为印刷物提供了稳定的作者和读者群体。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载《读书》1984年第10期。

193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萧乾在学校报刊栏前浏览报纸时，发现其习作《蚕》已经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本来是他邮寄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沈从文请教的习作而已。几天后，萧乾收到沈从文的信，告诉他“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1984年的萧乾是这样追忆半个世纪前的这一动人心魄的时刻的：“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迫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注]由此可见，在这种交往网络中，学生辈往往能够依靠前辈的提携迅速进入文艺创作的圈子，其作品也能得到恳切的鉴赏和批评，可以说，这种基于文艺趣味的交往借助于印刷物的传播，更能有效地使“太太的客厅”延展到社会。

如果说第一种交往主要是通过知识、习性而凝聚的话，那么这种交往则主要是通过共同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爱好展开的。萧乾对林徽因等大家的认同也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作“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

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常对文章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注]

卞之琳：《窗子内外忆徽因》，见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第14页。

卞之琳与林徽因的交往过程也是遵循同样的“交往逻辑”，也是在以文会友的模式中展开的，这种超越血缘、地缘等自然性联系纽带的交往反而为知识社群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方式。时为在校学生的卞之琳在其晚年回忆中这样描述：“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注]根据卞之琳的回忆，他与林徽因的交谈话题主要缘于经常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这些刊物除了《诗刊》外，还有杨振声、沈从文主编，萧乾任执行编辑的《大公报》文艺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以及叶公超主编的月刊《学文》等杂志。因此，对于像卞之琳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通过发表作品获得主流认可，是进入文学界的重要途径，这也是第二种交往网络的特征。

三、

《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

1．《星期论文》知识群体与《大公报》的文化权力网络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1188页。

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406页。

1953年1月7日，年逾花甲的胡适在“台北市报业公会欢迎会”回忆道：“《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1886—1941）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刊所采用。”[注]而事实上，最早提出开辟《星期论文》专栏的是当时《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他当时的用意是：“一是每天要发一篇社评，多数由他执笔，负担过重，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每星期他可以少写一篇社评。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扩大在学术界与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注]《大公报》研究专家（系大公报人）陈纪滢也说过：“大公报鉴于全国最高学府拥有专家学者无数，而社会各阶层均有饱学之士，这些人构成国家之文化动力。他们对国是与各种专门问题都有卓见，隐藏于脑海之间，有的人喜欢写文章发表议论，有的人则须催逼而成。尤其在国难蜩螗，全国需要竭尽智慧，以挽救危亡之际，更应以专家的学识，以贡献于全国。因之，于民国二十二年秋发起刊载《星期论文》，以代替社评。”[注]

《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32页。

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第407页。

1933年年底，张季鸾与《大公报》另一主笔胡政之联袂到北平，在东兴楼庄宴请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数十人，为即将开辟的《星期论文》约稿。席上特别说明稿件除抵触法律外，决不干涉内容，不更改字义，以尊重作者。

胡适作为当时北平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自然在《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界的这次合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34年12月20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也觉得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值得维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还替别位朋友'枪替'了好几次。"[注]可见，从《大公报》创办的1934年直到1953年，《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在他的心目中仍旧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而他对《星期论文》也持认同和维持的态度。不仅作为该栏目精神领袖的胡适如此，而且很多学者和读者都迅速认可了《星期论文》。据陈纪滢回忆："《星期论文》兴起后，引起全国注意，尤其知识界到了星期天，无不争看这个礼拜是谁写的。其中的确开启了中国专家学者在报纸上发表议论的先河，更为读者广辟吸收知识的园地。"[注]

1934年1月1日要闻版，《大公报》天津版影印本，1983年出版。

胡适：《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载《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1月7日。

胡适：《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载《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1月7日。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上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注]胡适的名字赫然在首批担任撰述的"社外名家"之列。紧接着，在1934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即1934年1月7日，胡适率先发表第一篇"星期论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在该文中，胡适首先概括了当时中国的新闻纸的发展趋势："近几年来，中国报纸的趋势有两点最可注意：第一是点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话部分的逐渐增加。这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报纸的文字容易懂得。"[注]胡适肯定了《大公报》在采用白话文方面的功绩："在《大公报》的六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报的文字变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话化，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了。"[注]

胡适：《后生可畏》，见《胡适日记全编》（6），第120页。

《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1万号特刊。

《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1万号特刊。

《胡适日记全编》（6），第267页。

而在《星期论文》开辟前的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1万号，胡适的贺辞《后生可畏》把《大公报》比喻成一个快速成长的“小孩子”（相对于历史更加悠久的《申报》《新闻报》等），并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赞美：“然而这个小孩子居然在这几年之中，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这真是古人说的‘后生可畏’了。”[注]胡适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注]对胡适的批评，张季鸾在当日发表的《一万号编辑余谈》中谦虚地接受，并承诺道：“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用白话文。”[注]当时胡适对《大公报》的批评主要的指向是学衡派的主将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胡适在1933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前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般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注]

在胡适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对社会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大公报》非常重视，而且对它有着一定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主要与他对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学人群”的角色定位有着一定的关联。这种自我认同在1933年4月8日他坚拒汪精卫请他担任教育部长的回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08页。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346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381页。

而在胡适所理解的现代社会，做“诤臣、诤友”就意味着以不入阁的超然立场议论政治，而议论政治发表对时局或重大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见解，首先就要求有一个能够自由表达的言论空间，并且这个言论空间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辐射能力。以言论见长的声誉鹊起的《大公报》进入其视野便不难理解了。1934年3月9日十二点半，路过天津的胡适专程到大华饭店，赴胡政之、张季鸾之约，会见《大公报》与《国闻周报》的一些年轻朋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着对《大公报》的评价：“去年我在《国闻》四十四期上见张佛泉先生一文，曾到处揄扬他，且写信到哈佛托裘开明打听此人。今日也见着了。他是《大公报》派出去的。《大公报》一班人有魄力，有远见，可以能造成这样一个大势力。”[注]两个月后，胡适在1934年5月11日的日记中再次肯定《大公报》的成绩：“凡能集中精力专办一件事，必有好成绩，其势力自然放射出来，不可压抑。成都的牙科与北平的协和医校，是其二例。天津之《大公报》亦是一例。”[注]

《胡适日记全编》（6），第426页。

虽然胡适只是《大公报》的特约撰述人之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介入了《大公报》公共舆论的生产中，并且这种时评写作也已成为建构他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在1934年年底所撰写的回忆中，胡适总结道：“今年作时论甚多，因为我编辑《独立》全年，又在《大公报》作了七八篇论文，故全年中作的时论比往年多的多。全数有三十多篇。”[注]其中被胡适认为比较可读的或者说有价值的有五篇，其中两篇是发表在《星期论文》上的，分别为《悲观声里的乐观》和《汪蒋通电里提出的自由》。考察从1934年1月《星期论文》的创办到1937年7月抗战的爆发期间，无论是从写作“星期论文”的数量还是从参与重大论争的次数来看，胡适都是《星期论文》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之所以能够吸引中国当时诸多一流学者参与，除了前面所论述的《大公报》的办报宗旨与《独立评论》的立言精神非常相似，在旨趣上有共同的关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保证了《星期论文》作为公众舆论能够获得制度性的保障，那就是张季鸾等《大公报》人与胡适等学术界人物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交往和默契友谊。这种友谊不能仅仅从工作需要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更多的或许可以从这些知识分子的性情相似、旨趣关怀相仿、对国难的屈辱体验和自觉担当责任来理解。核心人物的交往自然会扩散到这个交际网络的边缘去，例如胡适就先后向《大公报》推荐了很多得力的作者，而《大公报》也为很多作者获得良好的公众声誉提供

了一个公共空间。胡适也非常重视这种友情以及《大公报》提供的这个公众舆论空间。

《胡适日记全编》（6），第537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537页。
《胡适日记全编》（6），第214页。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写信告诉胡适："此间市政局奉北平当局电令，即日起停止敝报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故自四日起北平已不能去报。素承关爱，特以奉闻，并肯便中代达诸友好，为感。"[注]胡适的回信很真实地体现了他对《大公报》深厚的感激之情："这回我从南方归来，本不存多大乐观，只作'死马作活马医'的万一希冀。三周以来，无日不作苦斗，所赖有先生们不避危险，为我们作声援，作宣传。现在《大公报》停邮，平津两地的报纸上就不能有一隙之地可以给我们说话了。大概我们能努力的日子也就不多了吧？念之慨然。"[注]其时平津逐渐被亲日势力所渗透，报纸也相继被收买，因此《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成了胡适等人向社会公众发表言论的"一隙之地"，当然对张季鸾等《大公报》人心存感怀，由此也可见，胡适非常重视《星期论文》这个公众舆论的阵地，这也是他多年处心积虑经营的主要原因。相对于《大公报》一呼百应的公众影响力，《独立评论》就显得像是一个小小的"同人刊物"了。在胡适的日记中，我们也可以经常发现零星的与《大公报》人交往的记录，如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下午吴达诠来谈，谈了两点多钟。他主张'还政国民'最力，也主张把许多建设事业暂时中止。"[注] 1934年2月19日的日记："到大美菜馆吃午饭，与张季鸾、王芸生、杨金甫、沈从文谈。他们商议改良《国闻周报》。我劝他们参考*Manchesler Guardian*, *London Times*（曼彻斯特《卫报》，伦敦《泰晤士报》）的周刊。"《大公报》之重视胡适的意见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陶希圣的回忆，《大公报》之所以能够红极一时，是因为张季鸾等人能够周旋于衮衮诸公与学界领袖之间而游刃有余，既为报纸开创了新闻信息的源泉，又为报纸公众舆论的形成联络了一批最优秀的作者。陶希圣在追忆张季鸾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道：

陶希圣：《遨游于公卿之间的张季鸾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1977年第30卷第6期。

我们了解当时华北和北平的实际的特殊情形，我们才能了解《大公报》所以风光的机运。《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的主持之下，不但提供园地供平

津学界发表东西，而季鸾先生对于学界的人，周旋交往，亲切诚实。教书先生没有别的，要礼貌，而他的礼貌够；要诚意，而他的诚意够。这样一来，学界的人愿意跟他来往，他是以“温良恭俭让”与平津学界的人来往。当日平津国立或私立（如南开）大学教授待遇很高，不大在乎稿费，但稿费要礼貌作陪衬，才可得人喜欢。张季鸾先生约请北大和南开的教授写星期专论，四十块银元一篇，而礼貌更加隆重。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给他，正要发表的头一天，委员长出了险，他把校样打好寄给我，那是我生平最好的一篇文章，却又没有发表，稿费是拿到了。他不但交往学界，而且留心学界的人。他在平津学界和国民政府中间，老实说，跟蒋委员长中间，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一边是新闻界，一个《大公报》，另一边是学界，像北大、清华、燕京和南开各公私立大学，他从中联络。北方的书生论政，政治当局重视北方的政论，互相呼应，很少隔膜，《大公报》尽了一番力。这是实际的情况。当时日军正在从关外调动军队，扩大侵略，着着进逼，新闻界同学术界连起来在北平那样被侵略的、被压迫的、被欺凌的危险地区，苦撑在那里，这个局面当然被朝野所重视。万里长城是砖头做的，是建造于山顶上的，而当时华北的新闻界和学术界站在那里，是精神的万里长城，这个情况国民政府当然重视，一般国民当然重视。这就是《大公报》当年所处的形势，而张季鸾先生正站在形势的尖端。再说一遍，他对于高阶层的政情通达，对于北方学术界的情形他也通达，他和《大公报》站在两方面的中间，尽力联系，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为什么当时北方别的报纸不如《大公报》的地方。例如《益世报》，它也有学术界的副刊，但《益世报》没有一个代表者能在这之间奔走，而且像张季鸾那样的风格，那是鲁仲连式的风格，他有不党、不卖等“四不”的主张，换句话说，他没有企图，他没有权位的企图，而有一种洒脱的气度，他是一个热心爱国而且自重的人。这是当时北方的情形，这是为什么《大公报》起来而不是别的报，是张季鸾先生起来而不是别的人的原因。

以胡适为灵魂人物的《独立评论》群体和以张季鸾为领袖的《大公报》报人群体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通过《大公报》“星期论文”这个合作平台，双方都对对方有所倚重与期许，并且非常主动地拓展合作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历史脉络里，北平的偏政治性知识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增强了，同时也借助《大公报》这一主流媒体向全国民众及政府辐射其影响力，进而形成了学院与政治权力沟通的渠道。事实上，《独立评论》社的社员蒋廷黻等学者正是因为在《大公报》上的言论充分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从而为《独立评论》的一些核心成员从政铺平了“仕途”。

2.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文学公共领域

对于1930年代的北平来说，除了上述的政治公共领域之外，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个类似哈贝马斯分析启蒙时代欧洲社会时归纳出的文学公共领域。与欧洲历史相似的是，这个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依赖“虚构性”的文学得以建立。围绕着《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等报纸杂志，一个以北平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空间逐渐产生，并形成了一群社会来源广泛的“阅读公众”。自然，这个公共空间的形式是多元化的，既涵括实体意义上的物质性空间，例如前文已经讨论过的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周作人的“苦雨斋”之类的有形空间，也包含了像《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印刷品建构的想象性的精神空间。这两个空间并非相互绝缘，而是密切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和互动，例如通过沈从文代表《大公报》约请作者聚餐等形式，让我们看到启蒙的另一面相，它不是凌空蹈虚的空中楼阁，而是必须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周期性仪式”来形成一个启蒙的整体，开辟启蒙的话语空间，在这样一个历时性的人际传播过程中，同时发生着知识群体空间性的聚散离合。因此，要考察这个时期的知识群体的社会学来源、精神特性，就必须对这个“拟似”的文学公共领域的主体、空间、媒介与阅读公众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哈贝马斯这样阐述文学公共领域的启蒙意义：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第54—55页。

公共领域在比较广泛的市民阶层中最初出现时是对家庭私人领域的扩展和补充。卧室和沙龙同在一个屋檐底下；如果说，一边的私人性与另一边的公共性相互依赖，私人个体的主体性和公共性一开始就密切相关，那么同样，它们在“虚构”文学中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满腔热情的读者重温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私人关系；他们根据实际经验来充实虚构的私人空间，并且用虚构的私人空间来检验实际经验。另一方面，最初靠文学传达的私人空间，亦即具有文学表现能力的主体性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拥有广泛读者的文学；同时，组成公众的私人就所读内容一同展开讨论，把它带进共同推动向前的启蒙过程当中。……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纸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

就1930年代的北平而言，文学公共领域的空间形式主要体现为下述几种：其一，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朱光潜的“读诗会”等私人空间扩展成的公共空间；其二，以“来今雨轩”等公共场所为聚会地点的公共空间，主要通过沈从文、萧乾等代表《大公报·文艺副刊》举行的招宴会、茶会等形式；其三，通过《文学杂志》《水星》等文学性期刊凝聚起来的象征性公共空间。这三个公共空间的主体则是在人员构成上有相当重合的京派文人，这是一个与胡适等直接关注政治社会问题不同的文人群体，他们聚集或分散在北平的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以院系、社团、机构为单位形成一个个亚群体，讨论文学，阅读诗歌，主要的关怀旨趣在于中国的纯文学事业的建设，并进一步通过公共媒介、公共空间的纽带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作者群体、编辑群体与阅读群体的灵活互动。

朱光潜的“读诗会”是活跃在1930年代北平文艺界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1933年7月，朱光潜结束了八年的留学生活回国，经武昌高师同学徐中舒介绍，结识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在读过朱光潜的《诗论》初稿后，胡适决定聘请朱光潜担任北大西语系教授。同时，朱光潜还在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应朱自清的邀请）、北平大学（应沈尹默的邀请）、中央艺术学院（应徐悲鸿的邀请）等高校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当时，朱光潜居住在北平地安门里的慈慧殿三号。据其自述：

朱光潜：《朱光潜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慈慧殿并没有殿，它只是后门里一个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庙得名。庙中供的是什么菩萨，我在此住了三年，始终没有探头一看，虽然路过庙门时，心里总是要费一番揣测。慈慧殿三号和这座小庙隔着三四家居户，初次来访的朋友们都疑心它是庙，至少，它给他们的是一座古庙的印象，尤其在树没有叶的时候；在北平，只有夏天才真是春天，所以慈慧殿三号像古庙的时候是很长的。它像庙，一则是因为它荒凉，二则是因为它冷清，但是最大的类似点恐怕在它的建筑，它孤零零地兀立在破墙荒园之中。

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1—92页。

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的四年间，朱光潜一直住在这里，并与同住的梁宗岱共同主持“读诗会”。朱光潜才华横溢，为人随和热情，课堂上对爱好文艺的学生非常有吸引力，又在北平好几所高校上课，社会关系网络异常

广泛，同时又是归国留学生，同学故友遍北平。自从他入住这里以后，来访的同学、同事和学生络绎不绝，造成作为一个私人生活场所的“慈慧殿三号”门庭若市，为创造出一个文学公共空间准备了主客观条件。朱光潜在谈到组织“读诗会”的动因时说：“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集，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注]

从“读诗会”的空间形式和社会起源来看，一方面，“读诗会”所在的“慈慧殿三号”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性格的空间，是一个中国式的庙堂旁边的荒凉建筑，冷清、古怪而离奇，是最容易让人产生艾略特式诗情和中国印象的空间形式，而且朱光潜首先是将其作为一个私人性的居住空间来体认的；另一方面，“读诗会”的灵感又是来自空间的主体——朱光潜在英国的留学体验和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仿制”了伦敦的公共空间的形式。因此，可以说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是中西会通的公共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活跃的知识群体大部分也具有和朱光潜一样的知识背景，即既有传统中学的早期熏陶，又有西学的学院训练，对中、西两种生活方式都有切身的体验。在这里同样可以看见，朱光潜的私人性生活与公共性活动如何在同一个空间里既分离又聚合。曾经参加过这个“读诗会”的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中回忆道：

沈从文：《谈朗诵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

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注]

参加这个读诗会的主体是北平各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是一些对诗歌有着共同爱好的文人组成的群体，是一个完全自发性的聚会。可见，对于1930年

代北平文学公共领域的构造来说，学院网络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来源，学院提供了参与者、知识资源和文化视野，学院内的公共讨论也是“读诗会”等公共空间讨论的前奏和准备，而这样的公共空间又在打破和拆解学院壁垒所形成的封闭性，使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学校、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文人仅仅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凝聚在一起，平等地讨论，批判性地思考，形成一个文学公共领域。1935年11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创刊，每月发行两次。《诗特刊》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朱光潜、废名、林徽因、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作者群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读诗会”的成员，学院网络与媒介网络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促进了学院的创作活力，同时也保证了媒介拥有一个高层次的作者群体。学院的知识权力网络与媒介的话语权力网络结合在一起，构造了1930年代北平文学公共领域的制度机制。

《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茶会、聚餐会”则是联络北平文艺界与大众传媒的制度化的公共空间。《大公报·文艺副刊》是1930年代的“文艺重镇”，以之为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作者和读者群体，这些“阅读公众”既是《文艺副刊》的积极投稿者，也是其最热心的读者；从出身来说，这些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主要聚集在北平的学院，包括学院里爱好新文学的教师和学生。《大公报·文艺副刊》提供了桥梁，既沟通了学院与社会，同时也融合了学院与学院之间的文人群体，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制造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想象空间”。在1933年6月之前，《大公报》存在一个由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主要是美国白壁德人文主义的中国传人的公共园地，为崇尚新文化的人所不喜。

萧乾：《致严家炎》，见《萧乾文集》（第10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5—406页。

萧乾晚年的一段回忆大体上反映了这个新旧之变以及与之相应的人事变化：“我始终认为1933年为京派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也即是巴金、郑振铎、靳以北来之前），京派是以周作人为盟主。那时，京派的特点是远离人生、远离社会、风花雪月，对国家社会不关痛痒。我最庆幸的是我开始进入文学界，恰好在京派这个转变期。我与周作人等几乎没有任何交往……1935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后，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李广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但不久他们二人赴沪

了……）。还有冯至，他应是京派的中坚。”[注]萧乾的回忆自然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例如对周作人的偏见），不过也基本上反映了以1933年为分水岭的“断裂”，一批老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从《大公报·文艺副刊》整体性地退出，而新知识分子包括留学归国的学者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这个副刊的核心作者。

许钦文：《来今雨轩》，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组：《新文学史料》（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来今雨轩”对于1930年代的北平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公共空间，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太太的客厅”“慈慧殿三号”之类的空间。许钦文在一篇追忆鲁迅的文章《来今雨轩》中粗略地描述过：“当时孙中山先生还在，中央公园未改名称。走进园门不久，我左转弯，先到长美轩一望，知道茶摊的藤椅上已经坐满了人，却见不到鲁迅先生。这公园地点适中，交通便利，园内古柏参天，无论游玩和约会亲友，都很适宜。”[注]相对于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文学公共空间来说，这是一个更加公共的也更加开放的空间，在这个小小的社会空间里，周期性地凝聚着北平的知识群体，也架构起北平与天津《大公报》的桥梁。

《大公报》编辑沈从文、杨振声、萧乾从1933年起大致每月一次地宴请北平的知识分子，请他们为编辑出谋划策，同时向他们约稿，开展文艺讨论和策划。无疑，沈从文是这个公共空间的灵魂，他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吸引着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当然《大公报》的号召力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沈从文一直与京派文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3年8月返回北平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更让他拥有了与京派文人直接接触的阵地，也让他有了贯彻自身文学理想的园地。他在《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文艺观点，也掀起京派、海派之争。简言之，他的观点就是主张文学应该远离政治、商业，而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与京派文人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这也是媒介与学院合作成功的关键原因。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见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86页。

作家王西彦在回忆沈的文章中细致地记述了这个空间的聚会场景：“除了去拜访他，当时还有另一种见面聚谈的方式，就是由从文先生发通知邀约我们一些年轻人到公园里喝茶。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即中央公

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所约的人也并无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归他付钱作东。大家先先后后地到了，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沈从文先生为中心的局面。可是，交谈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并不像是从文先生在主持什么会议，因而既没有一定的议题，谈话的内容虽大致以文学和写作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时局和人生问题，等等。时间也没有规定，每次总是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illegible]因此，“来今雨轩”等北平的公共场所在1930年代扮演了一个“公共空间”的角色，它是类似《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文学园地”的编辑、作者和读者沟通、交流的场所。根据上述引文可见，它具有相当的平等性，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在此活动的成员可以相当自由地表达观点，尽管讨论的重心是文艺作品，但这个空间集结的文人却超越了单一性，成为众多京派文人尤其是学生辈的文人建立社会网络的黄金通道。

1934年7月周作人与其妻子羽太信子往日本探亲到8月底，因此这两个月无参加聚会的记载，有关参加聚会的史料见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

《胡适日记全编》（6），第297页。

与来今雨轩等地的茶会形成对照的是几乎定期性举行的“招餐会”。这种聚会也是由沈从文代表《大公报·文艺副刊》出面，组织一些居住在北平的学人、文人定期聚餐，讨论文艺，议论人生。据周作人的年谱记载，出席这种招餐会的成员也是相当稳定的，人数也一般固定在二三十人左右，地点往往是在丰泽园等地的餐馆。笔者仔细搜索周作人的日记与年谱，不避累赘地列举其中记载较详细的数次聚会的人员名单，从中可以管窥当时活跃在北平文艺界的精英几乎都是《大公报·文艺副刊》聚餐会或茶话会的座上嘉宾。1933年9月10日，“应沈从文之约，赴《大公报》茶话会，谈《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事”；1934年1月21日，“往丰泽园参加《大公报·文艺副刊》之会，到者：胡适之、闻一多、梁思成、杨今甫（即杨振声——引者注）、俞平伯、朱自清、叶公超、余上沅、巴金等多人”；1934年3月17日，“往丰泽园，赴《大公报》之招宴，到者杨今甫、沈从文、巴金、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郑振铎等”；1934年4月29日，“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1934年5月27日，“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沈从文、杨今甫、李健吾、余上沅、朱自清等”；1934年6月24日，“午

至会贤堂，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共二席”；1934年9月22日，“午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杨今甫、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等”；1934年10月20日，“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沈从文、杨今甫、李健吾、余上沅、梁实秋、闻一多等”；1934年11月17日，“至玉华台赴《大公报·文艺副刊》，到者：沈从文、杨今甫、胡适、余上沅、郑振铎、朱自清、孙大雨、秦宜甫等”。[注]胡适的日记偶尔也有关于这种类型的聚会的记载，如1934年1月21日，“《文艺副刊》（《大公报》）邀午饭，有饶子离、巴金、闻一多、周岂明等。此《副刊》每星期三六出一次，替代了吴宓的《文学副刊》。《副刊》主编为杨今甫与沈从文。从文南归，故今天不在座”。[注]

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第161页。

另外，俞平伯的年谱中也时常提及这些聚会，如1933年10月22日，“午，与周作人同往北海漪澜堂，参加《大公报·文艺副刊》举办的午宴。杨振声、沈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光潜、郑振铎等出席”。[注]从这些引述的记载中可以看见，集会地点一般固定在丰泽园，时间一般是一月一次，参加的成员基本上是北平各大高校中文系、英文系等文科院系的教授，也有一些特别突出的文艺青年（也是在校学生）能够取得与会资格，如孙大雨等人；同时，经常会有一些临时访问居住在北平的文人被邀请参加这种招宴会，例如1930年代曾经在北平短时停留过的左翼作家巴金、靳以等人。但从大体而言，由《大公报·文艺副刊》出面组织的这种定期性聚会的成员基本上是自由知识分子占绝对优势，因此，表面上这是《大公报》组织的聚会，其实变成了北平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交流空间。自然，之所以这样，又与主持者沈从文本人是一个主张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有莫大关系，而他居住的北平在1930年代云集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地域文化、学院空间、传播媒介与知识群体形成的互动，这种互动既可以看成是《大公报》延揽优秀作者，也可以看成是北平学院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向媒介的扩张。事实上，只要我们去翻阅19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会发现，出现在这个报纸副刊上的作者主要就是上述参加聚餐会的人员，而出现的陌生面孔往往又都是通过上述文人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学生辈。

萧乾：《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载《随笔》1984年第5期。

萧乾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一名重要编辑，他1930年入读辅仁大学时认识了其时为该校讲授现代文学课的杨振声，在办《中国简报》时经过杨振声的介绍，去访问了沈从文、凌叔华等在北平的作家，也因此而结识了沈从文。据其在纪念杨振声的文章中的自述："1933年至1935年间，除了去西斜街看望他，我还常同他一道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文艺盛会、中山公园品茗或到朱光潜先生家去听诵诗。对于我那时的每篇习作，他都曾给过鼓励。……《大公报》毕竟是一份民间报纸，我这才经杨振声、沈从文两位先生介绍，进了报馆。"[注]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萧乾进入《大公报》后负责主编副刊《小公园》，刘淑玲在《大公报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指出："《小公园》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以市民阶层为主要的读者对象，以轻松、趣味和消闲为主要特征。萧乾到任后使它的面貌完全改观，成为一个纯文学副刊，作品的文学水准大幅度提高，不到两个月就变成了《文艺副刊》的一个分支。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表明改造《小公园》是沈从文的意图，但是萧乾对《小公园》的改造却是在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帮助下进行的，具体的实施是萧乾本人，实施过程却是京派作家的一次共同行动，改造后的《小公园》根本地改变了《大公报》副刊的文学景观，使《大公报》成为一个真正的京派文学阵地。通过《小公园》的改造可以看到京派作家如何运用媒体作为阵地培养青年作家，传播文学观念，扩大文学影响。"[注]正如前文所引述，萧乾进入《大公报》后，又进一步强化了京派作家与《大公报》的关系网络，《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北平高校文人学者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来自不同院系、地域与阶层的人因为共同的"空间"与"趣味"而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使得北平学院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建立了强大的"文化权力网络"。

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组：《新文学史料》（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930年代轰动一时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事件是京派文人文化权力的集中展示。1936年9月1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复刊《大公报》十周年的日子，亦即"新记"《大公报》诞生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大公报》馆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举办

“科学和文艺奖金”的评选。在这一天，《大公报》以报馆“特启”刊出评选启事——《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举办科学及文艺奖金启事》。据萧乾回忆：“‘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会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投票推荐’，到三七年公布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注]

王荣：《“大公报文艺奖金”及其他》，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在这个文艺奖金评审委员会的名单上，除了巴金、靳以、叶圣陶之外，其他的评审委员都是京派文人、学者群体的重要成员，朱光潜是“读诗会”的主持，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沈从文、杨振声是来今雨轩、丰泽园等公共空间的“灵魂”，李健吾是京派最重要的评论家，朱自清一度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凌叔华也与京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京派文人的很多作品发表在她主编的《武汉文艺》上。巴金等三位左翼作家在1930年代的前中期与京派文人也存在相当的共识，也有亲密的人事上的往来。因此可以说，《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权力基本上把持在京派文人手中，是京派文人的文学趣味的集中表达，也是其文化权力网络的展示。王荣在《“大公报文艺奖金”及其他》一文中持另一种观点：“‘大公报文艺奖金’设立及评选，无论就立意上还是就程序上说，都应属于一项民间性的并面向新文学全体的文化学术活动，既不受当时的政府当局或党派意识形态的左右，也未对评选作品的内容及形式、发表刊物等有任何具体的限定，而使其与当时某种文学流派有些许思想方面的实际关系。所以似乎不能简单地断言，当年大公报馆举办的这项评奖活动，或者说‘〈大公报〉文艺奖金’就等于或是所谓的‘京派文学奖’。”[注]事实上，无论从评委会成员的来源，还是最后的获奖者名单，以及《大公报》举办这个评选活动依托的资源来看，都可以发现《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1930年代京派文人的实力的展示，是他们的知识权力在印刷媒介上的延伸。

1937年5月1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本报文艺奖金发表》，这篇文章集中而鲜明地阐述了《大公报》的文艺观，这种文艺观正是其能够与京派文

人长期合作的观念基础。文章指出：

《大公报》，1937年5月15日。

一言以蔽之，在政治上殆有轻视个人自由忽略思想问题之趋向。此固环境使然，但并非健全之现象也。近年国家所期诸一般青年者，为努力科学与国防训练，此皆当然必然之需要，无可置论；然同时应勿忘！凡民族的斗士，必须为具有独立思想刚健人格之个人。此乃注入式的教育所不能得者，必有以丰其感情，濬其智慧，解其苦闷，增其勇敢，使之对自己能解决人生之归趋，对人类能发动济度之宏愿，然后中国得集中其全国青年之热血热泪，以上自救救人之途，是则文学的修养尚矣。夫回顾中国民族近代之苦痛的过程，当认识文学力量之伟大。

这种对“独立思想刚健人格”的强调与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所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质言之，是把文学艺术当作一种独立于政治、商业之外的载体，通过它可以培养个性健全、崇尚自由气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的个体，无论在京派文人还是《大公报》人看来，这种“新人”才是铸造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紧接着，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大公报》对文学艺术界重视的缘由：

社会既不尊重文士，即出版界之于文学，亦每以商品目之。加以政府国务多端，无暇留意及此，一般作家，在生活上及政治上，皆感受恐慌，则望其思想感情之不偏激也难矣。吾侪报人，不事文学，于新文艺尤为门外汉。然能认识文学与国民生活关系之重要，故以为有尊重奖励文学艺术之必需。本报过去，曾有文学副刊，对于广义文学有所贡献，近岁更特设文艺副刊，承各方作家之爱护，得发表不少杰作。去岁为表示服务社会之微忱计，创设文艺及科学两种奖金，区区金额，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社会公众之关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1936年，为了配合《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以及检阅《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作成绩，《大公报》约请林徽因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1936年8月13日起，《大公报》连续在该报为该书的出版做宣传广告，这则广告也在不经意间透露了《大公报》在扶持京派作家方面的功绩：

《大公报》1936年8月13日。

读者也许奇怪居然有那么些位南北文坛先辈看重这个日报刊物，连久不执笔的也在这里露了面；其实，这正是老实的收获。同时读者还会带着不少惊讶，发见若干位正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来他们初露锋芒是在这个刊物上，这也不希奇；一个老实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注]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第61页。

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载《大公报·文艺》1936年第102期星期特刊。

出现在这个选集上的作者名字大部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京派文人，如沈从文、杨振声、林徽因、李健吾、凌叔华、蹇先艾、萧乾等。刘淑玲在其博士论文《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指出，“这个选集是京派作家群在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它们也以大致相同的文化取向体现出京派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繁华在都会，而人性在乡村；物质在城市，而精神在乡村。他们塑造了‘交织着原始的野性强力和人情味’，堪称远离现代社会的理想国的乡土世界，因而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在他们的笔下构筑出了说不尽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注]而对于这些小说的技巧，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无疑的，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地运用。生涩幼稚和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地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通篇的连贯，文字的经济，着重点的安排，颜色图画的鲜明，已成为极寻常的标准。”[注]因此，林徽因对于京派小说的认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赋予她所涉身其中的京派文人以一种“文学史”地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京派、媒介与学院三者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复杂的人事网络得以建构和分层，而建构和分层的原则既与文化价值与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文化权力与媒介资源的密切配合。所以，《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与《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充分彰显了当时京派文人的文化权力。

关于游侠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分析，请参考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

详见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对于科举制度停废和专制政体崩溃后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角色暧昧的社会力量，从与普遍王权紧密结合的政治角度而言，知识分子与政治建制确实在日益疏离，武人取代文人成为左右政权的决定性力量。在春秋时代，代表社会中坚力量的君子是文武兼备的；到了战国以后，开始出现游侠之士（流于粗暴无状）和游说之士（流于文弱无耻）的分化；[注]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人式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性力量。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在传统社会一直遭到压抑的“游侠”习性和力量得以重新展现，并构成对文人集团的弹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能说游说之士边缘化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见，在1895年到1925年这个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一种以学校、社团、媒介等传统中国所无的以社会空间为标志的新力量在崛起，它们为从庙堂分散到江湖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凝聚了这个文人式知识分子群体的能量。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一次光辉璀璨的爆发，但如果从知识分子重建社会重心，[注]积聚学术力量，构造相对自由独立的政论力量，与媒介、大学形成制度性的紧密关联这个角度来观察，193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北平时期无疑是一个比五四更加典型的时间和空间阶段，它以近代知识分子的方式展现了类似于传统士大夫的面相，并逐渐形成可能对政治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的学统力量。相对于同时期上海知识界的山头林立和党派化论争，我们从上述胡适派学人、周作人文人群体、林徽因与朱光潜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性、关怀、交往与努力中尤其可以窥察到：一种弥漫于北平知识分子中间的浩然之气在缓慢然而有力地生长着，无论是学院文人，还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学者，都充分地展现了其作为近代知识分子优雅、率真、忧患、深刻或才华横溢等多种面相，甚至可以说是1905年科举制度崩溃后最兼具现代意识和传统情怀的知识分子，假以时日，不可谓其不能成为引导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趋向民主、法治、自由的核心力量。然而造化弄人，天命难测，历史终究是“万山不许一溪奔”，栖居在摇摇欲坠的十字街头的象牙塔里的精英，终究要面对内忧外患的沉痛现实，而“七七”事变的烽火狼烟更是滚滚而至，最终这个近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几乎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了，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知识群体成了这个群星闪耀的群体在现代中国最后的绝唱。这个时期的北平知识分子能够在国内政治分裂的缝隙中苦心经营故都里的“世外桃源”，却未能逃脱外来的侵略力量的侵蚀，大部分知识分子终究只能仓皇出逃，疲于奔命，精致而优雅的象牙塔终究功亏一篑，瓦解于日寇铁蹄之前。

唐小兵

第七章

地缘、学缘与惯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共同体

1937年的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挑起了战端，把战火烧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这中心的中心——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面临着战火的洗礼。对于肩负中国文化使命的这些学人来说，是去是留成了他们讨论最多的问题。去意味着离开美丽的校园、熟悉的环境、安逸的生活和妻儿亲人；而留呢，可能会成为日本奴役中国的工具。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一条南迁的道路。

清华大学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做了一些战争准备，他们把一些图书、设备、资金等物资相继运送到湖南长沙，以备不时之需。抗战全面爆发后，教育部决定把清华、北大、南开合并，先是暂驻长沙，随即西迁昆明，这所在战火中诞生的大学最终在这中国的西南边陲落脚，这所大学就是历史上最神秘而且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西南联合大学。

［美］费正清：《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之行五十年回忆录》（第4部分），赵复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78页。

联大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全面抗战初期，由于需要全国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但他们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对此抱以极大的宽容。尽管自由、民主、公正仍是联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但对于此时担负着救国使命的国民政府，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1943年这个看似非常普通的年份，对联大以及整个知识界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上，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点。是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了由陶希圣捉刀的国策性著作《中国之命运》，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攻击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主张以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重建道德基础。《中国之命运》公开对五四进行挑战，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开始左转。正如其时在中国的费正清教授所敏锐观察到的："到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象征，已失去中国知识界对他的信任和忠诚。"[注]

联大所在的昆明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城市，她处于全面抗战的大后方，可以保证学生有一个稳定、安全的读书环境，并且有通往国外的滇越、滇缅公路，方便从国外进口图书和仪器设备，也便于了解国际学术和科研发展的动态；同时，她又是龙云的统治地界。龙云虽服从蒋介石政府，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使得昆明不是重庆，也不是延安，它远离意识

形态中心，任何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都难以渗透、侵入并控制人的灵魂。龙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既协调又对抗的关系，其间所形成的张力，使这里相对于其他国统区来说，政治氛围要宽松得多，这就为联大师生自由的精神活动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保障。龙云地方政府还给予联大极大的支持，也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联大吸引了上百名不同倾向、不同趣味的知名知识分子和当时最优秀的学生聚集于此，这里成为知识分子交往、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他们通过结社、办报、演讲、集会等形式对时局和国民党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8—100页。

大批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到来改变了昆明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风貌。联大教师和学生不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言论，还创办了一些综合性、文艺性、政论性的刊物，给高原带来清新的气息。在他们的影响下，昆明人的命运不仅与当地市场的米价相连，也与整个国际事态息息相关。如法政学院教授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后改为《当代评论》），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和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主编的《战国策》以及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出版的《民主周刊》《自由论坛》《大路周刊》《时代评论》等刊物对当时政治、经济、国际国内形势发表的看法和对文学、艺术的评论在昆明产生了一定影响。[注]一时间，在偏僻的云南昆明，人们可以通过报摊上买来的报纸杂志来了解外面广阔的世界。同时，联大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不仅丰富了同学的课外生活，也丰富了昆明人的日常生活。联大学生成立了各种社团，他们不仅在学校里张贴壁报、开展活动，还走上街头，走向农村，通过表演戏剧、话剧向民众进行抗日和民主宣传。除此之外，联大同学还创办了夜校和职业教育所，利用课余时间义务为当地民众上课。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昆明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对他们的思想启蒙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联大同学通过与民众的接触，走出了象牙塔，加深了对下层人们生活的了解，这些不仅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也更加坚定了自由民主的信念。随着这些文化人士的到来，也带来了西方的文明。特别是滇缅路打通以后，作为此路总站的昆明也跟着繁荣起来，她就像一个乡下姑娘，忽然插了满头珠翠。南屏街上的小商店陈列着耀眼的舶来品，电影院开始出现，建筑相当现代化，并上映了许多国外经典影片，市面上开始有外国著作出售。穿西装、着短裙、喝咖啡、看电影、跳舞、打桥牌等西方的生活方式也进入了昆明人的生活。

正是因为联大的特殊性，使联大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状态下，不同倾向、不同趣味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交往的？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他们怎样建构起自己的共同体？他们又是如何通过介入某个共同体来实现对自身多重身份的认同的？这些问题正是本章所要研究的。

一、

联大的公共空间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知识分子进入都市这个陌生人的世界以后，在现代社会的空间网络里进行公共交往，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建构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开创性地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是在此方面的尝试。科塞认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知识分子需要听众，需要有一批人听他们宣讲自己的思想，并对他们表示认可。……第二，知识分子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同行接触，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交流，他们才能建立起有关方法和优劣的共同标准，以及指导他们行为的共同规范。"[注]他考察了知识分子活动的八个制度化环境，并根据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类型化分析，从而来反思当代美国知识分子。他认为要使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必须经常与自己的听众进行交流，和自己的同行维持交往，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具体的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在这一章里，笔者将着重讨论联大知识分子生存、活动的七个空间：社团、同人报刊、民主广场、茶馆、文林堂、树勋巷五号和金鸡巷沙龙。通过对这七个空间的分析，可以看出联大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公共空间里和同行发生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的。

1．社团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从联大建立到复员，联大社团活动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全面抗战开始到皖南事变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联大社团活动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成立的社团见表7-1。[注]

表7-1 第一个时期的联大社团

社团名称	下属部门	创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所出壁报（主要活动）	导　师
南湖诗社（蒙自），后改为高原社（昆明）		1938年	刘兆吉、向长清、查良铮、赵瑞蕻、周定一、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陈三苏		朱自清、闻一多
群　社		1938年秋	邢福津、袁永熙、刘忠渊、古锡麟、马杏垣、董葆先、李悦、任以沛	《热风》《腊月》	曾昭抡、余冠英、吴晓玲
	学术股			学术讲座	
	时事股			时事座谈会	
	康乐组			球赛、郊游、月光会、夏令营	
	文艺股			讨论文学理论，与学术股举办文艺专题讲座（冬青文艺社）	
	壁报股			《群声》（林元、陈潜）（综合性）、《大家看》（街头壁报）	

▼（续表）

社团名称	下属部门	创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所出壁报（主要活动）	导　师
	服务股			成立伙食委员会及社会服务	
西南联大话剧团（联大剧团）		1938年12月		《祖国》《夜光杯》《原野》《黑子二十八》《雷雨》《傀儡家庭》	闻一多、孙毓堂
明　社		1938年年底		《青年》《明报》	陈雷屏
学生自治会	总务、文书、事务、课外作业、康乐等股	1939年春	裴笑衡、王旸当、郝诒纯	1939年5月4日的提灯会、“七七”纪念大会、画展、夏令营等	
青年话剧社		1940年	汪雨	《前夜》	
戏剧研究社		1940年		《阿Q正传》	
学生消费服务社		1940年			
群声歌咏队		1939年年底	徐树仁		
联大歌咏团		1940年春		《五月的鲜花》《中国不会亡》《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	曾昭抡
冬青文艺社		1940年初—1946年	林元、杜运燮、汪曾祺、刘北汜、施载宣（萧荻）、马健武、张定华	《冬青》《冬青文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冬青诗抄》《街头诗页》；在昆明的《中南三日刊》、贵阳的《贵阳日报》办过冬青副刊，部分成员办过《文聚》杂志	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
		1939年	林元、方龄贵、吴宏聪、何燕晖	《边风》	
引擎社		1938年秋		《引擎》	
工学院		1938年秋		《熔炉》	

▼（续表）

社团名称	下属部门	创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所出壁报（主要活动）	导　师
工学院			钟泉周、何东昌	《火炬》	
铁马体育会		1940年4月			
				《大学论坛》	
南针社				《南针》	
				《微言》	
		1940年		《学研》	
		1940年		《照明弹》	

这一时期，是联大生活最为多姿多彩、最为浪漫的时期。他们在校园里作诗、畅谈文学和学术、唱歌、唱戏、组织踏青、讨论时事、展望民主。群社是这一时期联大校园里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社团，它深入到了联大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联大轻松、浪漫、自由的校园生活只维持了两年多。1941年春，蒋介石在皖南茂林地区发动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来到昆明大肆搜捕所谓的“异端分子”，联大校园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影。校园里一些活跃分子相继离开学校，疏散下乡，校园失去了往日活泼民主的氛围，政治空气异常沉闷，同学之间形同陌路，甚至出现同居一室而互不相识的情形；泡茶馆的多了，打桥牌的多了，而民主墙的壁报少了，演讲会、讨论会不见了，联大的校园活动处于一时的消沉之中。群社基本上停止了活动，《群声》壁报也于1941年2月刊出了“终刊号”。群社消沉后，校园里那种轻松、活跃的氛围不复存在；联大其他一些社团有的停止了，有的活动也渐继减少，或者不再有公开的活动，只有社团内部成员偶尔进行小范围内的聚会和讨论。联大的社团活动进入它的第二时期。在此之后，直到1944年的5月4日，联大校园里一直充斥着“党”“团”之争，政治色彩很是浓厚。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虽然群社销声匿迹了，但联大里还是有一些社团在活动，主要如表7-2所示。

表7-2 联大的其他社团

社团名称	创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所出壁报（主要活动）	导　师
西南联大话剧团（联大剧团）	1938年12月		《傀儡家庭》《雾重庆》《妙峰山》	闻一多、孙毓堂
青年话剧社	1940年		《海妲传》	
国民剧社（由青年剧社分出）			《野玫瑰》	
	1941年（仅三期）	熊德基、鞠孝铭	《春秋》	
十一社（青年教师）		王佐良、丁则良、王瑶、何炳棣、吴征镒、季镇淮、翁同文、王乃樑		潘光旦、吴宓、曾昭抡、吴晗
冬青文艺社	1940年初—1946年	林元、施载宣	贵阳的《贵阳日报》办过冬青副刊，部分成员办过《文聚》杂志	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
铁马体育会	1940年4月			
神曲社	1942年秋	孙柏昌、徐芝应	《神曲》	
怒潮剧社	1942年	孙观华、许令德	《秋收》《家》	
耕耘社	1943年秋	邹承鲁、袁可嘉	《耕耘》（纯文艺）	
	1943年10月	程法伋、张源潜	《文艺》（纯文艺）	
外文系二年级级会		李明	《生活》（综合）	吴宓
社会系系会			《法学》《社会》	

联大资料室编：《八年来的联大壁报》，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47页。

这个时期的文艺社团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活动，冬青社为了适应环境，也不再和公众见面，社友们只是沉静地共同研究和埋头于写作。除了系会、级会外，没有其他新的全校范围的社团成立。联大的民主墙也陷入一片孤单，墙上不再有百家争鸣，取而代之的是冷冷清清、无人过问，偶尔只有一个“补白”壁报，补一些与官

方不同的消息。[注]此时相对比较活跃的活动就是演戏。联大剧团为劝募公债，演出易卜生的《傀儡家庭》，青年剧社上演了由易卜生《海妲传》改编的《权与死》，从青年剧社里分出来的国民剧社出演陈铨的《野玫瑰》。虽然联大此时像一潭死水，但也会偶起微澜，一次是《春秋》壁报的贴出，一次是1942年1月6日的倒孔运动，还有一次就是十一学社的成立。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445页。

《春秋》是师院学生熊德基和他的同学鞠孝铭创办的，前后只出了两期。《春秋》主要是针对三青团提出的所谓青年问题进行讨论。三青团联大分团部主任陈雪屏发起“青年的志气和思想”讨论，组织教授在报刊上、电台上发表文章，谈对青年问题的看法。《春秋》针对他们的发言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还发表了一些针砭不良风气的诗词和讽刺文章。这份壁报吸引了许多同学，连校外也有人赶来观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结果是到第三期就被训导处勒令停刊。[注]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445页。关于“十一学会”还有一种说法是“与西南联大同仁组织了一个‘十一学会’。这个学会主要为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场合……最初参加者多为教授、副教授，如潘光旦、杨振声、雷海宗、朱自清、曾昭抡、闻家驷、吴晗、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沈从文、陈铨等。由于冯至的家敬节堂巷位置比较适中，聚会常在他家举行，每一二周一次。后来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翁同文、丁则良、王乃梁、王佐良、吴征镒、李埏等亦参加进来，个人主张不一，经常出现争论”（吴征镒：《西南联大侧忆》，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3—64页）。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5—666页。

1943年上半年，联大里一些本校毕业留任助教的青年教师组织起一个演讲会，约两周集会一次，报告读书和研究心得，并请教授参加指导。演讲会的内容兼容并包，不同的政治见解也在会上交流。潘光旦给这个社团取名为“十一社”，这取自于“士”字拆开，说明与会者都是知识分子；吴宓则因发起人为王佐良和丁则良，故称之为“二良学会”。[注]这是联大年轻知识分子议政的尝试。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联大毕竟是联大，自由的传统激励着它打破寂静。1943年《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在联大惊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争自由民主、要求宪政的呼声又再次高涨。1944年，德国在对苏战争中失败，全世界民主浪潮汹涌。4月下旬，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虽然此时美国已经加入对日作战，但国民政府组织的战场依然没有摆脱溃败的局面。前线的消息时时牵动着联大师生的心，屡屡传来的噩耗让他们心急如焚，他们不再沉寂，他们走出封闭的世界，再次拿起战斗的武器，发出民主的呼声。这一年是联大社团活动转变具有标志性的一年，首先是五四晚会的举行，其次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访联大，再次是学生们发表了《国是宣言》。至此，联大开始恢复它的生机和活力。这个时期联大首先活跃起来的是壁报，《冬青》《耕耘》《文艺》《生活》《现实》《学习》《潮汐》《湿风》《新生代》《文摘》《社会》《诗与画》（后分为《新诗》和《阳光》）等，十几个壁报在民主墙上大显身手。社团活动也开始复苏，还有一些新的社团在酝酿成立，见表7-3。[注]

表7-3 联大的新社团

社团名称	创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所出壁报（主要活动）	导　师
悠悠体育会	1944年			
新诗社	1944年4月	何达、沈叔平、萧荻、黄海	《新诗》（开始两期称《诗与画》）、《七月诗页》	闻一多
阳光美术社	1944年	赵宝熙、沈季平、陈月开	《阳光》（画刊）	闻一多
冬青社	1944年夏（重招）	何扬、袁成源（袁用之）	《冬青》复刊	
	1944年5月	王汉斌、谭正儒	《现实》	
报　协	1944年5月		《文艺》《生活》《耕耘》	
报　联	1944年秋		《联大半月刊》《联大通讯》	
剧艺社	1945年春	程法伋、闻功	《剧艺》	
高声唱歌咏队	1945年3月	黎章民、严宝瑜		
文艺社	1945年3月	程法伋、张源潜	《文艺》《文艺新报》	李广田
布谷社（叙永）			《布谷》	
			《流火》	
			《辨奸》	
			《生活》	
			《耕耘》	
			《青年》	
			《诛伐》	
			《野火》	
			《前进》	
			《民主》	
			《人群》	
			《森森》	
			《论坛》	
			《论衡》	
			《新阵地》	
民　青			《学习》	
历史学会			《潮汐》	
	1945年春	李忠、李倬、孙树梓、陈冠商	《春雷》（有评论、杂文、诗歌、散文、漫画）	李广田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454页。

这一时期，社团和壁报活动又重新兴盛起来，又恢复到敢说敢骂的状态，大家由小圈子里走了出来，民主墙上的壁报尤其活跃。1944年5月中旬，联大壁报负责人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立西南联大壁报协会（简称“报协”），推举《文艺》《生活》《耕耘》三家壁报为常委。[注]联大壁报协会成立时，联大壁报几乎全体加入（包括师院和工院的壁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壁报也派代表参加，可以说此时的“报协”囊括了联大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风格的壁报。壁报在联大这一时期的学生民主活动中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

2．同人报刊

随着近代传媒业的发展，知识分子与这一行业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报纸杂志成为知识分子相互交流、发表言论的场所，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之一。西南联大是当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报刊自然是他们交往必不可少的方式。联大师生发表诗作最多的园地是香港、桂林、重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后来是天津《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林元主编的《文聚》杂志、《独立周报》副刊，穆旦主编的《标准》季刊等。从表面上看，联大的一些学者文人不仅对国民党政府持疏离态度，而且和所有政治团体保持远距离；但他们并非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相反，他们在私底下，用各种方式议论着国事。其中，办报就是最常见的一种。联大教师自己创办的同人报刊有一些，更多的是主办或主编一些报刊的副刊或专栏。总的来说，他们发表自己言论和主张所借助的刊物可分为三类：

参见：《许纪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许纪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一类是学术文艺性报刊，这种报刊大多是同人报刊或者某报的文学副刊，像国文组的《国文月刊》，林元主编的《文聚》杂志、《独立周报》副刊，穆旦主编的《标准》季刊等。在这类报刊的周围聚集着那些爱好文艺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致力于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不问世事。他们看似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但是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而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自己的创作研究中。当然他们并不是借学术来抒发对政治的不满，而是内心深处对政治存在一种戒备心理。联大作为一个大学，是一个学院化的机构，学术研究是联大教授学者最为关注的事情。联大的教授学者大多出生于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注]他们经历了五四的洗礼，又受过欧美留学的专业训练，并且拥有相当明确的专业分工和知识关怀，“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下，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注]这也是联大

时期取得众多学术成就的原因。这些知识分子在这个象牙塔中专心做自己的学问，他们可能会大声呼喊，也会偶尔私下里发发牢骚，发泄自己心中对政治的不满。

第二类是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报刊，除了钱端升的《今日评论》和林同济、雷海宗等人的《战国策》之外，联大师生经常发表文章的刊物大多如此，如费孝通任编辑的《生活导报》《独立周报》《自由论坛》《星期论坛》等。在这类报刊的周围聚集的是另外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性，肩负着社会道德、良心和正义，在社会中扮演公共角色。这种类型共同体内的知识分子更接近于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关心政治，但又不舍弃自己的专业，通常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大学讲坛、社团和公共传媒等公共空间发表自己对社会公众事务的看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们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要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式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联大诞生于战火之中，全面抗战让整个中华民族暂时地凝聚在国民党统治的旗帜之下，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持有极大的宽容，国民政府的统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然而，战事的不利，战场上的溃败，与之而来的物价的上涨，再加上国民党官员的腐败，这些使国民政府因民族危机而增强的合法性资源越来越受到知识分子的质疑。他们针对抗日形势、战争政策、民主法制和经济形势等一系列公共问题展开讨论，并在相关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意图通过公共舆论来影响国民政府。

第三类报刊就是政党的喉舌，国民党有《中央周刊》，共产党有《新华日报》，而在昆明，联大师生参与、撰写文章最多的则是民盟的《民主周刊》。这类报刊聚集的是那些热衷于政治，积极参政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专业之外对参政怀有极大的兴趣，有着强烈的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践的愿望，他们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或者采取组织反对党的形式参政。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通常是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公共议政型的知识分子那样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是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的。抗战的爆发为民主的兴起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广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要求一致抗日的同时，还呼吁国民政府开放政治，他们强烈反对国民政府的一党专制，主张实现民主政治，并希望能够加入政府参与决策，以巩固抗战基础。中国经过了1939年到1940年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后，许多民主党派纷纷建立，这也是知识分子参政的显著表现。在众多党派中，民盟是最大的一个。民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占据多数的民主党派，它于1943年5月在昆明正式建立支部后，一些联大教师如潘光旦、潘大逵、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人相继加入了民盟。他们创办了《民主周刊》作为民盟昆明支部的机关报，他们以此为论坛，参政议政，全然一副在野党的姿态。

3．民主广场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民主广场实际上是新校舍图书馆门前的一大块空地，之所以得名“民主广场”，则是因为联大后期许多著名的演讲、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这块空地的中间有一根旗杆，旗杆前有一座砖砌的两米见方、一米来高的讲坛，这便是升旗台。这块空地原本是联大召开国民月会的地方。一般每个月的月初，学校会邀请一些名人学者来校演讲，演讲人站在台上，学生站在台前，没有扩音设备，只能静静地听，茅以升、顾维钧、李约瑟、林语堂、陈诚、褚辅成等人都来这里做过演讲。1944年以后，联大校园里恢复了以往的生机，民主运动再次活跃起来，各种活动蓬勃发展，一些大型的活动便在这块空地上举行，民主广场的名字应运而生。在这里举行的相关活动如表7-4所示。[注]

表7-4 民主广场的活动

时　间	主题或主要活动	主　办　方
1944年5月8日	五四与新文艺运动	国文学会
1945年5月4日	联大师生大聚餐	联大学生自治会
1945年5月4日	营火会、火炬竞走	悠悠体育会
1945年5月5日	文艺晚会	联大国文学会、外文学会、冬青社、文艺社、云大文史学会、中法文史学会与昆明文协七个团体联合举办
1945年11月25日	反内战时事晚会	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
1945年12月2日	四烈士入殓仪式	联大校方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451—452页。

在民主广场上举办的活动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是1944年5月8日晚间召开的以“五四与新文艺运动”为主题的文艺晚会。这次晚会本定在5月4日晚在南区十号教室举行，但由于到场同学太多无法进行下去，后改于8日进行。这次晚会由中文系学生齐亮任主席，罗常培和闻一多共同主持，参加者达到三千多人，盛况空前。在这次晚会上，闻一多、罗常培、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冯至、卞之

琳、孙毓堂和闻家驷都做了演讲。因为是纪念五四，这次晚会的内容是围绕着五四与新文艺展开的，演讲的题目与演讲者分别是："五四前后新旧文体的辩争"（罗常培），"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冯至），"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朱自清），"谈谈现代中国戏剧"（孙毓堂），"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社会的关系"（沈从文），"新文艺与西洋文学的关系"（卞之琳），"中国的新诗与法国文学"（闻家驷），"新文艺中杂文的收获"（李广田），"新文艺与文学遗产"（闻一多），"新文艺的前途"（杨振声）。[注]这次晚会是联大在这块空地上举行群众性晚会的开始，这次之后，许多大型的集会都在这里举行，特别是在"一二·一"运动期间，这里成为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重要集会场所。

还有一次是1945年11月25日的反内战时事晚会，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也是"一二·一"运动的前奏。虽然抗战胜利了，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内战危机一触即发。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在联大民主广场上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虽然云南当局百般阻挠，但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仍赶来参加，与会者六千余人。在这次晚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四教授演讲，分别是钱端升讲"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伍启元讲"财政经济与内战的关系"，费孝通讲"美国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潘大逵讲"如何制止内战"。这次晚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第二天《中央日报》竟刊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歪曲报道，制造谣言污蔑时事晚会，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怒，从而成为"一二·一"运动的导火索。

4．茶馆

大学生活似乎总离不开沙龙，世界上几乎每一所名牌大学都有那么几所名人沙龙，他们和名人的成长紧密相连。牛津、剑桥的沙龙在咖啡屋，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大学的沙龙在酒吧里，早稻田的沙龙在艺伎馆里。而世界上最独特的沙龙当属西南联大了，这里的学生沙龙没有咖啡，没有美酒，也没有漂亮能干的女主人，只有清茶一杯，和抽老草烟的昆明市民，他们的沙龙是在简陋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泡茶馆——昆明忆旧之一》，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90页。

"泡茶馆"是联大独创的词语，在物质条件极其困乏的年代，茶馆成了联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谓"泡"，便是长久沉浸其中的意思，它原是北京方言，被联大学生带到昆明，创造出"泡茶馆"一词，意为长久地待在茶馆里。[注]

在全面抗战的特殊背景下，有大师而无大楼的联大校园能够提供给学生读书学习的地方，除了图书馆而别无他所，而图书馆"人才济济"，去晚了便无立锥之地，宿舍拥挤不堪，教室经常不得空，茶馆成了唯一的选择。在茶馆里活动自由，舒畅随意，没有拘束，可读书学习，可写论文小说，可打桥牌扑克，可谈天说地，

可吃喝打工，亦可叙旧恋爱，还可作为他用，如作为讨论会场、舞厅等。要写西南联大，总少不了茶馆这一笔。

这里所指的盖碗是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三件组成的茶具，所以茶也有盖碗茶之称。

采访张源潜老师，2004年1月。

汪曾祺：《寻常茶话》，见《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

汪曾祺：《泡茶馆——昆明忆旧之一》，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90—297页。

昆明的茶馆有多少、有几种，现已不得而知，大致说来，有新式茶馆与旧式茶馆、大茶馆与小茶馆之分。新式茶馆，其布局有点像现代的棋牌室，只是没有那么嘈杂。这里的桌子是四方的，比旧式茶馆的八仙桌要小要矮，刚好坐四个人，其主要用途也是给打桥牌者提供便利，茶室里使用装茶水的器皿也不是传统的盖碗，[注]而是新式的玻璃杯，也有用细白瓷壶的，除了卖清茶，还卖坨茶、香片和龙井。这种茶馆是随着联大师生的到来而开设的，主要的顾客也是联大学生。在物资奇缺的全面抗战年月，看电影、读书都似乎成了最奢侈的享受，打桥牌自然便成为联大人最经常的课余消遣。其中有一家叫“中国茶室”的就是专为人们打桥牌而开设的。[注]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还提到了一家“摩登”茶馆，也是用玻璃杯卖茶，卖绿茶、红茶——滇绿、滇红。“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注]置于玻璃杯中甚是好看。还有的茶馆不仅卖茶，还卖咖啡和可可，文林街上挨着大西门城门口就有一家。这家茶馆的墙上挂着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有蓓蒂·黛维丝、奥丽薇·德·哈弗兰、克拉克·盖博、泰伦·宝华。这家茶馆进进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皮夹克的比较有钱的男同学外，还有烫着卷发的女同学。有时星期六会在茶馆里开舞会，留声机里传来《蓝色的多瑙河》和《风流寡妇》的舞曲，男女同学在里面“嘣嚓嚓”。但这样的茶馆一般茶资较高，在全面抗战初期，联大学生尚可出入，到了后期，随着物价的飞涨，这些茶馆都相继关门了。旧式茶馆的一切都沿用中国传统，八仙桌、古色古香的茶碗，还有笑脸可鞠、提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法为客人续水的茶博士，有的还备有烟筒，可以租用。大茶馆多开在热闹地区，正义路上就有一家，楼上楼下，几十张桌子，漆得鲜亮的荸荠色桌椅。这样的茶馆坐客常满，有看相的术士，也有唱围鼓的演员或票友，还有贴在柱子上的“莫谈国事”的字条。[注]这些大茶馆不知什么原因也都陆续关门了，而独独那些小茶馆生意兴隆。这些小茶馆多分布在联大西门口的凤翥街和文林街上，不下十几家，不仅规模小，装饰也简陋得多，有的就把沿街的那间屋作为茶室，有的就是直接在街边搭起的凉棚，只有三四张桌，十来条长凳，所用的茶具也是大小不等、形状不一、比较粗糙的盖碗，续水的用具也是一般的紫砂壶，甚至只是个热水瓶。这样的茶馆大多是家庭生意，不论是老板、小二还是跑堂的都是自家人。联大学生多去这样的茶

馆，这里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茶资又便宜，在全面抗战初期，一杯茶水只收一分钱，是那时的穷学生唯一能够经常光顾的地方。

中国人喝茶就像西方人喝咖啡，中国人开茶馆就像西方人开咖啡馆，都是有传统的。茶馆不仅昆明有，全国各处都有，茶馆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昆明的茶馆和别处的茶馆还是不一样的，更不同于老舍笔下的《茶馆》，昆明茶馆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联大学子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茶馆里点的是汽灯，光线充足，又有茶水、小吃和点心供应，成为读书学习的最好去处。联大学生去茶馆没有不带着书的，常常一个茶馆里四五十个人都是清一色的大学生，他们或看书，或整理笔记，或演算习题，听不到一点声音。除了是看书的场所外，茶馆还为联大学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往的空间。

王则柯：《感受普林斯顿》，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

杨振宁：《杨振宁谈西南联大》，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2期，2002年。

西方国家的大学生有吃“下午茶”的习惯，说是吃茶，实际上是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或师友的小聚会或者称为沙龙，不论是喝咖啡还是喝酒喝茶，谈天是第一要义。漫谈之间，自然会涉及相关的学问，吃“下午茶”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所以西方国家的大学对这一传统非常重视。王则柯在《感受普林斯顿》中回忆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有位著名的数学家对学生说，课可以不听，“惟一要求就是每天参加下午茶的聚会”。[注]由此可以得知这种聚会的重要性。联大学生虽然没有吃“下午茶”的传统，也不具备这样优越的条件，但昆明简陋的茶馆同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交往的空间。参加某个社团，进入一份同人报刊，都要靠人引见，或者至少要获得成员资格，但参与茶馆的社交则不需要这些。茶馆向所有人开放，不论你是联大学生，是群社的，还是三青团的；是达官贵人，还是贫苦大众，只要付上一杯茶钱，就可以随意参与讨论、争辩和社会交往，也可以倾听大家的谈话。“茶馆虽陋，有人则灵。”对于联大学生来说，茶馆就像国外大学“下午茶”的聚会或者沙龙，可以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通过谈天来获取许多学问。除了学习，联大学生在茶馆里最多的就是闲聊，用四川话说就是“摆龙门阵”，后来成为名作家的马识途就是摆龙门阵的高手。在茶馆里进行小规模的辩论是最经常的事情。杨振宁在联大就读期间，曾在联大附中兼职任教。每天晚饭后，常和黄昆、张守廉花一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讨论或争辩天下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有一次，他和几位同学在茶馆里谈到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到底这一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同学们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回到宿舍不睡觉，继续争论，一直争论到下半夜，有同学爬起来点火照明查书，才得到结论。他说，同学们在一起探讨的机会多，更容易求得学问。[注]

杨振宁：《杨振宁谈西南联大》，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2期。

也有在茶馆里组织读书会，举办讨论会、茶话会的。联大同学常会包下某个茶馆的一层，甚至是整个茶馆，在这里进行活动。新校舍民主墙上还时时可以看到某校友会、某同乡会、某系级迎新会、某社团讨论会，某日某时在某茶馆召开的海报。民主墙上的壁报、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也经常是在茶馆里抄写完成的。茶馆也是联大学生从象牙塔走向社会的一个窗口。在这个空间里，和马夫走贩厮混在一起，可以接触到校园里看不到的东西。杨振宁在回忆中提到，他在茶馆里曾多次目睹一队队士兵押着一些犯人走向昆明西北郊布满散乱野坟的小丘陵地带。每一个犯人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也有少数喊着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注]茶馆也是创作的源泉，抗战胜利后盛行一时的《茶馆小调》即起源于此。

联大学生与昆明的茶馆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许多同学大学四年的时间常有一半是在茶馆里度过。曾经有个姓陆的同学在一段时期内整天泡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里。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到了中午，起身去吃中饭。吃了饭，接着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再来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书回宿舍睡觉。汪曾祺总结了茶馆对联大学生的三个影响：

汪曾祺：《泡茶馆——昆明忆旧之一》，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97页。

第一，可以养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以对抗恶浊的穷困，并不丧气灰心，这和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只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是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注]

5．文林堂

吴晓铃：《忆刘叔雅先生数事》，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184页。

出了新校舍，在大西门里的文林街上有一个基督教堂——文林堂，它是基督教徒聚会的地方。每逢周末晚上，那里便用留声机播放西洋古典音乐唱片，吸引了不少联大师生来到这里。这里的牧师也十分豁达，他们常常邀请昆明各大学的教授去做学术报告，随便他们讲什么，哪怕是反对宗教迷信的东西。刘文典在这里讲过《庄子》，“他解释《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里‘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的‘天均’。他使用了一个西方哲学的用语，说：‘这就是Natural balance嘛！’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不能不使人钦服。现在回味起来，觉得其味无穷。Natural balance，岂不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上的‘生态平衡’么！”[隆]高声唱合唱团也常常聚在这里练习。联大群社的社会服务股在1939年扩大了师院同学开办的民众夜校，也就是借了“文林堂”作为教室。

6．树勋巷五号

从大西门外的联大临时校舍——昆华师范，走约十分钟的路程就可来到树勋巷五号，这是个两室一厅的住宅，其中一间住着两个历史系的学生：程应镠和李宗瀛。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四层的书架，最初这个书架上有《资治通鉴》《国语》《战国策》《宋人轶事汇编》《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两千年史》和《十八家诗抄》。经过两年时间的充实，书架全满了，除了历史方面的书，还增添了工具书和一些文学著作，包括英译本、中译本和古典文学著作，因此树勋巷五号便成为一个小型图书馆。这里的常客除了与程应镠、李宗瀛同住的刘成骏、胡正谒外，赵宗复、柯家龙、张韵斐曾在这里小住，徐高阮、玉永兴、丁则良、雷志贴是常客，王逊、钟开莱与程应镠、李宗瀛也相交甚密，其中，赵、徐、王都是“一二·九”时期的学生领袖。

树勋巷五号不仅是个小图书馆，也是联大学生论政论学的别馆，《大学论坛》这张壁报就在这个地方编辑抄写然后在学校里张贴出来。凤子主编昆明《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时，常到访于此。凤子到重庆后，《平明》由程应镠主编，树勋巷五号成为一些联大一、二年级同学聚会的场所，《平明》的作者如江薄、吴风到昆明也总会来这里探望。沈从文在北京时就为程应镠修改习作，到昆明后主编《今日评论》文艺版，也来树勋巷约稿。

程应镠：《树勋巷五号》，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树勋巷五号的主人有着广泛的爱好，特别在文学方面，兴趣甚浓，徐高阮、王逊、钟开莱等人都是文学爱好者。住在他们楼上的是陈兰滋、邵森棣两个联大女同

学，这群人曾组织了一个朗诵俱乐部，参加者轮流朗诵一些英文名篇。可惜只搞过几次后，就随着女同学搬回联大宿舍而终止。[注]

7．金鸡巷沙龙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199—200页。

金鸡巷位于文林街文林堂旁，金鸡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四个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小楼的当中有个小客厅，经常有些熟悉的同学和老师来这里喝茶聊天，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从文、巴金是这里的常客，金岳霖、老舍也都来过。金岳霖在这里谈“小说和哲学”，老舍谈“小说和戏剧”。“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过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时，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注]

社团、报刊、沙龙是联大知识分子在交往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同时又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文化空间，而茶馆、广场、教堂这些自然空间同样也是联大知识分子交往的重要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里，联大知识分子之间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展开了更加广泛的公共交往，从而确立自己所属的文化关系网络，建构起一个个的知识分子共同体。

二、

联大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与自我认同

近代都市里的知识分子凭借惯习来建构他们的文化关系网络，但血缘、地缘、学缘等传统联结仍然是他们建立私交的重要关系架构。知识分子在相互的交往过程中，私交使他们结成了一个个排他性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由于惯习的不同，这些知识分子共同体也不尽相同，根据这些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趣味、倾向和立场，笔者将联大知识分子建构的共同体大致划分为学术文艺型、公共议政型和党派参政型三种。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空间关系网络里与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共同体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无时无刻不发生互动关系，他们通过交往，寻找自己的归属感。

1．学术上的探究

1938年2月，日寇攻陷南京后，沿江西下，直指武汉，威逼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奉命迁往云南昆明。这次迁徙分两路入滇，一路由长沙搭乘火车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再搭火车沿广九铁路到九龙，前往香港乘轮船至安南海防（越南），再乘火车沿滇越铁路至昆明，这一路是女生和体检不合格或不愿步行的人走的；还有一路则是取内陆步行入滇，这就是名震中外的知识分子的长征——湘黔滇旅行团。在这个旅行团中有教师11位，分别为：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希渊、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钰生和吴征镒。学生有200多人，共分三个中队，若干分队，其中第一中队第一分队的人员有：陆地利（清华）、王德玮（北大）、张之毅（清华）、唐敖庆、栾汝书、邓俊昌、李珍焕、王联芳、向长清（北大）、胡崇尧、谭惠凡、蒋增海（清华）、刘兆吉、赵悦霖。

就是这样一个由200余人组成的旅行团，经过68个日日夜夜的共同生活，联大的很多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465页。

在徒步旅行中，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在闻一多的影响下，组成了一个采风小组，要在民间集采歌谣，其中刘兆吉是最为坚持的一位。他在闻一多的鼓励、指导和帮助下，采集了两千多首歌谣，并选出一部分成集——《西南采风录》。辛苦的采风途中，有一个青年诗人对刘兆吉鼎力协助，他就是和刘兆吉在同一个大队同一班的青年诗人向长清。68天的旅程，他们朝夕共处，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文学和诗歌，这个共同兴趣激起他们不辞辛劳进行采风的热情。“他在行路休息或晚上

入睡之前，经常拿着小本子写诗，有时还把得意的诗句读给我听，以后干脆把本子交给我，任我翻阅。我是学教育的，但自中学时代即喜欢文学，每天有记日记的习惯，也爱写不新、不旧、不古、不律的歪诗。由于我承担了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采集民间歌谣的任务，常常与向长清一起写，一起讨论作诗、评论古今诗人的诗。”[注]在旅途中，有一天，向长清找到刘兆吉，告诉他等到了昆明，他打算约一些爱写诗的同学组织一个诗社，出版诗刊，刘兆吉听后非常赞成，并商量着要找闻一多来做诗社的指导老师。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464—468页。

旅途在1938年4月28日以旅行团到达昆明宣告胜利结束。由于战乱，人们纷纷避难于西南地区，这里一下子成为战时各界人士的挪亚方舟，昆明人口迅速膨胀起来，联大一时间无法在昆明安顿下来。联大一部分学院借住在昆明本地一些学校的校舍，而文、法商学院只好暂在蒙自上课。蒙自县距昆明约三百公里，它在清光绪时期曾被设置为蒙自关，法国领事馆、银行、外国商行在这里都有设置。蒙自南郊有南湖，湖中有松岛，风景甚是优美，有世外桃源之美称。就是在这个梦一般的地方，一个梦一般的诗人社团诞生了，这就是南湖诗社。到了蒙自后，刘兆吉和向长清就开始商量如何实现旅途中提出的成立诗社的计划，他们又一起拜访了闻一多和朱自清，请他们来担任诗社的指导老师。同时，他们还分头邀请同学加入诗社。向长清找来了他在中文系的学长陈三苏和周定一，他们都是北大来的，外文系查良铮、赵瑞蕻、李敬亭、刘重德、林振述。诗社成员中除刘兆吉外，其他诗友都是中文系和外文系学生，是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那时候的外文系与现在的外文系大不相同，它继承了北大、清华的传统，学习的是文学，不像现在的外文系学习的只有语言。所以闻一多曾经有个建议，把外文系与中文系合并，分成两个专业：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南湖诗社以蒙自分校靠近南湖而得名，南湖诗社以研究新诗、写新诗为主要方向。南湖诗社是联大成立后第一个学生社团，随着蒙自分校迁回昆明，有些社员参加了校本部其他文艺社团，南湖诗社也解散了。[注]

邢方群：《回忆群社》，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311页。

残年：《联大的团体生活——群社》，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邢方群：《回忆群社》，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309—319页。

施载宣：《从群声歌咏队到联大歌咏团》，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331—336页。

在联大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有一个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社团——群社。群社是一个综合性的社团，它经常的工作是出壁报，开辩论会、讨论会、时事座谈

会，组织各种活动。壁报是社团与大众的交流载体，联大的壁报尤其活跃，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民主墙上贴满了各个社团、各个名称的壁报。群社有专门的壁报组负责壁报的编写与出版。群社的机关报是《群声》，它由林元、陈潜主编，其内容多样，有时事分析、文艺创作、新书评介、漫画等；[注]除了《群声》壁报外，群社的壁报股还在大西门的城门洞边出版对广大市民进行宣传的街头壁报《大家看》；群社还办了纯文艺的《腊月》和画刊《热风》。《热风》以漫画（尤其是连环漫画）为主，兼有些短小的杂文和木刻，马杏垣、陈潜是它的主要负责成员。除壁报股外，群社还有学术股、服务股、康乐股、文艺股、时事股五个股。群社有一个集体学习的制度，上某门课的同学聚集在一起，规定每人应该看多少书，看完之后，负责报告，就像我们现在的读书讨论班，这样他们省去了许多时间，还能学到很多东西。群社的学术股还成立了各种学习小组，组织演讲和报告。康乐组针对同学喜欢旅游的兴趣，举办过路南夏令营，还有去附近的名胜如桃园、阳宗海；除了旅游，他们还组织球类比赛等活动。服务股顾名思义是以服务为宗旨，主要就是以办好学生食堂为主要工作，也搞些社会服务。[注]群社在1940年初达到了鼎盛时期，其所属的各种小组开始独立成立社团。喜爱唱歌的同学成立了群声歌咏队，并发展为联大歌咏团。[注]群社里文艺小组的成员也在考虑是不是也要成立一个文学社团。

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323页。

公唐：《联大的团体生活——记冬青社》，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323—330页。

同年年初，这批爱好文艺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正在讨论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文艺社团，这时，他们看见窗外正有一排翠绿的冬青树，于是便把新成立的文艺社团起名为“冬青”，同时也为了“表达社员们决心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中，学习冬青斗霜傲雪、坚忍不拔的常青风格”。冬青社就这样诞生了。冬青社的骨干分子自然是原群社文艺股的成员，有林元、杜运燮、汪曾祺、刘北汜、施载宣（萧荻）、王凝（王铁臣，田堃）、马西林（马健武），刘博禹（刘恒五）、萧珊（陈蕴珍）、张定华、巫宁坤、穆旦（查良铮）、卢静、马尔俄（蔡汉荣）、鲁马等。[注]此外，冬青社还增加了一些有不同文艺倾向、不同写作风格的老师和同学，并聘请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为导师（后来又加上李广田）。冬青社是联大最活跃的团体之一，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文艺活动。除了张贴壁报《冬青杂文》《街头诗页》，还发行编辑手抄本的“杂志”——《冬青文抄》《冬青诗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1941—1942年一年中，冬青社通过社员刘北汜的联系，在《贵州日报》上出版了《冬青诗刊》，由刘北汜编辑，每月一期。冬青社是一个文艺社团，它多次组织诗歌朗诵会、宣讲会、座谈会、游园会、专题演讲等活动。他们还组织过多种语言的诗歌朗诵会，除了普通话之外，还有广东话（林元）、英语

（杜运燮）、法语（张世富）、俄语（王恩治）等，冯至、闻家驷、陈嘉等教授及诗人雷石榆也参加过他们的活动。巴金曾在1940年和1941年两次到昆明看望他的女朋友——冬青社社员萧珊，她是联大历史系学生，她那时和王育常（王树藏）、刘北汜、萧荻都住在钱局街金鸡巷四号，巴金到昆明时就在那里下榻。于是，冬青社便通过萧珊请巴金同大家开了一次座谈会。正是对艺术的追求，冬青造就了一批诗人、作家、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家，像九叶派诗人中的穆旦、杜运燮都是冬青社成员，还有萧珊、汪曾祺、刘北汜等。[注]

林元：《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记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出版物》，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469—478页。

林元：《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记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出版物》，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469—478页。

当皖南事变的消息进入联大后，联大曾一度陷入沉寂，群社刊登了停社启示，就连冬青也把活动转入小范围内私下进行。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小半年。1942年初，一份薄薄的16开的文学半月刊开始在联大校园里流传开来。这份刊物的创刊号以穆旦的新诗《赞美》为头题，带有鲜明的西方现代诗风特征，这便是《文聚》。《文聚》是一群爱好文学的青年创办的文学刊物，以联大师生为主。在这群青年中有一个人叫林元，他原名林抡元，广东信宜人。林元自幼爱好文学，并且很有编辑的天分。在进入联大前，他就在广东高州创办并主编《怒吼》杂志，同时又在广州《救亡日报》上发表文章。1938年林元考入联大中文系，他性格活泼开朗，积极地投入了联大生活当中。他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加入群社，并负责群社壁报股的活动，主编群社的机关报——《群声》。他还参加创办冬青社，是冬青社的负责人之一。1939年，林元和方龄贵、吴宏聪、何燕晖等人合办了一个文艺壁报《边风》，同时他作为群社和冬青社的主要成员，负责《群声》和《冬青小说抄》的编辑工作。林元写小说，也写散文，还具有很强的组织力，所以他是个很好的编辑。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入联大后，联大许多活跃分子都相继疏散下乡，林元也离开了校园。五个月后，林元返校归来，他和他的同乡马尔俄，还有冬青社的同人马蹄（马杏垣）等人商量办一本文学刊物，这个提议得到了原冬青社成员穆旦、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李典、罗寄一、马蹄、陈时等人的支持和响应，他们纷纷为之出主意和帮助组织稿件，这就形成了文聚社最初的规模。[注]《文聚》创刊时宣称是一本“纯文学”刊物，给《文聚》撰稿的联大教师有冯至、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罗常培、王了一、闻家驷、余冠英、吴晓玲、孙毓堂、王佐良、穆旦、杨周翰等；学生有林元、杜运燮、汪曾祺、刘北汜、马尔俄、罗寄一、陈时、流金（程应镠）、许若摩、黄丽生、赵全章、郑敏等。当然，《文聚》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联大，校外的何其芳、方敬、楚图南、魏荒弩、靳以、金克木、姚可

昆、袁水拍、江篱、祖文等人也常在该刊物发表作品，这些撰稿人有昆明的，也有其他国统区，甚至解放区的。然而，不论在发表文章的数量上，还是共同体的活动上，他们都无法和前面提到的成员相提并论，所以不能算作《文聚》这一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同人。据统计，由始至终的《文聚》，老师当中发表诗文最多的是冯至，学生当中发表最多的是穆旦。《文聚》以“西南联大文聚社”名义出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再改为不定期丛刊，又改为《独立周报》的副刊，一直出版到1946年。文聚社不仅办《文聚》杂志，还计划出版《文聚丛书》，并在1943年《文聚》第1卷五、六期合刊上登出广告，共有以下十种：小说类有沈从文的《长河》（长篇）、冯至的《楚国的亡臣》（中篇）、刘北汜的《阴湿》（短篇集）、林元的《大牛》（短篇集）、马尔俄的《飓风》（短篇集）；散文集包括李广田的《日边集》、赵萝蕤的《象牙的故事》、方敬的《记忆的弦》；诗集是穆旦的《探险队》，还有卞之琳的译诗集《〈亨利第三〉与〈旗手〉》。到抗战胜利，出版了其中的三种：《〈亨利第三〉与〈旗手〉》《探险队》和《长河》。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探险队》是穆旦的第一本诗集。抗战胜利后，《文聚丛书》和《文聚》杂志也随着作者、编者离开昆明而停止了出版。注

《文聚》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三种文体，是一份以联大师生为主的文学刊物，也是在联大流传最为广泛的刊物。但这份刊物绝非一般的校园文学作品，众多诗人的成熟作品也是首刊于《文聚》。

从上面列出《文聚丛书》的目录单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方敬的《记忆的弦》，其他皆是文聚社这一共同体成员的作品。先来看看文聚社的主要成员及其概况（表7-5、表7-6）。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异天、戈德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李盛平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

表7-5 《文聚》的学生作者 注

姓　名	出生年份	毕业中学	在校时间及系科	参加的社团	趣　味	党派倾向
林　元	1916	广东信宜中学	1938—1942中文系	群社、冬青社、戏剧研究社	文学写作，擅长编辑	中共
马尔俄（蔡汉荣）		广东信宜中学	经济系	群社、冬青社	中外文学、音乐	中共
陈　时（陈良时）				冬青社	文学	
罗寄一				冬青社	文学	
辛　代（方龄贵）			1938—1942	冬青社	文学	
田　堃				群社、冬青社	文学	
刘北汜	1917	吉林通县高中	1939—1943联大历史系	冬青社	文学	
汪曾祺	1920	江苏高邮县中学，南菁中学	1939—1942联大中文系	冬青社	文学、散文	
杜运燮	1918	福州某高中	1941—1945联大外文系	群社、冬青社	文学、诗歌	
马　蹄（马杏垣）			1938—1942地质地理气象系	群社、冬青社	文学、版画	
穆　旦	1918	天津南开中学	1935—1939入清华地学系，半年后改读外文	南湖诗社、冬青	文学、诗歌	
李　典（李流丹）	1920			戏剧研究社	文学、版画、戏剧	
王佐良	1916		1935—1939清华外文系	十一社	文学、诗歌	
流　金（程应镠）	1916	江西省立二中，私立心远中学	1935年入燕京大学，1938—1940联大历史系		文学	
郑　敏	1920	南京女子中学，重庆南渝中学	1939—1943联大哲学系	1942年开始诗歌创作，《九叶集》	文学、诗歌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异天、戈德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李盛平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表7-6 《文聚》的教师作者 注

姓　名	出生年份	籍贯	职　务	教育背景		专　业	参加社团	党派倾向
				国内	国外			
冯　至	1905	河北涿县	外文系教授	1927年北京大学毕业	1930年赴德专攻文学和哲学，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	德国文学	冬青社	
朱自清	1898	江苏扬州	中文系教授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32年赴欧洲游历	中国文学	南湖诗社、冬青社、新诗社、国文月刊	
沈从文	1902	湖南凤凰	师院国文学系副教授			中国文学	国文月刊	
李广田	1906	山东邹平	师院国文学系讲师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		外文	冬青社、文艺社	
卞之琳	1910	江苏海门	外文系教师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		外文	冬青社	
罗莘田（罗常培）	1899	北京	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又入哲学系学习		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	国文月刊	
王了一（王力）	1900	广西博白	中文系教授	1925年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1931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中国文学、语言学	国文月刊	
闻家驷	1905	湖北浠水	外文系教授	复旦大学	1928年赴法，入巴黎大学、格林诺布大学	法国文学	冬青社	

▼（续表）

姓　名	出生年份	籍贯	职　务	教育背景		专　业	参加社团	党派倾向
				国内	国外			
余冠英	1906	江苏扬州	师院国文学系副教授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中国文学	群社、国文月刊	
吴晓玲			中文系教师			中国文学	群社	
孙毓棠	1911	江苏无锡	师院史地系副教授	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历史	联大话剧团	
穆　旦	1918		联大外文系教师	1935—1939年入清华地学系，半年后改读外文，随校西迁		外文	南湖诗社、冬青社	
王佐良	1910		联大外文系教师	1935—1939年清华外文系，随校西迁		外文	十一社	
赵萝蕤	1912	江苏苏州	校外，陈梦家太太	1928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大二结束后转读英国文学，1932年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英国文学	冬青社	

*上表反映的是各人在1941—1943年的情况。

参见Bryna Goodman, “New Culture, Old Habits: Native-Place Organiz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Frederic Jr. Wakeman and Wen-hsin Yeh(eds.), Shang-hai Sojourn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84-89。也可以参考兰金（Mary Backus Rankin）关于职业性迁移滞后现象的评论：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 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6,

79。转引自［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林元：《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见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44—146页。

《亦师亦友传佳话——记朱自清同余冠英的师生情谊与影响》，转引自朱自清网，网址：http: //f.ttwang.net/RoomFile/FreedomShowPost.aspx?Roomld=2799&Postld=1489。

在这些人中，朱自清和余冠英是江苏扬州的同乡，在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中，地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系纽带。中国人的地缘意识极为浓厚，籍贯在知识分子交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乡会在联大校园里是个普遍存在的团体，凡有该省份来的同学几乎都会是该省同乡会成员，甚至某地区、某城、某县都有同乡会。“同乡会作为文化现象把地方意识视为身份的组成部分，视为与其他人的重要联结，视为个人意识的中枢和社会文化指向点”，这个组织在全国各市镇都发展了相当广阔的网络关系，它“对于处于在一离开本社群流落遥远的他乡后就等同于流放的社会里是十分重要的”。[注]他乡遇到旧知，亲切的乡音会立刻缩短相互之间的距离，同时作为同乡，更容易获得相互间的认同感。我们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林元在回忆陈序经的时候提到：陈先生是一个很重乡情的人。他生在广东海南岛文昌县。在联大，他似乎对海南岛的同学特别亲，其次是广东同学；还有南开、岭南的同学；在社会上则对整个联大同学都抱有一种特殊感情。[注]在公共空间的建构和知识分子的交往过程中，往往一个社团或者一个报刊同盟初建时，都是几个同乡商定的结果。最初《文聚》的创办，林元首先找到的就是他的广东同乡马尔俄。这里同乡关系在很大意义上可以促进相互距离的拉近，可见籍贯也是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形成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朱余二人除了是同乡，又是江苏第八中学的校友兼师生，余冠英考入清华后，朱自清亦是他在清华的老师。朱自清比余冠英年长八岁，其父朱鸿钧与余父原本是好朋友，余冠英岳父陈巽卿又是朱自清父亲的金兰兄弟，二人关系甚是密切。[注]

我们再看一下《文聚》成员的学术出身，《文聚》列入讨论的29人中，5人毕业于北京大学，6人出身清华，15人是毕业于联大或是联大在读学生，而联大又是北大、清华西迁后的结合体，其背后有着一种不言自明的传承关系。卞之琳和李广田是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并与何其芳三人合称为“汉园三诗人”，《文聚》能组到何其芳的稿件也是由他们介绍的。王佐良当时已是联大外文系的助教，他和穆旦都是以教师身份进入这个共同体的；王佐良和穆旦不仅是清华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又是联大毕业的学生，而且同年留在联大外文系任教。在学生辈中，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林元在群社里的导师是余冠英和吴晓玲，流金和刘北汜是历史系同学。这是从小范围看，从大范围看，不论是学生辈成员还是教师辈成员，都是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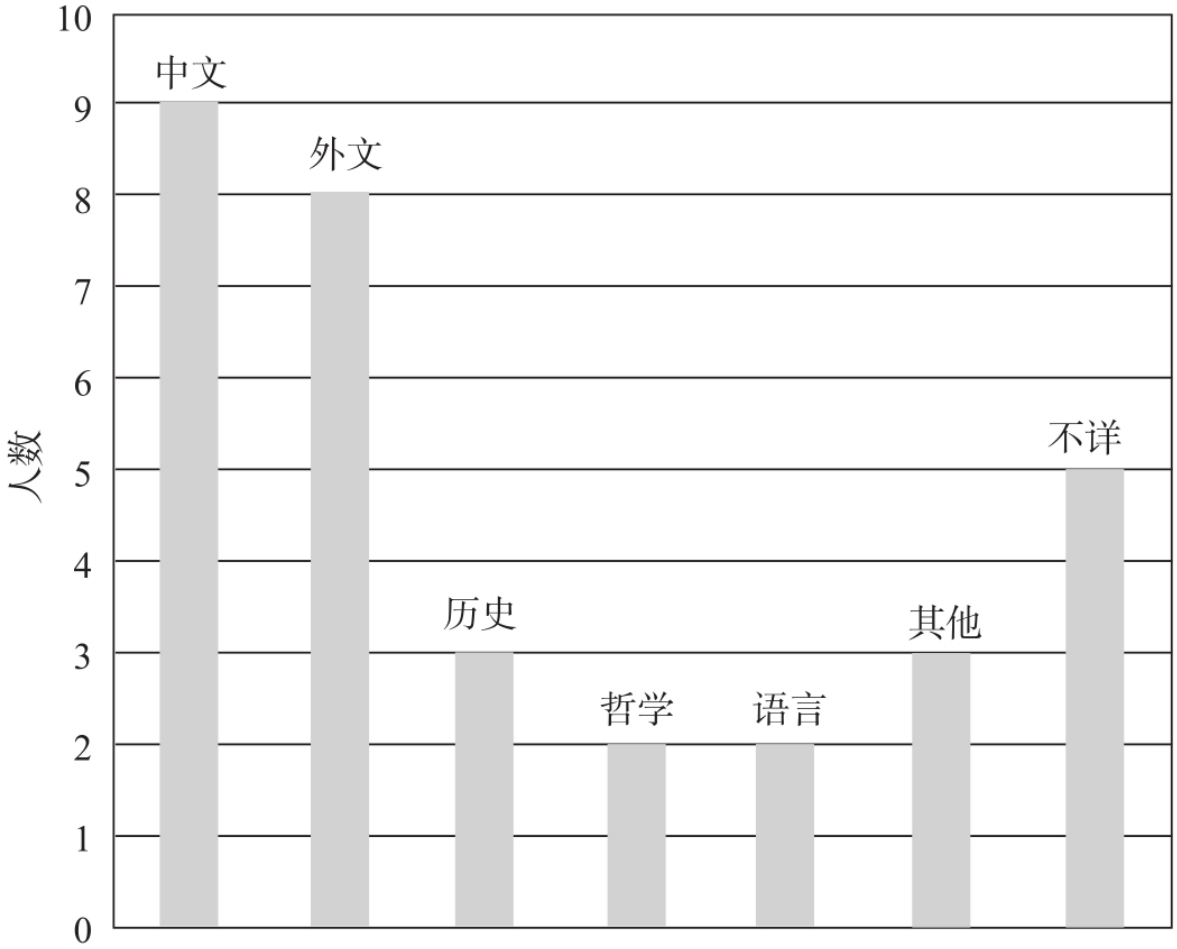
这一大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相互之间皆有亦师亦友的关系。可见，在《文聚》这一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建构中，同学关系与师生关系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种师友同学之间的学缘关系也是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建构、交往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关系，它包括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传统中国的学缘关系是由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近代以后，这种学缘就扩展到了新式的学堂、大学。在知识分子共同体组织过程中，特别是联大学生社团的建立，最初成员都是同学好友，因为老师的引见或同学的介绍而进入这个共同体的不在少数。同系、同校或同期都可称为“同学”。这种学缘关系在联大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资金缺乏，1938年联大做出《本校教职员不得夫妇同时在本校任职》的规定，内容如下：“第六十七次常委会议决：本校教职员不得夫妇同时在本校任职。其因特别情形，经本校特约义务帮忙者，致送车费，不支薪。现在情形与上项原则不符者，应于本年度终改正之。”见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0页。赵萝蕤是陈梦家的太太，而陈梦家受聘于联大中文系，所以赵萝蕤只得留在家里。然而，赵萝蕤依然没有放弃写作，并参与一些联大社团的活动，冬青社是其中之一。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401页。

从专业和趣味的角度来看，在这些人中（如图7-1），九人出身中文，八人的专业是外文；如果不计较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单以文学专业统论，共计十六人（赵萝蕤先入中文系学习，后转读英国文学），占了成员的59%。文学不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从他们参加的社团类型可以看出（如图7-2），有63%的成员是冬青社的，特别是《文聚》的最初成员，除李典外是清一色的冬青社成员，冬青是联大众多文艺社团中的一个，它是由群社的文艺股发展而来。李典虽然不是冬青成员，但他和林元却同是戏剧研究社的同人，而马尔俄、田堃、杜运燮、马蹄和林元又不仅是冬青社同人，也是群社成员，辛代和林元还是同一宿舍的室友。从文聚社最初成员的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出：文聚社和冬青社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不难想象冯至、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闻家驷这些教师辈成员的加入，冬青社的六个导师即闻一多、冯至、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闻家驷，除了闻一多外，其余的都是文聚社成员。虽然赵萝蕤并非联大师生，[注]但她同是冬青社成员。后来加入的王佐良、流金和郑敏等人和文聚社最初成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郑敏和穆旦、杜运燮、王佐良一直有往来，后来同为“九叶”派诗人。除了冬青社和群社两个社团外，《文聚》同人参加联大其他文艺社团的有5人，这些文艺社团包括诗歌（南湖诗社、新诗社）、文学（文艺社）、戏剧（戏剧研究社）、话剧（联大话剧团）。另外，《国文月刊》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术文艺团体。《国文月刊》是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教职员筹办的，它以中学国文教员为主要对象，兼顾高校中文系学生及自学青年，以“促进国文教学的改进以及补充青

年学生自修国文的材料”为宗旨，[注]其内容有通论、专著、诗文选读、写作谬误、学生习作佳卷、回答读者问题、发表书刊评介等。朱自清、罗莘田、王了一、余冠英、沈从文都是《国文月刊》这一学术文艺型共同体的成员。不论是冬青、《国文月刊》，还是其他文艺社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底线——文学，这一底线和《文聚》的倾向是一致的。



▲图7-1 《文聚》同人专业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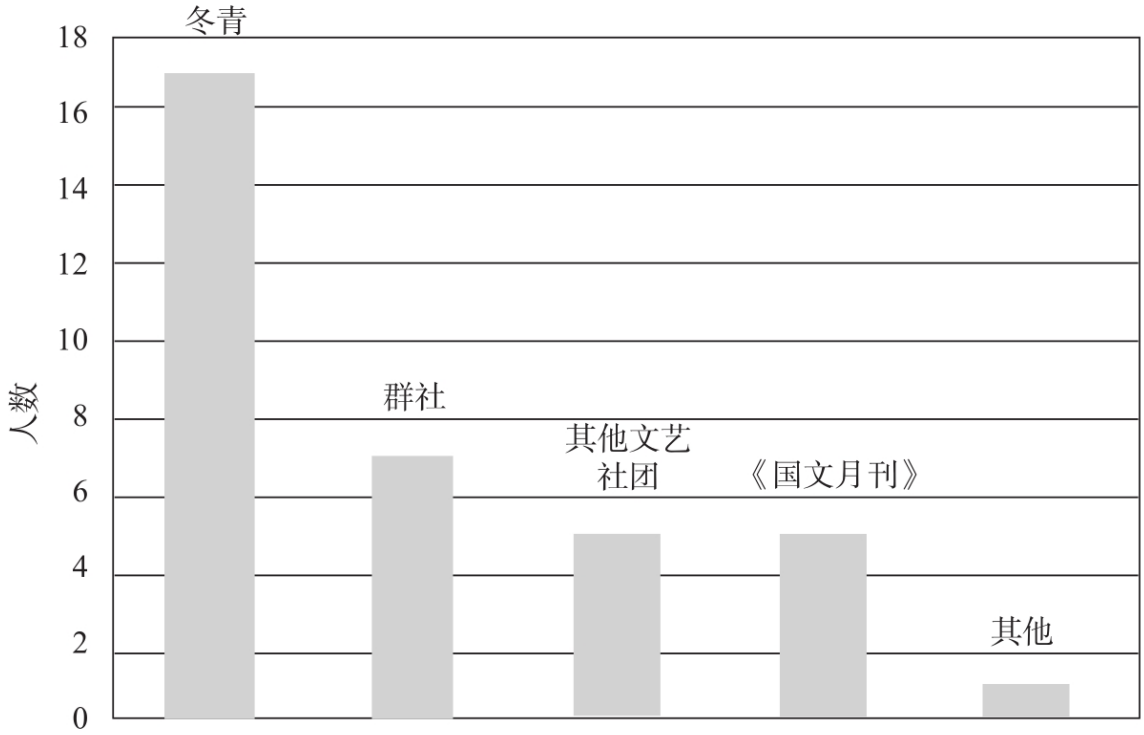


图7-2 《文聚》成员参加的社团统计图

方龄贵：《忆林元》，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349—352页；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主编：《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3分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69页。

方龄贵：《忆林元》，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349—352页。

除此之外，文聚社的发展还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在整个文聚社的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便是林元。林元在同学中以善辩著称，他为人热情、坦诚而又正直不阿，对朋友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一片赤诚。林元不仅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约稿的高手，《文聚》之前，他就负责群社的机关报《群声》和冬青社的《冬青小说抄》的编辑工作。《文聚》之后，林元还先后编过《观察》《新观察》《文艺研究》，[注]可以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刊物编辑、出版家。[注]《文聚》的成立最早是由林元提议，也是由林元联系、动员原群社和冬青社的旧友才形成最初的成员规模。《文聚》的创刊、编辑及《文聚丛书》的出版，《文聚》经费的来源，及后来联系《独立周刊》并成为其副刊，无一不倾注着林元的心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文聚》为空间，一群爱好文艺的知识分子，以林元为核心，根据相互间的亲疏关系、活跃程度，形成了一个呈递减数列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裙带关系，他们或为师生、同窗、

同年，或为同乡、世交，或为室友，血缘、地缘、业缘在这个共同体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他们获得认同感的基础。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文学的爱好，这一共同的趣味为这个知识分子共同体贴上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标志。

2．知识分子的公共议政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意义上的士。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临亡国危机的联大知识分子，怎可能坐而待毙却无动于衷！中国究竟往何处去？中国的对日战争应采取何种政策？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该如何确立？这些问题困扰着这群知识分子，他们以办报的方式，试图通过舆论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政府。其中联大知识分子最早创办的一份议政型报刊便是由钱端升任主编的《今日评论》。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277—278页。

钱端升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八岁时入家乡的私塾读书，1910年钱端升来到上海敬业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后来转入上海南洋中学。钱端升勤奋好学，1917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9年，他在清华获得官费留美的资格，第一年他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攻读政治学，翌年夏天获文学学士学位，暑假期间来到密执安（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就读，旋赴哈佛大学，学习了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并旁听哈佛法学院的一些科目。192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回国后，钱端升先后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注]钱端升一直致力于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希望把中国建设成西方民主式国家，为此他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尝试，办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钱端升作为北大教授曾经主办过以北大教授为核心的《现代评论》，此时他就与燕树棠、潘光旦、罗隆基等人有所往来。燕树棠在1924年《现代评论》创刊时，就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为它撰稿，罗隆基从美国回来以后也为《现代评论》撰过稿。1934年，钱端升来到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他所接替的就是罗隆基的位置。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71—72页。

1938年钱端升回国，在联大政治系任教，在联大期间，属于北大，同时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一面还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联大，除了钱端升外，还有其他一些教师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纪实》上记载“参政会中有十几位大学教授，他们因为平日往返比较接近，对于政治多多少少有一些共同点或共同兴趣，于是在开会期间，他们每有他们的小组聚会，交换关于各种问题的意见，在提案中互为声援，形成教授派的力量。这一派的人物有罗隆基、罗文干、陶孟和、周

炳琳、傅斯年、张奚若、杨振声、钱端升、任鸿隽诸先生”。[注]钱端升和其他诸教授一方面希望通过参政会来参与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办报，试图以公共舆论来影响政治。

《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1页。

《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4页。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395页。

1938年11月30日晚上，钱端升请一群朋友来家聚餐，晚餐中，钱端升提出要办一期刊，以谈论时局、对日战争、党国政策，大家都纷纷赞成。当谈论到期刊名称时，大家讨论的结果倾向于叫《中论》。[注] 12月16日，钱端升又举办了一次晚餐会，朱自清等人参加。会上大家讨论了这份刊物的名称，花去三个小时，最后大多数人同意定名为《今日评论》，[注]每周一期。经过一个月的酝酿，1939年的元旦，《今日评论》的第1期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份刊物由钱端升担任主编，他的助手王赣愚是其主要干将，并得到了朱自清、王赣愚、邵循恪、陈岱孙、伍启元、丁佶、潘光旦、王迅中、戴世光、刘崇鋐、王力等人的大力支持，罗隆基、陈雪屏、崔书琴、陈序经、吴半农、林浦等人也常为其撰稿。《今日评论》一直发行至1941年4月，每周出版一期，为期两年四个月。《今日评论》虽然接受了蒋介石、朱家骅等人的津贴，[注]但基本上还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致力于自由宣传不同观点，因此在战争早期成为吸引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讨论时事的论坛。

《今日评论》创刊后，多次召开编委会会议，讨论编务问题。1月27日，《今日评论》社晚餐会召开，朱自清被推为文艺编辑。1月28日下午，钱端升否决了陈岱孙《治与政》一文。朱自清在这一年中曾多次记载编辑会议的召开：

6月1日 参加《今日评论》编委会会议。

6月15日 钱端升告诉朱自清，说冯先生在《云南日报》人员面前攻击他。

6月29日 《今日评论》编委会在朱自清家召开。

7月6日 在钱端升家里召开《今日评论》编委会。

8月11日下午《今日评论》编委会开会。钱端升谈及重庆在外币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宋子文支持提高兑换率，孔祥熙则主张听其自然发展。

8月18日 在朱自清家召开《今日评论》编委会开会。

8月25日 《今日评论》编委会在下午召开会议，决定王将负责下一期的编辑发行工作。

9月1日 《今日评论》编委会开会。

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9月8日 下午《今日评论》编委会开会。[注]

《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2期。
《今日评论》1940年第3卷第11期。
钱端升：《抗战致胜的途径》，载《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11期。
钱端升：《中日战争与美国今后的行动》，载《今日评论》1940年第3卷第11期。
钱端升：《罗斯福当选与今后的美国》，载《今日评论》1940年第4卷第19期。

《今日评论》的中心议题是抗日斗争，这一主题是当时任何一份刊物都最关注的问题。经过一年半的全面抗战，《今日评论》在1939年1月1日创刊之时，有远见的撰稿人就已经注意到，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将会持久下去，而持续的战争终将会引起列强干涉，和平就会到来。[注]但谁可能是中国的盟友？是英美还是苏联？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签订之前，苏联给了中国最大的援助，向中国输送了飞行员和战争物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则就是积极反共，对付苏联；而苏联则希望保持东方势力均衡，这要求有一个强大且友善的中国，因此，在这段时间里苏联似乎是最有希望成为盟友的。苏德条约签订后，9月17日苏联军队进入波兰，此时法学教授燕树棠断言：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合是沙俄帝国传统延续的信号，他提醒他的同事们苏联并不是可靠的盟友。[注]随着欧洲形势的恶化，英法拒绝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对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的行为置之不理，明显的绥靖趋势使得他们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预估都十分悲观。钱端升指出，中国不能依靠日本国内自身的垮台或者大规模的国外援助，而必须为长期斗争巩固自身的政治基础。[注]随着法国的陷落及英国自卫战的开始，联大自由主义者最后寄予厚望的就是他们中许多人曾经学习、生活过的美国。可是，钱端升也指出华盛顿强力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很可能会受到限制，[注]只有当美国自身受到了攻击，或者当中国和英国处于战败的危险时，它才会加入战争。无论如何，美国军事力量在1944年以前都不会采取主动，因此美国可能会成为中国的盟友，但是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美国。[注]

钱端升：《统一与一致》，载《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1期。
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企望》，载《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3期。

Lawrence K. Rosinger, China’s Wartime Politics, 1937—194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 60; Frederick Spaar, “Liberal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Chinese Politics, 1928—1958,” Ph. D. diss., Brown University, 1980, p. 87. 转引自［美］易社强：《大学教授的讲坛——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楚德天译，载《学海》2004年第5期。

当全面抗战进入第三年时，人们的注意力便从希望得到国外援助或出现战场奇迹转向了民主政治。在《今日评论》的创刊号上，钱端升就已警告政府民族团结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注]钱端升在《对于六中全会的企望》一文中指出，只有提高政治经济效率，减少审查制度，结束党派之争，全面抗战的进行才可能更为有效，[注]而结束一党专政，开始实行宪政是最有效的途径。联大自由主义者劝告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立宪问题，于是罗隆基召集了一个编写宪法修正草案的大会试图强制限制行政权力。罗隆基的行为激怒了蒋介石。1940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限期地推迟召开国民大会，[注]立宪的希望最终破灭了。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异天、戈德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李盛平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在为《今日评论》撰稿的人中，以联大政治系教授居多，也以他们撰述的文章最多。我们先看一下他们这些人的基本状况（表7-7）。[注]

表7-7 《今日评论》联大政治系撰稿人的基本情况

姓　名	出生年份	籍贯	职业、职务	教育背景		专　业	党派渊源
				国内	国外		
钱端升	1900	江苏松江	联大政治系教授	19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法学	国民党
王赣愚	1906	福建闽侯	联大政治系教授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	获美国哈佛硕士、博士学位，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	政治、法学	国民党
丁佶		福建	联大教授，商学系主任	清华大学经济学系		经济学	
邵循恪		福建闽侯	联大政治系教授		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政治学	国民党
洪绂（思齐）	1899	福建闽侯	联大地理系教授		法国里昂大学博士	地理学	
刘崇鋐	1896	福建闽侯	联大教授，曾任历史学系兼师院史地系主任	1910年入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	获威斯康星、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历史学	
陈岱孙	1900	福建闽侯	联大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商学系主任	北京清华学校	获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学士、硕士学位，192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经济学	
伍启元	1912	广东台山	联大经济系教授	沪江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	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经济学	国民党
王力（了一）	1900	广西博白	联大中文系教授	1925年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1931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文学、语言学	
戴世光	1908	湖北武昌	联大经济系教师	清华大学	1936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数理统计硕士学位，193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经济统计学	经济学	

▼（续表）

姓　名	出生年份	籍贯	职业、职务	教育背景		专　业	党派渊源
				国内	国外		
潘光旦	1899	江苏宝山	联大社会学系教授	1913年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	1922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镇达特茅斯学院生物学学士学位，1925—1926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修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夏入麻省海滨生物研究所	生物系、社会学	国社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罗隆基	1898	江西安福	联大政治系教授	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哈罗德·拉斯基做研究	政治学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社党
雷海宗	1902	河北永清	联大教授，曾任历史学系兼师院史地系主任	1919年入清华学校高等科	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	哲学、历史学	国民党
陈序经	1903	海南文昌	联大社会学系教授	1925年复旦大学毕业	1928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	社会学	
燕树棠	1891	河北定县	联大教授，法律学系主任	1914年毕业于北洋大学	1915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学习，1920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法学	国民党

▼（续表）

姓　名	出生年份	籍贯	职业、职务	教育背景		专　业	党派渊源
				国内	国外		
崔书琴	1906	河北故城	联大政治系教授	1930年南开大学毕业	获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	政治、法学	国民党
朱自清	1898	江苏扬州	联大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		哲学、文学	
沈从文	1902	湖南凤凰	联大副教授			文学	
汪曾祺	1920	江苏高邮	联大学生	1939年入联大中文系		文学	学生
谷春帆		江苏吴县	昆明邮政总局副邮务长，重庆邮政总局业务处处长	圣芳济书院			
陈雪屏	1902	江苏宜兴	联大教授，师院教育学系主任	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27年获哥伦比亚文学硕士学位	文学、哲学	国民党
蔡枢衡	1904	江西永修	联大法律系教授		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及研究生院、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毕业于东京帝大研究生院	法学	

*由于资料有限，尚有个别人物未列入该表。

该表所列是各人在1939年元旦至1941年间的情况。

在表7-7列出的《今日评论》22位主要成员中，来自江苏省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28%（如图7-3）；福建省6人，占总人数的28%（其中仅闽侯一县就有5人，占总人数的23%，福建省成员的83%）；河北省3人，占总人数的14%；江西2人，占总人

数的10%；其中江苏和福建这两个省成员占据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今日评论》的两大中心人物——钱端升和王赣愚的籍贯不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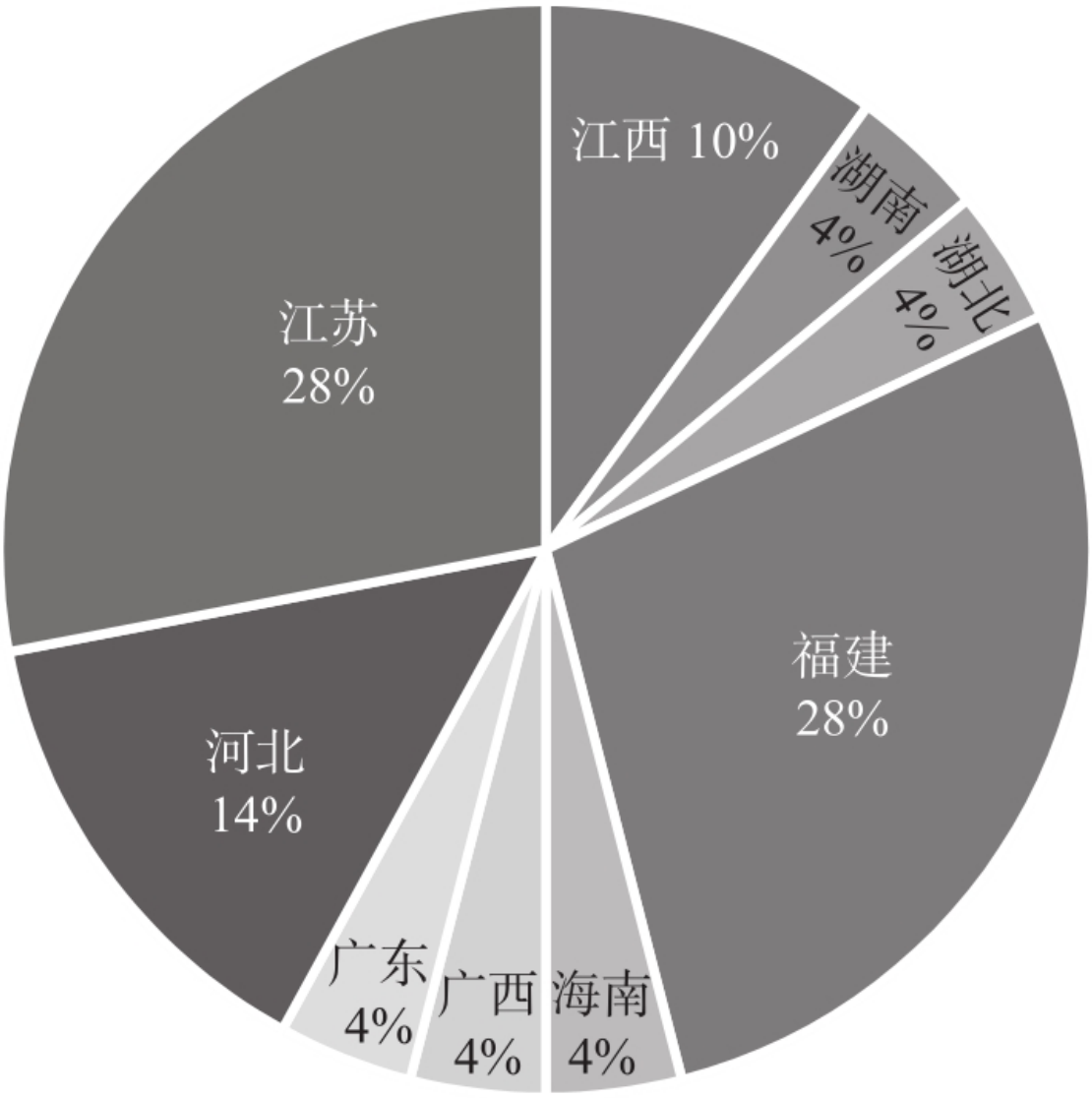


图7-3 《今日评论》同人籍贯数据图

闻一多：《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第8页。

从年龄上看，《今日评论》同人虽然年龄跨度比较大，但多数成员都出生于1898—1906年间。这段时间正是中国面临着思想转型的时期，他们从小或多或少都会接受一些中国传统儒家经典著作的教育，受过一定传统文化熏陶，幼年的经验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们一生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在他们身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

厚的感情，会有传统士大夫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观，以救国治国为己任。从求学经历来看，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是最为持久的一种惯习，特别是早期所受的教育。接受一种教育，等于是接受某一个阶级位置的教育。《今日评论》的这22人中，除了汪曾祺是学生辈的以外，21人中11人皆出身于清华，占据了一半，其中罗隆基和潘光旦又是清华同届同学，又同在美国留学，同是大江社的创办者、新月派成员，交情匪浅。从教育背景上看，清华学校是留美预备学校，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其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选派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做准备性的教育工作。所以这所学校在校园建设、学风、课程设置等各方面都带有十分浓厚的西方色彩，在这里任教的教师大多也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以至于这所学校可以被看成中国看西方的窗口，这所学校的学生也受到浓厚的西方文化影响。这些成员中的80%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其中有留学美国经历的占61%，法国占10%，德国和英国各占5%，相同的教育经历使他们带上了他们所属阶级的属性，这也是他们在交往中比较容易获得认同感的基础。而多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带有了西方味道，这就使他们又拥有了相同的生活习性。闻一多曾经说：“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动，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来，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注]这些人大多留学欧美，特别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出身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或者清华学堂，这些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进入这个非常西化的学校，像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人，他们十四五岁就考入这所学校，一待便是八九年，从清华出来后又直接去欧美接受教育，在他们身上带有十分强烈的西方色彩，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极为西化的。他们喜欢喝咖啡，看西方的电影，组织沙龙、讨论会、读书会、聚餐，还喜欢打球、旅游、打桥牌等。虽然全面抗战中后期物价上涨，联大知识分子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但某些生活惯习，特别是花费不高的生活惯习还是保留了下来，如打桥牌、看电影、小范围内的聚餐等。相似的生活习性是他们相互认同的又一个方面。从知识结构上看，这些人的专业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文学。他们这代人大多数知识结构都比较广博，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还涉猎了其他的学科知识，广泛的兴趣爱好使他们比较容易获得共同的趣味认同。从政治立场来看，《今日评论》创刊于1939年元旦，一直发行到1941年4月停刊为止。在这两年中，联大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奉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他们对于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并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宽容态度，《今日评论》同人亦是如此。但宽容不代表完全的容忍，《今日评论》同人大部分既受儒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经典教育，又都亲身经历过五四的洗礼，自由、民主仍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面对日本的入侵和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他们借助《今日评论》这一平台，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和统治方式提出看法和批评，但这些批评都是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上的。

《战国策》，1940年4月。其中唐密为陈铨笔名，尹及为何永佶笔名，上官碧是沈从文笔名。

Michael R. Godley, “Politics from History: Lei Haizong and the Zhanguo Ce Clique”, i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4, 1989, p. 104. 转引自［美］易社强：《大学教授的论坛——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

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赞成中国一党专政的主张又开始重新回潮。1940年4月，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同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和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铨等人创办了《战国策》，每半月出一刊，有23位“特约执笔人”，分别是林同济、雷海宗、陈铨（唐密）、贺麟、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上官碧）、郭岱西、吉人、二水、丁泽、陈碧生、沈来秋、王迅中、洪思齐、洪绂、童嵩、疾风、曾昭抡、何永佶（尹及）、曹卣、星客、仃口。[注]有学者指出，林同济和雷海宗创办《战国策》是“为了使国人获知欧洲发生的大事，迫切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不断灌输……对惨无人道的现实政治的批判认识”。[注]他们认为，中国又重新进入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建立高度集权的体制，在文化上重建文武并重的进取型文化，以集中全国的意志和力量对付外来侵略，才能图存。他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发扬积极的入世精神，扮演古代谋臣或策士的角色。他们强调文化形态史观，谈论主体政策、权力政治和英雄崇拜，他们在反思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宣传民族意识和中国文化重建的意义，抨击官僚统治，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战国策派的出现，以及他们对战争、对权力和英雄的观点意味着在联大和云大知识分子中出现一个新的倾向。

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载《今日评论》1940年第4卷第15期。
钱端升：《一党与多党》，载《今日评论》1940年第4卷第16期。

在战国策派的影响下，《今日评论》的倾向也迅速地右转。这种论调在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一文中体现出来。钱端升指出，在当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状态下，中国既不适合采用英美式的民主，也不能模仿德意和苏联这种极权主义，而依据现实，建立蒋介石的独权是最为理想的政府形式，但他还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对政府提意见、进忠言的民众大会。“这种类型的政府在形式上接近集权政府，但精神上决不苟同，因为领导这个政府的蒋先生是忠于人民政府的原则的”，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注]一周后，钱端升发表第二篇文章《一党与多党》，继续论述多党体制在当代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主张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实行开明的一党独裁，“今代的国家必须握有大权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平等，我以为极权主义不全是恶的”。[注]与《今日评论》的右倾观点相比，《战国策》同人走得要远得多。

雷海宗：《中国的兵》，见雷海宗、林同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岳麓书社，1989年，第52页。
雷海宗：《无兵的文化》，见雷海宗、林同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岳麓书社，1989年，第94—95页。

雷海宗：《中国的兵》，见雷海宗、林同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第52页。

雷海宗：《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见雷海宗、林同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第168页。

《战国策》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批判。雷海宗、林同济把世界上的高等文化区域划分成七个，在此基础上，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阶段，林同济则把文化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三个阶段。他们都认为当今世界局势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战争即民族的竞存，是国力的竞争，战争性质的正义或非正义则在其次。他们办刊的宗旨是战时文化重建。他们始终在思考文化重建与国力的关系，要使中华民族能抵御和战胜侵略，能自立于这个充满竞争的所谓“战国时代”，当然要有强大的国力，而国力的要素在于民气，最重要的就是要振发民族精神。如何振发？关键又在于摒除传统文化的积弊，发掘与张扬民族历史上曾有过的、能激发民气的精神酵素。他们受叔本华、尼采思想影响至深，而战时所集中暴露的文化积弊又促使他们增强了理论的锋利批判力。可惜因为处在战争年代，社会接受偏重现实性、政治性，虽然其根本出发点仍在于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在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他们认为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皇权专制已经使民族文化的“活力颓萎”，造成国民性如此羸弱。而今一个老大中国遭到异国侵略，处于挨打地位，这就不能不更清醒地正视我们文化颓废导致国力衰弱的事实。他们对战时所暴露的种种政治和社会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在许多论作中对当时许多不利于民气国力振兴的现象（特别是官僚政治）都严加批评，但主要还是文化角度的批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五四以来文化重建的历史经验的思考。他们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破坏有余，对新文化的建设不足，或者说，对传统文化有助于民族文化重建的活力酵素继承不够，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往往又食洋不化，因为当时整个文化心态比较浮躁。到1930年代，仍然没有摆脱激进而浮躁的状态，特别是那种曾经影响很大的机械唯物论，那种以政治为中心的非左即右的偏激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利于民族文化重建的。他们认为战争带来了压力，带来了危机感和紧迫感，这时重要的是吸取二十多年来新文化建设中的经验得失，重新寻找一种比较合适的路径。他们认为文化重建的目的在于改造羸弱的国民性，办法就是从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战国文化”中吸取活力，同时以世界一些民族的文化重建经验作为借鉴。雷海宗独特地从“兵”的角度评价传统文化，探讨重建中国文化的基本办法，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兵”的文化。雷海宗从文化层次探讨“兵的精神”及其演变，他“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注]秦以下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雷海宗把这种文化称作“无兵的文化”。[注]进而指出“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因为“一般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

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注]因此，“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注]这样，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和社会风气，才能创造出光明磊落的文化。他们依据他们的“文化形态历史观”来宣传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念，证明民族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价值。

钱端升：《论党务》，载《今日评论》1941年第5卷第14期。

罗隆基：《中国与民意政治》，载《今日评论》1940年第4卷第21期。

伍启元：《抗战期间的教学生涯》，载台湾《传记文学》1994年第65卷第6期。

到了1941年春，《今日评论》的主编钱端升开始对极权理论进行反思，回到三民主义的正统言论中寻找解决方法。他在《论党务》中写道，三民主义原则中的民治已经被极端主义者在两个方面进行误解：一方面是坚持极权主义的，另一方面则是推崇英美民主的。[注]目前，右倾的可能成为当前中国的最大威胁，欧洲和中国的局势都使得政治话语明确地右倾，中国走向民主的任何可能性似乎都消失了，国民党是否也将建立一个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政权？为防止出现这样的前景，一些《今日评论》撰稿人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求庇护。罗隆基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民意观念的传统使得像德、意那样的纳粹独裁政权无法在中国运行。[注]然而，国民政府并没有听从知识分子的劝告，反而实行更为严厉的打压政策。罗隆基在《今日评论》众人中以言语激烈著称，他先后发表了《期成宪政的我见》（第2卷第22期）、《五五宪草的权利义务章》（第3卷第10期）、《欧战与民主主义的前途》（第4卷第1期）、《权力与效率》（第4卷第9期）、《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第4卷第20期）、《中国与民意政治》（第4卷第21期）、《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第4卷第24、25期）和《国民参政会的效用》（第5卷第5期）。这一时期他主要集中于讨论宪法和政党问题，要求国民党尽早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政治。1941年，联大领导迫于重庆方面的压力解聘了罗隆基。1941年外交部内定钱端升出使某国，钱端升认为他应即停办《今日评论》。若干编辑希望由其他编辑继续维持及出版，或至少办到外交部正式宣布他的任命才停止，但钱端升坚决立即停刊，《今日评论》遂停止了。但编辑委员会中的其他联大教授于《今日评论》停刊后继续刊行《当代评论》，直至抗战结束时才停版。[注]

《〈战国策〉停刊启事》，载《中央日报》（贵阳），1942年4月4日。

《今日评论》停刊后不久，昆明版的《战国策》因“空袭频仍，印刷迟缓，物价高涨”，[注]于是年7月宣告停刊，并于12月3日起在每周三的《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一直持续到1942年7月，前后共出版31期，名噪一时，聚集在《战国策》周围的知识分子也因这份杂志而得名“战国策派”。

3．参政的尝试

潘大逵：《我参加民盟云南省支部活动的回忆》，见政协云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1986年，第85页。

赵锡骅：《民盟史话（194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9页。

虽然说全面抗战使得全国上下取得一致，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也表现出最大的宽容，国民政府的统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合法性，可是战事的延续、战局的恶化，再加上官僚统治、政治腐败、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民主政治问题又再次被提上日程。一些知识分子致力于组织反对党，试图通过参与政府改革实现民主宪政，民盟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党派。民盟成立后不久，民盟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于1943年5月正式成立，一些联大教师如潘光旦、潘大逵、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人相继加入民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占据多数的政党，他们通过办报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宣传民主宪政，从而促进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如黄炎培创办、张志让主编《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民宪》，章伯钧主编《中华论坛》，加上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工作的成都《华西晚报》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鼓吹民主宪政的社会舆论。民盟云南省支部也创办了《民主周刊》《自由论坛》《大路周刊》《时代评论》等刊物，其中以《民主周刊》影响最广，并成为云南民盟支部机关报。《民主周刊》于1944年年底创办，每周一期，以发表政论性文章为主。《民主周刊》首先在经费上取得了一个可靠的支援，秘密盟员朱健飞筹措了不少经费。[注]《民主周刊》先后由潘光旦、潘大逵、闻一多任社长，罗隆基、杜迈之任主编。迄至1946年8月被反动政府封闭，《民主周刊》共出版3卷71期，是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广泛的一种民主进步刊物。[注]

《民主周刊》以要求民主为主题，抗战胜利后又发表了反对内战的观点。刊物针对各个阶段发生的重要事件或问题，除发表《民盟云南省支部对时局的宣言》等民盟省支部的宣传文件外，还经常发表教授专家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有关评论，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各项政策，针砭时弊，提出告诫和主张。《民主周刊》从第1卷第22期开始增加“时评”一栏，主要针对一周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这一周的时局进行评论。

《铲除枭雄盗国思想——纪念云南护国革命》，载《民主周刊》1944年第1卷第3期。

赵锡骅：《民盟史话（1941—1949）》，第90页。

《民主周刊》创刊之时，正值豫湘桂战役大溃败之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到了贵州，中国的大后方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民主周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怎样渡过难关》的评论，指出现阶段中国不仅面临日军侵略的军事问题，更面

临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实行民主的政治问题。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团结，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它呼吁国民政府召集国是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渡过国家民族危亡的难关。云南护国起义二十五周年纪念时，《民主周刊》第3期发表时评《铲除枭雄盗国思想——纪念云南护国革命》，以袁世凯称帝的教训警告国民党当局："枭雄盗国寡头专制妄念，绝对不能苟存于20世纪。"[注]意在提醒蒋介石放弃专制独裁统治政策，联合各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时全面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国民政府军队的节节失利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清楚，只有实现民主才可能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实行宪政、实现民主、成立联合政府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夙愿。以后几期，《民主周刊》接连发表了罗隆基的《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潘光旦的《民主的先决条件》，王赣愚的《团结与军权统一》等专文，以及潘大逵论宪政问题的几篇文章，强调党派团结为实现民主的枢轴，并提出有关实现民主宪政的具体主张。关于中国需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政治，邓初民在《人民是最后的判决者》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新型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民主，而是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的联合政权"，并指出："人民的力量与反人民的力量的比重，发生基本的变化，最后必然要由人民的力量来决定一切。"[注]

罗隆基：《"七七"八周年纪念》，载《民主周刊》1945年第2卷第1期。
罗隆基：《我们在抗战胜利时的主张》，载《民主周刊》1945年第2卷第6期。

要求民主、建立联合政府，是《民主周刊》的主题之一，同时抗战局势仍旧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1945年5月，欧洲战场结束，中国战场在盟军的支援下，获得胜利已是定局。抗战胜利后，中国将何去何从呢？《民主周刊》在《"七七"八周年纪念》的专论中指出，国家正处于光明与黑暗的十字路口上，人民要自由、平等和民主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注]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三天，《民主周刊》便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我们在抗战胜利时的主张》，指出内战危险的存在，呼吁"赢了抗战，我们还要赢到国内的和平。赢了抗战，我们还要赢到国内的民主"，提出了一要保障国家安全，二要建立国内民主两大主张。[注]争民主、反内战是《民主周刊》这一时期的焦点。民盟还为建国提出一系列主张，其中楚图南发表了《战后和平与教育问题》等有关和平建设的文章。政协会议召开前后，为配合政协的斗争，12月28日，《民主周刊》发表时评《成败之间》，指出政协会议能否做到制止内战、制定共同纲领、改组国民党政府、制定宪法草案、解决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问题是其成败的关键，号召全国人民起来监督和指导。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周刊》刊登了周新民的《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期望》一文，对会议着重讨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大项目发表监督意见，表示支持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的主张，指出"联合政府的组成，乃为政治民主化的前提"，"必须先组织联合政府，政治确已民主化了，然后方可谈到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同期《民主周刊》发表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吴晗联名的《致马歇尔特使书》，从中国的历

史和现状论证中国的政党必须依仗武力才能存在，指出“这原因就是当权的政府不容许异见”。为中共拥有武装力量的必要性辩护，意在提醒政协会议注意，军队国家化必须国共两党同时将军队交给联合政府，不能让蒋介石企图利用军队国家化要中共将人民武装交给他“统一指挥”的如意算盘得逞。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民主周刊》发表《提高警惕》与《并非圆满》两则时评，要求政协会议后民主力量加强团结，以促使政协决议能够真正得到实施。

赵锡骅：《民盟史话（1941—1949）》，第92—93页。

《民主周刊》还对但凡是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评论。云南事变，龙云被软禁起来后，《民主周刊》为了表示抗议，发表时评《“误会”而“冲突”以后》，阐明民盟反对内战，要求自由、和平、民主的主张，对被蒋介石用武力胁迫下台的龙云表示同情。东北内战扩大化之时，《民主周刊》发表时评，呼吁“用和平民主的协商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并发表《时局严重应由国民党负其全责》一文，指出“国内局势危机因素增加，军事上国民党大量派兵出关，政治上反政协决议日益变本加厉，妨害人民自由的事件层出不穷”，并警告蒋介石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国民党及其总裁应该负其责任”。《民主周刊》还发表《立即停止东北内战》的时评，杜迈之的《东北问题一解》，李何林的《东北问题的关键》与《论东北问题》等文章，以大量的篇幅呼吁制止东北内战，加强舆论对国民党的压力。李闻惨案后，《民主周刊》冒着被反动派查封的危险，全文发表了社长闻一多的《最后的一次演说》，最终被迫停刊。

赵锡骅：《民盟史话（1941—1949）》，第91页。

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民主周刊》以民盟的政治纲领为其纲领，配合民盟的斗争，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结合各个阶段国内国际的重大事件和问题，发表了态度鲜明的主张和意见，痛砭时弊，直陈民意，敢于将矛头直指最高领袖蒋介石，成为昆明地区爱国民主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民主周刊》深受昆明各阶层群众和全国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欢迎。然而广大群众喜爱和向往的，正是国民党当局所惧怕的。《民主周刊》第4期的《时评》，竟被新闻检察官勒令撤销，开了“天窗”。周刊便在天窗处刊出“一个抗议”和“被扣”几个大字，以揭露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粗暴干涉。

《民主周刊》的成功离不开罗隆基，他是这份刊物的灵魂人物，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民主周刊》前面的“时评”差不多都出自罗隆基之手。他较重要的文章有《党派团结的具体建议》（第1卷第7期）、《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第1卷第16期）、《中国民主路程遥远》（第1卷第19期）、《中国的政治前途》（第2卷第1期）和《为国民党借箸一筹》（第2卷第4期）。《民主周刊》的其他几位主持人潘光旦、潘大逵、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费孝通等，不但将满腔爱国热情

抒发为文，而且身体力行，四处奔走呼号，发表大义凛然的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演说，号召广大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奋起投入争民主、反内战的波涛澎湃的人民革命斗争。闻一多被誉为“时代的鼓手”，昆明被称为“民主运动的堡垒”，《民主周刊》和它的主持者便是这个光荣堡垒的有力的宣传鼓动者和卓越的先锋战士。

《闻一多全集·年谱》，开明书店，1948年，第34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人物传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64页。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76页。

《民主周刊》创刊于1944年年底，与《今日评论》创办背景有所不同的是，《民主周刊》创刊时，作为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国民政府原有的合法性也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的统治开始质疑。《民主周刊》作为民盟昆明支部的机关报出台，其本身就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更多的是将反政府的姿态展现出来。《民主周刊》先后由潘光旦、潘大逵、闻一多任社长，罗隆基、杜迈之任主编。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教育，1912年考进了清华学校，同一年考入清华的还有闻一多。罗隆基在学生时代就热衷于学生运动，并成为领袖人物，担任了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罗隆基的同级同学闻一多也于1914年担任《清华周刊》的编委，为它撰稿，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便发表于《清华周刊》。和罗隆基、闻一多一样，1913年入学的潘光旦也是《清华周刊》热情的撰稿人，并当选为编辑。1921年罗隆基获得庚子赔款留学资格，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而闻一多由于参加了北京大中小学师生罢教罢课支援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的斗争，不顾学校当局对罢考学生“开除学籍”的威胁，坚守学生会决议不参加考试，表示“节义之士不可以刑威胁”，因而留级一年，推迟出国，[注]所以闻一多比罗隆基晚了一年出国留学，而和潘光旦同级。罗隆基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并于1923年和1925年先后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此后，他转去英国，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哈罗德·拉斯基做研究。一年后他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并于1929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罗隆基去美国的第二年，闻一多和潘光旦也赴美留学。美国留学期间，罗隆基与闻一多、吴泽霖、潘光旦等人成立了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大江学会，鼓吹国家主义，并在其会刊《大江季刊》的《发刊词》中，强调“我们是一个绝对信仰国家主义的一个结合”，“我们所最要提倡的一件事，便是气节。我们所谓的气节即是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那种精神”。[注]为了国家主义这一信仰，闻一多不待留学期满便于1925年提前回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国家主义运动中，并致信梁实秋号召国外志同道合的同志早点回国。闻一多回国后先是在北京艺术专科任教，1926年他参加了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潘光旦、罗隆基回国后，在上海地区的大学里任教。回国后的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

更加活跃地进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1928年3月《新月》创刊，罗隆基作为新月派的主要成员，从《新月》第3卷第2期开始担任主编。与罗隆基一起进入《新月》的自然少不了他的老同学闻一多和潘光旦。“新月”时期的罗隆基，其言论主要集中于介绍英美政治学理论，或以近代政治学理论来批评国民党。《新月》在罗隆基的主持下，从一个纯文学刊物变成议政的论坛，这最终成为《新月》流产的主要原因。而此时的闻一多已经无法忍受黑暗现实与美好理想的强烈反差，内心的激情经受不起时日的损耗，热情开始一点点褪去，他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开始出现退隐的念头。《新月》之后，闻一多开始与他那批热衷政治的老朋友们分道扬镳，1932年他回到清华任中文系教授，从此躲到象牙塔中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了。1937年，清华西迁，闻一多随校来到昆明，和闻一多一起到昆明的是他的老同学潘光旦。西南联大初期的闻一多仍然沉醉于《诗经》《楚辞》和《离骚》的研究，甚至连下楼散步的时间也不愿舍弃，因此还博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绰号。与闻一多有着不同选择的罗隆基还是醉心于政治，他除了办《新月》，还参加了“新月”内部的一个小的议政社团——“平社”，并积极地参与其活动，同时参加平社活动的还有潘光旦。1930年4月，罗隆基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之名义被捕，虽然历时只有几个小时，但却对罗隆基影响至深，使他对国民党产生巨大的反感。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篇《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不仅详细记述了当时情景，还对国民党进行了严厉批评。罗隆基也因此被迫辞去光华大学的职务。1931年，罗隆基从上海来到天津，在南开任教，并先后担任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和《北平晨报》社的社长。二三十年代的罗隆基尚且是个书生论政的大学教授，到了1940年代他就已经转变为一个十足的政治活动家了。1939年，罗隆基也来到昆明就任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和他的老朋友闻一多、潘光旦再一次在一个大学里供职。他还保持着参政的热情，常在《今日评论》上发表文章。在这里，罗隆基再次因言辞激烈而被解聘。1942年10月，罗隆基再次来到昆明，他此时的身份已不再是联大教授，而是民盟昆明分会主席。1944年年底，罗隆基开始负责民盟宣传部，出版《民主周刊》。这一时期，罗隆基的著述以讨论宪法和政党问题为主。作为民盟的一员，他的口气分明就像一个在野者。罗隆基这一次不再是孤军作战，他得到了他的老朋友闻一多和潘光旦的支持和帮助。闻一多做了十年余书虫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终于火山爆发了。1943年春，闻一多参加了周新民、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1944年参加了民盟，并担任起《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接任吴晗当选为《民主周刊》社社长。如果说闻一多是后知后觉的话，潘光旦则可谓先知先觉了。潘光旦在政治上很早就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他在上海期间曾与张君劢等经常往来，并于1936年加入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潘光旦便以国社党党员身份参加了，并一直担任民盟历届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还兼任民盟昆明支部委员、主任委员，负责创办和编辑民盟在昆明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可见《民主周刊》的三大支柱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不仅是清华同学，而且一直保持往来，有着极其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深厚的友谊绝非一般人可以替代。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云南省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异天、戈德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李盛平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1940年代的罗隆基，由于政见不同，和他许多清华的老朋友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了。罗隆基热衷于政治，曾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原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总部宣传部长等职，同年入盟的还有潘光旦。1942年，罗隆基来到昆明筹办民盟支部，同时来到昆明的还有他的同事潘大逵。民盟吸收了一批大学教授进入，构成了《民主周刊》这一知识分子群体。《民主周刊》除了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潘大逵、杜迈之五人外，经常为之撰稿的还有吴晗、费孝通、楚图南、曾昭抡、张光年、周新民、李公朴、王赣愚、朱云彬、张光年、洪谦、闻家驷、尚钺、冯素陶、李文宜等人。在这些人中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除了像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这种深厚的私交外，还有兄弟之亲、同学之情、同乡之谊、同事之交、同志之缘，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这一共同体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民主周刊》同人的概况，见表7-8。

表7-8 《民主周刊》同人概况

姓名	出生年份	籍贯	职业、职务	教育背景		专业	党派倾向	曾参与的社团和报刊
				国内	国外			
罗隆基	1898	江西安福	联大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主周刊》主编	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哈罗德·拉斯基做研究	政治学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社党民盟	《清华周刊》、大江学会《大江季刊》、《中国学生季刊》、新月社、《新月》、《再生》、《益世报》、《晨报》、《今日评论》、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
潘光旦	1899	江苏宝山	联大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	1913年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	1924年获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镇达特茅斯学院生物学学士学位，1925—1926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修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夏入麻省海滨生物研究所	生物系、社会学	国社党民盟	《清华周刊》、大江学会《大江季刊》、《中国学生季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书报春秋》、《优生月刊》、《华年周刊》、《中国评论周报》、新月社《新月》、十一社、《自由论坛》、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
闻一多	1899	湖北浠水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民盟中央执委，任《民主周刊》社长	1912年入清华学校	1922年赴美国学习美术，同时进修西洋文学，进一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近代英国诗歌	艺术、外国文学、中国文学	与国家主义者接近，民盟	《清华周刊》、游艺社、美术社、《创造月刊》、大江学会《大江季刊》、《晨报》副刊《诗镌》、《诗刊》、新月社、《新月》、《国文月刊》、南湖诗社、冬青社、联大剧团、新诗社、《生活导报》、《自由论坛》、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增刊》
曾昭抡	1899	湖南湘乡	联大化学系教授	清华学校高等科	1926年获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化学科学博士学位	化学	民盟	《中国化学会会志》、群社、十一社、《民主周刊》

▼（续表）

姓　名	出生年份	籍贯	职业、职务	教　育　背　景		专　业	党派倾向	曾参与的社团和报刊
				国内	国外			
楚图南	1899	云南文山	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教授，民盟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史地系		历史	中共、民盟	九老会、《劳动文化》、教育革新社、《教育新刊》、《灿星》、《秋声》、《诗与散文》、云南文艺界抗敌协会、《战时知识》、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增刊》
潘大逵		四川	联大法律系教授、云大政治系教授、《民主周刊》社社长	清华学校	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政治学、法学	民盟	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民主与宪政》、《民主周刊》
费孝通	1910	江苏吴江	联大讲师、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	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	哲学、社会学	民盟	《生活导报》、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
杜迈之	1917	湖南桃源	《民主周刊》主笔，民盟云南省支部秘书处主任	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			民盟	《自由论坛》《民主周刊》
周新民	1897	安徽庐江	云大法律系教授	安徽法政学校	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从事法学研究	法学	中共、国民党、民主政团同盟、民盟	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九老会、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增刊》
吴　晗	1909	浙江义乌	联大历史系教授，《民主周刊》主编	清华大学历史系		历史	民盟	《大公报》副刊《史学》、十一社、《自由论坛》、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

▼（续表）

姓　名	出生年份	籍贯	职业、职务	教　育　背　景		专　业	党派倾向	曾参与的社团和报刊
				国内	国外			
李公朴	1902	江苏武进	民盟中央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镇江润州中学，武昌文华大学附中，上海沪江大学半工半读	1928年赴美留学		国民党、民盟	九老会、《生活》周刊、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全民抗战周刊》、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增刊》
王赣愚	1906	福建闽侯	联大政治系教授、云南大学政治系教授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	获美国哈佛硕士、博士学位，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	政治学、法学		《今日评论》《民主周刊》
宋云彬	1897	浙江海宁	桂林师院教师、昆明英国心理作战部顾问	上海政法大学		历史、文学、编辑出版	中共、民盟	商务印书馆、《浙江日报》、开明书店、《黄埔日报》、《民国日报》、《中学生》、桂林文化供应社、《野草》、《民主生活》、《青年刊》
张光年	1913	湖北光化	云大附中教师、《民主周刊增刊》编辑				中共、民盟	扬子江出版社、北门出版社、《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增刊》
闻家驷	1905	湖北浠水	联大外文系教授	复旦大学	1928年赴法，入巴黎大学、格林诺布大学	法国文学	民盟	冬青社
尚　钺	1902	河南罗山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大学英文系预科班		历史	中共、民盟	莽原社、狂飙社
冯素陶	1906	云南广通	云南大学教授	中山大学			中共、民盟	九老会、云南文艺界抗敌协会、《战时知识》、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
李文宜	1903	湖北武汉		湖北女师、上海新华艺专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		中共、国民党、民盟	九老会、西南文化研究会、《民主周刊》

费孝通：《政治上的启蒙》，中国民主同盟文史委员会编：《我与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群言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从表7-8中我们可以看出：闻一多和闻家驷是同胞兄弟，这种血缘关系是知识分子交往中不可磨灭的关系纽带，俗语说“血浓于水”，亲人的影响力是其他力量无法取代的。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曾昭抡、潘大逵、费孝通、吴晗、王赣愚皆出身清华；楚图南和冯素陶是云南同乡，李文宜和闻家兄弟是湖北同乡，又和吴晗的太太袁震是同乡兼湖北女中的同学；吴晗和宋云彬是浙江同乡，潘光旦、费孝通和李公朴是江苏同乡。在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成员在联大和云大任教，有的同为两校教员，有的不仅就职于同一所学校，还分享同一个专业，在同一个系任职。周新民、宋云彬、张光年、楚图南、尚钺、冯素陶、李文宜早年均有参与政治的经历，又同为共产党员，罗隆基、潘大逵是最早一批加入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除了上述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成员皆有创办报刊、成立社团的经验，这可以说明这些成员对政治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式中国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为此，他们也试图通过办报的方式，以公共舆论来影响政府政治；或者参加社团的活动，借以影响政府。多次的尝试和努力的结果最终仍是国民政府愈发的专制和独裁，于是这些知识分子们想通过民盟这一反对党的方式，来实现限制政府和扩大个人权利的目的。为了使他们的主张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并为政府所重视，办报仍不失为一种最好的方法，《民主周刊》应运而生。《民主周刊》的政治倾向十分明显，所有同人皆是民盟成员，周刊经常发表民盟中央的时局主张、宣言和同人的意见，它更多的是代表民盟这一党派在发言，是民盟的喉舌。如果说《民主周刊》在创办初期尚且宣传民主宪政，加强团结，抗战到底，而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形势日趋明朗，反对内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则开始高涨。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中国共产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与中共党员配合工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当然，他们开始并不愿完全接受共产党的一切纲领，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路线。费孝通回忆自己当初加入民盟时曾说道：“我们那时的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政治上开始结合的。师生、同学、同乡等等常是他们类聚的基础。政治的觉悟导致原有的朋友之间分出亲疏，有些谈得拢，有些谈不拢了。有些信得过，有些信不过了。这也是政治启蒙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以我自己说，潘光旦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我进清华以前就熟识的。这个师生关系是我接受政治启蒙的基本社会关系。闻一多先生是潘先生的同学和经常来往的朋友。吴晗同志是我的老同学，但也是由于他是个常到潘先生家去的朋友所以特别熟，昵称老晗。”[注]可见，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的思想方式，同时这个人的政治选择又会使他的网络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政治立场和信仰同样是惯习中不可忽视的成分，它就像一个筛子，在朋友中间进行筛选，分出亲疏。所以共同的立场和信仰，以及相同的政治观点是这批人聚集在一起的最终因素。

由此可见，联大知识分子组建起他们自己的共同体、进行自我认同的因素离不开以下几个节点：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姻缘等传统因素和布迪厄提出的惯习。虽然血缘、地缘与学缘在知识分子交往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随着都市化的日益发展，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都市集中，都市里的公共空间不再只是熟人圈子，都市里聚集着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陌生人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断地摆脱传统社会中血缘、地缘与学缘关系纽带的束缚，一个新的规则——惯习，日益成为知识分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主角。同一共同体内惯习的一致性，是这个共同体得以建构和维持的根本，同时也是构成社会里不同的生活风格的基础。每一个共同体内的成员分享同一类型的惯习，集体行为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是惯习造成的；共同体内每个人所代表的都只是这一阶级惯习的不同版本，相同的阶级惯习是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原因，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标志，惯习给这个共同体成员戴上了只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家族徽章”。知识分子交往与认同的因素极其复杂，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姻缘和惯习等各种因素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共同体之间互相缠绕又相互独立的脉络关系，只是在不同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具体的表象和所起的作用比重略有不同。

储德天

第八章

重建社会重心：战后知识分子的同人群体

费孝通：《政治上的启蒙》，见中国民主同盟文史委员会：《我与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群言出版社，1991年。

许纪霖：《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参政（1945—1949）》，见《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八年全面抗战，使整个中国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于知识分子而言，其感其痛则更为深切，从而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觉醒了。[注]在全面抗战中后期，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已经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更多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站出来说话，由此出现了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参政议政的热潮。许纪霖先生形象地称之为“参与爆炸”（participation explosion）。[注]他们或者创立报刊，或者创建团体（组织），通过各种传媒不断发表对于时局的见解和主张，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特征鲜明的不同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一、

储安平与《观察》群体

储安平（1909—1966年），江苏宜兴人，乃储氏望族之后；伯父储南强，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储安平生下仅六天，母亲去世，由祖母抚养，14岁父亲去世，从此寄养伯父家中，直到去外地上学。1928年，储安平从光华附中毕业，升入光华大学政法系；大学时期的储安平醉心于文学创作，曾给《北新》《语丝》《真善美》《新月》《流沙》等文艺性杂志写稿；对社会政治问题亦感兴趣，1931年编过一本论文集子《中日问题各家论见》（新月书店1931年出版）。1932年，储安平从光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因健康原因，回家乡养病，旋赴南京；1934年，与同学端木新民成婚；其间曾主编《中央日报·文学周刊》。1935年11月10日，《文学时代》创刊，储安平任编辑，1936年4月，出完第6期后离开，刊物随即停办；同年4月，在同学赵家壁的联系下，由良友出版公司出版短篇小说集《说谎者》；此一期间同时任《中央日报》社主笔、记者。1936年8月，储安平随中国代表团赴柏林采访奥运会新闻；旋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的“费边主义”学者拉斯基教授；1938年，离英返国。1839年至1940年，储安平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教授，同时给《中央日报》写社论；其间，参加“渝社”——一个以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为主要成员的学术性团体；其后，曾短期任桂林《力报》的主笔，创办人为光华大学校友张稚琴。1940年，储安平接受老师廖世承的邀请，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其间写成《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著作；1943年《英国与印度》一书出版（桂林科学出版社）；1945年5月始，兼任《中国晨报》主笔；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离开湖南蓝田师范学院，赴重庆。1945年11月11日张稚琴创办《客观》，邀请储安平任主编；1946年3月，离渝赴沪，筹备《观察》周刊的后续工作。1946年9月1日，《观察》创刊，储安平任发行人兼主编，同时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中英文化协会副秘书长。1948年，因入国民党黑名单，储安平于12月12日被迫离沪赴平；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政府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储安平加入民盟和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编学社机关报《社讯》。1949年11月1日，《观察》复刊，储安平任主编；一年后，《观察》改名为《新观察》，离职出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1952年，储安平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前往东北和新疆参观考察，写下了《东北参观报告》《新疆新面貌》《玛纳斯河垦区》等著作。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做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报告，随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山农场放羊。1957年6月8日，储安平向《光明日报》社长章伯

钧提交辞呈，不再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1966年深秋，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自杀，未遂；不久，失踪。资料来源有邓加荣：《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谢泳：《储安平评传》，见谢泳编：《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谢泳、程巢父：《追寻储安平》，广州出版社，1998年；陈永忠：《储安平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汪荣祖：《自由主义在战后中国的起落——储安平及〈观察〉的撰稿群》，载台湾《传记文学》1993年第63卷第4期。

《观察》周刊，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份同人刊物，也是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刊物。从最初的倡议、筹备到创刊后的征稿、编辑乃至发行，储安平[注]几乎承担了与《观察》相关的所有工作，可以说，《观察》是储安平个人的事业。在储安平的苦心经营下，《观察》发行量由最初的5000份增加到最后的10500份，创造了民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奇迹，这一时期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为“储安平时代”。[注]

1．储安平与《观察》

冯英子：《风雨故人来》，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储安平自陈，《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载《观察》1947年第1卷第24期。

对于新闻工作，储安平有着近乎着迷的兴趣。[注]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应光华校友张稚琴之邀，辞去国立大学的教授职务，离开湘西赴重庆主编《客观》周刊。储安平邀请好友吴世昌、陈维稷、钱清廉、张德昌任编辑，请著名经济学家笪移今负责“经济一周”专栏，又亲自向熟识的知识分子约稿，很快令《客观》在重庆立足，影响不断扩大。但随着陪都各单位复员工作的展开，重庆的格局日渐狭小，加之储安平与发行人张稚琴相处并非十分愉快，[注]储安平遂决定离开《客观》，着手另起炉灶。

储安平自陈，《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载《观察》1947年第1卷第24期。

上海档案馆馆藏“观察档案”，卷宗号Q06-12-160。另外，给《观察》提供资金资助的还有两个人，一是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一是蒋经国。可参见冯英子：《劲草——冯英子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谢泳：《储安平与〈观察〉》，第24页。

创办一个新刊物，最困难的莫过于资金，尤其经过抗战，知识分子大都囊中羞涩。[注]储安平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做发起人，共同募集资金；储安平的一个学生名雷伯龄者，说服老父亲卖掉家中九亩农田，帮助储安平。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观察社”宣告成立，发起人为储安平、伍启元和沈昌焕，“创立时实收资本法币一千二百万元，共二百四十股，每股五万元。重要股东所占股额：计储安平及沈昌焕各廿股；伍启元、吴世昌、笪移今、陈铭德、陈维稷等各十股”。[注]

表8-1 《观察》的发起人和股东

股　东	发起人	工作单位	备　注
储安平	是	复旦大学教授	中英文化协会副会长；“观察社”社长、《观察》主编
伍启元	是		1946年9月赴英；国民党员
吴世昌	否	中央大学教授	1948年初赴英讲学
笪移今	否	民治新专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陈维稷	否	交通大学教授	中英文化协会会长、中纺第一印染厂厂长、中共党员
沈昌焕	是	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兼任秘书、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行政院新闻局特派局长	国民党员
陈铭德	否	《新民报》总经理	

沈昌焕（1913—1998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于书香世家，中学就读于光华大学附中，1933年毕业于光华大学政法系，后在北平燕京大学研究所研究两年，1936年初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1937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校长机要秘书直至1940年；1940年10月至1949年1月，在政府部门就职，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秘书、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公路总局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专员、远征军司令部少校参谋、中国驻印度专员公署二等秘书、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兼任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行政院新闻局特派局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可参见石之瑜编著：《宁静致远　美丽人生：沈昌焕先生纪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储安平致胡适》（1947年1月21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第168页。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

需要指出的是，《观察》的发起人和股东（见表8-1）无论是社会身份还是政治立场，都存在较大差异，相互之间也没有多少来往，他们能够聚集起来促成《观察》的诞生，主要是储安平穿针引线的结果。沈昌焕[注]与储安平为江苏同乡，两人中学、大学均为校友，并同在光华大学政法系就读，储安平比沈昌焕高一级。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校园名人，惺惺相惜，私交颇好。伍启元是储安平留英时的同窗好友，两人同时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吴世昌与储安平则为无话不说的知交。陈维稷是留英学界的前辈，储安平留英返国后与之结识并得到他的诸多帮助，二人分别担任中英文化协会的正、副会长。笪移今是著名的经济学者、民主界进步人士，深为储安平敬重。陈铭德是新闻界名人，储安平就职于《中央日报》社时即与之相熟，在业务上颇多往还。《观察》创刊后，几个发起人和股东对刊物的编辑出版事宜概不干涉，全权交由储安平负责。储安平任“观察社”董事长、社长，《观察》主编兼发行人。而储安平除了在复旦大学授课外，谢绝一切活动，全身心投入《观察》的创办，从社务管理到策划选题、组稿审稿和编改稿件、每期刊物的封面和排版，直至印刷校对、发行推广，甚至开付稿费，事无巨细，莫不事必躬亲。在给胡适的信中，储安平写道：“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力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注]其实，储安平还在上海筹备《观察》的时候，就有政府部门的朋友两次邀请他出任“高级公务员”，储安平委婉地拒绝了。处于豪华的大都市里，他寂寞而艰难地做着刊物的筹备工作，“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注]

冯英子：《风雨故人来》，第17页。
储安平：《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载《观察》1946年第1卷第11期。
储安平：《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载《客观》1945年第3期。
储安平：《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载《客观》1945年第7期。
许纪霖：《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参政（1945—1949）》，见《许纪霖自选集》，第113页。

这盏“灯”的光亮来自储安平念兹在兹的理想。对于办报，储安平有着明确目的：“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注]对于知识分子的言论参政，储安平颇有自信：“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注]这种认识源于他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储安平认为，一个国家固然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在政府之外，“同时还需要在这一个国家里面有一种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大率寄托在思想开明，拥

戴民主，爱好自由，憎恶竞争的有科学头脑的进步分子”[注]即中产阶级及与之相联系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间的中产阶级抬头……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注]这表明，战后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加自觉地追求多元社会中的角色认同，[注]同时也是他们政治上觉醒的重要表现。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2期。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
储安平：《民主》，载《客观》1945年第7期。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
储安平：《艰难·风险·沉着》，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24期。

在创刊号上，储安平公开表达了创办《观察》的企图：第一，对国是发表意见，即论政。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过于散漫无足以重视的组织，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是潜在的，只有经过动员才能变成实际力量。[注]这些“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他们的意见“对于今日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此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者”。[注]第二，储安平希望《观察》发挥教育的功用，在社会上培植自由主义的风气，使“人人有民主的头脑及有一种民主的思想方法”，如此，中国才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注]储安平希望《观察》上发表的文字，其中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读者尤其是青年的品性修养和进步有所影响，从而在渐走极端的社会中培养并不断壮大“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更为深厚的基础。故储安平一再强调：“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储安平的良苦用心：他希望通过《观察》将自由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在业已失序的社会中形成一股安定的势力，依靠“自由思想分子”自身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巨大影响力，亦即“道德权威的力量”“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注]吸引和影响社会以培植中产阶级，并使之不断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从而具有动员社会的能力。概言之：一则制造舆论，澄清政治，朝民主政治的大方向努力；二则重建社会秩序，改变社会风气。储安平说：“我们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我们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我们国家的生命。”[注]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储安平创办《观察》，充分调动其广博的社会关系，邀请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及其他各界名流担任撰稿人，围绕在《观察》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2．储安平与《观察》群体

《观察》撰稿人情况参见附表1。

《观察》的基本撰稿人[注]有78位（算上储安平79人）。他们中既有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教授、科研机构的资深专家，又有知识界的名流、新闻界著名人士和政府中的开明分子。这是一个以《观察》为阵地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松散集合，他们没有共同的主张，也没有所谓的纲领或者路线，仅仅是一种道义上或者精神上的联合。他们出任《观察》撰稿人，有的是储安平通过朋友关系辗转邀请，有的是储安平慕名函请，但绝大部分与储安平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可以说，《观察》群体是以储安平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为纽带群聚而成的。

在《观察》群体中，作为主编的储安平无疑是灵魂人物。

陈纪滢：《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2页。
冯英子：《风雨故人来》，第18页。
王火：《忆储安平教授》，见谢泳、程巢父：《追寻储安平》，第27页。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20页。
冯英子：《风雨故人来》，第10—11页。

曾与储安平一起参加“渝社”的陈纪滢说储安平“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注]冯英子说储安平“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注]储安平的学生也说他“不喜欢主动与学生接近，对学生的态度是客气的，但并不很热情，有距离”，甚至“恃才傲物”，[注]而张申府言：“据我所知，储安平是以敢言著名的办报人，有很好的操守。”[注]由此推断，储安平不但才情横溢、有操守且意志坚定，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冯英子说：“我同储安平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只是彼此踽踽独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交叉点上碰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办过报，一起写过文章，可是仅仅这么一点，要忘却他也不容易。他的声音笑貌，好像经常在我眼前，不把它写出来，也好像欠了他一笔债未曾还清一样。”[注]

陈永忠：《储安平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储安平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大学时期曾发起组织宜兴同乡会。[注]大学毕业后，储安平的足迹从南京到伦敦，再到重庆、湘西、桂林，最后又回到上海，尽管他一直辗转在学校、报（刊）社之间，他结识的朋友却遍及社会各界，教育界、文艺界、文化界、新闻界甚至政府部门中都有他的许多朋友，其中许多成了《观察》的撰稿人。比如张东荪、潘光旦、胡适为储安平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的老师；伍启元、吴恩裕、楼邦彦、费孝通、鲍觉民、钱歌川、夏炎德、萧乾等人是储安平

在伦敦大学的同学；钱锺书、吴世昌、高觉敷为储安平在蓝田师范学院的同事；梁实秋、叶公超、卞之琳、季羡林是储安平所熟识的文艺界人士；许德珩、吕复、笪移今是储安平在重庆结识的民主界进步分子；杨人楩、戴文赛、戴镏龄、钱清廉、李浩培、张印堂等则与储安平同为留英派，通过留英同学会相识；赵超构、浦熙修、王芸生、许君远、徐盈夫妇、李纯青则为储安平在新闻界的朋友；而在政府中就职的陈之迈、郭有守、顾翊群等学者型官员，也与储安平颇有私谊，尤其陈之迈，是储安平可以称兄道弟的朋友。他们因为储安平而走到一起，共同支持着《观察》这个事业。

陈子善：《“新月派”的后起之秀》，见谢泳、程巢父：《追寻储安平》，第19页。

《观察》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期刊，而储安平被认为是继胡适之后的又一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储安平的人生历程中（见附表2），有两个阶段值得关注。一个是光华大学时期。储安平于1928—1932年在光华大学读书，此时的光华名师云集，自由主义空气浓郁。文学院院长张东荪、中文系主任钱基博、教育系主任廖世承、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政法系主任罗隆基，其他或专或兼任教授的如胡适、朱经农、李石岑、颜任光、徐志摩、王造时、彭文应、江问渔、吕思勉、吴梅、蒋维乔、黄任之等均为学界名流，其中一些人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此时的储安平虽在政法系学习，却是一个文学青年，与“新月”派的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颇多来往，被称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注]可见，储安平成为战后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绝非偶然。另一个是伦敦大学留学时期。1936—1938年，储安平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的“费边主义”学者拉斯基教授，并深为其学说折服。因此，储安平的自由主义带有明显的“费边主义”色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察》的精神特质。

关于中英文化协会的相关资料可参见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43—884页。

《观察》的撰稿人可谓阵容庞大，但构成其主体的是那些具有留英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么多的留英派自由知识分子加盟《观察》，实与“中英文化协会”和“留英同学会”两组织有关。在国内，因种种原因，留英派知识分子相对于留美人士要少很多，但联系比较密切。王世杰、杭立武、张道藩等留英学界的前辈为了掌握留英学生的相关信息，发起了两个留英学生组织。一为1933年10月成立的中英文化协会，[注]主要的任务是延聘英国学者来华讲学，推荐、介绍中国学者赴英讲学并指导国内学生赴英国留学或考察。因此，中英文化协会在社会上乃至在自由知识分子当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另一个组织是1939年成立的留英同学会，宗旨为“研讨学术、联络感情”，会址设在重庆。这两个组织，储安平均参加了。通过留英同学

会，储安平结识了大量的留英派人士（见表8-2）并出任中英文化协会副会长一职，无疑增加了他在这些留英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威望。

表8-2 留英派人士

姓　名	生　年	国内/大学教育		留学背景		专　业	备　注
		时间	学校	时间	学校		
储安平	1909	1928—1932	光华大学	1936—1938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政治学	《客观》主编
伍启元	1912		沪江大学	1934—1937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	《客观》撰稿人
吴恩裕	1909	1930—1933	清华大学	1936—1939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政治思想史	《客观》撰稿人
楼邦彦	1912	1936年毕业	洧华大学	1936年赴英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政治学	留学时间几乎与储安平同时
钱清廉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法律	《客观》编辑
杨人楩	1903	1922—1926	北师大	1934—1937	牛津大学	法国史	《客观》撰稿人
陈维稷	1902	1921—1925	复旦大学	1925—1928	利兹大学	纺织	《客观》编辑
戴文赛	1911	1928—1932	福州协和大学	1937—1941	剑桥大学	天文	《客观》撰稿人
戴镏龄	1913		武汉大学	1939年归国	爱丁堡大学	英国文学	《客观》撰稿人
鲍觉民	1909	1929—1933	中央大学	1937—1940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	

▼（续表）

姓　名	生　年	国内/大学教育		留学背景		专　业	备　注
		时间	学校	时间	学校		
费孝通	1910	1930—1933	燕京大学	1936—1939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社会学	
		1933—1935	清华大学				
钱锺书	1910	1929—1933	清华大学	1936—1939	牛津大学	外国文学	
钱歌川	1903	1922—1926	东京高师	1936—1938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	外国文学	
吴世昌	1908	1928—1935	燕京大学	1948	赴英讲学，被牛津大学授予文学硕士	文学	《客观》编辑
杨　绛	1911	1928—1932	东南大学	1935—1937	牛津大学听课	文学	
		1932—1935	清华大学				
黄正铭	1901	1924—1928	东南大学	1933—1936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政治学	
李浩培	1906	1924—1928	东吴大学	1936—1939	情况不明	法律	《客观》撰稿人
夏炎德	1911	1931—1935	暨南大学	1938年毕业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	
叶公超	1904	1917—1920	南开中学	1925—1926	剑桥大学	外国文学	
张印堂	1902		燕京大学	1930年代初	利物浦大学	地理学	
卞之琳	1910	1929—1933	北京大学	1948	赴英讲学		
萧　乾	1910	1931—1935	燕京大学	1939—1942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	英国文学	

许纪霖先生将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大都生于1865—1880年之间）、五四一代（1880—1895年）、“后五四”一代（1895—1930年）、“十七年”一代（1930—1945年）、“文革”一代（1945—1960年）和后“文革”一代（出生于1960年以后）。见《许纪霖自选集·自序》，第2—4页。

从表8-2可以看出，当1946年《观察》创刊，这些留英的自由知识分子大都处于33—45岁之间的青壮年时期，而34—38岁之间的人占了绝大部分。他们大体上都属于“后五四”一代。[注]从留学时间上讲，储安平、伍启元、杨人楩、吴恩裕、戴文赛、戴镏龄、鲍觉民、费孝通、钱歌川、楼邦彦、钱锺书、杨绛、李浩培、萧乾等人差不多同时在英国留学（或听课）。就所读院校而言，除李浩培情况不明外，储安平、伍启元、吴恩裕、钱清廉、楼邦彦、鲍觉民、费孝通、钱歌川、夏炎德、黄正铭、萧乾都在英国伦敦大学，储安平、吴恩裕、伍启元、钱清廉、楼邦彦、鲍觉民、费孝通、钱歌川、夏炎德等均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伍启元、杨人楩、钱锺书、吴恩裕、李浩培、鲍觉民、戴文赛七人均为中英庚款留学生，伍启元、杨人楩同届，鲍觉民、戴文赛同届。就其所接受的国内教育而言，三人曾就读于燕京大学、五人为清华大学出身，其他也都毕业于国内著名高校，均接受了系统的知识训练，除陈维稷、戴文赛、张印堂三人外，其余诸人所学专业都为社会科学。因此，这些留英的自由知识分子无论从国内教育还是留学教育上，都具备很大的可拟性，拥有较强的对话能力。他们都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从学生时代就面临日本侵略的威胁，共同经历过抗战，因此，对于国家前途和时局具有大致相似的认知，具有很强的认同感。而《观察》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这些具有留英背景的人当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吴世昌、伍启元、吴恩裕、费孝通、杨人楩、楼邦彦等几个核心人物。他们不但与储安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观察》周刊最有分量的撰稿人。

储安平在一篇悼念徐志摩的文章中说：“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储安平：《悼志摩先生》，见《储安平文集》（上），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00页。

陈永忠：《储安平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

吴世昌：《中国需要重建权威》，载《观察》1946年第1卷第8期。

吴世昌与储安平无论在人生际遇、性情、知识的兴趣还是在精神气质、思想倾向上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与储安平一样，吴世昌八岁丧母，十岁丧父，靠亲戚朋友的接济生活。吴世昌所学专业为英国语言文学，但真正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史，多次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新月》健将徐志摩是吴世昌的表兄。而早在1927年，还是高中生的储安平就认识了徐志摩，大学时期，徐志摩又成了储安平的老师，其深

受徐志摩的影响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注]二人对徐志摩都有特殊的感情，当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吴世昌写下《哭志摩》，储安平写了《悼志摩先生》。吴世昌和储安平的大学时期，正值民族危机重重的危难时刻，两个年轻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抗日活动。储安平和上海的一些青年组成一个团体，欲亲往前线杀敌。[注]吴世昌为逼蒋抗日，则与兄嫂一起绝食，先到顺承王府向张学良请愿，旋赴南京，谒中山陵并在陵前大哭，共绝食84小时，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京沪。正是因为这些相同的遭遇和记忆，二人在蓝田师范学院认识后，相见恨晚，自此成为莫逆之交，无话不谈，互相支持。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主编《客观》，同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慨然充任编辑，储安平离开后，即由吴世昌接手主编《客观》，并保持了以往的特色和水准。在《观察》时期，吴世昌更是倾力支持，不但出资入股，还介绍撰稿人、代约稿件，“并在各方面协助，以迄于今”，[注]如杨刚就是由吴世昌介绍的。1947年7月，储安平因事离沪，拟请吴世昌暂代主编之职。作为《观察》的撰稿人，吴世昌也是写稿较多的几位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需要重建权威》一文。在此文中，吴世昌认为中国之所以内战不止、社会混乱，根本原因是中国已经失去了权威力量，因此要重建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重建权威，而这一任务自由知识分子责无旁贷。[注]虽然说法不同，但其主旨观点与储安平“充实社会”的主张不谋而合，从而成为《观察》周刊上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

参见潘光旦：《存人书屋日记》，见《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伍启元、吴恩裕、费孝通、楼邦彦与储安平均为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同学，吴恩裕与储安平一起师从拉斯基教授，是正经的同门师兄弟，杨人楩也是在英国留学时期与储安平认识的。伍启元、费孝通为西南联大同事，多次共同发表宣言，是西南联大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吴恩裕、楼邦彦、杨人楩则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杨在历史系，吴、楼同在政治系。他们与《观察》都有密切关系。伍启元是《观察》的七大股东之一，还积极为《观察》代约稿件、介绍撰稿人（张德昌、杨西孟就是通过他而担任撰稿人的）。[注]费孝通帮忙设计栏目和调查问卷。[注]吴恩裕则多次在途经上海时参与编辑工作。在《观察》的作者群当中，伍启元是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费孝通是笔头最勤、写稿最多的一个；吴恩裕则善于从哲学角度分析民主、自由等问题，他又化名负生主持《负生偶记》小栏目，点评《石头记》、中国文史和古诗词，颇具特色；杨人楩所撰写的关于“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文章最多，是《观察》自由主义精神的代表。楼邦彦则是储安平之外对国民政府批评最为严厉的知识分子，且擅长从政治学、法学的角度进行专业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核心人物除吴世昌外均留学英国，且大多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不同程度地受到“费边主义”的影响。在《观察》上，这些留英派自由知识分子多次撰

文或译介、评论拉斯基的文章及其学说，或表达对于社会主义的某种赞赏。他们要求政治民主，也同样注重经济民主，在民主政治模式的选择上倾向于英国式的工党政治体制。

从代际上讲，储安平与几个核心人物均为“后五四”一代，是知识界正在成长中的少壮派。若要《观察》健康发展，还得取得前辈学者的帮助以壮声势。在《观察》群体中，胡适、张东荪、陈衡哲夫妇、吕复、胡先骕、潘光旦、傅斯年、冯友兰、钱端升、许德珩等人均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家。他们的加盟，大大增强了《观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其中，潘光旦、陈衡哲、钱端升、许德珩是几位重要人物。

参见潘光旦：《存人书屋日记》，见《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278页。
《储安平致胡适》（1947年1月21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9页。
《杨绛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邓加荣：《寻找储安平》，见谢泳、程巢父：《追寻储安平》，第89—90页。

储安平在光华大学就读时期，潘光旦任社会学系主任。自光华大学毕业后，储安平与潘光旦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朋友。《观察》创刊前，储安平在上海继续未了的筹备工作，潘光旦和费孝通恰在苏州浒墅关“避风”（因“李闻惨案”），储安平前往聆听教诲，潘光旦提出了不少建议。《观察》开始出版后，潘光旦除积极写稿外，还帮助储安平为《观察》设计民意测验试题。[注]储安平如何结识任鸿隽夫妇无从查考，但根据储安平自己的说法，在上一辈学人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是陈衡哲先生。[注] 1949年陈衡哲夫妇从美国归来时，储安平曾设家宴为其洗尘，[注]可见他们之间交谊不错。在《观察》时期，陈衡哲写稿之余经常从美国寄信给储安平，提供了很多建议，尤其是关于自由主义的问题。另外，通过陈衡哲介绍，八位留美学生在《观察》第3卷第3期发表了《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从而在《观察》上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德珩是储安平在重庆时期结识的前辈。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不久，许德珩组织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复旦举办座谈会，储安平应邀前往并做发言。储安平对许德珩很尊重，《观察》被查封后，储安平逃往北平，曾得到许德珩的帮助，在北京府学胡同许德珩家中躲过了国民政府的追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德珩邀请储安平加入九三学社，储安平不仅参加而且任要职。[注]

3．想象的共同体

储安平创办《观察》是有明确诉求的，即将自由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鼓励他们说话，利用强大的舆论力量规范政府行为以澄清政治，培植自由主义精神以充实社

会，从而树立起一种能够稳定社会的权威势力。舆论的产生离不开作者、编者与读者，只有三方实现有效互动，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观察》获得了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的支持，基本撰稿人78位，实际写稿的作者远远不止这些。对于《观察》周刊，他们具有相当的认同感，不仅积极撰稿，还代约稿件、推介撰稿人、介绍订户，或者为《观察》的编辑计划、内容设计出谋划策，或者来函给予鼓励，从道义上进行支持。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

可参见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艰难·风险·沉着》；《风浪·熬炼·撑住》，载《观察》1948年第3卷第24期；《吃重·苦斗·尽心》，载《观察》1948年第4卷第23、24合期。

文继武：《士大夫的考验》，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16期。

随着国共内战引发的全国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观察》的经营也越来越困难，但《观察》的销售量却呈不断上升的态势。其读者群也不限于青年学生（包括教育界）、公务员（包括军界）及工商银行界人士，而是向社会各阶层延伸。参见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

对《观察》的阅读对象，储安平在刊物创办之初就给出了清晰的定位："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注]《观察》阅读群主要分布在学界（包括青年学生和教育界）、政界、工商银行界。[注]《观察》的创刊，犹如混沌世界中的一缕清风，其透彻的剖析、理性的言论态度和不畏强权的勇气，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肯定和赞赏。南京一读者说："在全国进步的报纸书刊几乎全被扼杀的今日，《观察》已俨然成为广大读者群精神的旗帜。"[注]随着《观察》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销售量也在不断上升，阅读群也逐渐扩展到社会各阶层，日益深入社会。[注]

储安平：《323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12期。

《读者的盛意》（一），载《观察》1948年第4卷第3期。

张志高、胡文山：《不要消极》，载《观察》1948年第4卷第21期。

《本刊暂时不收读者捐款》，载《观察》1947年第3卷第11期。

《读者的盛意》（一）。

为了增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储安平设置"作者·读者·编者""通信"栏目，刊登作者和编者之间的通信，不定期地以"编者后记"的方式对撰稿人进行言简意赅的介绍和评价。储安平还做过一次"读者意见"的调查，内容涉及读者信息、读者对《观察》的意见、读者对作者的意见等，并及时将调查结果登出。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储安平为每一卷所作的"报告书"，将《观察》的编辑、出版情况详细地向读者汇报，希望加强读者对于《观察》的认同感。储安平将《观

察》喻为一只船："编者只是一个舵手，这只船的前进，要靠大家撑持，大家努力。"[注]结果证明，储安平的做法是卓有成效的。报告书对《观察》遭遇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的陈述，激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和责任担当欲望："我购阅其他书报，觉得花了代价，无所用感谢，但对贵刊却不然。阅读贵刊，在精神上是一种高尚的享受，这种享受决非区区订费——代价所可抵偿。"[注]当《观察》遭遇政治上的危机时，读者纷纷来信表达对刊物前途的关切，甚至忧虑着储安平的个人安危。[注]他们积极为《观察》介绍新订户，希望与储安平一起努力使《观察》渡过难关。香港一读者认为《观察》的一切困难，都应该由读者共同分担。[注]对于《观察》，他们不仅仅是花钱购买刊物的消费者，还是思想文化传播的受众，更希望成为《观察》成长的扶助者和保护者。他们认为《观察》给了读者"心灵的滋补"，读者愿意捐款报之以酬偿，即使生活再困难，"除非到饿死的阶段，一切的消费，可以尽量节省，而起码的一碗饭与一本杂志，是不可缺少的"。在他们看来，《观察》名义上为储安平主编，"但如从远的大的方面看，它却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应该让群众合力维护支持"。读者对《观察》的这种强烈的认同感，激发了他们与《观察》共患难的责任意识："我建议先生在贵刊经费感到捉襟见肘必然会影响到刊物本身时，先生应不拘小节，毫不迟疑，先向读者提出。"他们希望在编者与读者的努力下，让《观察》永远保持"特有的作风，特有的重量，开灿烂的花，结辉煌的果"，"这一点我不敢说是代表所有读者的意见，但我相信多数读者必定具有同感"。[注]

可参见［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0—81页。

储伟：《散沙要集合起来》，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7期。

田菊安：《组织·生活·信仰》，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6期。

蒋锡昌：《互助会》，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1期。

蒋锡昌：《互助会的办法》，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3期。

任九皋：《一个"联谊会"的建议》，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7期。

撰稿人、读者的倾力支持，为储安平的《观察》事业提供了不尽的力量来源。而"读者投书"栏目的设置，在一定意义上真正实现了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在这里，读者可以就作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评论，或赞扬或补充或批评，可以对编者的工作提出意见，可以与其他读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编者也将与刊物有关的各种信息及时地告知读者，以方便他们的选择，获得更大的支持；《观察》的作者亦可以读者的身份投书《观察》，这样，作者、编者和读者发生了角色上的互变，作者变成了读者，读者变成了作者，编者既是作者也是读者，由此有效促成了三者之间的互动。他们群聚在《观察》周围，以刊物为核心，以文字为联系纽带，形成了一个知识、思想和信息共享的阅读共同体，[注]从而具有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在储安平、吴世昌、杨人楩等人发出自由知识分子抬头的呼吁后，许多读者都来信表达

了相同的看法。杭州一读者希望储安平出来领导，“负起将散沙集合起来的责任。譬如说，组织一个会，或一个社”。[注]厦门读者来信，认为只有在组织中获得公共的生活，建立共同的信仰，才能产生改造社会的力量。[注] 1947年2月15日，无锡读者蒋锡昌提出组织“互助会”的建议，互助会“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由百而千；以此转变风气”。储安平积极回应，鼓励读者“再拟一点具体办法出来”。[注] 2月20日，蒋锡昌再次致信《观察》，附寄“互助会”规则六条，储安平趁机发起倡议：“读者对于蒋先生所拟的办法，如有修正或补充者，本刊乐于发表。”[注] 4月12日，上海读者任九皋来函，“凡是没有组织，没有团结，则虽有‘量’而仍没有‘力’，产生不出‘中间（坚）力量’”，他提出成立一个“观察读者联谊会”，并拟定了八条规则。[注]接着，更多的读者、作者加入讨论。

参见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45页。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

《储安平致傅斯年》（1947年1月13日），见杜正胜、王汎森：《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95年，转引自谢泳编：《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279页。

可以看出，社会上的分散力量都有着要“团结”“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然而，无论“互助会”也好，“观察读者联谊会”亦罢，最后都不了了之。虽然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通过《观察》实现了互动，产生了巨大的舆论，但是，他们散布在社会上的不同职业领域，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除了《观察》之外，他们之间缺乏其他更有效的组织性联系，仅仅是一个通过文字形成的阅读共同体。无论是作者、编者还是读者，他们之间没有面对面的交往，是共同的话题将全国各地的陌生人凝合在一起。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属于《观察》的一分子，是基于精神上的、道义上的认同，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无形的而非实际的社会结构性联系，这个以《观察》为纽带的“想象的公共体”[注]自然很难承担起动员社会的功能。再则，如若进行社会动员，首先必须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核心的领导力量，即重建社会重心，这也正是储安平创办《观察》的目的。然而时势异矣，战后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往昔的力量。比如，与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相比，《观察》群体就有很大的不同。《独立评论》群体的核心成员大多为北平的教授、学者，除了刊物这一联系途径外，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往渠道，比如大学、各种学术性的委员会、基金会、欧美同学会、各式各样的聚餐会等。在交往中经由同事、师生、同学、校友、会友、私交、同乡等关系的勾连纵横，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北大、清华、燕京各高校教授为主体的，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蒋廷黻回忆：“虽然《独立评论》同寅间都了解彼此见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党。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

外界人士却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注]但《观察》群体并未给读者以这样的感觉，许多读者来信说“我们的文章各言其是，无统一的论调”，[注]傅斯年也批评《观察》因语调“缺乏共同性”而减少发言力量。[注]《观察》78位撰稿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即使其刊物的发起人、主要撰稿人也是七零八散（见表8-3），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交往网络，仅仅通过储安平和刊物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为《观察》撰稿时，他就进入了以《观察》为纽带的阅读共同体，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和工作与《观察》没有其他联系。尽管他们给《观察》以支持，关心它的成长和前途，但《观察》并不是他们共同经营的事业。

表8-3 《观察》的主要撰稿人

核心成员	股　东	发起人	住　地	工作单位	备　注
储安平	储安平	储安平	上海	复旦大学	中英文化协会副会长，“观察社”社长、《观察》主编
伍启元 吴世昌	伍启元 吴世昌	伍启元	英国 南京	中央大学	1946年9月赴英，国民党员 1948年初赴英讲学
	笪移今		上海	民治新专	九三学社社员
陈维稷	陈维稷		上海	交通大学	中英文化协会会长、中纺第一印染厂厂长、中共党员
吴恩裕			北平	北京大学	
费孝通			北平	清华大学	1946年11月赴英访问，次年2月返国，民盟盟员
杨人楩			北平	北京大学	
楼邦彦			北平	北京大学	
	沈昌焕	沈昌焕	南京	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兼任秘书、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行政院新闻局特派局长	国民党员
戴文赛			北平	燕京大学	
	陈铭德		南京	《新民报》总经理	

储安平：《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载《客观》1946年第12期。

迫于国民政府的威压，尤其是民盟总部被强制解散以后，上海各界通常以茶话、座谈、叙餐等隐蔽方式联络，新闻出版界有《文汇报》“星期客谈”、《中国建设》座谈会、开明同人叙餐会等，教育界有“大教联”座谈会，工商银行界组织的“星二叙餐会”、“星五叙餐会”、“双周座谈会”、浦东同乡会聚餐会、“枝鸟叙餐会”等，民进等民主党派也有许多座谈会、叙餐会。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还有一个各界人士参加的综合性的叙餐会，既有工商界人士，又有教育界人

士，也有国民党党政人员，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参加。可参见金学成：《解放前夕的工商界叙餐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8—269页。

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大后方的言论空气越来越紧张，《观察》也日益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储安平的个人安危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储安平开始主动增强与上海知识界的联系。在茅盾的日记中即有相关记录（参见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范泉也回忆说："到上海将近解放前的一段时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几个进步期刊的编辑人，经常到星期六晚上，轮流充当东道主，每次约在跟上次不同的地点，秘密聚餐，相互交换一些有关解放战争和文化艺术界意外遭遇的信息。参加秘密聚餐的，有《小学生》编辑叶圣陶、徐调孚，《世界知识》编辑冯宾符，《观察》编辑储安平，《文艺复兴》编辑郑振铎、李健吾等。我是《文艺春秋》月刊的编辑，也参加了聚餐。"参见范泉：《丐翁和叶老》，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30—31页。为了保持《观察》的民间论政立场，储安平宣称不参加任何公开的政治性的集会或活动，但还是接受学生邀请出席了1948年6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体育馆举办的"反美扶日公断会"。1948年后半年，储安平与上海各界的联系明显增加，其中，张志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参见李正文：《党的亲密朋友——张志让同志》，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41—142页。

自由知识分子如若产生力量，不仅需要"组织"，"经费"也是不可或缺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事业与工商界联系起来，才能产生实质性的力量。[注]因此储安平将《观察》置于中产阶级最为发达的上海出版。但直至《观察》被查封，储安平始终未能与工商界建立起通畅的联络渠道，《观察》所建构起来的文化网络自然也就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在上海，储安平也有许多相熟的朋友，如陈维稷、张志让、笪移今、陈望道、赵家壁、赵超构、萧乾等人都是文化界名流，是当时上海各界茶会、座谈会、聚餐会[注]上的活跃分子。换句话说，储安平在上海拥有许多进入本地自由知识分子网络的渠道（如表8-4所示），但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人脉关系上来讲，储安平与上海的知识分子团体（如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文汇报》、《时与文》、"大学教授联谊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是比较疏离的。即使在他执教的复旦大学，既有《观察》的撰稿人（如夏炎德、萧乾、章靳以等），也有其他相熟的朋友（如陈望道、张志让、周谷城等），但他并未将这种以学校为纽带生成的同事关系带入《观察》所建构的文化网络中。这种情况在《观察》后期有所改变，[注]不过，直至《观察》被查封，储安平始终未能使上海的各种文化网络成为《观察》舆论生产的支持性资源。也就是说，《观察》与大学没有关系，与学会也没有关系。《观察》的舆论来自《观察》本身，缺乏更大的社会结构性网络的支撑。即使是"中英文化协会"和"留英同学

会”，由于战后几乎停止活动且实际由政界人士控制，也仅是《观察》群体得以群聚的一个参考量，与《观察》舆论的生产无涉。

表8-4 储安平在上海的人际关系网络

姓　名	工作单位	与储安平关系	社会活动	业界联系
笪移今	民治新专	与储安平一起编辑《客观》周刊,《观察》股东、撰稿人	上海银行经济研究专员，九三学社理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理事会理事、秘书	教育界、金融界、民主党派
陈维稷	交通大学纺织工程系主任	与储安平同为留英生，一起编辑《客观》周刊，共事于中英文化协会,《观察》股东、撰稿人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中纺第一印染厂厂长，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共党员	教育界、科技界、实业界
张志让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储安平所尊敬的长辈学者；储安平执教复旦即为张志让所邀；在《观察》遇到政治危机时得到张志让的诸多帮助，1948年12月储安平飞北平避难时曾将《观察》托付张志让照拂	“大教联”实际负责人,“救国会”成员	教育界、法律界、金融界、实业界、新闻界、民主党派
赵家壁	晨光出版公司总经理	与储安平为光华大学同学		新闻出版界、文艺界
陈望道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	在重庆时期即与储安平相识，邀请储安平在新闻系兼课		教育界、“开明”同人
萧　乾	复旦大学教授	为储安平留英时的同学	《大公报》记者	新闻界、文艺界
赵超构	上海《新民报》主笔	与储安平在南京时即相识，在重庆时期有很多往来		新闻界

《观察》舆论的生产来自三个方面力量：撰稿人、读者和编者。

首先，战后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没落了。经过抗战，知识分子已经一贫如洗，随之而来的内战，则将他们彻底抛向了饥饿的边缘。北大教授裴文中做了一个生动的比较：

裴文中：《生活安定与学术研究》，北京大学四院学生自治会编：《四月风暴》，转引自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91—292页。

我的资格是留学的博士，又继续研究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现在每月所得是八百九十二万元，折合廿六年到廿七年的法币，只有廿二元六毛；折合白面，只有四袋多，相当于战前一个门房。以我现在收入，按照国家银行放款利息计算，国家只要有三千多万元放在库里，所得利息就可以长期供养开支我的薪俸……也就是说国家只要有了三千多万元就可以买我这一个人为他工作到死。三千多万元，折合实物，等于一辆多三轮车，等于一匹马，等于十八袋面粉……[注]

吴世昌：《谁能替人民说话》，载《观察》1946年第1卷第4期。

即使储安平、吴世昌、杨人楩等一再呼吁自由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让自由知识分子抬头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剩余精力全部消耗在油盐柴米的琐事上、妻号儿啼的愁苦中，“人人谋生之不暇，那有工夫管国家大事？”[注]

储安平：《艰难·风险·沉着》。

另一方面是读者群的不断贫困化。《观察》的最大读者群分布在学界（青年学生和教育界），《观察》出到第2卷的时候，储安平曾委托撰稿人在大学发展学生订户，结果却“全面的惨败”，“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注]这对于将读者定位于“高级知识分子”、希冀对青年学生的修养和精神培养有所贡献的《观察》而言，是个致命的打击。同时，《观察》本身的业务也受到极重的创害。内战带来的邮政业务的不畅、邮资的一涨再涨、刊物定价的不断提高、撰稿人稿费的增加，使《观察》每一期的出版都经历严峻的考验，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营业。持续的通货膨胀带给自由知识分子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压力，也在不断瓦解着他们产生力量的社会基础。

储安平：《风浪·熬炼·撑住》。

唐宝璋：《民主杂志〈观察〉封闭前后》，见谢泳、程巢父：《追寻储安平》，第52—53页。

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

作为编者的储安平，创办《观察》一直坚持民间论政立场："干政"非"执政"，是"思想影响"的工作而非实际的政治运动。但是，随着内战的日益激烈，大后方的言论空间也逐渐狭窄，战前那种自由主义的、建设性的"舆论气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以政治立场画线的分野。"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整个社会已陷入一种严重的神经错乱程度。"注《观察》处于国共的夹缝中，两面不讨好。1947年10月，储安平发表了《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公然怒骂国民政府是"缺德的统治"，令国民党大为光火。《观察》遭到公开警告，储安平也遭特务跟踪并光临其家中，几乎所有的国民党报刊都展开了对《观察》的围攻。注到1948年3月，《观察》又受到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警告："言论偏激。歪曲事实。为匪张目。"同时，又有谣传说《观察》和政府有"勾结"，甚至说储安平已将《观察》出卖给了"CC"。注1948年10月，《观察》发表了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一文，立刻招致了共产党的舆论攻击，解放区即作为反面教材学习。即使是自居"中间派"的上海的一些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批评《观察》。

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
储安平：《政治失常》，载《观察》1948年第5卷第13期。

面对着激烈的国共内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上的困难，自由知识分子消沉了，一种无力感蔓延开来。《观察》本是以专论为主的政论刊物，却因稿件的缺乏不得已将重心转移到了"观察通信"上，"原因是现在大家对于写政论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注即使是作为主编的储安平，也无可奈何地感叹道："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注

二、

《时与文》群体

《观察》是一个全国性的刊物，虽在上海出版，却与上海没有多少关系。真正汇集上海本地自由知识分子的是《时与文》周刊。

据上海档案馆馆藏《时与文》档案，卷宗号46-12-93。

《时与文》，综合性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1947年3月14日在上海创刊，1948年9月24日被国民政府以“屡作歪曲事实言论为匪宣传，动摇人心，意图破坏公共秩序”为由给予永久停刊处分；共出完三卷，第1、2卷每卷24期，第3卷23期。《时与文》周刊是同人刊物，资金完全由负责人和部分撰稿人共同募集而来。

据上海档案馆馆藏《时与文》档案，卷宗号46-12-93。

《时与文》周刊是由程博洪创建的，程博洪是国民党元老程潜的长子。早在抗日战争末期，程博洪与几个朋友已经在商量如何筹措资金，创办一个可以发声的刊物了。抗战胜利后，几个负责人在重庆、长沙、上海、昆明之间以通信的方式，确定了刊物的名称、宗旨及撰稿人的范围等事项。因有了这五百美元，其他几个负责人也分别出资或向人募捐，终于解决了刊物的创办经费问题。因为程博洪身份特殊，遂决定由他出面负责刊物的一切事宜。1946年3月14日，程博洪向上海市社会局递交了登记申请表，准备于1946年12月1日出版创刊号，由于迟迟未得到当局批准，创办工作不得已推迟到第二年。[注] 1947年3月14日，《时与文》[注]在上海创刊，同时成立“时与文”周刊社；周刊社下设经理、编辑两部，并成立五人社务委员会。[注]

《时与文》以宣传“中间道路”而著称史册。它坚持“进步、独立、理性、坚定”的言论立场，宣称“进步”是刊物的第一要义。上海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也是战后民主势力最强大的城市。《时与文》创刊后，很快成为上海民主人士的一个重要的发言阵地，从而形成了以《时与文》为中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1．《时与文》的负责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周天行并非周予同先生。周予同，原名周毓懋，学名周豫桐、周遽，字予同，笔名天行，1898年生，浙江瑞安人。有的研究者认为周天行即为周予同，此说不确。周予同从未参加《时与文》的编辑工作，也未给《时与文》写过文章。

《时与文》周刊的主要负责人为程博洪、汤德明、周天行[注]三人，程博洪任《时与文》主编、发行人、周刊社总经理，汤德明、周天行参加编辑工作，周天行并协助处理发行事宜。

可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23页。

参见《时与文》的“新闻纸杂志登记申请书”，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46-12-93。

程博洪，1917年生，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元老程潜长子；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注] 1942年毕业后入中央政治学校参加国民党训练团，随即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研究员。[注]抗战胜利后，他受张志让邀请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同时创办《时与文》周刊，吸引了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加盟，以“中间派”和“中间道路”的主张而名噪一时。

关于汤德明的生年有两种说法。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时与文》“登记申请书表”（1946年）记载汤德明为35岁，即汤德明出生于1911年；但在王效挺、黄文一主编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1942.2北大地下党概况）》一书为汤德明所作简介中，认为汤德明生于1916年。考虑到汤德明与周天行、程博洪同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笔者认为汤德明生于1916年的说法更为可信。

王亚文，1910年生，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团，1935年在渌江中学入党，193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3年考入北大经济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5—1937年在朝阳大学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长沙，协助蔡鸿钧成立长沙临时市委，后成立临时省委及临时军委，任军委总干事；1938年11月，受长江局指示，以青年特派员身份到昆明开展党的工作，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四年级学习，并在西南联大建立了党支部；1939年7月，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接受党组织命令回南方局工作，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组长，曾任起义部队（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政委。参见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1949.2北大地下党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9—200页。

王效挺、黄文一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1949.2北大地下党概况）》，第206页。

汤德明，1916年7月生，[注]湖南华容县人；1936年9月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同年在北大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校到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学习；1939年5月在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王亚文[注]），曾任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1940年毕业后，为掩护身份加入国民党，任职于设在重庆的行政院侨务委员会；抗战胜利后，任教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同时参加《时与文》周刊的编辑工作，加入“上海市大学教授

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上海市军管会、华东高教局上海市委工作；随后调入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注]

康宁书店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孙仲宇和当时尚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中共党员周天行共同筹划创办的，参见孙晓芬、孙晓云、孙晓静：《康宁书店》，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第24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周天行（周绵钧），1915年生，上海市人；1936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同年3月参加“民先”；1938—1941年1月在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商学系学习，曾任群社副社长、社长，1940年8月在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古锡麟，又名古念良）；1941—1946年，在云南、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经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批准来到上海，参加《时与文》周刊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同时出任康宁书店[注]上海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前后任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局、华东出版委员会秘书室主任，出版总署编译局秘书室主任，总署人事科长等职。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时与文》的主要创办者均毕业于西南联大，汤德明与周天行为1936级生，汤德明在经济系，周天行先在经济系后转商学系，程博洪（政治系）晚两级，但三人均在法商学院。汤德明和周天行均为“民先”成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汤德明的入党介绍人王亚文，亦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并与程博洪为醴陵同乡，且有亲戚关系。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汤德明通过王亚文的介绍进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工作，并加入国民党。两年后，程博洪亦毕业来到重庆，后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周天行毕业后，也曾来到四川工作。此一时期，三人来往密切。

《时与文》周刊的创办，学缘是至为关键的联结纽带。但是，程博洪等三人只是初出茅庐的后辈，无论其学识、资历或社会声望，都不足以支撑《时与文》。如若使刊物能够生存并不断发展，必须获得知识界著名人士，特别是上海本地自由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这期间就需要一些与上海各界有广泛联系的知识分子来牵线搭桥。

《时与文》作者群的情况请参见附表4。

2. “社务委员会”与《时与文》群体[注]

《致读者》，载《时与文》1948年第2卷第17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作为一个时政性刊物，稿源是异常重要的一环。《时与文》数次刊出“本刊稿约”。但在择稿方面，标准甚严，“有人以为本刊在专论方面不常吸收外稿，这倒也是实情，专论较难以达到相当水准，故选稿时不得不略为谨慎而严格”。[注]既然

有“外稿”与“内稿”的区别，说明《时与文》周围聚集着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群（见附表4）。

《时与文》社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可确知伍丹戈为社务委员，其余四人不得而知，因资料缺乏亦无法进行确定的考证，只能依据已有的相关资料进行推测。作为《时与文》的主要负责人，程博洪、汤德明和周天行应位列社务委员会。另一位疑为宦乡，即范承祥。抗战期间，宦乡即逐渐向共产党靠拢，曾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进入《前线日报》工作，并从上饶集中营拯救出多名中共党员并最终于1948年加入共产党，而《时与文》的三位负责人中两人为中共党员。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宦乡受徐铸成邀请担任《文汇报》副主笔，而《时与文》群体与《文汇报》的关系非常密切。1947年5月《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宦乡被列入黑名单，遭到国民政府上海当局的通缉，被迫转入地下。此后以范承祥为化名，在《时与文》周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宦乡资料来自《宦乡年表》，见《宦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04—405页）。但推测仅止于此，本文仍依据确切史料分析。

负责与作者进行联系的是《时与文》社务委员会，由程博洪、汤德明、周天行、伍丹戈等五人组成。[注]张明养、施复亮、程应镠（流金）、蔡尚思、宦乡等与《时与文》社务委员会关系密切，他们与五位社务委员共同构成群体的核心层。伍丹戈与汤德明都是研究经济学的，二人在重庆时期即相识并多有往来。抗战胜利后，伍丹戈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与在该校执教的程博洪又成了同事。张明养与程博洪为复旦大学政治系同事，施复亮与伍丹戈长期共事，且同为民建会员，宦乡则与伍丹戈同为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程应镠毕业于西南联大，与程博洪、汤德明、周天行为校友，特别是与周天行曾共同参加西南联大群社的活动，关系密切。在《时与文》群体中，伍丹戈、张明养、程应镠的位置至关重要，他们各自联络着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是这一群体得以群聚的线索式人物。

王增藩主编：《复旦大学教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42页。

伍丹戈（1912—1984年），著名的经济学家，别名康成，江苏常州人，1912年生。1933年毕业于光华大学政治系；新中国成立前历任光华大学副教授、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等职；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1946年加入上海“大教联”；[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税务局顾问，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立信会计学校、上海财经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历届理事等。

“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成立，是以中共地下党员为主发起创办的一个以翻译、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1936年解散。

柳湜（1903—1968年），湖南省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长沙县立师范。受业于徐特立等名师，1921年毕业后，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教书，先后结识了毛泽东、李维汉等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192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旋被派往安徽省委秘书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入狱；1934年获释赴上海，恢复了组织关系。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申报》读书指导部主任，主持《申报》之《读书指导》专栏，又与李公朴、艾思奇等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1934—1940年，先后在香港参加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编辑工作，在汉口创办《全民周刊》，出任重庆生活书店总编辑；1940年冬离开重庆前往延安，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司长、教育科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1968年被迫害致死。

艾思奇（1910—1966年），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县人。在中学读书期间即参加了共产党秘密组织“青年读书努力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险遭军阀逮捕，被迫乔装出走。1927年初到南京，由其兄介绍加入新滇社，不幸被捕并判为死刑，后经宗伯保释出狱；不久，赴日留学，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1928年回到昆明；1930年，再度赴日，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1931年回国后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从此走上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9月，是章乃器、胡厥文、吴蕴初等工商银行界人士为了挽救民族经济而创办的一个研究机构，日常工作以调查研究、为工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为主，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研究所特约研究经费和日常开支由组成董事会的会员工厂按月缴纳。抗战胜利后，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迁至上海，因受内战影响，研究所的组织形式和研究内容也有所变化，主要是邀请地下党员中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参加工作，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同时注意组织社会力量，建立特约研究员制度，以补研究力量之不足。这些人士，计有宦乡、陈维稷、张锡昌、秦柳方、吴清友、勇龙桂、季崇威、伍丹戈、周有光、阮觉施等30多位。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战后，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与工商银行界尤其是上层人士关系异常紧密。在重庆时期，研究所以聚餐会的形式举行会议，凡董事以下包括所长、研究人员在内的所有成员均参加，每周一次。战后，研究所继续保持和工业界人士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加强与进步民族工商业者的联系，联系的形式是多样的，例如通过“星五聚餐会”“银行俱乐部”定期召开座谈会等。1950年8月，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由华东财经委员会接管，从而结束了它作为民办研究机构展开研究活动的历史使命。

伍丹戈的社会关系主要在教育界、经济学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工商业界、民主界。大学时期，伍丹戈开始进入上海的左翼知识界。1932年，还在读大三的伍丹戈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注]结识了许多中共党人和社

会科学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伍丹戈与柳湜[注]、艾思奇[注]等为《申报》的《读书指导》专栏撰写文章；后在光华大学任教。从1929年至1937年，伍丹戈一直在上海学习、生活和工作，逐渐融入上海的自由知识分子网络。全面抗战期间，伍丹戈来到重庆，就职于四川省银行研究处，又受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注]邀请担任该所研究员。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是自由知识分子三大聚集地之一，特别是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自由知识分子纷纷来到重庆，与从全国各地流亡至此的知识分子汇合交融，逐渐形成了崭新的交往格局。其中，工商界、民主界以及进步的社会科学界人士势力强大且往来密切。对于伍丹戈而言，重庆的生活经历极为重要。以原在上海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四川省银行研究处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为平台，伍丹戈不但与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多渠道的联系，也逐渐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成为经济学界的新锐人物。任职于四川省银行研究处期间，伍丹戈在施复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其引荐和推介，伍丹戈迅速进入重庆民主界的交往圈，并由施复亮介绍，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曾担任民主建国会初创时期青年部的负责人。复员后，伍丹戈接受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新闻系主任陈望道的邀请，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同时兼任中国工业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

作为《时与文》的社务委员，伍丹戈充分调动自己的人际网络，主要通过由学校、学会（研究所）、党派等联络渠道，将一大批知识分子团结在《时与文》周围。如漆琪生（经济系主任）、周伯棣（银行系主任）、张明养（政治系教授）均执教复旦大学；樊弘亦曾执教复旦大学，在重庆时期即与伍丹戈相识。施复亮与伍丹戈长期共事于四川省银行研究处，与《时与文》关系相当密切。宦乡、吴清友和伍丹戈则同为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通过这层关系，伍丹戈也为《时与文》约得秦柳芳的稿件。在伍丹戈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党派是一重要的连接纽带。如漆琪生、施复亮、杨卫玉与伍丹戈同为民主建国会成员，施复亮且为伍丹戈的入党介绍人；沈钧儒、孟宪章、沈志远、石啸冲、施复亮、张西曼等与伍丹戈又同为民盟盟员，在重庆时期一起出席民盟盟务会议，参加各种政治性集会，从事民主活动。在经济学界，伍丹戈也有着广泛的人事联系。如王亚南和郭大力虽远在厦门大学执教，但均为伍丹戈所尊敬的经济学界的前辈，全面抗战前在上海时期即相识。特别是王亚南，成为《时与文》撰稿最多的作者之一。

张明养（1906—1991年），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原名良辅，笔名张弼等，早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上海法政大学，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25年在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去联系；1935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面抗战期间，在香港参加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工作；战后参加上海“大教联”，任理事；新中国成立前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东方杂志》编辑，《学生杂志》主编，《世界知识》、香港国际新闻社、《华商报》编委会委员，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文摘》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学生》《进步青年》主编等职。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张明养同志生

平》，见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在《时与文》群体中，张明养[注]是另外一个关键人物。程博洪与张明养同为国际问题研究者，在重庆时即相识，复员后又共同执教复旦大学政治系，程博洪创办《时与文》得到张明养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充分利用出版社、刊物、学校、学会、党派的关系纽带，将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叶圣陶：《我与商务印书馆》，转引自戴文葆：《集专家教授编辑于一身——张明养编辑生涯述略》，见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第95页。

胡愈之（1896—1986年），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伏生，浙江上虞人。1911年入绍兴府中学堂学习，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五四运动时，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1920年和沈雁冰、郑振铎等成立文学研究会。“四一二”政变后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初回国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筹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杂志。1935年与沈钧儒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会。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

张明养在一篇回忆胡愈之的文章中曾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不仅在编辑业务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得到他热诚帮助，获得很大收获。”转自戴文葆：《集专家教授编辑于一身——张明养编辑生涯述略》，见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第96页。

“苏联之友社”成立于1933年秋，是一个由中共地下党员发起成立，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团体，主要由中共党员和社会各界的左翼人士组成，著名的如胡愈之、钱亦石、钱俊瑞、金仲华、沈志远、张仲实、张明养、毕云程、王纪元、曹亮、章乃器、聂耳、柳湜、艾思奇等人，是中共的一个外围组织。

戴文葆：《集专家教授编辑于一身——张明养编辑生涯述略》，见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第102页。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因苏联拆走东北机器设备和撤兵问题，重庆发生了“反苏大游行”。在围绕要不要游行的问题上，国共两党通过各自在高校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复旦大学泰国侨生庄明三创办壁报《谷风》，反对“反苏游行”。三青团学生将壁报撕下，强行拖走庄明三，并强迫其跪在校门口的国旗旗杆

下。刚刚上完课的洪深教授见状怒不可遏，喝止了这一残暴行径，却遭致暴徒学生的殴打。张明养教授也正好下课路过，一边怒斥暴徒一边赶忙将洪深教授护送到教师休息室。“谷风”事件在重庆教育界和民主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事件发生后，张明养挺身而出，在教授之间奔走联系，其妻娄朗怀亦在教授家属之间进行串联，征得几位进步教授的同意，要求学校召开教授会，决议发表宣言抗议少数学生的暴行、惩办凶手、向洪深教授道歉。经过张明养的积极活动和教授会的努力，“谷风”事件顺利解决。参见吴佟：《怀念明养老师》，见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第51—52页。

葛志成：《深深的缅怀》，见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第8页。

从1930年至1942年，张明养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近13年之久。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是上海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心，与上海的知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创办的出版机构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其骨干大多是从商务出来的。[注]在商务，张明养不但结识了胡愈之、周建人、章锡琛、郑振铎、周予同、叶圣陶、茅盾等一大批商务同人（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开明书店的骨干），尤其通过《东方杂志》，张明养很快融入上海的社会科学界并迅速崛起。以商务印书馆为核心，张明养的社会交往范围逐渐拓展，其中，离不开胡愈之[注]对他的帮助和提携。[注] 1933年，张明养在胡愈之介绍下参加“苏联之友社”，[注]与胡愈之、沈志远、毕云程、金仲华、钱亦石、张仲实、王纪元、曹亮、章乃器等人经常聚会，讨论国际问题。1934年，以“苏联之友社”为基础，张明养协助胡愈之共同发起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自始至终担任刊物的编委，[注]与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关系亦相当密切。全面抗战期间，张明养随商务迁至香港，应胡愈之邀请担任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的编委。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张明养于1942年应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和新闻系主任陈望道邀请，离港赴渝，回母校任政治系教授，兼任《文摘》编委。由此张明养与教育界特别是来自上海的教育界人士广泛接触，特别是“谷风”事件，[注]让他一举成为教育界著名的民主教授，与复旦大学进步教授如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洪深等一起活跃在民主运动中。抗战胜利后，张明养随复旦大学复员回到上海，继续任教于政治系，兼《文摘》编委，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学生社团“政治科学研究会”的指导教师，积极支持学生运动。1946年，张明养与张志让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并一度担任干事，与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广泛联系起来。依靠在新闻出版界的影响力，张明养又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关系密切，与民进的骨干成员如周建人、徐伯昕、李平心、冯宾符、董秋斯等人有很深的私交。[注]

就来源地而言，《时与文》群体由三股人组成（见表8-5）。

表8-5 《时与文》群体成员

来源地	人　员	
昆　明	周天行、楚图南、夏康农、程应镠、郭森麒、冯契	
重　庆	复员回上海	伍丹戈、张明养、周谷城、漆琪生、施复亮、周伯棣、林焕平、沈志远、石啸冲、孟宪章、杨卫玉
	新进入上海	程博洪、汤德明、陈旭麓、翦伯赞、吴泽、杨晦、沈钧儒、臧克家、林沧白
留守上海	马叙伦、周建人、蔡尚思	

虞云国、严耀中、范荧：《晚于青史识苍凉——程应镠传》，见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由昆明进入上海的知识分子中，程应镠是一个关键人物。程应镠与周天行（经济系）、郭森麒（经济系）、冯契（清华研究所）为西南联大校友，与楚图南、冯契为同事，又与夏康农、楚图南同为民盟盟员。抗战全面爆发后，程应镠曾赴延安参加抗日工作，与已在延安的冯契相识，不久，二人先后回昆明入西南联大就读。在学校里，程应镠是校园文学中的活跃分子，参与创办联大的第一张壁报，与学生社团群社关系密切，而周天行曾任群社社长，两人颇为熟稔。1944年夏秋之际，程应镠进入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助教，适逢冯契毕业亦来此任教，系主任即为楚图南。程应镠与冯契又同在昆明私立天祥中学兼课，交往颇为相得，尤其是在1946年天祥中学迁校过程中，配合默契。此一时期，程应镠与民盟往来较多，曾受吴晗邀请数次参加民盟邀集的座谈会。《民主周刊》发行后，程应镠写过《一二·九回忆》和《一个十九岁的上等兵》等文章，交给闻一多拿去发表。[注] 1946年，程应镠兼任天祥中学的训育主任，邀请闻一多来演讲并在他家进餐。1946年4月，他在闻一多介绍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被暗杀后，有传言程应镠也上了黑名单，于是他匆匆逃离，于1947年2月到达上海，任教于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

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成立于1938年初，是中共为了适应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而创办的一个教育性质的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中共地下党员，邀请滞留上海的各界知名学者担任教员，如周谷城、周建人、吴清友、郭绍虞等，培养抗战人才，被称为上海的“抗大”。它实际上是中共干部训练班，也是中共进行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讲习所共举办四期，后来由于局势恶化，于1939年七八月间停办。参见徐达：《孤岛时期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见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98页。

可参见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256页。亦可参见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76页。

在重庆市区，有三个地方成为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活动中心：张家花园65号的“文协”、官府巷4号郭沫若的家和7号他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一路101号的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且相距很近。从张家花园登上百十级台阶左转不远，就是中苏文化协会，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也在张家花园。在重庆郊区，自由知识分子则以北碚为中心形成另外一个比较密集的交往群落。北碚位于重庆市郊，附近有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其他许多文化机构，专家学者很多。距此不远为赖家桥，是“文工会”在乡驻地，每年夏天郭沫若从城内来此地消暑，住在这儿的还有郑伯奇、杜守素和白薇；歇马场亦在左近，乃翦伯赞的居所，章伯钧、邓初民为之邻，朝阳大学、乡村教育学院也在歇马场；王昆仑、曹孟君夫妇和侯外庐全家则住在二三华里之外的白鹤林；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也距此不远。可参见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7期；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8—79页。

在《时与文》群体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有长期居住上海或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也就是说，在抗战胜利复员之前他们之间就有频繁的往来。至于那些新进入上海的知识分子，通过全面抗战时期桂林、昆明或重庆时期的交汇融合，也与来自上海的各界人士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长期居住上海的如施复亮、周伯棣、周谷城、伍丹戈、张明养、周建人、蔡尚思、林焕平、沈志远、石啸冲、孟宪章、杨卫玉等人，在全面抗战前即有多方面的接触，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抗日民主运动中，时常会面，密切合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一些知识分子滞留上海，如周建人、蔡尚思、郭绍虞等人，面对险恶局势，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互通消息，相互扶持，并肩作战，如参加中共创办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注]参加秘密出版团体“复社”及其聚餐会等，还常与开明书店同人相聚，“以大饼或生煎馒头或烘山芋当午饭。仿佛又恢复了学生时代的生活”，“彼此苦笑，但也不以为苦”，相濡以沫，结下了深厚的患难情谊。[注]而转赴内地的知识分子则先后聚集重庆。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是自由知识分子群聚的一个中心，专家汇聚，学者云集。他们通过以高校（以复旦大学为代表）、学会（以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会、中苏文化协会为代表）、党派（以民盟为代表）、新闻出版机构（如生活书店）等社会组织形成的关系网络，在生活和工作中来往频繁。[注]如翦伯赞，他的正式身份是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的专任委员，同时又是“中苏文协”理事兼其机关报《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政协时期还曾担任民盟代表团顾问。作为历史学者，翦伯赞活跃在民主界、社会科学界，与教育界的进步人士亦联系紧密，如应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邀请在复旦演讲，应陶行知之邀在育才学校授课，与邓初民、侯外庐帮助陶行知创办夜大学等。他们在重庆建立起来的联系随着抗战后的复员，也被带到了上海。

无论是来自重庆、昆明还是留守上海，《时与文》的作者之间有着多重联络渠道，相互之间渊源极深。从学缘上说，周谷城、楚图南、夏康农、孟宪章、沈炼之

为北师大（北京高师）校友；程博洪、汤德明、周天行、郭森麒、程应镠、冯契均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蔡尚思、石啸冲为北京大学校友；施复亮、周伯棣则为浙江一师同学。就职业关系而言，程博洪、周予同、周谷城、伍丹戈、周伯棣、漆琪生为复旦大学同事；钱实甫、郭绍虞、冯契共同执教同济大学；吴泽、陈旭麓、石啸冲、林焕平、翦伯赞、郭森麒则一起在大夏大学任教，且吴泽、翦伯赞、陈旭麓同在历史系，吴泽为历史系主任；孟宪章、笪移今任教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沈钧儒、楚图南在上海法学院，夏康农、杨晦在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郭森麒、汤德明在立信会计，蔡尚思、徐中玉则在沪江大学。他们在上海各大高校任教，除了上课时可以碰面外，住在校内的同事还可以互相探望，颇多私人往来，如夏康农与杨晦都住在上海幼师，且是左右邻居，时相往来。就社会身份而言，《时与文》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党派背景，如汤德明、周天行、冯契、翦伯赞、许杰、郑伯奇、吴泽、宦乡为中共党员，翦伯赞为吴泽的入党介绍人；沈钧儒、施复亮、孟宪章、沈志远、夏康农、伍丹戈、沈炼之、程应镠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施复亮、漆琪生、伍丹戈、杨卫玉又为民主建国会会员，孟宪章又是九三学社社员，而马叙伦、周建人、张西曼则为民主促进会成员。同时，他们又是其他团体的成员，如翦伯赞、蔡尚思、张西曼为中苏文化协会会员，伍丹戈、宦乡、吴清友同为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马叙伦、翦伯赞、周建人、蔡尚思为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会员，而《时与文》群体中一半都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会员。可见，《时与文》群体之间既有社会结构性的联络方式，也有由此衍生出的无形的联结纽带，既有公共的社会交往，同时也存在频繁的私人往来，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在《时与文》群体当中，施复亮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

关于施复亮的生平资料可参考王水湘：《施复亮传》，见金华县政协教文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华县文史资料》（第10辑），1999年。

《时与文》以提倡“中间路线”而闻名，施复亮是主张“中间路线”的领军人物，因此，可以说施复亮是《时与文》群体的精神领袖。施复亮（1899—1970年），原名施存统，浙江金华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早年就读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与傅彬然、周伯棣及沈乃熙（夏衍）、宣中华等为同学。五四运动中，以《非孝》一文惹怒政府当局，被学校开除。1920年与陈独秀等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赴日求学，回国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工作，当选团中央书记，后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任教；1927年宣布退党。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大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民国大学、广西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辗转来到重庆，经朋友介绍任职于四川银行经济研究处，任处长；抗战后胜利后回到上海，因受国民政府迫害，以写稿谋生。1945年参与创建民主建国会，任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注]

关于施复亮早年对中间道路的思考和实践可参见宋亚文：《施复亮政治思想研究（1919—1949）》，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235页。

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载《时与文》1947年创刊号。

施复亮是著名民主人士。虽然大革命后退出了共产党，但不久亦同国民党决裂，从而开始了中间道路的艰难探索。[注]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实践，特别是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失败、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施复亮迫切感到广大中间派民主人士必须行动起来，在国共之外寻求新的道路。由此，“中间路线”的提出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时与文》创刊前不久的2月份，国民党驱赶了中共驻北平、上海的代表团人员，和平之门从此彻底关闭，国家陷入无边的硝烟和炮火当中。1947年3月14日，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撰文，提出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阶级和党派关系上进行了概括和阐述。[注]张东荪随即在《时与文》上发表了《和平何以会死了》（以及《观察》周刊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与之相呼应，进行声援。马叙伦、伍丹戈等作为反对派，对中间路线提出疑问。由此，一场关于“中间路线”的争论在民主党派人士之间展开。

施复亮：《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载《时与文》1947年第1卷8期。

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载《时与文》1947年创刊号。

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载《时与文》1947年第1卷5期。

施复亮将“中间路线”概括为“调和国共”“兼亲美苏”和建立“联合政府”三个方面，[注]并从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他认为，中间派所主张的政治、经济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在阶级关系上，工人应与贫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注]他特别提醒广大中间派的自由知识分子，实践“中间路线”的前提是和平的国内环境，因此，中间派坚决地反对内战；但是，要区别对待内战双方，且谁站在人民的立场，谁站在反人民的立场，谁是进步的，谁是反动的，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注]

“中间路线”的提出，表明以各民主党派为主体的广大中间派民主人士不满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与共产党的纲领、路线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国共争斗不止的危难时刻，提出中间派人士联合起来共同领导中国前途的呼吁，从而委婉地表达了重返政治舞台中心的愿望。

3．《时与文》群体与“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关于“大教联”有不同的名称，如“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张明养同志生平》，见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第

2页）、“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娄朗怀：《怀念老伴张明养》，见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第85页）、“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等。准确的名称应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可参见蔡尚思：《上海大教联与信史实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另外，战后的上海还有两个教授组织，一为“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简称“联合会”），是由上海市党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会员大部分为具有国民党身份的教授，也有不少不明真相误入的；另一个是以“超然派”相号召的“上海大学教授会”（简称“教授会”）。可参见蔡尚思：《上海大教联的组织状况和斗争方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第388页。

张志让（1893—1978年），号季龙（幼时号季隆），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早年曾在北洋政府部门任职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兼课；1927年受“大革命”形势吸引奔赴武汉，因其堂弟张太雷之介，入武汉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工作；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毅然离开武汉回到上海，以律师行世。从1932年春开始，入复旦大学担任法律系主任，后兼任法学院院长；1936年曾为“七君子事件”律师团首席辩护律师；“七七”事变后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沪赴汉，任武汉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科长，后转到广西，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做宣传组长，并受聘担任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又因千家驹之介在广西大学兼课。1941年冬，离开桂林回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法学院院长并兼任校办刊物《文摘》的总编辑；1944年与黄炎培、杨卫玉共同创办《宪政》月刊，任总编辑，并主持月刊社每月一次举办的“宪政座谈会”。1946年夏随校迁返上海，与蔡尚思、周予同、沈体兰一起发起创立“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积极投入民主运动。1949年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不久当选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张志让：《张志让自传》，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注]（简称“大教联”）是上海市各大高校进步教授联合而成的一个民间团体，中共外围组织，在中共上海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大教联”是由张志让[注]倡议并邀集其他几个人共同发起的。张志让是这个教授群体中的灵魂人物。

张志让：《张志让自传》，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10页。

蔡尚思：《上海大教联与信史实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在离渝赴沪前，张志让就常常想到：“各高等院校的左派和态度居中的教授，组织起来，也是一股力量，可以发生一定作用。”[注]于是，张志让在回到上海后，

约请了几个政治色彩不是很浓又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大影响力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了“大教联”。1946年秋9月，“大教联”宣告成立，发起人为张志让、蔡尚思、周予同和沈体兰四人。沈体兰为干事兼召集人，李正文为干事兼秘书，张志让为干事兼会计，蔡尚思为干事。其会员最多时达到108人（参见附表5、6）。[注]

蔡尚思：《上海大教联的组织状况和斗争方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第389页。

张志让：《张志让自传》，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10页。

“大教联”的最高组织是干事会，由会员大会选举7人，最多不超过9人，经常任干事的有张志让、沈体兰、蔡尚思、曹未风、周谷城、许杰等人，其他如夏康农、吴泽、郭绍虞、张明养等，均担任过干事。[注]“大教联”还附设一个文化研究所（简称“文研”），常委有张志让、沈体兰、曹未风、郑太朴、蔡尚思，委员有李正文、翦伯赞、萧子风、许杰、吴逸民、孙大雨等人。[注]“大教联”的联络方式主要是聚餐会，通过发表集体宣言、以个人身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参加演讲、举办讲座或学习会等方式展开民主运动。集体宣言一般由张志让执笔，征集会员签名后送往《大公报》等报刊发表。“大教联”几乎集中了上海教育界所有的进步分子中的精英人物，他们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大教联与上海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如与教育界的中等教育研究会、小学教师联谊会、大中小学教师团体联合会、工商界、民主党派等都有联系。由于大学教授普遍经济有困难，“大教联”的活动经费也经常短缺，多次得到工商界人士的帮助。此外，“大教联”还与“上海学联”取得了联系，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甚至有的会员加入学生队伍，亲自参加游行示威等运动。

黎缇维：《纪念〈资本论〉研究者漆琪生同志》，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1991年，第144页。

对比《时与文》与“大教联”，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时与文》的主编为任教于复旦大学的程博洪。程博洪充分利用复旦大学的师资优势，积极为《时与文》征集稿件。最初几期的文章多出自复旦教授之手。“大教联”最初的倡议者为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在“大教联”成立之前，张志让曾在复旦内部组织了一个“周末纳凉会”，召集复旦教师中的进步分子聚谈，[注]程博洪亦多次参与此会。“大教联”最初的成员有三十几人，大多是复旦大学文、法学院的教授。因此，《时与文》和“大教联”都与复旦大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张志让又是程博洪的上级领导，从此也就不难看出《时与文》与“大教联”的渊源。再分析《时与文》群体成员和“大教联”的会员组成，会发现《时与文》群体中21人为“大教联”会员，如果除去不在上海的郑伯奇、张西曼、樊弘、吴晗、张东荪、曾昭抡、

王亚南、郭大力八人，所占比例会更高。其中张明养、周谷城、翦伯赞、蔡尚思、许杰、吴泽等人均曾为干事会干事，在《时与文》群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时与文》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大教联”的会刊，是“大教联”会员的舆论阵地。而通过“大教联”这一中介，《时与文》群体亦将其社会联系和影响力不断拓展，深入上海各界。

4. 《时与文》群体与上海社会各界

上海不但高校众多、工商银行业发达，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中心、民主党派集中地，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众多，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民间社会较为发达。因此，上海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就拥有了多重身份，很难将他们归入某个社会领域。例如《时与文》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张明养。他既是复旦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中等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也是《世界知识》杂志的编委、多个报刊的撰稿人、“大教联”的干事，与民主促进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最终加入了该党派。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时与文》群体与上海各界都有着广泛的联系。

《时与文》群体与上海新闻出版界的联系最广。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是《时与文》的撰稿人，同时也参与编辑其他刊物。如郭绍虞是开明书店的编辑，与叶圣陶共同主编《国文月刊》；夏康农与章伯钧、邓初民主编《大学月刊》；周建人主编《新文化》半月刊，同时也是生活书店的编辑；臧克家为《侨声报》副刊编辑，后来又接替白寿彝主编《文萃》，亦为星群出版社的主持人之一；杨卫玉则主编《展望》并为《国讯》的编委；石啸冲主编《文汇周报》；宦乡为《文汇报》副主笔，又协助友人编辑《新中华》月刊等。其中，《文汇报》与《时与文》的关系最为密切。

《文汇报》的副主笔宦乡，是给《时与文》撰稿较多的作者之一，尤其在1947年5月《文汇报》被查封后，宦乡将《时与文》作为最主要的发言阵地。《时与文》的作者杨晦是《文汇报》副刊《新文学》的主编、李平心是《新青年》的主编。《文汇报》副刊《文化街》的主编陈钦源后来成了《时与文》文艺栏目的主持人。另外，《文汇报》每月举办一次“时事座谈”，以政治、经济、教育、时局等为主题分期举行，参加座谈的大多为上海各界著名人士，其中不少是《时与文》作者。《大公报》亦定期举办时事座谈会，如1948年4月29日，蔡尚思、任鸿隽、张志让、周建人、沈体兰、杨晦、夏康农等出席了《大公报》第20次时事座谈，题目为“德先生与赛先生”。

《时与文》群体成员大多具有民主党派身份，有的甚至即为某党派的领导人物，如施复亮既是《时与文》群体的精神领袖，也是民盟盟员、民主建国会的常务理事。民主党派经常邀请一些党外的专家学者举办演讲或座谈，有时也邀请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列席党内会议，而《时与文》也成为这些民主党派发表政见的地方。此

外，《时与文》的作者还经常接受工商银行界邀请，参加其举行的聚餐会，“大教联”的张志让、李正文等人也经常通过“大教联”邀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为工商银行界举办演讲或座谈。《时与文》群体中的许多人都参加过类似活动，如伍丹戈、张明养、周建人、杨卫玉等。民主党派的组成都各具特色，民主促进会会员多新闻出版界人士，而民主建国会中经济学界和工商银行界人士较多。因此，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工商银行界与民主党派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此外，《时与文》群体多为上海各大高校的进步教授，他们不但是学生的授课教师，也是学生运动的指导者和支持者，经常参加学生举办的座谈、演讲等各项活动。

关于“反美扶日公断会”的情况，可以参见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5页。

以高校教授为主体形成的《时与文》群体，其社会交往深入上海各界，并与各界人士一起，相互支持，当他们与学生运动联合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这一点在交通大学的“反美扶日公断会”[注]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5．《时与文》群体与《观察》群体

《停刊告别读者》，载《时与文》1948年第3卷第23期。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载《观察》1946年创刊号。

《时与文》与《观察》都在上海出版，但是二者却有着极大的区别。首先，从刊物的发言态度看，《时与文》坚持“进步、独立、理性、坚定”的言论立场，重点突出“进步”，认为“进步”是刊物的第一要点，“‘进步’笼罩、环绕并且撑托着《时与文》。‘进步’乃本刊的灵魂以及全部精力所寄，‘进步’是我们看事看物发表主张的出发点”。[注]而《观察》则秉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注]重点强调“自由”和“理性”。刊物的不同精神面貌吸引了不同类型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不同的言论要求也在筛选不同的自由知识分子加盟刊物，由此就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林元：《从〈观察〉到〈新观察〉》，见氏著：《碎布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399页。

《时与文》与《观察》群体都是以大学教授居多，从教育背景看，《观察》群体多留学欧美，且绝大部分接受了完整教育并获得了学位；《时与文》群体大多未接受国外教育，在有留学经历的人当中也以留学日本为多，且很多人仅为听课或短期深造，并未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各专业领域有一定建树的学者，完全是自学成才。由此，就不难理解，《观察》撰稿人多为著名高校特别是北大、清华、燕京这样的国立大学教授；而《时与文》群体多在上海私立高校任

教，即使复旦大学，也是刚刚被批准为国立大学不久，无论声誉还是实力根本无法与北大、清华相比。从社会身份比较，《观察》群体多为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而《时与文》群体成员大多为民主党派人士，还有一些是中共党员。就政治主张而言，《观察》群体要求宪政民主，向往英国式工党政治体制；《时与文》群体也要求实现民主政治，但倾向于东欧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从政治倾向性上说，《观察》群体反对一切形式的内战，对国共各打五十大板，自始至终，未改变这种态度；《时与文》群体亦呼吁和平，但对国共却区别对待，尤其是随着自身生存空间的紧缩及战场上国共力量的消长，他们从最初的反对内战，到后来的理解、同情甚至支持共产党将战争进行到底。1948年10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南下、节节胜利、势如破竹，毛泽东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蒋介石却企图借所谓“和平谈判”进行修整的时候，《观察》于22日刊载了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一文。此文一经刊出，即遭到上海民主派人士的激烈批评。施复亮请笪移今向储安平转达他的意见，笪移今约施复亮与储安平会面长谈，施复亮指出“该文是和共产党政策撞头的”。[注]

《储安平致傅斯年》（1947年1月13日），见杜正胜、王汎森：《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转引自谢泳编：《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第279页。

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载《观察》1947年第2卷第14期。

《时与文》群体与《观察》群体皆为言论参政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但二者产生力量的方式却有很大不同。作为《观察》主编的储安平，他与上海的自由知识分子一直刻意保持距离，并有淡淡的抵触情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他写道：“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而一时无法可想。我们又不能在上海随便找些人叙会；这是我们主要的苦痛。”[注]后来，储安平对上海的《文汇报》公开提出批评：“我很坦白地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我不常看《联合晚报》），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注]正因为此，储安平从未主动融入上海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然也就无法从中获得支持。因此，《观察》与上海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正是由于自身的局限，《观察》与大学无关，与社会团体无关，也与党派组织无关，它的舆论仅仅依靠撰稿人和编者的共同努力生产，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精神力量，只有经过漫长的“思想影响”工作，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而《时与文》则不同。《时与文》的作者不仅仅是《时与文》的撰稿人，同时也分属于其他各种团体和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时与文》的作者同处于上海，共享一个城市空间，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关系网，但彼此交叉融会，具有多层的交流渠道，因而，也就更容易产生力量，且是实实在在的力量。

三、

胡适与《独立时论》群体

郑林庄：《胡适反动思想对我的影响》，载《光明日报》，1955年2月1日。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作为中国自由主义领袖的胡适，身边始终围绕着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的《独立评论》，聚集了一帮声气相合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吴景超、何廉、周炳琳、陈之迈、张奚若、陶希圣、汪敬熙、萧公权、陈岱孙、顾毓琇、徐炳昶、张佛泉、陈序经、郑林庄等，一时间，知识界赫赫有名的自由主义者纷纷加盟，创造了知识分子言论参政的辉煌。刚从美留学返国的郑林庄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中国目前的情形确很糟。政府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很失民心，社会上已失掉重心。但前途亦未完全悲观，因为像胡适这样一些学者已起来说话了。（指胡适所办的《独立评论》——引者注）"[注]可见，郑林庄将胡适和他的这些《独立评论》的朋友看作"一言兴邦"的人物。对于这段经历，胡适亦常萦绕入怀，魂牵梦绕。

1．胡适与"独立时论社"的成立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1946年7月，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就有朋友建议他恢复《独立评论》，胡适说："钱价一天一个样，等米下锅的学者不得不为了吃饭著文卖钱，且必须要付他们报酬。此外，劳动价上涨到排一千个字的人比写一千个字的人要得的报酬多。所以我们没办法出版一份真正的'独立'杂志来。"[注]胡适说的是实情，战后的知识分子普遍贫困，收入尚不如三轮车夫，三餐不饱，没有闲置资金创办刊物。自回国后，胡适对于时局问题一直保持沉默，避而不谈。

张佛泉：《悼亡友崔书琴先生》，见张其昀：《崔书琴纪念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97页。

1947年2月，国民党驱逐了中共驻北平和驻上海的代表团，国共彻底决裂。战场上，国共两党展开激烈的厮杀，在国统区也开始了对于知识分子的争夺，双方阵营分明，火药味十足，舆论界一片混乱。这时，张佛泉和崔书琴来找胡适商议，准备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发言阵地。但没有资金，创办一个经济完全独立的刊物已是不可想象的，《独立评论》也不可能复刊了，“这时我们便商议了一‘发稿’的办法。这办法的要点是这样的：我们先集合若干位作家，每人在指定日期交二千字短稿一篇；文稿打成若干份，分寄各地报馆，指定在某日一齐刊出；各报馆订购稿件，按月寄付定额稿费”。[注]胡适极力赞成这个方案。随后召开筹备会议，将这个“发稿社”命名为“独立时论社”，社址就设在崔书琴家中。1947年5月，独立时论社正式成立。

《储安平致胡适》（1947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0页。

当独立时论社成立的时候，创刊八月之久的《观察》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舆论重镇。在创刊前，储安平即函请胡适担任《观察》撰稿人，胡适未予回应。《观察》创刊后，储安平仍按期给他寄送《观察》。1947年1月21日，储安平再次致信胡适，详细介绍了《观察》的宗旨、态度以及编辑出版情况，请他担任撰稿人，并请胡适为《观察》第2卷第1期写一篇稿子。[注]这次，胡适答应了储安平的邀请，于是在《观察》第2卷第1期的封面上，胡适的名字赫然列在撰稿人的名单上。但胡适仍然没有给《观察》写稿。此后，储安平多次给胡适写信，并亲往北平晋谒，胡适始终没有给《观察》写稿。可以说，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并没有给战后最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观察》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而是将所有的文章交付独立时论社。

胡适的反常行为，与他八年的海外生活有关，也与他对国内局势的看法有关。1938年6月，国内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时刻，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些话：

李国钦兄从祖国飞回，来看我久谈。他告我国内形势，令人叹息。他说：“武人可算是尽了他们的责任，中国如不支，罪在文人。”此言可谓“一语破的”。

《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他说，国内士气还好，军士真可敬爱；最可叹的是一班文人至今不知大体，不能合作。[注]

《胡适日记全编》（7），第486页。

《陶希圣致胡适》（1945年4月3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16页。

《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5页。

《胡适日记全编》（7），第652页。

1947年7月7日，胡适在南京的《和平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说“政治党派争夺政治权力应遵循合法的方式去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用武力推翻政府并不是合法的方式而是一场革命。为自卫起见，镇压共产党的叛乱正是政府的义务。……因而，共产党的叛乱必须要予以镇压”。

此时，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站在了与国民政府相同的立场上。他认为，值当国家危亡时刻，知识分子应与政府合作，共渡难关，而不是喋喋不休地讥评政府。同时，在美八年，胡适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影响了他对国内时局的基本判断。1944年12月8日，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友人家听到南斯拉夫铁托游击队的事，联系欧洲法、比、丹、意、希腊等国最近发生的政府军与共产党游击队火拼的新闻，他认为：“这种事件最足以使我们明了这十多年的中共问题，及这十年的中共对日作战的问题的态度，及将来的中共问题。”[注]胡适认为，中国必须避免上述国家的悲剧，反共的思想逐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陶希圣的一封来信，更坚定了他的看法。1945年4月30日，陶希圣致信胡适，从十个方面阐述了战后中国即将面临的危机，每一条都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共，并指出，学术界是否能与政府合作，对于政府能否渡过此次危机至关重要。[注]由此，回国后的胡适自觉地与国民政府站在了一起。1947年初，胡适向傅斯年表明心迹：“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注]其实，胡适心中亦矛盾重重。他痛恨腐败的国民政府，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更为恐惧。因此，为了消除共产党的威胁，知识分子必须与政府合作，不能一味地指责政府。4月，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注]到1947年10月，胡适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国民党“剿”杀共产党，[注]终于偏离了自由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

《独立时论·序》，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刊行。

《观察》自创刊始即对国民党进行激烈的批判。从内心来讲，胡适是欣赏《观察》的批评立场的。但就现实而言，则无法认同。于是，尽管储安平不断诚恳地请求，胡适始终未给《观察》写文章，而是另外组织《独立时论》，针对时事发表评论，“很希望我们的意见能够有助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及科学的进步”。[注]这种看似温润客观的言论，实际上是给予政府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2．胡适与《独立时论》群体

1947年9月10日，崔书琴致信胡适：“昨天谈到请外埠名家为我们写稿的事情，我现在拟好了一个信纸，您如果认为妥当，就由您具名专函邀请，发给什么人请您自己决定。信打好后请您签名寄来。”在《胡适遗稿和秘藏书信》中还录有“独立时论社征稿启事”一则：“××先生：我们北大清华各校的朋友们最近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寄发文稿到全国各地报馆同日发表。四个月来，成绩还算不错。现在与我们合作的共有二十五个城市的三十九家日报。这些日报拥有的读者合计起来要有好几百万人。每篇文稿除去用费及本社公积金外，可以有七十万的稿费。我希望××先生也能参加我们的工作。每隔两个月寄一篇时论文章来。篇幅以二千五百字最为合宜。文章如果富于时间性，请用最快的方法寄给我们，我们的社址是：北京景山东街东老胡同五号。敬祝　健康”。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543、545页。

《独立时论》是由胡适、张佛泉、崔书琴、王聿修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的。具体的工作由其他几人负责，胡适出面邀请知识分子加入。[注]先后加入独立时论社的知识分子有四十多人，他们大多为北平各大高校的教授、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有外地人士。胡适依靠其强大的影响力，将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团结在独立时论社中，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见附表8）。

胡适是《独立时论》群体的灵魂。

［美］唐德刚：《“我的朋友”的朋友》，见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121—123页。

在中国近代自由知识分子中，胡适是一位“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无论是从教、办刊还是从事其他事业，他总能聚拢一大批知识分子；每到一地，他总能交到许多朋友，“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

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底‘朋友’！”作为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唐德刚对胡适的社交才能有过精微的解释：“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注]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是“上帝的礼物”（gift from God），不是可以用修养功夫修养出来的，加之胡适绝顶聪明，兴趣的范围广，欣赏（taste）的境界高，因此他在各行各业里所交游的都是些尖端人物。

《丁声树致胡适》（1945年9月19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9页。

《郑天挺致王世杰》（1947年12月14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89页。

胡适之所以能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除了他的“卡里斯玛”气质外，更重要的是来自他学术、思想上的成就。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白话文运动则使他成为思想界的先驱人物，特别是在战后，当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袖日渐凋零，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逝世，周作人变节，胡适成了硕果仅存的人物。“独立时论”的成员绝大部分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不断回忆、解释，是他们认同的基础。在《独立时论》群体中，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伴随着《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一起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身上，或深或浅都打上了胡适思想的印记。他们对胡适很是推崇，如胡适的学生丁声树赞誉胡适：“先生的学风，先生的襟度，其肫笃伟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拟，而治学方法的感人之深，我敢说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得上，——三百年前的非科学时代无论矣。”[注]郑天挺则形容胡适为北方学术界所倚靠的“长城”。[注]

在教育界和学术界，胡适掌控或能施以影响的学术资源之多是其他人无可企及的。胡适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深董事、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中央研究院是由胡适及其朋友们掌握的。同时，胡适也有复杂的权势网络，与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都有不错的交情，他的朋友如蒋孟麟、翁文灏为国府政要。胡适返国后，国民政府频频邀请胡适入阁，从驻美大使到教育部长、国府委员，到行政院院长，甚至是总统候选人。胡适的名字和国民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各大媒体所关注。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载《史林》1998年第1期。

凡此种种，使胡适拥有了巨大的象征资本。象征资本是一种信誉，它授予那些被公认为可以影响公共舆论的人。就此而言，象征资本是一种建构的权利，一种通过社会动员构成群体的力量。[注]

在《独立时论》群体中，大多人与胡适有着这样那样的渊源，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可参见季维龙：《胡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见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6—144页。

千家驹：《千家驹论胡适》，见［美］唐德刚：《书缘与人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首先是胡适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如陶孟和、胡先骕、燕树棠等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任教于南京高师的胡先骕曾与胡适争论“新诗”问题，被称为“南北二胡”，不打不相识，二人从此成了好朋友。陶孟和与胡适为北京大学老同事，胡适创办《努力周报》，陶孟和是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陶孟和受聘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创办社会调查所。从1927年6月起，胡适长期担任中基会董事，以后相继兼任过秘书、名誉秘书、代理干事长、干事长等职，与陶孟和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注] 1932年，胡适介绍北大学生千家驹去陶孟和那里工作，陶孟和听说千家驹是北大的捣乱头子，还可能是共产党，便有些犹豫。胡适说，捣乱和做研究是两码事，你一个研究所，怕他捣什么乱，这才打消了陶孟和的顾虑。[注]可见，两人私交非比寻常。在胡适出掌北大后，陶孟和积极为北大延揽教师，如北大经济系的樊弘教授就是他介绍的。

参见邓广铭：《胡适在北京大学》，载台湾《传记文学》2000年第76卷第3期。

“受业辱承不弃，屡荷提携，心时感之。联合国博物馆工作既可得经验又可赴欧参观，实最好之教育机会。承先生提携，尤为感激。”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56页。

第二类为得到胡适赏识、提携的学人，如毛子水、汪敬熙、沈从文、冯至、张佛泉、韩寿萱、杨西孟等。胡适爱才，遇到可造之才时，会予以无私的帮助。胡适刚任教北大时，有一次在北大校刊上看到一篇署名毛准的文

章，是从文学、音韵学角度解释《诗经》的。胡适大为叹赏，经调查发现作者是一个数学系的学生，深感惊讶。此后，毛准（即毛子水）经常出入胡适寓所。后由胡适推荐赴德留学，回国后由胡适邀请到北大任教，还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这时，毛子水仍然是胡适的座上客，以至于有人戏称他为“胡宅行走”。[注]沈从文早年深得胡适赏识，他能入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稿子，都是通过了胡适的关系；还通过胡适介绍结识了大批学者和教授，是胡适派学人中的重要成员。韩寿萱是北大毕业的学生，抗战时期由胡适推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辅助美国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的工作（当时胡适任驻美大使），后又经胡适推荐到联合国博物馆工作。[注]韩寿萱对胡适的提携深为感激，当1947年胡适决定在北大增辟博物馆学职业专科时，韩寿萱应师命回母校效力。杨西孟亦出身北大，1947年4月，胡适帮助他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到美国进修，对胡适他一直以学生自称。

可参见郑林庄：《胡适反动思想对我的影响》，载《光明时报》，1955年2月1日。

可参见陈友松：《检查胡适在教育方面的反动影响和胡适思想对我的影响》，载《人民教育》1955年第1期。

第三类为受胡适影响并服膺其思想的学人，如郑林庄、陈友松等。30年代，胡适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成长。到1940年代，这些人都处于青壮年时期，在胡适的邀请下，纷纷加入独立时论社。如郑林庄从中学起就受到胡适的影响。《新月》时期，郑林庄是燕京大学的大三学生，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提倡“集合全国人才，采用科学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的社会改良主义对他影响极大，后来郑林庄参加“农村建设训练课程”就是实践胡适的这种思想。[注]胡适办《独立评论》时，郑林庄是重要的撰稿人之一，成为胡适派学人中的一员。再如陈友松。中学时期，陈友松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易卜生主义》，曾以“我”为题在日记中写了大量的打油诗，如“我想我之为我不是我，我想人想我之为我不是我，我之为我我才是我，我不是我的我，我是社会的我，我信我有许多我，我是长流无限”。1927年，陈友松从菲律宾师范学校毕业，入商务印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与胡适偶遇。胡适亲手写了一个屏条“必须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送给陈友松。陈友松回忆说，“这个屏条多年成了我的座右铭”。[注] 1932年左右，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接触到了一些介绍苏联的书籍，如《苏联对美的挑战》《苏联的教育》《苏联的人之初》等，对社会主义的苏联产生了很大兴趣，还曾到纽约共产党宣传机关阅读国

际出版社的红色读物，并结识了冀朝鼎，遍读他书架上的马列主义书籍。此时，陈友松又遇到胡适，“再度受他的影响而右转了”。而且，当时陈友松在哥大系统研究了杜威主义，与胡适有了共同的思想渊源。所以，在1947年，胡适创办独立时论社的时候，陈友松再一次跟从胡适。

第四类为受聘进入北大任教的学人，如邓嗣禹、蒋硕杰、吴恩裕、王铁崖、楼邦彦等。

张佛泉：《悼亡友崔书琴先生》，见张其昀：《崔书琴纪念集》，第97页。

张佛泉：《悼亡友崔书琴先生》，见张其昀：《崔书琴纪念集》，第98页。

赵迺抟：《赵迺抟自述》，见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可参见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40、541页。

在《独立时论》群体中，崔书琴、张佛泉、王聿修、赵迺抟、毛子水、汪敬熙等人是核心人物。崔书琴、张佛泉、王聿修与胡适同为独立时论社的发起人。崔书琴、张佛泉、王聿修三人任干事，崔书琴负责编辑和执行业务的工作；[注] 1948年崔书琴辞去北大教职，赴南京就任立法委员后，由张佛泉接替其发稿的工作；王聿修则兼做会计，[注]由于工作比较繁复，赵迺抟也承担了部分工作。[注]在独立时论社，张佛泉、崔书琴与胡适的交往最为频繁。他们不仅一起创办独立时论社，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和参加“平津市民政治促进会”的活动；战后胡适唯一的文集《胡适的时论》，也是由崔书琴建议并与张佛泉共同负责联系安排出版的。[注]张佛泉在《独立评论》时期就是胡适派学人中的核心成员，得到胡适的诸多提携和帮助，是《独立评论》后期的实际负责人；崔书琴与张佛泉为哈佛大学同学，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同事，且同在政治学系任教，私交甚好。赵迺抟出身北大，胡适是他大学时的老师，1930年赵迺抟回母校任教，与胡适又成了同事；汪敬熙毕业于北京大学，也是胡适的学生辈，他出国留学是胡适推荐的。他们中除王聿修外，均在北大任教。其中，崔书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崔书琴（1906—1957年），河北故城人，生于天津；1927年加入国民党；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旋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34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返国，任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后任教于中央政治学校；

抗战期间执教于西南联大；1946年随北大复员回到北平；1948年夏辞北大教职，赴南京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湾。

《罗常培致胡适》（1946年4月24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02页。

夏济安：《记崔书琴先生对于国事的态度》，见张其昀：《崔书琴纪念集》，第73页。

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载台湾《传记文学》1985年第46卷第1期。

崔书琴热衷于政治，罗常培曾说他是“专给CC作耳朵的”，[注]夏济安则惋惜地说：“假如崔先生安心做他的教授，研究他的政治学和国际公法，少为实际政治操心，他可能再活二十年。”[注]在1947年国民政府参议员选举和1948年的政府“行宪”中，他和胡适都属于比较活跃的学院派自由知识分子。崔书琴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据邓嗣禹回忆：“他是国际公法专家，是非正式的国民外交部长，平津政学商各界人士，他认识得很多，联络得很好。去平津做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他跟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等，尽量帮助，使他们居之安，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崔书琴与平津教育界人士也有着广泛的联系，“下午三、四时许，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饭后，崔太太宣布饭菜费用，大家平均分配负担，再喝茶吃水果，即散会。“虽然来的人政治背景不同，而能在一起吃喝玩笑，这是崔书琴的外交手段。”[注]因此，《独立时论》能够吸引平津各大高校的自由知识分子，崔书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3．《独立时论》群体与北京大学

在《独立时论》的45位成员中，北京大学教授有27人。可以说，《独立时论》是北大自由知识分子的论坛。这些教授多为各院、系的领导或骨干师资力量，如赵迺抟（经济系主任）、王铁崖（政治系主任）、郑天挺（秘书长，后兼任历史系主任）、马大猷（工学院院长）、朱光潜（文学院院长）、季羡林（东方语言学系主任）、陈雪屏（教育系主任兼训导长，辞北大教职后系主任由陈友松接任，训导长职务由贺麟接替）、姚从吾（历史系主任，后辞北大教职）、韩寿萱（博物馆系主任）、毛子水（北大图书馆馆长）。他们是胡适管理北京大学的得力助手，也是胡适办好北大教育所依赖的重要力量。

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载《独立时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刊行。

《胡适日记全编》（7），第278页。

《高炳生等致胡适》（1947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96页。

胡适创办独立时论社，写时政类文章，在他看来是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但在他所构想的救国途径中，教育和学术始终是首选和必须的方式。在就任北大校长后，胡适也想趁此机会大干一场，使北京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1946年12月，胡适在国民大会上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交了《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议案，又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该重视教育。1947年夏，胡适写信给白崇禧与陈诚，提议在北京大学设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罗致人才，由北大负全责，科研基金须得国家拨付，并表示钱三强、胡宁、吴健雄、张文裕等九位这方面的专家已同意来北大工作。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1947年8月下旬，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有关会议时面见蒋介石，提出了国家“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随后胡适撰成专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注]发表。这是一个发展国家教育的宏伟方案，也是胡适的理想。但国民政府并未回应，社会上的各种批评却接踵而来。9月，胡适将这个计划拿到北大教授会上讨论，向达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亡了！”教授们的反应对胡适造成了很大打击，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我作了三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注]不过，向达的反应是正常的。面对着由内战引发的经济危机，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甚至无法为家人提供日常三餐，就连学生们也明白，“教师既难得一饱，又何暇致力学术，专心教育？”[注]

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见子通：《胡适评说八十年》，第134页。

徐复观曾说：“胡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代，是有兵有将，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今日在台湾，则既无兵，又无将，即是既无青年，又无真正的朋友。”[注]其实，在战后，胡适的将、兵已是越来越少，否则他的教育方案不致遭遇如此冷遇。例如，《独立时论》群体虽然大部分是北大的教授，但却没有周炳琳、钱端升二人。周、钱二人都是北大教授，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是“老北大”，其

地位与清华“三荪”（即陈岱孙、叶企孙、金龙荪）相类；钱端升是政治系教授，在北大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可参见《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2、735、736、742页。

《周炳琳致胡适》（1946年7月9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4页。

《周炳琳致胡适》（1946年11月9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2—143页。

《周鲠生致胡适》（1946年1月3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88页。

《郑天挺致胡适》（1948年4月25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87页。

周炳琳是胡适的学生，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自从进入北大任教一直到抗战前，周炳琳一直追随胡适。作为胡适的学生，周炳琳从学生时代即得到胡适的青睐，以后回到北大就职亦得到重用。二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有密切的关系。从“七七”事变起，胡适赴美，家眷以及其他事情均托付周炳琳照管。[注]全面抗战期间，两人天各一方，不同的经历留下了不同的记忆。胡适看到的是一个为民族危亡鞠躬尽瘁的蒋介石，周炳琳看到的却是一个腐败而残暴的国民政府，尤其是经历了“一二·一”运动和“李闻惨案”后，周炳琳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逆转。由此，二人之间的分歧出现了。周炳琳虽然是国民党员，却认为：“吾人今日于内战虽不能挽回劫运，然是非须分明，至少应持超然的态度。”[注]胡适归国后，频繁往来于北平，周炳琳对此很有看法。1946年年底胡适参加国民大会前，周炳琳曾试图阻止，“闻先生即将飞往南京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撇开此举之政治关系不谈——先生对于现实政治之看法，琳绝对尊重，——单讲校务，此时可以说尚未正式上课，事甚繁乱，局面未趋稳定。我们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注]周炳琳以“校务”劝阻，是委婉的说法，其实是在提醒胡适不要与国民政府靠得太近。胡适并未听从周炳琳的劝告，反而与国民政府越走越近，终于导致二人之间出现了裂痕。钱端升与胡适私交非常好，多年来一直围绕在胡适周围，在胡适衔政府之命前往美国求援时所带两个助手，其中之一即为钱端升。钱端升与周炳琳的情况类似。钱端升是“一二·一”民主运动中的“四教授”之一。抗战胜利后，周鲠生劝钱端升再办一个刊物，让大家说说话，“他回信敬谢不敏”，“他近来很悲观，尤其是昆明联大惨案学

潮令他多所感慨”。[注]之后，他的思想迅速左转。即使是加入独立时论社的郑天挺，对于胡适的政治态度也有些许微词，他曾委婉批评胡适在学生运动上的处理方式：“北大有自由批评之传统，外间颇多误解，今后处境将益困难。不满现状而有所批评，其人或即最爱国、最忠于党者，一概以奸宄视之，不惟不足以服其心，抑且为奸人张目。大学有使命，学术研究应有自由，如无实际行动，在校内宜宽其尺度。若事事以配合为责，奉行不善，其弊害不可胜言。”[注]

夏济安：《记崔书琴先生对于国事的态度》，见张其昀：《崔书琴纪念集》，第75页。

周炳琳、钱端升对胡适的疏离，说明北大内部自由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分化。无论是分化还是重新组合，他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再如崔书琴与胡适。崔书琴出身南开，哈佛大学毕业后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1937年才进入北大，而此时胡适已经赴美。也就是说，胡适与崔书琴之间并没有多少渊源。在平津教育界，崔书琴是研究“三民主义”的著名专家，且是少见的忠诚的国民党员，公开维护国民政府的声誉，甚至与他人进行辩论。在西南联大时期，很多优秀的学生都被崔书琴拉进了国民党。[注]战后胡适与崔书琴走到一起，是通过张佛泉的引介，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想帮助国民政府。

四、

吴景超与《新路》群体

施复亮：《错误的“看法”与反动的“对策”》，载《时与文》1947年第1卷第24期。

储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观察〉》，载《观察》1948年第4卷第12期。

《新路》于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创刊，1948年12月18日被查封，共出版两卷，第1卷24期，第2卷6期。

1947年10月，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民盟的被迫解散，标志着民主中间派人士与国民党的决裂。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出走香港，倒向了共产党一方，不少自由知识分子则与国民党走到了一起。但更多的知识分子没有做任何选择，仍旧保持独立的立场。然而，内战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自由知识分子的呼吁成了自言自语。施复亮说：“三个月来，我一直以沉默代替抗议，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内战打得这样起劲，叫我们这些向来反对内战的人说些什么好呢？要说的话，差不多过去都已经说过了。用不着重复，所以不想再说。”[注]就连储安平也不免灰心沮丧，“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注]在战场上，国共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局开始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政府当局更加严厉地压制言论，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再度紧缩。夹在国共之间，他们终于将批评和考问转向自身，发出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疑问，从而展开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大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路》[注]创刊了。

1．吴景超与《新路》创刊

钱昌照（1899—1988年），江苏常熟人。1918年在上海浦东中学毕业；1919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2年进牛津大学深造。1922年参加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到英国、美国、日本考察，回国后到全国各地游历。1928年至1947年，一直在国民政府部门就职，长期担任资源委员会的领导职务；1947年春辞去资源委员会工作，创办《新路》周刊。1948年出国考察，1949年6月回国。

吴景超（1901—1968年），字北海，安徽歙县人。1914年入南京金陵中学就读，翌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夏天赴美国，入明尼苏达大学，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31年秋，任清华大学教授。1932年任教务长；1935年年底离开清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1937年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任

经济部秘书；1945年任战时物资管理局主任秘书；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7年重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1952年调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新路》的创办，最初是钱昌照[注]与吴景超[注]、刘大中一起商议的。[注]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胡适日记全编》（7），第704页。

刘大中在美国留学时期认识了钱昌照，是经济学界的青年才俊。吴景超任职政府时与钱昌照结识。钱昌照长期负责资源委员会的工作，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隶属于经济部，吴景超为经济部秘书。1947年，钱昌照、吴景超同时辞去政府工作，钱昌照打算带吴景超、刘大中、王崇植等人出国考察，终未成行，[注]吴景超遂重回清华大学教书。一次，钱昌照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住了两天，“一天在吴景超家，一天在刘大中家。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想办一个杂志，批评时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批评。杂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题的。我们还决定在北平找一所较大的房子，买些参考书籍，在北平的朋友可以在那里讨论问题；从南方来的朋友可以住在那里。后来我们看中了一所房子，就在东直门大街”。[注]吴景超在拜访胡适的时候也提及此事，并顺便征求胡适的意见，“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农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注]胡适日记时间为1948年1月24日，可见，1948年初甚至更早的时候，这帮朋友们已经在商议、筹备《新路》的创刊工作了。

裴仁：《“新第三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载《时与文》1948年第2卷第23期。
丁亚平：《萧乾、文洁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第41页。
姚可昆：《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

此后，吴景超利用他在北平教育界的关系，邀请朋友们加盟，在1948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选出了五人委员会，由吴半农、钱端升（钱氏未回国前由楼邦彦代理）两人负责政治，刘大中负责经济，萧乾负责文艺和外交，吴景超负责社会；刊物将于5月正式出版。[注]在创刊的时候，编辑人员发生了变化，改为周炳琳负总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周炳琳、钱端升和吴景超是多年老朋友了，楼邦彦出身清华，是钱端升的入室弟子。负责文艺的编辑原定为萧乾，但据他说，“没等刊物问世，我就在复旦大学一些学生和杨刚的劝阻下，拍了个电报把它辞了。《新路》出刊以后，我由于开始答应负责部分编职，后来又打了退堂鼓，所以也确实为它写过几篇文字，但该刊每期都标有‘吴景超主编’的字

样，而我从未做过它的主编，却确实是千真万真的事实”。[注]萧乾的回忆可能有误，因为《新路》周刊上并没有列出主编。不过，萧乾确实没有参与《新路》的编辑工作，接替他的极有可能是杨振声。据姚可昆说，1948年夏天，杨振声邀请冯至和沈从文一家去颐和园度假，在园内冯至写出了《郊外闻飞机声有感》，拿给杨振声看，杨振声就在《新路》上发表了，“那时杨振声负责《新路》文艺方面的编辑”。[注]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89页。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101—102页。

《新路》周刊的问世，可谓生不逢时。蒋介石得知《新路》是钱昌照办的，怒不可遏。他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陈布雷劝钱昌照早点出国，“于是我从一位不离蒋左右的人逐渐成为蒋的敌人，不得不自我流放，连我并不重视的国民党党籍也被开除了”。[注]于是，钱昌照取道香港离开了大陆，而共产党方面，对《新路》也是大张挞伐。1949年钱昌照到北京，周恩来提起《新路》时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样一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注]

2．吴景超与《新路》群体

《新路》各个栏目的主持人和撰稿人均为北平各大高校的知名教授，他们大多具有欧美留学背景。以《新路》为阵地，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就某个专题进行辩论，发表集体宣言或抗议，由此形成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考察《新路》群体的组成情况（见附表9），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多重关系，联系非常紧密。具体说来有两条线索：一是清华大学，二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二十二位撰稿人之中，有十五人是在清华或西南联大接受的大学教育，都受过清华学术传统的熏陶，这一点尤以社会学系最为明显。在《新路》的撰稿人中，有七人属于清华社会学系，潘光旦、吴泽霖、陈达、吴景超四人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是老师辈，四人都留学美国，其中两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全慰天、袁方、胡庆钧三人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是学生辈，同时就读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共同的老师就是潘光旦、陈达、吴泽霖。这三人年龄相仿，胡庆钧和袁方同年，全慰天大一岁；而且三人都是湖南人，全慰天和袁方还是临县老乡。三人差不多同时毕业，又几乎同时留在清华社会学系任教。四位老师和三个学生具有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

再看几个留学英国的撰稿人（表8-6）。

表8-6 《新路》留学英国的撰稿人

作　者	籍　贯	生　年	教　育	留　学	专　业	任　职
胡寄牕	四川天全	1903	北京大学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	
龚祥瑞	浙江宁波	1911	清华大学		政治学	中央大学
楼邦彦	浙江鄞县	1912	清华大学		政治学	北京大学
王铁崖	福建福州	1913	清华大学		法　学	北京大学
蒋硕杰	上海市	1918			经济学	北京大学
徐毓枏	江苏无锡	1912	清华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	经济学	清华大学

傅斯年：《新潮社之回顾与前瞻》，载《新潮》1919年第2卷第1号。

龚祥瑞、楼邦彦、王铁崖、徐毓枏四人都出身清华，年龄不相上下，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都受过清华校风和学术传统的熏陶。楼邦彦与龚祥瑞是同学，曾在钱端升的指导下共同编著了《欧美员吏制度》一书，与王铁崖同在北大政治系任教，与蒋硕杰亦为北大同事。表8-6所列六人都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蒋硕杰和徐毓枏还是留学时的同学；除胡寄牕年龄偏大外，其余五人都是三十五六岁，差不多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教师以及同样的知识，拥有共同的知识框架和学术研究的“家法”。这种知识上的相通或者谱系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知性原则，统摄着他们的思想，当面临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做出同样的选择。这种基于知识上的群聚，比靠人脉关系的聚集更加稳固。傅斯年说：“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恩怨造成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因为恩怨容易变化，容易掺杂；独有知识造成的感情，随着知识进化。”[注]

战后清华创建了人类学系，与社会学系一起办公。

蒋硕杰：《我与刘大中三十年的友谊》，载台湾《传记文学》1993年第63卷第6期。

在二十二位作者中，有十三人任教于清华大学。吴景超、潘光旦、吴泽霖、陈达、全慰天、袁方、胡庆钧在社会学系（人类学系[注]），邵循正为地学系主任。刘大中、赵人儁、徐毓枏、戴世光在经济学系，赵人儁是徐毓枏在清华经济系就读时的老师，戴世光同时在社会学系兼课，因之与潘光旦、吴景超、陈达、吴泽霖等人均有联系，且与潘光旦关系密切。北京大学六人，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与王铁崖、楼邦彦在政治学系，蒋硕杰、陈振汉在经济学系。其中，周炳琳、钱端升早年均在清华任教，钱端升并出身清华，他们与吴景超都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吴景超与刘大中通过钱昌照而结识，后来又成为清华同事。刘大中则与蒋硕杰均为学术界的后起之秀，二人虽然到北平工作后才相识，一个在清华一个在北大，但却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关系。蒋硕杰说：“那时北大和清华有一个联合研讨会，每月举行一次讨论学术或经济现状及政策等问题，因此时常听到他的谠论。我们又同时为《经济评论》撰写文章，交换意见的机会很多。”[注]而胡寄牖即为《经济评论》的主编。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多重纽带联系起来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在面临着知识界不断分化、国家即将陷入崩溃的危难时刻，他们围绕在《新路》周围，挺身而出要为民族寻找国、共之外的另一条道路。

3．《新路》群体与清华大学

吴晗（1909—1969年），字伯辰，浙江省义乌人。1929年考入中国公学；1931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应云南大学之聘任文史系教授；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3年加入民盟，任云南省青年部长；1944年10月，当选民盟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随校复员回北平，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同时积极投身民主爱国运动；1946年10月任民盟华北支部委员、北平市支部主任委员；1948年8月，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进入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新路》的撰稿人中，任教于清华的有十三人，可以说，《新路》是清华大学教授们的言论阵地。但在清华内部，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以吴晗[注]为核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落。

千家驹：《我与吴晗》，载台湾《传记文学》1990年第57卷第2期。

闻一多、潘光旦、吴晗都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吴晗的妹妹回忆：“大哥与闻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时，门户相对，隔窗相望。他们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闻先生曾书赠大哥一条用钟鼎文写的横幅：‘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个横幅，直到解放后，大哥

还一直挂在墙上。”可参见吴浦月：《怀念大哥吴晗》，见庄丽君：《世纪清华》（2），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关世雄：《古城黎明之前——民盟北平市临工会活动追忆》，见中国民主同盟文史委员会编：《我与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89页。

吴晗：《吴晗自传》，见苏双碧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第32—33页。

吴晗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当他在中国公学求学时，胡适即为该校校长，后来，吴晗追随胡适来到北平，并在其帮助下进入清华大学就读。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术上，胡适都一度是吴晗的领路人。全面抗战前，吴晗“与左派教授或青年从不来往，在他思想深处，他看不起他们，他只崇拜胡适”。[注]他发生转变是在全面抗战后期。眼看着国家遭日本侵略而国民党更加腐败，吴晗逐渐走出书斋。他的转变还与他交往的知识分子圈子有关。从全面抗战开始至1940年，吴晗任教于云南大学文史系，系主任即为楚图南，因此，吴晗与民盟来往颇多。调入西南联大后，吴晗与闻一多、潘光旦等人住在左近，[注]时常相聚，最终于1943年加入民盟。回到北平后，吴晗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积极投身民主爱国运动，并担任民盟北平支部的领导职务。吴晗寓所在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是一个活动中心，“在那里经常聚集着民盟、民青的革命同志，有时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民盟成员如潘光旦、费孝通、王瑶以及盟友钱伟长、无党派民主教授张奚若、朱自清也经常到这里评议时政”。[注]战后北平的许多知识分子的集体宣言和声明都是在这里起草，然后各自出面去征集签名。在以吴晗寓所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落中，张奚若是个关键人物。张奚若是“老清华”，无论是在教授群体还是在学生中，都具有很高的威望。虽然未参与任何民主党派，但从抗战后期开始，张奚若的政治态度逐渐激进起来，尤其是在闻一多被暗杀后。吴晗回忆：“张奚若教授是在昆明时认识的，我和闻一多常去找他，在多次反蒋反内战的活动中常见面，但来往不十分密切。一多同志牺牲后，他和我的来往便非常多了。他住在清华新南院，离旧西院相当远，却常到我家来，有时一星期好几次，在和国民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晚上也来，有时讨论到深夜。”“在这两年中，我们交换意见，讨论问题，共同战斗，有时候还商量修改文件，在我们发出的宣言、声明、通电中，他没有一次不签名。通过他的影响，好些老年、中年教授也逐渐和我们接近了。”[注]

吴晗与《新路》没有关系，在政治态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但彼此仍能保持相互尊重，这当中有潘光旦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清华大学，潘光旦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民盟盟员，经常参加在吴晗寓所举行的各种活动和会议；又是《新路》的主要人物，《新路》举办的辩论和论坛他也积极与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中间，潘光旦有着较高的威望。他的寓所是清华教授们生活交往的一个中心。翻检潘光旦的日记，可以发现，潘光旦用简洁优美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清华教授生活交往的精彩画卷。经常来潘家的如雷海宗、张奚若、费孝通、吴景超、吴泽霖、吴晗、戴世光、袁方、

全慰天、陈岱孙、沈覆等人，其他如赵风喈、张子高、朱自清等也是潘家常客，一般通过“聚餐”“共饭（同食、同饭）”“便饭”“饭叙”“茶叙”“饮叙”“招宴”“招饮”“聚谈”“闲话”“小坐”等方式，相互之间来往很是频繁。如1947年的1月，潘光旦日记中有如下描述：

1日，“夜食烫鱼片，四弟外，同座有佛同、之方”。

5日，“至福田寓小坐，伯伦兄嫂假寓中为四弟饯行”。

7日，“伯伦兄嫂来寓共饭；夜涵师约与校务会议诸同人同饭”。

10日，“循正来，出示美国犹太民族智识分子所编印之《评论》月刊（*Commentary*）去年九月号，其中有专栏名‘人的研究’……知余于人文思想与社会学之关系最感兴趣，故举以相示”。

12日，“来客多，时作时辍；桐荪、子高两先生来，谈良久”。

18日，“鸣歧来谈美水兵奸污北大女生一案，为阅其所提出之英文文件，于其文字上酌加订正，鸣歧所学习者为法文也”。

19日，“伯辰来，南洋有捐款致一多家族，商如何如何存放生息及保管，拟设委员会为之，家驷、辰伯、与余外，将添约月涵校长及佩弦”。

20日，“午，涵师约冠贤兄嫂来校宴集，余亦在座”。

21日，“午后准备祭祖……祭罢，约之方、宝昀、志诚、子寿、厚坤、助民同食，十一时始散”。

22日，“夜约伯伦全家、才澄、慰天、之方、胡君毓源、卫君旭生同饭，才澄昨自津来，十时许散”。

23日，“心一自兰州来，伴其同候月涵校长后，至寓同饭，并约伯伦兄嫂、泽霖、茀斋作陪”。

24日，“业治夫妇来寓，留共晚食”；“鸣歧见示祝寿四绝句，为酌易三五字”。

25日，“近晚奚若来闲话”，“夜赴正宣兄嫂招饮，同席为姚农卿先生及其夫人，子高、观亭、茀斋三家兄嫂；农卿先生，佛同父也”。

26日，“午前至茀斋、仲衡寓小坐，并在茀斋处早餐”。

28日，“近晚寿民兄嫂来”，“至伯伦寓洽谈同学申请恢复《清华周刊》事；旋又同至士荃家，约其同谒校长未值；出，即与自治会同学会谈，听取其对复刊计画”，“夜约前鼎全家至寓中同食”。

参见《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7—235页。

29日，“昨汝江自沪来校，今午约其全家至寓共饭。夜希渊兄嫂来”。[注]

《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吴晗：《吴晗自传》，见苏双碧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33页。

潘光旦虽然是民盟盟员，但属于民盟中的“温和分子”，与人交往，始终坚持性情、才情的标准，并不太注重其政治上的态度。1947年夏，吴晗与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商议，邀请政治上比较进步的教授举办暑期讲座。雷海宗在学生眼中是保守分子，他主编着《周论》，但很少有学生去阅读。7月28日，自治会的学生来邀请潘光旦参加暑期讲座，谈及约请讲员的问题，潘提醒学生“应以学问人品为主，不应以政治见解之倾向为轩轾”，并“坚属其添请伯伦加入”。[注]正是因为有潘光旦这样的“温和分子”，清华大学不同政治倾向的教授之间才不至于出现多大的裂痕。但即便如此，他们之间也在逐渐分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微妙。“由于奚老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他在清华元老派的地位动摇了。清华定例，教授教学满五年可以出国休假一年。1948年暑假，奚老和我都满六年了……奚老呢，身体不大好，老朋友劝他出去一下调理也好，出乎意料的是学校竟然不准，他被统治集团除名了。”[注]

4. 《新路》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载《新路》1948年创刊号。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是一个以研究经济问题为主要任务的民间团体，它虽然不是政治团体，更非政党，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社经会”从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四个方面提出了32条主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注]

“社经会”是由钱昌照倡议发起的。钱昌照抱有坚定的工业救国信念，战后，他本希望可以趁机大力发展中国的工业经济，而蒋介石却一意以战争解决政治问题。钱昌照知事不可为，遂离开了任职达15年之久的资源委员会，与朋友商议创办一个研究经济的组织，为中国的前途谋一新路。于是，钱昌照找到了朋友吴景超、周炳琳、刘大中、萧乾等商议，大家一拍即合，并决定创办一个刊物，即《新路》。随后，钱昌照邀请钱端升、周炳琳、吴景超、陶孟和、刘大中、萧乾等教育界人士，再邀集实业界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孙越崎、王崇植、吴半农、孙拯等人共同

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筹备委员会”（见附表10）。其中，陶孟和曾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与钱昌照为校友，二人又是连襟；钱昌照与吴景超曾在同一个政府部门任职，与周炳琳、钱端升是老朋友，且周炳琳亦曾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孙越崎为钱昌照多年的同事，他担任资源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是钱举荐的；孙拯、王崇植为实业界人士，与资源委员会关系密切；而时任中国驻日代表团代表的吴半农，此前亦任职于经济部，且为清华出身。

姚可昆：《我与冯至》，第128页。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在这个筹备工作中，除吴景超外，萧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萧乾在任《大公报》驻外记者时，在英国与钱昌照结识，而且，萧乾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讲师并听课，与钱昌照算得上是校友。萧乾对“社经会”的筹办很是热心。据姚可昆回忆：“大约在1948年2月，有一天钱昌照和萧乾到我们家来，与冯至谈话，他们说，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各大问题非常复杂。人们感到彷徨苦闷，想集合一些有专长的朋友们组织一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对那些大问题进行研究，为中国寻找一条新路。他们还附带说，这个研究会既不反苏，也不反美。还筹备一种刊物，就叫作《新路》。”[注]沈从文也提到，萧乾曾到他家邀请他参加《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注] 1948年3月1日，“社经会”成立大会在北平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召开。经过讨论，选出理事11人，即钱昌照、孙越崎、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潘光旦、钱端升、刘大中、陶孟和、萧乾、楼邦彦；吴景超、钱昌照、周炳琳为常务理事；监事3人，即邵力子、吴蕴初和童冠贤。大会决定创办《新路》为会刊。

在“社经会”会员59人（见附表10）中，教育界人士34人，其他则为资源委员会人士、实业界以及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社经会”的成立和《新路》的创办，是知识界与实业界开始联手探索中国出路的开始。“社经会”为《新路》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新路》的研究对于“社经会”背后的资源委员会以及相关实业界人士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业界能够与教育界联合起来，离不开钱昌照与吴景超、萧乾等人于其间的牵线搭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路》群体中具有留英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占了很大比例，而且以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为主。在“社经会”筹备委员11人中，具有英国教育背景的有4人，即钱昌照、周炳琳、陶孟和、萧乾，因钱端升不在国内，代替其工作的楼邦彦亦为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生。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资源委员会、实业界人士的教育背景、思想、主张等有很大关系。

孙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

1942年，中国留英同学会编写的《中国留英同学录》收录各个时期的留英学生344人，其工作的单位类别如表8-7所示。[注]

表8-7 留英学生工作单位类别

分类类别	人　数	排　名
国民政府各院、各部以及各委员会、各局	130	1
各学校	72	2
各工厂及公司	41	3
银　行	13	4
各独立的研究院及文化部门	12	5
各省、市政府	11	6
医　院	2	7
不　详	63	占总人数的18.31%
总　计	344	

孙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0页。
孙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第375页。

在从政人员中，任职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门的人数最多，高达130人，主要集中于“军事委员会下属各部（海军部、军训部、军令部、军政部）、行政院下属各部（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等）。在军事委员会下属各部的留英生主要供职于资源委员会、航空委员会、海军部、军政部……在行政院下属的经济委员会，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中任职的留英生较多，任职于外交部的留英生多毕业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财政部的留英生也以毕业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居多，基本上属于学以致用”。[注]在学校就职的有72人，占第二位；在工厂及公司任职的有41人，占第三位。因此，无论是在资源委员会还是在实业界，都有数量不小的留英知识分子。这些留英知识分子当中，又以留学伦敦大学的为最多。[注]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实业界，或者是资源委员会，这些留英的自由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费边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资源委员会。

1954年，胡适回台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资源委员会，他说：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2374页。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注

5．《新路》群体与《独立时论》群体

《独立时论》是北大自由知识分子的论坛。《新路》则为清华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座。它们都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也都被称为“民主堡垒”。但是，作为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有着不同的校风和学术传统。

胡伟希：《清华学派的“日神精神”——兼论20世纪中国的学术类型》，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学生有争取自由民主的传统。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学生运动，大都是北大学生走在队伍的前列。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治校，使北大具有包容一切的恢宏气概，也使北大成为不同知识分子和思想的熔炉。因而北大师生个性化的自由色彩相当浓重，北大也成为各种新思潮的策源地。据胡伟希分析，不仅新思潮如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流行于北大，“国粹派”思潮以及后来蔚为大观的新儒家，其开山人物（梁漱溟、熊十力）亦出身北大。“即从学术史而言，北大的学术风气、路数、风格均与‘思潮’密切相连。”注这种开创新思潮的学术传统是与北大尚自由、反传统的文化性格分不开的，也表明北大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讲究经世致用。与北大不同，清华以勤勉朴质著称，实行“德智体三育并进”的教育思想，塑造学生的“全面人格”，其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为明证。由于是利用庚子赔款办学，师生普遍存在文化殖民化的危机意识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胡伟希以“日神精神”来形容清华学术传统，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同时格外强调“学术独立”，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金克木：《孔乙己外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35—336页。

可参见李辉：《和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金克木先生以幽默的笔调比较了北大与清华的不同："规规矩矩的学校是清华，门门功课一样紧，学完了总能出国，得了博士回来干什么都行。清华同学会有的是力量，本来是留美预备学校啊。"北京大学则是个特别的学校，"听说是蔡元培办出来的，叫做'兼容并包'。这些大学的所有特点，北大全包了，要什么，有什么。愿意干哪样都行，都有机会，只看你自己，学校一概不管。求学也好，革命也好，拉关系做官也好，从事教育办中学当教员也好，考出国留学也好，混文凭也好。总之，不管真上学，假上学，北大都容得下。这叫做'此北大之所以为大也'。"[注]虽近于戏谑，但金先生讲得很有道理。王元化则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来比较北大与清华，并以王瑶先生为例子佐证："清华从美国引进政治与学术分开来的教育原则和治学态度，我认为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我十分向往过去北大的自由空气，但是在治学方面，我还是倾向于清华的那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王瑶先生毕业于清华，后到北大任教，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北大人，而是清华人。这话也含有对治学态度的看法"。[注]

可参见《新路》1948年创刊号。

北大、清华不同的校风和学术传统，在《独立时论》和《新路》两个群体中也反映出来。《独立时论》群体是一松散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缺乏共同主张和纲领的维系，仅仅是对时事进行个性化的判断和解析，即使是其核心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与《努力》或《独立评论》时期的胡适派学人群体相较，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性。他们能够聚合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胡适"卡里斯玛"式的人格魅力及其象征资本，是胡适已有人脉关系延续的结果。而《新路》群体则不同。《新路》群体不但有共同的主张，[注]且其群体建构更多的是基于思想基础而非人脉关系。其中包括两条线索，一是清华学术传统，二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传统。

［法］布尔迪约、［法］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6页。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从《胡适的日记》《潘光旦日记》《梅贻琦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中可以看出，清华、北大的这些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通过聚餐、相互拜访、逛琉璃厂、书信等方式，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私人交往，同时，还存在着公共事务如教育、刊物、学生运动等方面的公共交往。

无论是《独立时论》群体还是《新路》群体，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大都留学欧美。布迪厄将“文凭”作为知识分子认同的一种具有归属意义的归属空间。[注]近代知识分子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努力考入名校或出国留学，归国后他们又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交往共同体。[注]《独立时论》群体和《新路》群体就是如此。无论是在生活、教学或其他学术活动中，还是在欧美同学会、基金会、中央研究院等机构中，这两个群体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密切的交往，[注]尽管他们的政治背景和倾向有很大区别。有许多人同时参加了这两个群体（徐毓枏、蒋硕杰、陈振汉、王铁崖、吴景超、刘大中、楼邦彦七人），说明《独立时论》和《新路》这两个刊物在精神上有相通性。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298页。

但是，这种精神上的相通性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北大与清华的分化。其实，这种分化早在抗战末期即开始了，而“一二·一”运动则是一次集中展示。“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冯友兰写道：“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就我个人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当了两派调和人的角色……可是进步方面的人，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我很觉得灰心，觉得这种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本来想照顾两面，可是两面都不满意。”[注]复员回到北平后，北大与清华不但在建制上分离了，教授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

《罗常培致胡适》（1946年4月24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02页。
《独立时论·序》，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刊行。

抗战后的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特点之一是普遍带上了政治色彩，更有不少的教授加入了政党组织。罗常培致胡适的信中曾讲到了教授的政治化，“在联大一方面的北大同人，除曾昭抡外，比较右倾的多，雪屏办团，从吾办党……此外枚荪、毅生、端升、今甫、燕绍庭和我……总算都是有党籍的……专给CC作耳朵的只有崔书琴一人”。[注]其他如郑华炽、朱光潜、马大猷、贺麟、杨西孟等人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的官员中，也是以北大出身的人为多。因此，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独立时论》群体，就呈现中间偏右的整体面相，其核心成员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时论》并不是以政府对立面的形象出现的，而是“希望我们的意见能够有助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及科学的进步”。[注]这种言论表达并非知识分子的纯粹自由立场，考虑到胡适战后的言论，可以说，这一群体尤其是其核心成员，是借《独立时论》给予政府以舆论上的支持。而清华教师中，以加入民盟的为多，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晗、吴征镒、关世雄、王志诚、范宁、季镇淮、李

相崇、屠守谔、李赋宁、张澜庆、王遵明、杨杰、张远东、李健武、陆祖德、胡原凌、郑尧、袁泰等，即使那些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也与民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张奚若、钱伟长、朱自清等人。因此，《新路》群体与政府的关系比较疏离，与实业界关系密切，而在群体精神上，这一群体则呈现出自由主义的气质。

张起钧：《儒林逸话》，台湾学海出版社，1982年，第177页。

谢华：《不与胡适谈政治的张奚若教授》，载《评论报》1947年第1卷第10期。

潘乃谷辑：《桃李思故园——回忆社会系、庆祝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见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李树青：《纪念杰出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1994年第64卷第1期。

北大和清华教授的不同党派身份、《独立时论》群体和《新路》群体不同的政治态度，决定了随着时局的变化，战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要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分化。这一点从胡适派学人的解体上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来。在不同时期，钱端升、周炳琳、吴景超、张奚若、潘光旦等人都曾是胡适的追随者。但在抗战后，这些人与胡适都渐行渐远了。胡适在北大的两个干将周炳琳、钱端升都没有加入独立时论社，而是积极协助钱昌照筹办“社经会”，并成为《新路》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张奚若早年在中国公学补习英文时，胡适是他的老师，那个时候两人就相识，后与胡适同时在美国留学，来往十分密切。归国后，张奚若也成了胡适的追随者，1920年代胡适把《努力周报》复刊的重任交给了张奚若，此后张奚若又是《独立评论》派的重要成员。有人批评胡适亲美，张奚若演讲中公开声援胡适：“人家说胡适中了美国的毒，我也就仅次于胡适之了。”[注]但在抗战后，张奚若与胡适之间开始有了不能不回避的话题，那就是政治。1947年1月，上海的《评论报》刊载了一篇对张奚若的专访，题目就是“不与胡适谈政治的张奚若”，张奚若说：“我与胡适先生的私人感情很好，但今日我们见了面，却尽可能避谈政治，以免影响感情。”[注]张奚若与胡适疏远了，却与吴晗走得越来越近。胡适跟另一个老朋友潘光旦，私下里仍是朋友，在北平也时常见面，但在公共事务的看法上，已经分道扬镳。1947年1月，有学生拜访潘光旦，中间谈到胡适，潘光旦说“和他私人感情很好，老朋友，现在是见面不谈国事”。[注]还有吴景超。吴景超是胡适颇为赏识的后辈，胡适是吴景超极力推崇并服膺的前辈。在很多事情上，吴景超都会征求胡适的意见。但是，从政府辞职归来的吴景超，思想上发生了剧烈变化。曾与吴景超共事多年的李树青说，吴景超在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任职经历是非常不愉快的，通过切身体验，吴景超看到了学者看不到的外面的东西，对国民党也更加失望。这段经历，“对于吴先生在四十年代后期的决定行止的影响，笔者虽无事实依据，认为是相当重要的”。[注]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吴景超曾就参加政府工作、为国家效力的问题请教胡适。而

当1948年胡适推荐吴景超去翁文灏内阁帮助处理金融危机时，吴景超却坚决不去。在政治问题上，吴景超与胡适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随着国共战局的明朗化，朝着更深的方向进行。当国民党溃败、共产党胜利在望的时候，最后的抉择到来了。对某些自由知识分子而言，走还是留，都得做出自己的选择。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柳光辽等编：《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伍启元：《抗战期间的教学生涯》，载台湾《传记文学》1994年第65卷第6期。

无论是《观察》《时与文》《独立时论》还是《新路》，在其群体建构过程中，由“学校”衍生出的各种关系纽带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观察》群体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时与文》群体与西南联大、《独立时论》群体与北京大学、《新路》群体与清华大学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许纪霖先生通过研究指出，“不管如何，学校的出身在都市公共关系网络中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认同、相互认肯的第一层空间关系”。[注]这个学校出身既包括具体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也包括了模糊指称的留学教育（如留美、留英等）。比如柳无忌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上海家中，就已经有南开大学的聘书在等他了，因为有好几个从耶鲁毕业的博士如杨石先、张纯明、何廉、方显庭在那里任教，且在教学行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注]而武汉大学，校长从王世杰到王星拱，再到周鲠生，都是留英派人士，因之也就成了具有留英教育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聚集的一个基地。1938年，本已接受清华聘约的伍启元归国准备赴昆明，因战争道路不通，教育部长王世杰遂介绍他去武汉大学任教。[注]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但是，学校（教育）出身仅仅是他们获得认同的第一层空间关系。是校友未必一定能走到一起，每一个群体的形成都有除此之外的第二层空间关系，即意识形态空间网络，[注]也就是说与他们自身的价值理想、思想主张相关。比如，构成《观察》主体力量的为留英派人士，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知识分子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们普遍接受了“费边社”的学说，主张中国亦应采取英国式工党政治的宪政民主模式；在对时局的看法上，因为他们均为无党无派的大学教授，保持某种独立立场，对国共都进行严厉的批评。而独立时论社成员大多为留美派知识分子，向往美国式的民主，其中的核心人员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且不少人为国民党员，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而对共产党进行激烈的批判。

麻星甫：《楚图南传略》，见麻星甫编：《一生心事问梅花：楚图南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朝华出版社，1999年，第286—288页。

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学校出身不仅仅是种名分，更重要的是名分之中的内涵，它包括了价值观念及其来源、知识构成、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性、历史记忆等多项内容。尤其是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易于群聚起来。在抗战前的北平，就存在着多个这样的群体。但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各高校进行大迁徙，自由知识分子原有的关系网络随着人员的流动被打散了。如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昆明，随着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沦陷，一些重要大学、学术机关、文化团体都流亡到云南，许多学者名流、教授以及文化界人士、作家都来到云南。一时间，昆明聚集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都脱离了原来的空间网络关系，需要建立新的关系网络，以实现自身的认同。但是，“不少人都还保持一种旧时代或畛域的偏见和优越感；曾出国留学的‘洋教授’看不起‘土教授’；学术界的人看不起搞政治活动的；教育界的人看不起文化人和作家；甚至于云南各界对于凡在中央机关做过事的人，也都侧目而视，保有一种警惕；外来人和本省人之间各抱有成见；即使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亦常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只有找到或培育出大家都接受的认同标准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融合。在中共南方局特派员华岗和民盟的安排下，成立了以昆明大学教授为主要成员的“西南文化研究会”，通过座谈、讨论、协商、争辩，消除了成见，加深了了解，“本地人与外来人的隔阂也逐渐消除，学者教授中‘洋’教授与‘土’教授间的歧见，学者教授对文化人、对政治活动者的偏见等等，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进步的大旗下，共同携手前进，使当时矛盾分裂的各个方面都团结了起来”。[注]通过这个组织，来自各处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通过座谈、演讲、辩论等方式交流，彼此之间增加了信任，不断融合，也逐渐形成了崭新的认同准则。这个新的认同标准就是政治上的觉悟或者政治态度。因为政治态度的相近，“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很多成员都参加了民盟。

费孝通：《政治上的启蒙》，见中国民主同盟文史委员会编：《我与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0页。

对于党派类型的关系网络，费孝通有过精彩的描述：“我们那时的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政治上开始结合的。师生、同学、同乡等等常是他们类聚的基础。政治的觉悟导致原有的朋友之间分出亲疏；有些谈得拢，有些谈不拢了。有些信得过，有些信不过了。……以我自己说，潘光旦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我进清华以前就熟识的。这个师生关系是我接受政治启蒙的基本社会关系。闻一多先生是潘先生的同学和经常来往的朋友。吴晗同志是我的老同学，但也是由于他是个常到潘先生家去的朋友所以特别熟，昵称老晗。从许多老师和同学中逐渐突出这几个人，那就是和民盟组织关系的开始。”[注]也就是说，党派类型的关系网络建构的基础仍然是学校出身、业缘、地缘这些因素，然后才是以政治上的觉悟为标准分出亲疏。这

也就不难理解，民建的会员大多为工商银行界人士和研究经济学的知识分子，民进成员则多是新闻出版界人士，而九三学社中科技工作者比较多。

但是，随着国共斗争的加剧，在知识分子的交往中，政治态度这个新的认同标准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战后，许多知识分子都具有了党派身份，即使是无党无派人士也普遍政治化了。政治态度的不同导致他们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痕，由此出现了分化。比如在北平自由知识分子中，钱端升、吴景超、周炳琳、潘光旦、张奚若与胡适的疏离即为最有代表的例子。尽管张奚若、潘光旦都说与胡适在私下仍是朋友，但在公共事务的见解和主张上，已经分道扬镳。没有了公共交往上认同的标准，无论私人交往多么密切，他们始终无法走到一起，也就无法群聚到一个团体中去。况且，在抗战胜利后这个非常态的中国社会中，所谓的政治并不仅仅是争取自由、民主，而是随着内战演变成为生存问题。

《北大半月刊》第3期，1948年4月16日。

北京大学的一个办事员说得形象："从前我对'罢工'这个名词怕得很，以为罢工就必带政治色彩，现在我明白啦，政治也不是什么玄妙的玩意儿，什么是政治，窝头就是政治，为了吃饭还怕什么，不然就要饿死，我们要罢，罢，罢！"注 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下，大学教授也开始破产。北大教授汪振儒向胡适自陈：

七月份的薪水，承校方的好意，在六月下旬便已预支完了。但到本月中旬，虽是预支的，但也一样地用完，无奈只得再向学校打主意，拟再预支八月份的薪水一百万元。……郑秘书长批准借四十万，心想总可以挨到八月了。……而个人手中实存的现款，仅有一万四千二百元了，明天买了菜，就是想进城活动借款，甚至于车钱都没有了，觉得这真是一种笑谈。

《汪振儒致胡适》（1947年7月25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19页。

先生或者以为我的家庭负担很重，所以出超很高，但个人的家庭，只有一妻二子（其中之一还远远养在外婆家，到北平几个月从未曾寄过任何钱去），最近添加一位投靠的难民，以劳动服务换取每日的口粮，如此而已。个人无任何嗜好，不抽烟，不吃酒，不打牌，也不请客应酬，买书穿衣服则更谈不到，但是预支的薪水仍然是维持不到月底。学校中的同人，薪水比我少的很多，负担比我重的也很多，我尚如此，他们将如何度日，这对我是一个百思不能解答的问题。注

《北大、清华讲助员工联合会等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72页。

毛子水：《关于罢教和要钱》，载《周论》（北平）1948年第1卷第19期。

张东荪：《增产与革命》，载《观察》1948年第4卷第23、24合期。

教育界人士几至“三餐不给，儿女啼饥号寒”，甚至“有的弄到神经失常，以至于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注]为了生存，大学教师们不断地提出呼吁，要求政府调整工资，讲助员工甚至进行了罢教、罢工。但毛子水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教师是种神圣的事业，工资不够用，尽可以与政府商量，动辄以罢教相威胁实在有失身份；而且，教师是接受国家的聘请而教书，他们与政府应当是甘苦与共的关系。因此，当有学生征求毛子水对讲助员工罢教的意见时，他明确地说：“我不赞成。”[注]而张东荪认为，“时局严重已超过了说话的阶段”，而“向现实的当局说话”，则“自政协破坏以后久已不做此想”。[注]也就是说，现政府不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政府，不罢教就意味被剥夺生存的权利。由此，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之间再一次发生分化甚至发展为对立。

在抗战后的几年中，自由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一直保持着高涨的态势。无论是《观察》提出的“中国需要重建权威”，还是《时与文》主张的“中间路线”，或者是胡适宣扬的“学术独立十年计划”还是《新路》开列的32条主张，都是做着同一种努力，即在国共之外寻找、塑造一种能够与国共抗衡的势力，即壮大民间社会，重建中国的社会重心，由这个“社会重心”引导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正常发展轨道。他们认为，这个责任只能由国共之外的人士来承担，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无论是哪个群体，都意识到了当前自由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壮大力量。

谢立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建立和发展》，见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编：《中国科学家回忆录》（第1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240页。

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自由知识分子的普遍政治化，他们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而随着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他们的生存日益受到威胁，“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自救唯恐不及，哪里还能‘救国’？”[注]生存的压力，不但使他们没有能力去担当起“历史使命”，反而由此又演变成相互之间政治态度上的更大差异，从而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战争终于掏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所有力量，而政治化又促使他们更加分化甚至对立。由此，自由知识分子“重建社会重心”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在历史的河流中一冲而散，尽管它曾那么的绚烂夺目、动人心弦。

郑志峰

附表1

《观察》撰稿人

作　者	籍　贯	生年	国内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储安平	江苏宜兴	1909	光华大学	英国	政治学	复旦大学政治系
伍启元	广东台山	1912	沪江大学	英国	经济学	英国某大学任教
吴世昌	浙江宁海	1908	燕京大学	英国[1]	文学	中央大学中文系
陈维稷	安徽青阳	1902	复旦大学	英国	纺织学	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
笪移今	江苏句容	1909			经济学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银行经济研究专员
杨人楩	湖南醴陵	1903	北京师大	英国	历史学	北京大学史学系
吴恩裕	辽宁沈阳	1909	清华大学	英国	政治思想史	北京大学政治系
楼邦彦	浙江鄞县	1912	清华大学	英国	法学	北京大学政治系
费孝通	江苏吴江	1910	清华大学	英国	社会学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钱清廉				英国	法学	中央干部学校
钱歌川	湖南湘潭	1903	东京高师	英国	文学	台湾大学[2]

▲1 1948年初应英国文化工作委员会邀请赴英讲学，1955年返国。

2 1946年7月，钱歌川辞东吴、沪江、之江联合大学训导长之职；夏，应朱世明邀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专门委员；不久工作完成返国出任教育部学术审查委员会专门委员；8月，赴台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后兼文学院院长。

▼（续表）

作　者	籍　贯	生年	国内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鲍觉民	安徽巢县	1909	中央大学	英国	经济地理	南开大学
戴文赛	福建漳州	1911	福州协和大学	英国	天文学	燕京大学
戴镏龄	江苏镇江	1913		英国	外国文学	武汉大学
萧　乾	北京	1910	燕京大学	英国	文学	复旦大学新闻系
钱锺书	江苏无锡	1910	清华大学	英国	文学	国立编译馆、暨南大学
杨　绛	江苏无锡	1911	清华大学	英国	文学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黄正铭	浙江海宁	1903	中央大学	英国	法学	中央大学政治学系
张印堂	山东泰安	1902	燕京大学	英国	地理学	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
夏炎德	上海市	1911	暨南大学	英国	经济学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李浩培	上海市	1906	东吴大学	英国	国际法	武汉大学法律系
卞之琳	江苏海门	1910	北京大学	英国	诗人	南开大学
韩德培	江苏如皋	1911	中央大学	美国、加拿大	法学	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
陈衡哲	湖南衡山	1893	清华学校	美国	历史学	
任鸿隽	浙江吴兴	1886	中国公学	日本、美国		化学
戴世光	天津市	1908	清华学校	美国	统计学	清华大学经济学系
潘光旦	江苏宝山	1899	清华学校	美国	社会学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雷海宗	河北永清	1902	清华学校	美国	历史学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吴泽霖	江苏常熟	1898	清华学校	美国	社会学	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冯友兰	河南唐河	1895	北京大学	美国	哲学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李广田	山东邹平	1906	北京大学		文学	清华大学中文系
王讯中						清华大学
钱端升	上海市	1900	清华学校	美国	政治学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续表）

作　者	籍　贯	生年	国内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曾昭抡	湖南湘乡	1899	清华学校	美国	化学	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
许德珩	江西九江	1890	北京大学	法国	政治学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季羡林	山东临清	1911	清华大学	德国	语言学	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
陈友松	湖北京山	1899		美国	教育学	北京大学教育学系
冯至	河北涿州	1905	北京大学	德国	文学	北京大学西语系
杨西孟	四川江津	1900	北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胡　适	安徽绩溪	1891	清华中国公学	美国	哲学	北京大学校长
高觉敷	浙江温州	1896	香港大学		心理学	国立编译馆、金陵大学
章靳以	天津市	1909	复旦大学		文学	复旦大学
曹　禺	天津市	1910	清华大学		戏剧家	戏剧学院教授
傅　雷	上海南汇	1908	持志大学	法国	文学	
刘大杰	湖南岳阳	1904	武昌高师	日本	文学	暨南大学
马寅初	浙江绍兴	1882	北洋大学	美国	经济学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赵家璧	江苏松江	1908	光华大学		编辑	晨光出版公司总经理
赵超构	浙江瑞安	1910	中国公学		新闻	上海《新民报》总编辑
杨　刚	湖北沔阳	1905	燕京大学	美国	新闻	《大公报》驻美特派员
王芸生	天津静海	1901			新闻	《大公报》总主笔
许君远	河北安国	1905	北京大学		新闻	《大公报》编辑部主任
徐盈	山东德州	1912	金陵大学		新闻	《大公报》平津特派员
李纯青	台湾台北	1908	中央政校	日本	新闻	《大公报》社论委员

▼（续表）

作　者	籍　贯	生年	国内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吕　复	河北涿鹿	1887		日本	社会学	中央大学
沈有乾	江苏吴县	1899	清华学校	美国	哲学	
沙学浚	江苏泰州	1907	中央大学	德国	地理学	中央大学
周子亚	浙江杭州	1911	中央大学	德国	政治学	浙江大学法学院
周东郊	浙江绍兴	1907	东北大学		历史学	
宗白华	江苏常熟	1897	同济大学	德国	美学	中央大学
柳无忌	江苏吴江	1907	清华学校	美国	外国文学	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
陈瘦竹	江苏无锡	1909	武汉大学		戏剧家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萧公权	江西泰和	1897	清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国立政治大学
傅斯年	山东聊城	1896	北京大学	英德	历史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梁实秋	北京市	1902	清华学校	美国	文学	燕京大学
胡先骕	江西新建	1894	京师大学堂	美国	植物学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
张东荪	浙江杭州	1886		日本	哲学	燕京大学
王赣愚	福建福州	1906	清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何永佶	广东香禺	1902	清华学校	美国	政治学	中央政治学校
蔡维藩	江苏南京	1898	金陵大学	美国	世界史	昆明师范学院
张沅长	上海市	1905	复旦大学	美国	文学	
孙克宽						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
张忠绂	湖北武昌	1901	清华学校	美国	政治学	
叶公超	广东番禺	1904	南开中学	英国、美国	外国文学	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
钱能欣	浙江湖州	1917	北京大学	法国	国际问题	中国驻法大使馆秘书
陈之迈	广东番禺	1908	清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中国驻美大使馆参事

▼（续表）

作　者	籍　贯	生年	国内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顾翊群	江苏淮安	1900	北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国际基金银行执行理事
郭有守	四川资中	1900	北京大学	法国	教育学	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委员
程希孟	江西南城	1900	北京商师	美国、英国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
张德昌	河南林县	1907	清华大学	英国	经济史	国民政府某部门

附表2

储安平的社会交往网络

光华大学时期	光华大学师生	老师	廖世承、张东荪、潘光旦、胡适、钱基博、王造时、罗隆基
		同学	沈昌焕、赵家璧、沈剑宏、王统元、钱蘋、李唯果
	新月派	徐志摩、叶公超、梁实秋、胡适	
	文艺界	田汉、徐志摩、梁实秋	
南京与重庆时期	学院派	吴世昌、周子亚、黄正铭、宗白华、柳无忌、吕复、陈瘦竹、沙学浚、萧公权、钱清廉	
	文艺界	老舍、张天翼、梁实秋	
	政府部门	程沧波、张道藩、沈昌焕、张德昌、陈之迈、顾翊群、王世杰、笪移今	
	其他	许德珩、陈维稷、周东郊	
	新闻界	《大公报》	王芸生、徐盈、许君远、李纯青
		《新民报》	陈铭德、赵超构、浦熙修
	文艺界	储安平曾加入中华文协重庆分会，与老舍、张天翼、梁实秋等相熟	
	《客观》周刊	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 副刊编辑：聂绀弩，“经济一周”栏目编辑：笪移今 主要撰稿人（见附表3）	
留英时期	伦敦大学	吴恩裕、伍启元、费孝通、鲍觉民、钱歌川、黄正铭、夏炎德、萧乾、王铁崖、龚祥瑞、吴元黎	
	其他院校	杨人楩、楼邦彦、钱锺书、杨绛、戴文赛、李浩培、戴镏龄、徐毓枏	
蓝田师院	吴世昌、钱锺书、孟宪承、高觉敷、廖世承、钱蘋、邹文海、谢扶雅、钱基博		
《观察》时期	除与笪移今、张志让、叶圣陶等人有些私人往来外，其活动基本局限在《观察》周刊社内；《观察》后期，为了应对险恶的时局，与其他一些刊物轮流举办“聚餐会”以交流信息，使刊物继续维持下去。		

附表3

《客观》作者群

姓　名	籍　贯	生　年	国内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储安平	江苏宜兴	1909	光华大学	英　国	政治学
吴世昌	浙江宁海	1908	燕京大学	英　国	文　学
陈维稷	安徽青阳	1902	复旦大学	英　国	纺　织
张德昌	河南林县		清华大学		经济史
钱清廉				英　国	法　律
聂绀弩	北京京山	1903	黄埔军校二期	苏　联	作　家
笪移今	江苏句容	1909			经济学
吴恩裕	辽宁沈阳	1909	清华大学	英　国	政治思想史
伍启元	广东台山	1912	沪江大学	英　国	经济学
杨人楩	湖南醴陵	1903	北京师大	英　国	历史学
高觉敷	浙江温州	1896	香港大学		心理学
周子亚	浙江杭州	1911	中英大学	德　国	政治学
戴文赛	福建漳州	1911	福州协和大学	英　国	天文学
戴镏龄	江苏镇江	1913		英　国	外国文学
徐　盈	山东德州	1912	金陵大学		新　闻
宗白华	江苏常熟	1897	同济大学	德　国	美　学
陈瘦竹	江苏无锡	1909	武汉大学		戏　剧
李慕白	浙江海宁	1913			书画家
钱　蘋			中山大学		教育学
陈衡哲	湖南衡山	1893	清华学校	美　国	文　学
任鸿隽	浙江吴兴	1886	清华学校	日本、美国	
潘光旦	江苏宝山	1899	清华学校	美　国	社会学
李浩培	上海市	1906	东吴大学	英　国	国际法
陈友松	湖北京山	1899		美　国	教育学
冯　至	河北涿州	1905	北京大学	德　国	文　学
萧公权	江西泰和	1897	清华学校	美　国	政治学
张东荪	浙江杭州	1886		日　本	哲　学
吕　复	河北涿鹿	1887		日　本	社会学
郭有守	四川资中	1900	北京大学	法　国	经济学
林焕平	广东台山	1911	暨南大学	日　本	文　学

附表4

《时与文》作者群

作　者	籍贯	生　年	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备　注
程博洪	湖南醴陵	1917	西南联大		政治学	复旦大学政治系	国民党员，《时与文》主编、发行人
汤德明	湖南华容	1916	北京大学		经济学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大教联、国民党员、中共地下党员、《时与文》编辑
周天行	上海市	1915	西南联大		经济学	康宁书店上海办事处主任	中共地下党员、《时与文》编辑
周谷城	湖南益阳	1898	北京高师		历史学	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	大教联干事、民盟
施复亮	浙江金华	1899	杭州一师	日本	经济史		民盟、民建常务理事、民建机关刊物《平民》编委
伍丹戈	江苏常州	1912	光华大学		经济学	复旦大学经济系	民盟、民建、有社联经历，《时与文》社务委员
张明养	浙江海宁	1906	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	复旦大学政治系	大教联、《文摘》编委、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周伯棣	浙江余姚	1901	大阪商科大学	日本	经济学	复旦大学银行系主任	大教联
漆琪生	四川江津	1904	京都帝国大学	日本	经济学	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	大教联、民建
蔡尚思	福建德化	1905	北京大学		历史学	沪江大学历史系	大教联发起人、中苏文化协会会员
徐中玉	江苏江阴	1915	中山大学		文　学	沪江大学中文系	大教联、民盟盟员
林焕平	广东台山	1911	暨南大学	日本	文　学	大夏大学、《文汇报》社委员	曾有“左联”经历
陈旭麓	湖南双峰	1918	大夏大学		历史学	大夏大学历史系	大教联
翦伯赞	湖南桃源	1898	武昌商校	美国	历史学	大夏大学历史系	大教联、中共党员、中苏文化协会会员

▼（续表）

作　者	籍贯	生　年	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备　注
吴　泽	江苏常州	1913	中国大学		历史学	大夏大学历史系主任	大教联、中共党员
石啸冲	辽宁辽阳	1908	北京大学	德国	政治学	大夏大学	民盟
许　杰	浙江天台	1901	浙江五师		文　学	东吴大学	大教联、中共党员、民盟
郑伯奇	陕西长安	1895	震旦大学	日本	文　学	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中共党员
孟宪章	湖北均县	1895	北京高师	日本	经济学	民治新专	大教联、民盟、九三学社
楚图南	云南文山	1899	北京高师			上海法学院	大教联、民盟
郭森麒	福建福州	1917	西南联大		经济学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大夏大学	大教联
流　金（程应镠）	江西新建	1916	西南联大		历史学	上海法政学院、光华大学	大教联、民盟
夏康农	湖北鄂城	1903	北京高师	法国	动物学	上海幼师	民盟、大教联干事
杨　晦	辽宁辽阳	1899	北京大学		作　家	上海幼师	大教联
钱实甫	湖南常德	1909	北京大学	美国	历史学	同济大学	大教联
沈炼之	浙江永嘉	1904	北京高师	法国	历史学	暨南大学	大教联、民盟
冯　契	浙江诸暨	1915	清华大学		哲　学	同济大学	大教联、中共党员
宦　乡（范承祥）	贵州遵义	1909	上海交大	日本、英国	国际问题专家	《文汇报》副主笔	中共党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林沧白（钦本立）	浙江长兴	1918	朝阳学院		经济学	《商务日报》编辑	

▼（续表）

作　者	籍贯	生　年	教育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备　注
臧克家	山东诸城	1905	山东大学		诗　人	《侨声报》副刊编辑、《文萃》编辑	
吴清友							
沈志远	浙江萧山	1902	苏联中央大学	苏联	经济学	达德学院	民盟
周建人	浙江绍兴	1888	会稽学堂		生物学	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编辑	民进、大教联
杨卫玉	上海嘉定	1888	上海理科专校				民建常务理事、职教社成员
马叙伦	浙江杭州	1885		日本	教育家		民进常务理事
沈钧儒	浙江嘉兴	1875	东京法政大学	日本	法　学	上海法学院	民盟
张西曼	湖南长沙	1895	京师大学堂	俄国			民盟、民进、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樊　弘	四川江津	1900	北京大学	英国	经济学	北京大学	九三学社
吴　晗	浙江义乌	1909	清华大学		历史学	清华大学	民盟
张东荪	浙江杭州	1886	东京帝国大学	日本	哲　学	燕京大学	民盟
曾昭抡	湖南湘乡	1899	清华学校	美国	化　学	北京大学	民盟
王亚南	湖北黄冈	1901	中华大学	日本、德国	经济学	厦门大学	
郭大力	江西南康	1905	大夏大学		经济学	厦门大学	

附表5

根据蔡尚思：《上海大教联与信史实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一文整理。

“大教联”全部会员名单

姓　名	任职单位	备　注	姓　名	任职单位	备　注
沈体兰	圣约翰大学	干事兼召集人	张志让	复旦大学、光华大学	干事兼会计
李正文	大夏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干事兼秘书	蔡尚思	沪江大学	干事
曹未风	光华大学	干事	潘震亚	复旦大学	干事
郑太仆	中华工商专校	干事	孙大雨	复旦大学	干事
彭文应	上海法学院	干事	漆淇生	复旦大学	会员
邱汉生	复旦大学、大夏大学	会员	周伯棣	复旦大学	会员
余遂辛	复旦大学	会员	周予同	复旦大学	会员
顾仲彝	复旦大学	会员	方令孺	复旦大学	会员
翦伯赞	大夏大学	会员	王国秀	大夏大学	会员
沈嗣庄	中华工商	会员	章靳以	复旦大学	会员
叶圣陶	中华工商	会员	周谷城	复旦大学	会员
方光焘	暨南大学、中山大学	会员	焦敏之	上海法学院	会员
陈望道	复旦大学	会员	张光业		会员
杨　晦	上海幼师	会员	曹　杰	东吴大学	会员
周熙良	武汉大学	会员	许　杰	东吴大学	会员
陈仁炳	圣约翰大学	会员	胡厚宣	复旦大学	会员
盛澄华	复旦大学、清华大学	会员	钱崇澍	复旦大学	会员
赵宋庆	复旦大学	会员	张孟闻	复旦大学	会员
吴　泽	大夏大学	会员	陈　逵	暨南大学	会员
刘佛年	暨南大学	会员	章乃器		会员

▼（续表）

姓　名	任职单位	备　注	姓　名	任职单位	备　注
朱锦江	复旦大学	会员	赵纪彬	东吴大学、山东大学	会员
吴文祺	暨南大学	会员	马寅初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会员
杜守素	中华工商	会员	张定夫	复旦大学	会员
马宗融	复旦大学、台湾大学	会员	张泽瀛	交通大学	会员
蔡　仪	大夏大学、杭州艺专	会员	夏康农	幼师	会员
郭绍虞	同济大学	会员	楚图南	上海法学院	会员
胡梅邨	暨南大学	会员	盛叙功	复旦大学	会员
卢于道	复旦大学	会员	张文郁	幼师	会员
戴望舒	上海市立师专	会员	吴逸民	麦伦中学	会员
潘世兹	圣约翰大学	会员	王师复	复旦大学、台湾大学	会员
胡文淑	复旦大学	会员	彭信威	复旦大学	会员
陈子展	复旦大学	会员	萧子风	暨南大学、云南大学	会员
王以中	复旦大学	会员	林穆光	圣约翰大学	会员
吴　天	戏剧专校	会员	刘　笃	同济大学	会员
萧　乾	复旦大学	会员	董每勘	戏剧专校	会员
程应镠	政法学院、上海市立师专	会员	陈旭麓	大夏大学	会员
陈四维	中华工商	会员	杨　烈	同济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会员
陈文彬	暨南大学	会员	朱伯康	复旦大学	会员
汤德明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会员	郭森麒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会员
赵书文	复旦大学	会员	林志纯	大夏大学	会员
陈守实	复旦大学	会员	许幸之	戏剧专校	会员

▼（续表）

姓　名	任职单位	备　注	姓　名	任职单位	备　注
薛葆鼎	光华大学、交通大学	会员	浦寿海		会员
范云迁	苏社教	会员	胡曲园	复旦大学	会员
穆木天	同济大学	会员	郑权中	复旦大学	会员
杨村彬	戏剧专校	会员	郑建国	沪江大学	会员
勾适生	大夏大学	会员	章洪楣	暨南大学	会员
杨一之	同济大学	会员			
以上93人，以下为最后入会的会员					
邓尔敬	音专	会员	杨嘉仁	音专	会员
劳景贤	音专	会员	范　杨	新中国法商学院	会员
冯　契	同济大学	会员	李炳焕	复旦大学	会员
徐中玉	沪江大学	会员	曹亨闻	复旦大学	会员
朱绍文		会员	孟宪章	民治	会员
凌舒谟	上海商学院	会员	曹辛汉		会员
以上全部105人					

附表6

“大教联”干事名单

年　份	干事成员
1947年	张志让、沈体兰、彭文应、蔡尚思、潘震亚、李正文、孙大雨
1948年	沈体兰、张志让、曹未风、李正文、郑太仆、夏康农、孙大雨、卢于道、马寅初。候补：蔡尚思、潘震亚、周谷城、彭文应、刘佛年
1949年2月13日	补选：董每勘、林穆光、陈仁炳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干事：曹未风、潘震亚、陈望道、周予同、蔡尚思、周谷城、许杰、刘佛年、李正文 候补：张孟闻、吴泽、郑太仆、郭绍虞、吴文祺、章靳以、孙大雨、陈逵、杨烈、张明养

附表7

“大教联”附设“文化研究所”委员名单

文化研究所委员列表	
常　委	沈体兰、张志让、曹未风、郑太仆、蔡尚思
委　员	沈体兰、张志让、曹未风、郑太仆、蔡尚思、李正文、翦伯赞、萧子风、许杰、吴逸民、孙大雨

附表8

《独立时论》撰稿人情况

姓　名	籍贯	生年	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胡　适	安徽绩溪	1891	中国公学	美国	哲　学	北京大学校长，中文系教授、主任
崔书琴	河北故城	1906	南开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张佛泉	河北宝坻		燕京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王聿修	天津市			美国	政治学	北京师院政治学系
赵迺抟	浙江杭州	1898	北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毛子水	浙江江山	1893	北京大学	德国	历史学	北京大学史学系
汪敬熙	山东济南	1893	北京大学	美国	社会学	北京大学动物学系[1]
陈雪屏	江苏宜兴	1902	北京大学	美国	教育学	北京大学教育学系
燕树棠	河北定县	1891	北洋大学	美国	法　学	北京大学法律系
朱光潜	安徽桐城	1897	香港大学	英国、法国	美　学	北京大学西语系
郑天挺	北京市	1899	北京大学		历史学	北京大学秘书长、史学系主任

▲1 1948年任联合国科学部主任。

▼（续表）

姓　名	籍贯	生年	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郑华炽	广东中山	1893	南开大学	奥地利	物理学	北京大学教务长、物理学系
邱　椿	江西宁都	1897	清华大学	美国	教育学	北京大学教育学系主任
杨西孟	四川江津	1900	北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陈振汉	浙江诸暨	1912	南开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蒋硕杰	上海市	1918		英国	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马大猷	广东潮阳	1915	北京大学	美国	物理学	北京大学物理学系
陈友松[1]	湖北京山	1899		美国	教育学	北京大学教育学系
冯　至	河北涿州	1905	北京大学	德国	文　学	北京大学西语系
韩寿萱	陕西神木		北京大学	美国	历史学	北京大学史学系
周作仁				美国	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沈从文	湖南凤凰	1902			小说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
邓嗣禹[2]	湖南长宁	1905	燕京大学	美国	历史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吴之椿	湖北沙市		文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王铁崖	福建福州	1913	清华大学	英国	法　学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楼邦彦	江苏鄞县	1912	清华大学	英国	法　学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吴恩裕	辽宁沈阳	1909	清华大学	英国	政治思想史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胡先骕	江西新建	1894	京师大学堂	美国	植物学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

▲1 陈友松曾在菲律宾师范学校学习。

2 1948年5—6月间，邓嗣禹休假期满，回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书。

▼（续表）

姓　名	籍贯	生年	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专　业	任职单位
吴景超	安徽徽州	1901	清华大学	美国	社会学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雷海宗	河北永清	1902	清华大学	美国	世界史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陈岱孙	福建闽侯	1900	清华大学	美国	经济学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经济学系主任
张印堂	山东泰安	1902	燕京大学	英国	地理学	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
戴世光	天津市	1908	清华大学	美国	统计学	清华大学经济学系
徐毓枏	江苏无锡	1912	清华大学	英国	经济学	清华大学经济学系
齐思和	山东宁津	1907	燕京大学	美国	西洋史	燕京大学历史系
郑林庄	广东中山		燕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燕京大学经济学系
粟寄沧					经济学	铁道学院经济学系
陈序经	湖南文昌	1903	复旦大学	美国	社会学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张　锐			南开大学		经济学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袁贤能	浙江天台	1898	燕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傅筑夫	河北永年	1902	北京师大	英国	经济学	南开经济研究所
萧公权	江西泰和	1897	清华学校	美国	政治学	政治大学政治学系
陶孟和	天津市	1888	南开学校	英国	社会学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巫宝三	江苏句容	1905	清华大学	美国	经济学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彭光钦	重庆长寿	1906	清华大学	美国	生物学	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

附表9

《新路》作者群

作　者	籍贯	生年	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学校	专　业	任职单位
吴景超	安徽徽州	1901	清华大学	美国芝加哥大学	社会学	清华大学
潘光旦	江苏宝山	1899	清华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社会学	清华大学
钱端升	上海市	1900	清华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	政治学	哈佛大学
周炳琳	浙江黄岩	1892	北京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听课三年	法　学	北京大学
戴世光	天津市	1908	清华大学	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经济学	清华大学
袁　方	湖南汉寿	1918	西南联大		社会学	清华大学
龚祥瑞	浙江宁波	1911	清华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政治学	清华大学
刘大中	江苏武进	1914	交通大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	经济学	清华大学
楼邦彦	浙江鄞县	1912	清华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政治学	北京大学
徐毓枏	江苏无锡	1912	清华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	清华大学
陈　达	浙江余杭	1892	清华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社会学	清华大学
翁独健	福建福清	1906	燕京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	历史学	燕京大学
蒋硕杰	上海市	1918	日本庆应大学预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	北京大学
陈振汉	浙江诸暨	1912	南开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	经济学	北京大学
吴泽霖	江苏常熟	1898	清华大学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社会学	清华大学

▼（续表）

作　者	籍贯	生年	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学校	专　业	任职单位
王铁崖	福建福州	1913	清华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法　学	北京大学
全慰天	湖南南县	1917	西南联大		社会学	清华大学
胡寄牕	四川天全	1903	北平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史	
周锡卿	湖南宁乡	1915	交通大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经济学	驻日代表团技术专员
邵循正	福建福州	1909	清华大学	法国法兰西学院	历史学	清华大学
胡庆均	湖南宁乡	1918	西南联大		社会学	清华大学
赵人儁	浙江兰溪	1900	清华学校	美国哈佛大学	经济学	清华大学

附表10

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整理，卷宗号J2-2-332。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资料 注

1．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名单

王崇植	吴半农	吴景超	周炳琳	孙　拯	陶孟和	孙越崎
刘大中	钱昌照	钱端升（缺席期中由楼邦彦先生代理）				萧　乾

2．成立大会的情况

1948年3月1日下午2时，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假欧美同学会举办成立大会，会员缺席及代理情况如下：

缺席人	代理人	缺席人	代理人
江季平	姚念庆	朱忠道	钱昌照
谷春帆	刘大中	吴蕴初	钱昌照
张文潜	刘大中	张志让	萧　乾
卢作孚	孙越崎	卢郁文	吴景超
沈家祯	姚念庆	邵力子	钱昌照
段锡朋	周炳琳	章靳以	萧　乾
万家宝	丁　忱	霍亚民	吴景超

▼选举情况

提名委员	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	
提名候选人	理事	王崇植、王铁崖、朱光潜、朱忠道、谷春帆、吴半农、吴景超、周炳琳、孙拯、孙越崎、翁独健、陶孟和、章靳以、叶景莘、杨振声、楼邦彦、刘大中、钱昌照、钱端升、霍宝树、萧乾、徐毓枏
	监事	吴蕴初、邵力子、段锡朋、孙多钰、童冠贤、卢作孚

▼选举结果

理　事				常务理事	监　事
周炳琳	钱昌照	吴景超	孙越崎	吴景超	邵力子
萧　乾	潘光旦	刘大中	钱端升	钱昌照	吴蕴初
陶孟和	王崇植	楼邦彦		周炳琳	童冠贤

3．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会员名册

姓　名	任　职
丁　忱	申新二五厂管理处秘书
王崇植	开滦矿务局总经理
王铁崖	北京大学教授
石志仁	交通部平津区铁路管理局局长
任　华	清华大学教授
朱光潜	北京大学教授
朱忠道	前行政院副秘书长
江季平	中国派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专门委员

▼（续表）

姓　名	任　职
谷春帆	汇政储备汇业局局长
沈家祯	久大企业公司总经理
吴之椿	北京大学教授
吴半农	中国驻日代表团代表
吴景超	清华大学教授
吴蕴初	天原天利日化厂总经理
吴泽霖	清华大学教授
李庆海	清华大学教授
邵力子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周炳琳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林耀华	燕京大学教授
姚念庆	资源委员会秘书
段锡朋	中央委员
孙　拯	资源委员会委员
孙乾方	南开大学教授
孙多钰	开滦矿务局董事
孙越崎	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
徐淑希	中国派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副代表
徐毓枏	清华大学教授
翁独健	燕京大学教授
高　植	中央大学教授
陈　达	清华大学教授
陈　源	教育部驻英文化委员
陈振汉	北京大学教授
马大猷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
陶孟和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陶葆楷	清华大学教授
章靳以	复旦大学教授
张文潜	大生纺织公司经理

▼（续表）

姓　名	任　职
张志让	复旦大学教授
张祖良	前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南京合署总务科长
冯　至	北京大学教授
童冠贤	北京大学教授
万家宝	戏剧学校教授
费孝通	清华大学教授
叶景莘	前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
杨西孟	北京大学教授
杨振声	北京大学教授
赵人儁	清华大学教授
赵迺抟	北京大学教授
楼邦彦	北京大学教授
刘大中	清华大学教授
潘光旦	清华大学教授
蒋硕杰	北京大学教授
卢作孚	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
卢郁文	资源委员会参事
钱昌照	资源委员会顾问
钱端升	北京大学教授
霍宝树	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戴世光	清华大学教授
萧　乾	复旦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一、专著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

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蔡国裕：《19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

蔡鸿源：《民国人物别名索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897—1987）——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查国华：《茅盾年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陈达：《浪迹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陈纪滢：《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1879—1915）》，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

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邓加荣：《寻找储安平》，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上、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广州：广州出版社，1993年。

丁亚平：《萧乾·文洁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

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丰一吟：《丰子恺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冯雪峰：《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冯英子：《风雨故人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

冯英子：《劲草——冯英子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傅长禄：《中国现代文化史略》，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耿云志：《胡适新论》，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明）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自反录》，清光绪三年（1877年）泾里宗祠刊本。

郭沫若：《郭沫若自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胡不归等：《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胡明：《胡适传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胡适、马叙伦、陈鹤琴：《四十自述·我在六十岁以前·我的前半生》，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

黄炎培等：《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872—192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焦润明：《傅斯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金克木：《孔乙己外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久宣：《商务印书馆——求新应变的轨迹》，台北：利丰出版社，1999年。

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洪涛：《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李辉：《和老人聊天》，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娟丽等：《军学奇才——蒋百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台北：一方出版社，2002年。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梁实秋：《梁实秋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林徽因：《林徽因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林元：《碎布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

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刘义林等：《张君劢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柳和城：《张元济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鲁迅、许广平：《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陆建华：《闻一多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鹿桥：《未央歌》，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

栾梅建：《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梅志：《胡风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钱穆：《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尚丁：《黄炎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邵伯周：《茅盾评传》，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

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委员会，1984年。

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

宋亚文：《施复亮政治思想研究（1919—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孙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美］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陶菊隐：《蒋百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陶菊隐：《蒋百里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田汉：《田汉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王艾村：《柔石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王华斌、王燕子：《黄炎培》，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

王觉源：《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王绍增：《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王世贞：《张君劢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

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王思鬻、李肃东：《贺麟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云五：《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王云五：《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

王则柯：《感受普林斯顿》，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

闻黎明：《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吴大猷：《回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

吴其昌：《梁启超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6—9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谢泳、程巢父：《追寻储安平》，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谢泳：《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谢泳编：《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熊月之：《万川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许纪霖：《无穷的困惑——两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许纪霖：《许纪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许渊冲：《追忆似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薛化元：《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发展：张君劢思想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

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杨绛：《杨绛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杨永乾：《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唐山：唐山出版社，1993年。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姚可昆：《我与冯至》，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叶绍钧等：《文艺写作经验谈》，重庆：天地出版社，1943年。

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张人凤、邹振环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美］叶文心等：《上海百年风华》，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

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

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俞可平：《社群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美］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美］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张巨才、刘殿祥：《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9年。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

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

张其昀：《崔书琴纪念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张起钧：《儒林逸话》，台北：学海出版社，1982年。

张荣华：《张元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张耀南：《张东荪》，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北京：文汇出版社，2000年。

赵锡骅：《民盟史话（1941—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郑大华：《张君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郑心伶：《鲁迅与青年作家》，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年。

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郑逸梅：《书报话旧》，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

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周健强：《聂绀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

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

朱光潜：《朱光潜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子通：《胡适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

邹鲁：《回顾录》，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左舜生：《万竹楼随笔》（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左玉河：《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二、编著

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成仿吾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成仿吾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

《大公报》（天津版影印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李大钊全集》编委会编：《李大钊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897—1997）》，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申报》（影印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

《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中国现代教育家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北大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影印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

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

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陈平原等编：《追忆蔡元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陈漱渝编：《郭沫若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

戴文葆、张之一编：《张明养同志纪念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杜呈祥编著：《邹容》，北京：青年出版社，1946年。

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杜运燮、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

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高崧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897—1992）——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关鸿等编：《迟到的理解》，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海风主编：《吴趼人全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

恒社旅台同仁编：《杜月笙（镛）先生纪念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环球社编辑部编：《图画日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黄延复、马相武主编：《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

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

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蒋复璁等编：《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蒋光前等编：《蒋百里先生全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

金华县政协教文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华县文史资料》（第10辑），1999年。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金岳霖文集》（第4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编：《中国科学家回忆录》（第1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李盛平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

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梁仁选编：《你我·匆匆：朱自清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柳光辽等编：《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吕希晨等选编：《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麻星甫编：《一生心事问梅花：楚图南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

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人物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组：《新文学史料》（第4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

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影印本），商务印书馆内部资料（1980—1993年）。

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规则汇编》（影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

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上海通社编：《旧上海史料汇编》，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年。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上海图书馆，1979年。

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文》（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石之瑜编著：《宁静致远、美丽人生：沈昌焕先生纪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苏双碧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

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王灿炽编：《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

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

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见《胡适研究论丛》（第3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王明根主编：《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

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1949.2北大地下党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王学珍、郭建荣编：《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王云五主编：《重印东方杂志全部旧刊总目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

王增藩主编：《复旦大学教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吴天任编：《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出版社，1946年。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异天、戈德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虞坤林编：《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

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演讲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袁刚等编：《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演讲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合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西南联大精神永垂云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建校65周年纪念文集（1938—2003）》，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张曼菱编：《西南联大启示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张汝伦编选：《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赵帝江等编：《柔石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赵遐秋编：《新月诗魂——名人笔下的徐志摩 徐志摩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郑大华编：《两栖奇才——名人笔下的张君劢 张君劢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1926—198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中国民主同盟文史委员会编：《我与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1年。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5年。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西文史资料》（第12辑），1988年。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4年。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7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兴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兴义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8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总11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4、5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第10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史料征集组，1991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望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普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90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91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蒙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蒙自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97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蒙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蒙自文史资料》（第3辑），1998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9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

朱传誉主编：《傅孟真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朱传誉主编：《梁启超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

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

朱宗震、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庄丽君主编：《世纪清华》（2），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三、译著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美］本杰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加］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法］布尔迪约、［法］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法］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李桐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美］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

［美］费正清：《中国之行：五十年回忆录》，赵复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波］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郑斌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林右崇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年。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饮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年。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法］朋尼维兹：《布赫迪厄——社会学的第一课》，孙智绮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英］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美］维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美］约瑟夫·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美］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岳谦厚、张玮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四、外文著作

Chartier, Rog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14th and 18th Centuries*, trans. Lydia G. Cochra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uang, Philip C.,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Israel, John,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Taylor, Charles,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Yap, Key-chong, *Western Wisdom in the Mind's Eye of a Westernized Chinese Lay Buddist: The Thought of Chang Tung-sun (1886—1962)*, Oxford D. Phil. Thesis (Hilary Term, 1991).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木之内誠、『上海歴史ガイドマップ』、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年。

五、报刊 / 馆藏资料

《北京大学日刊》（1917—1932年）。

《北京大学月刊》（1919—1922年）。

《晨报副刊》（1919年2月7日改版至1921年10月12日独立为《晨报副镌》）。

《创造》。

《大公报》。

《东方杂志》。

《独立评论》。

《独立时论》。

《观察》。

《国讯》。

《华西晚报》。

《江苏》。

《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1919—1922年）。

《今日评论》。

《警钟日报》。

《救亡通讯》。

《剧艺社社友通讯》。

《民立报》。

《民主周刊》。

《清华校友通讯》。

《清华校友文稿选辑》。

《人民文学》。

《上海地方协会月刊》。

《少年中国》。

《社会新闻》。

《申报》。

《十月》。

《时事新报》。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时与文》。

《苏报》。

《太平洋报》。

《无名文艺旬刊》。

《新潮》。

《新路》。

《新青年》。

《战国策》。

《正义报》。

《中建》。

《中外日报》。

《中学生》。

《中央日报》。

《周论》。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整理，卷宗号J2-2-332。

上海档案馆藏“《时与文》档案”，卷宗号46-12-93。

上海档案馆馆藏“《观察》档案”，卷宗号Q06-12-160。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黄炎培日记》。

六、论文 / 文章

《张东荪研究专辑》，《中国文史研究通讯》1999年第2期。

《周作人致吴海发信（手稿）》，《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9期。

白逸琦：《研究系与北洋政治（1916—1928）——温和型知识分子的宪政主张及其贡献》，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韩］白永瑞：《从庆典到反抗：五四时期天安门集会的由来》，见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

蔡尚思：《上海大教联与信史实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曾业英：《梁启超与民主党》，《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陈方竞：《北京大学“校”与“刊”的结合及其“公共空间”的开拓》，见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5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陈隽、佟立容：《陈干与辛亥革命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

陈谧等：《陈黻宸年谱》，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2003年第1期。

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见汪军主编：《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京剧、近代工业和新文化的源头》，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

陈旭麓：《〈国民日日报〉评述》，见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陈永忠：《储安平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陈与龄：《林白水先生传略》，《东方杂志》1935年第13期。

陈长河：《梁启超与北京松坡图书馆》，《民国春秋》1994年第2期。

程波：《新诗现代性的特殊生态——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程光炜：《“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楚图南：《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文史哲》1980年第4期。

楚永全：《梁启超与〈改造〉》，《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

楚永全：《民初建设“强善政府”的尝试——以进步党、研究系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理论与实践为例》，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戴海斌：《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邓广铭：《胡适在北京大学》，《传记文学》（台北）2000年第76卷第3期。

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见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传记文学》（台北）1985年第46卷第1期。

董国强：《论1910—19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展流变——以〈新青年〉同人群体、“新月派”和“独立评论派”的结构分析为视角》，《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董国强：《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

方平：《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预备立宪公会》，见熊月之、高纲博文主编：《透视老上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付美英、方裕谨：《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对革命书刊的封禁》，《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独立评论》1936年第188号。

高力克：《五四时期研究系的“第三条道路”》，《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5期。

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耿云志：《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谷小水：《丁文江与胡适关系略论》，《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

谷小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丁文江这个人》，《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12月号。

谷馨山、赵树芬：《上海泰东图书局与新文学运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顾农：《西南联大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9期。

关德懋：《翁文灏其人与事》，《传记文学》（台北）1980年第36卷第4期。

郭延礼：《传媒、稿酬与近代作家的职业化》，《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

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上海通志馆期刊》1934年第3期。

胡思敬：《国闻备乘》，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胡伟希：《清华学派的“日神精神”——兼论20世纪中国的学术类型》，《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

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黄大受：《忆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活》，《文史杂志》1996年第3期。

黄金麟：《仪式与论述：民初科玄论战的论述与分析》，《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之三：人文及社会科学》（台北）1995年第5卷第2期，1995年7月。

黄敏兰：《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2期。

蒋硕杰：《我与刘大中三十年的友谊》，《传记文学》（台北）1993年第63卷第6期。

蒋廷黻：《我看胡适之先生》，《文星》（台北）1962年第9卷第6期。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金珍焕：《五四时期研究系的政治主张》，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日］井上红梅、董炳月：《采访周作人》，《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8期。

李帆：《陈独秀与刘师培》，《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

李惠惠：《新潮杂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5年。

李娟：《新潮社扩充为新潮学会的原因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李平书、穆藕初、王晓籁：《李平书七十自叙·藕初五十自述·王晓籁述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李仁渊：《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思与言》2005年第3期。

李树青：《纪念杰出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传记文学》（台北）1985年第46卷第1期。

李伟民：《文化与人文的精神圣地——读〈西南联大历史情景中的文学活动〉》，《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李喜所：《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李宪瑜：《〈新青年〉杂志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李宜霞：《论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大公报·文艺》1936年第102期。

刘曾兆：《清末民初的商务印书馆——以编译所为中心之研究（1902—193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刘光第：《南旋记》，见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

刘贵福：《钱玄同与五四思想革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刘桂生、岳升阳：《北京宣南士人文化空间的形成与戊戌维新》，见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刘明：《论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员聘任》，《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9月号。

刘为民：《〈晨报副镌〉与〈科学〉杂志》，《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刘燕：《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北京档案》2003年第11期。

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刘祚昌：《西南联大忆旧——兼论“西南联大精神”》，《学术界》2001年第1期。

逯耀东：《胡适与北京的饭店》，见逯耀东：《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社会后果》，《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6月号。

罗志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吕文浩：《日军轰炸西南联大的后果》，《文史精华》2002年第3期。

吕文浩：《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马自毅：《冤哉，秋瑾女士——析时论对秋瑾案的评说》，《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蒙树宏：《谈西南联大的小说作者群》，《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2期。

孟悦：《“世界主义”景观与双重帝国边界上的都市社会》，《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闵锐武：《〈甲寅杂志〉与〈青年杂志〉的渊源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欧阳军喜：《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欧阳哲生：《胡适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潘光哲：《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以一九〇三年为例的一些思考》，《近代中国》（台北）2001年第145期。

齐世荣：《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千家驹：《我与吴晗》，《传记文学》（台北）1990年第57卷第2期。

钱晓文：《北京〈晨报〉研究》，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沈从文：《谈朗诵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沈寂：《苏曼殊与陈仲甫》，见丁守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苏鹏：《海沤賸瀋》（选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4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苏绍柄：《1905年反美运动各地开会日表》，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

苏云峰：《民初之知识分子（1912—1928）》，见《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年。

汤一介：《“真人”废名》，《万象》2002年第9期。

陶希圣：《遨游于公卿之间的张季鸾先生》，《传记文学》（台北）1977年第30卷第6期。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6年第5期。

汪荣祖：《自由主义在战后中国的起落——储安平及〈观察〉的撰稿群》，《传记文学》（台北）1995年第63卷第4期。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汪子嵩：《中西哲学的交会——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之一、之二），《读书》1999年第9、10期。

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台大文史哲学报》（台北）2002年第56期。

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2月号。

王鸿泰：《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见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王楫、张源潜、王景山：《西南联大文艺社忆旧》（上、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5期。

王家修：《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片断回忆》，见政协贵州省都匀市委员会编：《都匀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6年。

王景山：《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王荣：《“大公报文艺奖金”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见巴金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王政：《李大钊在〈晨钟〉报本事考信述要》，《学术研究》1999年第3期。

王志宇：《欧事研究会初探（1914—1916）》，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1年。

韦宗友：《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爆发》，《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A1期。

［韩］吴炳守：《民初张东荪国家建设构想的形成》，见《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韩］吴炳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及其基础》，《史林》2002年第1期。

［韩］吴炳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建设构想及其实践》，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吴铭能：《从书信看梁启超生活侧面》，《贵州文史天地》1998年第3期。

伍启元：《抗战期间的教学生涯》，《传记文学》（台北）1994年第65卷第6期。

萧公权：《清华五年——问学谏往录之九》，《传记文学》（台北）1970年第17卷第4期。

萧乾：《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随笔》1984年第5期。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读书》1984年第10期。

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组：《新文学史料》（第2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萧乾：《致严家炎》，见《萧乾文集》（第10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谢泳：《钱钟书与西南联大》，《新闻出版交流》1996年第6期。

谢泳：《西南联大的启示》，《读书》1994年第12期。

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熊月之：《一百年前的假孙中山案》，《文汇报》2003年6月11日。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8月号。

徐少红、凡佳：《梁启超南京讲学记》，《南京史志》1999年第2期。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杂志》2005年第1期。

许纪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张君劢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学海》2005年第1期。

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许钦文：《来今雨轩》，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组：《新文学史料》（第3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颜浩：《“某籍某系”和“东吉祥诸君子”——1920年代中后期北大的两个教授集团》，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颜浩：《民间化：现代同人杂志的出版策略——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杂志和北新书局》，《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杨国强：《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史林》2006年第4期。

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杨天宏：《“开窗”还是“拆房”——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目标与取径辨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

杨早：《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刊物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杨振宁：《永不消逝的友谊——我和黄昆在西南联大》，《党史纵横》2002年第8期。

姚丹：《西南联大中文系、外文系和校园里的新文学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美］叶凯蒂：《从护花人到知音——清末民初北京文人的文化活动与旦角的明星化》，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叶其忠：《“知识即生活”：从张东荪与张君劢间的一场辩论看张东荪早期认识论的核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2002年第37期。

叶其忠：《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96年第26期。

叶其忠：《1923年“科玄论战”前张君劢对欧战四个看法之嬗变及其批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2000年第33期。

叶其忠：《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人生观〉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与扩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96年第25期。

［美］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

元青：《梁启超晚年的国民运动观刍议》，《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元青：《章太炎与梁启超》，《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日］原正人：《中国之前途：集权乎？分权乎？民国初期张君劢、张东荪的〈联邦论〉》，《“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2003年第20期。

张宝明：《“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2期。

张凤鸣：《学习生活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邵阳市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

张佛泉：《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独立评论》1937年第230号。

张红：《抗战时期内迁进步知识分子对其历史使命认识刍论》，《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张继：《回忆录》，见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张剑：《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析》，《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

张玲霞：《论西南联大的文艺社团及其刊物》，《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

张敏：《晚清上海租界文人职业生活（1843—1900）》，见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张朋园：《进步党——兼论清末民初温和型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1982年。

张芹：《〈晨报〉副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张同道：《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张夏珍：《论西南联大作家群的杂文艺术》，《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张新颖：《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实主义诗群》，《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章开沅：《论汤寿潜现象——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之一》，《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章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代际意识”的萌生及其意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7期。

赵捷民：《回忆西南联大》，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第18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郑大华：《国家、社会与个人——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郑文祥：《1920年代上海的大学与学生文化》，《史林》2004年第4期。

郑勇：《社会转型中的文人结社——以南社研究为中心》，见王守常等主编：《学人》（第1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郑跃涛、魏颖：《试述研究系与北洋政府的外交委员会（1918—1919）》，《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宦乡年表》，见《宦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

周作人：《十字街头的塔》，《语丝》1925年第15期。

周作人：《夏之一周间：苦雨斋之一周》，《现代》1932年第1卷第5期。

周作人：《志摩纪念》，《新月》1932年第4卷第1期。

朱洪斌：《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朱志敏：《李大钊参加“研究系”活动质疑》，《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朱志敏：《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庄森：《〈青年杂志〉相承〈甲寅〉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再版后记

本书初版于2008年，这次承蒙世纪文景的盛情重新出版，我找到当年的初版，重新翻阅一遍，不胜感慨。本书的其他七位作者，都是我的学生，12年后，都已经“长大成才”：瞿骏、唐小兵已经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宋宏、王晓渔继续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任教；王儒年如今在中国药科大学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郑志峰已经成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的教授、副院长；而储德天，也已经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策划编辑。其中有几个名字，读者可能比较熟悉，他们早已成为史学界和公共知识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学人。光阴如梭，当年是一大带七小，如今稍显夸张地说，本书的作者群颇有点阵容豪华的意味了！

12年间，风云变幻，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初心：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深切关注和一往情深。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从1980年代的“文化热”开始热门，至今已经持续了30多年。最初集中在从思想和政治的领域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新文化史在史学界的兴起和流行，我带领学生们尝试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与其所置身的城市之间的关系，发掘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迁如何推进和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这本书就是这一尝试的结晶。如今重新阅读，不仅没有过时之感，反而有新的意蕴所在。

到目前为止，世纪文景已经出版了我的三本书——《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有为有守：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不妨将这三本书看作一个研究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的系列。若连起来阅读，可以看到我个人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感谢世纪文景，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的机会。编辑们高质量的策划、设计、编校和后期推广，为拙作增添了光彩。什么是工匠精神？这就是出版业的工匠精神。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能够像世纪文景这样，贴近市场，贴近时代的脉搏，贴近作者和读者，那么，即使外在环境不变，中国的图书出版景象也会有一个不小的改观。

今年是又一个庚子年，国内国际发生了太多的大事，疫情猖獗，硝烟弥漫。不过，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不确定的世界里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家国天下情怀和求知求真的初心。对于一个知识人来说，何以解忧？唯有著述，岂有他哉！

许纪霖

2020年8月于樱园